

# 三里洞：上海支边矿工的影像史

林鑫 著

## 内容介绍

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虽然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无论从作品的数量或表现的深度来看，它们都为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保留了异常直观而丰富的记忆。并且，它们也对社会和艺术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

然而，相较于作者的勇猛精进和作品的迅速积累，当代纪录片的研究却大大滞后了。这种滞后的表现之一，是有关的探索大多建立在访谈和影片评论的基础上，而缺乏田野调查的功夫，这与纪录片如此深刻地切入生活的田野形成鲜明对比。缺少第一手资料的支撑，不仅会危及纪录影像研究的发展，也使当代纪录片难以得到有力的理论后援，看不清自己的过去以及未来的前途，在商业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日益式微。

《三里洞》或许会成为是一个转折点。作者林鑫是第一线的战士，也具有自我反省的睿智和勇气。他和妻子像蚂蚁一样日积月累，信守承诺，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影像资料整理和编撰工作。除了吴文光早年编写的《流浪北京》而外，这是中国当代纪录片基于田野观察的又一个重要文献。这部著作和电子版的《电影作者》同时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当代影像的作者已经不再满足单一的影像语言，而在寻求文字和影像的结合。只有在多重语言融会贯通的过程中，纪录片才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有积累、有生命力的文化，而不仅仅是一声愤怒但微弱的呐喊。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主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郭净博士

1955年，300多位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怀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希望和梦想，来到铜川的三里洞煤矿。50年后，当年的建设者大多不在了，在那片深埋着黑色煤炭的土地上，始终激荡着矿工的命运和呼吸。作为矿工之子，作者于2005年深入三里洞矿区，寻找拍摄那些活下来并依然生活在当地的老矿工，完成了纪录片《三里洞》。本书是关于《三里洞》的文献，也是一个更为深入的文本。从大量影像素材中整理出的矿工口述实录，真实地反映了矿工生活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作者关于三里洞的回忆文字以及对拍摄实践的思考，则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书中还收录了关于拍摄过程的文字、图文对应的脚本以及年表、剧照、对话、诗歌、绘画、地图等资料。

本书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作者拍摄、绘制和提供。



1、林鑫在纪录片《三里洞》拍摄中，2005年5月于铜川 菊芳摄



2、纪录片《三里洞》剧照



3、林鑫 2012 年 9 月自拍于铜川家中

## 作者介绍

林鑫 本名朱林鑫，1960 年出生于陕西省铜川市，祖籍江苏太仓。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西安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出版有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江苏画刊》提名《21 世纪优秀艺术家画集—林鑫》（江苏美术出版社）等。2003 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主要作品有《陈炉》（2004）、《三里洞》（2006）、《同学》（2009）、《瓦斯》（2010）《传道人》（2013）等。

### 林鑫联系方式：

电邮：[zlinxin@sina.com](mailto:zlinxin@sina.com)

手机：13319196985

住宅：0919-3581008

地址：陕西省铜川市新区正阳路 3 号 人民银行家属楼 1 号楼 4-502 室

邮编：727031

## 总目

序：当地人叙事与纪录片之光

第一部分 我的三里洞记忆

第二部分 寻找即将消失在时间尘埃中的矿工

第三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脚本

第四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札记

第五部分 三里洞矿工口述实录

第六部分 噢，父亲

第七部分 王小鲁对话林鑫

附录

后记

参考文献

## 目录

### 序：当地人叙事与纪录片之光

#### 第一部分 我的三里洞记忆

故乡，父亲和母亲

北公房

上学

太仓之一

电影

野根

三里洞矿中

记忆碎片

太仓之二

笛咏老师

待业

哥们

私奔

伤逝

画展

藤黄

诗集

兄弟

表妹的苦涩

思凡的成长

陈炉

云之南

三里洞，三里洞

生活在继续，拍摄在继续

我是铜川人

#### 第二部分 寻找即将消失在时间尘埃中的矿工

开拍之前

第一天的拍摄手记

我无法再次面对他的目光

压不住的爽朗笑声

当年的老照片也没有保存

风云人物葛登发

他不善言谈

副矿长陆荣初

被遮蔽的记忆

在芳草堤小区

剪不断的乡愁

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

那是他不愿触及的伤痛

在十里铺  
寻找童伢  
一个侥幸的人

陈义祥  
工程处

109 个名字

从黑暗中拉回的记忆

我的父亲朱永生

煤矿的痕迹

### **第三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脚本**

戚国其

顾龙祥

沈龙根

王正祥

姚洪昌

葛登发

张百生

陆荣初

周寿根

罗世俊

丁福珍

童 伢

高章顺

陈义祥

朱永生

### **第四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札记**

我遵循的拍摄原则

臣服于生活的逻辑

角度

彩色与黑白

生存三部曲

群像

两个声部：空镜和口述

结构

诗歌：我的在场

时间

空间

表象与真相

粗粝和精致

声音

剪辑

版本

限制和应对

业余

直觉

文化殖民地心态与自信

边界

风格

关于镜头语言的几则断想

纪录片《三里洞》的细节

影像：宏观历史和个体记忆

### 第五部分 三里洞矿工口述实录

顾龙祥 顾龙祥

朱永生

对话 1

对话 2

何菊珍

沈龙根 擻完煤再上罐，擻不完煤你就别想上来  
一个腰弯弯的，一个呼噜呼噜气喘不上

王正祥 你不报名就不行

大冒顶

对煤矿上我就是不感冒

光我用的炸药，可能要拉个几车皮了

我给他一个人一个耳光子

来的没有几个人了

一直到现在，我记着你妈这句话

姚洪昌 要走了，就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

三里洞属于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

他为支援大西北献身了

我现在也不想回去，哪的黄土不埋人

一提起朱永生，那是个老实人

你找着活就干，找不着活就……

葛登发 因为自己是个党员，应该吃苦在前

那个时候在铜川市是有名的

光扒人我扒了有十几个了

以矿为家，最后没有家了

娃埋怨，你也只能听听

你爸一辈子，苦一辈子

咱那时离开煤矿也是没办法

张百生 我是农村人，我不怕吃苦

又塌下来把我埋在里头

陆荣初 我在这 300 多人里面还是比较行的

从那时要命了，要命了

粮食根本不够吃

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

不容易，这个家是愚公移山

周寿根 支援大西北，无上光荣

凡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提前完成没问题

我好像在七一路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回来一样  
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还有上技工学校学三年，那都是骗人的

王俊彦 我那时是通风区区长  
湿衣服一天能穿八九个小时  
放一炮，瓦斯检查员要进去检查一次  
究竟还有多少人不太清楚  
我临走他还在通风区  
她说你想找共产党的组织干啥

罗世俊 感觉支援大西北光荣的很  
能扒出来就扒，扒不出来就算了  
我哭着说火车票没有了

倪进祥 白白地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啥

丁福珍 四个人一天要装 24 吨煤  
就我这一下，把二十多个人命救了  
有汇报说着火了，着火也不要紧，一样出煤

江兴怀 你不建设咋办，还得当亡国奴  
在煤矿上能干到最后，而且还活着，那是不简单

王福坤 说到西北也挺好的，也有太阳  
死了的死了，退休的退休，回老家的回老家  
井下这玩意，一不小心，就要发生事故

缪德新 说是支援大西北建设，那是骗来的  
掘进是为采煤开路的

成妙祥 我们那时候思想也动摇  
害怕也不行，干这一行没办法

童 仇 我底板这么丑  
一块手表  
对对对对对对  
给我安的罪名是畏罪自杀  
上访  
一件怪事情  
这是报废房子

高章顺 在铜川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  
破产以后，年轻人 45 岁以下的卖工龄

陈义祥 唯一的将来，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  
一打听知道我了  
矿区确实辛苦，说不辛苦是假的  
我们一代人基本上也完了  
这煤考古下来以后，是森林变成的

张电飞 每年药费一二百块钱，挂不了几次吊针都挂完了

叶永康 我到支架厂干自己老本行

毛老福 我调到红旗工程处当瓦工

朱阿宝 活一天算一天

陈长寿 给我们放了电影《顿巴斯矿工》



对于我来说，100个人也挑不出俩  
陆根福妻 人死了，等于啥也没有了  
跟着男人没有享过福  
打工嘛，跑到神木那边打工  
裘水标 他说你跟朱师傅学吧  
噢，那是冒顶碰住了

#### **第六部分 噢，父亲**

燃 烧  
噢，父亲  
不能忘记的父亲  
沉默的风景  
在开往西线的列车上  
我依恋着母亲  
梵高 黄色的梵高  
生命的结束是死亡的开始  
黑色的记忆  
黑色的闪电  
狼  
两朵并蒂的花  
小 妹  
这里曾是我的家  
大妹的婚期已经订下  
烛 光  
三个层次的星星  
第四维空间

#### **第七部分 王小鲁对话林鑫**

群像具有的力量  
社会的面相，崇高的纪实

#### **附录**

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煤城  
铜川市行政区划图  
铜川矿务局矿区位置图  
采煤工作面示意图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一）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二）  
三里洞煤矿简介  
铜川矿务局暨三里洞煤矿重大事件年表  
1955年上海支援三里洞煤矿部分人员名单  
朱永生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年表  
纪录片《三里洞》拍摄制作和放映  
林鑫纪录片作品

#### **后记**

#### **参考文献**

## 序：当地人叙事与纪录片之光

王小鲁

一

林鑫导演将他的纪录片《三里洞》相关文字结集成书，书中包括拍摄时的全部口述史资料，还有导演的个人史，又有他制作纪录片的过程和反思。这些都为了解林鑫的纪录片提供了材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此，但我这里主要想论述一下林鑫的纪录片，毕竟最近几年，他主要是作为纪录片导演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

分析林鑫的身份很有意义，在北京或云南的独立电影放映场所，他是纪录片导演，但回到铜川，他就是银行职员和市政协委员，还是个画家。不过他最早的身份，是三里洞煤矿瓦斯检查员的儿子，这些身份综合塑造了他的纪录片面貌。我从这本书中，看到林鑫在拍摄第一部纪录片《陈炉》之前，就曾在西安和北京做过展览，有架上绘画也有装置艺术，他其实是带着一种当代艺术的涵养和诉求进入纪录片制作的。当我们后来看到粗糙的《三里洞》的时候，很难相信他的第一个作品《陈炉》如此具有形式主义倾向。

林鑫的纪录片处女作《陈炉》只有30分钟，拍摄此片，林鑫是借了电视台的机器去的。陈炉是千年古镇，以陶瓷闻名。本片开头是一个360度摇镜，描绘了陈炉的空间特征。之后它以三个章节结构全篇：自说、风骨、风情。在第一章里，它把本地人的采访剪切在一起，每个人用一句话评价陈炉。不同的人是这样评价陈炉的：

“陈炉的面貌有大改变！”“陈炉就是学校不行。”“在共产党领导下，陈炉人民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这里就是缺水，漏水，愁死了。”“一天到晚唱个戏，快乐，心情舒畅。”“陈炉是苦恼，工厂也散了，人越来越少。”……

加上丰富的表情，这样的镜头组接富有幽默感。第二章节则以特写或均匀的摇镜描绘了陶瓷工艺流程，这里也有一种文献性，但观众更加留意其中传达出来的视觉效果。第三章节主要描绘当地人的内部和外部生活空间。很多短促的镜头堆积在一起，时而叠化，时而跳切，声音时而配上本地戏唱腔，所以本片很像一堆静帧照片组成的MTV。我称这纪录片是交响乐式的，用的是旅游者的视角，它富有观赏的愉悦，却无法完成深入的社会叙述。人们在镜头前讲话的短促镜头固然也有丰富的内涵：他们有的腼腆，对于公众发言感到不适应；有的则被召唤（摄像机在他们眼中等于官方电视台），说出了官方化的语言……纵然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看到每个人物在讲话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联系。因此，《陈炉》是一个有趣的纪录片小品，展现了导演影像营造的能力。

到了《三里洞》，林鑫的纪录片制作有了大的变化，它更加质朴了。这也许与他面对的问题相关：他开始处理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此刻的他变得肃穆起来。他从此找到了他纪录片创作和个人表达的坚硬支点——煤矿。他的纪录片观念也在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曾对最近几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意志进行总结——目前它们处于一种“主体渐显”的倾向里，作者都希望自我的艺术能力和身影在作品中得到更多显扬。但在十多年前的纪录片导演自述和评论文章里，人们更多希望纪录片作者在工作时不要张扬自我，而是让客观世界独自呈现……而今，林鑫就是要退回到这样的倾向里。他曾多次强调艺术家在现实和历史面前的无力，他唯一要做的是要谦卑，要让历史讲述不受个人自恋性元素的干扰。

统观林鑫的生命状态，我觉得这一态度转变，是有一个特殊的文化语境的。此后个人史和社会史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对象，他的工作态度是历史学的态度，不是主观浪漫主义的。多

年后，他将自己在纪录片工作中获得的素材出书，我觉得这做法显示了他一直以来以影像写史的愿望，他不是一个人过于追求“作品性”的导演，而逐渐凸显了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自然和恰当的事情。

## 二

我和林鑫相识，也是因为纪录片《三里洞》——它片长接近3小时，拍摄完成于2005年。我在2007年的南京影展（CIFF）上遇到他，想聊一下此片的情况。那时他蓄着大胡子，外表粗犷，但没谈几句他已泣不成声。他声音低沉、话语绵密，句子之间不加标题符号，如同水流永不停息，这几乎也是他的纪录片的口吻。他当时究竟说了什么，我几乎完全没有听清。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不同场合流露出类似感情。

我曾思索他的人格特征，是什么让他这般哀伤和密集的倾诉？是生活下面积蓄了太多悲剧？这么多话语集中喷发，背后似乎有一个重要的源泉。1955年，林鑫的父亲和300多个上海工人在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来到铜川三里洞，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目标，生命尊严被贬损乃至被事故扼杀。林鑫的父亲是瓦斯检查员，积劳成疾，后来林鑫耿耿于怀的是父亲病逝在工作岗位，欠了矿上几百块钱，矿上还差人来讨要。从《三里洞》的口述史里可以看到，晚年的矿工境况恶劣，无钱治病，房屋也面临拆迁。这些困难显然是国家控制的结果。离开三里洞多年的林鑫回来时，此处已废墟一片，但他重新忆起旧日生活所面临的艰辛和恐慌，往日的气息和死去的没有得到安抚的灵魂，一切都不可遏抑地涌现出来。

当该说的话未说，该解决的未解决，这个世界是不平衡的，它必须被说出、被解决，这符合力学原理。那些不曾被书写的细节、被压抑在地层深处的话语，急不可耐，浩浩荡荡地涌出，它们终于找到了一张嘴、一个管道——瓦检员的儿子林鑫以及他的纪录片。林鑫似乎被无名力量召唤，话语跌跌撞撞，但充满了有份量的内容。他的纪录片如同煤矿的安魂曲。

艺术工作者被当作灵媒和神圣使命承担者，这在东西方文艺理论史里都不少见。在他的《三里洞》书稿里，收录了他的诗歌，他在一首关于煤矿的诗里用了一个词——“宇宙的沉冤”。他还在文章中说：“我是大地的儿子。”这些表述都富有激情，也富有超验色彩。我们经常分析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文化心态的特殊性，而在林鑫这里，当他拍摄没有社会内容的《陈炉》时，得到了领导赏识，后来拍摄了《三里洞》，他在银行的生存空间顿时变得狭窄起来，虽然获得了影展交流的机会，但没有任何赢利。支撑他的应该是一种文化力量，但那具体是什么呢？

一套文化符号的学习——书籍里的文字会赋予孜孜不倦者内在的心理节奏，还会控制和引导其心灵的流向，那种道义的传承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完成；另外林鑫生于60年代，在他的书稿里，我看到80年代理想主义对他的影响——理想主义者有一种献身精神；而且在林鑫的片子里，我观察到一些细节——他对于精神性符号的特别偏好。在《三里洞》、《同学》和后来的《瓦斯》里，他对基督教视觉元素的捕捉，都十分敏感，《三里洞》结尾他用了圣歌《神爱世人》做配乐。

林鑫作品里的献身精神，上面我们已经提及：从纪录片《三里洞》开始，他的艺术家身份的逐渐撤退。应该把《三里洞》和之后的《同学》（拍摄于2007—2008年）放在一起看，因为两个作品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处。它们都是群像式的，都超过了观赏愉悦所需要的长度。《三里洞》里有十几位矿工的口述，口述的内容基本都在说他们如何从上海被“半欺骗性”地运到了铜川，然后是煤矿上的工作状况，尤其瓦斯事故是所有人的心结，最后都叙述了当下的艰难境况。不同人的讲述内容其实多是重复的，乃至策展人曹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三里洞》里不同人的口述如同传唱耶稣故事的“四福音书”。

不过历史不是神话，林鑫显然着力于历史知识的确切性：大家所谈皆为历史的证言，采访人数的众多和众口一词，是为了证明悲剧的普遍性和结论的客观权威性。《同学》的做法则更加极端，203分钟的片长里竟然放进去了23位同学的跟拍和口述。每个人5到10分钟的篇幅。这些人得以联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林鑫在三里洞煤炭子弟中学时的78级同学。多年之后，林鑫想知道当年的这些同学都在做什么，于是就开始联络。他强调这些受访者都是他任意抽取的样本，而且采访拍摄也都是随机的，每个人只跟拍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因此我称林鑫的这两部作品为“影像统计学”。

他的剪辑也安分守己，把每个人的素材都按差不多的长度罗列在一起，如此毫无修饰地加以堆积。虽然林鑫经常因追求广度牺牲了深度，不过这“影像统计学”是有效的。《同学》里的人大多被买断工龄，然后被迫缴纳“统筹金”，有一个同学得了重病，躺在床上危在旦夕，却还要缴纳也许无法兑现的“统筹”。多数人生存空间如此窄小，自我价值实现的道路几乎全被堵塞。当我们看到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大部份人都如此的时候，就可以认同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灾难并非来自个人原因，而是社会塑造、国家控制的结果。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林鑫影像的特别之处：他的对于被拍摄材料的神圣化，已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在《同学》里，他曾经拍摄一个在煤气站打零工的同学，把同学转车的每个步骤的影像，都一一组织在了这个片子里。几乎每个受访者的素材都是这样被处理的。导演力图把所有影像都塞到作品里面，似乎每个片段都具有某种神圣的不可替代性。这样的意志过于强烈，乃至他的剪辑经常是把场景切得比较细碎，节奏于是就有点冒失。他的声音元素有时候也不处理，该弱化的时候不弱化，而是原本原样硬切硬接……一次在猜火车酒吧放映的时候，有观众说他的声音设计让人很不舒服。

但这样的做法，肯定和他的总体生命气息相关。客观世界的微妙变化，比如下午一点钟和两点钟的光线在他眼中，都是要认真加以分别和处理的，纵然观众和摄像机对此并不敏感，而且对于叙事也不重要。这个诚实的品质，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流层次的道德，而是一种面对某种神圣力量的负责。他心中似有一个对某种客观存在的敬畏。初学拍摄者往往会非常严厉地把客观真实和苛刻的纪实手法作为第一标准，但越到后来，他们会发现这个界限越不重要，但至少在林鑫的第三部纪录片里，这个严格的自我要求仍没有丢失。

当纪录片导演自觉地要撇弃作者身份，走向无我，于是自己成为一个被使用的工具。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感情。林鑫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秉有了教徒的很多特点。他的爱人曾在他拍摄的过程中信了基督教。“无我”的研究者的历史研究该是严肃的，在他的书稿里和创作中，时常可见他对于历史存在的朴素信念。尤其是到了《瓦斯》之后，林鑫对铜川这个以煤炭联结起来的能源城市的历史叙述，就更加全面深入了。

《瓦斯》讲述了2004年铜川“陈家山矿难”的前因后果。当时井下瓦斯已失火数天，但领导不管不顾。若处理瓦斯问题，就要停产一个月，他的政绩就没了，而上面对煤矿领导完成任务的奖励非常高，巨大的诱惑使其丧失了良心。而且里面有各种疏漏——比如领导的副手可能会希望煤矿发生事故，这样领导被停职，他就可以升迁了。导演找到了亲历的矿工、当时的领导以及死者家属，从各个角度讲述了夺去166人的矿难过程。观众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原来这些年前仆后继的矿难的根源，都不是不可控的技术原因，而全是人事的结果。矿难竟然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就是说——在这个体制内，矿难是无法避免的！

《瓦斯》之后，《三里洞》的悲剧有了一个补充说明。这两个片和《同学》被林鑫命名为“生存三部曲”。三部片子互相阐释，互为补充。而这本《当代纪录片文献：三里洞》借助了纪录片的力量，形成了一部铜川的细节史和微观史。这部史书还附加了当地一些宏观的历史变迁概要、地形图、大事纪……于是宏观史和微观史互为补充。但从目录和体例来看，此书又跟官方地方志有点相似，这体现了林鑫写史的勇气和话语争锋的决心，在我看来，这非常让人振奋，而且也是开了先例的。

### 三

下面我再详谈一下我对林鑫创作之心态和文化意义的理解。就林鑫的创作理念来说，他在他的书稿中写得非常清楚。他说：

“作为一个纪录片制作者，没有权力去阉割生活。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卑微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像仆人一样，尽可能忠实地将生活转化为影像……”

在制作过程中尽可能简朴直接，避免过多的修辞。对纪录片来说，忠实记录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只能尾随其后……而不是反过来让生活成为艺术的人质。”

从作者在文本中的存在感或者作者性的程度上来说，若相互比较，则《三里洞》因全片被调成黑白，加强了影片的整体感和对现实的疏离，从而使它更具艺术个性，但这在客观知识性方面有一个损失。另外我仔细观看《三里洞》的运镜方式，里面有一些强硬推拉的镜头，他在那时对于朴素镜头的表现力并不满足。但到了《同学》之后，导演减少了对素材加工的愿望。除了最后一个段落里，导演把很多同学逐渐走远的背影剪切组织在一起，制造了一种感染力，其他地方的艺术处理很少。

“我接受命运的摆布，在这些偶然或必然相遇的同学的普通一天中，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状态……”

这是《同学》的创作谈。从某个角度来说，《三里洞》和《同学》纵然朴素，但它们因特殊的粗糙，或者因为某种极端的做法，都烙上了导演的个性色彩，使林鑫的作品具有了某种辨识度。虽然《瓦斯》的镜语似乎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但却是其中作者性最低的，是因为这种成熟的影像用来全心说明事实，而且其主体部份乃是一个与林鑫无直接联系的事件——除了结局加了一个过于漫长的放着烟花的夜空，据说那是城市庆典的烟花，我们可以感到那是一个隐喻——后来林鑫对我说，那烟花喻指的，正是瓦斯爆炸。

林鑫记载历史的愿望大于制造作品的愿望，我们知道两者之间可以协调，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导演显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此他的纪录片的作品性并不高——作品性是指一种艺术完整性和独创性的追求。经历过八九十年代形式美学探索的林鑫，他所带来的这个状态又具有一种自愿自觉。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对林鑫的纪录片进行评价，应该同时评价他的行动，而非他的作品性。它们不具有优异的视觉质量，但那代表着作者和现实的一种互动状态，它本身具备文化和社会的内涵。恰恰这种不熟练，没有打磨得过于光滑，它给予我们一种信赖感，中国古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其实是从2000年左右曾经讨论过的粗糙美学，但数字技术进入高清时代后，这个概念就基本被搁置不谈了。这种粗糙的纪录片制作方法在本土往往具有一种特殊的观赏效果，这些独立纪录片和中国观众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当下有效的交往脉络和关系美学。但是国外的选片人也许认为这些纪录片艺术性不够。诚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位。事实上，这些年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包括《上访》简化版、《伞》、《1428》、《归途列车》，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做成了一种便于外国人吸收的样式，更加形式化，但是其份量相比于国内的作品，却显得过于轻盈，让本土观众觉得不满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许是将纪录片的电影作品属性和人类学属性相结合的必然尴尬。我觉得要划分纪录片的类型，可以找到一个新方法，就是在纪录片的人类学属性和电影作品属性之间连一条线，从作品靠近两端的距离上来进行划分。

林鑫的某些作品不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流通性，除了《陈炉》，似乎很少在国外播映。林鑫说：“……一些地域性、原创性突出或是内容强大而技术相对粗糙的影片，由于不合乎主流标准或选片人口味而被忽略。而评判者对原生态纪录片及其生成背景的隔膜，也往往使其

批评缺乏应有的分量和准确性。”和当代艺术领域相比，后者与国际先锋话语的互动更为紧密，但中国独立纪录片尤其是一些体现“本地人叙事”的纪录片，其核心词汇不是前卫观念和先锋的形式，而是当地事实。林鑫在其中提到一个概念：原生态纪录片。我愿意将这原生态纪录片的主要特点，归纳为“本地人叙事”和“地方性美学”。从拍摄者的地域属性来说，纪录片大略可分两类，一类是外地人来拍摄一个群体——很多是旅游式的，当然也有深度体验的，但因最终对当地的历史缺乏体验，所以总有距离；还有一种则是林鑫这种本地人的自我拍摄。他们对于本地的脉络和细节都熟悉，所以能追寻本地最细微处的生活逻辑。但拍者和被拍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带着私人感情和交往顾虑，这可能会造成认识的偏差。

林鑫拍摄三部曲时，已经离开煤矿多年，他沉溺的程度也许相对较弱。我要强调的是“当地人叙述”的另外一个特色，这其实在中国独立纪录片中大量存在——这个纪录片叙事往往没有完全化约为一种普遍的能被外地人、外国人的美学品味所接受的叙事，因此是一种特定的有限的交往美学。这个拍摄者的生命轨迹主要在本地，他对于外地、外国的时下的普遍影像需求往往不熟悉，也不愿意去走“国际专业化”（易思成语）道路，这是由他的知识共同体的范围和创作意志所决定的。所有制作、观赏、接受的过程，都需要一个文化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的考量。但是在中国，虽然地域广大，有各种文化差异，但是因为国家对于个人生活的统一、普遍且强烈的控制，所以我们能很容易将这一切化约或解读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因此，我觉得林鑫纪录片首先是一个时空保存的意念。那主要不是创造。当然，这种带有神圣意味的愿望，可以与巴赞理论的影像本体论相互参照。其次，它是一种语言，语言是做交流用的工具。然后才是一种艺术。艺术的位置其实是靠后的。我认为这是林鑫影像的主要内涵。

若从传统的艺术角度评价林鑫的作品，我们也许会冷场，但当我们将其看做一个文化景观，则我们将获得一个异常丰富的观看对象。这些年的独立纪录片对于中国社会记忆的塑造，已经起到了非凡的作用。独立影展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宣泄的场所。在一个新的纪录片评价系统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纪录片工作者以影像与当代社会互动的有效性。林鑫对于铜川微观史的建立，必将成为一个具有非凡文化能量的事件。我记得两年前，林鑫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的单位如何控制了他使用机器，又说单位要他剪掉留了几十年的胡子。不知为何，这些细节都让我兴奋，让我感觉到文化介入社会的力量，虽然其效果尚且未知，但这些细节会借助各种传播通道呈现出来，进入一个公共空间里被言说、被议论，于是重新生成着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

#### 四

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暗黑叙事传统里，林鑫作品算其中之一。有上海的观众批评林鑫的作品，认为他的叙事中缺乏光亮。纪录片导演季丹曾经对我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要拍出光来。她这个观点其实是受一个日本朋友的启发。从文本的角度来说，这个光是作者制造出来的，但是从纪录片和生活互动的关系来看，这个光更多来源于他的发现，不是无中生有。生活纵然艰辛和没有尊严，但是每个人都活下来了，这当中一定有一种值得人活下去的力量。这个力量应该由纪录片导演发现，并且强调出来，不然就会让观者异常沮丧。我看马莉的《京生》，其中年过七旬的老郝艰苦卓绝，但当笔者去她在郊区破烂小屋里访问的时候，发现里面仍然有亲切的交谈，有朋友间认可的愉快。冬天门外寒风凛冽，但屋子里温暖和煦。这都是一种力量。拍出光不是要扭曲事实，不是刻意温情，不是讴歌体制，被压迫的基层承受无比重力却仍然生动、鲜活，导演要拍摄出让人具有柔韧性的原因所在。那是痛苦中的蜜。

在林鑫的《当代纪录片文献：三里洞》这本书里，笔者看到了三里洞生活的诗意和光亮，比如林鑫描述少年时期排队接水的场景，本来是艰苦的生活画面，但是却带来了孩子们热闹相聚的氛围。他的纪录片里却少有这些元素，情绪往往比较单一，它常依靠一种量的累积来增加叙事的强度和痛苦的强度。我在此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如此。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这里拍摄的不是生活史，而是一部专门史，没有足够的空隙去填充这些元素。另外，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这个黑暗是外部世界的属性，还是来自于叙事。也许他有不同的对于光的理解？

纪录片虽然标榜客观，但无疑仍然是一种叙事——虽然我并不认可仅把历史当作修辞学和文学的分支。历史口述纪录片里，有两种叙事：一是作者（导演）的叙事，一是被拍者（口述人）的叙事。在三里洞人的口述历史里，矿工们对历史的否定，其实也是为了否定今天，在今天的怨恨里，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光被全部遮挡住了——这是一种可能。当然，如林鑫所言，煤矿在中国是极端领域，这里常被死亡笼罩。但即使这里的历史叙述存有偏颇，他们当下的情绪和心态却是真实的，这印证着纪录片真实性的未被驱逐以及它的复杂性。林鑫的叙事和被拍摄者的历史叙事，给予我们一种普遍的悲观氛围。《同学》里显示了普遍的无意义和价值感的丧失。而在《三里洞》里的失望，到了《瓦斯》里则更加强烈。一位有知识有见解的退休干部说，他们对这个体制毫无办法，我只能拿着每年一万多块的国家工资，多活几年，多让这个体制费点钱，耗死这个体制。

当地上的欢乐减少，人们就期待天上的欢乐。在林鑫的《瓦斯》里，一个矿工的妻子被单位冤枉，正义长久不得伸张，但多年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她认为这和信仰有关，她对着镜头说：“神不亏待人。”这样的细节被林鑫那么有心的收集进去，也显示着林鑫的精神倾向。在这个方面，作为导演的林鑫和当地人一样，他们处于一个经验共同体里。在林鑫电影和他的生命当中存在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哀伤的宣泄，以及对于人事之失败的必然性认识，这和他的创作思想也是一致的，都有非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者相信自我控制、自我做主，相信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相信自己捏造世界的的能力。但是这里却相反，体制这般严密和失去控制，人似乎只有精力的徒费。纪录片《三里洞》最后一幕，作者的镜头从人摇向蚂蚁，长时间对着地面上蠕动的蚂蚁拍摄。人渺小若此！这是作者对于人和世界的认识。有一次，林鑫和我说，如果说到宗教，纪录片是他的宗教——他最后相信纪录片，相信纪录。这种对于纪录片之神圣化的理解，其深层里其实也埋藏着一种无力感——“我毫无办法，我只有纪录”，很多独立纪录片导演都曾这么说，尤其“主体渐显”思潮之前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

于是，也许林鑫对光的理解与我们不一样。那光不是来自世俗世界，不是日常领域的快乐，而有其他来源，在《当代纪录片文献：三里洞》里，他曾回忆过去的时代：

“……我有一次从大礼堂的高墙外经过，里面传出一阵阵圣歌，一瞬间使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颤从心中掠过。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人在地上的影子很短，天空辽阔无云，也没有一只鸟儿飞过。我当时只是匆忙地行走，并没有想进去一探究竟。只是听说每个礼拜天，基督徒都会在里面集会。那个炎热的中午和圣乐，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时地会想起。当我在2010年的圣诞节开始拍摄一部和基督教有关的纪录片时，我才回想起曾经一度离他们很近的那一个瞬间，也许那天还是朱诚信牧师在讲道。”

林鑫目前在剪辑他的下一部作品——《传道人》，那是关于铜川的基督教教会的故事。这也许是他找光的路程。上面我说到宗教文化对于他的纪录片的影响，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纪录片创作中重要的方面，也许不准确，但就此搁笔。最后向林鑫的纪录片行动致敬，也为本书的开创性喝彩。

2013年3月于北京电影学院



4、《三里洞》剧照



## 第一部分 我的三里洞记忆

2012年，当我在料峭的春寒中不得不选择提前退休的时候，才忽然明白，我已疲惫不堪地在持续挣扎和妥协无奈中蹉跎了32个春秋，青春的棱角和骚动的心灵也在一天天匆忙度过的庸常日子里，被坚硬的社会现实磨平。现在，终于挣脱了谋生的羁绊，可以循着内心的引领，做一些对社会有益并且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我52岁，两鬓也已经斑白。早晨的阳光从窗户上照射进来，温暖而宁静，打在墙上的百叶窗影子，缓慢地移动。我这时发现，由于一直陷入忙乱的工作和繁杂琐事中，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真切地感受和体验阳光了。当我透过迷乱的光线，试图打开记忆的闸门去追溯那些久远的往事，想起离开我们已近30年的父亲和母亲，以及那些在铜川三里洞度过的青葱岁月，心中依然有种揪心的感觉。也许我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推的更早更远，从1930年代中国江苏南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水乡太仓说起，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 故乡，父亲和母亲

太仓，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乡。父母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和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煤城铜川以及三里洞煤矿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生命故事，最早起源于江南的鱼米之乡太仓。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小城，地理位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1405年7月11日开始，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由太仓浏河口出海的。至今太仓城里，还依然陈列着郑和下西洋时煮缆绳用的巨大铁锅。太仓的历史名人如明代的王世贞父子、张溥、仇英，清代娄东画派、江南大儒陆世仪、诗人吴伟业等，均是文化史上的重镇。但这些被当地官员和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荣耀与辉煌，却和乡下一般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更多的联系。

父亲的祖辈生活在太仓南郊的新丰，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后来便一步步衰落下来。爷爷朱成良曾在上海的大学和银行里面做事，应该属于会计财务一类吧。其弟染上了吸食鸦片，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变卖一空。到父亲朱永生1932年出生的时候，家里已十分窘迫，他母亲石小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不得已，去给别人帮佣以维持生计。在她的三个儿子中，父亲排行第二。老大朱泉生年长几岁，基本上可以照顾自己，老三朱全权很小还在吃奶。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父亲送人。当我爷爷朱成良从上海回来后得知此事，一心想把父亲重新要回来。父亲的养父母也姓朱，将父亲领回去后十分喜欢，无论怎样协商也不愿意给，最后只好作罢。这些都是在很久以后听奶奶（父亲的生母）讲的。我出生以后，父亲起初想给我取名承业，母亲说你那煤矿工人的职业有什么好继承的，这个名字不好。现在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据说还专门请人排了生辰八字，说我缺木缺金，祖父就为我取名林鑫。爷爷一直希望早一天看到我，毕竟是朱家的第一个孙子，上面还有一个堂姐比我年长一岁。1961年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回到太仓时，祖父已经在不久前喝多了酒，跌入河中去世了，时年63岁。奶奶石小妹一直活到86岁，去世时已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父亲的养父叫朱福和，了解的人说，他是一个白相人，这是苏南上海地区对公子哥一类人的称呼。“白相”在南方话里就是玩，

也就是在社会上混的人，过的是一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据说他最初是弹棉花的，至于后来靠什么为生已无从考证。但他一直喜欢打麻将，还娶了一个小老婆。49年以后政府禁赌，麻将不能打了，他忍不住，私下里继续，最终吃了官司。据说后来放出来了，积习难改，又被弄进去再也没见出来，可能最后死在了狱中。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的生父和养父都已经去世了，平时也很少有人提起。父亲的养母朱贵宝，好像也没受过太多的苦，像京剧《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一样，一直在太仓南郊的码头镇上开着一间小茶馆。虽然生活相对悠闲，但好像生意也不是很景气。她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都给人了。父亲和姑姑都是她后来收养的。听说姑姑朱兆英是朱福和在外面收的二房生的，后来朱贵宝看着女孩可爱就领了回来。她原本是想作为童养媳收养的，因为姑姑和父亲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于父亲来说，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感觉两人结婚并不妥当。不管奶奶朱贵宝的想法如何，朱永生和朱兆英兄妹最终也没有成为伴侣。姑姑刚来铜川的时候，在北公房的夜校给矿工们教识字，认识并嫁给了一起从上海支援到三里洞煤矿的电工张金龙，那已是后话。由于父亲的养父母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学名叫朱兆其的父亲，只上到初小便出去做学徒了。父亲的体质一直比较瘦弱，有一次给资本家背米时，站立不稳从石桥上摔了下来，后来膝盖上的伤口一直溃烂老也长不好，落下了一块很大的伤疤。父亲说他们家划的成份虽然是贫农，实际上应该是雇农。他养母开小茶馆的房子是租赁的，后来父亲将奶奶和姑姑接到铜川以后，就把开茶馆的房子退了，在故乡太仓也就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所以当时有些一起来的矿工离开三里洞煤矿跑回上海时，父亲已经没有退路了。1985年冬天，我陪母亲回南方看病时，姑姑也到太仓看望母亲。有一天我和姑姑一起从码头镇的街道上走过，她指着其中的一间房子对我说，以前他们家就住在这里。那是一条十分狭窄的老式街道，两边的房门都紧闭着，那些老房子因年代久远，显得有些破败。清冷的街道上静悄悄的，没有看到什么人。父亲是沉默的，不大讲这些往事，所以更多的细节无从知晓。至于后来父亲到了上海的建筑公司做纠察（实际上就是门卫），也是我在拍纪录片《三里洞》时，听他工友们的讲述才知道。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在上海做工的时候，被资本家的女儿看上了，常常去找他，想约他看电影什么的。那时父亲的收入很低，还要养活他母亲和妹妹，而出去玩总是要花钱的，他不敢去。所以，这段恋情最终没能维持下去。父亲许久都没有再谈恋爱，也许是这段感情一直让他很伤心吧。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已经27岁，他比母亲大了整整八岁。多年以后母亲给我说起一段往事，那是她和父亲结婚几年之后，母亲有一天从街上回来，看见父亲一个人站在屋里抽屉边上，拿着前女友的照片在默默发呆。母亲对父亲说，这会儿再想有啥用呢，人家也结婚生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我是1960年1月20日出生的，正赶上三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母亲说当时粮食根本不够吃，老是饥肠辘辘。好在因为她有了孩子，父亲和奶奶哪怕自己吃不饱，也都将食物让她先吃，所以营养上没有受到太多的亏欠。家里现在还保留着父母当时在服务大楼照相馆给我拍的百天照，我趴在一个枕头上，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一只小胳膊还试图努力地撑起。后来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是半夜，父亲去二门诊部请医生来家里接生的时候，只有一个女医生值班，她有点害怕，不愿意出诊。父亲又回来叫了姑姑一起去医院，才把医生接来。那时铜川还十分荒凉，晚上到处漆黑一片，很少有人夜间行走。母亲没有告诉我，那天晚上天空有没有星星，外面是否寒风凛冽。里屋门框的凹槽内镶着一支温度计，父亲有时会取下来到外面量气温，然后进屋告诉母亲和奶奶是零下几度。门口的水沟里冰面严严实实，室内窗户玻璃上也结满了冰花，无法看清窗外的世界。我出生的这个房间，总共不到20平方米，还隔出了一个套间和厨房，奶奶睡的套间仅能放一张单人床，紧挨着的厨房是一个进门的过道。里屋稍大些，除了双人床、桌子、两个方凳，还有一只木箱子，这些就是当时全部的家具。除了箱子，其他都是租矿上的，每月和房费一起缴纳租金。屋里地面上平铺着一

层蓝砖，顶棚用席子搭在芦苇杆绑扎的方格骨架上，房顶正中垂下的电线吊着一只卡口灯泡，一般也就是 15W，光线十分昏暗。晚上经常停电，煤油灯是必备的，随着火苗的跃动，会在墙壁上打出巨大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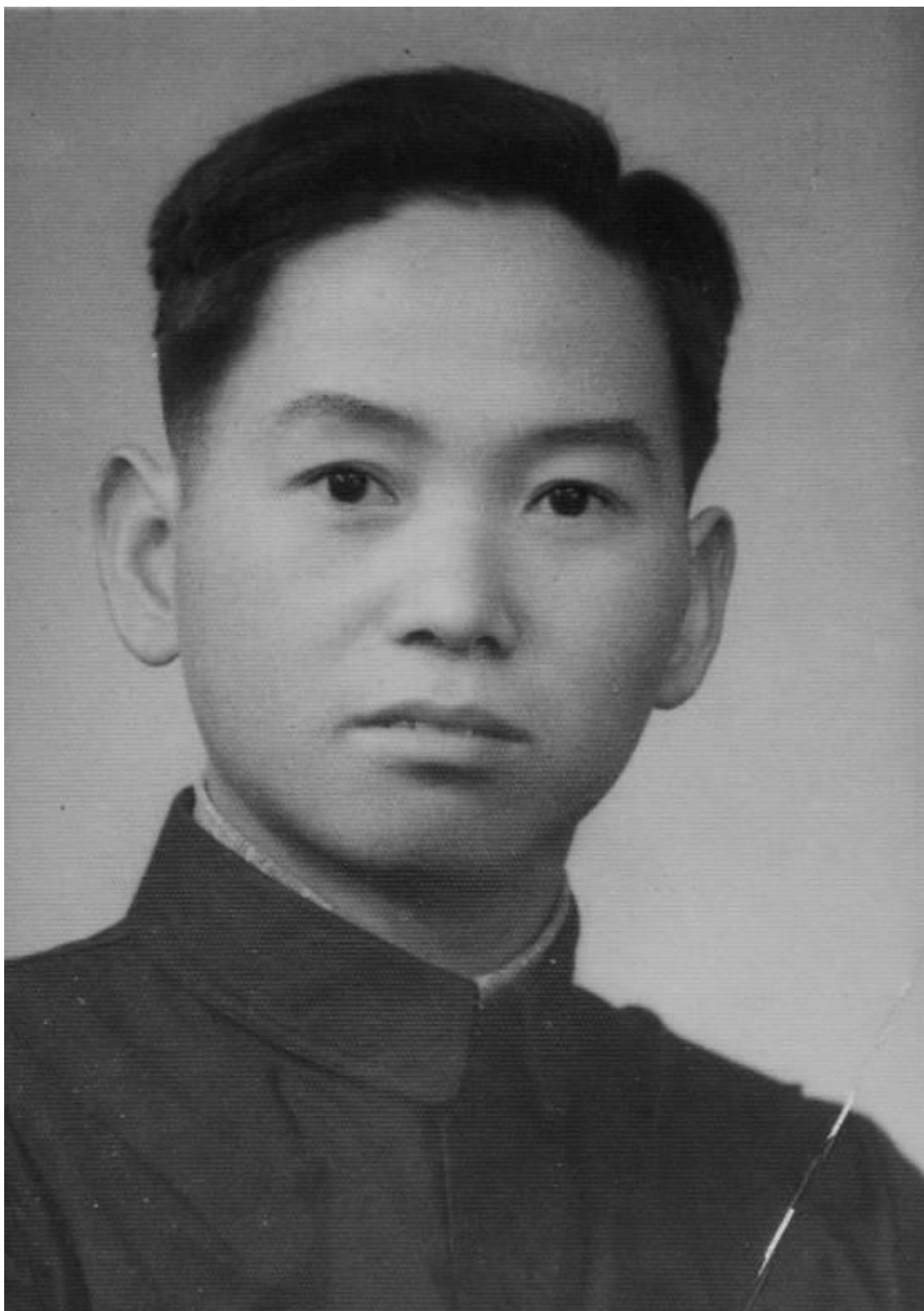
家门口迎面是一座山，像一幕屏障和夜色溶在一起。向左顺着公房门前的过道，走到南面楼头，在两排楼房的连接处，有一个涵洞模样的上下通道。穿过洞内台阶一直下到坡底，横过一条马路，从漆水河小桥来到对岸的灰堆坡，再沿着桥墩下的石台阶向东走，不远处一条漆水河的支流挡住了去路，这里没有桥，水面上间隔排列着大小不一的石块供行人通过。四周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哗啦哗啦地流水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传出很远。父亲打着手电筒照着前面的路，小心谨慎地前行，那小小的光柱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再走上一段路，看到前面隐约有窗户透出的灯光时，就到了矿务局第二门诊部。不知道父亲那天晚上在这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奔波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憧憬。当我 28 年以后也因为儿子即将出生被基建公司医院的护士支应着在一马路和二马路跑前跑后买东西时，也许和父亲当年一样，内心充满着紧张、兴奋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当我的第一声啼哭在黑夜中响起的时候，母亲、父亲和奶奶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不管后来他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多少艰辛和无奈，在那一刻，他们的生活被喜悦和希望笼罩。那是农历的腊月廿二，八天以后就该过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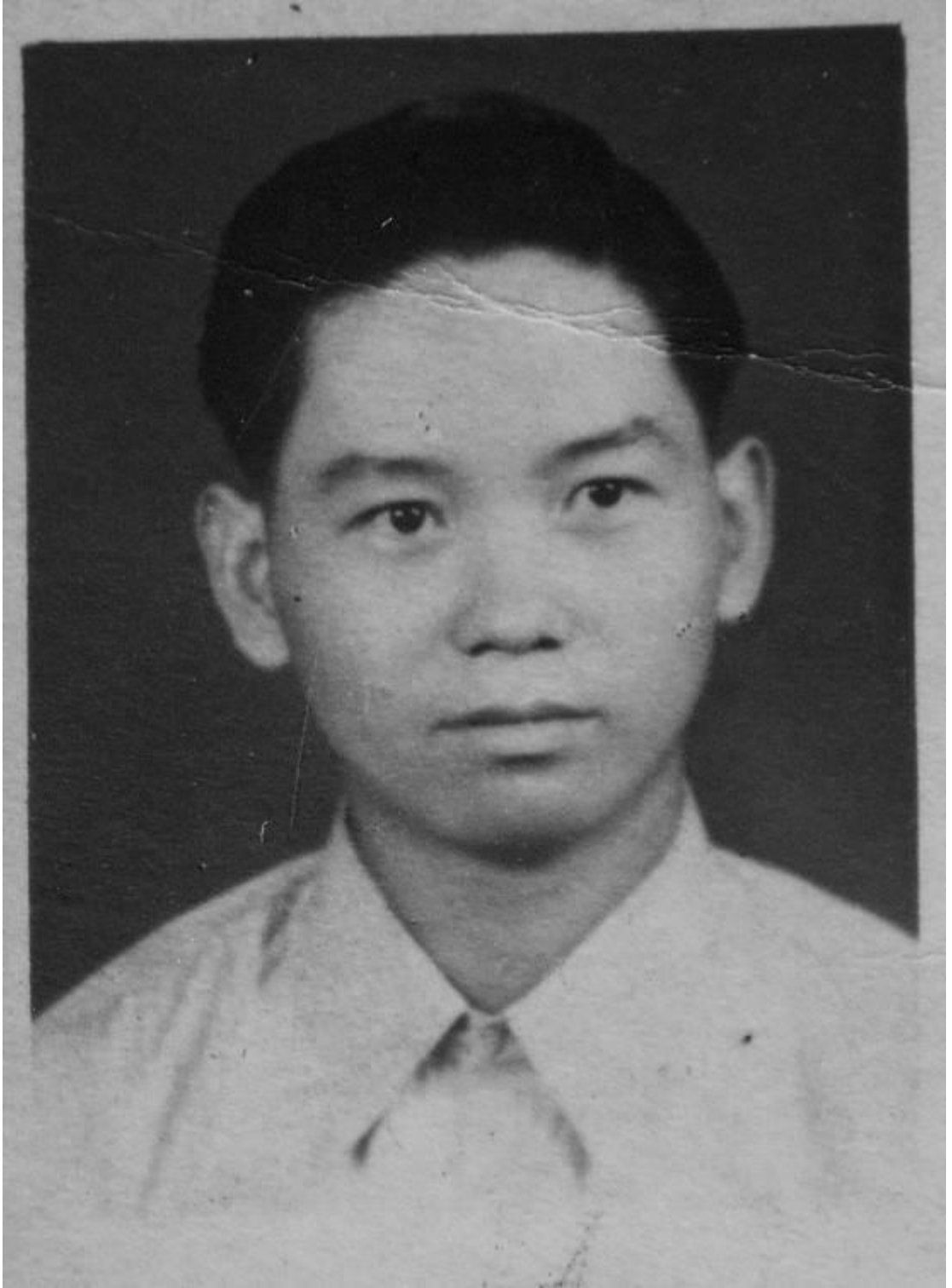
5、林鑫百天照 1960 年 5 月于铜川

父亲是 1955 年 12 月和当时上海建筑公司的 300 多人一起，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也是在拍摄《三里洞》的过程中才逐步了解。49 年以后，上海的建设行业大都停了下来，没有多少活可干。那时父亲所在的上海建筑公司也停工学习，每月只发十几块钱生活费。这时国家发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铜川矿务局也来到上海招工。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这是一个到远方去实现理想的机会，

也是一种无奈和现实的选择。父亲和工友们一起报了名，来到铜川的三里洞煤矿。此后几十年，父亲一直在三里洞煤矿的通风区工作，大部分时间担任瓦斯检查员。后来在井下受伤以后，调到地面做办事员，同时兼着修理瓦斯鉴定仪器的工作。1986年11月，父亲在临退休前因病去世。终年55岁。



6、青年时代的父亲



7、青年时代的父亲



8、中年时代的父亲



9、父亲旧照 1956年于铜川

母亲吴玉英，1941年出生在太仓南郊码头镇旁边一个名叫吴家弄堂的小村子里。外祖父吴银生是一个勤劳的木匠，为人做事严肃认真，一生都在不停地努力工作。辛辛苦苦攒下的钱，都花在了造房子上。日本人来了，把村里的房子烧个精光，他似乎也并不气馁。又一点一滴地从头再来。在这个不大的村庄，外公第一个盖起了带小阁楼的四合院。母亲说，亏

得是盖了房子，要是买了地的话，49年以后就划成地主成分了。还好，只是上中农。听外婆说，外公弟兄三个，他最小，从小比较娇惯，长辈们也一直觉得他不成器。可后来三个兄弟当中还是他最有出息。我记事的时候，还看见阁楼上摆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外公常常收听。收音机后面有一个专门的电池盒子，每次用完电以后要拿到城里去充电。外祖父70岁了还一直在工作，村里人在路上碰见，总是亲切地叫他老木匠。一次心脏病突然发作，外婆和小姨连忙将他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以后外公还一直埋怨说：“你们不要救我该多好，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走了，没有一点痛苦。唉，非要把我救过来，天天打吊针，受这么多的罪。”外祖父于1979年7月去世时，已经75岁。外祖母名叫周阿云，是一个身材瘦小，手脚麻利的老太太，她生了很多孩子，一些夭折了，一些给人了，我始终都搞不清我到底有几个姨。除了紧随母亲之后来到三里洞的菊珍姨外，还有太仓南郊、昆山蓬朗镇、上海朱家桥的姨，留在外婆身边的是小姨。母亲在家中排名倒数第二，原来以为是家中最后一个孩子，所以乳名叫阿末郎，可谁知几年后小姨又出生，就只好叫小郎了。舅舅我见过两个，据说还有一个没成。大舅也是木工，很早就去四川工作了，退休后才回到太仓老家定居。外婆一直到90岁还能下地干活，记得我小时候跟她去浇地施肥，她告诉我说人喝的是循环水。外婆个子矮小，走路却很精神。她说要去很远的地方看她的妹妹，我当时很诧异。她一大早出发到很晚才回来，一路都是步行。外婆是一个乐观的人，每天总是忙忙碌碌，也依然很快活。她总是说“现在很开心呀，有吃的也有穿的，怎么能不开心。当年日本人把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也没有吃的，那真是苦日子。女人们都把脸上抹得黑黑的，村子东面的几个小媳妇，被日本人拉去睡觉，不肯的话，就拿刀往身上戳。”外婆很长寿，200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98岁高龄，比母亲46岁的生命整整长了一倍还多。外公是一个专断的家长制式人物，脾气比较暴躁。49年以后流行自由恋爱，大姨自己谈了一个对象。外公知道后非常恼火，把大姨的头按在房屋前面的河里打。当年发生的这一幕情景，对母亲产生了直接的威慑作用，也坚定了母亲最后选择离开太仓的信心。住在隔壁的一个帅小伙新泉十分聪明能干，也很喜欢母亲。但母亲知道，那是人家从小招来的上门女婿，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结果。外公很早就给母亲定了一门亲事，那家的男孩和母亲是同学，整天邋里邋遢的，母亲压根也看不上。通过大姨那场闹得非常激烈的恋爱事件，母亲觉得自己如果待在家里，将来在婚姻上恐怕很难扭过外公，于是便萌生了离开太仓到外地找工作的想法。

母亲是初中毕业，在当时农村已经算很高的文化程度了。她和住在码头镇上的朱兆英、王惠英三人是初中时最要好的同学。那时朱兆英已经跟着他哥哥朱永生到陕西铜川去了，母亲便给朱兆英写信说想到外地找个工。朱兆英回信说工作不好找。母亲说介绍个对象也行。朱兆英便把父亲介绍给母亲。先寄了一张父亲的照片，母亲看后同意了，便准备到铜川去。那时她不敢让外公知道，只是悄悄地将真实情况告诉了外婆，对外公只说是去外地找工作去了。后来外公知道了大发雷霆，母亲说，实在是距离太远了，否则的话外公一准会撵到铜川来。那是母亲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眼看着列车越往西行，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荒凉，几乎看不到树，都是光秃秃的山，心里面不免有点后悔和担心。但已经离开了太仓，也就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到铜川之后，父亲和母亲很快就结婚了。从此他们的命运被拴在了三里洞煤矿。一开始，由于母亲有文化，通过考试招到矿上的变电所工作，一天的工作就是按钟点看看仪表，做做记录，也没有太多的事情。由于那时已经怀孕，老是瞌睡，一次上班的时候趴在桌上睡着了，被工长进来发现，也没有叫醒她，直接把做记录用的马蹄表拿走了。母亲说那时也太老实，人家说不让上班就不敢去了。随着我和弟弟妹妹的陆续出生，加上当时奶奶还健在，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个月几十块钱的收入维持。父亲工作的通风区属于辅助单位，多年来一直是四级工，家里每月入不敷出。不得已，母亲又开始在红矸山、石渣厂等地找临时工干，那是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一个偶然的机，母亲到百货公司临时帮灶，就跟着老师傅学习做菜，师傅看她踏实肯干，也就无保留地教给她。后来母亲就一直



在银行做炊事员，给职工做饭。中间有一段时间搞基建把灶停了，由于母亲良好的口碑，银行不想让她走，就安排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储蓄代办员。几十年含辛茹苦，总算把我们姊妹四个拉扯大，也十分不易。母亲一直盼着等父亲退休后，一起回到故乡去安度晚年。父亲下了一辈子井，眼看到 55 岁就可以退休了。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短短 10 个月之内，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1986 年 1 月母亲去世时只有 46 岁。父亲去世后，弟弟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太仓，与母亲合葬在吴家弄堂的墓地与外祖父相伴。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张，2006 年吴家弄堂也列入了太仓市的新城区规划开始拆迁。昔日的稻田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这些祖祖辈辈依靠土地为生的村民们，告别了宽阔的农家小院，搬进了密集的高层住宅。父母的墓地也随之迁移到了新丰附近的南广寺公墓。在外漂泊了一生的父亲和母亲，最终都回到了太仓，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10、母亲旧照 1950年代于江苏太仓



11、父母结婚照 1958 年于铜川



12、父母结婚照 1958年于铜川

## 北公房

铜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处在关中平原向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铜川的建制原来只是一个很小的县，随着国家对煤炭资源勘探开发的日益重视，1958年4月5日由国务院批准成为省辖的地级市。1955年12月18日，父亲和他们建筑公司的300多工人从上海出发，经过三天两夜的旅途于12月21日到达铜川时，铜川矿务局也不过刚刚成立了一个月。那时的铜川，基本还算不上是一座像样的城市。一条狭长的十公里川道，夹在连绵不断的丘陵起伏和沟壑纵横之间。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可以看到半山上当地居民住的窑洞。顺着川道由北向南，漆水河蜿蜒不断地从市区穿过。地处北关的县城只有短短的一条老街，从七里铺往南，杂草丛生，还不断有豺狼出没。三里洞煤矿的大部分矿工住在北公房、南公房以及河东公房。我们家住的五里铺北公房，是早期铜川矿务局的办公所在地。沿着漆水河西岸靠山而建，分别为三层或四层楼房，顶层是坡顶红瓦紧贴着山脚而建，所以从西面看是一排排的平房。但是从东面看过去则是三层或四层呈梯田状排列的楼房，一层和二层面向东而建，全部是一排排由砖石垒砌的窑洞。后来矿务局搬到了十里铺，这里就全部成了矿工住宅区。



13、北公房（三里洞矿工住宅区）



14、北公房（三里洞矿工住宅区）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北公房最靠北面的一栋三层楼上，从北向南数过来是第12家，从南向北数是第13家，因为小时候数过多次，所以至今还记得。好多幼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是清楚地记得那时夏天还有萤火虫，在夜空中一闪一闪不断地从眼前飘过，好不容易抓住一只，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荧光却没有。家家户户都躺在门前地上铺的凉席上，扇着扇子乘凉。吃饭的时候也常常端着碗互相串门聊天。有陌生人从门前走过的时候，大家的眼睛会齐刷刷地望过去，看看是找谁家的人。家里有人的时候门是敞开的，没有什么私密的空间。记得那时父亲还非常年轻，工友们也来来往往，喝酒聊天。晚上停电的时候点上煤油灯，他们依然兴致很高地喝酒划拳。我常常在旁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那烛光映红的一张脸依然有些印象。我平时睡在奶奶的脚头，天冷的时候，奶奶会给我做一个很小的枕头，塞在肩膀处，防止冷风进来。我躺在床上，借着窗户射进来的微弱光线，盯着斑驳的墙面，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图形，有时像一个人形和一间房子，有时觉得是一只脚丫和耳朵，有时又看着像是白色的鬼，没有眼睛，隐隐约约地好像在动，于是将头整个缩进被子里，但还是会做噩梦。记得有一次父母带我和姑姑一家去七里铺的电影院看电影，父亲在窗口排队买票的时候，我看到了卖票窗口上方镶着工农兵手举一捆麦穗的彩色浮雕。离影片开演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便聚在电影院旁边的咖啡厅喝咖啡。服务员不停地过来过去，手里端着盘子里放着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还会顺便赠送一些像蛋卷一样的小小糖果。看的是什么电影那时太小，已经没有印象了，有几个镜头倒还记得。噢，也许是叫《红军桥》吧，像剪影一样的动画，一个一个黑色的小人小心地慢慢过桥，桥断了，人都掉了下去。还有一个镜头是一个像猫一样的动物卧在那里，后面来了一个大一点的动物，一口把它吃掉了，自己又变成了一只猫卧在那里。这个镜头好像还重复了几次。不知道是什么电影。只记得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狸猫换太子》，不知道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电影散场时，人们纷纷站起，噼里啪啦地响起一阵座椅板翻转的撞击声。黑压压的人群，密密麻麻地向出口涌动。此时我坐在父亲肩上，随着拥挤的人流，缓慢地向场外移动。我手里拉着的细线绳牵着一个红色的气球在空中飘着，不远处另一个牵着黄色气球的孩子是坐在姑夫肩上的表弟荣明。那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吧，现在想起这些情景，眼眶依然有些湿润。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高大的，我还无法体会到父亲后来所经历的生活艰辛和沉重。那时家家都有夹相片的镜框，父亲戴着大盖帽穿

矿工制服的相片显得十分神气。有时我也会制作一些小电影，在透明的塑料纸上用墨水画上一些人物，然后把手电筒打开对着我画的图案，影子便映射到了白墙上。傍晚的时候，时常扒在窗台上凝视窗外，天空渐渐地暗下来，漆水河对岸的房屋和山头已经被暮色笼罩，有时紧挨山顶的天空会出现晚霞。天色很快就全黑下来，远处的灯光也一盏盏在黑暗中点亮，像一群参差错落的星星。漆水河对岸的二门诊部房间中隐约可以看到人影的闪动，像邻居张许金伯伯家里收音机上那个佛龕形状的绿色指示灯，一会儿变亮，一会儿变暗。张许金也是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的，有人说他偷听过敌台。白天的时候，从窗口可以看到漆水河上相隔不远的两座桥，一座是铁路桥，不断地有运煤的火车通过，向北可以看到远处山脚下，铁路开始分岔，一条铁路通向三里洞煤矿，一条通向三矿和王石凹煤矿。拉煤的火车皮总是很长，一列火车常常要挂几十节车厢。往王石凹方向有一个大坡，火车经常爬不上去，有时需要用两个火车头推。呜！咕咚咕咚，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嘶……火车又停了下来，退回来，重新再试。往往要经过好几个回合才能上去，然后转过史家河那边的山头，看不见了。火车噗噗噗的声音还可以隐约听见，只是节奏明显加快，声音也越来越低，渐渐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每天看火车是童年时代的一件大事，只要一听到鸣笛就赶紧爬到窗前，静静地等待，对火车也始终有一种经久不衰的好奇和神秘感。另一座是通往史家河煤矿的运煤小矿车铁轨桥，小矿车四个一组，每组相距几十米，轨道中间有一根很粗的钢丝无极绳，不停地牵拉着一组一组的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分缓慢地匀速爬行着，源源不断地把史家河的煤运往五里铺的转运站。

作为家中长子，奶奶总是十分疼我。经常领着我上街去玩，有时会给我买一些零食。她偶尔也会带我到五一饭店点一份烩菜，那个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奶奶是那种典型的南方老太太，衣服虽然不是很好，但一直穿得十分干净整洁，头上总是戴一顶毛线编制的圆帽。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依然显得很有精神。来到铜川以后，生活一直很拮据，所以她十分仔细，尽管十分宠爱我，但当我想让她给我买一把稍贵的玩具手枪时，她也不会马上答应，只是转身走了，我哭着撵过去，看见她停下来等我，我就继续站在原地哭，反反复复几次。那时家里生活真的是很艰难，只是我当时太小并不明白。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南方去了，外面在不停地下雨，我和小伙伴躲在屋檐下捏泥娃娃。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很关心地告诉我，你要对你妈好一点，不然等你奶奶去世了，看你妈怎么打你。有一阵突然出现了酱油短缺，到处都没有酱油卖，奶奶叫我拿瓶子到姑姑家去倒一点。我刚下坡，就见几个大一点的女孩说，铁路局商店有卖的，便跟着她们一路去了，到了一问也卖完了。她们说到灰堆坡去看看，我又跟着她们去灰堆坡。在翻过铁路的时候，坡度太陡，上了几次，我都滑到了，站在半中间，上不去也下不来。那几个女孩毕竟比我大点，慢慢地都翻过去了。一个女孩还站在铁路上面回头向下看了看我，另一个说：“别管他，咱们走吧。”她们走远了，只剩我一个人无助地站在那里哭，四周静悄悄地也没有一个人。最后只好小心翼翼地蹲着退回到坡下面，再顺着河滩绕了很远的路才到姑姑家。回来的路上，又碰到那几个提着空酱油瓶的女孩，她们十分惊讶地说：“咦，他还自己回来了。”我只是看了她们一眼，没有说话。大概是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埋在了北公房后面的山上。不知为什么当时这里很多的墓都没有墓碑，多年以后，也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奶奶的墓了。父母最后毕竟魂归故土，奶奶则永远长眠在异乡了。现在想起这事，心里依然感到内疚。奶奶去世前就对父亲说过，她如果死了，就把她埋在阮德贤的坟墓旁边，这样毕竟有个熟人可以说话，免得死后寂寞。阮德贤是和父亲一块从上海来的，和我们家住同一排公房。先是在矿上下井被雷管炸成了黑脸，后来又在上班的路上被汽车撞死了，就埋在西面的山上。他的妻子还很年轻，改嫁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搬走了。记得安葬奶奶的时候，在阮德贤的墓前也烧了一些纸，希望老乡之间，互相有个照应。

当时的矿区没有公共澡堂。所以我总是到矿上的职工澡堂洗澡。轮到父亲上早班时，我会在下午两点，站在三里洞煤矿的入井口旁边，等父亲下班。三里洞矿是立井，井口有两个铁罐笼同时工作，一升一降。矿工们都穿着工作衣，矿工帽上戴着矿灯，灯的后面延伸出一条电缆连接到系在腰间的蓄电盒上。准备下井的矿工，虽然工作衣很黑，脸上还是干净的。刚刚上井的矿工，从罐笼中走出来的时候，则浑身上下乌黑，只有牙齿和眼白是白的。我站在上罐的人流旁边，睁大了眼睛，看着一个个黑影从身边闪过，几乎都是一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的父亲。直到一个人走过来，拉着我说走吧，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顺着人流穿过一条很长很暗的通道，父亲交了矿灯和工牌，带我进入更衣室。一排排更衣箱，一个接一个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两排更衣箱之间狭窄的通道只能容一人通过，每个更衣箱上都编了号码，用的也大多是号码锁。在更衣室内穿梭了许久，拐过好几个弯道，才到了父亲的更衣箱旁边。一进入澡堂，回声很大，满是哗哗的水声和喧哗声。矿工们的声音大都很高，不时地有人说些粗话，引起他人的反弹。淋雨的水流，在一个个黑色的躯体上冲出一条条白色的纹路，露出皮肤的本色，由于一直见不到太阳的缘故，矿工的肤色大都显得苍白虚弱。在矿上充电房工作的一个阿姨，和我们住邻居，我小时候常和她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她家是从东北那边过来的，她丈夫在史家河煤矿工作，那时好像还不到40岁，就已经不上班了，常年有病，一直不停地吃药，床边也到处摆放着各种医学书籍。很多健康的人，已经不在，往往是这样的老病号，反而能把生命延续得很久，现在已经80多岁了依然活着。他当年教我数字1-10的日语读法，没想到多年以后在日本山形问路时竟然用上。他家的大儿子非常喜欢看书，所以我那时也常常去他那儿借书看，大多是没头没尾的，什么《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时看到的。后来他们家的小儿子内招到矿上下井，没多久就出了事故死在井下，那是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噢，还发生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那时我的同学段长有，偷了邻居家10元钱，他告诉我说是捡来的，我们就和王正祥的儿子春平一起到街上的食堂吃饭，买了香烟、手电筒等。我喜欢看书，就拉着他们一起到七里铺新华书店，那时也没有多少书可以选择，就买了弗·梅林写的《马克思传》等几本书。还没有来得及看呢，他偷钱的事情就露馅了。我被父亲严厉地教训了一顿，赔了我花掉的3元钱，书也拿走了。从此和段长有也不再来往。他结婚的时候，找我画过一幅画。后来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一直到2008年我拍摄《同学》时再次相遇，才知道了他以后的经历，令人感慨。那时逢年过节，矿上就会挨家挨户到门框上订有“光荣烈属”牌子的人家送慰问品，我们看了很是羡慕。后来才知道，所谓烈属，就是他们家父亲在井下出事故去世了。我家隔壁就住着一户姓段的人家，父亲很早就在矿上遇难，剩下母亲拉扯着一群孩子慢慢长大，多年以后，他们都先后离开铜川回河南老家去了。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街道两边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宣传标语口号，白纸黑字上面，常常会在一些人的名字上打上红色叉叉。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所有人都在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居委会每天组织大家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成为一种仪式。我们小孩子也总是跟在大人们后面，面对刷着红色油漆的毛主席语录墙齐声歌唱，同时还有动作比划着。记得早上唱的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激烈地跳动，向着红太阳……”。每天傍晚则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那时每家门前的墙上都用油漆刷上一块红色的语录板，写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语录，家家户户屋里的墙上贴满红色的剪纸，有忠字向日葵、有样板戏人物、有毛主席像。我同学刘全安的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她叫儿子刘新安用红纸刻了很多的忠字，分给各家张贴。那时虽然懵懵懂懂，却也觉得蛮好玩，总有一种节日的气氛。我收集的一沓沓毛主席语录画片上的内容，不少现在还记得。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绘画，不能那样雅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



地行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人有动脉静脉……”等等。早上天还没亮，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开始播音了，开始曲总是先播放《东方红》，晚上十点播完《国际歌》全天的播音就结束了。中间则反复播放革命样板戏。经历过文革的，人人都会唱样板戏，无论是《红灯记》、《沙家浜》还是《智取威虎山》，每一个唱段都基本上耳熟能详，顺口都可以来上两段。记得弟弟弘鑫（那时还叫红鑫，红卫兵时代出生的缘故）小时候唱的特别好，常常领到刘全安他家的山坡上，唱一段，给他一片红薯干。后来出了麻疹之后，就不会唱了。只要一听到锣鼓的声音，我们就赶紧往坡下马路边跑，游行的队伍很快过来了，最前面的汽车上放着一面直径约两米的大鼓，和父亲一同来自上海的葛登发，一个人赤裸着上半身，十分有力地挥动着鼓槌，显得十分威武。与其他车上四五个人联合敲一面鼓相比，更凸显出葛登发的英姿。人群骚动着，跟着他前行，更多是为了看葛登发打鼓。他那时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像一个英雄，也会留意到他平时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在小伙伴之间传播。比如他总是骑着只剩下两个轮子和主干的破自行车，挡板、把手、手刹、振铃都拆除了，需要停下的时候，就用脚压住轮子。他那一身旧工作衣，浑身上下已经布满了补丁，可还是不断地在上面缝缝补补。在那个着装几乎是清一色红卫服的时代。这样另类的工作衣穿在身上，用现在的话来说，显得很酷。也许是关注的太多，后来同学中传出了看到他压在我一个同学母亲身上的话。看来那个时代也并不是全是革命，尽管样板戏宣传的英雄人物个个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人的本能欲望依然会在暗处涌动。那时三里洞矿有个叫王坚的年轻女性，长相非常出众，说话神态也果断干练英姿勃发，尽管和我们住同一排公房，却很少见她和其他人来往。眉宇间也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副冷傲的表情。后来传出了她和三里洞矿团支部书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周围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和议论。再见到她时，已变得灰头土脸神情沮丧，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不久她就搬走了。游行的队伍还在不断地行进，人也越来越多，人群中不断有人带领着大家高喊口号。各种彩色纸张印制的毛主席语录传单，不停地向空中抛洒着，漫天飞舞。每个小伙伴都收集了很多，并相互交换。当然还有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那时每个人都有不少的收藏，现在早已不知去向了。忽然，来来往往的人都神色慌张地四处躲避，家长也都赶紧把孩子们叫回家中。武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扒在窗户上，看见从史家河方向跑过来一支整齐的矿工队伍，一面跑还不停地高呼着口号。每人都身穿崭新的工作衣，头戴柳条帽，手里举着一根根木棒和长矛，快速地向五里铺聚集。门前的山坡上也呼哩哗啦下来了一大群三里洞的矿工，潮水般向西沟口方向涌去，父亲也在这群人里面。站在门口的奶奶看见了，大声呼喊：“永生，永生。”父亲刚回了下头，很快就被其他的矿工拽走了。枪炮声渐渐密集起来，母亲领着我们和邻居们一起跑到山脚下的窑洞里躲避起来。远处不断传来机关枪和步枪的声音。开始打炮了，声音很大，不断有炮弹的碎片落在院子里，小伙伴飞快地去捡回来，摸一摸还是热的。后来听说，那天三里洞煤矿的队伍刚到西沟口，一颗炮弹落下来，当场就炸死了一个矿工。人们纷纷爬到山上占领制高点，219和212两派在大麻子地里展开了搏斗，听说也死了人。父亲好像是被对方一杆长矛从两腿间捅过，幸好只是腿部有一点擦伤。后来在坡底下老矿务局的大礼堂门口，看见父亲坐在那儿，手里握着一支长矛在看门，见我走过还对我笑笑。我往里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什么人，心想那里也许应该是219的指挥部吧。奶奶带着我来到七里铺，马路已被沙袋和铁板隔断，只留下一个很小的门让行人通过。这里是一条分界线。往南一直到十里铺是212的地盘，往北到三里洞是219的地盘，用沙袋和铁板筑起高高的隔墙，两边都有武装人员把守。墙边停着数辆汽车改制的装甲车，沙袋上面支着机关枪。我很害怕，紧紧拉着奶奶的手，奶奶走过去和守卫人员说了几句，就让我们过去了，态度看着还比较和蔼。在七里铺的街道上走着，我心里还一直担心，生怕这时候突然发生武斗，通道的门一关，我们就回不来了。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为避免别人再来叫父亲去参加武斗，母亲把父亲藏在房顶上的柴火堆里躲避。过了一段时间，武斗好像停止了。老矿务局的大礼堂又开始演出节目，是样板戏《红色娘子

军》、《智取威虎山》等，记得演《智取威虎山》时，拥挤的人群把礼堂楼梯的砖墙都挤塌了。我们小孩总是贴在门边，在大人往里挤的时候顺着就把我们带进去了。每次演出，老矿务局大礼堂观众都是满满实实的，小孩子个子低，站在人群后面看不见，只好扒在窗框上。四下里一望，礼堂两边的窗框上扒满了孩子。演到杨子荣打虎上山一段，舞台前面拉起一层薄纱，舞台一角的灯光透过缓慢旋转的圆形雪花玻璃灯罩打在帷幕上，就像真的下雪一样，有时灯罩转着转着，不知为什么忽然停了，所有的雪花全部不动了停在空中，演员则依然在继续表演。舞台下顿时呼声口哨声四起，舞台上的雪花又重新开始转动。很多年以后，大礼堂不再演戏了，有一段时间里面住过因漆水河发大水无家可归的难民。后来我有一次从大礼堂的高墙外经过，里面传出一阵阵圣歌，一瞬间使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颤从心中掠过。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人在地上的影子很短，天空辽阔无云，也没有一只鸟儿飞过。我当时只是匆忙地行走，并没有想进去一探究竟。只是听说每个礼拜天，基督徒都会在里面集会。那个炎热的中午和圣乐，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时地会想起。当我在2010年的圣诞节开始拍摄一部和基督教有关的纪录片时，我才回想起曾经一度离他们很近的那一个瞬间，也许那天还是朱诚信牧师在讲道。现在大礼堂早已拆掉了，北公房也作为滑坡地带，面临全部拆除。马路边一幢幢新的居民楼正在迅速崛起，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拒绝怀旧的时代，“拆迁”这个关键词将会把和记忆有关的留存物完全抹去。

## 上学

父亲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以后，很快便将奶奶和姑姑接了来。姑姑那时在北公房上面的夜校扫盲班教矿工认字，结识了也是从上海来的电工张金龙，后来成了我的姑夫。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那时铜川时兴跳交谊舞，姑姑和张金龙那时经常在一起跳舞，渐渐产生感情，走到了一起。据说父亲当时一度反对过这段恋爱，觉得张金龙太过精明，不是那么老实可靠。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姑夫坐在勉县八一铜矿家属区自家门前的山坡上，对我说起当年这一段往事时，表情依然有些动容。“你爸那时候真的是让我很伤脑筋。”姑夫说的时候，眼睛一直久久地望着远处起伏的山脉，没有回头看我。

由于姑姑的介绍，母亲从太仓千里迢迢来到了铜川三里洞煤矿，嫁给了在矿上做瓦斯检查员的父亲。母亲接着又把她从小给了人的姐姐何菊珍也介绍到了铜川，嫁给了也是上海来的三里洞煤矿绞车司机顾龙祥。到此，父亲的主要亲戚关系网就在西北铜川的三里洞煤矿这个狭小的圈子内搭建完成。再后来姑夫的弟弟张野根也在其兄的介绍下，从上海浦东的农村来到三里洞煤矿，母亲和姑姑把太仓的同学王惠英介绍给张野根，做成了一段分居两地几十年的马拉松姻缘，那是后话。其他的人家也差不多都是通过这种不断地相互介绍，使各路人马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输送到了三里洞煤矿。到1970年，我们家人口已经是一家三代七口人，包括奶奶、爸爸、妈妈、我、弟弟和两个妹妹。我是1960年出生，大妹林娟是1963年，弟弟弘鑫是1966年，小妹弘娟是1969年。

1967年，我应该上学了，记得当年学校报名只收1959年10月底以前出生的人。我是1960年1月出生的，刚好被挡在门外。看着隔壁的“小能豆”上学了，心里很不高兴。父亲为安慰我，借来别人的课本，照着样子做了算术和语文课本，教我认字和算题。所以上学前我已经认识很多字了。1968年8月我终于在三里洞矿小上学了，报名的那天下着雨。我们的班主任张淑兰老师，东北人，大大的眼睛，长得很好看，一遍一遍地领着我们读课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上面的配图是天安门。我怎么也不会想到，40多年后我在陈家山煤矿拍纪录片《瓦斯》时，会和张老师奇迹般地在异地再

次相遇，其发福的体态已找不到当年的清秀身影了，但是那一双眼睛依然有神。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原来一直保留着，搬了几次家后也找不到了，书页上面到处都是我画的各种涂鸦。我从小喜欢画画，在拍纪录片《三里洞》时，听老矿工陈义祥讲到父亲年轻时给他画过一张马时，我非常吃惊。从来不知道父亲会画画，也从未见他画过。我对绘画的迷恋看来还是受到了父亲遗传的影响。父亲喜欢作曲，他原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家，也常常在停电的夜晚给我们姊妹几个哼《伏尔加河纤夫曲》，那深沉的男低音在空气中弥漫，父亲手指夹着的烟头火光红红的，在黑暗中闪耀。那一刻的父亲是那么慈祥，尽管看不清他的面容。后来父亲高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珍珠塔》、《玉蜻蜓》等戏剧故事。但更多的时候父亲是严厉的，我小时候也没少挨打，但是挨打的原因，现在大都想不起来了。像老师说的，我本质上是属于好孩子一类的，但也常常经不住诱惑，有时会跟着其他的同学一起旷课。不记得是在高尔基的《童年》连环画嘛还是什么地方看到的，挨打的时候，要顺着笞帚打过来的方向转动，这样可以减轻疼痛。我在挨打时也曾经尝试着这样去做，但好像并不管用，依然很疼。那时马车队还是常用的运输工具，我们每天上学的路上，都可以看到一队队运输的马车。遇到上坡的时候，赶车人坐在车上一面不住地挥动手上的鞭子，一面使劲地吆喝着“驾，驾，驾……御”，驾辕的马和前面三匹马一起用力，马蹄踩在公路上不停地打滑，发出踢踢踏踏的声响。我和同学们也经常偷偷地趴在马车的后尾边上，将双腿蜷起双脚离开地面，让马车载着前行。这时路边的同学总是恶作剧地齐声喊道“赶马车的往后看，后面有个王八蛋”。马车夫头也不回，只是轻轻地鞭子向后一掠，鞭梢便抽在脊背上，生疼。冬天来了，河里早早就结了冰。虽然家里和教室里都生着火，还是十分寒冷。同学们将自己带的馍拿出来，放在教室的炉子上烤得黄黄的，吃起来酥脆。手上戴着母亲编织的毛线手套，可以露出手指方便写字。但手还是被冻得红肿，皮肤渐渐地变成紫色，然后肉皮像卷心菜一样，一层层翻起来，看着十分可怕。用冻疮膏抹上厚厚的一层，再用纱布包住。冬去春来，手上的冻疮也渐渐痊愈，变得奇痒无比，总是忍不住用手去抠，上面的皮一层层剥落，里面已经长出新的皮肤。冻疮一旦开了头，第二年又会周而复始，再次发生。现在想起来，我上学期间的假期作业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写完过，开学的时候总是想着咋样才能蒙混过关。也许是课外书看多了，对课本上的东西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作文经常要写《一件好事》，然后大家都写怎样扶老太太过马路，马路上拾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这类的故事。校长组织全校同学训话，总是会在停顿的时候，发出一个“啊”字，同学们便在底下偷笑，然后会数他在整个讲话的过程中，一共发出了多少个“啊”字。除非遇到特别严厉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同学们总是小动作不断，互相传纸条说悄悄话。教珠算的高老师个子一点也不高，瘦瘦的面容很和善，长得有点像俄罗斯人。上课时总是大声喊着：“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这节课只要认真听这五分钟哦，就会做作业了。注意了，都看着这儿，就五分钟。”同学们便停住小声地交头接耳，耐心地听上几分钟。那个老师我们都很喜欢，多年后在街上遇到向他打招呼，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在学校印象较深的是学工学农。每个班级分一块地，大家上山种苞谷，挖坑、播种，往山上抬水，浇灌。到收获的季节，每个学生还可以分几个苞谷。不记得是哪个班级苞谷收完了，同学们放火烧荒。只听得几声枪响，从山沟里上来了几个当兵的，把老师用绳子一捆就带走了，学生们大哭。后来才知道，原来山底下有一个秘密信箱，周围都用铁丝网拦着。学校还有做粉笔的小工厂，每个班级在学工的时候轮流着去做。比较辛苦的是搬砖，从三里洞矿砖瓦窑搬到学校有几里路，每个男生一次搬两块砖，女生们搬一块，几百学生洋洋洒洒、稀稀拉拉，战线拉的很长，俨然是一次小规模“长征”。学生中间也传出了一段顺口溜，“小学生，真受气，王老师坐那儿真美气”。在学校的运动会是热闹的，我参加了60米智力竞赛，也就是跑到终点算完题，再跑回来。我使出浑身的劲，拼命向前冲，速度却似乎没有加快，其他跑道的人很快就跑到我前面去了，好在我算题快，最终获得了名次，奖了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但是这次比赛也打掉了我的自信心，老师和同学们都说，

你赛跑怎么像骑马一样呢。这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体育比赛，以后就一直是观众了。

新学期开学了，发的新课本都要求包书皮，拿到同学付书民家，他姐姐帮着把我们俩的课本都用年画一块包了。他家的经济条件较好，买的图画纸也常常给我几张。他后来招到桃园煤矿下井，矿上破产以后，一直在外面四处打工。我2008年春节期间为拍摄纪录片《同学》找到他时，尽管显得有点落魄，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给我描述着那与现实落差极大的艺术梦想。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蹲在墙角，透过门前种的几株向日葵，向山上眺望。向日葵还没有成熟，就不知道被哪个孩子摘走了。有一次大妹哭个不停，怎么也哄不住，妈妈发火了。我怕妈妈生气，就赶紧说我领妹妹到门口玩。大妹那时才一岁多，我也不到五岁。邻居家比我大一点的郭新说，我来背着你妹妹吧，我说行。就叫大妹站在门口煤堆旁的石头上。那是冬天，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蹲下去，手从背后抱住妹妹的腿。当她试图背着妹妹站起来时，双手终于没有搂住，妹妹向后摔了下去。哇一声，妹妹又大哭起来。母亲本来就不高兴，把我也训了一顿。后来，随着弟弟和小妹的相继出生，家里的生活也更加困难，父亲还是天天上班下井，母亲也到矿上的红矸山去干临时工。奶奶去世以后，白天父母上班去了，我和大妹也要上学，弟弟和小妹放在家里没人照看，怕被外面淘气的孩子欺负，就把他俩锁在屋里。弟弟和小妹就只好从门下的狗洞中和外面的小孩玩耍。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带着弟弟妹妹一起上街，天气很热，弟妹想吃冰棍。那时卖冰棍是推着一个小车四处流动的，此时附近却找不到卖冰棍的。我叫弟妹待在原地不要动，我到前面去买。一路上也没有见到一个卖冰棍的，我越跑越远，到七里铺才终于买到了冰棍。我怕冰棍化了，把身上的背心卷起来兜着往回跑。到了五里铺服务大楼附近，弟弟妹妹都不见了。我急得到处寻找，火辣辣的太阳下，我浑身是汗。我想弟妹们一定是等的着急去找我了，就又顺着原路往南寻找。到五一饭店那儿，见到他们三个手拉着手，汗流满面地在太阳下走。我赶紧掏出包在衣服中的冰棍，此时已经快化完了。多年后在太仓和大妹聊起此事，她已经不记得了。

快乐的时光也是常常有的，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就会开油锅，做很多好吃的。于是过年就成为一种盼望，不仅有压岁钱，还可以放炮。从上海带回的大白兔奶糖，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甜蜜的记忆，一张张五彩缤纷的糖纸，曾是孩提时代的珍藏。父亲每年的元宵节都会给我们扎兔子灯笼，下面还安着轱辘可以拉着在地上走动。傍晚天色刚刚暗下来，小伙伴们便迫不及待地提着各自的灯笼出现在院子里，小嘴还不停地嘟囔着“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夜色中的灯笼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缓缓地移动。远处不知是谁的灯笼烧着了，伴随着火光，马上响起一阵嘹亮的哭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几个小伙子围在一起，抬着一米见方的孔明灯，把底下的油绳点着火，然后慢慢地托住往上一推，孔明灯便向空中缓缓升起，一直飞得很高很高，也变得越来越小，渐渐地像一颗星星，后来就看不见了。那时父亲给我用卡纸做了一架双层翅膀的飞机，还有一个用火柴盒和硬纸板做的玩具梳妆台，梳妆台外表贴着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很精致，台面上方还镶嵌了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我喜欢看书，也常常到同学那里借各种连环画，只是数量很有限。记得我自己节省下来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书是《王妙郎的故事》，好像是七分钱一本。后来买到的《天体的来龙去脉》内容非常有趣，从太阳系、银河系，一直讲到总星系、红巨星、白矮星。那时就产生了一个疑惑，书上讲宇宙是永恒的，是无限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但是小到一粒麦子，一个人的生命，大到行星、恒星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如果宇宙中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永恒的，那么所有这些不是永恒的东西加在一起怎么就成了永恒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帮我借了一本《宋词选》，成为我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读物。直到多年以后，中国古典诗词的隽永和雅致还令我一度产生了深入研究的想法。古典诗词常用的字词不是很多，但无论是从每一个单字的点画结构，字词的发声韵律，还是字形本身带给人的美感，都是统一的，如果将这些字词的使用频率、点画的形式构成和声音的抑扬顿挫结合在一起做一个综合深入

地比较研究，不知是否会打开一扇新的窗户。从雄性十足的汉魏书法联想到中国汉代的陶俑，一种大气磅礴，不斤斤于微末和雕琢的品格，或许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精髓。与之相比，希腊、罗马的雕塑则显得过于理性和雕琢。

读书是自得和快乐的，但由于自己性格比较内向，常常显得自闭，一种语言表达上的缺陷造成的困扰和障碍一直持续到我的成年。也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六七岁的样子，我说话开始有些结巴，其实也并不严重，然而随着周围的议论和劝说，自己也就越发紧张。越是想流畅地说话，就越是结巴得厉害。记得当时母亲叫我到隔壁大娘家里借一块蒸馍用的笼布。我过去后还没有张嘴心里就开始紧张。只发出第一个音节之后就绊住了，后面便再也发不出声来，引来周围一阵哄笑，我非常困窘，结巴也越加厉害。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在暗地里与口吃做搏斗，试图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使口吃得以纠正。说话时常常在一个音还没有发出时，我就可以凭直觉知道，下面这个音我会卡住，于是马上停下，略作停顿后，再选择另一个同义的字词替换，再慢慢地读出声来。经过一段极为漫长的自疗过程，我终于能够像常人一样较为流畅地用语言进行表达了。

口吃的困扰通过我的不断努力而最终得以矫正，而另外一件儿童时代关乎我健康的治疗则来自一次偶然的发现。在同一排公房住的来自上海的矿工姚惠民家女儿得了小儿麻痹，后来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直靠双拐支撑。有一天，姚惠民老婆对母亲说：“看你家林鑫走路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对劲，不会也是小儿麻痹吧。”母亲一听不得了，立即和父亲一起将我带回上海，到大医院检查。还好，由于治疗及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那是我一两岁时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一点印象，这些都是母亲后来说的。再一次回到太仓，并给我的童年留下深刻的记忆，已经是五岁以后的事情了。

## 太仓之一

童年的故乡总是梦幻而遥远。尽管家里亲人之间，一直用南方话交谈，生活中也保留了很多南方的习惯，然而故乡更多只是停留在语言和美好的想像当中。直到有一天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才呼吸到江南湿润的空气并领略了和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完全不一样的水乡风貌。母亲带着我和大妹一起回老家，在铜川怎样上火车，到西安怎样转车都记忆模糊了，只知道从西安到上海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南京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过江的时候，车厢被分批装在大轮船上摆渡。透过船上的栏杆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点点江面，平静的水面颜色有点泛黄。母亲说这就是长江。车厢在船上待了很久才过到对岸，船上静静的，只有一两个人在甲板上走动。到了上海一出站，向北走好像是天目中路，到处是人群和车辆穿行在狭窄的马路上，乱哄哄的。坐长途汽车到太仓南郊下车后，母亲领着我和妹妹，沿着一条河边的乡间小路，向远处一个可以望见的村落走去，母亲说那就是我们的老家吴家弄堂。我一路走着，还不停地四处张望，有种陌生和新鲜的感觉，和想象中的故乡并不一样。河上不断有渔船驶过，还张着帆。噢，这是真正的帆船，不过一点也没有图画上的白帆好看，有的帆布十分破旧，上面还有补丁。船上的货物装的满满的，甲板眼看就要和水面挨着了，只有十来公分的距离，看着像随时都可能会沉下去一样。小路右边的棉花地里，可以看到一个个头戴斗笠的村民在摘棉花。不知田里谁喊了一声，“是阿末郎回来了。”话音未落，棉花地中间就冲出一个低矮瘦小的老太太，腰上还挂着摘棉花的竹篓，大声喊着“阿末郎”，一蹦一跳地从田里跑过来，笑的十分开心。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外婆，快人快语，十分利落。跟着外婆回到村口，转过一片茂密的树丛和竹林，就到了外婆家。见到照片上见过的外公，感觉有点严肃，心里怯怯地有点怕他。外婆家是一个江南风格的四合院。进了大门前厅，一眼看到的是

一架靠墙摆放的老式织布机，上面张着密密的色线。靠左边的房间是一个仓库，放着粮食、稻草、铡刀、农具等杂物。右边是灶房，江南的炉灶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灶台上有一大一小两个铁锅和一个汤罐，灶台靠着灶门那边立着的一面墙是灶壁，白色的灶壁上画有各种蓝色的图案和灶沿下方的图案呼应。小姨忙着在灶壁的后面烧火，将稻草打成一个个像数字4一样形状的草把，不断地填入灶口，草把在炉膛里燃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小姨很爱笑，说话嗓门也大。灶塘里烧火时坐的树墩旁边，有一只乌龟静静地卧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灶台旁边放着一口很大的水缸，里面爬着几只田螺。小姨说，水缸里面放几只螺蛳，水就干净了，没有杂质。从前厅进入天井，地面的青砖上布满了绿苔。左右两边是东西厢房。正房西侧是大舅和舅妈的卧室，正房东侧是外公和外婆的卧室，卧室里有一把木梯可以上到阁楼上，那是小姨的卧室。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透过密密麻麻的竹林，可以看到其他人家的白墙。大舅的儿子兴涛，常常带着我用沾满蜘蛛网的竹拍子，去粘树上的知了。下雨的时候，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不断，可以听到屋外的蛙声此起彼伏。在东厢房屋檐水滴滴答答不断的台阶上，外公有时会用火烧着一排裁短的竹竿在熬竹油。从灶房的偏门出来，有一条翠竹掩映的小径直通到河边，每天家人就在这里的石板上洗衣服、洗菜、淘米。偶尔也可以看到细长的青蛇蜿蜒地从竹梢上一闪而过。小姨带着我们到竹林里挖新出的竹笋，用来炖汤。河边的石台阶旁边，泊着一条小船。我按捺不住好奇心想上去划船，晃了两下站不稳，直接掉进了河里，浑身都湿了。也常常用柳树的叶子做出一只只小小的柳叶船，放在河中顺流而去。大人们每天都要在仓库铡草喂猪，我觉得好玩十分想看，却总是被赶开。趁大人午睡的时候，我悄悄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试着铡草。铡刀很沉，草没有铡到，我的右手被压在了铡刀上，只看到手掌上的肉被切开了，白白的，然后就冒出血来。哭声惊动了母亲，她赶紧用布把伤口一裹，一把抱起我去找医生。当时好像没有感觉到疼，母亲一直抱着我，沿着田边的小路不知道跑了有多久，手上包的布已经被血染红了。到了镇上的诊所，大夫只是用一种白粉敷上后包住，好像也没有缝针。伤口长好以后，右手上留下一寸多长的刀疤和再也无法自由弯曲的拇指。后来母亲领着、我和大妹到城里去玩，也顺便照相留念。太仓有一种特产叫肉松，妹妹特别喜欢吃。照相的时候，妹妹手里抱着一袋肉松始终也不愿意换掉，我拿着两只花红。那是在太仓留下的唯一合影。

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一直让外公耿耿于怀的事情。母亲一心想带着子女回到太仓生活，但如果不能把户口迁移回去，是很难在当地立足和生存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外公就一直在跑着办这件事。据母亲说，外公当时已经在县里盖好公章，按理可以直接办理户口迁移了。但由于外公不熟悉流程，又拿着这张证明到南郊镇盖章。没想到一到镇上就卡住了。不仅不同意，还把户口迁移证也收掉了。眼看要办成的事情最终黄了，外公为此一直叹息不已。母亲说起这事，也带有很深的遗憾。不过要是当时真把户口迁移办成了，那么我们兄弟姊妹后来的生活和道路，可能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在社会这个大机器上，任何一点细小的变动，对个体命运的影响都是颠覆性的。时光不会倒转，生活的进程也没有假设。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正是由无数的偶然或必然所生成。



15、林鑫和母亲、大妹、小姨 1967 年于太仓



16、林鑫小学毕业照 1974 年于铜川

## 电影

究竟什么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太仓回到了铜川，我已经不记得，但是江南水乡和黄土高原的巨大差异，则深深地刻入我的记忆。临走的时候，外婆给妈妈一些手工编织的彩色条纹老粗布。回来后，母亲用这些粗布给我和妹妹每人做了一条裤子。我穿着彩色条纹的裤子，多次被小伙伴们嘲笑为穿的是花裤子。那时物品短缺，做衣服的缝纫机也很难买到，我们家的熊猫牌缝纫机，还是外公在太仓买了托运过来的。记得为买一台 40 块钱的三五牌挂钟，母亲盘算了很久，最后还是因为售货员是熟人关系，先把挂钟抱回来用着，货款每个月付一点，几个月后才全部付清。

70 年代没有多少娱乐，看露天电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地道战》、《地雷战》



看的遍数太多，几乎都可以记住镜头内容的衔接。但依然乐此不疲地一看再看。人多的时候，站在后面看不见，干脆站到银幕背面看反着的影像。一部片子常常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放映，开演的时间前后错开一点，为了胶片的传递。影片在放映过程中由于温度较高，胶片常常被烧断。在放映员连接胶片的时候，灯亮起来，孩子们会做出各种手型，伴随着尖叫，影子打在银幕上。一盘胶片放完了，有时另外一盘胶片还没有送来，那就干等着。看电影已经成了大家最大的娱乐。由于反反复复地放映和观看，像样板戏一样，好多电影里面的台词也十分熟悉。“面包会有的”，“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等等成为当时民间最为流行的时髦话语。那时候经常放映的几个场地有铁路局院子、老矿务局大门口和 194 地质勘探队，大家一般叫 194 队。除了几部国内影片和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外，外国影片大部分来自阿尔巴尼亚，有《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等等。晚些时候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也换取了不少观众的眼泪。到后来才有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多瑙河之波》、《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电影毕竟不能当饭吃，生活是现实和直接的。铜川地区本身缺水，而北公房的缺水则成为一种常态。矿上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各供水一小时，一个几百户居民的家属区只有几个水管。于是，每天的日常用水成为每个家庭的硬性任务，不管任何时间，每个水管跟前都排着长长的水桶队伍。夏天旱情严重时，水压更小，水管滴滴答答，一个小时也接不了几桶水。于是排列整齐的接水队伍就乱了，大家纷纷拿起桶挤着往水龙头上套，张家的桶挤扁了李家的桶，李家的桶又砸坏了王家的扁担，大人们在旁边骂着，半大少年嬉闹的挤着水，旁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们，抢水成为每天的一个景观，为接水发生的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我不想天天去挤，就担着水桶跑到很远的河东或灰堆坡的水井里打水。有时候在梦里都会想着错过排队接水的时间而突然惊醒。

这是一个短缺的时代，不光是缺水，什么都缺。买布、买粮、买肉、买豆腐、买红糖都要凭票证。为买一点豆腐常常天不亮就要起来到豆腐店门前排队，去的晚一点就买不上了。唉，总是排队，排队，排不完的队。那时要是谁家有人是在商店卖肉的，大家可真是羡慕死了。所有的人都眼巴巴看着那钩子上挂着的几块肉，都想买膘厚的肥肉，回家可以提炼一点油出来供炒菜用。当然，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嘲笑苏联修正主义的经济困境。记得在老矿务局大礼堂演出了这样一段相声，说有一年苏联过年的时候，大清早肉店一开门，市民们一拥而上都挤了进去，肉架上空空如也，只有一根猪尾巴挂在那里。挤在最前面的那个家伙，一把抓住了猪尾巴，第二个也紧紧抓住不丢手。一个说，你知道我是谁嘛，我是警察局长的小舅子。第二个也毫不客气的回敬道，你知道我是谁嘛，我是州委书记夫人的表妹的堂姐夫的丈母娘的外孙子。即便是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段台词竟然在脑海里记得那么清晰，甚至连那个演员当时的表情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栩栩如生。

那时每天做饭非常麻烦，要有一个人不停地拉风箱，啪挞啪挞，在烟熏火燎中，不是饭溢出了锅外，就是菜炒糊在锅中。父亲每天下井上班，大部分时间上的是下午 2 点班，但因为班前学习、换工作衣、交班等等，所以等我们中午放学回来，他已经上班去了。说是晚上 10 点下班，上井后还要洗澡，再走回来需要半个小时，常常到家已是晚上 11 点以后了。这时我们也早已睡着了。只有母亲始终守候着父亲归来。在我的印象中除非父亲休班，平常几乎是见不到父亲的，他像一个影子，你知道他存在，但几乎见不到他。母亲后来也一直干临时工。父母都不在家的時候，我们就自己做饭。发面、蒸馍、擀面、炒菜这些家务活早早地就开始学着干了。更多时候是母亲提前把饭做好，我们中午回来热一下。

## 野根

50年代末，姑夫的弟弟张野根，也从上海浦东的农村来到了三里洞煤矿工作，母亲和姑姑便将她们在太仓的同学王惠英介绍给他。野根是个老实人，忠厚木讷，不多言语，他一辈子都在采区攉煤。王惠英则心直口快，雷厉风行，两人性格落差很大。当初谈恋爱时王惠英就不是十分满意，谈到将来的落脚点，两人也一直说不到一块。野根说他退休以后要回到浦东去住，而王惠英一直住在太仓南郊的码头镇上，是城里人，她说将来只待在太仓，不愿意到浦东去过乡下的生活。姑姑劝道，像野根这样的老实人，天底下到哪儿去找呀。后来他们还是结婚了。王惠英来铜川住过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太仓的厂子里做会计。从此开始了一辈子的长途马拉松。扁担总是离不了的，每年的探亲假期间，野根总是大包小包担着行李，从铜川回到上海和太仓，将自己节省下来的工作衣、胶靴以及这里的核桃特产等，担回南方。因为物资短缺，返回铜川时则又将南方的大米、大肉等带回到三里洞。年年都是如此，像一个长途搬运工。姑夫离开三里洞以后，就委托父母关照野根，到休班的时候，也常常请他来家里吃饭。后来野根在井下发生了一次事故，把腿砸伤了，以后走路脚一直有点跛。退休以后野根回到了南方，按理说像候鸟一样分居了一辈子，这下总该可以团聚了吧，谁知道谈恋爱时遇到的那个问题，在几十年以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王惠英坚持要住在太仓，张野根也很倔，坚持将家安在了浦东。两个人一个在太仓，一个在浦东，像走亲戚一样来往着。这是后话。

记得有一年，小妹还小，大约四五岁的样子。母亲托野根将小妹带回到太仓老家。在西安转车的时候，上车的人很多，他又挑着很重的行李，十分拥挤。野根便请同路回去的矿工帮忙将小妹带上火车，那人行李相对少一些。车站上到处是人，车厢里也挤满了人，西安到上海的这趟列车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当野根终于将行李弄上车并安排妥当，然后回过头去领小妹的时候。那位矿工说，她去找你了。野根慌了，在车上找了一圈没有找着，只好又把旅行袋从行李架上取下来绑好，在下一站下车，再转乘反方向的火车，赶回西安火车站。很多年后和小妹谈起此事，小妹说当时在站台上人很多很乱，那个矿工说，去找你叔叔吧，小妹急忙过来找野根已经找不到了。后来火车开走了，剩下她一个人在站台上哭，列车员过来问明了情况，将她领到了工作人员办公室。虽然是虚惊一场，现在想起来也后怕。

## 三里洞矿中

1974年的夏天，我从三里洞煤矿小学毕业，升入三里洞煤矿中学。上学的地点也从五里铺变成了路途远一点的三里洞。那时到处的“批林批孔”运动方兴未艾，张铁生也因为考试交了白卷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虽然对这些事情的发生感到恍然不解，但我对绘画的兴趣却更加浓厚。几个爱好画画的学生由美术老师带领着，在学校门前的墙上绘制巨幅宣传画。也经常被学校团委和教研组抽出来制作宣传栏、墙报。于是就有了不上课的理由。我和同学刘全安、付书民还跟着美术老师王积功到金锁关的农村去搞过阶级教育展览的连环画创作。根据组织单位提供的脚本，先由我和付书民绘出草图，王老师统一用毛笔钩墨线，再由我们填色。刘全安负责文字书写，他那时的毛笔字已经写的很好。那是我第一次到陕西的农村，大队部将我们安排在小队长的家里吃饭，农村的粉蒸肉、馒头和苞谷面稀饭，和在城里吃的感觉不一样。前后一个多礼拜，完成了几十块展板的近百幅图画和说明文字，用绳子串起来一挂，就是一个可以流动的展览。每日待在群山之中，显得特别宁静，也可以很清晰地听见对面很远山头上的人说话。每天早上村民和下乡的知青一起出去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正在这里下乡的王正祥大女儿红梅，骑在牛背上，在知青们的一阵哄笑中，掉了下来。当地人

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后一个小伙闲着无聊，在村前转悠，嘴里不断地哼着小曲。这些下乡知青，都是三里洞矿中比我们高几级的学生。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而知青们天天待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里，则盼望着能早一点招工进城。

同学们最爱上的课是体育课，比呆坐在教室里有意思。跳绳、踢足球、打篮球，还有双杠和高低杠，大家也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体育老师黄凤清，是一个有点像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一样的人物，每天早上总是沿着学校的操场跑步，风雨无阻，永远穿一身洗得已经发白的深蓝色运动衣。脸晒得黝黑，眼睛总是眯缝着，像一只没有睡醒的狮子。但一进入足球场，他马上就变得活跃起来，带着足球来回穿梭，敏捷地过人，技巧十分娴熟灵活，其神情则投入和专注。训练学生射门时，他站在守门员位置，一次次地鱼跃扑救，倒在地上，球始终死死抱住。黄老师的英文底子很好，有时英语老师请假了，他也会代课，其幽默生动的授课风格很受学生欢迎。无论什么季节，他总是那一身旧运动衣，从来没见过换过，也因为他在学校教师中的特立独行和对教学的认真投入令我心生敬意。直到有一天，暑假即将结束，我从矿上洗澡回来的路上，迎面碰上了一身笔挺西装的黄老师，我甚为诧异。这简直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有一种绅士的气质和风度。他刚从上海探亲归来，后来听说他的妻子也非常漂亮。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命运驱使他来到了三里洞矿中做体育教师，我们无从知晓。期末的体育考试是拍篮球，我连拍了几次也没有达到规定的连续拍击次数，黄老师唉了一声摇摇头，给我打了60分。

那时的三里洞矿中，各有特点的教师还有不少，只是后来大多数都离开了。比如我们的班主任徐龙贵，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传说他当年考大学时，就很牛逼的对同学放言，如果我考不上复旦，你们就都不要去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竟沦落到了三里洞煤矿下井，由于学校缺少教师，才又把他调到三里洞矿中教数学。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他考回母校读研究生了，以后也没有见过。也有人说他后来去了英国，但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清瘦白净的徐龙贵老师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人，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布置完作业后，大家会请求他把作业题讲一下，他讲了几句就说：“不讲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着：“讲，讲。”常常讲着讲着就把作业题讲完了，大家往作业本上一抄完事。有次讲题，他运算了几步之后，没有运算过程，直接就画一个等号，把得数写上了。同学们问“这一步怎么得来的呢？”他盯着黑板仔细看了一眼有点困惑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我一看就知道等于这个数，你们抄上，没错。”还有一次在教室里，他对着全班同学说：“老师没有烟抽了，哪位同学给老师拔根香烟。”沉默了片刻，胆大一点的同学，就走过去，递给他一支烟。大家一阵窃笑。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处得很好。一直传说许老师怕老婆，有一次终于得到了我们同学的验证。他叫了付书民等几个大个的同学帮他拉煤，到家后，马上拿出香烟给同学们抽，同学们不敢接，正说着，他老婆回来了，吓得许老师赶快把香烟塞进了抽屉里。他老婆是河南人，据说很厉害。

那时全班的男同学基本都抽烟，有的同学上课忍不住，也会偷偷抽上两口，再把烟圈吐到课桌下的抽屉里，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很小的时候到同学家去玩，他就派其弟去买八分钱一盒的“羊群”牌香烟招待我们。其实那时也不会抽，只是每人嘴上像大人一样叼一根香烟，觉得很扎势而已。我和同学赵建忠商量，我们两个坚持不抽烟，互相监督。不过他最终也没有经住同学们的拉拢和劝说。抽烟是一件小事，那时候就是想找一件事情约束一下自己，如果连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那我们以后还能做什么呢？尽管我后来也一直没有抽烟，但工作场合的大量二手烟，则无法避免。我们那时都觉得学习没有什么用处，等待我们的就是混到高中毕业，然后上山下乡去修地球。最远大的理想也不过是下乡出来以后，在哪个单位做一个美工。没有什么学习的动力，有时上课听得无聊，就悄悄地从后门溜出去，到后操场躺在废矿车改制的铁椅上晒太阳。铁椅已被阳光烤热，躺上去感觉很烫。天空没有一丝的云彩，掏出兜里从废弃的矿灯上拆下的放大镜，在太阳下不断调整镜片和地面的距离，

阳光透过镜片在地面汇聚成一个亮点将地下的纸片点燃。烧蚂蚁，看着地上的蚂蚁跑过来跑过去，最终也没有躲过镜片的聚光照射，有一种作恶的快感。现在想起这些，则感到内疚和不安。因为我们最终会认识到，每个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像一只无处逃生的蚂蚁，无论怎样地挣扎和努力，最终还是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记得有一天上学迟到了，班长叫我上台做自我检查。我说：“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我今天到七里铺新华书店去买《毛主席语录》，上课来迟到了，这是不对的，我坚决改正，以后再也不买《毛主席语录》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班长气急败坏喊着，你偷换概念。这是一段趣事。三十年后，我为拍摄《同学》找到当时的班长王泽远时，他的口头语中依然常常在不经意间带出“这是一个概念”的句子。他后来考上中专，分到粮食系统，逐步成为一个部门经理和企业法人，再后来下岗买断了工龄，那是很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在学校时，我们大多数同学依然是学着、玩着，没有太多的想法。

国家大事不断地发生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始终也搞不清楚。文革期间，194队门前，还有刘少奇的塑像，跪在那里，手在身背后绑着，身后立着的牌子上写着叛徒、内奸、工贼。那时流行大字报，到处是批判牛鬼蛇神和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漫画。记得看过某本没有封面的书中讲过刘邓大军，起初以为刘指的是刘少奇，后来才知道是刘伯承。电影院放正式影片以前，经常加演《新闻简报》，多少期，多少期，都有编号。内容大都是毛主席接见西哈努克亲王或谁谁谁，影片中的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参观，画面上西哈努克好像一直张着嘴不停地在吃东西。当时传说是西哈努克嘛还是巴基斯坦赠送的那个著名的芒果，作为一种与中国人民友谊的象征还在全国各地像奥运火炬一样迎送传递。每到一个地方，当地都会组织群众站在马路的两边夹道欢迎。芒果很小，放在一个透明的圆形玻璃罩中，由站在汽车上面的一个人用手高高地托举着，车缓慢小心地前行，马路两边的群众都翘首仰望，人太多了，我们小孩们站在后面，偶尔可以透过拥挤的人群缝隙对那个据说叫做芒果的黄色圆形物留下惊鸿一瞥。现在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随便摆放的很多芒果时，依然会对这样一种极为普通的水果，在那个特定年代造成的举国欢庆感到不可思议。《新闻简报》影片中林副统帅始终不离毛主席左右，手里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微笑着，一副很谦逊的样子，无论在哪儿都一直戴着帽子。有一次在三里洞煤矿门前的玻璃橱窗中看到一张林彪打电话的图片，没有戴帽子，是秃顶，感到很诧异，同学们还在一起议论。不久，就听到矿工们在私下议论说，林彪想炸掉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阴谋失败，和叶群、林立果一起逃往苏联途中，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掉下来摔死了。也有人说是周恩来总理叫人打下来的。大家都是私下里神秘地议论，直到后来公开。再后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也粉碎了，又开始大范围地给以前被打到的人物平反。好人和坏人之间角色转换的太快，令人有点迷惑不解。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从小就被灌输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形象，即便是到后来刘少奇平反之后，心理上也依然觉得很难接受，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国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紧接着1977年恢复高考，摆在我们面前的命运已不再只是上山下乡一条出路了，还可以考大学。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希望。学校也重新调整划分了班级，我们三里洞矿中高78级一共有800多名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班级多次被打散重组。所以一个班的同学是很少能够始终在同一个班级。只是这次调整成立了两个重点班，我被分在文科的重点七班。任课老师和班主任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我们的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刘国胜老师，他擅长写作，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和同学的关系也一直处得很好。语文老师张志民是新调来的，以前没有见过，老是穿一件黑棉袄，一副典型的关中老农打扮，说话也是标准的秦腔普通话。然而讲起课来虽然语速不快，但非常认真，一板一眼绝不含糊。其他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经常只是签上一个“阅”字，顶多再加上一两行文字的批语。而张志民老师则完全不同，不仅对每个同学的作文都认真批改，红色笔迹的批语也经常长达几百字，同学们互相传阅着张老师的评语，眼神中流露出对这个

乡巴佬式的张老师由衷地敬意和赞叹。从高一的前半学期开始，就不再有寒暑假，连续两个学期，备战高考。老师也从一年级的汉语拼音开始，进行全面的复习，第一个假期张志民老师鼓着劲一口气讲了数十篇古文，为同学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言文基础。因为我古文学的不错，有次在上课的时候悄悄地看课外书。张志民老师发现了，叫我站起来，让我将一篇还没有学过的古文翻为白话文，第一句是“孔子过泰山侧，”我译为“孔子路过泰山的旁边”。张老师大加赞赏，竟然和教师参考书上的标准译文一个字都不差。后面的翻译虽有瑕疵，已忽略不计了。此后张老师便常常叫我在早读课上领同学们读古文。有时还到理科重点班领读。虽然此时口吃的毛病已经好了很多，但心里依然很紧张，生怕在哪个地方卡住。像打仗一样，完成一节课的领读，常常是一身汗，但还要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被别人发现。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虽然才读高一，但学校还是选了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权当是一种演练。当年西安美院也在铜川设有考点，美术老师领着我们几个人，带着各自的素描、速写和色彩写生习作前去考试，结果第一轮就都被刷掉了。面对已经积压了十年的生源，那年高考我们年级只考走了一个学生。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再到西安考美术学院，先后经过了初始、复试和体检，但最终依然没有被录取。我们应届毕业的800多学生，最终也只有五六人考入大学。一些同学选择了复读，后来又考上了几个，但更多的同学则走向了社会。待业、招工、下井，每个人的命运不尽相同，即便是大多数同学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每人都忙着自己的生计，除个别平时来往密切的，大部分同学都几乎没有见过。直到30年以后的2007年夏天，我拍摄纪录片《同学》时，才在不断地寻找中与同学们再次一一相遇，但有些同学的变化已经大到对面站着也不敢认了，相对而坐不胜感慨。有同学算过，当年三里洞矿中高78级的800多同学，不管是因病、车祸还是其他原因去世的，已经将一个班级报销了。



17、林鑫 1978 年在三里洞煤矿中学的高中毕业证

记忆碎片

记得在 70 年代，漆水河还清澈见底。小蝌蚪不停地在河水中游来游去，一对一对叠在一起的蜻蜓紧贴着水面快速飞过，树上的知了在中午刺眼的阳光下不停地鸣唱。那时夏天河里经常发大水，我和弟妹正在河里洗衣服，听到远处有人喊发大水啦，河里洗衣服的人们赶紧端起洗脸盆飞快地逃离河滩，站到高处的马路上观看。不一会的功夫，洪水下来了，像一堵墙齐刷刷地压过来，发出很大的声响。洪水的浪头浑浊发黑，各种垃圾草木等在水中漂浮翻滚。刚才还很清澈的河水马上被污浊的洪水覆盖，漆水河上横跨着的两座桥梁，像是漂浮在水面上，数米高的桥墩已经被洪水淹没。旁边灰堆坡的居民区由于地势较低，街道和房子完全浸泡在水中，不时会从淹没的房屋中飘出一些箱子、木盆等物品，屋里的人们早已爬上了房顶。桥面上由无极绳牵引着四个一组的运煤小矿车，依然旁若无人地继续前行，咕噜咕噜慢悠悠地像一头老牛。喘急的洪水中有时会冒出一个挣扎着的人头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在拼命划水，人物的面目已经看不清，完全被黄色的泥水遮盖。岸边观看的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水流太急，无人能下去营救。落水者顺着洪水的起伏很快就被冲到下游去了。过了很久我依然没有缓过神来，还在想着那个落水者的命运。

矿上常常发生事故，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叫声就知道矿上又出事了。应该是 1974 年吧，我刚上初一，焦坪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了 101 人。我们在上学的路上，连着几天都看见一辆接一辆的汽车，拉着棺材从南往北向焦坪煤矿的方向开去。周围的人们议论纷纷，同学们也传播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刘全安告诉我说，瓦斯爆炸过后的人体，就像烤熟的红薯，人手指头一戳，就是一个洞。他一面讲还一面用手比划着，听得我毛骨悚然，夜里无法入睡。后来刘全安接他父亲的班到三里洞煤矿下井，他说刚上班的时候，见到四个小女孩手拉着手，在三里洞的矿区蹦跳着向前走，她们每个人的辫子上都扎着两朵白色的小花。她们也是父亲在井下死亡后接班的。很多年过去了，他不经意间讲的这几句话，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像一组凝固的电影镜头，不时会想起。后来成为诗歌《两个孪生的姐妹，两朵并蒂的花》的直接来源。

家里的经济状况依旧没有好转，一直在辅助部门工作的父亲，收入实在太低。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总是无法坚持到月底。借点钱下个月开资一还账，第二个月还是不够用。母亲只好不断地干各种临时工，给家里经济上一些补贴。我上初中放暑假时，母亲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在大同沟修公路，那是我人生挣到的第一份收入，一天 1.38 元。

有一天深夜，我们都已经睡着了，外面传来很急促的敲门声。是矿上的工友来报信，说父亲在井下出了事故把脚压伤，已经送到了矿务局医院。那时已是后半夜，我和母亲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中间，四周漆黑一片，因为家里离矿医院比较远，走了很久才到。在冷色灯光的照射下，医院显得阴森恐怖。父亲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进来，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微笑。他身体非常虚弱，脚上已经打上了石膏，瘦弱的身躯裹在白色的床单中，显得十分无助。后来我才知道，一生老实巴交的父亲，每天在井下都要来来回回跑几十里路检查瓦斯，从不偷懒。出事的那天，也许是实在太累走不动了，第一次扒矿车的父亲脚就被压伤了，后来为此还受了处分。而那些经常扒矿车的，反而没事。

父亲受伤以后走路一直有点跛，无法再走长路。通风区便安排父亲做办事员，也修理瓦斯监测仪器。在父亲工作的办公室，我第一次透过瓦斯鉴定器的观测孔，看到了里面绽放出七彩的颜色像彩虹一样，在灰黑色的矿区显得无比艳丽。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已经 27 岁，母亲只有 19 岁。后来母亲对我说，你爸那时老是说我年轻不懂事，现在我又觉得他老了。在四川工作的大舅来看母亲，讲述了他一路上多次被红卫兵逮住戴高帽游街的经历。由于国家发布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家属区又忙碌起来，就在北公房对面的山坡上挖防空洞，家家户户分派任务，每家进度一米，顺着两座山的两面同时开挖，24 小时不间断的轮流工作。还给每家每户分发了防毒面具，以

抵御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修向我们扔原子弹。

姐夫张金龙一家后来离开三里洞煤矿，调到了往北几十公里以外由部队负责的沟门煤矿。我跟着姑姑去过一次，那是冬天，雪下的很大。我们坐着军车，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前行，有点林海雪原的感觉，部队营房外到处是厚厚的积雪。我和表弟荣明在树林里逮了一只黄色的小狗，带回家中养大，后来有一天狗跑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门的下部为狗出入挖的洞，一直存在。荣明当时给了我很多用过的子弹壳作为纪念。后来姑父又跟着部队到了陕南宁强县燕子砭的八一铜矿。临走时路过铜川荣明还问到我，那天我出去玩了，没有见到他们。相比荣明的机智灵活，我则显得老实木讷。有一次姑姑派我俩去火车站接从上海探亲归来的野根叔叔，火车还没有来，看到火车站的围墙上不知是谁挖了一个洞口，不断有人穿过，我们也跟着钻了过去。谁知里面马上有人喊叫，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围拢过来。荣明一看扭头就跑了，我自以为洞口本来就在那儿，又不是我们挖的，并没有急着逃走。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抓住，扭送到火车站的二楼办公室，里面没有人，他们几个便在楼梯口一边玩耍一边看住我。后来好像没有声音了，我才从另一边楼梯悄悄地溜了。回去野根叔叔已经到家了，荣明还没有回来。

中学阶段像小学一样，除了上课之外，也经常安排学工。我被分在三里洞煤矿锻工车间，有一位面容看着很和善的中年人申师傅，说话很少，总是默默地干活，和其他工人师傅的豪爽并喜欢粗口的风格很不一样。同学们私下议论说，他是右派，噢，原来是这样。

赵建忠同学经常帮他母亲拉架子车，我有时好奇，也想试试，驾辕很吃力，很快就栽把了，在马路上摔出去很远，幸亏没有受伤。

我们班转来了一个高个子女生，感觉比我们成熟很多，上了没有几天课，就不见她来了。矿上开公判大会的时候，我们都坐在台下，她的父亲被判了刑。事情据说是这样，半夜她母亲睡醒了，发现他父亲和她睡在一起，就悄悄地锁上门去报案了。我们班主任站在后面嘿嘿笑着，唉了一声。同学们也一直在议论。那个时候判刑的强奸案很多，有一个女红卫兵被人骗到北关的山上强奸后杀害，将尸体扔到了漆水河里。这个案子一直也没有告破。每次公审犯人的时候，在老矿务局大门口都贴有布告，两张或三四张，上面写有犯下的罪行，死刑犯的名字上打上了红色的叉叉。看到有鸡奸的罪名，始终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犯人被枪毙之前，照例是要游街的，胳膊用绳子反绑在身后，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除名字和红叉叉外，还有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强奸犯等等罪名。他们的头被后面持枪的战士压着，有的犯人眼睛还向四周窥视，有的则呆呆地一动不动。听去过刑场的人说，将犯人枪决以后，马上就有人拿着馒头上去蘸着犯人的鲜血吃下去，据说是治病的。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牛文学，口齿有点不清，每次唱国际歌唱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时候，他总是唱成“英刺啦”。也有些同学在私下悄悄地传阅着一些书抄本小说，完成了最早的性启蒙。76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在广播中听到小说《爱情的位置》，感到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唯一的性知识是来自一本《农村妇女卫生常识》的普及读物。青春期的极度压抑和骚动无处释放，有时心想，要是没有性欲该有多好，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艺术了，不再有自责、焦虑和内心的挣扎。当很久以后听说这是男人可以骄傲的优点时，我早已青春不再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与帕索里尼影片的相遇，也是冲着封面上三级片式的广告词误打莽撞上的。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一些正常的事情搞得十分神秘，也给一代人的成长和生活带来了无法消除的影响，无论你愿意与否，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 太仓之二

记得是76年，预报说铜川可能会发生地震，大家都搬到外面自己搭建的防震棚里居住。父母因为工作无法离开，便把我们姊妹四人送回太仓待了有半年时间。那时我读高一，大妹读初二，弟弟和小妹读小学。这次回到太仓的感觉和小时候已有很大不同，小时候那种美好而梦幻般的故乡已不再存在。我带着更多的焦虑和成长期的烦恼，也常常思念远在铜川的父母。

外公家的四合院依然如故，也许是我的个子长高了，看上去没有小时候感觉的那么高大，房子也显得更加破旧。屋内的摆设没有多少变动，我穿过灶房的边门，向绿竹掩映的河边走去，听到谁喊了一声“林鑫”。回头一看，不到一米宽的窄巷中前后并没有人。我退回几步，才看到隔壁人家的窗口里面一个姑娘正微笑地看着我。是阿秋。还记得她小时候的模样，不大说话，别人说话时，她总是静静地坐在织布机旁边，脸上带着微笑。此时阿秋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走到窗边递给我一把糖果。我这时才看清，屋里还坐了一个穿着一新的英俊小伙，床上摆着一摞红色锦缎被子。噢，阿秋姐要出嫁了？她点点头，依然微笑着，不再做声。听说她嫁到了很远的地方，一直也没有再见过。

弟弟妹妹继续留在外婆家，在太仓南郊读书。我被接到新丰的奶奶家，也就是父亲的生母家，与奶奶和叔叔一家住在一起，大伯住在后面的院子里。在这里奶奶、叔叔、伯伯及家人都对我很好，但和在外婆家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外婆家比较热闹，这里则显得斯文和安静。有时晚上透过窗户的灯光，看到大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在一起聊天时，就会更加思念远在铜川的父母。我在上海的葛隆中学读书，上学和放学都要跨越江苏省和上海的地界标志。上学的第一天，站在教室门口等校长来安排座位，学生们以为我是老师，吓得赶紧跑进教室坐好，看来我那时候真的比同龄人显老很多。记得母亲曾为此安慰我说，现在长相显老一点，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会显得年轻，母亲说的不错，只是她再也没有机会看到。

在学校到底学了些什么已经全部都不记得了，倒是葛隆镇那条小小的街道和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下课时站在河边看船上的渔夫撒网，像扔铅球一样，身体前后反复扭动数次之后，猛地一甩，渔网便像抛物线一样在空中散开落入水中，形成一个很大的圆形区域，然后再慢慢地收网，一点一点收拢，最后提起来，或者什么也没有，或是几条小鱼。学校门房有一位姓顾的老先生，人称顾老头子，他喜欢书法，写的是颜体正楷，用笔一丝不苟。我常常在下课时间去看他写字，他说我要是喜欢书法，可以去县城买一本王羲之的兰亭序，拿来他帮我断句。

叔叔在太仓城里的工厂做工，有一天他带我进城去洗澡，太仓的澡堂和煤矿大不一样，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上面有个挑勾，把顾客脱下来的衣服，高高地挑起来挂在四周的墙壁上。服务员笑容可掬，来来回回地为顾客提供着服务。当我说毛巾忘在衣服兜里，需要把衣服再次从墙上拿下来时。他的笑脸一下子拉长变得不耐烦起来。噢，原来他开始的笑容只是一种职业的表情。洗完澡去书店买了《唐摹王羲之兰亭序墨迹三种》，五角钱一本。

把字帖拿到学校门房，顾老头说：“内容我就不给你讲了，这些有封建思想的内容现在不好讲的。我给你断一下句子，你临习时方便。”这本字帖我一直保存至今。在南方待了一个学期，父母两头寄钱压力很大。铜川的地震预报了一段，始终也没有什么动静，所以还是回铜川吧。我们那时只是对回老家感到兴奋，没有想到其他。后来才知道了父母的真实想法，假如万一真的地震了，他们有工作走不了，起码给孩子们留一个活命的机会。后来妻子告诉我，她父母那时只是把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她和姐姐留在铜川，父母给了姐妹俩一人一个大大的红苹果，她们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吃过一个完整的苹果。来太仓的时候是冬天，回铜川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带着大大小小的旅行包和装满棉衣的木箱子，伯伯和叔叔一直将我们带到上海火车站并送上车。车厢里到处是人，挤得满满的。途中上来了一个高大蛮横的汉子，四下瞅了瞅，径直走到我跟前说：“小孩有票吗？”我忙说有票。“小孩有票也不能占座位。”



他说着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座位上。对面的乘客看不下去了，说了他几句，他才灰溜溜走了。一路上三天两夜还算顺利。到西安火车站广场转车回铜川的经历却至今难忘。开始进站了，旅客们纷纷背起放在地上的行李站起来排队上车。我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箱，背后背着一个很大的旅行袋。弟弟妹妹也都拿着大大小小的东西和背包。然而长长的进站队伍却始终走走停停，几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走到进站口。因为队伍还不时在缓慢地向前移动，所以沉重的行李也无法放下来，怕放下了急忙又背不上去。累的实在不行了，我只好弯下腰，让胸前的箱子着地，来减轻点整体的重量。当队伍往前行走的时候，我又能很快地站起身跟上。也许当时我那样子实在狼狈不堪，听到旁边有人在小声说：“你看那人多可怜呀。”我装着什么都没听到。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对出远门多带一点行李心怀恐惧。



18、林鑫和大妹林娟、弟弟弘鑫、小妹弘娟合影。1976年于铜川

## 笱咏老师

尽管我从小喜欢画画，那只是自己随兴在图画本上涂鸦而已，从来也没有受到老师的正规训练和指导。遇到陈笱咏老师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原是陕西美术家协会的专业画家，长安画派唯一的理论家。1966年，由于历史问题，他被下放到山西吉县的农村劳动，还学会了做木工。农闲时也给附近的村民用油漆画箱子和柜子上的花鸟图案。70年代后期，笱咏老师到了铜川郊区的陈炉陶瓷厂担任美术设计，他妻子边国英也跟着一起来到铜川，在母亲做炊事员的那家银行当会计。有一天，边国英对母亲说：“听说你儿子喜欢画画，等老陈回来，把你儿子的画拿来，叫老陈给指点一下。”母亲说了这事，我心里自然很兴奋，精心地准备着人物、山水和花鸟画。一个周末的傍晚，我跟着母亲，手里拿了一大卷自己的习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笱咏老师。

当时笱咏老师住在五一路银行的二楼，只有很小的一个房间。做饭的炉子也只能支在门外的过道上。进屋第一眼见到陈老师，那一双透澈有神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那时大约50来岁，个头很高很瘦，身体感觉有些单薄，手里拿着一支老式的铁盒水烟袋，时不时地吸上一口。炉子上还煎着中药，小小的房间中到处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香味。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笱咏老师的书法和绘画。他的书法作品字距和行距很密很满，每个字都不规则地错落排列着。字与字之间自然地穿插挪让，尤其注意通篇的布局和照应。字体虽然是何绍基一路的风格，但用笔则更为潇洒劲健。墙上的花鸟画则是清一色的梅花，还没有达到后期作品的炉火纯青，但每幅画的章法已各具特色，无一雷同。长长的题跋也与画面上的梅花相互照应，成为构图章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墙上一个木画框中镶着一片很小的册页，画的是一个小孩拉着牛的尾巴上山。见我仔细地端详着这件作品，笱咏老师说：“这是在农村看到的，实际生活中就是这个样子。”看来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主张，他仍在继续实践着。我把带来的作品在地上一张张摊开，他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看，并不急于发表意见。待全部看完以后，他拿起水烟袋吸了一口，然后说：“你要先学习画素描，建立绘画造型的基本功。如果想学国画，国画的基础是书法，应该坚持练三年的正楷，学颜真卿就行。好的国画，你注意去看，拆开来每一笔都是书法，不练字是不可能画好国画的。现在很多学国画的人不练字，画出来的线条是软的。”他说的这些话，一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后来笱咏老师还专门到我家布置了画素描写生的静物，在桌上铺上一块灰色的布，上面放一只鸡蛋，他给我先画了一张做为示范，并把女儿画的石膏像素描借给我参照。这是我第一次正规地跟着老师学素描，从静物到石膏人物写生。因为想学国画，便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地临习颜真卿的《勤礼碑》、《麻姑仙坛记》。以后每个周末的晚上，我便带着厚厚的一沓素描或者国画请笱咏老师指导。冬天遇到下雪天路滑，郊区的公交车就停了，笱咏老师常常要走20里的山路，很晚才能到家。对我的习作，他几乎从来也没有表扬，总是毫不留情的指出各种不足。前面的问题通过努力改进了，又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我每次都是怀着希望前去，但每次都是在被批的一无是处的沮丧中离开。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的往返回合之后，终于有一天，笱咏老师对我坚持不懈地努力所取得的进步做出了肯定和好评，我落了泪。

1977年美协恢复以后，笱咏老师回到了西安。我依然经常带着作品到西安向老师求教，并在师母管理的美协图书室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时很难见到的中外艺术大师的画册。尽管由于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渐渐地越出传统的中国画而转向了彩墨实验的探索，但此后漫长的几十年中，我始终不定期地去西安看望他们。笱咏老师对艺术创作的执着、激情和敏感，以及为人处事的严谨、坦荡和率真，都给予我很大的影响。现在老师和师母均已作古，我和他们

的长子陈玄依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19、茄咏老师

## 待业

高中毕业之后，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便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有一个政策，家中长子可以办免下证，所以我就没有下乡。作为长子，眼看着家里生活困难，却无法为父母分担，心里很是内疚。有时想想内招下井算了，有的同学已经报了名。其实从内心讲也不想下井，毕竟是有危险的，弄不好那天下去就上不来了。但不下井又没有其他的出路，想想还是下井吧，就算有万一，我们家毕竟还有一个儿子。只要家里日子能好过一些，就我一个，也就那么回事了。我把要去下井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她去和父亲商量。母亲告诉我，父亲不让我下井，他已经干了一辈子，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再走这条路。哪怕是在家待业，干干临时工也行。在这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爱在深处，他从没有直接向我说过什么。由于父亲的严厉和小时候的多次挨打，甚至一度对父亲怀着一种怨恨。但此时我终于感受到了父亲一词的温暖和分量，尽管父亲依然保持着严肃不动声色的外表。

接下来待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不但心里承受着吃闲饭的压力，工作也不大好找。母亲托人给我在三里洞的搪瓷小件厂找到一份做洗脸盆的临时工，先是给脸盆胚胎上釉，晾干后再放入高温炉中烧制，烧好后我们再拉着架子车去沿街叫卖。其他还都可以，但是每次出炉对我是一个考验。脸盆在炉中是放在架子上的，一个架子上有四个脸盆，烧好以后，要用一根很长的挑杆伸进去托住脸盆架的底部，再从滚烫的炉火中挑出来。我的身体素质一直不是很好，常常是很艰难地用挑杆挑起脸盆架，然后再缓慢地后退，眼看就要出炉了，手稍微一抖晃，已经烧好的成品，又跌入火炉中成了废品，所以没干多久就被解雇了。

后来又有一个机会，在北公房下面的马路边挖土方。同学中也有不少人报了名。每人一天的任务是挖1个立方的土，两个人一组，要挖出宽深各1米，长度为2米的壕沟，我和同学刘川林搭档。当时是严冬季节，土地已经上冻，一洋镐下去，只在地上留下一个很浅的印迹，铁锹踩上去更是纹丝不动。挖了大半天时间，只挖下去薄薄的一层表皮。我感到筋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刘川林还在不停地鼓励我，给我打气，说哪怕他多干一点。他个子比我高大、也比我健壮。在冰冷刺骨的寒风中，冻了整整一天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再后来到了三里洞煤矿劳动服务公司的砖瓦窑，在瓦机上湿瓦胚不断地从流水线上运过来，我要用托板一块块接住后，再放到旁边的地上摞起来。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瓦胚过来后打在托架上的冲击力仍很大，我虽然十分努力，但还是常常接不住。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女同学，连忙过来把我替下来。那一刻我感到无地自容，怎么连一个女孩子都不如。但无论如何，也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干了几天之后，由于单位领导知道了我擅长绘画，很快就把我抽出来负责砖瓦窑的宣传专栏。大多数时间是在不断地更新墙报内容，从写稿到绘画插图，均由我一人独立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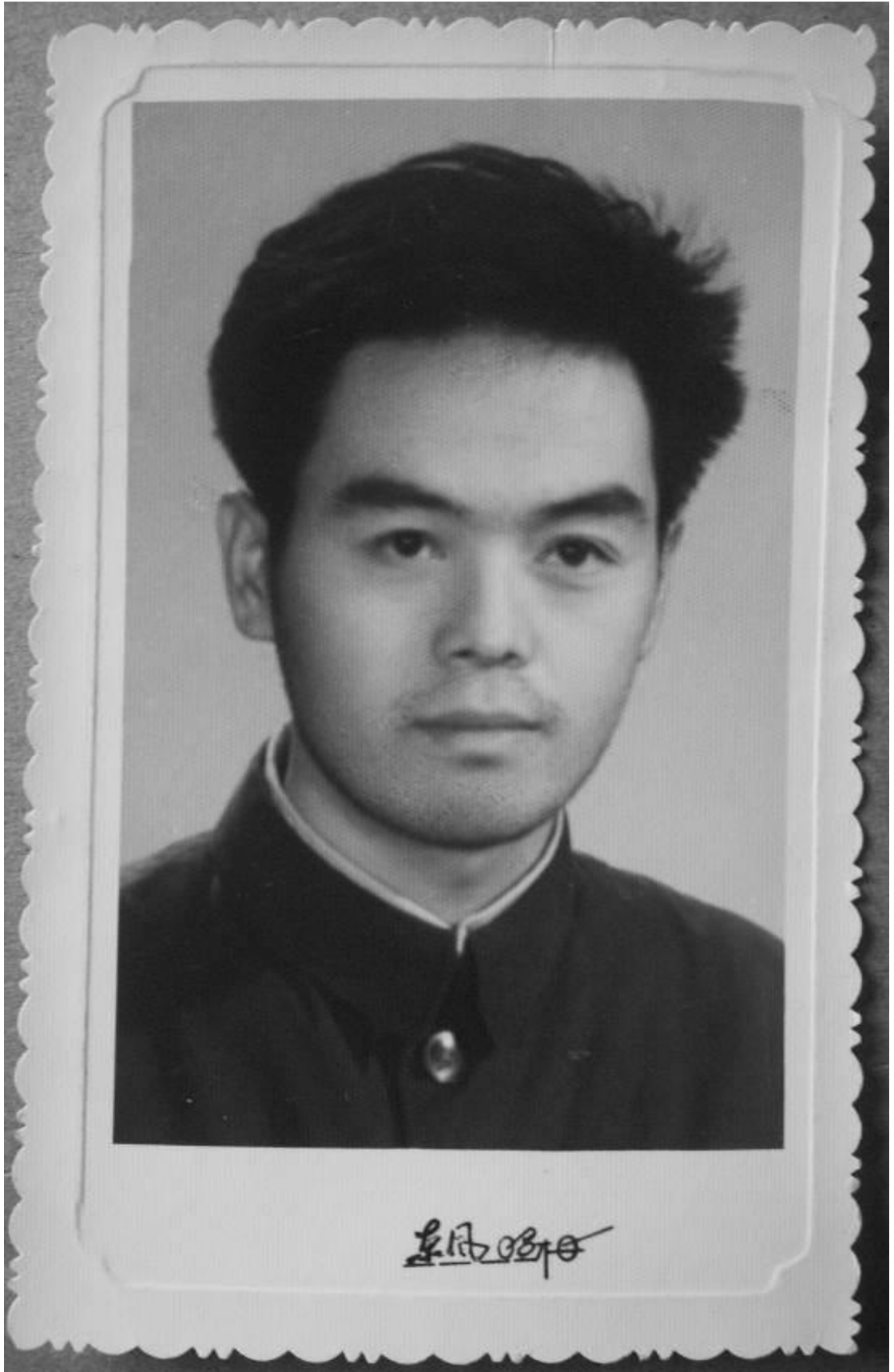
这时，在三里洞矿锻工车间认识的申师傅来找我了，他说我不适合干体力劳动，矿上家属支部想成立一个书画社，由他负责筹办，想叫我一起过去。我当然非常高兴，并推荐了同学赵建忠。那是和体力劳动完全不同的一种工作环境，靠画画也可以谋生是令人兴奋的，作为铜川市街面上第一家书画门店，我们不断地寻找着盈利的途径，画老虎年画、人物肖像、山水花鸟画、广告牌等等，成为一种营生。那时老虎年画比较受当地群众的欢迎，然后就批量制作，为了避免单一和枯燥，我不断地变换背景，有的老虎在山顶上，有的在草丛里，有的在河边。

1980年3月，我报名参加了当地银行的招干考试，由于我数学底子差，除了因式分解、平面几何外，其他考题答的不很理想，好在我语文成绩很好。1980年6月1日被铜川的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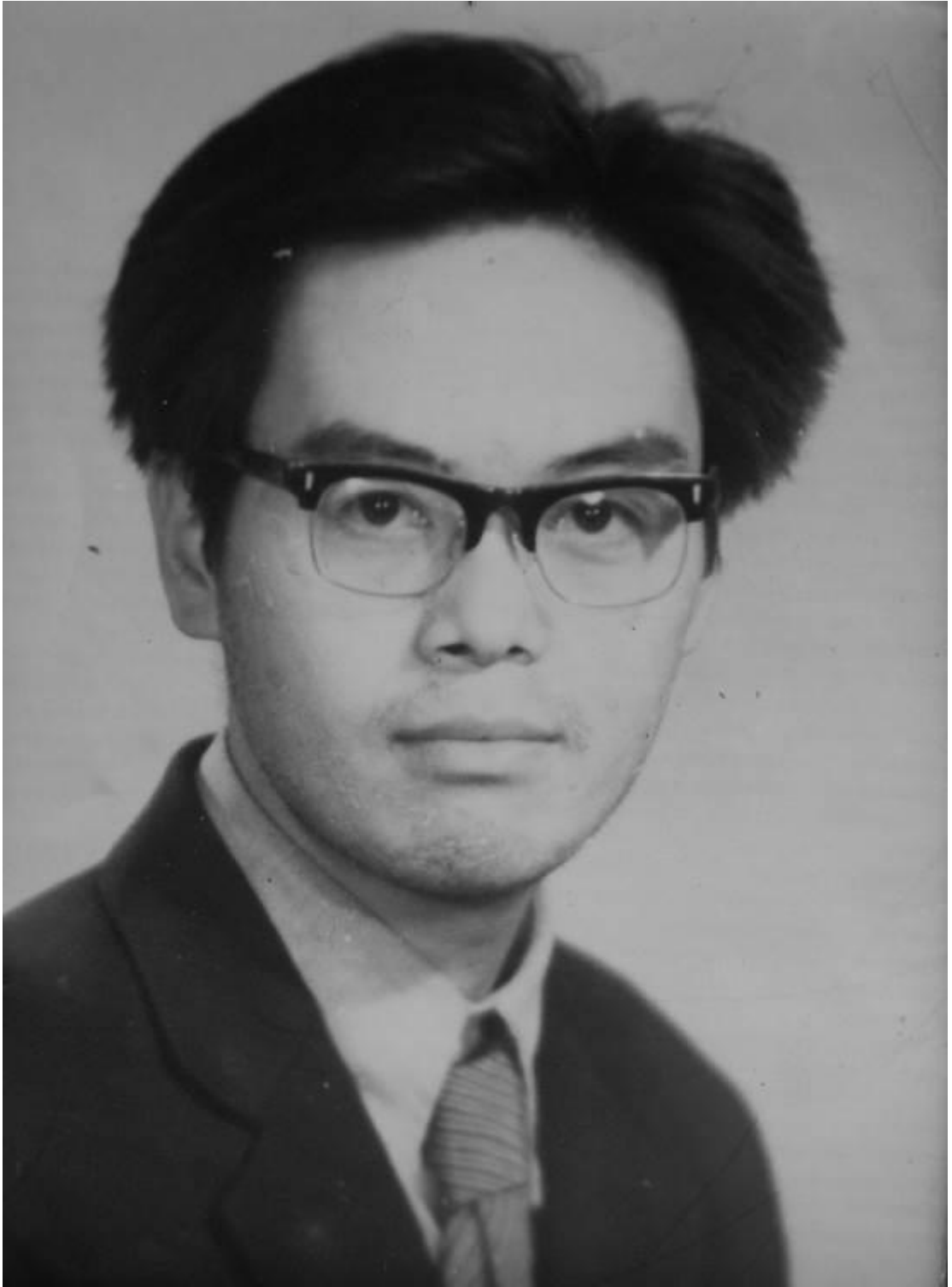
行录取，从此开始了我长达 32 年的职业生涯。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其他人都分到了银行的各个基层处所，我因为有绘画特长，就留在了机关储蓄科，主要从事业务宣传工作。也经常下到铜川的十几个基层营业网点，制作大量的宣传栏和流动展板，进行有奖储蓄的推广宣传。但对绘画的热情依旧不减，原准备下一年继续考西安美术学院，可是第二年国画系不招生，只招版画专业。笱咏老师说：“学国画不一定非要考美院，因为国画的基础是书法，不是素描，美院现在的教学是有问题的。”再加上我已经工作了，就没有再考。但每天大部分工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钻研书画上。那时家里空间很小，只有一张写字的桌子，晚上弟弟一放学，我便立即要把桌子腾开。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 34.5 元，为了能有钱买书和画册，也常常接些广告和装饰画一类的活。母亲看我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很是劳累，一再说：“你已经工作了，不用再那么辛苦了。书一直在不停地出版，你慢慢买嘛。”理解母亲的关爱，然而由于在学校几乎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此时我才有意识地重新起步，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自学过程。从 1981 开始，我上了四年夜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虑到在国画上题款需要自撰文文言文，又开始自学王力的《古代汉语》。重新作为一个学生，不断地在渴求着新的知识和视野，从开始的书法、绘画、治印，到后来的写作和纪录片，一直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空间。80 年代初期，我还刚刚从青春的忧郁中脱出，带着玫瑰色的梦想和激情，和同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画会，经常聚在一起海阔天空、激扬文字。记得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几个坐在门前的山坡上，有筱文、刘全安、董发义、朱奇、张雪林和我。当时刘全安说，我会在日记中把今天的聚会记下来，不然多少年以后就忘了。那时一个个年轻气盛，各自心潮澎湃地怀着大师梦，成为画家或是作家的共同愿望成为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推动力。谈起未来，刘全安说，我们几个最后能有一两个人坚持下来就不错了。面对他冷静的话语，看着面前一张张志在必得的面容，我无法判断谁会出局。更无法想像的是，当年在一起慷慨激昂的这几个哥们，在经过几十年的人生颠簸之后，从出发点开始的路径，早已被残酷的现实一再修正。每个人依然行色匆匆地奔走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但离当初的理想已有天地之遥。不管青春梦想是如何的虚无缥缈，在经历过社会的洗礼之后，每个人的双脚最终会踏在脚下这片坚硬的土地上。



20、林鑫在北公房家中作画 1979年于铜川



21、青年时代的林鑫 1982年



22、青年时代的林鑫 1985年





23、1983年，弟弟朱弘鑫考上复旦大学，临走前在家门口照了唯一的全家合影。

## 哥们

在我们当时画会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中，筱文是唯一经过科班训练的。在西安美院国画系的进修，不仅树立了他远大的艺术理想，也把一个文静美丽的西安姑娘杏花带回了铜川。两人结婚以后，筱文所在的工艺美术厂效益不好，常常工资都发不下来，加之随后又生了一对龙凤胎，生活更加拮据。无奈中自己经营的一间书屋“芳草地”，也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和管理经验很快就倒闭了。有一次杏花说到，筱文整天在外面跑着找活，却始终也不见他拿回来钱，有时连着两三天也吃不上一顿饭，只能饿着。想回西安父母家也由于没钱买车票，只能搭熟人的顺风车。经济的困窘最终成为压垮这个小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筱文面无表情地说他要离婚了，他说杏花去西安经常搭顺风车，红杏出墙了。我和刘全安竭尽全力做劝解工作，讲到生活的艰辛和杏花的无奈，要求一个西安大城市来的女孩，在铜川这么一个小地方，忍受这样一种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他们还是有感情的，筱文同意原谅杏花，不再离婚了。接着我们去做杏花的工作，记得见到她是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她尽量保持着克制，但脸上依然流露出悲伤和憔悴，夜色中可以看到她脸上的泪痕。也许她对这段生活已经彻底绝望了，无论我们怎样劝说，她最后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离开。她要坐顺风车回西安了，我们只好非常失望地告别。回来究竟是怎么给筱文说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从头到尾，筱文的父母始终没有出现，这段令人伤感的婚姻并没有得到他父母应有的祝福和帮助。之前筱文也只是偶尔说起，由于他父母热衷于当官，从小把他放在老家农村，落下了小儿麻痹残疾。随后不久，筱文也离开了铜川，一对双胞胎，儿子由他大哥帮着抚养，女儿则给了三原农村的一户人家。他婚姻解体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还都没有成家。

后来筱文在潼关的水磨石厂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还邀请刘全安、董发义和我一起去玩。会面后，我们一大早由潼关县城出发，从风陵渡过黄河后，坐长途汽车到山西芮城去看永乐宫壁画。下午返回时也就差了几分钟，没有赶上最后一趟班车，远远地已经看见大巴了，我们一面招手一面喊着向前跑，大巴还是开走了。无奈只好步行走回潼关，穿过黄河铁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沿着山路在黑暗中往潼关方向摸索着前进，到达潼关县城已是半夜两点。稍事休息，凌晨5点起来去爬华山，走了一夜的路，腿已经酸困至极，足足用了10个小时才登上山顶。尽管冻得够呛，也没有看上日出。后来筱文也常常回铜川，但已经不在厂里干了，自己带些戒指、耳环之类的黄金饰品到铜川向熟人推销。后来又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与人合伙开了金矿，据说规模挺大。以前离开铜川时他就说过，等他挣够了钱，就专门画画。他怀着重拾理想的信念，到北京的画院去进修，交了几万元学费之后，发现北京的空气更加浮躁，接触到的那些所谓搞艺术的，也都是削尖了脑袋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弄钱，却又十分笨拙。他待了没多久就回到了西安，已经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心境了。他果断地撤离潼关，在西安扩大了他的实业投资。因为黄金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高危行业，十个做黄金生意的九个栽，他属于极少数的幸存者。刘全安说，他去找筱文时，在路上遇到陌生人，离得很远对方就避开了，眼神也始终游移不定。到西安安家以后，筱文的小儿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坐出租车围着西安城转上一大圈，否则就不睡觉。后来大家都忙于生计，见面的次数也就更少了。

由于矿务局工程处不景气，当年一起学画的张雪林很早就到广东打工去了。有次在铜川街头偶然碰见，闲聊中他无意中说到杏花已经不在了。我听了十分难受，将消息告诉了刘全安。全安忙说：“不，还在，前不久还见过。”全安说当时他和筱文坐火车在西安北门的桥上临时停车，桥下车水马龙、人流不断。凝神望着窗外的筱文突然下意识地说出，那是杏花。街道上一个拉着架子车的女性背影，渐渐地消失在人群中。没有犹豫，他和筱文赶紧下车去追，

没有追上。念着曾经的一段缘分，全安帮筱文在西安打听了很久，找到杏花的姐姐，得知杏花在附近一个市场帮别人看摊，她说是筱文把杏花的一生给毁了。杏花和筱文分手以后，心想找个没钱的生活不下去，那就找个有钱的吧。谁知找有钱的也不行，过了一段时间那男的就进了监狱。她后来就一直一个人过，身体也不太好，一个邻居看她可怜，让她帮着照看个摊子，勉强度日。全安把杏花的地址告诉筱文后就离开了。过了两天，全安接到筱文的电话，说他不大方便，叫全安拿一万块钱过去，杏花会在市场门口接他。到了约定地点，看见一个中年女子迎上来打招呼，全安吃了一惊，这个苍老憔悴的中年女人难道是杏花吗，他已经完全认不出，和当年那个美丽的西安女孩已有天壤之别。全安跟着杏花进到市场里面，把钱交给筱文，筱文顺手就扔给了杏花。杏花连忙用双手紧紧捧住，她说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定要放好。筱文希望杏花不要给别人打工了，自己撑个摊子或找点事做。听着安全的叙述，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沉默了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一直也没有再见过杏花，见到筱文也不忍提起。一转眼和筱文也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真心地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刘全安是我们几个同学和朋友中唯一有写作志向的，他一直认为中国当代只有哲学工作者，没有思想家，他当年的愿望是要成为中国当代第一位思想家。高中毕业那年大学没考上，就内招到三里洞煤矿，在通风区成为我父亲的工友。在井下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请假继续到学校复读，连续参加了几年高考，均以落榜告终。后来辞职在家专事写作，十多年时间，先后写出了《阍人之歌》、《蛾之谷》、《秋风琴》、《圣墙》、《寻找天堂鸟》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理论专著《文学层次论》，《文艺报》也刊发了他写的论文《正在走向纯粹的中国文学队伍》。其中70万字的长篇小说《阍人之歌》被当时中国文联出版社主编顾志成誉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然而辗转多个出版社，始终无法出版。为生活所迫，他又发明了专利产品“多功能方便读书架”，由廊坊的厂家投入生产，但也没有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刘全安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学创作20余年，直到40岁才结婚成家。然而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最终使创作无以为继。用刘全安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登山家，已经爬到了8000米的高度，最终被雪崩给埋葬了。”在纪录片《同学》中，刘全安迟涩缓慢的言语中透出深深地无奈。不得已转而经商，从卖茶叶、卖鞋的小摊贩做起，再到数码彩扩店、儿童专业影楼，顶着很大的压力，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摆脱了经济的困窘。随着和社会的频繁接触，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曾经的文学梦想不再向任何人提及，所读的书籍内容也大多是经商管理类。他有一次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商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你如果需要用钱的话就吭一声。”我只是笑了一下。他最近又扩张了几家门店，在西安也买了房子。周转金始终紧张，到处想办法贷款。依然是忙忙碌碌，但已经从一个作家成功地转型成为一个商人。年轻的妻子又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千金，刘全安在50岁后，拥有了三个年幼的女儿。

忠厚老实的董发义，高中毕业待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招工到了20里外黄堡镇的电瓷厂，天天骑着自行车来回上下班。没干几年就下岗了。又到山里的林场待了好几年，看林子之余做些木雕。由于长期在森林中独处，语言和思维渐渐与当下的社会现实脱节。回到铜川后在家里办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教孩子们画画。后来夫妻两个在市中心开了一个奶茶小店，艰辛地将儿子供到大学毕业。纪录片《同学》记录了他们那一段的生活。现在那个奶茶店已经转让，又好久没有他们的音讯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2年8月28日凌晨，他们的儿子因一起意外的车祸去世了，当天正是他儿子25岁的生日。我接到电话顿时眼泪流了下来，赶到老区，见到董发义瘦骨嶙峋的面容，我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朱奇在取得了自考大专文凭以后，进入了公务员队伍，被安排到宜君县的县口乡，后来调入印台区政府城建局工作。90年代停薪留职下海创业，起初从事装修，以后创办了铜川市第一家数码照相馆。一度因为刘全安也介入到数码照相行业，造成了朋友之间的反目。多

年以后，在已经功成名就之时又遇到了中年危机，面对诸多的家庭难题需要应对。

我80年进入铜川的银行后，最开始被分配在机关储蓄科从事宣传工作，84年以后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先后在银行的办公室看过门房，到营业室和国库科做过记账员，再后来到了人事科工作。90年以后到提前退休一直在银行的工会工作。银行的工作呆板、无趣、琐碎，处处循规蹈矩而无需什么创造力。一开始与我较为奔放的性格格格不入，感到非常压抑和窒息，加之我本身不大好动，每天只是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断地被社会改造着，渐渐地学会去适应环境。后来读到卡夫卡，他描写的情景我不仅感同身受，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像卡夫卡那么伟大的人都可以承受，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又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24、（左起）筱文、刘全安、董发义 1980年代于耀县药王山。 林鑫摄



25、(左起)林鑫、刘全安、筱文 1980年代于耀县药王山。 董发义摄

## 私奔

银行的工作沉闷而枯燥，整天忙忙碌碌地了无生趣，与自己的艺术理想有着巨大的落差。可是在这样一个小城市，能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已经是相当令人羡慕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几个哥们有的去美院进修，有的辞掉工作专事写作，我既没有这样的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乌龟，慢慢地爬吧，只要不停下脚步，随着年月的积累，也会在绘画上有所进步。

连绵不断地阴雨，使门前自盖的小屋后的护坡滑塌，室内后墙上鼓出了一个大肚子，房子随时有坍塌的危险。父母亲不得已，只好决定将房子拆掉重新再盖。因为住在山坡上，运输十分不便，从搬砖头挖地基到盖好，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恋爱的年龄，我由于性格内向和长相显老，一直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有一次别人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公园约会，忽然就下起雨来，人们都匆忙地跑进公园的凉亭中避雨。这时忽然看见我妹妹的同学胡菊芳也和一个小伙子一起跑入了亭子，她也在公园和男朋友约会。看到她的一瞬间我愣在那里，感到了失落和沮丧。这个无数次到我家找我大妹玩耍的善良美丽的小姑娘，怎么忽然之间就长大了呢？这是一个我一见倾心的女孩，她那灿烂的笑容怎么也无法从我的心中抹去，可惜的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相遇。站在我身边的女友，也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女孩不错。夏日的雨很快就过去了，天很快又变得晴朗。菊芳走过来问我对那个小伙的看法，我说，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当时的女友还是分手了。来年春节期间，菊芳又和往年一样来我家玩，闲聊中她问起我的女友，我说已经吹了。你们咋样？我反问。她说也吹了。也许这是天意，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内向的我不善于主动表达，也不知她的想法。母亲很喜欢她，

便叫大妹撮合。后来菊芳说到，她其实是很崇拜我的，很喜欢我画画的样子，很欣赏我画的鲁迅和老虎。她喜欢看书，我们家有很多她爱看的书，也能聊得来。有一次她带我到她单位，看见的同事都劝她吹了，说我长的太老气了，根本配不上她。她自己内心也很纠结。觉得虽然我长相显老，但为人诚实善良，我的家人也都对她很好。她那时甚至很天真地想，她要是愿意，还有谁会嫁给我呢。她说要不你先找吧，实在没有合适的我们再在一起。那时她面临着很大的家庭压力，她父亲也是矿工，对生活有着更为实际的考量，希望为她找一位汽车司机，这样可以为家里拉煤。找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没有什么用处，到银行存钱也不用找谁走后门。作为一个矿工的后代，我理解他们的想法，虽然我不是司机，但我们可以买煤给老人送去。我觉得她是我当时遇到的最合适的人。在那个难捱的季节里，我俩常常到北公房对面的山坡上倾心交谈，终于觉得不能没有彼此，立即结婚，我们做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决定，不然的话，紧接着发生的一系列家庭变故，我们是否有机会走到一起还是疑问。面对她家里的阻力，我俩选择了私奔，悄悄地离开铜川到南方旅行结婚去了。那是1985年8月，在旅途中菊芳写信告知了她的父母，我们也准备着归来后负荆请罪。在西安因为买不到当日的火车票，等了两天，菊芳此时显得不安和焦虑。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心情也顿时豁然开朗。旅途的第一站是无锡，黄昏暮色中的一小碗芋头汤，让整个的空气变得温馨甜蜜，无锡给人的感觉是甜甜的，温婉节制，与北方城市的豪放粗狂有着鲜明的对比。来到鼋头渚登高远眺的一刹那，一望无际的太湖尽收眼底，在水天相接之处，帆影点点，烟波浩渺，顿觉心旷神怡。一种从未有过的宽阔和辽远，使从小一直在山沟里长大的我们有一种天朗气清的心境。接下来到了苏州园林，在一步一景的玲珑剔透和精致唯美景色中，反而意识到西北黄土高原的沉雄博大。在杭州入住的客店在孩儿巷，据说是南宋陆游写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名句的地方。只可惜艳阳高照下的小巷，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致。来到西湖边，游人如织，我们也同另一对情侣合租了一叶扁舟荡漾在西湖之中。波光粼粼的湖面，在阳光下显得分外亮丽。西湖的阴晴转换只是瞬间的事，刚才还是烈日当头万里无云的蓝天，一转眼就变得乌云密布，天空和周围很快暗下来。湖面上随风起浪，波涛汹涌，一叶扁舟不停地在水面上颠簸起伏，我们双手紧紧地抓住船帮，雨点也啪挞啪挞地落下来，头戴斗笠的划船女子沉着冷静、快速地向对岸划去。只一会儿功夫，天已放晴，又是艳阳高照，西湖的瑰丽多姿也算领略。在去九溪十八涧的途中，翻上一座山坡，阵阵浓郁的香气迎面袭来，抬眼望去，满树的金黄，桂花撒落了一地。直到后来翻看地图才知道盲打误撞地来到了著名的赏桂名胜满觉陇。在上海为新婚的妻子购置了新衣服，那件从南京路街头人群中一把抓在手中的粗棒针毛衣穿了多年。我自己花了20多元买了一身外套，里面全是旧的，工作几年攒的钱加上父母给的总共也只有1000来块钱，除去路费已所剩无几。考虑到回来要向岳父母请罪，为二位老人买了衣料。还想给父母买一些礼物时，已经实在是没有钱了。我觉得以后的日子还长，我会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最终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成为无法弥补的永远遗憾。但当时我并不知晓。在回来的列车上，遇到了一个回新疆石河子的上海女孩，她的父母都是上海的支边者，退休以后回到了上海。当时的政策规定只能带走一个子女，父母选择了弟弟。她现在一个人留在石河子，22岁了也无法正常谈恋爱。这次是回上海探亲，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回到上海。这是一趟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快列车，你如果稍加留意，车厢内乘客之间的聊天话题几乎都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在这些第一代西部建设者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的眼前还会闪现出这个来自石河子的女孩那一双美丽忧郁的大眼，那是诗歌《在开往西线的列车上》的生活原型。



26、林鑫和菊芳 1985 年旅行结婚时在无锡鼋头渚

## 伤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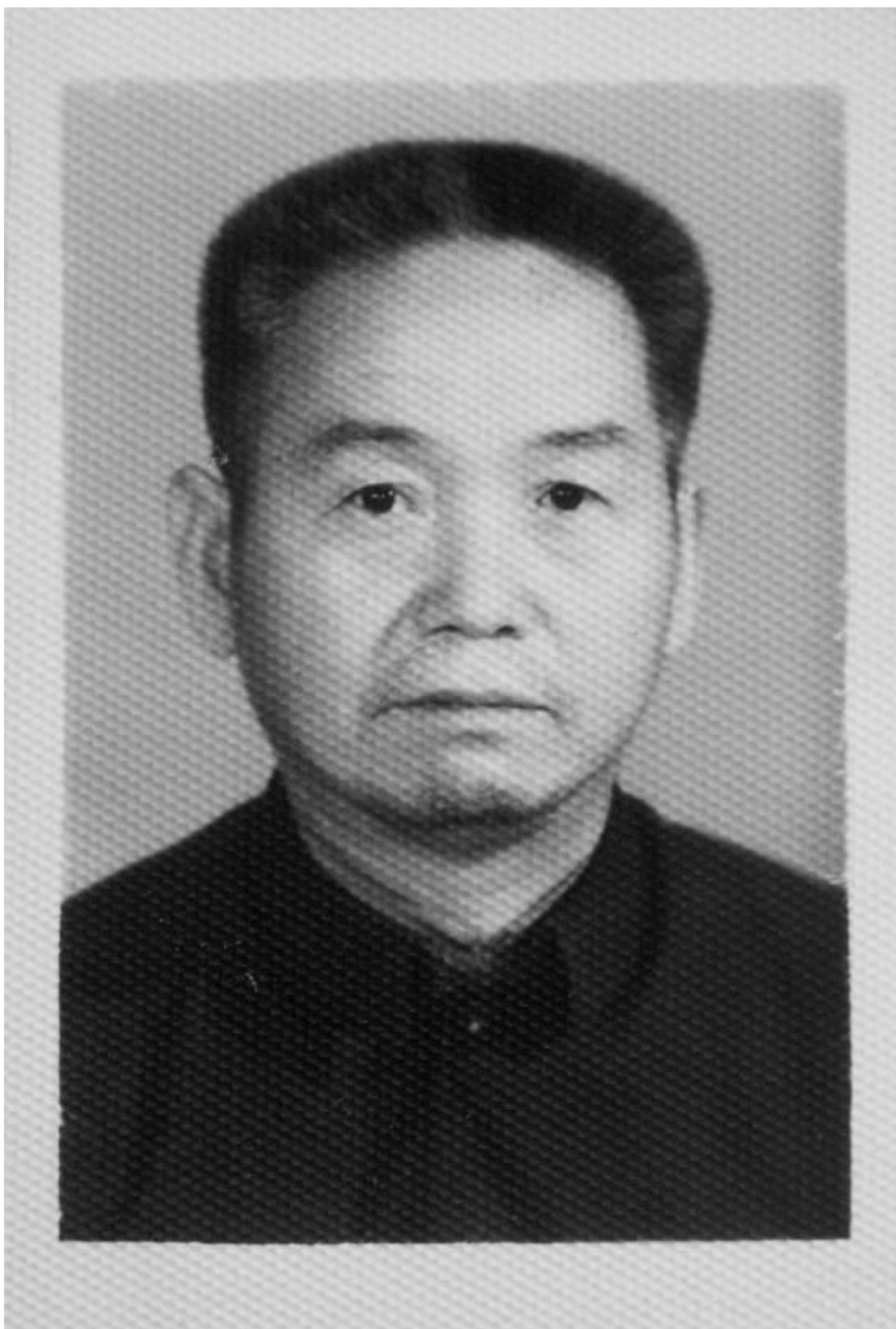
旅行结婚归来，最终得到了岳父岳母的谅解，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然而新婚的

喜悦还没有过去，悲伤已悄悄地逼近。多年以来，母亲总是忙着工作和操持家务，每天都是先给我们做好饭放在锅里，等我们中午放学回来，自己热一下。她又急匆匆地赶到银行给职工做完饭，自己才能回家吃饭，往往到家都已经一点多了。母亲吃饭老是没有正点，胃也常常不舒服，她总认为自己是胃病，平时吃上几片胃舒平也就过去了。但母亲说这次胃疼的很厉害，和以前不一样，她忽然很想吃杨梅罐头，我赶紧跑到坡下面的小卖铺去买，回来看见母亲倚在门框上，眼巴巴地等着我。她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大妹陪母亲去了矿医院，医生说是胆结石，需要马上住院动手术。在医院住了几天，大夫只是不断地进行各种检查，一直也没有做手术。母亲说，做胃镜检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受。后来大夫要找病人家属谈话，我就感觉可能病情不是太好。来到医生办公室，主治大夫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是简要地告诉我，母亲的病已经确诊为胆囊CA肝转移，也就是肝癌。他说这是目前最严重的癌症，况且到了晚期，他们已无能为力，预计母亲的生命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赶，两边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像虚影一样不断地从眼前闪过，一路上眼泪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我到家以后究竟是怎样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父亲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那种巨大的悲伤已经将我彻底笼罩。外祖父觉得铜川离太仓十分遥远，心里一直挂念，要是母亲老了想回到故乡，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他就对母亲说，家里翻新房的时候，也顺便给母亲盖两间。有了外公的允诺，父亲和母亲就节衣缩食，硬是从每月微薄的收入中挤出20元、30元钱寄回太仓。在外祖父1979年去世以前，房子已经落成，母亲终于有了期盼已久的归宿，却始终还没有机会回去。母亲一直念叨着，等到1987年，父亲就年满55周岁可以退休了，然后他们老两口一起回到故乡太仓去住，可以在乡下养些鸡。回归故乡的心愿眼看着就要能够实现了，她不断想象规划的晚年生活，却最终化为一场泡影。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尽管医院已经下了死亡判决，我还是想成全母亲最后的心愿，将她送回太仓。也想去上海的大医院继续求医，寻求最后的一线希望。西安开往上海的这趟列车永远是那么拥挤，过道上也始终站满了人。我买的是三张硬座车票，可以让母亲平躺在座位上，我和大妹只能坐在高高的座位靠背上面。在拥挤、担心和焦虑中，度过了列车上颠簸难熬的三天两夜。我总是在想，会不会是诊断错了，过去也听说有些晚期的癌症病人最后竟然自己好了，癌细胞自动消失了。我时刻盼望着这样的奇迹也能够在母亲的身上出现。来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长海医院，医生检查后说，立即住院做手术。但医院的床位早已住满，需要每天在住院部的窗口排队等号。那时弟弟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我们就住进学校的招待所里。每天天不亮我就一个人早早起身去医院排队，昏暗的街道上空空的，一路上也不会遇到一个人影。进入医院，长长的楼道里漆黑一片，显得阴森恐怖。一个个黑影站在办理住院手续的窗口排队，彼此之间也不搭话，只是静静地在黑暗中等待。天色渐渐亮起来，医院开始上班了，排队的窗口前已经密密麻麻地围满了病人和家属。护士开始叫号。一个面色十分苍白虚弱的小伙子，看样子最多不过二十四五岁，挤在焦急等待住院的人群前面，激动地拉着护士的衣服说：“你们救救我吧，你们救救我吧，我还那么年轻。”护士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冷冰冰地嚷道：“肝胆外科今天没有床位，人还没有死哩，死一个才能腾出一个床位呀。”周围刹那间变得死一样寂静，没有人出声，每个人都在心里期待着，护士下一个喊出的是自己手中的号码。面对着一大群晚期癌症病人及其家属脸上着急、焦虑、期望混合在一起的复杂表情，忽然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在这一刻很轻很轻，轻的像一张纸，随时都可以撕碎。护士也由于司空见惯而变得更加麻木和没有耐心。我沉默着，手里紧紧抓住病历和排队的号码，或许那是看不到尽头的黑暗中唯一可能的光亮。母亲由于学校食堂的米饭太硬无法消化，不得已在母亲的陪同下回了太仓老家。我依然每天天不亮就去排队等号。终于叫到我了，赶紧递上病历。护士问：“病人呢？”我说现在就去带来，说完转身就跑。在赶回太仓去接母亲的公交汽车上，我的眼前总是不断地闪现出一幕幕电影镜头似的画面，没有痛苦，只是一种伤感凄楚的美在周围环绕。汽车也好像是在公路上漂浮滑行，显得十分虚幻和不真实，一点都不像是在现实



中。我为自己的恍惚感到自责。等我急匆匆陪着母亲赶到医院时，病床已被他人所占。护士说：“肝胆外科从来是病人等床，不可能让床空着等病人。”最后只好先安排到医院的康复病房，医生一检查，说已经无法进行手术了。我不死心，找到了医院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他说“这是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攻克的难题，医院主要是以做研究为主，肝癌晚期出现了黄疸，就无法做手术了。”无奈只好返回太仓，住到中医院进行保守治疗。回到太仓，母亲的心情一下好了许多，病情也好像有所减轻。母亲讲起了小时候外祖父给她买青梅的往事。我心里惦记着，天不亮就踏着晨雾，沿着太仓城里的街道去寻找青梅的踪迹。病床旁边的一个危重病人，黄昏时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走了，母亲一晚上没有睡好，老是念叨着那个病人回家以后怎么办，也一再地向我说起这个问题。我心里十分悲凉，不知该说些什么。有太阳的时候，我陪着母亲到医院的院子里散步，给母亲讲银河系以及星空的演变，讲那些很遥远的事，尽量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对于病情，母亲认为自己得的是黄疸肝炎，我们也一直盼着之前医院的诊断只是一个失误，始终也不愿放弃最后会出现奇迹的可能。那是一段苦闷煎熬的日子，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母亲的病痛，时间只能一分一秒地在微弱的企盼和希望中度过。母亲最终决定不在医院住了，她想回家。外婆家当年的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了，在原址矗立着一座两层的楼房。进入外公给她的那间新房，母亲伤心地哭了，她感到委屈。母亲那年只有46岁。大妹此时已经将工作调回太仓，婚礼的日期也早已提前定下。眼看着母亲一天天变得更加虚弱，大妹的婚期也离得越来越近，我心中十分焦虑，生怕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大妹的婚期撞在一起。我提出将大妹的婚礼日期尽可能提前，但妹夫家早已将请柬发出、酒席订好，时间已经无法更改。实在想不出两全的解决方法，我陷入痛苦之中，脑子里一片紊乱，理不出头绪。问问妈妈吧，让我问问妈妈该怎么办。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过来，我要问母亲什么，问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大妹的婚礼撞在一起该怎么办？我愣在那里，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父亲从铜川来了，极度身心疲惫的我终于有了依靠。一天傍晚，母亲突然变得异常清醒，眼睛也明亮有神，很清晰地说话，好像病好了一样。看见大舅在旁边，还叫了一声大哥。然后一个个握过我们的手，一瞬间母亲眼睛里的光芒又消失了，身体软下来。我和大妹呼唤着母亲。母亲此时双眼显得空茫，十分微弱地说出了最后的话。“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头很晕，很晕……”母亲走了，我没有流泪，只是呆呆地站着，对我来说，最深的悲伤不是痛哭，而是沉默。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我托着母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我是长子，在这种场合是应该哭的，此时却没有一滴眼泪。走到村口的路上，我干吼了几声，眼泪落了下来。

大妹的婚礼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二天如期举行，弟弟和亲友们都去了。我独自留下陪伴孤独的父亲，他站在母亲的遗像前，大声地喊出母亲的名字，表情极为痛苦。我沉默着，即无法安慰父亲也无法缓解自己的悲伤。



27、父亲 1984年摄于铜川



28、《弥留之际》 宣纸彩墨 69\*67cm 林鑫作于1992年

我和父亲从太仓回到铜川，已到了1986年的1月底。母亲不在了，大妹调回了南方，家里冷清了许多。小妹也好像一下就长大了，始终也没有问起母亲。妻子在20里外的黄堡纺织厂上班，每天下班后都赶回来。那一年的春节是沉闷的，没有贴春联，四周不断响起的爆竹声，也带不来一丝喜悦。父亲的情绪一直不是很好，除了每天上下班，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几个月以后父亲也病倒了，先后到铜川矿务局医院，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反反复复检查，最终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在西安陪院期间，晚上病房不允许留陪员，我就一直睡在病房外面的走廊地板上，半夜不时地溜进病房去看看。父亲渐渐地无法吃饭，吞咽日益困难。又转回到铜川矿务局医院，只能靠打点滴维持。几十年的矿工生涯，已磨去了父亲身上的锐气和棱角，只能认命和安于现状。当我去矿上打听父亲的职业病鉴定情况时，父亲只是微微地摇摇头说：“没用的。”他每天平静地躺在病床上，枕边放着一个小收音机，按时收听评书《杨家将》。身体也渐渐消瘦到只剩下一把骨头，床铺太硬受不了，只好买了块海绵垫在他身下。又一天播放评书的时间到了，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前打开收音机。我说需要开收音机吗？他摇摇头。他试图对我说话，但嗓音嘶哑发不出声音。我递给他一支笔，他写在我手掌上，我认不出是什么字。他看我不理解，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那是11月，已经是冬

天了，病床紧挨着房门，老有凉风从门缝吹进来。晚上我把毯子挂起来遮挡时，父亲突然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这个动作是如此熟悉，我意识到了，但不愿相信。依然平静地给他盖好被子。晚上刘全安来了，他说你连着这么多天没有休息，今晚我替你守着吧。我就在病床旁边的躺椅上休息。第二天一早，父亲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赶紧叫来护士插上氧气，父亲已经停止呼吸，走完了他那沉重的一生，再也没有醒来。

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妹接了父亲的班，被安排到三里洞煤矿的选煤楼工作。

1955年，23岁的父亲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一直工作到临退休前去世，还欠了矿上500块钱。后来矿上派人来要。我说父亲为三里洞煤矿奉献了一辈子，现在去世了，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这笔欠款，你们就以我们子女的名义向矿上申请一份补助，把帐还上吧。

母亲应该是怨我的，她总是觉得我没有尽力，因为我始终也没有告知她病情的真相。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当时是应该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为好。告诉母亲一切，就直接毁灭了母亲的希望，那样太残酷了。不告诉她，我又要长时间地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和无法释怀的深深歉疚。父亲显然在心里对自己的病情是明白的，只是嘴上不愿承认。后来常常梦到母亲在谴责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中，只有等妻子回来了，我才回家。在上班的时候，我有时也会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哼起哀乐，沉浸在一种凄美的旋律氛围中，像梦游。直到有人提醒，才戛然而止。一个人最虚弱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你，内心的恐惧甚至连妻子也无法告知。现在可以坦然说出这些，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

## 画展

父亲和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性格，各自继承了他们家族的血脉。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随遇而安的人，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也只是默默地承受下来，其人生态度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对社会已经看得很透，从来也没有听他发出过任何的不满和抱怨。母亲则像外祖父一样，是一个不会服输的人。一生都在为改变自身的命运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停地努力奋斗。她总是积极地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并始终怀着希望和信心，竭尽全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父亲是一个无为的现实主义者，那么母亲就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父亲和母亲的这些品质，也会在其子女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只是由于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异，以及自身生存境遇的历练，会向不同的方向倾斜和改变。也许正是父母遗传的双重导引和生存现实的不断磨砺，我成了一个充满感性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非常清醒理智地将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

成长是缓慢的，不仅需要生命激情的瞬间绽放，也需要长时间的默默耕耘和耐心等待。母亲1986年1月在太仓去世后，紧接着11月下旬父亲在铜川去世，中间仅仅相隔10个月。又过了两个月之后，1987年春节期间，《林鑫书画展》在铜川市图书馆展出。这是我个人也是铜川市的第一次个展，观众络绎不绝。《墨点无多泪点多》等和我自身经历有关联的作品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保持在传统中国书画构架下的展览，但也初步尝试了实物装置和书法的色彩实验探索。

80年代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的时期，以前大量禁锢的中外图书纷纷出版，西方意识形态和艺术流派也纷至沓来。从美学热开始的文化思潮，一浪接着一浪，译介的名著林立，展现着一个多维而精彩纷呈的世界。佛洛伊德、叔本华、尼采成为口头禅，对慧能以及《五灯会元》的禅宗公案也津津乐道。饥饿的大脑贪婪地吞噬着扑面而来的各种东西方书籍，或一

知半解或浮光掠影。日益开阔的视野，为我打开了认识未知世界的一扇又一扇天窗，也不断改变和加深着我对生活的认知。虽然在传统文化中沉浸已久，但思想观念上还是受到了来自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强烈冲击。梵高、毕加索、约翰·凯奇是继徐渭、八大之后又一批使我折服的艺术大师。那是一个到处充满激情、狂躁和理想的时代。朋友们私下的讨论中，我们也常常为自己在人生观形成时期，遭遇到的思想开放和各种观念碰撞而感到庆幸。

每日依然在忙碌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甚至还没有做一个父亲的充分思想准备，儿子已在1987年6月呱呱落地，给他取名思凡，一种平凡而有思想的普通人生活是我所期许的。朋友调侃说：“朱思凡，噢，猪八戒在天上待不住要下凡了。”我和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带着凡凡，这是一个在自行车上长大的孩子。

1989年6月初，《林鑫现代艺术展》在西安陕西省美术馆（陕西美术馆前身）开幕。整个展厅的布置浑然一体，墙面上悬挂的作品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展厅正中两根立柱之间，顶着天花板矗立着一件用粗棒针毛线编织的巨大装置《蛛网》。一件巨幅立轴《送葬》从地面延伸到墙面一直顶到天花板。画的下部是抬着棺木的人群，往上可以看到送葬的队伍和远处的地平线，最高处的太阳，已经像送葬的人群一样，被凝固成褐色的石块。展厅地面上不规则地排列着一张张一米见方的宣纸，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各种符号。展厅内循环播放的类似打击乐那样但并不和谐的声响，是由我制作的非乐器演奏的声音作品。由刘全安、陈少峰、任和平、吴川淮、岳沉等几个同仁担任演奏员，乐器有桌子、笤帚、拖把、脸盆等随手可以拿到的物品，加上人声。没有弦乐，仅仅是打击乐和人声的组合。也没有总谱之类的东西，一切都是偶发随机的。参与者作为能动的主体，成为创作的一部分。在我的指挥和示意下，每个人根据声音的发展，加入自己的声部。空寂的静场过后是突然爆发的骚乱敲击，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尖锐的人声缓缓加入，在气若游丝的颤音和绵延中透出一种空灵和诡异。初次录音完成后，我再进行二次转录，录音的错位和变形强化了作品中的非现实张力和氛围。那是我对声音所做的实验。当时陕西美术馆的几个楼层都有展览，所以布展期间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纷纷议论。布展完成后，我把展厅门锁上就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画廊，刚上楼就看到笱咏老师蹲在展厅的门口等我。看来争议已反映到笱咏老师那里。进入展厅，笱咏老师仔细地看全部展出作品一一进行了审视。看完之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久经磨难的笱咏老师提醒我注意，一是不要有政治问题，二是不能有色情问题。除了这两点，其他没有什么。为避免误解，他还特意嘱咐我在一件内容为十字架和头像的作品标签上注明标题为《自画像》。展览开幕式结束以后，好像是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说了些什么，美协又临时召集紧急会议，最终勒令取消了四件作品，展览则照常进行。在现场的《文艺界》杂志主编金铮说，展览撤掉的作品，我们在下一期《艺术界》发表。电视台、报刊等媒体也对展览进行了报道。当时的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画家方鄂秦对我说：“看了作品，我能够想象到你背后付出的努力，像这样的作者不支持，我们去支持谁。”这些话至今想起来，依然感到温暖。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正是诸多前辈和朋友的鼎力相助，我才能够越过重重的困难和阻挠，努力前行。

1993年8月，《林鑫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了书法和绘画作品百余件。我也生平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画家袁运甫、祝大年，评论家刘晓纯、郎绍君等出席了展览的开幕。书法家谢云在给定的信中写下“简疏里加深厚质，必取大成”的鼓励。《中国画》、《文艺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题介绍和报道。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当时的市文化局长刘学敏、书法家李自力以及省人行牛春和、张志高等人不遗余力地支持令我感动。尽管在大家的帮助下多方筹集，办展费用依然短缺。我和妻子每天下班后，承担起全部展览作品的装裱工作，屋内四面墙上全部上满了托裱的字画，30多平米的两居室完全变成了一个作坊。近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专门做过饭，一锅烩菜像火锅一样在火上炖着，每天只是不断地加些蔬菜和食物进去，我和妻子、儿子围坐在一起，随便吃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到深夜。妻子除了帮

我干活带孩子，白天还在银行储蓄所承担着繁忙的前台工作。那年我 33 岁。依旧充满着对艺术理想的激情。从北京回到铜川以后，我白天要全职上班，晚上访客也渐渐地多起来，一段时间不再有宁静的创作时间，我变得焦虑和烦躁不安，不得已在门上写了张“无事请勿打扰，谢绝闲谈”的纸条。有人说我太自私了，我一再道歉，真的是没有时间，我不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整个白天为谋生从事着和艺术完全不搭界的繁琐工作，只有到了晚上，城市的喧嚣安静下来，我才可以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世界而忘却现实的存在。如果真的是朋友和创作者，他应该可以谅解我的处境和选择。多年来我一直在城市的丛林中独自行走，没有友军和同盟者，从早期绘画书法的形式探索到用纪录片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记录，我一直步履匆匆地风雨兼程。其实我完全可以像我的同事们一样，悠然自得地买辆车，过起舒适惬意的小日子。为什么不呢？我可以忍受物质的短缺，不能忍受精神的贫乏。一种对精神孤旅的向往使我与当下以金钱定义成功的价值标准越来越远。一厢情愿地执着于理想主义的情怀，使我渐渐地越出了纯艺术的象牙之塔，迈步走向十字街头。作为这个世界的过客，我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也努力通过拍摄纪录片，坚定地固守着良知和做人的底线。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当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也不会抱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拍纪录片已然成为我的信仰，成为我的呼吸，成为我生命的支撑。当把这一切从我的生命中抽离，我马上就只剩下躯壳。有人说，你自己这样选择可以理解，你妻子跟着你图什么呢？我说既然还乘坐着同一艘小船在激流中穿行，就只能同舟共济，没有其他的选择。

多年以后，行长找我谈话时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我进行了调查，发现我平时基本上不和人来往。我说是的，我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非常好监控。

# 林鑫作品展

LINXINWORKOFART



北京·中國美術館

CHINA ART GALLERY·BEIJING

1993.8.10

1993.8.15

29、《林鑫作品展》画册封面

## 藤黄

在北京的个展结束后，生活也渐渐地平静下来，依然是忙忙碌碌的上班族生活，波澜不惊。一年又一年的时光在身边飞逝，除了对绘画不断深入地思考和实践，对音乐的迷恋和沉浸也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渐渐发现我对音乐史的投入程度，竟然超过了美术史，弄反了。从格里高利圣咏、巴赫、马勒到勋伯格、韦伯恩、肖斯塔科维奇一路听来，一度甚至向朋友发出假如在我们的一生中没有被音乐打动过就白活了的感慨。从早年对交响曲的沉醉，到渐渐可以体会到室内乐的韵味，人生的阅历渐长，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审美眼光。曾经觉得巴赫是那么久远古老，现在则发现他是多么地动听和耐听，就像是亘古而长新的太阳。《哥德堡变奏曲》几乎像枕边书一样，成为我荡涤尘埃的良药，无论是古尔德还是图雷克版本，也不管是在多么疲惫、烦躁和焦虑的状态下，只要起始的几个音符响起，马上就像是在久旱的沙漠中遇到一眼清泉，心灵顿时顺服下来，不再浮躁。弟弟的专业是数学，但也非常喜欢音乐，我不知道我们兄弟两个对于音乐的这种酷爱，是否也是来自曾经想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父亲的遗传。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的“华彩”唱片店买CD，有限的资金无法满足对音乐的渴望，在来来回回的流连忘返中，难以做出最后的抉择，一直到商店打烊了，服务员歉意地微笑着提示说，每天都是这样，顾客总是迟迟不愿离去。我连声道歉，匆忙退出。忽然感到卖音乐唱片是一个幸福的职业，不用推销，顾客们总是到商店关门了，也不愿意离去。后来我明白，其实中国大多数的音乐爱好者也和我一样囊中羞涩。由于不会外语，买进口的原版唱片时常常要向售货员反复询问，免得买错。一次在西安外文书店，见到一张CD像是多年寻找未得的古尔德弹奏的巴赫《二三部创意曲》，但并不能确定。询问店员也说不清楚。回到铜川家中一查资料，果然就是，只好立即返回西安买下，免得失之交臂。于是痛下决心学了几个月英语，依然不会读，但是唱片的基本信息可以看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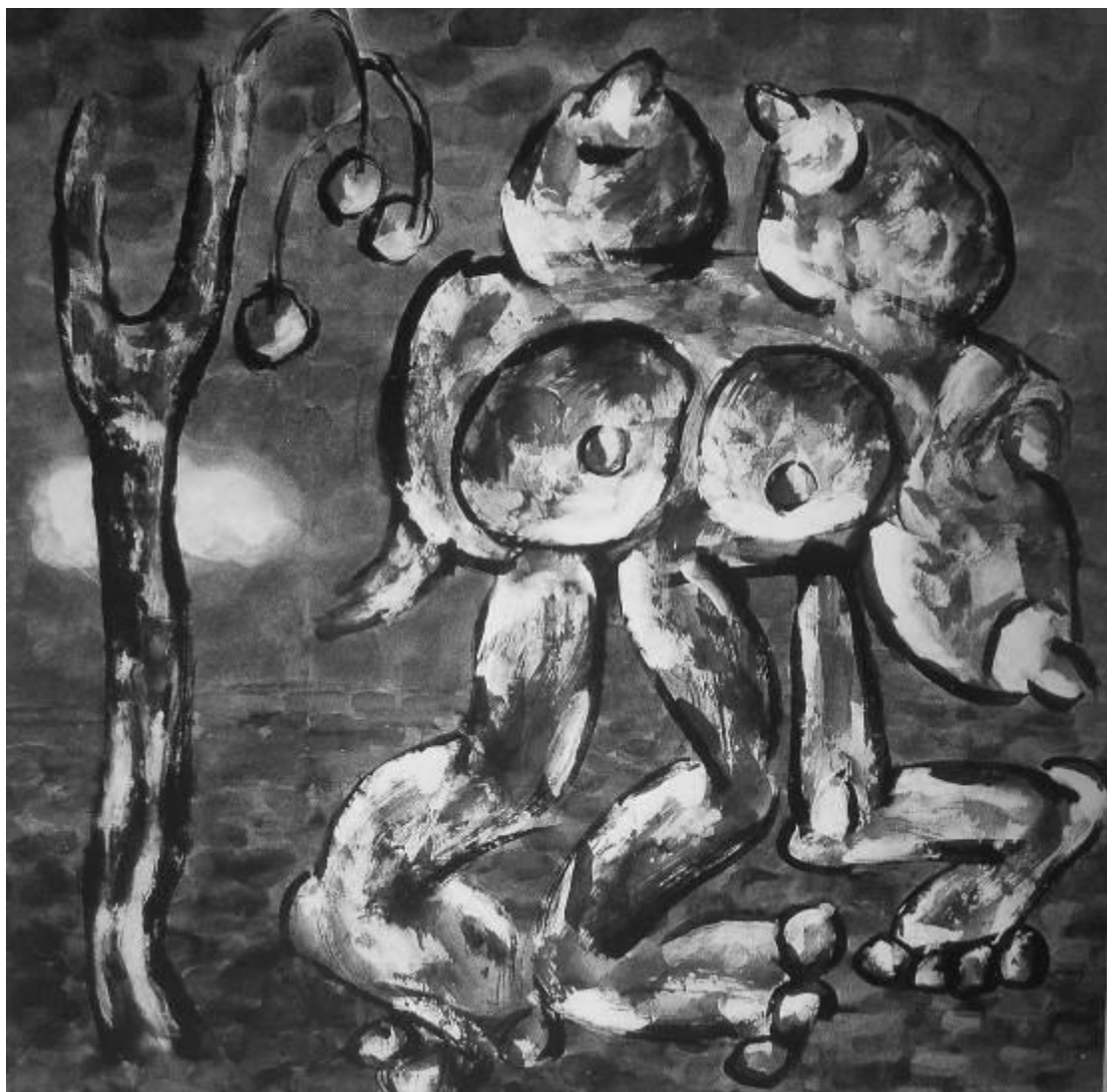
小妹弘娟接父亲的班到三里洞煤矿以后，工作是三班倒，天天在选煤楼上捡石矸。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就直接下岗了。后来三里洞煤矿破产买断工龄，矿上给了一万块钱。多年后小妹告诉我，有一回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三里洞煤矿，在选煤楼的传送带上捡石矸。窗户上还是没有玻璃，刺骨的寒风吹过来，像刀割一样，冻的实在不行。她心想，自己不是发过誓再也不回矿上了，怎么又到了选煤楼，她正纠结着，醒了，只是一场梦。小妹买断工龄后先后摆过小摊，做过保险公司业务员，搞过产品营销。后来回到南方打工，开过小店，现在从事育婴师和月嫂工作。大妹林娟依然在太仓的银行工作，弟弟弘鑫则在复旦读到博士以后留校任教。

记得父母亲去世后不久，已经到选煤楼上班的小妹问我，癌症会遗传吗？我肯定地回答，不会。其实我心里也一样忐忑不安。父母的离世，使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好端端一个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当家里的一切事情，都还依靠着爸爸妈妈的时候，忽然他们两个就都不在了。我对弟弟妹妹说，有我呢。其实我深知虚弱的我撑不起一条远航的船，只是装着非常勇敢的样子，给弟妹以信心。父母亲都去世了，我是长子，下一个轮也该轮到我了，忽然觉得离死亡从来也没有这样近。我不知未来的岁月中会发生什么，也不敢保证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只是努力地抓住每一个当下，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决绝和坦然。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大夫含糊其辞地说，哦，还没有最后确定。我什么都明白了，不用告诉我。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我竟然平静到没有丝毫恐惧，只是暗暗地想，噢，我才38岁就要死了，有点早，心里稍稍感到有点遗憾。我应该告诉妻子，哪些书法和画是重要的，不要随意散失了。死到临头，竟然还在想着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奇怪的梦。也不知为什么，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又该怎样解释。



观看波兰斯基的《死亡与处女》是一次极为震撼的观影经验，影片中女主人公面对恶的宽恕，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道德底线。甚至连影片中的配乐，我十分喜欢的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也有很长时间不敢再听。是波兰斯基错了，还是我错了，我陷入沉思。渐渐我意识到，我们自小到大一直受到的教育内容是被阉割过的，我们是祖国的花朵，一直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成长，看到的大都是所谓正面的东西，黑暗和邪恶与我们远离。当有一天我们越过温室的薄膜，窥视到人性的黑暗时，我们的内心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所谓保护和隔绝，早已经使我们成为一个单面人。我开始反思，努力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1993年以后，我的绘画逐渐从清新走向厚重，画幅也多是六尺、八尺甚至是多张拼接，虽然是国画颜料，但常常用脸盆大的器皿盛着颜料，蹲在地上泼彩。混沌中，似人形似动物的生命体蠕动着，爬行在荒原上，没有头颅。人，真的是一种高级动物吗，我怀疑。我们不知道一只蚂蚁的悲欢，我们也不知道蝴蝶做梦的颜色。我的创作一直是激情迸发的，常常在灵感到来时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一个月或几个星期，然后归于沉寂。墙上、画案上、地上，到处是绘画和颜料，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颜料气味。不停地挥墨泼彩，终于使我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妻子提醒我眼睛很红，我开始以为只是疲劳过度，休息了几日不见缓解，眼睛依然很疼。就到矿医院挂了专家门诊，大夫说是巩膜炎，在眼球上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叫我去买一种抗癌的药。我听了觉得不靠谱，就直接到西安西京医院看专家门诊，大夫说就是普通的结膜炎，没有什么，开点药，渐渐有所减轻，眼看快好了，又加重起来。往返西安多次，终究也查不出什么病。就是普通的结膜炎，却老不见好。不行又看中医，十几副药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什么也无法干，也看不成书，一直眼睛疼，几个月过去了，始终也不见好转。各大医院专家都看了，也都没有办法。心想要是眼睛好不了，就什么都干不成了，那后半生怎么办呢，也许可以学习写作吧，可以闭着眼睛写。还是不死心，又一次赶头班车奔赴西安，终于挂到了西京医院专治眼科疑难症的专家号，是个女大夫，我记得叫白建伟，她问了我几个月的治疗情况，果断地说：“你什么炎也不是，是药物中毒，赶紧停药。”后来才知道颜料中的藤黄有剧毒。彻底缓解已经到第二年了，视力下降了很多，裸视连视力表上最大一个字母也看不见了。



30、《沉默的风景·蓝色》1号 宣纸彩墨 69\*67cm 林鑫作于1997年



31、《沉默的风景·黄色》3号 宣纸彩墨 178\*97cm 林鑫作于1999年



32、《沉默的风景·黄色》6号 宣纸彩墨 130\*69cm 林鑫作于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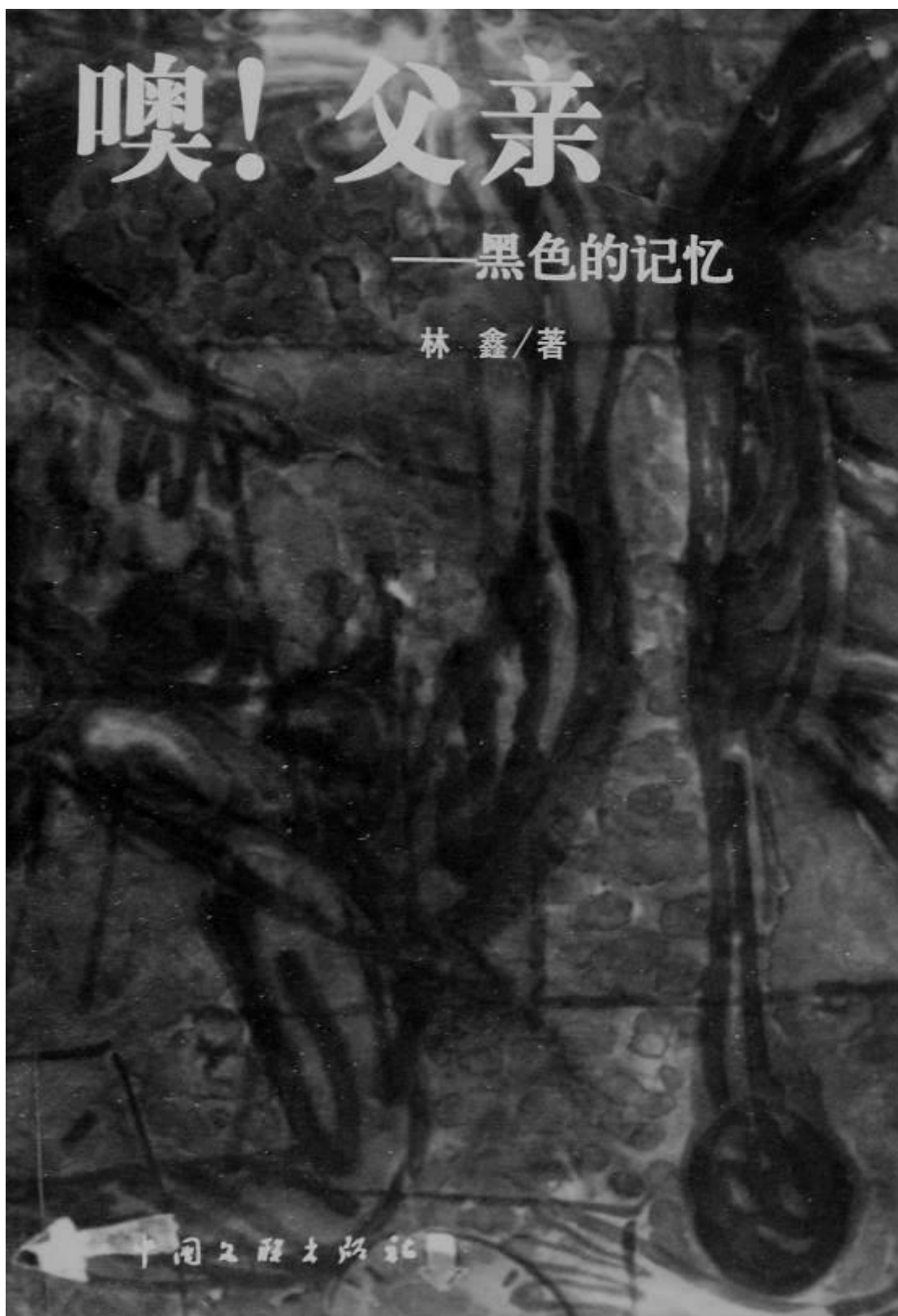
## 诗集

在庸常的日子里蹉跎久了，不仅棱角被时间的齿轮磨平，生命的激情也会渐渐失去。日复一日，时间只是像惯性一样悄无声息地从眼前溜过。直到有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忽然有一行行诗句，从脑海中浮现，我顺手拿笔记录下来，带着惊异。那是最初的一首诗《噢！父亲》，紧接着像是一次井喷，一篇一篇的诗句蜂拥而至，甚至来不及记录。从清晨到子夜，任何时间、地点都挡不住诗句的奔涌。我只是用笔快速地抄写下来，甚至用不着字词的斟酌和润色。24小时随时到来的句子令我十分疲惫，有时太累了，关灯睡下，句子依然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出。只好摸黑写在枕边的纸片上，醒来自己也看不清写的是什麼字，“鸟噢”是什么意思，太潦草了，结合上下文，才看出是“岛屿”。半个多月时间，不分昼夜，写出近170首诗。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黑色记忆喷涌而出，那久违的激情之门再次打开，我流了泪。自以为很多东西已经淡忘了，已经不为所动了，当诗句的撞击纷至沓来时，依然令人感到痛苦。有一段时间嘴唇发紫，心脏承受不了激情的压力。在诗人的称号几乎已经沦为贬义词的当下，还有谁会去读诗呢，选出119首，以《林鑫诗集》的名称发在网上，任其自生自灭。那是2000年的春天，我40岁。后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噢！父亲——黑色的记忆》。那是命运赐予的一份意外礼物，也成为我生命其中的一个驿站，过去没有，以后也很难再有了。十年以后，当我在网上看到网友制作的《林鑫诗选》电子书时，我也下载了一份收藏。这些诗歌依然在互联网上漂浮，或者被某个人偶然读到。现在想来，这种特殊的写作之所以会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发生，除了生活的积淀，与我当时的工作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那一段我正好担任图书管理员，平时也很少有人来看书和借阅。相对的闲暇给了记忆释放的空间、时间和可能，也使我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始终保持着写作的激情亢奋和张力。直到有一天，接到通知去参加连续几天的市政协会议，写作的进程被拦腰截断。清醒时不再有句子出现，而是憋回到梦里，每天的梦中依然是诗句在不停地奔涌，可惜醒来后已记不住一句。从来也没有想过做一个诗人，在80年代满大街都是所谓的朦胧诗人在哼哼唧唧的时候，我不屑于与他们为伍。而自己不由自主、不计工拙地写下这些或许还可以称为诗篇的文字时，我已经不再青春年少，岁月的磨砺已然给我的文字增添了一份厚重。每当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坦然答道，我应该是幸福的，并不回避我所拥有的艰辛。假如你说的幸福仅仅只是单一的快乐这一种，是我决然无法领受的，一种像死水一样仅仅是宁静甜蜜的幸福。就像光给你吃糖，会甜死你。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挫折、成功、喜悦、伤心、甜蜜、痛苦、慰藉等等，都是我们偶在的生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养分，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共同成就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丰厚。一个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永远也不会懂得珍惜他人的情感；一个没有在凄风苦雨中煎熬过的人，也不会对我们每天拥有的阳光感到惊异。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断地从绘画书法转到诗歌又转到了纪录片，其实这里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依靠直觉，本能地抵达一种更为适合的表现媒介。不同的领域就像是一片楼群。一个人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跨越就像爬楼。如果他想到相邻的楼上去，有时并不需要下到楼底，再从另一座楼的底层爬上去。你完全可以站在已经达到的高度，在相邻的两座楼之间，搭一把平行的扶梯，然后平移到另一座楼的相同楼层。这是一种经济的方法，也是我从书画到诗歌，再到纪录片所走过的路径。你的情感阅历、生命积淀和社会经验在这里是通用的，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契机。当然，通常这只能发生在相邻的楼与楼之间，跨越的远近取决于你拥有的扶梯长短和弹性，你所能达到的高度，建基于你在第一座楼上已经到达的楼层。

一天，接到小妹从上海弟弟家打来的电话。她说，弟弟打开电脑给她看我的诗集，她读着读着，马上哭了。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姊妹之间，从来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内心的

感受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姊妹之间唯一一次谈到父母去世的那段日子，还是在电话中。生命中一些最深处的心灵创痛和记忆，依然无法触摸。



33、林鑫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封面

## 兄弟

姐夫张金龙在我的记忆中，常常是表情严肃地抿着嘴唇，个子瘦瘦高高的，精干的外表下透出一种刚毅。可一旦笑起来，马上又显得和蔼可亲。也许是后来到了部队的沟门煤矿，他一直穿着一身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过了几年，他带着全家跟随部队迁到了陕南，落脚在宁强县燕子砭的八一铜矿，以后就很少见到。父亲病重去世前，姐夫专程从陕南赶过来，那时他头发已经灰白，看起来老了许多，饱经沧桑的面孔和神情凝重眼神始终令人难忘。一转眼又是多年不见了，经常收到姑姑的来信，知道他们又搬到了勉县。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和小妹一起去看望他们。原来海虹轴承厂的原址，现在成了八一铜矿退休职工的居住地。在群山环绕的一座丘陵状山坡上，坐落着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每户门前的空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儿女们上班去了，姑姑做饭和收拾家务，姐夫则在门前的地里种菜。干完活，他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顺着山谷的方向，久久地向着远方眺望。由于房屋是建在山坡上面，可以看得很远，远处一层层青翠的山峦隐现出没于白云之间，景色缓慢不停地变换着。姐夫那年60多岁，头发已经全白了，还是穿着那一身洗的发白的旧军装，也依然清瘦精干。他说原来在燕子砭，他们家住的是矿上专门分给劳模的楼房，算是很好的。后来矿上把退休职工全部搬到勉县以后，房子也被别人占了。现在住的这片平房，是海虹轴承厂搬走后矿上买下的，为了方便他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要了相邻的两间。门前自己种点蔬菜，日常也够吃了。姐夫对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有吃的，你姑就有吃的。我吃啥，她也吃啥。青年时期那段记忆依然在他的心头缠绕，挥之不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不管离开故乡多么久远，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想到落叶归根。也正是这样一种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促使张金龙兄弟二人竭尽全力在浦东盖了房子。张野根最终拖着伤腿回去了，却依然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过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姐夫的心里始终也放不下几个儿女，只好留在了陕南。姐夫是共产党员，当了多年的劳模，年年被评为先进。他是电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矿上一叫马上去，几乎没有上下班的区别。姐夫说，他几乎是抛开家庭干工作的，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矿上。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背景下，一种精神的力量，使他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快退休的时候，姐夫承包了矿上的电机修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还是全部拿出来和科室的同志们一起均分。然而社会的发展，最终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现在早被人们抛弃了。金钱至上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他看不懂，也无法理解，甚至会流露出一种失落。他现在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凝神眺望着远处的山峰，看云起云落。

不知是过了一年还是两年，接到大表弟荣明的电话，说姐夫病危。我和小妹再次奔赴勉县。张野根也从上海浦东专程赶过来。野根叔叔已多年未见，感觉也苍老了许多，只是依然像过去一样，见人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都叫弟弟或妹妹，从来也不叫名字。说话中牵扯的人物一多，就往往搞不清他说的是哪个弟弟妹妹了。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那是在三里洞煤矿下井落下的残疾。小妹在屋里帮姑姑做饭，我负责把饭给姐夫送去。因为只请了几天假，所以我尽可能待在医院多陪陪姐夫。已经是春天了，抬眼望去，山坡上盛开着一片片黄色的油菜花，散发出郁郁勃发的无限生机。顺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翻过一座山坡，就到了矿上的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只是旷野上几间没有装修的平房，看上去十分简陋，像是尚未竣工的临时工地。房屋的里里外外，全是没有粉白的水泥墙面，显得粗糙、生硬和冰冷。室内的光线略微昏暗，毛坯墙面上用明线拉着电线和电灯。虽然有好几间病房，大部分都空着，总共也就两三个住院的病人，使医院显得更加荒凉和空寂。姐夫平躺在床上打吊针，野根坐在姐夫对面的床边看着，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长时间静静地呆着。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已经停止了，他们兄弟二人此时就像两尊凝固的雕塑，一动也不动。我不知此刻他们心里在想些

什么，病房内的空气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临走的那天，躺在床上的姑夫已经十分虚弱，他努力地支起上半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久没有松开。我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心里十分难过，但依然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些安慰的话。转身一出病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满山遍野金灿灿的油菜花，依然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争相怒放。



34、父亲（左）和姑夫张金龙在一起。1983年于铜川

## 表妹的苦涩

姑夫临终前，一直放心不下的是他的二儿子春明。家中四个儿女，三个都是产业工人，1967年出生的春明是唯一考上大学的。在咸阳中医学院的五年大学时光，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谈恋爱了，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90年大学毕业，女友留在了咸阳，春明分到了陕南略阳的一家医院。女友叫他先暂时不要去报到，看看她家人是否可以给他在咸阳找一家接收单位。姑夫则觉得供儿子上5年大学已经十分不易，如果不报到，搞不好就把工作丢了。于是逼着春明去报到上班。这段经过五年相恋后被阻隔在异地的情感，又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分手了。这对春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恋爱的挫折加上工作上的不如意，使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至今也没有成家。听说他的女友也一直到了很晚才结婚。老大荣明在建筑单位，常年四处奔波。照顾父母和两个弟弟的责任主要落在了表妹明娥身上，记得小时候总是娇滴滴一副林黛玉模样的表妹，多年后站在我面前已经变得十分果敢和泼辣。也压根没有想到，生活的重负会将一个人的面貌乃至性情彻底改变。她说矿上的人看着她整天忙前跑后，都认为她是家里的老大，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一个常年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一天深夜电话响了，是表弟荣明打来的。我马上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因为他很少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都有事情发生。他说表妹14岁的儿子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尤文斯瘤，在西安住院，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在西安的病房见到了表妹和她的孩子，原来那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此时脸色苍白地躺



在病床上，文弱的像一个小姑娘。看见我进来，叫了声舅舅，声音很低。我一阵心酸。表妹迎过来问，你怎么来了。她微笑着和我说话，没说几句就突然情绪失控，泪流满面。她说“人家都说好人有好报，我一直任劳任怨地为家里操劳，为什么却遇到这种事？”我只是默默地听她哭诉，对一个即将失去孩子的母亲，不知道说什么能安慰她。医院正在装修，到处是脚手架、工人、管道，刺耳的机械噪音此起彼伏。要做检查了，孩子躺在推车上，几个人护着，在脚手架的中间穿行，不断地向左、向右，转过几个楼梯拐角，再乘电梯到二楼。很多的病人在排队等候。表妹说这样的病全国也只有几例，没有什么办法。医疗费已经花了几万，如果实在治不好就回去了，表妹两口都是工人，一直住医院里费用也负担不起。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是说“我赶快好吧，不然过年怎么和同学们玩呀。”离开医院以后，我一直没有勇气再打电话。过年的时候小妹来了，说表妹的孩子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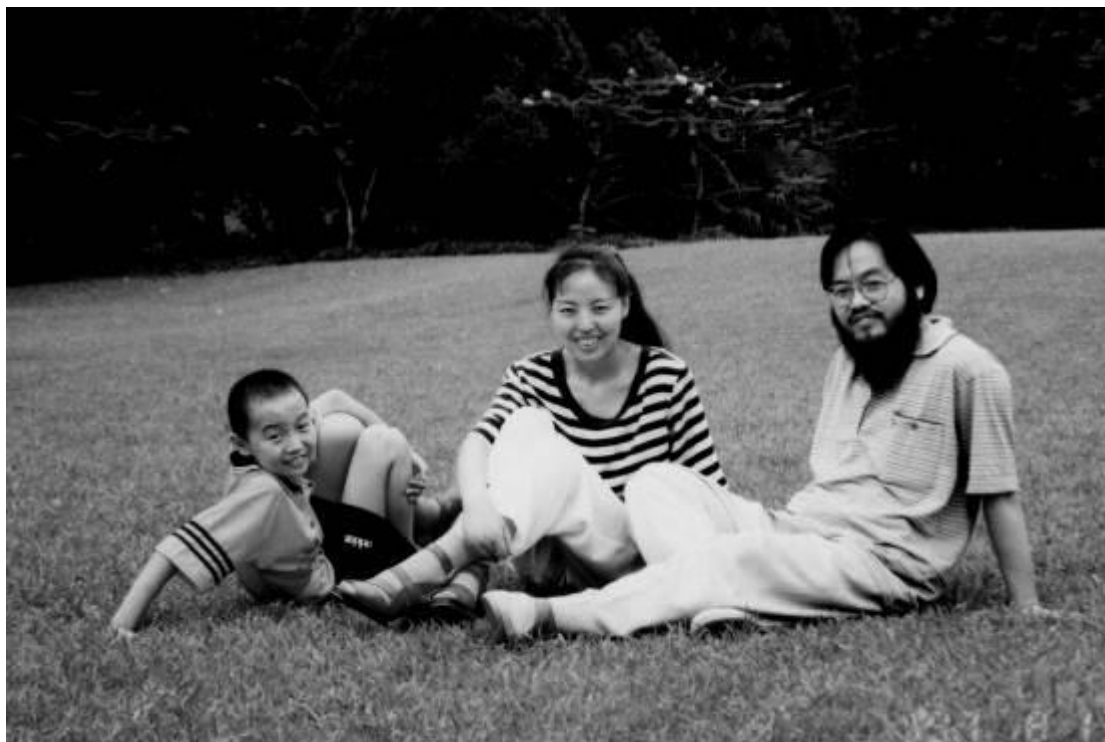


35、表妹 1983年于铜川

## 思凡的成长

儿子思凡1987年6月出生，也就是在我举办第一次个人书画展的几个月之后。家里除了到处摆放的书籍、绘画之外，也多了许多尿片子。凡凡很小就喜欢到处涂鸦，他小时候的绘画我现在依然保留着，其极大的随意性和自由奔放的想象力没有任何的约束和羁绊。把他放到中机厂的幼儿园，竟然自己逃了出来，沿着马路去找妈妈。我去接他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玩耍，他一个人靠墙坐在小板凳上，抿着嘴一副委屈的模样。天天用自行车带着他上下班，在紧张地忙碌中来去匆匆。刚到家一会儿凡凡不见了，一看，他把上半身趴在阳台上的米桶中玩的津津有味。上学了，依然是玩心很重，不爱写家庭作业。学校常常派同学来叫家长。无奈和老师说好，每天写完家庭作业，家长签字。坚持了一个礼拜，同学又来叫了，说“你家朱思凡还是天天写不完家庭作业。”这怎么可能？天天都盯着呢，每天写完作业，

我们检查后才签字确认。原来他抄回来的家庭作业题就已经少了许多。我愤怒了，作为惩罚，叫他把自己做的小泥人一个个全部捏碎。尽管打着为了孩子学习的旗号，但真的看着他一个个心爱的玩具捏碎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一阵阵难受，直到现在想起也依然无法释怀。从小学就已经开始的应试教育竞争，使家长不由自主地成为教育制度摧残和扼杀孩子天性的帮凶。上不了重点中学，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到处都要文凭。我们已经为此受累，决不能让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也许已经说得遍数太多，儿子说：“咱们家怎么说什么话题最后都能绕到学习上。”弟弟打电话过来，说收到了一封我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他觉得内容不像我写的，是一个理论设想。我说可能是凡凡发的吧，写的怎么样？他说国外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问凡凡，你给叔叔发邮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邮箱。他说“我不想让他知道是谁写的，以免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实际上你是第一次到一个地方，但觉得好像以前来过。我建立一个设想，假如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霍金就屁了。”他上初中时就已经把霍金的《时间简史》等书研读多遍。我告诫他，你应该是做一个登山家的材料，要是在山脚下就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是很遗憾的。我和妻子看的很紧，他放学也都按时回家。中考还是落榜了，我低三下四地到处求人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复读。后来才知道，由于我们看的紧，他就上课时间跑网吧去了。曾是宫崎骏帝国网站论坛版主的儿子，两年的发帖量达4000多条。第二年终于考上重点高中，奋起直追，但由于基础薄弱，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面对日渐逼近的高考压力，我的脾气变得粗暴而没有耐心，和青春逆反期的儿子冲撞频繁。妻子对我发出最后通牒，希望我搬出去住一段。她说“儿子是重要的，丈夫也是重要的，不能看着你们两个一个把另一个干掉。你必须弱下来，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等待儿子的成长。”我说好吧，我没有地方可去，就在家装孙子可以吧。妻子和儿子在饭桌上吃饭，我躲在卧室由妻子将饭菜端进来。避免我和儿子在一起发生口角。记得一位纪录片导演对我说，你有这么牛逼的题材，怎么不拍呢？我答道，哪怕毁掉的是一部杰作，我也希望儿子能健康地成长。生活永远比作品更重要。后来去日本山形电影节的时候，为了缓和与儿子的关系，在东京新宿给他买了刚上市的第一款800万像素的柯美卡片相机。看到他后来拍摄的照片令我动容，一个个学生的课桌上堆着一尺多高的书本，每个人都低头趴在桌上休息。他后来告诉我，老师只要一说下课，哗一声学生在课桌上跌倒一片。那时他和我的关系还很紧张，也发誓第一年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铜川。他把拍摄的数码照片文件夹放在电脑的桌面上，让妻子转告我，看后将意见写在纸上，说完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赶紧跑到电脑前，将照片一张张看过，按着作品编号写下具体的意见，有些还画图说明构图的重点。儿子在北京电影学院参加摄影复试的时候，旁边的考生说，嗨，瞧这人拿个卡片相机也来考试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想借一个单反相机参加复试。我说你还是用自己的相机吧，各种功能都已经熟悉，老师绝不会因为你拿的相机不好而把你刷下来。经过一试、二试、三试，终于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课考试，接到儿子艺考通过的短信，我感慨万千，发短信给儿子，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我永远为你感到骄傲。后来由于高考文化课成绩不是很理想，儿子的文综成绩很高，数学和英语分数太低，担心滑档，最终放弃北电，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儿子终于越过了自己人生的低谷，走出铜川，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和更加开放的未来。上大学期间，学的是影视编导，我为他购买了学习用的单反相机和摄像机，我自己依然没有拍摄设备，一直靠借机器拍片。儿子很快成为我的技术指导，通过遥控，帮我解决剪辑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大学毕业后，他到了深圳工作，不时地打电话回来，关心着我和他妈妈的健康。职场的竞争和拼搏仍在继续，他依然在不断地努力和成长。



36、林鑫一家三口 1997 年于上海



36-2、林鑫一家三口 2012 年 10 月于铜川家中

## 陈炉

2003 年时我已经 43 岁。陕西美术馆馆长、笳咏老师的儿子陈玄给我打电话，说要去陈炉考察，希望我同行。陈炉是铜川保留至今的一座千年陶瓷古镇，有着“炉山不夜”的美丽

传说，目前已逐渐衰落。陈玄此行的目的，是想看看是否可以把陈炉陶瓷在陕西美术馆设一个窗口，向外面推介。然而到陈炉一看，昔日的盛况早已不在，年轻人也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熟练的老艺人也越来越少，现在那些描花匠人笔下的线条，显得绵软无力。闻名于世的罐罐墙也逐渐破败，不少已被人为拆除。眼看着美丽的陈炉古镇在一天天凋零，我置身其中，感到深深地无奈和惋惜。应该马上用影像记录下来，我们没有能力阻止陈炉的衰落和凋零，也要保留下现在陈炉的面貌。但由于当时单位正在集资建房，我交完房款，已经没有了购买设备的能力。一天遇到电视台一熟人谈起我的设想，他很热情，可以提供设备并参与摄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为避免后患，我还是丑话说在前面，再三强调我这是独立拍片，与电视台无关，仅仅是私下借用一下设备。交涉完毕，我马上去买了DV磁带，周末就投入拍摄。他和我对于摄影的想法相距甚远。我只好把每一个镜头的机位摆好，并将我的想法和如何推拉摇移的路线详尽演示一遍，再由他操作。他和我一样，对技术也不熟悉。

《陈炉》前后拍摄了一个多月，严格来说，实际拍摄的时间只有八天，都是在我的双休日，每次连拍两天。尽管到陈炉去过多次，但拍摄依然是随机的，在拍摄窑炉的场景时，看到高大的烟囱底部有一只瓢虫，我十分想拍这样一个长镜头，镜头长时间地凝视着一只小小的瓢虫直到它飞走，然后渐渐地镜头拉开再向上摇到烟囱的顶部。由于当时我对摄像机的驾驭能力实在太弱，尽管十分小心，摇到烟囱上部时还是把镜头摇偏了。我十分沮丧，然而瓢虫又再次飞来，我又重新拍摄，还是没有拍好，瓢虫又再次飞来。我在那一刻内心感到了敬畏，冥冥中有谁在帮助我。尽管拍了多次，由于我的无能，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一个完美的长镜头。在影片中只能由两个镜头衔接而成。傍晚下山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上帝的话，就给我一场雪吧。我想象中落雪的陈炉一定格外美丽。第二个周末果然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但是摄像机却借不出来。我来到了体育场，一个人静静地在看台上坐了一下午，无奈地看着漫天的雪花飘落。

又过了一周，再次来到陈炉的时候雪已经融化了，但却意外地见到了竖在墙角的一块斑驳的厂牌，那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片头。白底黑字由于风吹雨淋像古镇一样沧桑。后来文化馆一个爱收藏的人看了影片，还一再追问我那块厂牌的位置，想弄回来把“陈炉”两个字锯下来。我无言以对。

影片终于拍摄完毕，总共有十几盘带子。他问带子你拿走吗？我说就放在这儿吧，反正还要在这里剪辑。然而问题就出在这儿，他闭口不再提剪辑之事，只是跟我要买磁带的发票，说他可以在电视台报销。我说素材我自己要保留的，他说也想留一份，我就把发票给了他。后来有一天他叫我过去，非常得意地对我说，他已将片子剪完并配了解说词，取名《光照陈炉》，在铜川电视台的评比中拿了一等奖，正要往省台报送。他说片子上不方便出现我的名字。我尽管感到愤慨，也只是说，既然你已经做了一部片子，那么我做的时候就不再为你考虑了。在后来我剪辑片子的过程中，他一再试图说服我，既然用了电视台的设备，他就应该是制片人，我的这部片子也应该属于电视台。我说你们电视台已用我的素材先做了一部片子，并拿去评了奖，应该兑平了。他后来又要求继续跟我拍摄下一步纪录片《三里洞》。我说等这部作品完成了再说下一部吧。我心里明白，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了。我感谢他曾经提供的帮助，但是关于署名，还是实事求是吧。他问，是摄影助理？我说，不，是摄影，和我的名字并列。他后来又说自己在工作中有用，希望自称制片人。我说帮助你可以，但是必须写下协议，免得以后再生事端，对大家都不好。签署的协议明确注明，他可以自称制片人，但只是挂名性质，不具有制片人的实际职能。我再次买了带子，将《陈炉》的素材和成片导出，其中三盘素材带已被他找借口删除。到此一段公案终于了结。尽管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不妥，我还是能够理解他的处境，也一直将他的名字作为摄影之一保留在影片《陈炉》的片尾字幕中。这是我做的最为纠结痛苦的一部影片。一面剪辑影片，一面还要不断地与之

周旋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搞得我十分焦虑，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妻子看我做的如此艰辛和作难，极力劝我放弃。我说那是我精神的产儿，即便是忍受屈辱、遍身血污，我也要让它出生。

尽管拍摄和制作的过程困难重重，而影片本身确是唯美的，精致的画面构图和影调，展现了一个东方陶瓷古镇的灿烂黄昏。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摸过摄像机的人，硬是靠着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热情，最终将影片完成。在制作中我不懂也并不介意纪录片的清规戒律，只是按着自己的构想，先用一个 360 度长镜头拍摄的陈炉全景作为开场，然后通过自说、风骨、风情三个段落，展现了陈炉本地人眼中的陈炉，陶瓷生产从备料到烧制成品的整个过程，以及陈炉的民风民俗。进入的态度依然是艺术的，并试图将记录、文献和实验三者融为一体。英文字幕则请弟媳张莹帮助翻译。



37 (1-6)、纪录片《陈炉》剧照



38、纪录片《陈炉》剧照



39、纪录片《陈炉》剧照

## 云之南

影片完成后向那儿投稿呢，我一无所知，就上互联网搜寻相关信息。当我在西祠胡同的“后窗看电影”板块看到“云之南记录影像论坛”的征稿信息时，对“云之南”还没有概念。按照网上提供的地址将DVD寄出，没多久就接到了组委会杨昆的电话，他说光盘已经收到，但在测试时发现后面的部分读不出来，希望尽快补寄一份。我说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投给“青年论坛单元”可以吗，虽然我年龄已经40多岁了。杨昆说没问题。那是2004年的秋天。我那时还没有看过纪录片，也不知其他人的水准，如果投“竞赛单元”落选，连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2005年初，我收到了“云之南”的入选通知。阳春3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到达昆明。报到地点是在云南省图书馆，到了那里，已经陆续有人在报到。我拿出自己制作的A4纸打印的海报，用12张拼成一个连方，贴到放映厅旁边的公告栏内。这时刚才还在拉电线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大厅走过，微笑着对我说这样很好。我不知道他是谁，看那谦逊和蔼的样子，大概是负责器材和播放设备的专业工程师吧。一会又见他蹲在地上在写通知，不断地忙前跑后。直到开幕式上，我才知道，他就是“云之南”的主策展人郭净，“云之南”工作人员的低调令我印象深刻，工作牌上写的是项目组协调人。所有的风光场面均由请来的嘉宾主持，项目组的成员只是悄悄地躲在幕后，做着这些最不起眼又不可或缺的琐碎工作。记得影展进行到第三天，我走过大厅，一个个头瘦小肤色微黑的男子无力地靠墙站着，样子极度疲惫连眼睛都睁不开的了，见我走过，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是杨昆。”噢，这就是杨昆呀。看他累成这样，不忍心和他多说话，打过招呼我就走开了。在一个到处充满着喧嚣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年代，地处西南的春城，竟然还有这样一些人存在。他们低调谦逊，又脚踏实地做着这样一个纪录片影展，能够与他们相遇，我感到温暖和慰藉。在“云之南”的七天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完全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如此纯粹幸福的七天。有了“云之南”的存在，虽然每个人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还是一个人在默默地工作和拍片，但不会再感到孤单，你知道有一批人和你一样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独自用影像记录着这个时代。最后照集体合影的时候，一个小个子快速地跑过来，旁边有人说这是和渊，和渊看起来年龄很小，长得很像哈利·波特。影展期间四个放映厅同时在播放，期间除了看片，也和很多纪录片作者以及观众做了交流。影评人张献民、吕新雨、张亚璇等也是在这届“云之南”认识的。还有更多国内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和独立影展我那时还不知道。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小川绅介的影片，特别是《第二道防线》和《牧野村千年物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通过近距离乃至零距离的摇晃镜头，与村民命运的起伏时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急促的心跳和呼吸。后者则以一种从容不迫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对自然和生命进行了持久地凝视。

影展中播放的国内纪录片大多粗粝朴实，直接记录的当下社会现实充满张力和紧迫感，没有刻意的技巧和花招，呈现出一种不事雕琢的品格和力量。在回来的火车上，与西安的青年作者董均、周渔在一起聊了半宿，并没有年龄的隔阂。在心态上我一直是一个学生，总是不断地尝试和学习着新的东西，虽然笨拙迟钝，进展缓慢，也始终马不停蹄。后来《陈炉》参加了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接到藤冈朝子的电话，我正在长途汽车上，嘈杂声很大，英语我听不懂，中文她不熟练，但我听懂了“山形”两字和她的名字。我在“云之南”通过志愿者的翻译，把DVD给了朝子。她要我在网上填一份报名表，我英语太差，看不懂，始终也没有填。影片入选后，还是朝子请和渊帮我填写了报名资料。去山形是跟苏青、米娜同行，苏青在博客中写到：“林鑫说他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

坐飞机就飞出了国门。”米娜对我说：“你太厉害了，一个日本单词，每次从你嘴里说出来都不会重样，怪不得你儿子说你笨。”有一个问候的单词，我终于想办法用中文记住了，“扣你鸡娃娃”，大家都笑了。看片的时候，郭净老师说，我们坐在边上吧，人家都是买票的。属于云之南特有的低调和谦逊在东瀛我又一次领略。

## 三里洞，三里洞

事实上，还在山里拍摄《陈炉》的时候，拍《三里洞》的想法就一直在心中持续地涌动。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用影像将父辈的生活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去世时我才20多岁，还停不下匆匆地步履对父辈的生活进行回望。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日渐丰富，我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做的话，这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随着这些老矿工的相继离世，以后再想去追寻父辈的生活和足迹，就会更加困难甚至不再可能。拍摄设备依然是一个困扰的问题，一个直到现在我也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朋友得知了我的情况，及时地提供了设备方面的持续支持和帮助。我和他之间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甚至有时见面也不打招呼，但我知道那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样惺惺相惜的友谊已不多见了。他也是矿工的后代，对我所做的事情有着深入地理解和由衷赞赏。2004年11月28日，陈家山煤矿特大瓦斯爆炸发生了，作为44年来全国最大的一次矿难，有166名矿工兄弟失去了生命。我的关于矿工生活的三部曲框架也在脑海中形成。但我意识到，如果我当时直接去陈家山的话，可能拍摄到的更多是浮在事件表层的新闻。我想等这些漂浮遮眼的喧嚣和尘埃散去之后，再进入陈家山煤矿，通过对记忆的挖掘和搜寻，冷静地还原矿难发生时的真实情况以及事件背后的矿区生态环境，并记录当下矿工的 actual 生活。这一等就是五年。影片《瓦斯》完成时，已到了2010年的12月。在此之前，我已经先后完成了后来定名为生存三部曲的前两部《三里洞》和《同学》。拍摄《三里洞》，仍然是利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我借了摄像机出发，穿行在矿区的每个角落。在五十年之后，寻找当年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的幸存者，用影像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和生活，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一直以为我从小在三里洞矿区长大，对煤矿的生活已经非常熟悉。但当我一个个寻找当年的老矿工进行拍摄时，才明白我对煤矿的认识是如此肤浅。那些饱经沧桑的老矿工，面对着镜头，波澜不惊地讲述的那些陈年往事，令我感到震惊，一段尘封的历史为我打开。纪录片更多记录的是社会的面相，内心深处的隐秘则始终难寻。一个老矿工讲到一个人上半辈子比较容易，只要把子女拉扯大，下半辈子真……他说不下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儿子因媳妇红杏出墙而举枪自尽的细节。他内心深处的悲凉刻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却始终也无法说出。前不久去世的老矿工丁福珍面对其子女现状的询问，直接对其中的一个儿子进行了忽略和格式化。那是我的同学丁家宝，因为偷电缆在一次严打中被枪毙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他的父亲依然无法面对。影片中那个时时发出爽朗笑声的王正祥也已经去逝了，带走了他的乐观和笑声。后来知道我在拍摄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病了只是不知道。最终这些人会相继离去，他们的面容保存在影像中并继续对我们述说。

太多的真相早已被掩埋，那些逝去的矿工的记忆无法复活。戚国其，这个三里洞煤矿投产后第一个死去的来自上海的矿工，也只是在众多矿工的口述中才得以将当年发生的事件还原。那些废弃的矿山遗迹，那些选煤楼、井架、灯房、澡堂，那高高耸立的石研山，都是无声的见证。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遗迹也会像铜川矿务局的王家河煤矿一样从地面上彻底消失，不留下一点痕迹。暗夜中三里洞矿区隐约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二胡练习声音，以及在北公房一片破旧的瓦砾中传出的一个孩子清脆地朗读英语单词的声音，在影片中或许并不引人



注意，却使我穿过黑色的记忆感受到一种确切的希望和慰藉。

有一天在三里洞煤矿拍摄完毕，时间还早，就顺路去看望好久未见的小妹。一进门，她正在电脑上接收大妹的女儿舒郁从太仓传过来的照片，音箱里传出了舒郁的歌声，图片还在一张一张发过来，那是舒郁拍摄的大妹和弟弟他们清明节在太仓给父母扫墓的照片。我一下就怔住了，仿佛是天意，我直觉这些照片就是《三里洞》的片尾，就这样一张接一张播放，后来影片中配的是拍摄姨夫顾龙祥时，我姨何菊珍唱的圣歌。大概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2005年上半年已将素材全部拍完，接下来是漫长的剪辑。由于影片展示的大部分是已经逝去的时光，所以口述成为重建这段历史的主体。70多盘磁带，一边播放一边将影像中的口述文字抄写下来，每天断断续续地记录，用了近一年时间，得到将近20万文字。然后对记录文字进行初步筛选，并将需要的文字录入电脑，对原始素材进行大幅度地内容删减和文字编辑后，形成文字脚本。再把影像素材导入电脑进行剪辑。由于电脑硬盘的空间太小，完成一个章节之后先输出，再将素材删除后，才能导入第二部分的素材，进行剪辑。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折腾，影片完成的时候已经到了2006年12月。由于生存的环境原因，我的大脑不得不随时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快速切换，充满了紧张、不安和焦虑。在《三里洞》的后期制作阶段，我已经搬到了离老区40公里的新区上班，每天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上班时间，除了完成每天的文稿起草、处理日常杂事，承担单位各项活动的摄像工作，还要配合各种主题制作相关的专题片。我在上班时间总是十分忙碌。偶有闲暇，也总是会被新的工作打断。同事电脑的游戏声音也使我感到烦躁。体制内的单位总是这样，忙的人干不完的活，闲的人悠然自得地玩着游戏，也许是他们更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吧。渐渐地又实行起考核，变得越来越务虚，每人每年要写三万字的政治读书笔记，开不完的会议发不完的文件、总结、计划文稿。搞得每天下班后十分疲惫，遇到单位的饭局也是尽可能回避。我在单位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沉默的人，一个局外人。尽力做好本职和领导临时安排的各项工作，对得起自己所拿的这份薪水。不与任何人勾心斗角，也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和同事们虽然关系融洽却很少有私下交往，因为尽管在同一个单位供职，但我们关注的事情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妻子是我的助手，除了每日在储蓄所为储户办理各种繁忙的业务，业余时间还担任我拍摄的助手和文字录入。影片的拍摄制作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都是我自己投入。我们俩都是义工，为一部影片需要付出长达两年的劳动。提供帮助的朋友也无法感谢，有的甚至名字也无法说出。英文字幕的翻译是影片制作较大的一笔开销，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先请的一个翻译公司，翻得质量太差，帮我介绍的这位朋友看不过去，又自己帮我重新翻译，由我弟弟帮我校对。2007年对影片进行修订时，又请范敏格对英文字幕做了校译，黄冬博士义务帮助进行了审阅，又再次由弟弟弘鑫最后把关做个别文字的订正。

生活在继续，就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在三里洞煤矿破产后买断工龄的小妹已经回到太仓打工去了。所以片中说到“我们姊妹四人，两个在南方，两个在铜川”。但到了片尾的字幕上，则成了“朱永生和妻子去世后葬在故乡，他们的四个子女，三个已先后离开铜川，回到上海和太仓。长子继续生活在铜川，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三里洞》。”

2007年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惊蛰”注定会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传奇。留德归国的易思成接棒成为这一届的策展人。就在《三里洞》已经入选，我即将准备启程之际。半夜接到了易思成的电话，影展暂缓，后面有情况会随时通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手机多次半夜响起，那是易思成打来的。每次得到的信息都在变化。影展将继续。暂时不行。准备换个地方。又一次接到易思成的电话，声音显得低沉，还是不行。我关切地问，是停办，还是延期。他说最好的结果是延期。我听着他那疲惫、嘶哑的嗓音，一时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我可以想像他们付出的努力，也为“云之南”感到深深地担忧和遗憾。放下电话我很久没能入睡，不断想起郭净、杨昆、和渊以及上次在“云之南”见到的许多纪录片作者和朋友，还有热情的观众和志愿者。这件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生活又照常运行，依然是上班下班，

忙碌而杂乱。半夜电话又再次想起，是易思成，他说将在大理做一个作者、评论家参加的小型交流研讨放映，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我马上表示，一定到。时间很紧，坐火车已经来不及了，立即买飞机票前往。在昆明的翠湖边上和冯艳、崔卫平一起等待出发，我和冯艳聊到直觉和一些心灵感应的话题，崔卫平说她听不懂，闭着眼睛小睡了一会。转到公共话题，她马上变得精神起来，说话投入并充满激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崔卫平，也见识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情怀。到了大理，没有见到郭净，说是留守昆明，我再次心生敬意。

放映在大理古城的一个城楼上，大家席地而坐，专注地盯着银幕，下午在楼下的讨论则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热烈的氛围中凸显出一张张真诚的面孔。一踏出古城楼，面对的是苍山洱海，天上的云彩瑰丽多姿，不断变换，也在平静的水面上留下倒影。到了饭点，在古城的街道上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一面吃饭，一面还相互交流着刚才看过的影片。匆忙吃完饭赶回城楼上，接着观看下一场放映。

《三里洞》放映开始了，我静静地坐在最后面，尽管在剪辑中已经反反复复地看过无数次。但当我真正坐在观众席上时，我依然被影片重重地击倒，泪流满面。我站起来和大家交流的时候，看到身边坐着的杨昆低下头，双手捂住脸。我那天的情绪完全失控，多年堆积在胸中的郁积最终在这一刻得以释放。过了一天，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作者告诉我，她一直在想，如果她也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命运是否会和这些老矿工一样。

紧接着5月在北京宋庄的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三里洞》获得最高奖独立精神奖。10月在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十佳纪录片单元再次放映。《南方周末》在文化板块头条发表了王寅采写的文章《三里洞：他们是被骗来的》。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组也专门来到铜川，制作了两期专题《黑色的父亲》。遗憾的是这两期节目播出时，铜川当地的凤凰卫视频道已被屏蔽



40、《三里洞》剧照



41、《三里洞》剧照



42、《三里洞》剧照

## 生活在继续，拍摄在继续

由于我是在全职工作之余，利用双休和节假日进行纪录片拍摄，所以给我的拍摄方式带来了很大限制。围绕一个拍摄对象进行观察式的长时间跟拍，对于我来说基本是一种奢望。我拍口述既是一种直觉选择，也是自身环境局限和制约的产物。通过记录一个群体，可以反映出更为广阔的生活画卷，也避免了个案视角相对狭窄的不足，并使影片更有说服力。我也试图通过口述来重建时间和记忆以呈现影片的深度。

在拍摄《三里洞》的过程中，我基本上完全采取口述的方式。拍摄罗世俊的时候，发生了其妻子突然离开，罗世俊焦急地去找的情况，我迅速地改变原来的拍摄方式，跟拍事情的进展。这一段意外的插曲也促成了罗世俊后来口述重点由当年的煤矿记忆转到了当下老两口的生存困境。这是生活本身的进程推动了影片剧情的发展。更多时候，我只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我总说，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只有臣服于生活的逻辑，生活才会为你绽放。基督徒说，上帝必不使我缺乏。拍过纪录片的人都知道，生活的戏剧会在你的摄影机前自动展开，它给予你的往往比你想要的更多更精彩，即使再牛逼的纪录片导演，他也不可能去导演生活。

生活本身就是一幕戏剧，其发生和发展也总是让人始料未及。我的妻子胡菊芳和我一样，也出生于三里洞煤矿的一个矿工家庭，她在三里洞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一直担任班长，小学期间还是全年级的连长，一直是老师公认的好学生。然而在参加高考时却连着两年失利，后来招工到了黄堡的纺织厂工作，起初在整理车间上三班倒，接着考进厂里的幼儿园担任幼教，并通过在职学习拿到了幼师文凭。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从黄堡调回铜川到一家商业银行的幼儿园继续担任幼儿教师。为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她看管教育着别人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则送到了中机厂的幼儿园。随着银行职工小孩的逐年减少，幼儿园最终关闭。菊芳也被分到了储蓄所担任前台柜员。90年代中后期下岗风潮在全国蔓延，商业银行的员工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存竞争和压力。随着基层处所的大范围撤并，银行开始通过考试进行末位淘汰，虽然菊芳此时年龄已接近40岁，但仍然和20来岁的员工一起参加了多次下岗分流考试。夜已经很深了，她还拿着300多道复习题，让我给她提问。她总是喜欢应对挑战，一点也不感到胆怯。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常常不能按时下班。下班以后开会学习也已经成为常态。给职工分摊的基金、保险等各种任务常常很难完成，无奈只好自己买下后卖出或退保，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自己承受着直接的经济损失。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职工在重压下选择了买断工龄。当时有政策，女职工工龄满20年可以申请提前内退，菊芳当时不够条件。第二年差三个月就够条件了，女职工内退的政策已改为47岁。又过了几年，菊芳眼看就到47岁了，上面的内退政策又改成了50岁。2012年菊芳已经49岁，第二年就满50岁了，只能期盼着到时候政策不会再突然改变。上半年她父母和弟弟连续五次住院，因为无法总是请假，只能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陪护。更要忍受诸多难以言表的内心挣扎和煎熬。人到中年，压力和困惑也一起袭来。尽管她现在已不再临柜了，但全天在银行大厅负责咨询，中午也连续工作不能休息，依然使她感到吃力。她并不怕吃苦，更大程度上是心累。新片76万字的口述文本，大部分是菊芳录入电脑的，后来她实在忙不过来，我开始打字，目前我用搜狗拼音输入法一天也可以打到一万多字。一位好友也帮我录入了部分文字。

儿子还在上高中的时候，菊芳在北关租了一间小屋陪读。她想带一本书等晚上儿子上学以后读。我说带这本吧，这本书耐读。我顺手递给他一本《圣经》，那是在市政协开会期间，同一个讨论组的朱诚信牧师送我的。我当时正遇到困境去找他聊天，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面

对困惑和信仰的。他给我大段地讲述《圣经》，但依然无法解决我的困扰，我需要时间自己去面对并解决问题。我也没有想到，经我之手转给菊芳的这本《圣经》竟然成为一个契机，她最后因着多种缘由信了主成为一名基督徒。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需要一种信仰成为生命的支撑。在后来拍摄《同学》时候，有一天意外没有联系到拍摄的同学。菊芳说：“你帮我们教会拍一下圣诞节吧？”我说今天不是圣诞节呀，她说“我们教会是分不同时间轮流着过圣诞节。”噢，好吧。我生平第一次走进教会，拍下了铜川新区基督徒在临时搭建的十分简陋的帐篷内聚会的情景。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么多人端着碗排队吃免费的大锅饭，场面十分壮观。我做了一部短片《乡村的圣诞日》送给新区教会。很久以后我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基督教的纪录片时，李牧师告诉我，他已经把那个短片传到了北欧许多国家，他们都为新区基督徒的信仰感动。也是在那次聚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秋芝讲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受过很多的磨难，经济状况窘迫。菊芳给了她一件棉袄，第二天接到她电话说棉袄的口袋内有2000块钱，叫菊芳去取。我和菊芳傍晚来到她工作的地点，也问到她最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她一开口，我马上觉得要是手边有摄像机就好了。我没有再和她见面，我心里明白，我有一天会去拍她。我从来没有去寻找拍摄的题材，总是题材在后面追赶着我。这些还都需要时间和等待。

拍完了关于父辈生活的《三里洞》，接下来拍摄三里洞矿工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同学们的故事，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和同学们1978年从三里洞矿中毕业以后，到我拍摄纪录片《同学》时，已经过去了30年，也刚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完全同步。虽然大部分同学仍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大都忙着各自的生计很少相遇。我计划拍摄随机遇到的20来个同学们的一天，作为当下生活的一个切片。然后通过他们的讲述回望其三十年的生活经历。同学的选择是随机的，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从同学处得到更多同学的电话号码，联系时常常是打到第三个人的电话才能够接通，然后将拍摄带往不同的方向。如果影片中间的某一个同学当时换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后面的人物和故事都会发生改变。

纪录片的拍摄有着自己的命运和轨迹，拍摄中也常常会出现阴差阳错和歪打正着。我拍摄的23个同学，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个女同学我很早就有了她的电话，但考虑到我前面已经拍过做生意的。所以从抽样调查的角度已经把她舍弃了。但当我试图联系一个男同学时他恰好在给这个女同学的母亲三年祭帮忙。我赶过去漫无目的地拍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识到我要拍摄的这段主人公是这个女同学。在坟场一段她的痛哭使我茫然，但摄影机依然在记录。她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非常能干的女强人。生意做的很好，为人也热情豪爽。但当我后来拍摄她口述的时候，才看到了她隐藏在强悍外表下的脆弱无助的心灵。像她自己所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无论感情如何，戏是演到了。我和妻子陪着她一起流了泪，也不知如何能安慰这个陷入生命低谷的女同学。临走的时候，菊芳上前拥抱了她。遇到卖卫生纸的高青芳正是在同学母亲的三年祭上，好多同学坐在一起。她旁边的一个女生指着高青芳对我说：“她和你是同班同学。”我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高青芳说“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公房住。”我快速地在搜索着记忆，试探地问，你姓高。她说你想起来了。我其实依然没有想起来，只是化解了当时的尴尬。直到两个星期后要去拍摄她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眼前才浮现出她中学阶段清秀的模样，岁月的风霜已经把一个人的外表完全改变了。跟拍高青芳的一天，或许无意中对她造成了一些伤害。平时她卖卫生纸的时候遇到同学都是回避过去的，不好意思大声叫卖。而我跟拍她的一天，回避已不可能。整整一天的沿街叫卖和奔波，也只能收入十来块钱。菊芳和高青芳家小时候在一个院子住，听到她第一声叫卖的时候，差点落泪。也正是在拍高青芳的路上，遇到了后来拍摄的同学程青武和李宝珠。

拍摄杨德胜的时候，我知道他坐过三年的牢狱。我说那件事可以讲吗？他说不好说。那我们就跳过。他讲了很多生活的经历以后，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回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下子泪流满面，所有的委屈倾泻而出。跟拍他的一天，要在铜川到西安打两个来回。到第二趟返

回的时候，我的胳膊连摄影机都要举不起来了，我努力地记录下时间的流逝和他极其普通的一天。假如抽掉其中的一些环节，其完整一天的生活和辛劳就无法准确展现。尽可能忠实准确地记录，是对自己的一贯要求，也是我拍纪录片的一个起点。拍清洁工李宝珠的时候，她家住在很高的山上，我们凌晨三点打车过去，出租车也不愿意上山。我和妻子只能下车爬上山去。从李宝珠家出来，一路跟拍了很长一段时间，全在黑暗中，画面上没有留下一点影像。在凌晨的寒风中，李宝珠在街道上挥动着笤帚浑身冒汗，帮我拿东西的妻子直接就冻感冒了。后来妻子说，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在地上乱扔纸屑，你扔一点，清洁工就要弯一下腰。我现在不论走到那儿，只要在街头见到穿着黄色工作服的清洁工总是会多看两眼，便又想起了我的同学李宝珠。或许很多人都不会留意到这些人的真实存在。

不同人物在影片不同段落中多次穿插出现，有一种前后衔接和呼应的关系。最后一段清洁工李宝珠在街道上清扫时，后面段长有从一辆车上下来，从李宝珠的身边走过，曾经是邻居、同学的两个人，现在如此近距离地在镜头前擦肩而过，没有交集，像在生活中一样，也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而在影片中，这个镜头却像是对前面段落的一种回应。绝对的客观记录是不存在的，无论你的摄影机支在那里，都有特定的视角，也会感受到镜头后面拍摄者的脉动和呼吸。

纪录片《同学》的影片人物结构完全按拍摄的前后顺序排列，没有人为了调整和改动，也有着自然的节奏起伏和韵律。季节从夏季的雨开始，经过秋和冬，再到第二年的初春结束。第一段里的人物还穿着短袖，后来逐渐变为长袖、棉衣。影片结尾是同学们独自行走在路上的背影，生活还在继续。影片记录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

因为《同学》的拍摄只能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所以一开始很担心拍成同学们的星期天。拍完以后才知道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日益紧张的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早已容不下从容自在的生活方式了，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沉浮。



43、纪录片《同学》剧照



44、林鑫在纪录片《同学》拍摄中

影片总共拍摄了 240 盘带子，记录的口述实录有 42 万字，用到影片中仅 3 万字，只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记录。做完后期已经到了 2009 年的春天。影片参加了宋庄、南京、重庆的影展。2010 年 5 月在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上作了展映。

2009 年秋季，已经酝酿了五年的纪录片《瓦斯》正式开拍。但拍摄的进程远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尽管陈家山矿难已经过去了五年，矿上的高音喇叭里不断地播放着《幸福万年长》等欢快的歌曲，表面上感觉不到一丝悲伤的气息。但是只要你随便一问，便随处可以遇到在矿难中失去亲人的人们。在职的矿工大多数拒绝了采访，他们依然被恐惧笼罩，并且还要在当地继续生存。当我试图采访一个矿难幸存者的时候，他对帮我联系他的大叔说：“叔，你千万不要参与此事。”大叔说：“我那么大年龄了，怕啥？”这位矿工说：“你不怕，你儿子还在矿上，人家收拾你儿子。”我想拍摄矿区内部的一处空间，刚举起摄像机，马上就有人出来干涉。由于大叔的及时出现，拍摄才成为可能。这位已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矿工，依然有着坚定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对我的拍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有一天深夜我们去拍摄在石矸山捡煤渣的矿工家属时，他们以为我们是矿上派来的，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原来矿工和家属因为生计困难，就到石矸山上去捡些残余的煤块卖点钱补贴家用。石矸山很容易滑塌发生危险，所以矿上不允许在石矸山捡煤块。矿工家属们只好深夜冒着严寒，头上顶着一盏小灯，偷偷地上山捡。远远望过去就像是星星点点晃动的萤火虫。

拍到从三里洞煤矿调往陈家山煤矿的老矿工吴青海也是一段奇遇，他是我四十年未见的一年级班主任张淑兰老师的丈夫。这个文革中三里洞煤矿大名鼎鼎的 219 头头，退休后研究起风水，为过世的矿工主持丧事。陈家山瓦斯爆炸遇难的矿工也都由他一手入殓安葬，一提起此事，他马上老泪纵横不能自己。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矿工述说着矿难的真相，也怀着对国家富强的盼望，讲出了老百姓期待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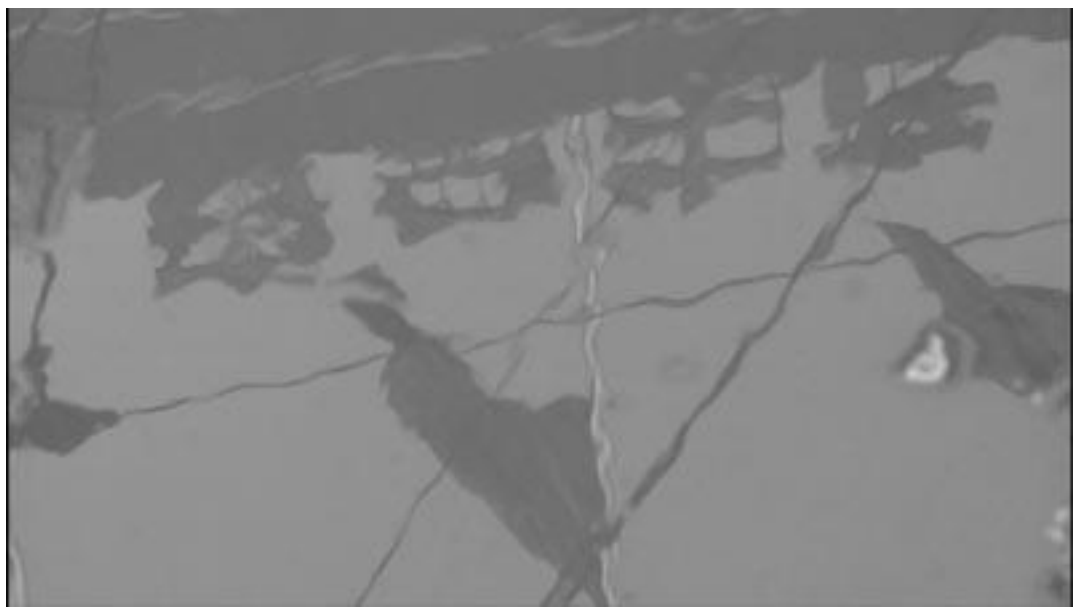
一位中层干部，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是矿上利益集团的一员，但依然十分感慨地说出对普通矿工艰难的日常生活的同情和对煤矿生产安全状况的忧虑。

在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中，矿难只是我进入拍摄的一个点，我试图通过一层层的深入剖析，展示出整个矿区的社会生态，以及矿难背后的深层原因。假如人们能够汲取教训的话，可以尽量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矿工们认为的真正罪犯一直逍遥法外，矿难的悲剧也一再重演，那么多矿工兄弟生命的消逝依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警醒。当陈家山的矿工还对矿难的惨痛记忆犹新的时候，在西安火车站的随机采访中已经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已对这场国内 44 年来最大的矿难记不得了，因为近年来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的矿难实在是太多了。就在 2011 年 10 月中旬，《瓦斯》在宋庄北京独立电影展上放映的时候，铜川田玉煤矿又再次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又有 10 多名矿工兄弟遇难。

从 2003 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到现在，我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仅仅是生存三部曲就耗去了六年的时光。而这些作品都是在日常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完成。在拍摄和制作过程中也遇到了数不清需要克服和解决的各种难题。我始终是一个自学者，从书法、绘画一直到纪录片拍摄，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成长。从制作技术、拍摄经验到生活阅历和人生感悟。

2010 年 12 月，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购置了我人生第一套拍摄设备，包括索尼 EX1R 摄像机、无线麦、话筒、广角镜、脚架等相关配件。我在圣诞节期间再次启程，开始拍摄《传道人》，一部关于信仰的还未完成的片子，我也将坦然应对扑面而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 我是铜川人

连着参加了两届云之南影展，带给我的是与同道相遇的快乐和欣慰。2009年，我的新片《同学》，最终没能在影展截稿前完成。去不成云之南了，心里感到有点遗憾。这时接到了易思成的电话，邀请我担任本届影展的评委，感谢云之南，给了我再次来到昆明的机会。见到易思成，一瞬间竟然没认出来，一头飘逸的艺术家长发没有了，现在显得更加朴实和成熟。没有见到杨昆，说是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没过多久，就在网上看到了杨昆病故的消息，我心中十分难过。下一届“云之南”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祭奠。2011年的云之南，影片《同学》参展，我最终却无法前往，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歉意。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一种双重的无根状态。从小父母就告诉我，我们家是南方人，我们的故乡在江苏太仓。那是父母的故乡，不管他们漂泊到哪里以及是否能够回去，在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故乡可以惦念。那个父母常常说起的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始终无法忘怀也无法认同的存在。尽管回过几次太仓，甚至还在那里上过学，但无论是自己的感受还是别人的看法，我终究是一个外乡人，那里早已不再是我小时候向往的故乡了。而在铜川，我只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铜川人。90年代，很多人离开铜川，前往山东和南方的时候，我也曾一度想离开这里。后来我才明白，无论怎样试图逃离，我的生命和记忆都和这里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切割。有一天看到上大学的儿子在博客中写到：“马上放假，终于可以回去吃到家乡的羊肉泡馍了。”我心头一热，他那么肯定的故乡，在我的内心曾经有过长时间的纠结和排斥。也许以后有一天，我也能够坦然地说出，我是铜川人。最终使我成长起来的，依然是这片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和遗忘的土地。我现在不得不感谢这座带给我诸多痛苦同时也伴随我度过了50多个春秋的城市。

我的日常生活是撕裂的。在社会上曾担任过铜川市青联常委、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以及15年的市政协委员。在单位的专业职称是经济师，还兼着工会出纳。上班的时候，在银行工会除了处理各种杂事之外，还要参与组织各种文体活动，起草文稿，收发文件，放早操等工作。有几年还兼着单位的照相、视频拍摄和制作。每天早饭后第一件事情是刷卡上班，然后是给职工放广播体操并负责考勤。到传达室取回阅览室订的当天报纸和杂志进行分拣和上架，把主管行领导的报纸送到他办公室。回到工会办公室以后，赶快打扫完室内卫生，把做操的考勤结果汇总填报。然后打开电脑查看是否有上级部门下达的新工作安排和邮件需要尽快处理。将收发的公文登记、传阅、归还，需要留底的复印归档。我担任的工会出纳由于周转金有限，需要不断地到开户银行去取款和回来报账，按时给本单位当月过生日的职工发放生日礼金，收交职工工会会费。管理单位的荣誉室和职工图书阅览室，负责图书的采购、管理和借阅登记。我作为工会的安全管理员和计算机管理员，每周定时对本部门进行安全检查并登记。负责工会的固定资产、财物的保管以及工会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管理。随时需要将所做的各项基础工作、职工之家、民主管理、双先表彰、文体活动、职代会等等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完成情况录入工会综合管理系统存档，便于上级的随时检查。工会工作网页也需要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办公大楼门前的宣传栏要及时反映行领导活动和行内的中心工作而经常更换。其实有很多工作都是在进行无效的重复劳动，即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无谓地浪费着宝贵的社会资源和不可再生的能源。原本很简单的工作，现在也要先写出计划和实施方案，经过各级领导批示通过，工作做完以后要写出简讯和总结汇报材料，然后将全

部的工作流程和相关资料全部打印出来归档。2011 年度的本单位职工体检，我从三月份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和体检方案，层层向上级汇报，按照领导的意图进行多次修改，中间领导一旦出现新的想法，前面的工作就全部作废，重头再来。这样反反复复多次，在各级领导之间踢皮球，做了很多无用的前期工作，直到八月份该项工作才最终得以实施。年终考核只注重文字材料，尽管工会组织的活动都是全行职工参加，人人都知道。但还是必须输出全年活动的纸质文本，所以不断地按照考核内容要求整理相关档案，一年下来打印的文档资料将近一米厚，打坏了两个硒鼓。很多工作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反复，各级领导的意见也很难一致。作为一个经办人员，尽管看起来工作繁忙干的十分辛苦，工作效率却并不高。还有开不完的会议，写不完的会议记录和落实情况汇报，组织起草双先评比和表彰文件，参与组织职工运动会，元宵节游艺会，团拜会，文艺演出……

下班以后，则沉浸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从开始的绘画书法到现在的纪录片。没有礼拜天和节假日的概念，也尽可能减少与人的日常交往，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在谋生之余，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和拍片已经填满了全部的时间，没有其他的闲暇。《电影札记》的编辑汪玲多次打电话和发电邮，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始终没有时间完成，直到拍《瓦斯》时天气突变，冻感冒了，才回来躺在床上一口气完成了《一个纪录片人的生命旅程》的写作。另一篇文章《在卑微中前行》则没有这么幸运，和渊约稿的时候，正是我单位工作最忙的时候，每天筋疲力竭地回到家中，已写不出几行文字，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拼成一篇，显得上气不接下气。

随着我拍摄的纪录片影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压力也接踵而至。已经留了 20 多年的胡须也被以组织的名义勒令剃掉，然后遇到熟人时我主动打招呼，对方常常显得尴尬认不出，我也不做解释。我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重新成为一个陌生人。有朋友表示不平，我说，领导要我年轻，我为什么不年轻呢，感谢领导吧。可以装逼的艺术家标志没有了，走入人群中不再显得扎眼。不断地约见谈话仍然在继续，我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希望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除了不断地汲取和享受前人建立的文明成果之外，也能通过个人的微薄之力对社会有所回馈，为历史留下些一个地域普通人生活的影像文献。没有人说我做的这一切对或者不对，但我的出行和拍摄依然使一些人感到恐慌，已经入选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的新片被勒令撤回。休几天年假出行，被告知要备案，并要求保持联系，说随时可能会因工作需要叫我回来。我坦然答道，没问题，我手机 24 小时开机。当后来得知我又去宋庄参加了北京独立影展时，剩下的年假，自然也无法再休了。南京、重庆的影展也只能缺席。我试图为社会做一点有意义事情的努力，变得日益艰难，我感到尴尬和无语。坚硬现实，已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生命显得微不足道。像三里洞矿工曾经做过的一样，我只能选择承受。2011 年，我带着严重的腰病，依然坚持完成了自己全年的本职工作，那是我生存的基础。每个月的工作业绩考核，11 个月称职加一个月优秀。年终部门总结联评，进行职工无记名投票，将我 2011 年度的工作评定为称职。然而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单位的领导最终将我 2011 年度的工作考核定为不称职。姓李的行长说：“就是要敲你一下，看你以后还拍不拍（纪录片）？你不服可以去上告，连着两年考核不称职就可以开除你。”面对赤裸裸的恐吓和威胁，我说我拍的纪录片有问题吗？他说分行专门为你开过会。我问结论是什么。他说对你的纪录片我们不评论，也评论不了。我拿出了在国内多个影展的获奖和参展等证明材料，但对方不屑一顾。尽管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我也不想成为一名上访者，结果大家都明白。从 20 岁开始，我已经连续在这家银行工作了 32 年，这是我受到的唯一处分，当然，是以莫须有的名义。加之年底工作太忙，劳累过度，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再次发作，各种治疗均未见效，只能躺在床上慢慢恢复。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我向单位递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可能对自己对单位都是一个解脱。退休前单位多个部门联合再次对我进行组织谈话，希望我退休以后也不要参加社会上的影展交流活动等等。我只是说，我依然会坚持说真话，保持做人的良知，今

后的一言一行也始终会对得起我所生长的这片土地。谈话还在进行中，手机的铃声响了，我一看是云之南郭净老师的电话，我挂断了。谈话一结束，我立即回拨过去。郭老师告诉我，“中国记录影像文库”的编写计划，出版管理部门已审批通过，可以立即着手写作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来的也正是时候。我的时间表，永远是这样被命运填满的满满的，一直颠簸在不间断地的生命旅程中，没有闲暇的时间和叹息的空间。对于我所遇到的多方面大大小小的各种阻力和压力，我或许应该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持续阻挠和限制，最终帮助我实现了艰难地成长，并将我托举到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努力根本无法达到的生命高度。为生存已经身不由己地蹉跎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些事情了，我已经 52 岁。回到家中，铺开一张尘封已久的四尺生宣，放笔用生涩奔放的笔触，写下杜甫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的青春，我的真正属于自己的青春，应该从现在开始。不管未来的生活中会出现多少晦暗沉闷的长夜和凄风苦雨的天气，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即使是匍匐着前行，我也不会放弃对阳光的渴望与信心，并继续迈出自己缓慢而沉重的脚步。

对于《三里洞》，我始终无法面对，放映中也总是泪流满面。有多少坚强就有多少软弱。终于能够坦然说出的一切，呈现了一个曾经十分虚弱的心灵正在变得日益强大，而埋藏在内心更深处的隐秘，依然无法托出。我始终清楚自己的微小和软弱，还需要时间的不断磨砺和坚韧地生长。真相也始终无法穿透，我们只是在表面徘徊。为了这些生活影像的记录，已然耗去了如许多的光阴和岁月，并给我带来诸多的麻烦、慰藉和感慨。从最终意义上说，我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制作人，同时也成为一个受益者。正是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使我从一个有着强烈艺术家倾向的自我表现者，转变成一个谦卑的日常生活记录者。日复一日的劳作，最终会将平淡的日子充满，带给我丰盈的收获和感悟，并激励我直面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仅仅为了那长眠地下苦了一生的父母赐予我这偶在不确定或许随时都可能消逝的生命，以及生长于斯的这片令我纠结不已不能释怀的土地，我也将始终怀着不安和羞愧，心存感激。



46、林鑫在纪录片《三里洞》拍摄中 2005年5月于铜川三里洞煤矿 菊芳摄



47、《三里洞》剧照



## 第二部分 寻找即将消失在时间尘埃中的矿工

### 开拍之前

位于陕西铜川的三里洞煤矿，1954年8月开始建设，是西北地区第一座机械化矿井，设计年产量为60万吨<sup>1</sup>。1955年12月，铜川矿务局从上海建筑公司招了300多人，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来到铜川，被分别安排到史家河煤矿（一矿）和李家塔煤矿（三矿）进行培训。我的父亲朱永生就是其中的一员。1957年7月1日三里洞煤矿建成投产。1986年11月，在三里洞煤矿通风区多年担任瓦斯检查员的父亲因病去世，小妹朱弘娟顶替招工到三里洞煤矿选煤楼工作。2000年三里洞煤矿宣布破产。下面是当时《中国矿业报》关于三里洞煤矿破产的相关报道。

三里洞煤矿是建于1957年的老国有煤矿，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地辉煌一时，近年来却因资源枯竭而逐渐走向衰落。2000年9月1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正式批准其作为全国第一批破产煤炭企业。2000年10月，该矿正式向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sup>2</sup>

2005年春，在父亲和他的工友们来到铜川50年之后，我拿起摄像机，开始寻找当年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和经历。之所以选择上海这一批人，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进入比较方便。实际上从三里洞煤矿投产以后，不断有人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这里。那些人物的命运，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父亲他们当年来到铜川的时候，还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现在活着的也已经七八十岁了。我的姨夫顾龙祥仍然健在，住在青年路的金华小区，那么就从他开始吧。然后再找我家原来的邻居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等，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中和父亲一起来的张许金、姚惠民等也已去世。

周一至周五我要正常上班，只能利用每个周末的双休和节假日进行拍摄。在出发前对即将拍摄的纪录片《三里洞》，也只是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和框架：

一、拍摄的内容分为人和物两个部分：

- 1、 人（幸存的矿工，证人，证言）；
- 2、 物（矿山的废墟、物证，证据）。

二、准备向被采访的老矿工提出的四个主要问题：

- 1、 当年是怎么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的？
- 2、 在煤矿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 3、 是否想过回到故乡？
- 4、 现在的生活以及子女的状况。

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减少提问，主要记录的是矿工们的口述。因为对可能拍到的素材量估计不足，只买了20盘DV磁带就开拍了，后来一共拍了71盘素材。开始是我

<sup>1</sup>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632页

<sup>2</sup>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

一个人拍摄，后来赶上我妻子胡菊芳轮休的时候，她也会跟着我一起去。

## 第一天的拍摄手记

我是一个矿工的儿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五十年代西部大开发时，一列来自上海的火车，载着父亲和300多位同样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的三里洞煤矿。将他们的一生以及儿女大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50年过去了，当年这批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者们，活着并依然生存在这里的老矿工已经不多了。我的父亲朱永生已经去世近20年，姐夫张金龙也于三年前不在了，随着这些老矿工的一个个离去，也渐渐掩埋了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时代。那些鲜活的生命，曾经怎样顽强而又坚韧地生活过，并如何被生活和岁月无情地抹去，我并不知晓。只是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待在什么地方，煤矿都是我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黑色记忆。1975年的一天早晨，我走在上学的路上，数着一辆辆拉着棺木向北而去没有尽头的汽车，我知道了焦坪煤矿造成101名矿工死亡的瓦斯爆炸。现在我徘徊在三里洞矿区，寻找着风烛残年的老矿工——我的父辈。试图用影像留住他们生命中残破的记忆和当下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个体生命的尊严。

今天是拍摄的第一天，我一个人背着索尼190P摄像机、f707数码照相机和三脚架，随身装了五盘DV摄像带，去寻找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顾龙祥。他是三里洞煤矿的绞车司机，也是我的姨父。小时候曾到矿上他工作的绞车房玩耍，怎么去的已经忘了，他当时给其他矿工说的几句话现在还记得。“绞车司机总是要被人骂的，开得不好，停得太猛，罐笼里上下罐的工人自然骂娘；开得平稳，工人们便说，这狗日的开得还不错，一样挨骂”。他是副绞司机，负责提升矿工上下罐。那时他还年轻，长得十分英俊。

虽然住同一个城市，相隔也不过几站路，却在匆忙的生计奔波中，几年没去看过他们，此时心里有些内疚。走到二马路，坐上公交车到青年路站下车，看到那座老楼依然立在那里，显得有点沧桑。径直上楼敲门，却敲错了，下了一层继续敲门，门虚掩着，推开门，姨迎来说：“林鑫来了，快进来，看你姨夫弄点煤，楼下修路无处放，都搬到屋里了。”

姨父在马路对面给建筑工地看楼，每天10元工钱。我先拍摄了一些室内的场景，然后来到他工作的地方拍他的讲述。姨父已经老多了，口齿也不太清楚。他讲到了戚国其，1955年他们一起从上海来到铜川，1957年7月1日三里洞煤矿正式投产，7月13日绞车的钢丝绳断了，机斗从井口掉了下去，把在井下开水泵的戚国其直接压成了肉饼，这是三里洞煤矿第一起死亡事故，也是这批来自上海的矿工中第一个遇难者。

我在拍摄姨父寻找老照片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圣歌，转身一看是菊珍姨和一个老姊妹伏在墙边的沙发上祷告，沙发上面的墙壁上还贴着一张世界地图。那个姊妹是来给姨夫家的小女儿玲玲介绍对象的。玲玲此时已32岁，因精神受过刺激，一直没有成家，成为姨父一家的心病。唯一的儿子也离婚了，现在外地打工。几个女儿会经常回来看望。

菊珍姨给我讲述着过去的生活，也讲到了自己的母亲，讲出她一生对母亲爱恨交集的复杂情感，以及她内心的痛苦。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尽管她的讲述已游离出我原本想要拍摄的主题。最后说到她母亲已经97岁高龄时，她说已经原谅母亲了，知道母亲当年将她送人也是不得已。等把玲玲的婚事办了，攒点钱再回去看看母亲。痛苦的极致，仍然是爱。她给我唱圣歌，那是我听过的世界上最真挚感人的歌声，暗哑的嗓音发自一颗痛苦的心灵，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暮色中灯影朦胧，车流不断，我凝视着窗外，时间流逝。

中途带子用完了，打电话让妻子又送来三盒，但依然没有录到最后。我无法预测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只好尽量多拍。生活本身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和戏剧性张力，不断推着我向前走。

事先设计好的一切，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和无力。立即请朋友帮助，订购了 100 盒 DV 带，可以无所顾忌的拍下去。

2005 年 4 月 2 日星期六 深夜

上面这段文字，是拍摄纪录片《三里洞》第一天晚上写下的拍摄手记。原计划要一直写下去的，可是只写了第一天，便在投入拍摄和谋生的双重压迫下，无以为继。周六和周日连着两个整天拍摄，接下来周一到周五是连续五天的繁忙工作。再加上我当时供职的银行已经搬到离铜川老市区 40 里外的新区办公，所以光是上下班路途就要花掉两个多小时。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十分疲惫，已经没有精力再写东西了。只是尽可能保存些体力，以应对下一个周末紧张忙碌的寻找和拍摄。

我现在才意识到距离《三里洞》的前期拍摄，已经过去了七年。我努力搜寻着自己的记忆，追溯寻找拍摄三里洞煤矿老矿工的那些日子。《三里洞》本身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现在写下的文字则是关于拍摄记忆的记忆。我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回当时的感觉，只是将寻找拍摄的过程和发生在影片背后的故事，进行简要的叙述。

姨夫顾龙祥，一直是慈眉善目的样子，好像一点脾气也没有。从我童年记事起他就是这样。菊珍姨的性格则完全不同，一辈子争强好胜。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母亲叫我给菊珍姨送点点心之类的东西。我总是前脚刚走，她便又匆匆忙忙地送回来，让母亲觉得十分无奈。她们姐妹两个，常常会为一些生活琐事发生争执，也互不相让。母亲总是说，你姨太要强了。后来母亲便尽量不再多说话，以减少矛盾和摩擦，这样也就客客气气相安无事。

母亲去世很久以后，我再次见到菊珍姨的时候，忽然发现她已经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尽管依然心直口快，心态却变得十分平和，不再偏执、焦虑和急躁，面部也时常挂着笑容。那时她已经是基督徒了，总说是上帝救了她，不然她早就没有了。每个周日，她都会到青年路教堂去听讲道，玲玲也会跟着一起去。姨夫依然是和善地微笑着，话语不多。玲玲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孩子，由于没有照看好，孩子夭折了，受到婆家的埋怨。后来玲玲离婚了，又搬回娘家，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2011 年我拍《传道人》的时候，在青年路教堂遇到了玲玲，她过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依然笑的很单纯。

我对这批来自上海的老矿工现在还剩多少，住在那里大多不知道。拍完了姨夫，就请他给我提供了几个一起从上海来的老矿工信息，我再一个一个去寻找。

住在姨夫家楼上的奚海金没有接受我的采访。当我敲开门说明来意，他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轻轻把门关上了。他已经 80 多岁，一个人独自生活，他的老伴和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他不想再说什么，沉默中，已将属于自己的记忆彻底封存起来。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他的生命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故事，又有着怎样的经历，我们都被那一扇门关在了外面，无从知晓。

## 我无法再次面对他的目光

2005 年 4 月 3 日是星期日，我再次来到青年路，这里过去叫瓦盆窑公房，现在已经改成金华小区了。顺着姨夫家马路对面的一条小路向东望过去，可以看到矗立在半山腰的青年路教堂，那里据说已成了滑塌区。这是铜川市内较早建立的一座教堂，是 70 年代后期信徒们用洗脸盆端沙子，老太太在漆水河中搬石头，一点一点凭借着信心盖起来的。在姨夫家附近有一个很小的老年活动室，三里洞煤矿退休的老矿工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打扑克、聊天。

我先到姨夫看楼的工地门房中等着，他去老年活动室看看有谁在那里。不一会姨夫就领了一个人从马路对面过来了，进屋后我才看清楚，他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深蓝墨水一样颜色的点点，那是在井下放炮时叫雷管炸的。我小时候在北公房和矿上多次见到过这样的形象，每次看到满脸是蓝黑色点的矿工，就感到十分害怕，从来也不敢正眼去看。

现在这个“黑脸”的老矿工就坐在我面前，带着一副墨镜。他叫沈龙根，也是当年和父亲一起从上海来的，我看着有一点面熟，却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善言谈，问起煤矿的事情，也总是说：“天天下井采煤，这有什么好谈的，天天都是这样。”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们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可讲的。谈到矿上发生的事故，也只是平淡地说“矿上死个人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经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是拉家常那样平静。大大小小的冒顶事故，他早已司空见惯。

我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的生活环境，就跟着去了他家，他住在姨夫同一栋楼靠西面那个单元。上楼的时候，他呼吸上不来，爬几个台阶就要歇一下，上到四楼已经气喘吁吁。常年在井下挖煤的矿工，大部分都有职业病。他说现在天气暖和还好一点，他整个冬天要在床上躺三个月。进屋见到他的妻子，是一个十分慈祥和蔼的老太太。沈龙根告诉她我是朱永生的儿子时，她显得十分热情。她走路时腰弯成90度，完全无法直起身走路。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过去担土的时候发生塌方造成的。两位老人住在十分简陋的房屋内，即抚养孙子，还要供孙子上学。子女都下岗了，有的摆个小摊度日。从上海来到这里几十年，由于生活窘迫，他们什么地方也没去过，更没有机会回上海，故乡对于他们来说，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谈到生活的现状，沈龙根沉默下来，他的妻子继续在说。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沈龙根捂着眼睛的手在微微发抖。过了一会，他把脸扭向窗外，依然沉默着。

我内心感到有些不安，或许我的闯入打破了老人平静的生活。后来电视台要采访他的时候，我建议换成了其他的矿工。我无法再次面对他的目光。

## 压不住的爽朗笑声

我家和王正祥家过去住在同一排公房，他两个儿子，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记得王正祥那时脾气相当暴躁，打起孩子来下手也重，他们家的几个子女都比较怕他。那时王正祥尽管个子不高，却显得十分彪悍。夏天常常穿一条大裤衩，叼着一支香烟，嘿嘿地笑着，在家属区转悠，遇到邻居就凑在一起聊天。他的妻子林秋娣，常常来找母亲，因为都是南方人，自然关系比较亲近。还有和我家隔几个门住着的姚洪昌一家，都是来往比较密切的。后来我孩子上初中时候，找王正祥的儿子春平补过课。春平是矿务局中学的数学老师，一直带毕业班。王正祥的小儿子春龙，和春平内向宁静的性格相反，人际交往娴熟老道。他很早就停薪留职，离开供电局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据说后来做的还不错。

自从王正祥搬到河东以后，就一直没再见过。这次找到他们，林秋娣阿姨和多年前没有太多变化，依然是瘦瘦的，说话不慌不忙。王正祥则改变很大，原来壮实的身材变得十分消瘦，脸上布满了皱纹。个子本来就不高，此时更显得矮小，但眼睛却依然有神。讲起过去的往事，他非常感慨，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在三里洞煤矿下了一辈子井的王正祥，性格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在采煤区当放炮员，一直干到退休。因为儿子的条件较好，他觉得晚年还比较享福。我看到了墙上那个粉绿色的三五牌挂钟，小时候多次见过，当年也是家里的一个大件。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依然在滴滴答答地走着，到半点的时候，咣当一声，一下激起我很多童年时代的回忆。离开了王正祥家，我有一点感受，就是这些老矿工晚年过的如何，和子女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子女经济条件差的，老人的生活就比较艰难。子女经济条件

好一点，老人也相对过得好一些。这个判断也为我接下来的拍摄不断证实。

《三里洞》制作完成后不久，王正祥就去世了。后来在街上遇到王正祥的二女儿红爱，这个小时候不太争气一直让家长操心的孩子，现在是一个孝子。她说我去采访的时候，王正祥已经有病，只是当时不知道。发现时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住在医院里也只是花钱受罪。其他几个姊妹主张放弃治疗，她则希望尽全力抢救，而不管是否有效。说这些事的时候，她依然显得情绪激动和愤愤不平，说完后很快消失在密集的人流中不见了。王正祥其他几个子女，我后来也一直没有遇到。

## 当年的老照片也没有保存

和十分豪爽的王正祥不同，绞车司机姚洪昌的性格则更加沉稳和严肃。三里洞煤矿发生第一次断绳事故的时候，姚洪昌正好在上班，讲起当年的事情，他仍然记忆犹新。矿上出事之后，部分矿工离开煤矿跑回了上海，他和我父亲因为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而最终留了下来。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他也已经退休多年，但一说到因井下事故去世的工友时，他的神情依然十分悲伤。

因为性格脾气投缘，姚洪昌和父亲一直关系很好。至今还记得他们在夏日傍晚，坐在门前小凳子上扇着扇子，纳凉聊天的情景。小时候奶奶去世后，母亲还在太仓老家。父亲去上班的时候，就委托姚洪昌的妻子雅芳姨帮我做饭。姚洪昌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和我是同学，在黄堡陶瓷厂工作，后来调到学校当教师。我拍摄纪录片《同学》的时候，曾经想和她联系，电话却始终没有打通，后来才知道她的手机已经换号了。姚洪昌的儿子姚风平，小时候也常在一起玩，并当我画素描头像的模特。当时一起玩的另一个小伙伴，内招到矿上不久，就在井下的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姚风平没有选择下井，一直在上海打工。回来后自己买了一辆小中巴，姊妹几个一起经营，由于生意不好做，就又把车卖了。

姚洪昌后来搬到了坡底下紧靠马路边的一栋单元楼里，家里的陈设依然像过去一样，收拾的十分整洁，床上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棱角分明。他平时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也帮着照看孙子，两个女儿也常回来。除了比以前显老以外，姚洪昌的精神气质和年轻时没有多少变化。他觉得自己已经脱根了，对故乡不再眷恋，打算一辈子留在铜川了。我希望拍一下他年轻时的照片。他说当年的老照片都没有保存，连同支援大西北时发的光荣证，都一起扔掉了。

透过他家西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面紧靠着山坡的三层楼，我家原来老房子的窗户也清晰可见。二层窑洞的烟囱里已经冒起炊烟，是到做饭的时候了。还有不少三里洞的老矿工以及他们的子女，依然住在那些已经报废的房子里。

## 风云人物葛登发

葛登发是一个给我小时候留下深刻印象的英雄式人物，在文革期间他赤裸着上身敲大鼓的威风形象始终记得。他的样板戏剪纸和快板演出在铜川矿区也相当有名，是当时三里洞煤矿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他妻子刘梅娣一直是北公房地区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平时也总是十分忙碌。后来我从北公房搬走以后，就很少再见到他们。

很多年过去了，葛登发仍然住在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里，那也是三层楼，和我们家原来住的公房相接。我们一直叫中间水管那边，是因为他们家门前不远处有个公用水龙头的缘故。

那时自己家里没有水管，每天大家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到家属区的公共水管前排队接水。

来到五里铺北公房，穿过三层楼中间一孔石头砌成的门洞，就来到了葛登发住的那排公房。两边的房子已破旧不堪，中间的行人过道也十分狭窄。葛登发正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晒太阳，见我和他打招呼，就站了起来。我说您还认识我吗？他说“你不是老朱家的孩子嘛。”尽管多年未见，葛登发还是一眼把我认了出来。只是他耳朵听力很差，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声喊，他才能够勉强听见，但还是常常听错。他戴上了助听器，也还是不行。我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明白了我的想法。毕竟年龄不饶人，葛登发虽然个子高大，站在那里也有点颤颤巍巍。但一谈起煤矿的事情，马上就显得精神起来，他讲到了当年多次冒着危险到井下救人的经历，眼神中闪着光，可以感受到年轻时的那股豪气。我没有要求他变动任何的方位，只是顺手把摄像机架在他前面的过道上，记录下他的讲述。也可以看到他身后自己搭建的小屋顶上，摆放着用破旧洗脸盆种的一盆盆花。正当葛登发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昔日荣耀的煤矿经历时，他的妻子刘梅娣带着儿子葛龙以及女儿、女婿从街上回来了。拍摄仍然在进行，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插话，一说到这些老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矿工们即没钱买房子，也没有地方可去时，现场的气氛马上变得凝重起来。过去的理想主义热情一下子撞到了当下坚硬冰冷的现实。葛登发十分无奈地坐在那里叹气。刘梅娣讲着老矿工的焦虑和窘境。葛登发叹了口气说：“过一天，算一天。”他的儿子葛龙则说起在上海打工时看到的令人羡慕的上海人生活。说“要是父亲当年不来的话，一定比现在过得好。”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十分无奈。三个人说着各自的心事和想法，你一言，我一语，像三个相互交叉的不同声部。葛登发此时摘下了头上的遮阳帽，露出满头的白发，表情也更加悲哀。他的女婿始终没有插话，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边。我一扭头认出来了，那是我的同学谢新红。他父亲谢继贤也是1955年从上海来的，退休以后回南方去了。谢新红在三里洞煤矿下了一段时间井，后来就离开了煤矿，去给别人开车。他的外貌和中学阶段相比变化太大，不仅面容沧桑，头顶上的毛发也已十分稀疏，以致站在旁边很久我都没有认出来。后来凤凰卫视做专题《黑色的父亲》时，也采访了葛登发。节目播出的时，铜川地区把凤凰卫视的电视信号整个掐了，当地的观众都没能看到。后来很多人是在互联网上看的。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刘梅娣阿姨，问她那期电视节目看了吗，她说“孩子们在网上看了，我们没看。”三里洞煤矿的拆迁户，后来大部分安置到了铜川新区的裕丰园小区。我在那里遇到了葛登发的儿子葛龙，他已经搬到了新区居住。我问你父亲搬下来了吗。他说没有，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2012年秋天，听人说那片公房的住户基本上都搬走了，只剩下3户人家无处可去，其中就有葛登发。

## 他不善言谈

顺着葛登发家那一排公房继续往南走，就到了四层楼。张百生住在四层楼最下面的一层窑洞里。他平时笑眯眯的，像大部分的老矿工一样，穿着十分朴素，模样也显得忠厚木讷。他不善言谈，我去采访的那天，他正好感冒，所以讲的不多。他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这两天感冒了，一般说起来，思想上也蛮愉快的。”其心态已十分淡泊和平静。后来有人告诉我，张百生是我们同学张爱萍的父亲，他的房子已经拆掉，搬到了别处。

## 副矿长陆荣初

在见到陆荣初之前，我一直对这个当过多年三里洞煤矿副矿长，老矿工也经常提到的人物有着一种好奇心。但是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又能够给我讲些什么，我还是无法想象。鉴于多年来对地方官僚的认识，我并没有太高的期待，但还是要去找他，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回应。

我和菊芳一起来到三里洞煤矿矿部，除了那些郁郁葱葱的大树，周边的环境和过去相比，变化真的是非常之大。矿部大门口上方的三里洞煤矿几个大字有的已经歪斜了，到处是破败凋零的景象，显得十分荒凉。进到矿部里面向别人打听陆荣初的住处，那人指着西面的一条小巷说：“他住的是自己盖的房子，你们顺着这里进去，再一直向北走，到前面你们再问。”既然是自己盖的房子，那一定比一般的单元房好吧，我心里一边想着，和菊芳一起顺着小巷向北走去。一边走一边问，顺着小路不断地向左向右，穿过了一大片破旧的矿工住宅区，仍然没有到陆荣初住的地方。我再次问路的时候，一个老工人模样的人说：“我带你们去。”我俩就跟着他继续向北走，来到一片更加破败不堪的棚户区。他说“你们就顺着这条小路进去，最里面的那个门就是。”我们向他道谢之后，就径直走过去，可我心里还是有点迷惑，难道矿长就住在这样破烂的地方吗？到了门口敲门，门虚掩着，应声出来的老太太是陆荣初的老伴，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告诉她我是朱永生的儿子，她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室内。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很小的院落，三间砖混结构的平房不是很高，院子里到处堆放着各种杂物，中间种着一些花。除了那个铁门显得稍微宽大外，看不到什么不同的地方。屋内收拾的很干净，但狭小的空间依然显得拥挤。过一会陆荣初回来了，是一个十分清瘦精干的老头，个子不高，衣着也非常简朴。我说明了来意。他问“你关心这些干啥？”我说我是矿工的儿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希望能够将你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记录下来，正在一个一个寻找和拍摄。他说“其他人已经给你讲过了呀。”我说每个人讲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是矿长，对煤矿的整个情况应该更加熟悉。陆荣初性格沉稳不张扬，其很强的行为自律和朴实的性格，在矿工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那么大年纪了，记忆力依然很好，讲了很多煤矿的事情。他多年来一直住在这个自己盖的小院子里，矿上几次分给他的单元房，都让给别人住了。两年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把纪录片《三里洞》做完了，《南方周末》上刊登的报道也有人拿给他看，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后来听说，他住的那一片棚户区也拆迁了，不知他现在搬到哪里去了。

## 被遮蔽的记忆

周寿根住的离张百生家不远，中间只隔了几个门，但是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张百生忠厚木讷，周寿根则开朗健谈。他从井下电工、机电师一直做到了劳资科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物。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一只手缺了一截手指，那是在矿上的一次事故中失掉的。他的老伴始终没有插话，只是静静地和小孙女待在窗外。

当周寿根说到“一个人的家庭，说不好听的话，前半辈子好过，到后半辈子真……”他说不下去了，那种难言的表情和痛苦的眼神令人难忘。后来问起他子女的状况，他只是简单地说一个在公安局的儿子病故了，大儿子下岗后在外地打工，小儿子还没有结婚。

很久以后，我才偶然得知他那个在公安局的儿子，并不是因病去世，而是妻子红杏出墙后，他自己举枪自尽的。我感到十分惊愕。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我无法向他求证。一次遇到和他十分熟悉的一位退休干部，不仅向我证实了此事，还接着告诉我，周寿根的大儿媳也是自尽的。我这时才明白了周寿根那无奈表情下掩盖的深深痛苦。我们拍摄下来的很多东西，只是事情的面相，而更加残酷的事实和真相，则始终隐藏在晦暗的深处，即无法穿透，也无

法触摸。

后来拍纪录片《同学》的时候，遇到了三里洞煤矿破产失业以后，到北公房地区拆迁办打工的同学段长有。无意中聊到了周寿根，他说周寿根住在老房子里一直不愿意搬，扛到最后扛不住，还是搬走了。我问周寿根现在住那里？段长有说不知道。

## 在芳草堤小区

在采访陆荣初的时候，我希望他谈谈我父亲的情况。他说没有在一起工作过，具体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他推荐我去找当时的通风区长王俊彦，说也是一起从上海来的，就住在三里洞煤矿南边的芳草堤小区，到那里一问就知道了。说到王俊彦，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和工友们一起在家里喝酒聊天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一个名字。在南方话里，王和黄同音，所以我当时听成了“黄金叶”，这是一个香烟牌子，心想怎么还有人叫这个名字，觉得怪怪的。现在我才明白，父亲当时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王俊彦。

沿着漆水河的柳堤，我和菊芳来到芳草堤小区。一见到王俊彦，他说已经知道我要来。因为我去拍陆荣初那天，陆荣初妻子在桥头买菜的时候碰见他，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了。王俊彦的老伴已经去世，现在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身板依然硬朗。没有想到他当年是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民兵队长，应该算老革命了，最后竟阴差阳错地来到了三里洞煤矿下井。

王俊彦给我讲述的一次大冒顶经历刚好陆荣初也讲过，那次事故他们都在现场。两人不同角度的叙述是一个互证。

他告诉我，院子里还有一个一起从上海来的矿工，已经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平时也没有来往。王俊彦说了具体地址，我自己去找。敲开门以后，那个男人站在门口，并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只是问我有什么事。我简单地说明来意，他还想说些什么，他妻子从里屋跑出来，一把拽住把他拉进了室内。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把门“砰”一声关上了。我再敲门和喊话，始终不开门也没有回应。尽管这种不由分说的拒绝显得不近情理，我也只好无奈地离去。始终我都没有搞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决绝地把一个来访者关在门外，这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个迷。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矿工的名字叫鲍忠祥，他的女儿也曾是我的同班同学。

## 剪不断的乡愁

2005年的时候，与父亲一同从上海来的老矿工，住在三里洞矿部附近的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陆荣初，另一个是罗世俊。罗世俊是三里洞煤矿多年的劳模和标兵，就住在矿部的标兵楼上，寻找他比找陆荣初容易的多。

见到罗世俊以后感觉有点面熟，一时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老伴有病刚出院不久，他一天到晚在家陪护。

就在罗世俊给我讲述的过程中，他的妻子过来告诉他说要吃油条，她因为有病，说话不清楚。我也是在反复观看素材的过程中才听明白她讲的意思。罗世俊耳朵很背，听不清她讲些什么。他以为妻子要吃鸡蛋，就说你自己去吃吧。

老伴转身走了，罗世俊继续给我讲述在煤矿的经历，过了一会他好像想起什么，停下



来去看看妻子是否在屋里，到卧室和其他房间没见着妻子，他马上慌了，说妻子跑了，一跑可能就不回来了。他立即穿起外套出门寻找。我也赶忙背起三脚架和摄影包，拿着摄像机跟拍寻找的过程。到楼下一面向邻居打听，一面沿路找出去。终于在公路边卖油条摊上发现妻子正坐在那儿吃油条时，罗世俊才松了一口气。他站在路边等着，一脸的无奈和茫然。路上的汽车来来往往，不时发出刺耳的噪音。等妻子吃完，他搀扶着她，慢慢地往回走，很艰难地爬上一阶又一阶楼梯。

回到家中，罗世俊的讲述继续，讲到老伴跟着自己从上海来到这里也受了苦的时候，触动了妻子的伤心之处，她满腹委屈地大哭起来。罗世俊说老伴有病以后，一不小心就自己跑了，有时一个人就跑回上海了。我非常吃惊地问，你一个人可以回到上海？她点点头说，嗯。然后她又说了一段话，听不清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以为只是一段胡言乱语，并没有十分在意。直到我在剪辑时反复重放视频，才大致听清了她说出的话，令我感到极为震惊。原来她讲的是自己丢了火车票以后，如何一个人坐上火车回到上海的事情。一个身患严重疾病、行走不便、又存在着语言表达障碍的人，需要怎样的一种坚持和毅力，才能一个人度过三天两夜和漫长的 1000 多公里行程，抵达遥远的故乡。

在《三里洞》这部以口述为主的影片中，罗世俊老伴这段意外的插曲，是片中重要的跟拍段落。这个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也十分困难的老人，却对过去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曾经的美女不仅及时纠正了罗世俊讲述中对他俩结婚时间的记忆错误，也竟然知道我家原来是住在北公房的三层楼上。而我对她以前的情况却没有任何印象。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在楼下的公共水管前排队接水的情景，很多人拿着水桶围在水管前拥挤着抢水，罗世俊拿着扁担和水桶，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等待，一脸斯文的样子。他那时年轻，四方大脸，住在我家楼下的一层窑洞里。

再次见到罗世俊已经是两年以后了，在三里洞煤矿附近的老年活动室，他和其他退休矿工在一起打麻将，老伴坐在他身边静静地看着，依然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

前一阵听说，罗世俊的妻子已经去世了，罗世俊还依然健在。

## 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

倪进祥和顾龙祥、沈龙根都住在同一栋楼上，只是不在一个单元，我去了几次，倪进祥家里一直没有人。我隔了几天再去的时候，恰好他在家。一进门，室内的陈设和顾龙祥、沈龙根家相比明显要好很多。他的子女在社会上属于混的比较好的一类人，家里的经济条件自然不一样。

此时倪进祥的神情十分疲惫。他说昨天晚上刚犯了一场病，心脏不大好，也不能用脑子。他应该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可惜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只是勉强地断断续续说了一些。我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好久留，就连声道歉着告辞了。

## 那是他不愿触及的伤痛

直到前不久，菊芳在老区遇到了丁福珍的女儿，才知道丁福珍也已经去世了。七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精神状态看着还可以。丁福珍是我同学丁家宝的父亲，丁家宝小时候就十分顽皮，一直属于不爱学习的所谓坏孩子。同学叶文娟说，高中毕业后的一天，她在大同桥附

近的道路上，见到派出所的人将丁家宝双手铐在马路边一棵树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围过去观看。火辣辣的太阳下，丁家宝晒得满头是汗，尽管十分干渴也无人理会。叶文娟从那儿走过，看着他可怜，就买了水送过去，因为他双手都铐在树上，她只好喂他喝。我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见过丁家宝，后来听说 1983 年严打的时候，他因为盗窃电缆被枪毙了。

在北公房下面光线昏暗的一层窑洞里，丁福珍坐在一张旧沙发上，给我讲述着他在三里洞煤矿井下的种种工作经历。最后我问他子女的近况，他一个个说过来，没有提到丁家宝。那是他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伤痛。我也没有追问。对有些事情，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 在十里铺

在三里洞煤矿的周边来来回回拍了十来个人之后，已经没有什么人可拍了。剩下的不是已经去世了，就是找不到人。听说十里铺那边还有一些，我就开始往南面寻找。

当年上海来的这批矿工中，和陆荣初一样也担任过三里洞煤矿副矿长的，还有一个江兴怀。我按着老矿工告诉我的大致地址，一路问着，在供应处附近的一栋家属楼上找到了他。江兴怀已经 80 多岁了，个子瘦瘦高高的。尽管年事已高，精神却依然很好，言语中不时带出一些那个特定年代的豪言壮语，一看就是那种当过多年干部的习惯语气。或许有着自己的顾虑和谨慎，他不愿多说，讲话时也很有分寸。然后十分礼貌地将我送出门。当得知我还要去找供应处王福坤的时候，他热情地把我领到了王福坤住的楼下，告诉我是哪一家后，就自己回去了。

王福坤老两口待人非常热情，过去和我父亲也比较熟悉。他的个人经历比较丰富，换过较多工作岗位，到供应处以后主要是做采购。他告诉我蓝公房还有一个缪德新，也是一起来的。

我沿着川口的大坡，来到了蓝公房，这里我以前从未来过，问了几个人之后，在老年活动室见到了正在打麻将的缪德新。缪德新说：“没啥意思，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了。”他离开三里洞煤矿以后，先后调到桃园煤矿和陈家山煤矿下井，由于得了职业病，48 岁就退休了。

后来在小河沟的一栋单元楼里找到了以前住在南公房的成妙祥，成妙祥是我同学成荣妹的父亲。后来拍纪录片《同学》时，已经当了大学副教授的成荣妹也成为影片中的一个人物。

## 寻找童伉

在拍摄《三里洞》的过程中，我一直想找一份 1955 年从上海支援到三里洞煤矿的矿工名单，几个老矿工向我提到了一个名叫童伉的人物，说他是当年的领队，找到他，很多详细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此人已经 80 多岁，据说还健在，就住在红旗街菜市场后面的山上。他有一个女儿在骨科医院，可以去那里问他的具体住址。

又是一个周末，我一大早来到川口附近的骨科医院，医院里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人。向一个值班的护士打听童伉的女儿，她说医院里没有这样一个人。我心想还是直接去找吧，就来到红旗街市场后面的山坡下，向附近的居民打听，说有一个 80 多岁姓童的老矿工，是上海人，就在这儿附近的山坡上居住。大家都摇摇头说不认识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前前后后找了很久，始终也没有打听到童伉的情况。实在没有办法了，到市场上去问问吧，或许会有人知道。就向路边钉鞋和做小生意的商贩打听，他们几乎天天在这里摆摊，但也没有人知道。

只要童仇确实在这一带居住，总会遇到认识他的人。我不断地向周围的路人继续打听。后来终于问到一老者，他说印象中有这么一个人，个子高高的，经常可以在市场上见到。好像是住在山坡的上面，具体在什么位置他也不清楚。这时身后一个人问我，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童仇。他说：“你跟我走吧，我是他原来区队的书记”。我跟着他，顺着很陡的大坡，一直向山上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很纳闷，童仇已经 80 多岁了，这么陡的坡可以爬上去吗？心里正想着，就听那人冲着路边大声喊道：“童仇，出来”。那口气俨然还是一副领导的架势，语气也十分生硬。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了路边一排已经非常破旧的平房，这时童仇已经从屋里出来了。我告诉他我是朱永生的儿子，在找 1955 年从上海支援大西北来到三里洞煤矿的那批矿工，想把他们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童仇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的情况比较特殊。”随后童仇的讲述向我打开了生活中匪夷所思的一面，这些十分荒诞离奇的故事就在身边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着，他波澜起伏的一生经历就像是一个传奇。童仇 1955 年来铜川时已经 30 多岁了，是一个社会阅历非常丰富又极其复杂的人。1949 年以后，他主动表现出一种十分积极的姿态，更多是试图回避随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政治风险。尽管他处处谨小慎微，努力表现，却最终也没有躲过那场劫难。就在童仇十分平静地讲述着自己被关进监狱的那一段经历时，远处隐约传来的一阵阵部队操练声，成为其讲述的底色。尽管时间和空间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我仔细看这段视频时依旧感到毛骨悚然，仿佛那一刻就发生在当下。童仇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人物，他的出现完全打破了我之前对这部影片的预期。生活总是比我们主观想象要复杂丰富的多，我曾一度犹豫着是否应该将他放进这部主要讲述矿工的影片中，后来我意识到，我们没有权利对生活进行阉割，任何武断和居高临下的审视都会使你记录下来的影像显得可疑。这个一辈子经历了诸多坎坷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记忆力很好，一些数字和日期记得十分精确，自己的一些原始资料和证明材料也都完好保存着。在他向我讲述的过程中，他的老伴始终默默地做着家务，不发一言。

找到童仇，是这次拍摄的一个意外收获，他的出现使影片具有了更加宽阔的社会视野和维度。我意识到，在一个大时代的变革过程中，一个个体生命，不管你如何用尽心机，依然会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也无法完全掌控和左右自己的命运。

## 一个侥幸的人

相对于童仇大起大落的个人遭遇，高章顺的经历就显得平凡和波澜不惊。他是我同学高金康的父亲。原来住在北公房四层楼那边的三层窑洞里。去找他的时候，他家早已搬走，问周围的邻居，他们也说不清楚。后来想到高金康的岳父住在葛登发家下面的二层窑洞里，就先去找他，然后打听到了高章顺现在的住址。到了河东公房，很快就找到了高章顺。恰巧高金康也在，他离开三里洞煤矿以后，一直在上海打工，由于最近没活干，又回到了铜川。高章顺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小食堂，为旁边矿务局四中的学生提供饮食。一到放学的时候，学生们就三三两两地进来了，一家老老少少也都开始忙碌起来。

高章顺已退休多年，虽然面相在变老，但给人的感觉和精神气质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说话时依然思维敏捷，语速很快。他说自己是一个侥幸的人，在三里洞煤矿下了十多年井，竟然没有受过一次伤。

## 陈义祥

陈义祥和父亲朱永生是多年的老朋友，父亲在世时，他经常到家里和父亲一起喝酒聊天。他的一个儿子和我弟弟是同学。陈义祥过去住在南公房，后来就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告诉我他住在七里铺的虎头山上，顺着小河沟口的那条路一直上到半山腰，问了几个人之后，就找到了陈义祥家。老伴说他在山顶上的麻将馆打牌，一时半会也回不来。我又顺着山坡继续向上走了有几百米的样子，看到路边有好几家麻将馆，就一家一家挨着寻找。陈义祥正和几个老工人围着麻将桌玩的起劲。和陈义祥打过招呼，我大致说了来意。他正玩在兴头上停不下来，于是就和他另外约了时间。

第二天早上再次来到陈义祥家的时候，他和家人正在吃早餐。我拿出摄像机先拍了一些室内外场景。饭后坐下，陈义祥从容地给我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从上海讲到铜川，从过去讲到现在，他的口才和记忆力都非常好，很多细节也记得十分清楚。由于后来他调到了矿务局生产处，所以对铜川地区的整个煤炭建设和生产情况也十分了解。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眼看着又要到打麻将的时间了，马上就此打住。我希望他找一些青年时代的照片。他说只剩下一张了，还在镜框里。取出拍过以后，他又重新装好。陈义祥已经不再有什么想法，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每天就是打打麻将，转转玩玩。他们这批人来到铜川已经 50 年了，他和陆荣初、王俊彦等想搞个聚会纪念一下。我当时说如果你们聚会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来把整个的纪念活动拍摄下来。后来也一直没有消息。

## 工程处

住在三里洞附近的老矿工，能找的都已经想方设法找了。还有一部分人来到铜川以后，培训还没有结束，就被抽出来分到了矿务局工程处（当时叫支架厂）。这些人和留在矿上的人联系不多。我试着到小河沟里面的工程处家属区寻找，找到了仅剩的几位。当年从矿上调到工程处以后，他们继续从事着自己的老本行——泥瓦工，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也平平淡淡。虽然有一些不如意和抱怨，但和矿工相比已经好多了。张电飞因为后来提拔当了干部，孩子反而没能接成班。叶永康和儿子都沉默着，几乎不说话。朱阿宝生活得比较纠结，自己住一间很小的房子，两个儿子还都争着想要。找到单元楼后面毛老福住的那间小平房，他没有在家。忽然间天空乌云翻滚着下起雨来。我就往回走，已经到了路口，看到后面一个老人气喘嘘嘘地冒雨赶过来，那是毛老福。由于跑了几步，他不住地咳嗽，说话非常吃力。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了，现在一个人独自生活。

## 109 个名字

拍完工程处的几个人之后，我又在五里铺的老火车站附近找到了陈长寿，拍下他的讲述。他在井下干了几年以后就调到了地面上，后来主要从事煤炭营销工作。

还有一个叶佩昌，名字很早就听说过，几个老矿工告诉我说他在南公房住。这时南公房已经开始拆迁，姐夫张金龙家原来住过的那栋二层楼房还在，大部分房间已经搬空，过道里到处堆放着垃圾和杂物，只有个别房间还有人居住。我反复向周围的住户打听叶佩昌，大家都摇摇头说不认识。后来有人说叶佩昌已经回老家了，也有人说又回来了。尽管前前后后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始终也没有得到叶佩昌的确切消息和地址。后来拍摄纪录片《同学》

时，找到了她女儿叶文娟。我这时才想起小时候去南公房姑姑家的时候，也会到邻居叶文娟家玩。她的母亲个子不高，胖胖的，笑起来有点像“小铃铛”。她父亲我或许见过，可是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叶佩昌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回到上海，住在崇明岛上靠近海边的村子里，现在老两口都去世了。

陆根福在《三里洞》开拍的不久前已经去世，我见到了他妻子和儿子陆平，他两个儿子陆平和陆斌是一对双胞胎，都是我们的同学。记得上中学时，这兄弟俩还十分活跃，因为长得太像，有时也容易搞错。现在再次见到的陆平，已经是一个沉默的中年汉子。他很早就离开了煤矿，到处做生意，后来亏本了，又到神木的矿上去打工。陆根福妻子拿出一些年轻时在上海的老照片，她那时长得很漂亮，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和眼前这位慈祥瘦弱的老太太判若两人。2011年我拍纪录片《传道人》的时候，在新区教堂的复活节聚会上再次遇到她，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逸着，精神状态很好。她过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一瞬间竟然没能认出来。她和菊珍姨一样，现在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也许是信仰融入到心灵的缘故，其面容显得安详、平静和喜乐。

北公房的二层窑洞里原来住着一个张林根，他儿子张德勇也是我的同学，听说高中毕业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山里承包土地开荒，以后就没有再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张林根在三里洞煤矿退休后，总是跨个菜篮子逢会赶集到处卖鸡蛋，蹲在市场中的人群中，像地道的关中老农那样和买主讨价还价。以前偶尔还会碰到，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还有一个毛阿龙，原来住在北公房下面的平房里，房子拆迁后，据说在北关临时租了一间小房子，后来也没能见到。

当年随着王石凹、桃园、王家河、东坡、鸭口、金华山等新矿井的建成投产，一部分上海来的矿工陆续从三里洞煤矿调到了其他煤矿；也有的跑回了南方；还有一部分人开始就分到了矿务局工程处继续从事建筑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从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一直试图寻找当时他们那批人的名单，却始终没有找到。通过采访和回忆，大多数矿工认为，1955年12月从上海支援大西北来到三里洞煤矿的一共是318人，我现在能找到的只有20来人，通过矿工的讲述和回忆知道了107人的部分情况或名字。其他的211人继续消失在黑暗中，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信息。

直到2014年的3月，一个意外的机会，认识了也是同一批从上海来的矿工后代丁煜勤，才知道了他的父亲和另外一个矿工的名字。

## 从黑暗中拉回的记忆

戚国其是自己从黑暗中冒出来的。我很早就听说过三里洞煤矿在投产不久发生了一起绞车断绳事故，机斗掉到井底把一个矿工砸死了，但并不清楚详细的情况。在《三里洞》拍摄过程中，由于老矿工从不同角度的讲述，才使这个故事一点一点完整地浮出水面。后来我将这些讲述和回忆编辑在一起，成为纪录片《三里洞》的第一个人物戚国其。也是刘梅娣阿姨的一句话，才知道我们家住的就是戚国其当年住过的房子。也想起了我小时候从奶奶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奶奶说，我们原来是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后来戚国其走了，我们才搬到了下面的公房住。三里洞煤矿是1957年7月1日投产的，不久就发生了戚国其死亡事故。但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矿工们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这是三里洞煤矿投产后不久发生的第一起死亡事故。2012年我在网上看到二月羊在博客中这样写到：

《三里洞》里提到的戚国其，我也听母亲讲过，可见他确实是当时三里洞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他遇难的时间，母亲讲的和《三里洞》里讲的不一致。母亲说是7月7号。因为

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三里洞矿一九五七年七月七号砸死一个戚（七）国其（七），这么多“七”撞在一起，大家觉得有点“邪”。<sup>3</sup>

这个网友的文字是我目前看到和听到的关于这个事故发生日期的一种比较确切的说法。

## 我的父亲朱永生

纪录片《三里洞》里面有两个人物是已故者，一个是三里洞煤矿投产后第一个死亡的矿工戚国其。另外一个就是片尾最后一个人物我的父亲朱永生。父亲 1986 年就已经去世了，我试图通过对他工友们的采访来还原父亲的形象。所以遇到和父亲熟悉的老矿工，就会请他讲讲我的父亲。像顾龙祥、葛登发、姚洪昌、王正祥等均提供了自己的回忆，也让我了解到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一直想找一个对父亲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在通风区和父亲一起共事时间最长的朱岳如已经去世了。我想起了原来也一直在通风区的裘水标，他是浙江人，比父亲他们那一批来的晚一些，父亲当年是他的师傅。记得我小的时候，他每次从南方探亲归来，总会带些红薯干做成的平行四边形小点心片，脆脆的很好吃。他还在三里洞煤矿的山上自己养过蜜蜂。后来他当了通风区的班长。父亲去世的时候，欠了矿上 500 元钱，矿上曾经派他来要帐，当时家里十分困难。我说你们用我们子女的名义向矿上申请点补助，把这笔钱还上吧。后来他走了，没有再来。20 年过去了，不知他是否还在铜川。采访王俊彦的时候，他告诉我，裘水标就住在三里洞矿旁边的山坡上。

我和菊芳顺着三里洞矿部的小路，向东绕过选煤楼，来到了山坡旁。这里是矿上的棚户区，到处都住着三里洞煤矿的职工家属。

裘水标老了很多，他说了没几句，就提起当年矿上派他去找我要账的事情，说后来向矿上申请了补助，将那笔欠款给补上了。我问，父亲当年在矿上受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井下冒顶把父亲的脚砸住了。我静静地听着他的叙述，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面对着昔日工友的儿子，他不想伤害我的感情，尽力编造着一种善意的谎言。实际上，那次事故的情况我是知道的，父亲每天上班要在井下跑几十里路，出事的那天，或许是因为太累走不动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父亲，第一次扒矿车脚就被压伤了，后来还受了处分。

我和菊芳离开的时候，裘水标拿了一大块他煮好的肉送我，我再三推辞，他始终坚持着一定要给，不忍心拒绝、也无法拒绝他的一片诚意。我们已经走出去很远，回过头看到裘水标还在路边站着。

采访完这些三里洞煤矿的老矿工，带给我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我一开始也决然没有想到，纪录片《三里洞》的拍摄和矿工们十分平静地讲述和回忆，对我来说会变得如此沉重。

## 煤矿的痕迹

拍完 1955 年从上海支援到铜川三里洞煤矿的老矿工，接下来拍摄煤矿的场景和废墟。和矿工的口述一样，这些已经破产的煤矿遗迹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三里洞煤矿已经破产 5

<sup>3</sup>引文见：老高老高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416749405>

年了，矿井后来被个人买了下来，还在继续生产。来到曾经熟悉的三里洞煤矿矿部，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当年那些热闹繁忙的车间、矿车、轨道，此时已显得沉寂。来到入井口，随着叮当的铃声，陆续有人在上下罐。我把摄像机架在这个小时候多次来过的地方，已经不再有当年那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场面。矿上的保安一直在后面跟着我，问我拍这些干什么。我告诉他，我父亲以前是这个煤矿的工人，已经去世很久了，我拍点东西纪念他。“噢，纪念父亲，可以的。”他说着就走开了。我把摄像机架在那里，拍下了纪录片《三里洞》开头矿工下井的长镜头。接着来到绞车房，房子内部和绞车都还是老样子，和我小时候的记忆没有多大差别。可是顾龙祥、姚洪昌他们那一代绞车司机都早已退休了，现在开绞车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从绞车房出来，继续拍摄周边的环境。选煤楼的门锁着，无法进入楼内。这时菊芳在矿上工作的一个同学刚好从旁边走过，他帮忙去找钥匙，不一会儿就过来把选煤楼下面的那个小铁门打开了。他把锁挂在门上，说你们出来，直接把门锁上就可以了。我和菊芳进到选煤楼内部，里面四壁黝黑，周围的窗户玻璃都没有了，待在空阔的楼内，明显感觉到潮湿和阴冷。透过墙角的一处缺口，可以看到选煤楼外三四个孩子在阳光下玩耍，远处铁道口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人颠簸着越过铁路，转眼就看不见了。选煤楼内的屋顶上不断有水滴滴啪哒的滴下来，在地上的一片水洼中划出一圈圈涟漪。我们沿着铁板焊成的转角楼梯，一层层爬上去，脚步声带着浑浊的金属共鸣在空气中回荡，淹没了轻微的滴水声并扬起一些煤尘。到了楼上，可以看到墙面上残留的“高高兴兴上班，安安全全回家”宣传标语，只是大红色的油漆由于风化和长时间煤尘覆盖，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像是凝固的血迹。四处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煤灰，运煤皮带槽一直延伸着，穿过两楼之间相连的通道。小妹招工后，一开始在这座选煤楼上上班，不久遇上了下岗，三里洞煤矿破产以后就被买断工龄失业了。在选煤楼和入井口之间的空地上，一个锈迹斑斑已经废弃的机斗静静地卧在那里，四周地面上的无名小草，依然不停地从地面钻出来，给黑色的矿区路面增添了一点绿色。后来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到三里洞煤矿看了以后说，在现场的感觉和看影片不大一样。影片是黑白的，而在现场，黑色废弃的建筑物和周围郁郁葱葱的绿色树木呼应着，有一种当代的感觉。那是一种艺术家的审美眼光。从选煤楼绕过去，就来到了矿部后面的石研山，几十年从井下源源不断挖出的大量煤矸石，已经堆成了一座高山。大面积的石研反射着强烈的阳光，显得十分刺眼。姚洪昌讲述的那个被石研山掩埋了坟头的矿工陶明祥，永远被埋在石研山下，无人知晓。从石研山下来，再次来到井口，一个矿工悄悄地告诉我，刚走过去那个人是现在矿上的经理。我赶忙追上去，问是否可以把过去的充电房打开让我拍摄。他说“那已经废弃了，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你拍现在的充电房就可以。”我想拍过去那个年代的遗迹，哪怕只是一个空间。他说“你去找办公室的人给你开吧。”走进早已废弃的充电房，地上到处是厚厚的尘土和杂物，顶上的天花板歪斜着耷拉下来。矿灯没有了，只剩下一排排灯架矗立着，还可以让人联想到三里洞煤矿鼎盛时期的壮观场面。开门的女工无意中說前两天井下又死了两个矿工。问她具体情况，她看到我把摄像机转向她，就停住了，说这个事情矿上不让说。充电房外面的过道是矿工们每天上下井的必经通道，没有人经过的时候，完全是漆黑一片，墙上间隔排列的交矿灯小窗口透着微弱的光，像是黑暗中矿工凝视的眼睛。略微有一点响动，过道的灯便一下子全亮起来。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斑驳墙面上的各种宣传标语。过一会灯自动灭了，过道又重新变回黑暗。顺着过道向里走，找到了现在的更衣房，依然是编着号码的一排排更衣柜，只是数量比以前少多了，完全没有当年那种密集排列的阵势。从空气污浊气氛压抑的老楼内出来，看到大门上方悬挂着“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传横幅，再往上一个由两把铁锤交叉像汉字“父”一样的煤矿徽志浮雕，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依然镶嵌在大楼墙面顶部的正中间。

拍完三里洞煤矿，再次来到五里铺北公房的家属区。这个地方49年以前是同官煤矿的矿部，55年以后是铜川矿务局所在地，再后来则成为三里洞矿工和家属的住宅区。这些50

年前的老房子已经报废，矿上也不再收取房租，但里面依然住着矿工和他们的后代。我家原来的房子，现在是邻居唐妮住着。我说可以进去看看吗？她把我让入室内。进屋的瞬间忽然有点不适应，这间小时候感觉蛮大的房子，此时竟显得这样狭小逼仄。我走到窗前，窗外的景物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感觉了。

从屋里出来，沿着山边那条走过无数次的蜿蜒小路，来到山上小时候常来的大麻子地，遍地的狗尾巴草和喇叭花依然茂盛地生长着。这里属于前原村，文革期间这一带曾经发生过武斗，一些矿工在这里丢了性命。太阳快要落山了，宽阔的大麻子地正中间，一个像碉堡一样粗壮的水泥柱依旧耸立着，是地下防空洞的通气孔。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留下的痕迹。当年家家户户轮流着费了好大劲才挖好的防空洞，现在完全废弃了，而我们要时刻提防的苏修也早已土崩瓦解。

我将架在山上的摄像机镜头推上去，近距离跟拍地上爬行的一只蚂蚁，然后将镜头缓慢地摇起，可以看到远处三里洞煤矿高高耸立的选煤楼。少年时代我和小伙伴们就常常站在这里眺望远处的三里洞矿区。镜头没有停下来，还在慢慢地继续向上摇，地平线渐渐下沉到画外，在选煤楼附近拍摄时落到镜头上的煤灰黑点，此时十分清楚地凸现在满是天空的画面

上。拍完三里洞煤矿的大远景，沿原路下山，向南经过中间水管来到了四层楼。这里地势较高，可以看见漆水河对岸山上的青年路教堂。我当时拍下的那个模糊晃动的远景，后来影片中没有用。四层楼下面的那排窑洞里住着周寿根、张百生还有我始终没有见到的林冲其。我在紧挨着四层楼的南公房拍摄，有个中年男人以为我是记者，不断向我述说着矿工的生存困境

三里洞煤矿和史家河煤矿在文革期间曾合并在一起叫红旗矿。那时矿务局的大部分煤矿也都重新起了比较革命的新名字，如反帝矿、反修矿、东方红矿等等。父亲他们来到铜川以后，最初是在史家河矿学习培训，所以我和菊芳又前往史家河煤矿寻找当年的遗迹。史家河矿比三里洞矿停产更早，此时已完全报废了。我们顺着两山之间的大路一直走进去，却始终没有看到井口。我小时候来过多次，应该就在附近。向人一打听，原来已经走过了。于是又拐回来，边走边问，一个老工人指着路边高高的围墙说，就在这墙里面。进去一看，遍地是一米多高的野草，开着一片片的黄色小花，废弃的井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井口也已经被盖住了。王正祥说这里的井下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烧死了几十个矿工和大学生。周围荒草中一排排平房，门都敞开着，空荡荡没有一丝生气。父亲他们当年培训时上下井的一对铁罐笼，早已锈迹斑斑，只剩下骨架在寂静中矗立着。从史家河煤矿出来，看到原来运煤的小矿车轨道已经拆除，五里铺火车站的转运煤台也没有了。

我想到了市区另外两个已经破产的煤矿。桃园矿和王家河矿的投产时间都晚于三里洞煤矿，和三里洞矿、王家河矿等立井不同，桃园煤矿属于平硐，地点就在十里铺的宜古村附近。到那儿一看，井口就像一孔很大的窑洞，已经完全用石块封闭了。旁边两层楼上几个废弃的浴池还在，楼内散发出一股腐烂难闻的气味。

从桃园煤矿出来，顺着铁路走到川口后，再向王家河方向走了大约几里路，觉得应该到王家河煤矿了，就向附近的人打听王家河煤矿的井口在什么地方，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我等了一会，看见一个退休工人模样的人走过，就赶忙上前去打听。他说王家河煤矿就在这里。我问井口在哪儿？他说就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填上了。我看到不远处他手指的地方，现在矗立着一座新建的水泥厂。我非常震惊。1984年12月，王家河煤矿因资源枯竭停产下马。短短20年时间，这座曾经喧嚣沸腾的煤矿已经被从这座城市中彻底抹去，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一种个人的视角来记录和保留下这段历史和记忆。纪录片《三里洞》完成后，我在导演阐释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作为矿工的儿子，那深深地刻在心灵深处的煤矿，成为我永远也抹不掉的黑色记忆。1955年12月，父亲和他的300多位工友，从上海来到西北铜川的三里洞煤矿。在艰难的生存挣扎中，掩埋了他们的青春和梦想。2005年，我怀着对父亲的一份歉疚，寻找着那些活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肖像，并以此作为纪念。



48、三里洞煤矿选煤楼



49、林鑫在拍摄三里洞煤矿选煤楼

菊芳摄



50、三里洞煤矿选煤楼上的天轮



51、2005年5月1日 林鑫在三里洞煤矿

菊芳摄



52、三里洞煤矿场景



53、林鑫走在矿工下井时领矿灯的过道中

菊芳摄



54、林鑫在拍摄三里洞煤矿选煤楼

菊芳摄



55、在三里洞煤矿的火车头局部

### 第三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脚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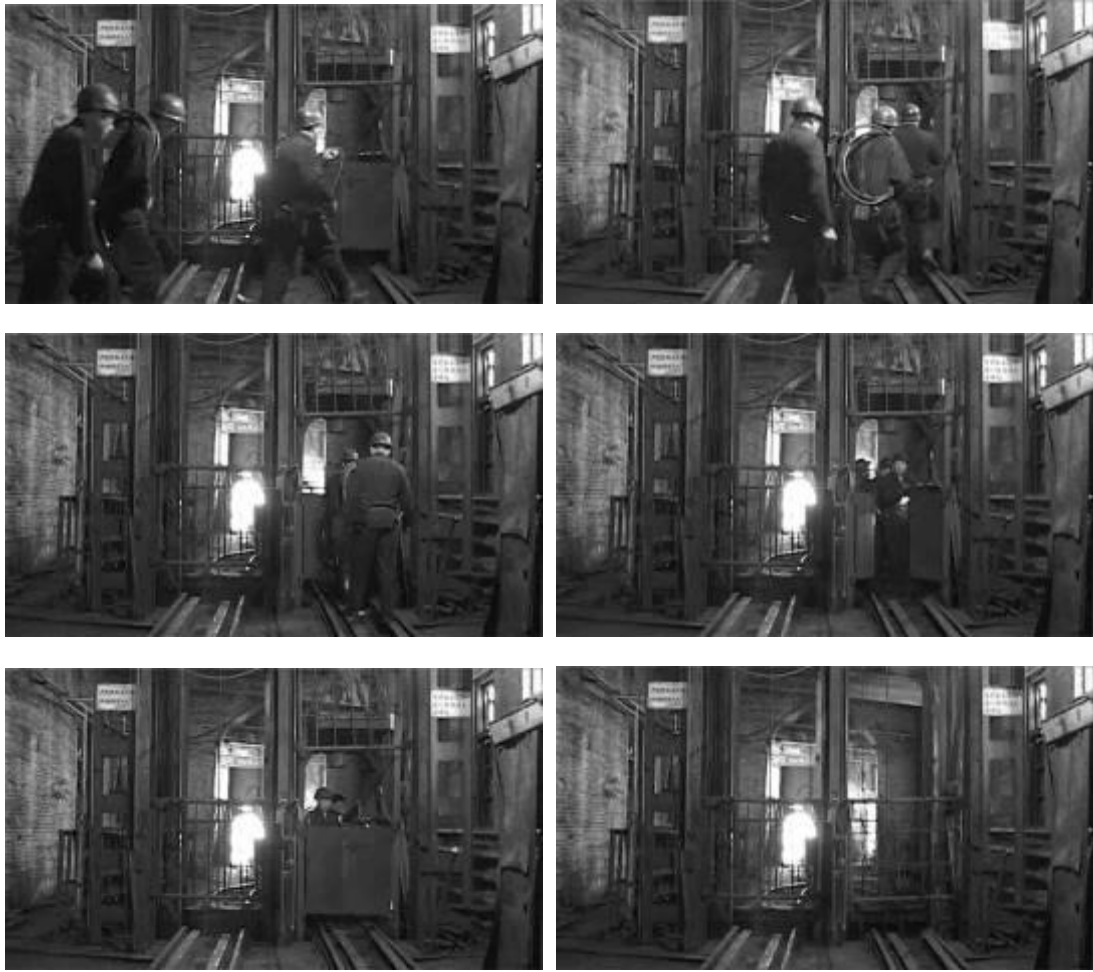
纪录片《三里洞》总共拍摄了71盘DV磁带，矿工口述占了素材的绝大部分，整理出的口述文字近20万字，另外一部分是矿区的空镜和生活场景等内容。《三里洞》成片于2006年12月剪辑完成，2007年7月的修订仅替换了个别镜头画面。《三里洞》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矿工口述，一条是矿区的空镜，在影片中相互穿插交替出现，是人证和物证的并置和对应。为了和煤矿的质地匹配影片选择了黑白画面。全片共15个人物章节，是一组矿工的群像，影片第一个人物戚国其和最后一个人物林鑫的父亲朱永生是已故者，由矿工的回忆构成。原始的脚本只有标题和口述文字，其他内容是这次整理时增加的。





56、三里洞煤矿的入井口

【片头序幕：三里洞煤矿的入井口，随着铃声，竖井右侧的罐笼提升到了地面，矿工们进入罐笼，关闭舱门，铃声再次响起，罐笼徐徐下降到地平面以下，看不见了，只有罐笼上面的钢丝绳在下降中微微晃动着，许久，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另一侧的罐笼升上地面。转入黑场，片名《三里洞》三个白色的黑体大字在黑色的背景上出现。】



57(1-6)、三里洞煤矿的工人正在下井



57-7、《三里洞》影片片名

# 戚国其



58 (1-8)



58 (9-16)



59、三里洞煤矿入井口

【戚国其 1957 年就已经去世，本段内容主要是矿工们的回忆和选煤楼、绞车房等空镜组成】

**陈义祥** 像我们来的 318 个人，有些人回去了，大部分死了，三里洞发生工伤，死亡事故头一个，就是我们上海来的戚国其，开水泵的。

**陆荣初** 第一个叫戚国其，在井下开水泵的，主井底下有个大水厂，不开水泵慢慢就淹了，必须排水。主井钢丝绳断了，大机斗钢丝绳断了，一下拍到里面，水厂把机斗提上去，光打捞他，打捞了几天。

**王正祥妻** 戚国其是第一个，57 年三里洞移交生产，他是开水泵的，一下子砸死在井底下，年轻得很，二十多岁。

**刘梅娣** 他开绞车的嘛，他第一个牺牲，57 年死的。

**姚洪昌** 三里洞矿从绞车上来说，最大的一次事故就是断绳事故，这是移交生产以后第一个大事故。当时绳子乱了，上面选煤楼上一个煤仓，煤仓煤倒满以后，这个机斗就下不去了，石头就卡到那个煤上了。一下不去，可是司机都是新手刚学的。姓雷嘛，雷云科，他是开车的，他好家伙还继续开，开开开，把那个滚筒上的绳子……机斗卡在那了，绳子还在那送着呢，绳子送送送，送得多了以后，滚筒上的绳子就乱套了。所以正在整理滚筒上的绳子的时间，选煤楼他那个机器一开动，把那煤仓的煤就运出去了，慢慢慢慢煤仓的煤就运出去了。一运出去机斗里石头就没有力量，一下子下去，石头冒了一团火，绳子就在机斗跟前冒了一团火。当时我在现场，我在机房，只看见他妈的，绳子拧的一团火，机斗掉下去了，把底下的装备，底下也有煤仓，把煤仓整个砸了。煤仓底下还有一个水泵房，就是我们一块来的戚国其嘛，他在开水泵，机斗下去，一家伙把他砸到底下，这是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第一个牺牲的就是戚国其。

**周寿根** 他是党员嘛，戚国其，我们来的时候他就是党员。一到井底以后，还得往下 30 米，就是主井提煤的机斗。交接班了，一看，交班不好交，还有点水，干脆再去排一下，排完了以后好交嘛，排干了以后好交班。下去了，下去了以后，刚在下去的时候，机斗钢丝绳断了，下去砸到这个地方，砸到中间，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了，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好象那个大罗马表还走着。

**葛登发** 主井钢丝绳断把戚国其砸死，我在井下十六个小时，在水里泡十六个小时，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把他弄出来。

**姚洪昌** 唉呀，那个事故对我们上海来的这些人震动不小，确实震动不小。

**王俊彦** 那个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光知道，人下去，那个罐笼下去把他砸死了。唉呀，那个投产时间不长，实际上扒人的时候我也去了，在翻罐笼底下。

**罗世俊** 戚国其，咱三里洞矿头一个牺牲，戚国其头一个嘛。

**成妙祥** 他人刚下去，上头吊煤的扑通下来了，把他一下压扁了，他头一个，也是上海人。

**丁福珍** 那时矿上刚移交，生产经验也不太足，他在底下清理煤仓，头一个事故就是这样。唉，头一个事故死的惨的很呀，他老婆回上海了，他老婆还有一个娃没满月。

**顾龙祥** 死了以后就埋在这个山上。那时，咱矿上对这个人还比较重视，他家里还在上海，矿上把他家里人接出来，开追悼会。那时候矿上，司机都参加了开追悼会。时间长了，发生事故多了，矿上就那么回事了。

**姚洪昌** 戚国其他那个老婆来把那个骨灰带回家去了，后来把骨灰订了个木盒，直接就寄回家去了。

**陆荣初** 他儿子已经结婚了，家庭生活光抚恤金能拿几个钱，两个娃不够生活。这老太婆一直（从）浦东踏了自行车到上海卖菜，家里种菜，卖菜。这是她自己来把情况给咱说了，



娶媳妇了，儿子不孝顺。哭的，听听心里很难受，在肚子里他爸就死了，一直把他养到结婚，最后娶媳妇了，不孝顺。



60 (1-8)



60 (9-14)

## 顾龙祥

【顾龙祥提了一壶水，从楼梯下来，穿过马路，朝对面工地的门房走去的画面。】

**顾龙祥** 我是55年12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当时来的时候，一个是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另一方面分散上海市人口，疏散出去，支援各地，到这里来。

我从57年移交生产，一直开绞车，一直到92年退休。不过在工作时间，也碰到了也见到了，也看到了。咱矿上一起来的，一起开追悼会的，砸死的，像掌子面发生事故呀，掘进上发生事故呀，运输上发生事故呀，那多了，这种事情多了。原来人死了以后，放在土窑洞里面，时间一长，老鼠，虫呀，把那死人有的把耳朵咬掉了，有的把那个脚趾头啃了。后来看看不对，矿上另外盖了太平房。反正矿上的事，基本上一个月，要发生一个事故，发生事故也不一定死，也不一定不死。你想想在上面开主副井，下去是人，上来也是人，按规定一罐是12个人。有时候人多，你也挤，我也挤，那20多个人再装20多个人，40多个人，一上一下等于50个人。那50个人的生命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全靠这个脑袋瓜子、手和眼睛。那50个人的生命，说不好听的话，都靠你开绞车的。你赖好不注意的话，砸一家伙去球了。在上面不知哪个矿，那也是副绞上下人，下去有四五个人。也麻痹了，砸罐了，下去，呜呜……等到他知道了，马上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罐笼砸一下下去了，砸一家伙下去以后，有的人腿骨从肚子里出来，有的直接把腿砸断了，下去那速度多快。矿上那个井筒，上下人那个井筒170，从上面到下面170（米），主绞是200米深，副绞上下人的170。说不好听，你开个绞车，也是提心吊胆的，你下去上来，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些人下去，上来咋项，掌子面？主副井呢？下去上来砸一家伙，就完了。过去的时候，为啥一个月一开支，半个月就没钱了，因为这钱在半个月以内都吃完、花完、用完了，用完了他安心工作了。煤矿工人下去不知上来上不来了，都考虑这个事。发了工资就吃，就花，花完了再下去，下去再挣，死了去球，就抱这种思想。



61 (1-8)



61 (9-16)



61 (17-24)



61 (25-26)

**林鑫** 现在剩的有……？

**顾龙祥** 现在没有多少了，老倪算了一算最多二三十人，不会超过 50 人。我是 92 年退休了，我家里你也知道，我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一些。一方面小女儿经常看病，那发生了多长时间，十五六年了，住了几次医院。犯呀看呀，犯呀看呀，一看花好多钱，你看我现在一天挣 10 块钱，一月挣 300 块钱，目的也是为了补贴一些生活，比较充足一些。过去，你上个月拿了钱以后，用了 20 天就完了，给小家伙看看病，有时候她一住医院，最多用半个月。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呀，那都是去干干其它活补贴补贴。

老大拿退休工资，老大现在 400 多块退休工资。老大的女婿省运司开汽车，最近也没活干。老二在 194 烧锅炉，没办法，冬天烧锅炉现在停止了，停了以后到外面找些零活。反正几个闺女，你要一个那是没项，只能她自己维持自己。老三在铝厂工作，她也没房子。小红原来在三建司工作，没交养老统筹把他开除了，哪里有活了去干干，没活了到其他地方去干。到其他地方干，干了能拿到钱还差不多，前年干点活到现在钱还没拿到。他到 194 队去帮忙去了。反正就糊里糊涂，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想着存点钱买点啥东西了，那根本没项，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就那么回事了。



现在没有多少了。  
Not many.



不会超过50人。  
No more than 50.



我是92年退休的，我的年龄也知道。  
I retired in 1992, I know my age.



我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一些。  
My family is quite poor.



一方面小女儿经常看病。  
My youngest daughter often had to go to the doctor.



眼明着呀，把眼着呀，一看花好多钱。  
It spent lots of money on her medical bills.



一月得900块钱，  
and 300 rupees month.



用了20天就完了，给小家伙看看病。  
20 days of medical expenses for my youngest daughter.

62 (1-8)





老大拿退休工资，老大现在400多块钱退休工资。  
My oldest child retired early and now has  
a monthly pension of about 400 yuan.



老二在194检修炉。  
My second child works at a boiler at Team 84 in winter.



最近他没活干。  
but has been out of work recently.



小盆儿曾在三建当过工作。  
Xiaopeng once worked for the Third Construction Company.



前年干点活到现在钱还没拿到。  
He still hasn't got money owed to him for work done two years ago.



反正就糊里糊涂，马马虎虎。  
In any case, he can make enough to糊口.



过一天算一天就那么回事。  
He takes everything in his stride, without much thought of tomorrow.

62 (9-15)

【顾龙祥的妻子在唱圣歌,】

歌词:

我跪在十字架下求  
止不住的泪水流  
亲爱的救主, 你来搭救我啊  
让我投进你的怀抱中

主, 你拉住我的手  
拉住我的软弱的手  
灵程路上大步向前进啊  
让我永永远远不回头

主, 你早日接我走  
早日接我住进天堂楼  
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啊  
叫我永永远远享福到永久。



63 (1-4)

## 沈龙根

【沈龙根在上楼梯，不断地喘气。】

顾龙祥 慢点走。

沈龙根 我还歇歇，上四楼要歇个几趟。

顾龙祥 手扶着栏杆。

沈龙根 扶栏杆也不行。

沈龙根 上海建筑公司招工招到这里来的嘛。他说是支援大西北，来了下井采煤嘛。我一直在采区，又脏又苦。还就是时间长，干工作时间长，说是8个小时有时12个小时13个小时干到天明了。擻完煤再上罐，擻不完煤你就别想上来。天气冷，天天穿衣服换衣服，冻得够呛，你说井下干活出了汗衣服都湿了，湿了，明天上班你还要穿，还要穿上。煤矿工人说起来没法说，说不了，说不上。你说不吃馍，馍吃不了，上海来的，光想吃大米饭，大米。不可能的嘛，你吃不惯也要吃，不管好赖都要吃，不吃你就饿着。

用电钻嘛，打了眼放炮嘛，装火药雷管，装好雷管以后，炮线往外一拉，你要进去连炮，线拉好进去两个头要连在一块，连炮出来好放炮了。结果我进去连炮，正连着炮呢，他外边给你送上电了，崩成黑脸。一说到这里来下煤窑，一下煤窑一看，一下去人，那么深的地方下去一看都害怕，到采煤掌子面最害怕了，害怕你也要干，不干不行嘛。有些事时间长了咱也忘了，光来这50年了。



64 (1-8)



64 (9-16)

**沈龙根妻** 第一回下井，罐笼像顶轿子那个，人都待在里面然后门一关，钢丝绳吊下去。猛的去，头一晕晕的，头要晕的，头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天了，看不着了。

**沈龙根** 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天，根本不知道。

**沈龙根妻** 都爬进去的，爬进去人还要侧转，爬到里面去采煤。我也进过掌子面几趟，都是爬的，拿铁柱子，这么高的铁柱子，扛着，拖着，人爬着拖一段，爬一段，拖一段，爬一段，爬进去。

**沈龙根** 差不多这么高，这么高，你撬煤还要趴下撬。你不管干啥要爬，你不爬，不爬你不干，可低。经常遇到冒顶事故，采煤上经常冒顶多的是。不管哪个采区都有经过冒顶，你柱子打不好也要冒顶，你放顶也是冒顶，放的好差不多，放的不好埋到里边去。井下，唉！死个人不在乎。





65 (1-7)

林 鑫 你上不来气是？

沈龙根 职业病，煤矿上职业病。

林 鑫 煤肺？

沈龙根 噢。冬天比较厉害一点，像最近天气暖和了，那你出来不要紧，比较好一点。一到冬天，我睡三个月，光睡在床上睡三个月，不起来，就是不起来三个月。老伴身体比我还那个，比我还差。她主要是腰弯。那是老早烧煤泥了，和煤饼挖点土。最后挖了好几担了，我说这一担不担了，不要担了。她说我再担一担，再担一担，还要担一担。我说不担了球事都没有，这个腰。她说再担一担，好了，最后担一担，最后一担把她埋住了。闺女都出门了，儿子摆摆小摊，卖调料那个。生活基本上可以，咱也不问他要钱，他也不给我钱，就这回事。

沈龙根妻 娃都大了，都走了，剩老两口在一块，现在没啥人管了，你看房子一塌糊涂也没人管了。

沈龙根 房子你看脏得很，我们也弄不动。

沈龙根妻 一个腰弯弯的，一个呼噜呼噜气喘不上，下煤窑下的气喘不上，药没有断过，一直吃药。

沈龙根 主要是有个小孙子，光我们老两口基本上差不多，小孙子上学历害。

沈龙根妻 开 600 多块钱，光报名 800 块钱，还要买书呀，买那样，买这样呀，一学期就是 1000 块钱。你看，他开 600 多块钱，还要吃药，药不断的。我还要看看病，我是头疼不能走路。

林 鑫 您现在子女过多长时间来看你们？

沈龙根 看是来看，子女来看。

沈龙根妻 看是来看看，常时来兜一圈就走了。哎呀，南方不能去了，去了路费价钱贵不能去，自己身体也不好，走路也不方便，想也想去，回不去了。

沈龙根 你说娃都在这里，回去该咋回？没法回去。

沈龙根妻 我们是在蓬朗镇住的，昆山蓬朗镇。

林 鑫 从五十年代来到这，再没离开过？

沈龙根妻 没有，没有。

林 鑫 周围其他地方去过没有？

沈龙根妻 哪里都没有去过，一直在铜川呆着。六个孩子，现在养大了，一个都不管了。





66 (1-4)



67 (1-4)



67 (5-12)

## 王正祥

**王正祥** 大冒顶主体压力来了嘛，成妙祥他兄弟就跟着我，唉……那个压力来了，我说快跑，他也跟着我跑，好家伙那个情况冒顶给勒住了一样，唉，那一次危险的很。唉，那一次大冒顶时候，王川江他还在，把他埋在里头，两天两夜，哈……没有受伤，眼睛睁不开，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哈……他说肚子饥的很，饥的很，头一个的时候扒出来把他撑死了，一吃，弄个救护车接到大门口，死了。这一个弄出来不敢给他吃了，弄出来时就给他打针，把他弄到医院去，住了一个礼拜出来了。

**王正祥妻** 记得那时候四班倒，你伯伯上的是啥班呀，到第二天早上天明还没回来呢，把人等的急死了。这不是半夜面条擀好，本身12点以前要下班的么，干到天明还没回来。三班在井下，家属在家真是把人能急死了。咦，这咋还不回来，还不下班回来，那真是把人……真是油锅上煎的。你们还小，春平他们还小么。一晚上没睡觉，跑到矿上找去，常常有这个事。反正我跟着你伯伯这一辈子真是操心操死了，一说到下班不回来，真是两眼望穿，不容易，好容易熬到退休，赶紧退吧。





68 (1-10)



记得那时候三班倒，四班倒。  
He worked three or four shifts at that time.



到第二天早上天明还没回来呢。  
by the next morning.



把人等的急死了。  
I was really worried about him.



那真是把人……真是油锅里煎的。  
What happened? I was worried sick.

69 (1-4)

**王正祥妻** 我们是 54 年结的婚，55 他们就来了。

**王正祥** 我们这些来的都是欺骗来的。

**王正祥妻** 响应毛主席号召么支援大西北，他那时说的是调到西北来当国家干部哩，他没有说下煤窑么，要是下煤窑谁肯来？

**林 鑫** 自愿报名的吗？

**王正祥** 你不报名就不行，有人报了名不来了，整天把你弄办公室做思想工作。我那时来培训采煤，到三里洞还采煤，到退休了还是采煤，哈哈……

**王正祥妻** 一直就是放炮员，可怜的很，那个衣服呀，新工作衣呀，就是现在卖那个劳动布，多厚，我给他补上，补在膝头上。补在这个地方一天就磨烂了，光是来回放炮，爬过来爬过去。

**王正祥** 我们那时候国家把我们坑死了，下了 29 年窑，唉，我们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唉，真个是命扑出来的。唉，渴起来就喝那个水管子里水，水管子的水，就是井下的水，尿也有，啥也有。吁，抱住那个水管子，你不知道，一喝一个饱。你不喝不行，干的你真个没办法。唉，所以我家里确实，不管你是儿子也好女婿也好，没有下井的。哈……我是个煤窑工，我对煤矿上我就是不感冒（没好感），那个真是命扑出来的。七八米远打一根柱子，七八米远打一根柱子。那个时候，自己的时候，这个脑子，我说他妈的，在这里砸死了谁也不知道。哈哈，唉……过去在那个井下的巷道只有这么高的巷道，如果扛个 135 斤的铁柱子直跑，70 年跑了，扛住了；到 83 年，铁柱子扛起来了，腿抬不起来了。

**林 鑫** 你在地下采煤好像离工作面非常远？

**王正祥** 最少要走十几里路，到二水平近了，二水平近了，但坡度是这样子，坡度这样子。你人上头下去了，一到底下腿就打颤了，不会走路；你从底下爬上来呢，一身水。唉，路离井口近的很，近的很，坡度 600 米长了，华里 1 华里多路了。唉，煤矿工人想起来确实不能干，说啥都不能干。

**王正祥妻** 那时候不知道，知道在上海说啥都不来，拾破烂都不来。

**林 鑫** 你在那干那么长时间半中腰有没有想过不干了回去这种想法？

王正祥 有，咋没有，哎呀我在城市的，在农村我早就跑掉了，谁都想过，在上海没有户口粮都吃不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粮就不行。74年的时候，我说你们，春平跟春龙，我说你们大了干啥？他们说下煤窑。我问他为啥要下煤窑？他说下煤窑拿钱多。我那时七级工嘛，拿钱多？我给他一个人一个耳光子，我说讨饭都不叫你下煤窑。哈哈……后来75年，焦坪不是发生事故死了101个人。我说你们下煤窑不下煤窑啦？不下了，不下了。我说咋又不下了？你看车子跑了一天了，哈哈……唉，史家河还失过火了，那一年还烧死过几十个人，大学生还有几个，烧死了。光我用的炸药可能要拉个几车皮了，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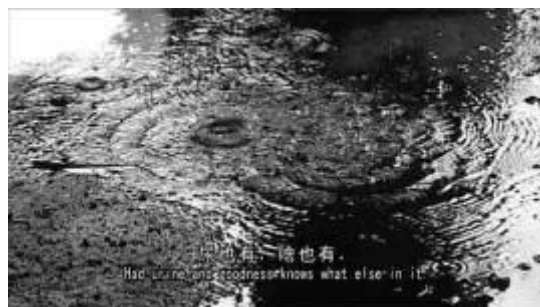
王正祥妻 那箱子，那么高，一天一箱子，背着。

王正祥 58年、59年、60年这三年死的人最多，受伤的人也多。吕帮新死了，张永福死了，叶长刚我说不了，人说董志良退休也死了，唉。





唉，真个是命扑出来的。  
Our lives hung by a thread.







70 (1-19)

**林鑫** 几个子女现在干啥工作？

**王正祥** 红梅、红爱退休了。春平在一中，春龙在供电局十来年不上班了，他请的假，他在外头弄。

**王正祥妻** 小花在北关做生意，卖个鞋弄个啥的，小玲在工艺美术部裁剪上胡混吧。反正个人都成家了，都能过去，过得好吧歹吧就是那回事。

**王正祥** 特别是煤矿工人，老的拿两个钱，养三代人的多得很。

**王正祥妻** 我现在就是这，你个人只要顾着个人就行了。哎呀，我们就这么大的本事，来铜川啥都没有，就混了6个娃，混大了，哈……总算把经念完了。



71 (1-4)

## 姚洪昌

姚洪昌 我记的我是 54 年在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学习建筑的一个年轻的技术标兵。所以说在当时情况下，支援大西北动员了，自己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说在年轻人里面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反过来说，自己思想年轻，也是比较单纯。来这儿的时候，我当时是第三分队的分队长嘛，同时我 5 年的团支部书记。在我思想里咱绝对不能走，要走了那就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这个起码不光彩，坚持，再苦也得坚持下来。三里洞是 57 年 7 月 1 号移交生产的，属于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三里洞矿那时候年产 60 万吨，最高产量是 72 万吨，89 年开始慢慢地掉下来。现在属于破产单位，破产了，地下也没有啥煤了。



72 (1-6)

井下发生事故就比较多些，77年，那是冬天，冬天就是这个暖气呀，锅炉房六吨锅炉出毛病了，这个蒸汽送不上去，送不上去形成副井暖气供不上。井筒上结那个冰，结的那个冰凌，靠在井筒壁上，那一溜子冰凌，从上到下整个都结着冰呢。所以采取打冰的办法，就是人工打冰，已经快到底了。哎，这个时候呢，暖气锅炉，上头锅炉出问题了。抢修到早上的时候锅炉好了，暖气又往井筒里继续送气。可是打冰呢，当时没有进行。一直到早上八点多，这时要换班了。换班，哎，正上下人的时候，底下没有打冰的那一层，那个冰，他妈的，掉下去了。那个冰呀，好家伙，多大？几吨呀。一家伙下去把罐笼盖都砸塌了，底下的钢梁都砸弯了，钢梁好家伙，工字钢那多大了，把工字钢都砸弯了，当时就牺牲了一个姓王的姓啥的？在我记忆里这个事故对我影响还是比较深的。



73 (1-6)

陶明祥，陶明祥也是我们上海一块来的，他是个井下开水泵的。当时他们三个人，巷道淹了，淹了以后就开始采取个办法，就是排水，他们三个人光顾着排水，排了……把水排下去快透的时间，里头那个瓦斯出来把人薰倒了，把他们三个人都薰倒了，最后三个人都牺牲在底下。他牺牲以后，他儿子接班了，后来他们两个都调回去了，弟兄俩都回家了，都调回去了。为这个事情我和他儿子，叫我可生气，你都不上你爸的坟上去看看。最后他说，他找不见了，他爸的坟地找不见了。咋找不见了，就是矸石山，那个井下拉上来的石矸给他往下倒倒倒，最后把他父亲……那个时候的死人都埋到那个地方的，都埋完了。我很生气。因为咱作为同辈人，一块来的，感到很伤心。他为支援大西北献身了，最后死的时候，他妈的叫石矸给埋住了。





74 (1-9)

**林 鑫** 阿姨是哪一年不在的？

**姚洪昌** 九四年。她主要是高血压，突然之间……她那个人心眼太好了，光顾着别人，吃也好，干啥都好，就是光顾着别人，她不顾自己。

**林 鑫** 老大现在怎么样？

**姚洪昌** 老大丽萍嘛，丽萍跟你同学吧。老大在 194 那个学校，在学校教书哩，她基本上还算生活比较好，姊妹三个中数她比较好一些。小风现在属于失业了，他那个黄堡陶瓷厂现在下马了。他开头算下岗，下岗拿了三年，三年以后，就给他转到农行，拿一百七十几拿两年。现在时间一到，属于失业，厂里也不管了，社会上也没有了，自谋职业，就这个状态。小蓉呢，她也是那个染织厂，原来属于下岗，现在下岗工资也停了，那么咋办，自谋职业，你找到活了你就干，你找不到活了，呵呵……

**姚风平** 我从来没想过什么下井，井底下年年好家伙出事故，听着挺害怕的，心里头总是有那种担心。

**林 鑫** 你的同学那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姚风平** 小思，他在史家河是因为啥死了，是小车给弄死了，还是输送带给弄死了？哎呀，当时想想那也是一个生命一个同学，下到井底下，出了事故以后人都没了。

**林 鑫** 我们从小在一起玩大的伙伴。

**姚风平** 他跟你家是近邻居。

**林 鑫** 隔壁的，从小都在一块玩的。

**姚风平** 噢，有时候跑到井口，上来的那工人，呀，看着穿的脏兮兮的。哎呀，那家伙衣服，这么热的大热天，感觉他们都穿着棉袄上来。一上来井罐，他们就在那抽烟呢，那时候很小嘛，就在那看。哎，我说他们上来啥都不干，先蹲在那儿抽一会。我前几年一直在上海干的时候，看人家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经济收入跟咱们没办法比，一个家庭几个人收入还不够人家一个人收入。



75 (1-8)

林 鑫 你一直开绞车？

姚洪昌 一直开绞车，一直在地面开绞车。开绞车开到啥时候，开到 92 年，就开始到四大机械维修。那个基建上没有人，所以说把我抽去搞基建，基建上搞建筑，搞了有三四年吧，以后就内退了。现在家里也没啥人了，老人都过世了，我妹妹给我来信说，她那个娃买房，那房价高得厉害，那个时候 5000 块钱一个平方，现在最贵的要上万了呀，一个平方要上万了。我说，老天爷呀，我在煤矿上，我的妈呀，我能买得起这个房子？现在，我现在也不想，哪的黄土不埋人，你想回去也没那个门了，等于脱根了。说老实话，那时候说安心为煤矿事业奋斗一辈子，那这一辈子就在铜川了。

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光荣证还在呢，最后也把它扔了，也烧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发的。老照片都没有保存，那时也没有，也没有啥留念。公司里边那时候支援大西北建设召开大会发的光荣证，我回去找到以后，哎呀，有啥用处，扔了。





## 葛登发

**葛登发** 这个带上也不行，带上声音稍微乱一点。我这耳朵主要是在井下，放炮的时候呢，反正是震动性大。你自己是个排长又要管生产，完不成任务领导上不愿意，放个炮打个眼，把耳朵弄坏了。那个时候我生产最有名的，思想上不管咋的，你今天出一百车皮，我非压倒你不可，我思想上就是这样子，人的思想极左的很。干十几个掌子面，反正是以矿为家，出了冒顶，扒人，光扒人我扒了十几个了，在井下发生事故扒人，自己朝外背，背出来。背死人不容易，抓住手背在身上，两腿爬出来，都是这样弄。

**刘梅娣** 广播里一叫葛登发，葛登发，底下大冒顶了赶快去。哪一次，只要矿上冒顶，你叔都去，哪一次都是那样子。那次陕西报上都登了他，真的，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最痛心的就是这个房子。

**葛 龙** 要是一拆迁，啥都没了。

**刘梅娣** 老工人都那样说，你看干了一辈子矿工，最起码有个窝。连窝都没有了，现在要撵你走。都没有钱，三里洞矿破产单位嘛，你知道的，谁有钱，都没有钱，买不起。这个房子，三里洞都要扒了，扒了往哪去嘛。南公房现在都开始弄了，老工人有的不签字，不要怨人家老工人不签字，没地方去嘛。过去说了，以矿为家，为矿上出煤，多出煤，多贡献。现在没有地方苦恼哩，我这咋整？没有地方去了，我咋整嘛？都是这样想。

**葛登发** 苦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地方也没有，也没办法。咱不要多大，两个人能住进去就行了，你说临时这样住下去也可以，咱也活不了几年，说不好听的话，安度晚年就算了。

**刘梅娣** 他都七十多了，七十四了。

**葛登发** 叫咱买房子起啥作用，根本就不起作用。你说买房子吧，还没有钱，就这点工资，自己生活，基本上差不多，难度也大得很。

**刘梅娣** 那天，那个新闻记者来说补偿两万，一户给两万块钱。靠着山的那几家说，哪有两万，一共给五千块钱，还不给你手里。在矿上几十年就落得这个下场。都愁，不是说一家愁，都愁，老工人都愁。俺两口都是上海建筑公司调来的嘛，他是 55 年来的，我是 56 年来的，还在李家塔，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去上学哩，骗来的嘛，骗到这来的。

**葛登发** 来了就走不了啦。

**刘梅娣** 死的也不少，咱南方人死的也好多。

**宝 宝** 俺爸那时候腿砸住了，砸住没有几天就打着石膏……

**刘梅娣** 一条腿，一只脚，五个脚趾都砸断了。砸断以后，人家说不行，把石膏自己拆掉，拆掉又下井去了，拼命干。他好几次工伤了。矿上完成任务，他那一班布置多少完成多少，都不欠。

**葛登发** 七几年主井大修，在井筒里一天干两个班，一天干两个班，弄一个月嘛，主井大修干了一个月，冒险，结果立了个三等功嘛，给了个奖状。完了，啥事也没有了。

**刘梅娣** 立了三等功，啥都没有。有啥用哩，这时窝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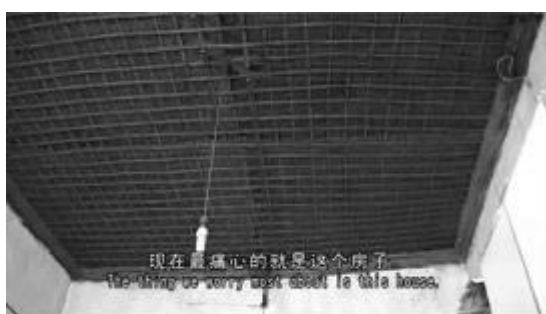
**葛登发** 反正矿上的事，就是这样，冒险的活都是叫咱干，危险的活都是叫咱。有啥事情，广播一叫，就到。下井下这么长时间了，快那个了，老了还没地方住，真笑话……唉，要是不扒不弄，不撵咱，咱就这样凑凑合合住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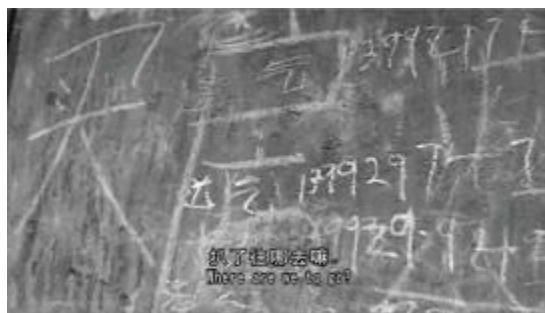
**刘梅娣** 住几年就算了。

**葛登发** 还能住几年，住不了几年。

**刘梅娣** 你想下一辈子的井，七十多了嘛。

葛登发 不管多大地方，能把被子放下能睡下就可以了，唉…… 那个时间靠组织的，现在组织不管把咱撂摊子了。









拼命干。他也好几次工伤了。  
He suffered several injuries.



在井筒里一天干两个班，一天干两个班。  
Two shifts every day in the pit.



井一个月嘛。在井大修干了一个月。  
Maintenance lasted for a month.



给了个奖状。完了。啥也没有了。  
and gave nothing but a certificate.



空了三等奖。啥都没有。  
Got third prize, got nothing.



有啥用哩。这时间都没有了。  
It even has no place to live now.



冒险的活都是叫咱干，危险的活都是叫咱。  
We have to do all the dangerous work.



77 (1-32)

**刘梅娣** 老大，食品厂倒闭了，失业了；老二就是勤劳，也没有工作，女子；老三是宝宝，宝宝是接你叔的班，矿上退休了，提前退休了；老四葛龙，他是待业青年，也没有工作，现在给人家私人开个车，拉个东西，自己管自己吧，这些儿女挺孝的，挺好。

**葛 龙** 我的父母，他们真的太辛苦，真的太辛苦。所以说，我现在在外面打工每次回来，我看到我爸，我心里很难受，七十多了。就像我妈今年这么大年龄了，一天在社区跑过来跑过去，真的苦。

**刘梅娣** 哎呀，真苦，我现在想想都想哭，干了一辈子。

**葛 龙** 现在自己又没工资又没什么的，一天到晚还忙忙和和的，跑东家串西家，跑这家，跑那家，大小事都来寻她。今天这儿检查，明天那儿计划生育，所以说这也是跑一辈子。

**刘梅娣** 都跑了一辈子，给孩子没安置好，居委会那时指标有的，市上都是下指标，一个公房给你几个指标，你自己分配。那人家有的都困难得很，你说你不帮他？是不是，咱不能眼看人家过不去。我赖好吧，你叔还上着班哩，是不是，能过去，可没想到走到这一步。有时候也后悔，后悔也没法了，已经是过去了。有时候葛龙他哥和老二都埋怨，妈，你思想好嘛，指标都给人家。娃说你，你也只能听，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子。

**葛登发** 唉……自己慢慢锻炼锻炼，活一天算一天。

**葛 龙** 在上海再不咋的，像他们退休以后待遇比这儿高得多，哪一个老工人一个月下来都 1000 多块钱，就是退了休。而且，还有自己的房子，这儿呢，自己的房子，不能提。

**葛登发** 现在就这回事嘛，那你说你咋整？

**葛 龙** 一辈子。

**葛登发** 嗯。

**刘梅娣** 没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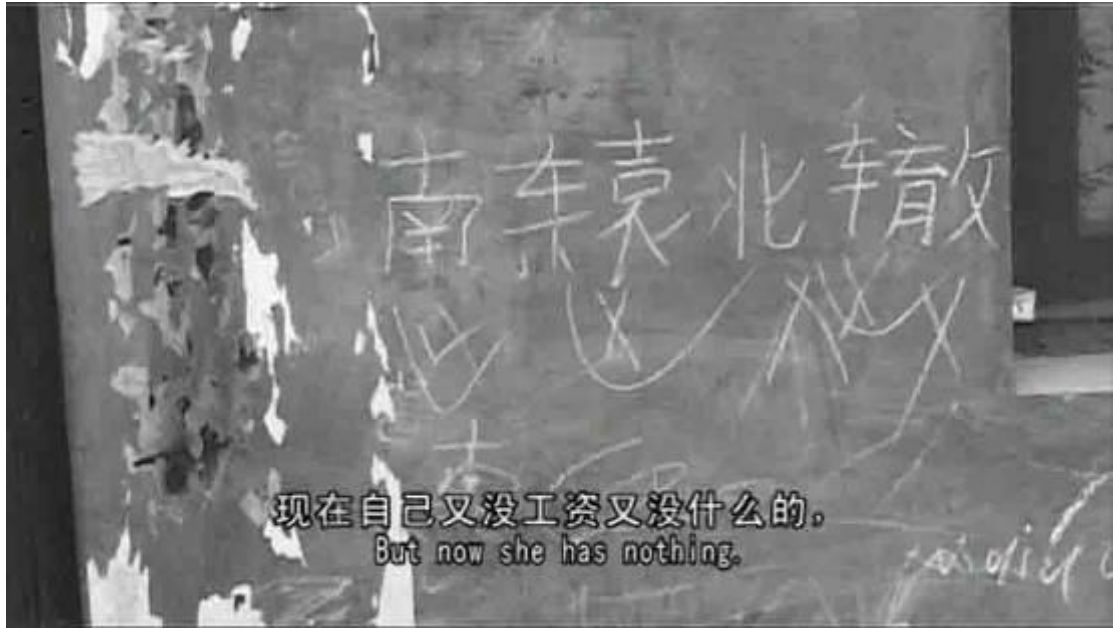
**葛登发** 唉，各方面都要那个一下。其实我们来的人不多了，没有几个了，没有几个了，都差不多了，没有几个了。

**刘梅娣** 这也是现实问题，从一开始支援大西北，一直到现在退休，歇到家里，一直到现在，房子……快没有地方住了，一直到现在就算结束了。

**葛登发** 没有几个了。

刘梅娣 没办法，急死你。









78 (1-17)

## 张百生

**张百生** 我们在建筑公司来的这些人，在上海好像都是学徒工，工级比较小的，都来的这号人。那时年纪轻，啥都不想，好像到外面跑跑，出去转转，苦呀不苦，没这种想法。

刚成立采区，我是农村人，不怕吃苦。培训时有一回石头砸到我这脚指头，把指甲都砸黑了。鞋穿得疼，我把鞋前面弄掉了，穿鞋不疼。没有脚砸破了怎样怎样，我还坚持下井。

我家里出来了，我时间长习惯了，她出来不习惯。她来了以后又回去了，来了以后又回去了，回去不知两趟三趟。她说一个人带几个小孩，在上海不行，没有办法，又来了，来了一直到现在。





79 (1-9)

下去了，太阳也见不着了，电视也没有。一天到晚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睡觉。有一回危险发生了，那时候放炮哩，炮不放，煤这么多填实了，煤一放掉，上面是空的。看不行了，我赶紧拿木头去顶，顶的时候，石头掉下来了。掉下的石头可能有桌子这么大，把我都埋到底下了，旁边还有攥煤的人，把我弄出来。我都受过几次伤。那一次放顶，那个木头柱子敲过来敲过去，都动了，一般讲敲过就算了，我这个人实心人，敲过来敲过去，光这根木头敲了好长时间，结果敲下来了，一块石头跟着掉下来，把我这个脚砸坏了。休息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了，领导上派我做啥做啥。

本来是井下工，在地面上做了一段时间，成立一个采区，所以又下井了。第二次下井，下下下，哎，又出事了。那时下井放炮，上罐时，看见溜子上有这么大块矸，把这块石头搬下来，在搬的时候，一块石头又掉下来，把这个小拇指头……当时好像没砸掉，把小拇指砸成这样。大夫说这个指头要去掉，去掉以后又在地面上，干干干干，又下去。下去了，一千干到……可能是 78 年。炮响了以后，再放另外一个炮，线接住后，看的时候又塌下来把我埋在底下，扒出来后又拉到十里铺，那时大小便可能有七八天不行，盆骨是这样的，把它砸坏了。这一弄，又休息了几个月，慢慢恢复了差不多，恢复正常。才开时好像瘫痪了，不行了，这是最后一趟。退休到现在已经 20 多年了。这两天感冒了，一般说起来，思想上蛮愉快的。





80 (1-10)

回上海去呢，现在家都在这里，没有想过。可能有六七年了，我回去过一回，说起来上海比这里美的多了，你现在拿这一点钱到上海去，没有这里耐用。比如这地方买点菜五块钱，到上海去五块钱不行，是吧。

林鑫 你现在退休以后能拿多少钱？

张百生 我现在是 757.24，工资不高。

林鑫 你几个娃？

张百生 四个。怎么讲呢，像过去都有工作，现在都没有工作了。他们现在自己在寻饭吃。老大娃，矿上破产了，在西安哪里看大门；老二呢，也在西安，过去在基建公司盖房子，七弄八弄不行了，现在西安哪个地方卖饭；老三那孩子，在外地煤矿上，好像还是私人煤矿；老四娃……想不起来，实际上，怎么讲呢，有些事情……



81 (1-6)

## 陆荣初

**陆荣初** 55年12月18号，从上海火车站动身，到这里12月21号，整整三天三夜，我在这三百多人里面来说，还是比较行的。到60年时当书记，71年到91年退休，搞了二十年，生产矿长、生活矿长、后勤矿长都干过。

有一次，麻花钎子顶住运输机刮板，从我这身上，穿着厚棉袄，硬顶，把钎子顶弯了，骨头还未顶断，要是顶断了，内脏都通了，棉袄厚。煤矿的安全就是这样，他有不安全的因素。我们一块来的，叫任福兴，在五区，放煤以后煤仓堵住了，咋办，崩，一崩，哗一塌，塌了以后把他埋进去了，扒了好几小时把他扒出来，扒出来完了。从那时要命了，要命了，到我退休为止，在井下死的140个，140多个死在井下。



当时只知道要煤，煤炭部的号召，国务院的号召，先生产，后生活。搞四班交叉，四班作业，这班和那班两班交叉出煤，我这一班人连你接班的人一块，交班中间要交 50 吨煤。不说时间，啥时出够 50 吨煤，你就交班，你就走，出不够 50 吨煤继续干。有时条件复杂得很，甚至一个班过去了，早班又来了，这班还没出够 50 吨煤哩。年年生产光靠工人不够，哪个家属没下过井，都下井挖煤去。老婆娃娃一起上。老大、老二都下过。给你家属支部要套家伙，下井挖煤去。家属下去安全没注意好，造成终生残废也有。

三里洞矿，年年亏损，年年亏损，后来日子过不下去了，煤又卖不掉，光欠人家钱。又是停电，又是停水了，所以就更谈不上福利设施了。盖点临时棚棚，简易的，能生存下去。哪一任矿长都是那样，都没办法，哪个矿长来，都赔钱，那时国家计划你，今年亏 500 万，对不对？500 万不够，总超过他的计划。矿上换一任矿长还是不行。地理条件复杂得很。后来看看弄不成了，干脆整个停了算拉倒。60 年 61 年的时候，绝的很，一月一个，一月一个，只要这月没死，到下月俩，一年死十二三，一年死十几个。过去还有指标，煤炭部给你下指标，一个矿死几个，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吃顿饭，喝喜酒都提心吊胆，饭还没吃完哩，一块大冰把罐笼盖子砸掉了，一罐笼死了 5 个吧。

**陆妻** 来的时候呀，房子像鸡窝一样的，矮的很。等他回来，我才把门开开，给他做饭，他不回来，我就不敢开门。对面山上窑洞里有个神经病，哎呀，一到夜里喊叫，我更害怕。我要回家，不在这儿，害怕人。所以，给房产科说说又搬下来，搬到西沟窑洞里。结果下大雨，漏的呀，漏的不行，又搬，搬了好多地方。

**陆荣初** 我们这地方是买的地方，800 块钱，借了五家，最多的借了 300，最少的借了 50，才凑够 800 块钱，买了这片地方。没这么大院子，只有一半大，都是红矸。

**陆妻** 才开始大的小的，光垃圾篮买的好多，抬啊，担啊，倒矿车里，倒山上去。

**陆荣初** 求人家井口运矸的稍微有点空闲时间，赶紧推几个车，一装，给挂钩的说，挂钩拉上去，不容易。

**陆妻** 不容易，这个叫愚公移山。





又是停电，又是停水了。  
As they cut the water and electricity.



所以就更谈不上福利设施了。  
So no chance of giving us any extra allowance.



盖点临时棚棚，简陋的，能生存下去。  
They just erected a simple temporary canopy for us.



矿上换一任矿长还是不行。  
Changing director doesn't have any effect.



干脆整个矿子算拉倒。  
The mine closed down.



一年死十二三，一年死十几个。  
About 12 to 13 miners died every year.



一个矿死几个，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  
If the number of deaths from accidents was under a certain number,  
then the mine was considered safe.





83 (1-17)

菊 芳 你们也没有住单元房？

陆 子 第一栋标兵楼就有我们的房子，都让给人家了。

陆 妻 他啥东西都是仅人家，都给人家。79年房子盖好，这个要房子哩，那个要房子哩。

陆 子 还有那三代人没有房子，拥挤户。

陆荣初 你给人家要公房，看有这么大房子能住下就行了，分给咱房子让给别人住去吧，咱不住了。

陆荣初 60年……

陆 妻 连上三个班在井下，到第二天早上，实在瞌睡的要命。那个脚踏车不是新的是旧的，加上昏头昏脑的，他上坡，那个拉大米的下坡，一个脚就没劲了，就倒下来。倒了以后，拉大米（车）从身上经过，最后肋子压断了两三根。住到医院以后，这个工人去看，那个工人去看。他讲，陆矿长对我们好呀，我家都没的吃，馍也没有。人家矿务局照顾他三十斤粮票，他都买成饭票，买成饭票干啥呢，放口袋里。这个工人说，哎呀，陆矿长，我今天没有粮呀，我家里没粮。给，给你一张饭票到食堂拿三个馍，弄三个蒸馍。我咋知道呢，他在医院住院。是工人在说，30斤粮票，统统都发给工人了。工人去医院看他，他才说的。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家几个小孩子吃啥，都是吃个菜呀，这东西没有啥好吃的。

菊 芳 他回来也不给你说？

陆 妻 没有，始终都不说。

陆荣初 我们煤矿再没人了，弟兄两个到铝厂去了。两闺女，一个在矿务局总机上也退休了，一个女子卖工龄了。过去卖工龄也走后门，卖了一万多块钱，干了十来年，十几年工龄都不要了，卖了，卖了一万来块钱。当时银行利息是4，五年利率是4%，100块钱一年能拿4块钱，算下来也不开资，也没啥干，在家歇着，干脆卖了算了，卖了一万多块钱，存到银行，一年也能开几个钱，4%嘛，后来跌屁了，一步步下降，最后降到一点八几，去年升到2.25%、1.98%。唉……





84 (1-10)

## 周寿根

**周寿根** 那个时候，信仰毛泽东、周总理是相当信仰的呀。那意思就是支援大西北无上光荣，年轻人走出去闯一闯，闯闯世面，一共要了 318 个人。这里的人去动员时说，铜川可以，你们建筑工人原来是上脚手架的，现在是煤矿工人，叫你们去上技工学校，说白了，还是叫他骗来的。送我们的时候是上海市建筑工会的主席，弄了十辆大轿车，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从上海上车一直到铜川转了三次车，在西安还不敢停，害怕我们跑了。到铜川，也没上技校，就是到后来学习了大概一个礼拜，就叫下井。

在采区当电工，那个水泵把水排完往进移的时候，可能没有停电，我拿钳子掐线的时候，一掐叫电打住了。电打住了以后，反正完了，如果说不被人家发现，非打死在井下不可。醒来的时候，我说你们弄啥？他说还弄啥呢，你忘形得意，你都死了，现在才把你救过来的。他说你感觉咋项？我说我好像在七里铺电影院看了电影回来一样。他说你还看电影，你都没气了，做了半个小时人工呼吸，才把你救过来。算了，你歇上半个月再上班。我第二天就上班了。那个地方相当惊险，我都死了几回了，在井下。有一回还是那个工作面，拉东西，一家伙顶到肚子上，顶到肚子上以后，好像越来越窄，刚好到窄的地方，刮板输送机自动停了，我从刮板输送机上翻下来，第二次。第三次是那个手指头，也是在井下，检修完了以后，这台刮板输送机转不了圈，结果着急了打开一看，他把轴承安反了转不动，卡住了以后，弄好拆下来又装上。试验的时候，接那个传动链，把我的手指头绞到里面，手指掉了。我一看断了，给我安上，安上我一看，断了以后，我把手指头往空里一扔，我也不要了，拿手捏住，上来到矿医院职防所。结果人家说你不要看，叫我们给你动手术。我说看着不要紧。那个大夫拿钳子夹住，剪子一绞，血管吡一下，吡了大夫一脸。哎哟，这时我才感到疼，歇了一个礼拜，也没有吃工伤，到现在就是断了一个手指。

还有一个吕庆远，那是开溜子的，那是冒顶砸死的，那家伙说不来。就是开刮板输送机的时候，班中餐，到班中间吃饭的时候，吃馍，都带着馍，喝水。那家伙还小心的很，周围都是柱子顶着哩，他就在那个中间坐着吃馍，上面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他头上，当场就砸死了。于月堂，是放炮员，放炮以后烟大的很，他在刮板输送机上跨过去的时候，一块煤拉过来以后，挤到下面睾丸上，当场就快死了，没送到医院就死了。他可怜得很哩，那于月堂娃还小哩。





可能没有停电，  
and the switch was on.



一给叫电打住了，  
I got an electric shock and passed out.



醒来的时候，我说你们弄啥。  
Then I woke up, I asked what had happened.



我说我好像在七五前电影院看了电影回来一样。  
I said it had been just like watching a movie about to end.



一家伙顶到肚子上，顶到肚子是钢圈。  
My stomach was wedged against the conveyor belt.



把我的手指头顶到里面。  
when I tried to get out the machine  
my finger got wedged in the transfer belt.



林 鑫 你总共几个子女？

周寿根 三个，老人在矿务局通信上，老二原来延大毕业的，毕业后原来在虎头山教育学院，后来到公安局，也不行，是肝癌，不在了。老大的女子都 18 了，上高二；老三今年十一才结婚。管屁他，我顾不了。

林 鑫 你孙女我上回来见了，个子高高的。

周寿根 还在楼上睡着哩，那也辛苦着哩，天天学到（晚上）12 点。我老大从电线杆子上掉下来以后，吃着工伤，现在西安打工。管屁他。一个人的家庭，说不好听的话，前辈子好过，到后半辈子真……唉，反正家家都有难念一本经。

你看现在退休工资五六百块钱，说不好听的话，不是光养老俩口呀，还有儿子哩，还有媳妇，还有孙子哩，多得很。煤矿里面，煤矿职工现在既要管自己，还要管儿子，还要管孙子。为什么呢？煤矿工人可怜，他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他的娃基本上都是靠煤的。就拿三里洞来说，破产了，那娃娃基本上都是接班的娃娃，在煤矿接班的。破产了以后，有的买断了，有的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就是 205，还要供娃娃上学。你说当父母亲看着孙子、孙女上学，儿子就这二百来块钱，说不好听媳妇有工作没工作还模凌两可，煤矿的子弟正儿八经找个媳妇有工作的不多。所以现在老俩口，既管孙子、管儿子、儿媳妇，还要管自己，就这五六百块钱。说不好听，我这 890 块钱，还是高的，一般来说，都是 600 来块，700 块钱，他要养家糊口。再一个，整天说这边拆迁，那边拆迁，哪里去拿钱买房子。

有人说，谁叫你们上海到这来的？妈的，那时年轻，谁知道咋回事，结果到铜川一看，夜里都想跑回去。把我们骗来，什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还有技工学校上三年，那都是骗人，骗也没用，现在都来了。







86 (1-12)

## 罗世俊

**罗世俊** 那时候矿务局到上海去，报名支援大西北，人觉悟高么，感觉光荣得很。重工业嘛，咱上海那时重工业还没有，都是轻工业，感觉支援大西北光荣的很。结果来到这地方，学了十五天就分配下井。55年来的，56年差一点把我命要了，冒顶砸着我了，砸着我，差一点过去了，当时砸得我眼白都没了，都成血了，盖住了。最后住院，慢慢好起来了。我说我再不干了，再不能干这煤矿，差点把命都要了。上海来后，人家很多人都跑了，咱也算是个老实人，就这样干了。

开采了，7月1日开采，把我调到三里洞，还继续在采煤上，干那么重的活。我几个小孩，人口又多，生活又过不了。那时拿60块钱，七八口人，就这样弄。来到这地方一直干采煤，年年有奖状，季季有奖状，都是奖状，都是标兵啊。这，那，到现在有啥用呢，活倒是为国家贡献不小，没啥用。





87 (1-8)

**【罗世俊妻子走近罗世俊】**

**罗 妻** 我要吃油条。

**罗世俊** 什么？你吃，鸡蛋，你吃去。她有病，脑子又不管用。你走吧。

**【罗世俊妻子离开】**

**罗世俊** 唉，就这样经过，像我这样，都死了出来的人，55年来，56年就把我差一点砸死了。那时思想好，要是这会就没人来了。这社会谁教育了，都想钱了，对不对，那时候咱不想钱，干这光荣，光荣的很。在井下，不碰头就是碰脚，井下工作苦的很，说实话，确实苦。冒顶，经过大冒顶多次，多次冒顶，人是往外跑，一动被溜子压住了，压住以后就扒，能扒出来就扒，扒不出来就算了。你说这情况，煤矿三班倒，尤其是夜班，这人呀受不了，瞌睡，井下为啥瞌睡，井下没有空气，一弄就叫你瞌睡，叫你瞌睡，怪得很。在采煤上，有人站着拄着锹就扯呼噜，乏的。

**【罗世俊起身到卧室看妻子】**

**罗世俊** 看我家里在不在，她脑子不够用，她走了。我家里脑子不够用，她跑了，他妈的，真走了，真走了。脑子不够用，跑得不回来了。

**【罗世俊匆忙来到楼下】**

**罗世俊** 看见往哪跑没有？

**邻 居** 刚出去，吃饭哩。

**罗世俊** 在这里，也不给我说一声。

**【罗世俊的妻子在小摊上吃油条，罗世俊一脸无奈地望着。然后搀扶着妻子回家上楼】**







88 (1-11)

**罗世俊** 咱老伴是吧，在上海结的婚，54年结的婚吧？

**罗妻** 53年。

**罗世俊** 53年结婚，在上海生了一个娃，到这儿来了。老伴也受了苦了，干个临时工，井下推大车，来到这地方，她跟着我也吃了苦了。上海人嘛，到西北来，她受苦也没话说。现在她有病了，脑子不够用，有时她跑了，跑了我找不到。跑耀县，耀县派出所打电话来了，才找到她。最后跑跑跑到上海，跑了几天，上海打电话到上海了。夜里两点到上海，车子送到南浦大桥，中午12点没摸到家，多长时间，人家送到弄口她摸不到家，就这样情况。她有病了，我离不开，白天晚上都要照顾她，离不开。她走路又不行，脑子也不够用，在门口都认不到家。噢，卖油条地方，快到家了。确实现在年龄大了，我也苦的要命，一天到晚休息不好，服伺她，光服伺她，你说咋弄。人嘛，一辈子了，对不对，老伴一辈子，你不服伺谁服伺，你指望儿女服伺不了这样周到，不像我整天看着她，就这样情况。她走路也走不成，走时栽倒，有次腰骨折了，才好，睡了三个月。住了三次院，弄点钱都看病看掉了，药费贵的很，你也知道，人不敢生病，生病生不起。

**林鑫** 矿上住院医疗费报不报？

**罗世俊** 不报，他家属嘛，都是自己掏。吃药，都是自己掏的。唉，人怕生病。你看住院，头一天到市医院，一天390，几百块钱一天，你看我工资那么小，几百块钱一天，最少都150多，200、300一天。两天，一月工资就完了，住两天院。390我一月工资两天都不到，都完了。发愁，家里这么穷，住了三次院。现在吃药，还要花钱，药费也贵的很。像我中午也不烧饭，在我闺女那吃饭，一天都不做饭。几个孩子一个月一次，她完了他，他完了她。

**林鑫** 你一人能回到上海去？

**罗妻** 嗯，来到火车站车票被骗走了，我哭着说火车票没有了，列车员说，不上去，车开了。我等在检票员这儿，检票员好，给我说，你进去吧，我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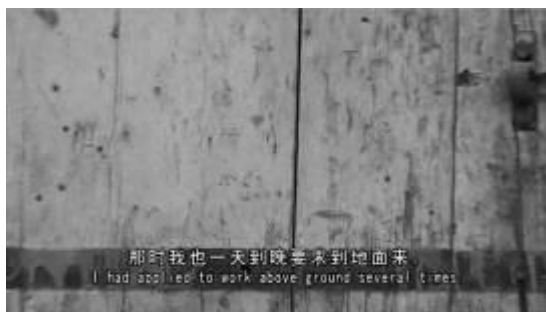
89 (1-17)



## 丁福珍

**丁福珍** 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人家来到这里嫌苦走了，我也没走，回去也是没有办法。分到三矿，一天到晚，唉，苦得很，我们来时苦得很，拉小车呀。调到三里洞还是拉小车。一直拉 56 年、57 年、58 年、59 年。到大跃进的时候，哎呀，那才苦呢，24 小时都不能上来。一人拉两个车，拉两趟一个煤，一个煤就是一吨呀，矿车还装好。24 个煤，4 个人，进 4 米道，装 24 个煤，还推到车上，还装起来。你现在能拉，妈的，多少人也出不了 24 吨煤，拉小车。在掘进队把身体搞垮了，那时我也一天到晚要求到地面来。还不错，一开始在三里洞当三班大组长，管三班。后来身体垮了，到水力采煤区，我是水力采煤区的大组长，任务只要交给我，我们都完成。弄到身体垮了，就慢慢地弄到辅助部门，实际上矿上对我也不错，身体一跨，把我弄到运输区，把把井口呀，又把我弄到通风区维修，维修以后身体不行，就做炮捻呀，一直到退休。

现在弄得，老了又干不动，弄成职业病，现在还把职业病的福利去了。目前来说，你像有病也没人管，（医疗费）一年就 200 多块钱，两天吊针一挂完了，有些事情的确对煤矿工人太不合理了。我们煤矿工人一到这儿，都是干一辈子，弄得一身病。天不下雨我们都知道天要阴了，要下雨了，浑身都疼，气短，上不来了。





90 (1-10)

话说回来了，井下工作也就是危险得很。人家给我说，大型的冒顶，十五分钟要给信号哩，十五分钟上头掉渣呀，一个劲地在那个，那你就赶快走，撤离掌子面。我经过好几次，这大型的冒顶，我可经过好几次。到通风区采小块煤，我说不行了，卢家洪说为啥不行，不能撤。我现在不听你的，把工人们都喊出来了。喊出来时，卢家洪跟我吵，我说你不要跟我吵，马上就来了，东西能带的东西赶快带，不能带的东西就丢。没有20分钟，就10来分钟，轰一家伙，机头冒到机尾，光剩下个溜子头了。就我这一叫，把二十多个人命救了。丢了东西刚跑到溜子头，卢家洪说你上去我处理你。处理我，我还要处理你呢，两个在那顶起来。其实卢家洪也没有坏心，那个人还是不错的，到最后他也害怕，柱子看着一掰两截，东西是一点都没拿出来。

还有一回，我已经到十八分了，唉呀，我看着害怕，木头呀，看着噼噼啪啪。他在发抖，我说你不要抖，命早叫住了。一阵子落下去后，我把一个人拉出来。顺着木头进去，其他人不敢进，我进去把他抓出来，抓出来以后，我就吓瘫了。

凡是哪一次评奖都有我的，我家里奖状贴满满的。不管在通风区也好，采区也好，掘进队也好。在水力采煤区，我也凶着哩，隔两天，那锣鼓就打来了，喜报就送来了。话也说回来了，因为我爱得罪那些干部，哪里不对我就会说他，提他意见，就是这样子。





91 (1-8)

像陈家山那瓦斯矿，我们就在说哩，这瓦斯大的矿，出这种事故，都是怨领导。说你完成任务，我再给你拨 200 万，超额完成多少。底下矿长一听能弄 200 万，好家伙不要命了，警报器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就出煤。有汇报说底下着火了，着火也要出，一样出煤。为了一个能拿 50 万块，一个局长拿 50 万，一个矿长拿 40，只要完成任务。现在光生产不顾工人……有些事情，都是胡来的，没办法。再一个领导处理也不恰当，你像上一回瓦斯爆炸，明知道因瓦斯处理了，还能到省上当大官去了，他更不在意下面，更不管。上回他出事，不要紧，只要完成任务，对不对，出事，这里处理了，调到其他地方，还升大的，他是这种思想。你看这回出这么大事，你看逮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都没逮捕，说不定处理了三个人，到其它地方又干上了。没人管，你像现在，有个病呀，有个啥，巴不得你死快一点，死了就少开支嘛，问题就在这里，他明的不敢说，暗里就这样。

**林鑫** 子女现在做社么？

**丁福珍** 子女一个在咸阳做生意，一个在矿上做生意，开小食堂，老大原来在桃园矿工作，身体不好，一弄，旷工处理开除了，桃园矿。现在没有办法也是做个小生意，开个小食堂，一天卖一百多块钱。



## 童 伉

童 伉 我们从上海来的 318 人，谁没有棉衣棉裤，国家有一笔钱了专门照顾。我没有箱子，我只有有一条被子，我的上衣棉袄有的，一般人不要穿这些棉袄，我穿，但是借的。我有一双鞋子，老王，我那双鞋子，你那里放放；我还有条衬裤，老李你那里放放。那么他们知道，童伉没有箱子，那么小组里面同我谈话了，我不同意，我说这钱给比较困难的人去，比我困难的人还有，始终不要，始终不要了。大队指导员说，这人先进的很，所以把这个纠察（袖章）给我手里。那时上海到这里车子呀三天，停车时，有些人到火车站外面去逛逛转转，那么你走吧你走吧，火车站一进站都能看到我。那时我们有带队的，说童伉能行，无形中，带队也落到我的头上。童伉有啥情况没有，直接去问带队的。第二个我写东西比较漂亮，直接说我是大学生，因为我懂外语，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不是带队的，我也不是党员，我也不是大学生。对于下井挖煤我没啥贡献，我根本不干重活，我在井下根本不是拼命挖煤，弄这弄那，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生命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底板这么丑，刚解放时斗特务人员学习班，我这个区里第九个报名，我交代出来的问题比领导掌握的还多，那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就使我政治上没受到多少压力。我父亲是反动地主，而且我是流氓出身，反动地主家庭，流氓出身；我同日本鬼子打过交道，主要做生意，也有人说我是反动汉奸；同英国人、美国人打过交道，做西药生意，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高级军官，那么国民党的残种余孽。我在煤矿上工作时我有两个特点，一个，不是我管的事情我要管，是表现，要突出表现，不是你管的事情你管了才是突出表现；第二个，我想各种办法来避免对我控制，我在井下工作是这样子，只要你叫我童伉，对对对对，这是我工作特点，叫我我就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些领导说对啥？你不是叫我吗，叫我肯定有事情，没有事情不会叫我，对吧，你有事情叫我，我先同意你，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叫我天上抓月亮去，或取太阳去，不可能吧，肯定我能办的你叫我办，我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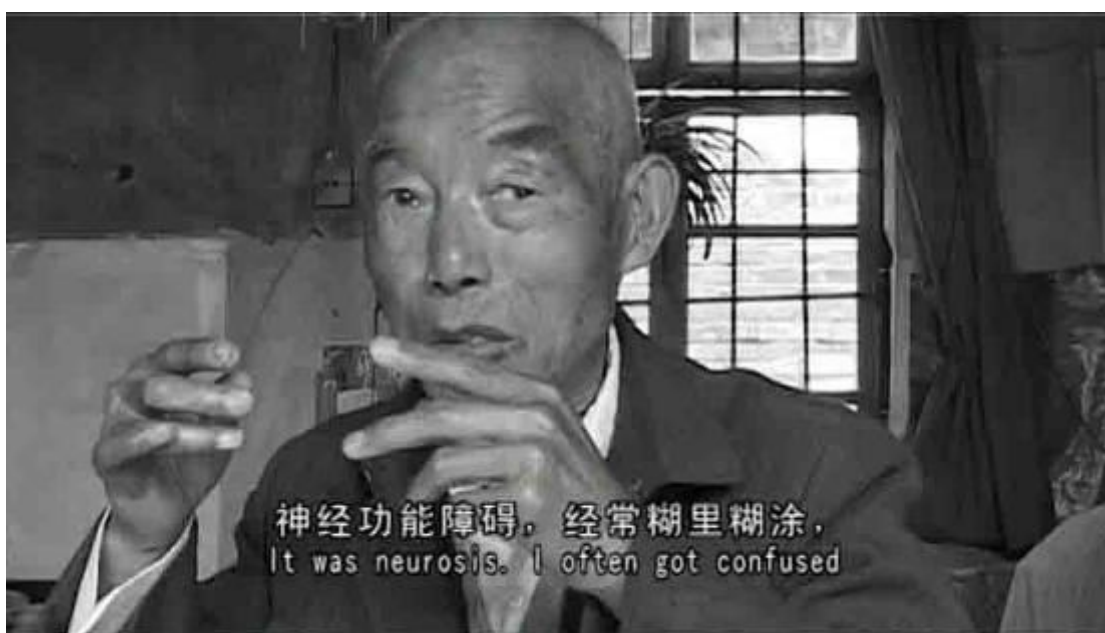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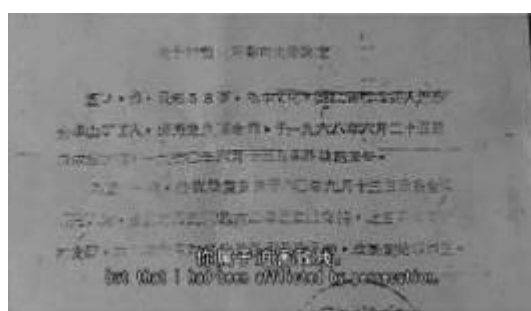


93 (1-12)

52年以前我是做西药生意的，我做西药生意与地下党有接触，那时地下党不公开的，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党，但和我关系挺好。文化大革命把他逮起来了，我在矿上，军宣组找我，他说你可以立功了。我说咋，他说把陈明山事情你说点，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可以提供意见。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而且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到中央去了，同我有啥关系呀。他说这样子，莫须有你随便说嘛，那么当然我也不能说了。我被揪出来了，历史反革命揪出来了。我爱人孩子住在公房里面，他说你现在反革命家属没有条件住公房，把我老婆孩子也赶出来，造反司令就住了我房子。我想不通，即使我有罪呀，我老婆孩子不应该有罪，那我上吊了。那时军管，解放军把我救过来了，安的罪名叫畏罪自杀。送到公安局，关了两年。在监狱里有病了，啥病，神经功能障碍，经常糊里糊涂，经常大小便随便解，监狱

关了两年。残联接待我，他说你不属于工伤，你属于迫害致残，他通过铜川市残疾人联合会，说这个人是迫害致残，应给予公残待遇。所以他给我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残3级残疾人证，落实政策，我有残疾证，可是矿上不承认。





94 (1-11)

春节以前有人告诉我，金华山矿上知道你情况特殊，给你 100 块钱补助。离退科科长说，非但没有这回事，听也没有听说过。结果我去找捎话这人。这个人倔得很，他说童叟，我可以用头来担保，没这件事我不会同你说这话，但是看你，能不能拿到这 100 元钱。对，我有信心，我花了 160 块钱。4 月 12 日这个离退科科长 100 块钱交给我闺女，这是一个怪事情。离退科科长给我说过两次话，一句话是非但没有这件事情，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第二句话，谁说有这 100 块钱你找谁去，这是第二次离退科科长给我说话；第三次离退科长到我这，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我错了。我现在已经把三句话记录了，要求矿务局领导解释一下。我今年已经 83 岁了，我年龄虽然老了，但是我实事求是共产党方针政策还没有忘，我还是要继续争取。矿务局长到我这来，我给了他 79 份信。那天到我家，头一句话就是你 79 份信我全部读了。我 79 封信都有留底，都有具体内容，那我说行了，我就不要再讲话了。我给你 79 封信，你已经收到，那我说我的要求和意见都在里边，组织上该咋处理咋办。他说哎，你住这房子，没有住房？但是我没有同他说。这房子都不要钱，这是报废房子。

我现在心情挺舒畅，也挺愉快，我现在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工作还挺理想。我最满意的我家庭情况，第一我爱人身体好，这是一个顶主要原因，爱人身体好，我思想没有负担；第二，我孩子现在都有房子，而且都是二室一厅，挺理想；第三我现在 777.10 元，我和我爱人两人不能说很富庶，不是小康标准，但是生活已经够用了。









95 (1-16)

## 高章顺

### 【高章顺在找他年轻时的照片】

**高章顺** 咱们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市工程局。后来，上海那时工作也少了，开始学习，回去等工。以后，大西北要人了，支援铜川来了。刚来时，他们说煤矿工人好得很，又是给你上来洗澡，又是太阳灯，又是那个这个，矿工帽子怎么样，就是他们骗来的，实际就是骗来的。

打眼放炮，回收啥都干，在一线啥都干。到1962年，我眼睛有病了，眼底出血，后来在医院里住院，住了有几个月。后来医院鉴定，说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能干重活，就叫我鉴定，鉴定以后到地面上。地面上不行嘛，家里父母，她的父母都有病，还有四个孩子，生活上工资太低了，后来我要求下井。

井下工作时候，经常有大冒顶啊。很多的事情，危险大得很。有一次，大冒顶了，那个老师，他要干活去，我说等一会，他没进去，结果大冒顶了，冒下来。我说差一点，把你压里面命都要了。还有一回，整个工作面压力来了，还有个徐区长，他管生产，下去工作面打木垛。一根一根以后，危险的很，我说赶快徐区长，走，不走不行了。徐区长刚跟在我后边走出工作面，整个掌子面切下来。大冒顶次数多了，经历了次数不少哩，溜子啥都整个压在煤里，人在里面也得压死。危险性大得很，经常性。经验丰富一点，眼力高一点，手快，脚快，比较好一点。脑子灵一点，看有情况，该打个柱子，打个柱子，不行的话该跑要跑，不跑你就要命了，有人慢一些，发生事故多一点，精干点，比较好一点。我下井十七年，工伤也没有吃过，能保持完整还不错。







96 (1-10)

在井下工作，第一个人要眼力高，一个手快，脚快，一看情况不行了，赶快掏个坑打个柱子。人要精干，工作要勤快，不会吃亏。就害怕懒的人，屁股大的人，光想坐一会，最容易出事故。我当班长时我这样说他，新工人刚来，不认识，你老工人勤快一点，打个柱子就行，不打柱子，万一顶板掉下来，压住，压的轻了工伤，压得重了，压死。井下煤矿工人害怕一个人懒，能勤快点的人不会吃亏。一方面你坐的地方，你注意安全，煤这么高，你害怕时间长了煤偏帮，照样把人砸死，你要小心；一方面坐着，看看顶板，有裂缝没有，柱子打好，有柱子没有，要小心呢，你不小心不行。煤矿工人就是太危险，一方面空气不好，工作面打眼放炮，这个煤灰，呛的不得了，炮烟又苦，难闻的很，煤灰大。掘进队煤灰才大，弄个风机来回开着，这个确实对人危害性就是大。一般容易得职业病，我职业病也三十多年了。

职业病一般情况气短，好比井下吸这个煤灰多了，这个煤吸到肺通道堵塞了，气短，有时不太通，容易堵塞，呼吸困难。变天了，感觉胸部闷痛，天气好的话，好一些，咱一期职业病，比较轻一些。三级职业病走路都走不动，上楼梯都上不去，吸吸哈哈，呼吸特别困难。肺里煤尘吸的太多了，确实呼吸困难。咱矿上职业病死了多少，一般的身体不行都死了。

破产以后，年轻人不到45岁以下卖工龄，没有办法情况下，只能卖工龄。卖工龄交统筹一开始交1千3、4，现在1千7多，一年下来。这点钱的确不够交统筹的。卖个一两万块钱，你看一年要交多少，还要平时生活了，有了临时工干干，没有了还要吃老本。铜川地区没有开发，也没有工厂，干临时工也困难。一般干临时工就是三百、四百块钱，工资也低，就是这个条件，铜川确实没有办法说。在食堂里去干干，一天14个小时，早上6点15分走，到晚上8、9点回来，一个月给240块钱，确实工资太低了。现在卖工龄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工资低，人也吃力，钱也挣不下，确实困难。

子女就是这样，大儿子也卖工龄了，干干临时工，有了就干干，没有了就在家歇歇。我的大女婿也卖工龄了，反正就是这回事。我小闺女她也卖工龄了，都没有啥。我小儿子没啥工作干，到上海打工去了。



你老工人勤快一点，打个柱子。  
The experienced workers should quickly  
put up a pole to support the roof.



煤矿工人就是太危险。  
Being a miner is extremely dangerous.



掘进队煤穴才大，弄个风机来回开着。  
The digging team used a draught fan.



呼吸困难，变天了，感觉胸部发紧。  
Difficult to breathe sometimes.  
And when it rains, I feel pain in my chest.



一般的身体不行都死了。  
Most miners died from bad health.



工资按工龄一开始给1千3、4，现在给千7多。  
We had to pay 1300 to 1400 yuan annually for our pension before/after  
because it is more than 1000 yuan.



一年下来，这点钱的确不够交统筹的。  
The money was not enough to pay for the pension.



临时工就是三四百块钱。  
Temporary workers get 300 to 400 yuan a month.



在食堂里干活，一天14个小时。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14 hours a day.



一个月给240块钱。  
but only getting 240 yuan a month.



97 (1-12)

【高章顺之子高金康的讲述】

**高金康** 像以前咱父辈从上海到陕西来，搞煤炭事业，这个家也拴到这了。家长也没有路子，咱还在煤矿这个圈子里转，也知道煤矿比较危险。家里也处于无奈吧，咱以前考学也没考上，机会也错过了，我父亲再想想，算了，你到矿上下井吧。下就下吧，反正就是那回事，人嘛都要生活嘛，光在这等着也不行，就报名下井了。我是80年4月份到矿上，参加培训下井，当时是在掘进三队干到93年，三里洞矿也不行了。因为工资也低，俺单位谁要愿意下岗，一个月还有点钱，到外头再去挣一点。当时就想，那时浦东开发嘛，到上海去闯一下，跑一跑，看一看，就去了。一直是干干干，中间也有段时间没工程，有段休息时间。以前比较少，休息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就有活了。但是从去年开始，活越来越少。现在上海这个建设基本上差不多了，个别的就是工程量少了，建筑单位多。就是和尚多饭少了，现在就是请客送礼，把标中了，凭关系。处于这阶段，我在去年只干了四个月回来，今年到现在那边还没消息，在目前比较艰难一点。

【高章顺家的家庭餐馆场景】

**高章顺** 咱们小吃，都是学生，简单饭。

**顾客** 嗯。

**高金康** 现在就是开个家庭小吃部，哎呀，反正是……





98 (1-8)



## 陈义祥

【陈义祥家吃饭的场景。】

陈义祥 【陈义祥拿着年轻时的照片】就剩这一张了，在这里。

学习大概有三个月，说同志们，你们将来都是我们煤矿的主人。给你们招到这来，唯一的，将来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开路先锋一样。我们现在正在煤矿搞发展，正在扩建，将来都是机械化，你们都是搞机械化。你们上海人文化有文化，暂时你们辛苦一点。

文化程度差一点，身体好一点的人，给你们发个搭肩，圆的。发个担架，有个钩，拉小车。发那玩意，这一发不要紧，第二天一下跑了十八个，背着被子到西安。教育处知道以后，开了车就撵到西安，有些还没上车，进站时，只要说上海的问一下，你在哪工作？上海。上海哪工作？只要说上海到铜川的，这些人留下，一下把十八个人又弄汽车拉回来了。拉回来干了一个月。第二次，他们商量好，把被子行李先寄走，他们几个口袋买点馍，在茶炉上烤烤，清早不到天亮烤了馍以后他们就走了。几个人商量好在咸阳上车，跑上海。那时吃粮都是定量的，回家以后，国家把他们弄得狼狈。不工作，人家出去蹬三轮车，中午回来吃饭，他利用这一两个小时，上街卖棒冰，擦皮鞋等。到亲戚家人家都有定量，你吃不行。弄不成了，有些人又回来了几个，三年以后，把他们户口解决了。





背井离乡到西安。  
They accepted to live in



只是很上海到西安的人留下。  
As soon as they said they came from Shanghai  
but worked in Lanzhou, they could be accepted.



拉回来了一个月  
one month later



刚不到五天，饿了以后他们就走了。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y left with nothing but their bread



回家以后，国家把你们弄得很惨。  
After they got back to Shanghai,  
the government put them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到亲戚人家都有定量，你吃不饱。  
Since the relatives were also on rations,  
they couldn't spare any food for them

99 (1-12)

下井一个人拿两个馍，我们来的人还比较卫生一些，缝一个口袋，脖子毛巾围着，还戴口罩，一开始这些情况。到后来正常工作了，口罩也不戴了，毛巾也不围了，馒头在炉子上烤一烤在井下不容易粘灰，这样一个过程。矿区确实辛苦，说不辛苦是假的。

井下的空气看不见，你到工作面看不见，一开始都戴口罩，后来都养成不戴口罩的习惯。顾不上，一戴口罩出汗干不成，闷得很，干不成，最后也取了。所以我们上海人采煤的工种有 50%，大部分是职业病，我也是职业病，到冬天出不来气。现在我们好些都去世了，那是出不来气，晚上睡觉就是要趴着睡。躺着睡就闷气，害怕一下出不来气就日他了。

到这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的干，一方面为了国家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

从上海到这里 50 多年来，咱们一些人确实把全身的精力都贡献给煤矿了，子孙后代有些人还确实在继承着，有些人接他父亲班，继续干煤矿工作。



打國給廣告，說不辛苦是假的  
It was really hard life.



一戴口罩出汗干不成，煩煩煩  
He couldn't work because he sweated so much.



大部分是職業病，我也是職業病。  
suffered from occupational diseases. So do I.



躺着睡就悶氣，塞拍一下出不來氣就日他了。  
It's hard to breathe if I sleep on my back,  
I could kick the bucket at any time.



那也是爭先恐後拚命的干。  
here in the mine.



二方面也是為了自己生活下去。  
but also to earn a living.



咱們一些人確實把全身的精氣神都貢獻給煤礦了，  
some of us have really given their lives to the coalmine.

100 (1-7)

现在我们回去，家乡人基本上不认识，我们一代人基本上也完了，有些跑来这个叫爷爷，那个叫爷爷不认识。光是回去两天吧，把 1000 块钱……叫一声爷爷，100 块钱，少了还拿

不出去，因为南方的水平。所以到家里亲戚那都不想去，去不成，咱们一个月才拿多少一点工资嘛。现在基本上我们来的人都是这个水平，600多，700块。700块，600多，都是这样的水平。好几个现在都死了，都是出不了气。江东林，张阿发，去年死了吧，陆根福也是去年死了。

医院的刀子是最快的，杀人不见血，要钱是最高的，那老百姓看不起呀，这一月工资跑到医院里，还未看到病还未抓到药哩，把一月工资就没了。这个检查那个检查，那个检查这个检查，检查了一圈以后，完了，一月工资没有了，药还没有抓到，病还没看成。

城市失业了，下岗了。家庭在二层楼三层楼住着楼上能种地？不能种地你叫下岗，干啥哩，给你生活费205，205块钱现在为什么不给，自己找出路。国家都给你解决不了，自己能找出路，对不对，这不成了反贴门神了吗，对不对。你把门关着哩进不来，哪找出路，那吃老子的，他没工作下岗了，老子舍得叫他饿死吗，不可能嘛。

**林鑫** 你几个子女现在都在哪工作？

**陈义祥** 现在不工作了，都在铜川。一个招待所的，也退休了；一个工程处的；一个在文化宫旁边住着哩；一个在矿务局家属院住着哩；一个在桃园矿住着哩。

**林鑫** 你有个娃也在三里洞后来破产买断（工龄）了？

**陈义祥** 和你弟弟弘鑫同学，他两个一样大，属马的。买断了。





101 (1-10)

## 朱永生

【下面这段文字是朱永生的儿子、本片导演林鑫的诗歌《噢，父亲》，由林鑫旁白。伴随的画面是黄土高原的落日特写、三里洞煤矿的更衣房、狭长昏暗的过道、入井口等画面，】

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层中燃烧  
那时我太小这种深刻的绝望无法感受到  
只是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  
看着一辆辆汽车装着一排排棺木不知有多少  
同学们相互传递着瓦斯的爆炸  
有人说瓦斯过后的人体象烤熟的红苕  
我只在父亲的瓦斯鉴定器中  
窥见过七彩的颜色象彩虹在我的心头照耀  
母亲在晚上再也睡不好  
等着父亲等着父亲的归来平静的脸上隐藏着心焦  
凌晨三点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  
我和母亲走在死城的马路当中听得见山上的狼嚎  
父亲的腿上打着石膏  
苍白的脸上浮着微笑  
在那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坚毅里  
将心中美好的愿望一点一点全部蒸发了  
曾有过欢笑曾谱过曲稿  
这所有的一切在哪里不知道  
不幸的父亲总算没有死在坑道  
临走的那天紧紧抓住我手摇了摇  
没有希望没有微笑  
从此那黑色的矿井再也抹不掉  
昔日的小伙伴又走上父辈的路  
昨天 XXX 已在井下报销





102 (1-10)

**姚洪昌** 你爸，朱永生，他是通风区的，属于辅助单位。

**周寿根** 一直是当瓦斯检查员，到后来时间长了，确实也跑不动了，才弄到区里当个办事员吧，那从来不多事的。

**顾龙祥** 像你爸爸当瓦斯检查员，瓦斯检查员也是个提心吊胆的事。哪个地方没人去，他第一个去，检查瓦斯，去测量，刚才说了那个上边死了的有 200 多人，那也是瓦斯，也是瓦斯爆炸。

**葛登发** 你父亲基本上还可以，在上海的时候当纠察，在华东第三工业部当纠察，我们来是一起来的，一个火车上来的来的嘛。

**周寿根** 就像你爸以前当瓦检员，一个班检查，要跑几十里路哩。八个小时，哪有空打个瞌睡，根本就没有的，就是不停的跑。

**葛登发** 他原来身体不太好，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一年不如一年，垮下来。他人可好，群众威信也高。他不管啥事，基本上做事稳的很，各方面稳得很，因为他人老实，人喜欢。你爸一辈子，苦一辈子，一直苦到临死，没有享过福，因为啥呢？没有退休，去世了，苦一辈子。

**王正祥** 像你家那种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你看你们吃的饭，那个面条，光放盐，连酱油都不放，我一口都咽不下去。你爸工资低一些，再有你奶奶，确实负担也有些重，在那个年代，你家有个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你工级再低，确实没办法。你爸、你妈确实把罪受够了。

**顾龙祥** 上早班刚下班了，到大世界（食堂）里面去转一圈，我一看你爸喝的二迷迷。我说你咋在这里。唉，吃吧，弄了点牛肉。已经是食道癌，肯定是食道癌。弄了点牛肉，弄了点啤酒，他一个人吃，一个人喝。我说你光吃这，那个牛肉是热性，酒也热性哦。唉，吃吧，慢慢吃，反正是说不好听的话，也快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他知道。

**顾龙祥妻** 俺那妹子已死了。

**顾龙祥** 死了。出院以后又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又开始上班了。上班这段时间，又化验出食道癌。所以那一次我看见以后，到后来再没看见过。

**丁福珍** 你爸去世时我真难受死了。







我们来是一起来的，一个火车上的车油油。  
We came to Tongchuan together, on the same train.



一个挺远的，走路几十里路。  
nonji walk for miles



他原来身体不太好。  
He never was in good health.



他不会啥事，基本上做事稳的很，各方面都很。  
He was very consistent in everything he did.



因为他人老实，人善。  
because he was an honest man, and everybody liked him.



一直苦到临死，没有享过福。  
He never enjoyed life.



连酱油都不放，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No sauce at all, I couldn't eat a meal like that.



确实负担他有些重，  
so this was really hard.



已经是食道癌，肯定是食道癌。  
He already knew he had esophageal cancer.



所以那一次我看见以后，到后来再没看见过。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103 (1-16)

【影片中下面这段文字配的画面是一个长镜头，开始是长时间跟拍地上一只不停爬行着的蚂蚁近景，然后渐渐地摇起摄影机，透过草丛，远远望过去是三里洞煤矿的选煤楼，摄影机继续向上摇，天空布满了整个的画面】

王福坤妻 你老家都有谁？

林 鑫 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王福坤 在上海吗？

林 鑫 上海一个，太仓一个。

王福坤 太仓离上海一点路嘛，路又不远，这可以了。

林 鑫 我姊妹四个，两个在南方两个在北方。我小妹妹接班了，在三里洞矿选煤楼干了十几年，买断了，破产了，给了一万来块钱，打发了。我那时给我爸说家里比较困难，我高中毕业了，家里姊妹几个，我报名下井，我爸不让我下，“我都干了一辈子，你在家待业吧，不让你下井”，说啥不让我下井。我想，就我一个，只要为了姊妹们好，给家里挣点钱。老大呀，老在家待业也不是事。其实从心里来说，也不想下井，弟弟妹妹都小，就我爸一个人上班，家里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对我爸说，算了，我内招到矿上下井吧，我爸说不行，后来就离开煤矿了。

丁福珍 你爸给我说的嘛，“能弄个临时工，我也不叫他下井”，我和你爸两个一没事就在一起编闲话，你爸有病我经常到你家去看，经常去。

林 鑫 当工人一辈子的确可怜。

丁福珍 唉，实在是……









104 (1-21)

【伴随着顾龙祥的妻子唱圣歌的声音，影片画面是一张接一张朱永生的子女们在2005年清明节的时候太仓给父母扫墓的照片。最后一张是荒草中朱永生、吴玉英夫妇简陋的合葬墓碑】

**字幕** 朱永生和妻子去世后葬在故乡，他们的四个子女，三个已先后离开铜川，回到上海和太仓。长子继续生活在铜川，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三里洞》。

导演/摄影/剪辑

林 鑫

感谢片中的受访者和为本片的完成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们

2006年12月

2007年7月（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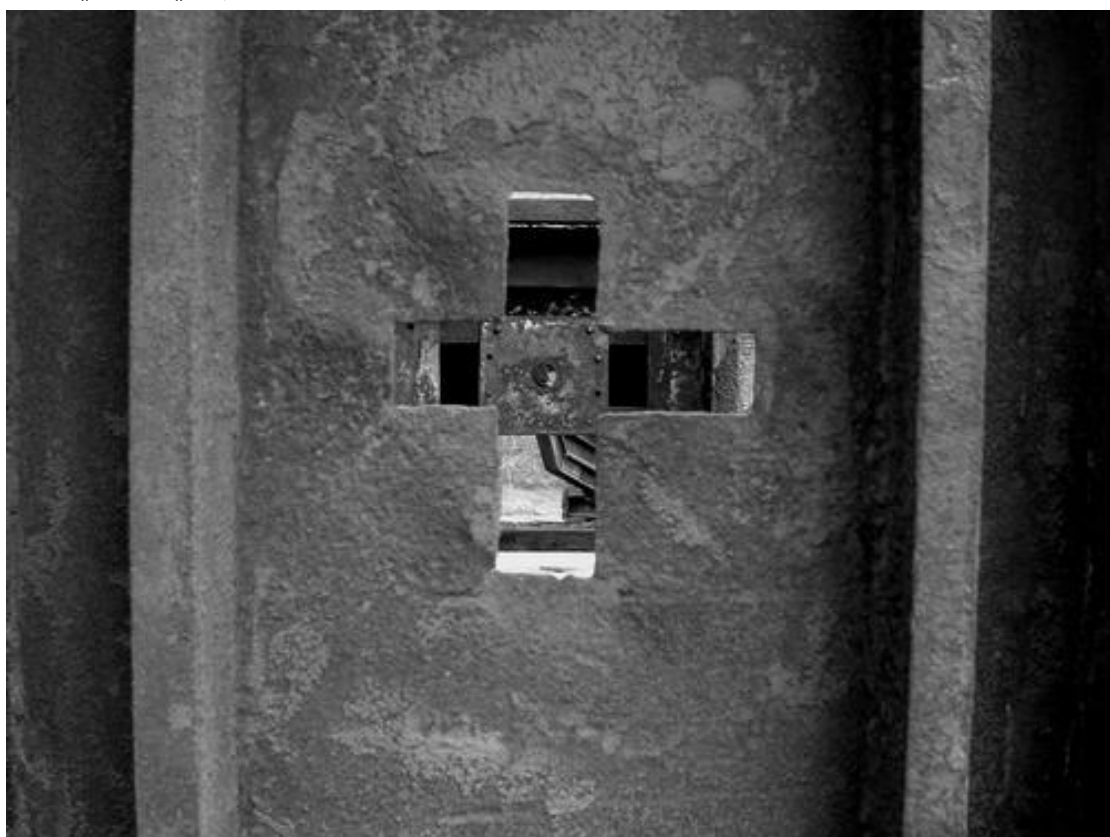
完



105、《三里洞》剧照



106、《三里洞》剧照



107、《三里洞》剧照

## 第四部分 纪录片《三里洞》札记

这些关于纪录片的文字碎片，大多是事后的分析和思考，而在拍摄时，面对未知和不可预测的结果，更多时候只能凭直觉前行，影片也是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才逐渐生成。

### 我遵循的拍摄原则

当你无可奈何地跌入你所拍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成了你的生活。作为一个纪录片制作者，没有权力去阉割生活。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卑微的，只能小心翼翼地像仆人一样，尽可能忠实地将生活转化为影像。任何居高临下的审视、同情和武断都会使你记录下来的影像显得可疑。

### 臣服于生活的逻辑

艺术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一个再牛的导演也不可能去导演生活。个人的所谓艺术创造，在复杂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会显得矫情和无力。剥去艺术的外衣，做一个生活的记录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立场。不管在影片制作中如何发挥你的才能和想象，也必须臣服于生活的逻辑，而不是将自己凌驾于生活之上，这是纪录片制作的底线和起点。

### 角度

我们不是上帝，自然不具备上帝的全能视角。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世界，记录下来的影像，也必然带有自身的烙印和体温。没有绝对的客观和中立，无论把摄像机架在哪里，都有特定的视角和方向，且一定是人的眼光而不是上帝的注视。秉持良知、信心，尽可能忠实、中立，以最大限度呈现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也不断考验着我们的眼力和脚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他人的观察，不是我眼中的映像。多个个体从不同视角的交叉观照，会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立体的生活图景。人为的阉割、扭曲或“创造”，均越出了记录的底线。完全客观机械地写实是冰冷的，因其没有生命的呼吸。面对同一座山峰，不同的人去拍照，可以拍出完全不同的样貌，从选景角度、构图取舍、风格倾向乃至境界高下，均会因个人的内在气质修养以及是否拥有饱满的生命激情而不同。重要的是个人眼中的世界，须有灵魂的在场，无论是一草一木、山川白云，还是一座煤矿的废墟，都应该充满生命的起伏和脉动。即使是极度压抑的煤矿废墟空镜，也依然会留下曾经鲜活的生命痕迹和穿越时光尘埃的微弱回声。或许可以这样说，任何镜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都是主动观察所得和人的物化。很多细节的再生和凸现，是近距离观察和凝视的结果。作为当下社会生活中之一员，我们的主观世界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组成部分，它受到先天不足、后天缺氧以及生存环境的制约，无论如何异想天开，也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地域和时代。

### 彩色与黑白

现实本身是彩色的，《三里洞》之所以选择黑白影像是基于直觉和多年在矿区生活的感受，是超越客体表象对煤矿本质的一种体认和表达，与艺术无关。这里没有对现实面相的完



全照搬，而是试图通过黑白镜头的持久注视，准确传达出这个空间的情感质地。这种注重主观真实的影像，或可以叫做心理写实。

拍摄《三里洞》的想法最初在脑海中出现时，只有一组朦胧的镜头画面，就是在整部黑白影片中，插入一个蓝天的彩色镜头。但是，那片纯净的天空不属于矿工。当初想到这个画面，或许是想给这部可能沉重的影片打开一扇透气的天窗，也隐含着内心深处的一点小小愿望，把这片蓝色的天空，献给我的父辈，使他们带着煤肺和矽肺的残躯，在这部充满黑色记忆的影片中，能有个从容呼吸的通道。我清楚地知道，矿工们基本上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班前学习、换作衣、下到井底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工作面，干完活上罐洗澡。三班倒或是四班倒，除了上班、睡觉之外，余下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见不到阳光的。讲述中老矿工的面孔和交叉映现的煤矿废墟空镜，均处于狭小封闭的空间中，而幽暗处插入的一片蓝天则始终在我的心头闪耀。去矿上寻找拍摄我的父辈时，并不清楚能拍到的素材以及成片的模样。随着拍摄的逐步深入，我感觉到前期的预设，虽然视觉效果很好，但并不准确。对于每天在矿井下辛苦劳作的矿工来说，影片中那唯一的彩色镜头，也依然显得奢侈。坚硬的现实，阻断了任何可能的抒情，诗意在这里只能是一个贬义词。尊重生活本身的质地和自己的真实感受，黑白影像，才是煤矿的准确呈现。这既是心理的真实，也是外在的真实。在后来的剪辑过程中，我改变了原有想法，毫不犹豫地把那个彩色镜头去掉了。影片中依然出现了空洞的天空，但那是黑白的，也已经不再纯净，在矿区拍摄时无意间飘落到镜头上的煤灰点此时显现出来，带着粗糙的颗粒和煤矿的气息，将矿山废墟与周边环境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这种乱头粗服的意外效果没有刻意和雕琢，完全是全神贯注地投入拍摄而无暇顾及的产物。我无法想象，如果当时拍摄的时间更加充裕和从容，将这些带有污点的镜头替换成更加干净的天空画面，放到影片中是否依然能够呈现出这种朴拙和混沌的效果。镜头上的污点是瑕疵，也是质地，其粗粝的本质在这里比光滑的镜头语言更准确有力。拍摄时身心同步的节奏、气场，在看似偶然中有着某种必然性，也是影片浑然一体的空间质感和力量所在。

煤矿的工作环境和矿工的生活状态本身就是十分粗粝的，尽管非常认真地进行了拍摄和制作，依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被拍摄内容和拍摄时状况的烙印。那些粗糙来不及打磨之处，保留着影片制作过程中的挣扎和焦虑。那种经常要从影片制作和谋生工作之间不断切换的经历，令人痛苦和不安。加之技术的不熟练，导致我处处如履薄冰。假如我现在去拍三里洞，虽然制作技术更加成熟，但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感受了。老矿工在不断地离去，片中很多场景也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影片的产生，有着某种必然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唯其不完美，才显得真实可信。

## 生存三部曲

作为矿工之子，《三里洞》是我必须去完成的一部纪录片，带着对父辈的缅怀追溯，也试图为自己留下一份记忆。这是一组关于矿工的生命肖像，主要纪录了父辈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我个人的情感。2004年11月28日，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了166名矿工遇难的特大瓦斯爆炸。在极度震惊之中，和煤矿相关的三部曲框架也在我的脑海中清晰起来。我想拍摄矿工及其下一代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旅程，也是一群人、一个地域乃至一个时代的影像记录。《三里洞》以老矿工口述为主，形成一条长达50年的时间线；《同学》随机跟拍20多个同学的一天，是当下生活的切片和横断面；《瓦斯》则以一个矿难事件作为切入点，通过在矿区的深入采访，努力还原矿难的事实真相。但我并不想仅仅拍成关于矿难的新闻调查，而是希望等事件引起的喧嚣和尘埃逐渐平息后我再进入，尽可能呈现出矿工的日常生活境况、矿难发生的深层背景以及整个矿区的社会生态。我2005年春开始拍摄关于

父辈矿工生活的纪录片《三里洞》，接下来2007年夏到次年春拍摄反映矿工下一代也是我的同学们生活的纪录片《同学》，直到五年后的2009年，才进入陈家山煤矿拍摄《瓦斯》。用了六年时间，于2010年12月完成了生存三部曲。

## 群像

面对一个时代，个体的经历，或许仅仅是个案，有着自身难以回避的局限和偶然性。多重复述乃群体见证，通过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的反复叙述，使消逝的时间、事件得以重建。那些久已逝去的人物也通过矿工的回忆，使之模糊的形象从黑暗中复活。单个的口述只是孤证，而分别拍摄的一个群体中多个人物的口述，或交叉重复，或相互印证，立体展现了过往年代的一些基本史实。那些已经或即将消失的经历和事件，通过他们的讲述得以确证。这些事情真实地存在发生过，不容质疑。个体的命运注定会沉浮在时代的洪流中，通过这群普通人的挣扎和遭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不管一个人性情温良忠厚还是精明强悍，或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和应变能力，都无一例外地会成为时代的囚徒，也无法挣脱捆绑在躯体和心灵上的双重锁链。拆开看每个个体的经历时，感觉大都稀松平常，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然而将一群人的经历放在一起，就会折射出相当的社会容量。一种普遍的存在感，寓于每个个体生命的沉浮路径和体验深处，而通过这些节点的凝聚，编织成一张无形的社会之网，体现出群像的力量。

## 两个声部：空镜和口述

在《三里洞》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个是口述，一个是空镜。从头至尾口述和空镜交替出现，像音乐的两个声部，即彼此分离又相互照应，在影片章节的不断推进中有机地胶合在一起，起到互证互补的作用。亲历者的口述和废弃矿区的空镜延伸着记忆的触角，穿过混沌和黑暗，展现出消失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时光无法倒转，我们无缘亲历和体验那个逝去年代的矿工生活，而只能通过人物口述和煤矿遗迹来还原和记录。这些幸存的老矿工是见证者，他们的出场和讲述，成为关于那个时代的强有力证人和证言。当这些风烛残年的老矿工打开记忆的闸门，释放出内心封存的多重难忘经历和生活感受时，也让我们知晓了更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人淡忘的生活细节。与口述并列的煤矿废墟，在寂静中矗立着，很少见到人的出现。而不断转换的画面和缓慢的推拉镜头，像沉默中移动的目光，带着几分犹豫和不安，在为闭塞窒息的空间带来些许灵动之时，也避免了画面的板滞。这些煤矿的遗迹，依然残留着人的气息和痕迹，墙上的标语与涂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井架、矿车、机斗、轨道、绞车、选煤楼、传送带，车间、石研山，灯房、更衣箱、澡堂、入井口以及破旧的矿工生活区等等，均是沉默的述说和物证，向我们昭示了煤矿曾经的喧哗。虽是空镜，关注点依然在人，片中反复出现的沉寂矿山，是当下现实空间的真实写照。在采访老矿工的时候，我事先准备了几个问题，如：你们当时是怎么来的？讲一下你在煤矿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是否想回到故乡？现在的生活和子女状况等。因为我是矿工子弟，这些问题是我所关心的，也是多年来家庭谈话中常常涉及的话题。尽管我的父辈们都来自上海，但每个人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感受，通过一个群体的共同述说，使我看到了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不同个体命运的浮沉轨迹。以口述为主的纪录片，主要是人物对着镜头讲述，为避免千篇一律的大头讲话，插入了相关工作和生活场景的画面。或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或是那种黑暗的感觉，或是一些生活细节。口述和场景之间存在的呼应、对照、类比、暗示等多重关系，最终会在观众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活着的空间。在分别拍摄这些矿工时，大部分时间是他们一个人独自叙述，我只是充当一个沉默而专注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他们持续不断地讲述中，我仅仅用眼神做出

回应，尽量保持其叙述内容的完整和连贯。一般我都会请他们从最早的时候慢慢讲起，一旦进入状态，摄像机就好像不再存在，而仅仅成为他对我（一个老矿工对晚辈）的述说。矿工的生活经历，我们知之甚少，随便插话打断讲述的进程不足为训。每个口述者由于年龄、性格和自身文化素养的不同，其述说方式也会有很大差异。比如陈义祥和童仇，基本上用不着我说话，其良好的语言表达和记忆力能够一口气讲两三个小时，几十年跌宕起伏的命运，在缓慢沉着的语速中娓娓道来，而思维逻辑依然清晰，这些口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物故事。而沈龙根、张百生等，性格忠厚木讷，其讲述简单朴实，也常常出现停顿，这时就需要耐心等待。沉默也是一种鼓励，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再次开口，说出更多的内容。只有在陷入长时间沉默之后，我才会提一个新的话题，一旦他开始述说，我马上住口。这些因人而异的具体方法，均为了准确地呈现出他们的世界。记录的是矿工们的生活经历，而不仅仅是我想要了解的内容。有些对他们来说不太重要的事情，已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忘。而几十年后依然能够说出的东西，已经过时间的拣选和历练。我无法判定哪些内容是影片需要的，只能将他们的口述全部记录。没有边界制约的言说超出了事先的期待，并展现出更加宽阔的视野，得到的收获也远比期望的多。当然，大量的原始素材增加了后期剪辑的工作量，除已经完成的影片之外，也为我们留下了近 20 万字更加深入的矿工口述实录文本，这是影片的延伸，也是一部独立的口述文献。

## 结构

《三里洞》由一个固定长镜头拍摄的矿工上下罐场景序幕和 15 个相对独立的人物章节组成。每段内容围绕一个人物展开，将 15 个片段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组矿工群像。第一个人物戚国其和最后一个人物我的父亲朱永生都是已故者，主要靠工友的口述重建，大家共同的追忆，打捞出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碎片。中间 13 个人物按拍摄时的先后顺序排列，不同人物之间，也有着自然的节奏起伏。将煤矿废墟空镜、老矿工讲述时的面孔和青年时代的老照片并置在一起，凸现出 50 年时间跨度形成的张力和反差。幸存者的在场和已故者的形象缺席，是影片确定的现实边界。逝者的形象（包括照片）没有出现在影片中，片中留下的是工友的描述和观者的想象。最后一段结尾，是 2005 年清明节弟弟妹妹在太仓祭奠父母时的一组照片。简陋的墓碑矗立在故乡的土地上，随着一张张照片的交替出现，菊珍姨唱的圣歌持续到影片结束，歌词的最后两个字“永生”，是一种盼望，也是父亲的名字。矿工对着镜头的讲述场面基本用固定机位拍摄，而与之并置的大量矿区空镜则使用了很多推拉摇移镜头，在展现环境空间的同时也避免了长时间口述形成的画面单一。从技术上讲，大量空镜的运用，恰当地化解了口述纪录片内容高度浓缩后在剪辑时留下跳接过多的缺憾。影片中口述和空镜这两条主线，是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人证和物证，二者缺一不可。无论是老矿工沧桑的面容还是废弃的矿山，均为影片的灵魂所依，没有了这些，影片将无法存在。

## 诗歌：我的在场

父亲朱永生那段，一开始就是北公房山上的落日特写，接下来镜头的视线掠过三里洞煤矿更衣室内一排排编着号码的作衣箱，再穿过狭长昏暗的过道来到入井口。画外音是我朗读自己的诗《燃烧》。无论是诗歌还是影像画面，均是从一个矿工之子的视角对父辈和煤矿的凝视。这里没有刻意的安排和预先构想，剪辑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些影像和诗句就在瞬间浮现出来。对父亲以及家庭、成长等生活经历的记忆，以及那种无法释怀的浓郁情感是这一章的柱石。在朗读诗歌配音的时候，尽管是我一个人自拍，也依然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泪流满面。连着试录了三次，选用了相对平静的最后一遍录音，但还是无法达到老矿工们讲述

时的从容淡定。我的进入，使两代人在影片中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对话和联系，也使作者的立场，从开始的旁观，进而成为被拍摄者群体的一员。片中的诗歌写于 2000 年，五年之后拍摄的纪录片，只是换了一种表达媒介，那种挥之不去的沉郁和激情，依然驻留在我生命的深处。脉搏的跳动是生命持续的保证，假如作者是真诚的，其拍摄的纪录片也必定回荡着作者的情感和呼吸。

## 时间

影片长度和片中内容展现的时间长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片长取决于影片容量及其张力。一部史诗性的影片素材很难在一个标准的影片长度内得到充分展示。而一个短片的内容也无法拉长为鸿篇巨制。一部影片的长短，只能在剪辑生成的过程中确立。将一堆复杂庞大的素材压缩成一个短片，就像删除了全部的枝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颗树了。尊重生活的本来面目和基本形态，是片长的尺度。影片内容涉及的时间，尽管已在剪辑中加以浓缩，仍需显出时间的痕迹。即使年代久远，什么都拍不到，也可以去拍遗忘，那也是时间的见证。《同学》中拍摄人物的一天，剪辑后的影像不到十分钟，但通过不同时段的光线变化，依然记录了时间的流逝。

## 空间

影像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再造，不是现实本身。经过制作者的提炼和重组，影片的空间虽以现实为依据，但本质上已演变成主观建构的空间，并融入了作者的观察、经验和剪辑。影片的空间有三个维度，首先是用声音建立的空间，由于现场声的存在，使影像由平面走向纵深。其次是镜头中展现的空间，浓缩了生活环境的常态。第三个是通过剪辑切换形成的想象空间，它不是现实空间的翻版，而是一种和现实平行的，通过不同角度、距离的画面并置产生的一种空间关系，但和现实又不完全脱节。影片空间和生活空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部影片不可能把现实空间完整地转换成影片空间，影片空间有其自足性，它是现实空间的浓缩和切片，具备其一切属性，但无法包罗大观。剧情片常常会把在多个城市拍摄的画面剪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影片空间，但观众仍感觉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按导演意图进行的选择组合，没有严格照搬现实空间的样貌，只要这个影像空间看起来是合理的，就能够成立。剧情片的拍摄更像是写一部小说，除了像小说一样将现实中不同的人物原型整合成一个人，也可以选取不同地域的场景来组成影片空间。还有的直接通过搭建布景或电脑制作，对现实的空间进行重建，但依然会遵循生活的常理。写实性的纪录片和剧情片很大一个区别，就是必须在限定的现实空间中组接拍摄到的素材。眼睛的视野就是纪录片展示的空间尺度，尽管拍摄者没有在画面上出现，但镜头的注视，已揭示了他的存在，也必然站在生活中实际观看的角度。曾看过一部纪录片，其中一段车厢内近景画面，镜头像乘客的目光，注视着面前的一切。紧接着切入一个从高处俯瞰的大全景，一列火车远远地从群山中驶出。两个不同视点的镜头并置，使已经建立的空间关系产生了断裂。后一个镜头像上帝的视角，与前面人的视点没有联系。有些纪录片过于追求艺术表现和技巧，常常使影像停留在生活表面而缺少必要的深度。其镜头切换的不同画面，更像是不同景别、视点的拼图，而不是生活中我们用眼睛实际注视的空间。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构，还应该包括人群、心理等社会成分，是一种动态的整体观和存在感。即便是在多个地域拍摄的散点式纪录片，也仍需要恰当地展现出地域的空间维度。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生活根基和敏锐的观察力，才有可能准确地把生活的空间转换到影像中，并保留其原有的复杂和混沌。

## 表象与真相

被遮蔽在深处的真相，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纪录片有着天然的局限性，使我们在大多数场合只能捕捉到生活的面相，而无法抵达深层的真实。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基斯洛夫斯基最终放弃了纪录片制作而转向剧情片，作为他个人这样的转向无可非议，我们也看到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后来的剧情片成就远远高过纪录片，至今仍然是这个领域对生存本质最为卓越的洞见之一，而其记录片则相对表面和平庸。但这并不足以否定纪录片的存在。生活是永远无法穿透和穷尽的，哪怕我们拍到的仅仅是生活的面相，也依然有着拍摄的充分必要性。不管我们做出多大的努力和能走多远，也永远处在抵达事实真相的路途中，面对危机四伏充满歧路的社会现实，个体的观察是有限的，事物不可能被完全知晓，通过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揭开故事背后，依然存在着混沌未知的世界。镜头拍下的有限素材，仅仅是生活之惊鸿一瞥，而生活在继续，其呈现出的样貌，也依旧像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理性的思考和直觉的表达，催促着我们继续前行。这些记录下来生活影像，虽然仅仅是生活的一个切片，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感受生活和认识现实，并缓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怯懦和恐惧。

## 粗粝和精致

我喜爱的影片，从塔尔科夫斯基、基斯洛夫斯基一步步走向法斯宾德与赫尔佐格。制作的纪录片，也从《陈炉》对美和诗意的沉醉中惊醒，走向凝重、粗粝。煤矿题材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只能是粗粝的，无论是矿工的个性，还是煤矿的工作生活环境，都注定了与精致唯美无缘。朴拙、粗糙、厚重是其沉默的底色，过分精细化的影像语言不仅无法再现煤矿的质感，反而会失去矿区生活中原本的粗粝、混沌和大气。如果拍摄的是一群都市白领，则无论影片内容如何跌宕起伏，精致绵密的影像语言与他们的生活品味始终同步。不同人群的生存模式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有其自身的品格，并给人不同的体验。粗粝和精致是风格，更是质地，影像表达要准确地与所拍摄的内容相匹配，方能传达出那种特有的空间感觉和本质。作者个人的气质、阅历和经验必然会渗透到影像中，但不可以取代和压倒被拍摄内容本身所体现出的整体倾向。卡帕拍摄的虚焦模糊的诺曼底登陆照片，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具备了真实再现的多种要素。作者的在场，能见度很低的环境，以及时间的紧迫感和运动张力，使静止图像传递出动态影像一样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如实记录了拍摄现场的外在环境空间和内在心理空间的双重维度。在这里一切关于影像的技术指标全部失效，而鲜活的生命运行轨迹成为其力量的基石。剧情片的规则不能裁定纪录片，就像足球的规则不能用于橄榄球。一部剧情片要求的技术达标，构图完美，影像效果出色等必备要素，对纪录片来说，是一个参考，但不是必须的。纪录片的好坏有另外的标准。面对拍摄中一场突然而起的冲突，是否能够及时反应并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是一个优秀纪录片作者必备的素质。在这里那些技术上的吹毛求疵没有意义。镜头可以是模糊晃动的，焦距可以是不准的。而这种晃动画面恰恰和当时的特定情境是一致的，此时如果用三脚架拍摄出十分稳定的画面，则与当时的气场毫不匹配，是超然和冷漠的注视。对一部纪录片来说，是否忠实准确地将生活转化为影像，以及影片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比技术更为重要的指标。有评论者指出，《三里洞》里面有一种不安，缺乏一种宁静从容的氛围。这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三里洞》中粗糙简陋的影像，是特定制作条件和心境的产物。内心的持续紧张、不安、焦虑以及情感的投入，使一部本可以十分沉静的影片，带上了作者的生存痕迹。头脑时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切换，令人十分疲惫和困扰。再加上技术设备的简陋，只能做完一段将素材删除后，才能再导入第二段素材，并时刻担心着系统的崩溃和文件的丢失。影片的拍摄和制作环境决定了影

片的面目，尽管后来修订了一次，但这种粗粝的风格依旧。

## 声音

见过太多与影像本身毫无关系的配乐，使我对音乐的使用十分谨慎，尽可能使用现场声而避免人为配乐。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声音，足以支撑起影像的空间。无论是山间的瀑流喧腾、风声鸟语，还是都市的车水马龙以及无处不在的建筑施工器械声，均成为一个时代和地域的表征。现实中声音的密集和嘈杂程度也往往与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竞争压力大小成正比。到处行色匆匆地来往人群，不断迷失在钢铁水泥的城市丛林中，快节奏和焦虑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这里见不到从容安逸、悠然自得的生活姿态和情调，即便把舒缓悠扬的音乐放入这样的空间，也很快会被周围喧嚣的嘈杂声所淹没。声音必然和空间相匹配，这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启示。即使影片中需要配乐，我也会采用拍摄现场的声源。像《陈炉》的秦腔，是当地民间自乐班的自发演唱，《三里洞》中唱圣歌的菊珍姨是基督徒，这些乐曲和歌声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和影片内容非常协调，并带有当地特有的气场和属性。在纪录片中采用的现场同步录音，虽然达不到所谓高保真音质要求，但那种杂乱的噪音恰恰是当下现实的准确呈现，且具有支撑起整个空间的能量。一旦去除了这些粗粝混乱的现场声，无论将配乐和声音做到如何精致，所营造出的声音空间也是密闭的，不再有现实的空气流动，音色也会在纯粹中显得单薄纤弱。混沌是一种力量，在纪录片中高质量的声音，是指对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声音进行忠实地记录和还原，而不仅仅是为了艺术的缘故去达到某种声音的技术指标。那种刻意做出来的声音，和生活本身无关。现实中各种层次的声响使无病呻吟的配乐显得矫情和无力。我不喜欢配乐，更热爱和迷恋现实生活中无限丰富的声音，那是真正高质量的声音，和生活完全同步。

## 剪辑

纪录片的生成是在后期剪辑阶段。在《三里洞》拍摄时，心里只有一个大致的结构框架，即没有前期调研和脚本，也不知道最终能拍到怎样的影像素材。持一种完全开放的积极心态与片中人物相遇，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成分。只有到了后期剪辑时，通过对大量素材的反复甄别拣选和不断摸索，才能使影片从混沌和黑暗处逐渐浮出水面。开始花了很多时间将影像素材中的口述笔录下来，再根据笔录文字进行浓缩和删减，整理出文字脚本。然后导入素材进行剪辑。先剪出章节的口述部分，然后再插入空镜。《三里洞》拍摄的素材量较大，不可能全用，近20万字口述素材，90%都删减掉了，仅有10%左右保留在完成的影片中。剪辑的原则是尽可能浓缩，将繁杂的枝叶大幅删除，仅保留主要的枝干和部分细节。这里没有面面俱到，只是以自己的直觉把握住关键和本质的东西。如果换一个人剪辑的话，可能对素材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在这里依然体现出制作者的个人视角。虽然是一个浓缩的影像文本，也基本保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和形态。

## 版本

从《陈炉》、《三里洞》、《同学》一直到《瓦斯》，都只有一个确定的版本，虽然在剪辑过程中反复斟酌修改，但作品一经问世，影片长度就固定了，不再做变动。这几部作品的片长分别是29分钟，172分钟，203分钟，136分钟。《三里洞》由于生存环境的制约，剪辑时完全无法安静地从容制作，2006年12月完成第一版后，于2007年7月对个别地方做了修订，替换了片头和中间的几个镜头。《同学》为避免误读，去掉了最后一段的国旗画面，

影片长度都没有改变。在剪辑阶段，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完善，影片完成后就基本不再修改了。就像一个婴儿，出生时带着先天的不足和优势，并成为其个性的一部分。一个完美的洋娃娃是苍白的，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

## 限制和应对

纪录片制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这其中既有拍摄条件和生活本身的限制，也有社会环境的制约，它不断拷问着作者的良知和纪录片揭示真相的可能性。限制是一种缺憾，也是一种激励。恶劣的拍摄环境造成的困扰，常常反过来激发和提升作者的勇气和信心。我拍了十年纪录片，最近才有了自己的拍摄设备，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纪录片，也受到诸多制肘。这些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去做，最终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其他方面的阻力，也一样无法迫使我停下行进的脚步。多年来一直在银行供职，每天八小时的日常工作占去大块时间，拍纪录片只能利用节假日进行。像直接电影那种长期跟拍的方式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即没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投入，也不可能随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拍摄现场。所以我只能拍摄以口述为主的纪录片，用有限时间捕获生活的切片，并通过人物的述说保存记忆。这是一种直觉选择，更是在自身条件和环境限制下的应对。采用群像的表现方式，也是为反映更加深入和宽阔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持续努力。限制和缺憾，没有成为捆住手脚的桎梏，反而促成了我拍摄纪录片的风格和特点。假如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宽松的拍摄环境，我依然能够拍出现在这样的纪录片吗？回答断然是否定的。弹簧的压力和反作用力，阐释了纪录片生长与当下现实的密切关系。作为这片土地的儿子和义无反顾的纪录片制作者，在生存和拍摄中遇到的各种困境，使我对被拍摄者的境况有着切身的体会，也使影片和现实有了一致性和针对性。这些都不是刻意地处心积虑，而是越过重重路障之后的水到渠成。无论是当下的生活还是纪录片，已很少能从容淡定，一部纪录片的完成，也必然是重重压力下不断挣扎的产物。

## 业余

在夹缝中生存的个人纪录片，超越了作品的商品属性成为一种表达，也避免了市场对纪录片的禁锢和窒息。多年来，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谋生，拍纪录片处在完全业余的状态。对我来说，业余是一个褒义词，它意味着除去附加其上的各种利益考虑，可以专注地和生活本身发生联系，也与制作者的心灵共生。由于拍纪录片不再是作者的谋生韬略，于是就变得相对简单和纯粹。除了对作品负责，而无需顾及诸如投资人、公众趣味、经济效益等外在因素，也不再仰人鼻息。执着于纪录片的记录属性，不顾及市场，不讨好观众，直指当下的社会现实，并成为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在为生存做出诸多妥协，遭遇无数困扰、焦虑和无奈之后，这些用心灵浇灌的纪录片，使一个个匆忙度过的庸常日子显现出自身的尊严。当一个纪录片作者无所顾忌地投入到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和记录时，同时也拥有了自生自灭的自由和寂寞。业余，应该是纪录片创作的理想状态，而作者遇到的各种压力和生命体验，最终会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遇到的纪录片作者，多数处在这样一种业余状态，很少有人能通过拍摄纪录片维持生存。也许是为生活本身的力量所折服，真正的纪录片作者，总是十分低调和谦逊，成为这样一个无限膨胀时代的异数。

## 直觉

无论是拍摄还是剪辑，遇到无法决断的时候，我信任直觉。影片有自己的生命，无法完全按作者的意图去实现，而采用随机和相遇的拍摄方式，为纪录片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上

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会打开一扇窗，这句重复无数次的话，现在依然有效。没有刻意和胶着，坦然接受命运的赐予。那些看似错失的机遇，往往会在下一刻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实践中的反复印证，给了我一种完全开放的心态和信心。只要俯下身去，生活就一定会为你绽放。那些精彩纷呈的影像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也使我对存在本身的深不可测感到敬畏。

## 文化殖民地心态与自信

遍地开花的个人纪录片，是对当下生活的回应，也有着直接的现实针对性。他者的远距离评判，既无法恰如其分，也不足以说明作品的高下。多年形成的文化殖民地心态，使我们的批评话语一向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建树，而盲目照搬的各种理论概念，在对本土影像的读解中也往往导致偏差和曲解。一部纪录片，必然和脚下的土地发生联系，而土壤和环境，最终决定了作品的生长空间和存在形态。作为一种策略，为某些现世考量主动或被动进行的自我阉割，是机会主义的不自信表现，也是对观众和自己的不尊重。作品的面目，有其内在生成的必然性，既无法预设可能的观众群，也没有必要为某些标准的存在而改变影片的自律。强悍的作品是自足的，不需要通过外在的认可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准确忠实地记录了此在的生活，就必然会得到有类似体验者的共鸣，且不会因地理和时间的阻隔而减弱。视界是完全开放的，一些既定的评判标准只是为了能够被不断地打破和修正而存在。对于尚未建立自身评价体系，而只能任由某种强势垄断话语进行评判的时候，一些地域性、原创性突出或是内容强大而技术相对粗糙的影片，由于不合乎主流标准或选片人口味而被忽略。而评判者对原生态纪录片及其生成背景的隔膜，也往往使其批评缺乏应有的分量和准确性。一部纪录片的价值，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准确地将生活转化为影像，作者和评论家的话语均无法取代作品本身的说服力。在湖南的一次纪录片研讨会上，一提到直接电影，与会者马上众声喧哗，进入一片混战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建立依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把偶像踹到沟里去，不要让先驱的高大身影遮挡住前行的视线。只要扎根于沃土，就必然会开出奇葩。每个人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是高亢还是低沉。面对大师或某种标准的膜拜必然导致自己声音的缺失。一种自觉、自信和对脚下土地无可救药的沉溺是记录影像的出发点，而风格和手段也都由此而生，任何将个人艺术表达凌驾于生活之上的所谓创新和花招，和土地毫不相干。共生，是一种自然而然地抵达，而不是刻意的乖戾和扭曲。作者眼中的世界，既是客观的写照，也是心灵的外化。就像牛吃草产奶一样，观片的经验，会潜移默化地转化为成长的营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都不妨碍我们去吸收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生硬的风格模拟是无力的，因为那种特定的样式，生长于另一片土地。强行的移植，必然带来夹生，也失去了自身天然具有的原创性。在制作过程中尽可能简朴直接，避免过多的修辞。对纪录片来说，忠实记录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只能尾随其后，且只在有助于影片更加准确地阐释生活时才有效，而不是反过来让生活成为艺术的人质。曾有观众问，你们拍的纪录片，即没有商业价值，也没有发行放映的渠道，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拍摄？我答道：虽然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一步步迈向死亡，大家还是照常坦然地生活着，没有惶惶不可终日。拍纪录片也是一样，那是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办法用利益来决定取舍。

## 边界

现实在给纪录片制作套上枷锁的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没有必要固守僵化的教条和模式，向任何一个方向的突围都应该得到鼓励。无论是实验还是写实，均会扩展观察生活的维度。实验和剧情等多种因素的渗透，使写实的边界更加模糊和宽泛，同时给



纪录片拍摄带来更大的诱惑和挑战，一种无边的写实主义观念最终得以确认。纪录片的艺术性，表现在作者对记录现实生活的影像素材所进行的创造性处理，但依然忠实于生活本身的样貌。不管个人的视角如何主观，其行为与思想也仍旧是客观现实的组成部分。一个人用影像去记录生活，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被动地复制出一个现实的副本，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依然存在于影像中。时间、地点、事件与人物的选择，影片风格和镜头语言的把握，对生活内容的浓缩尺度、影像空间的主观建构以及情感的渗透，都体现出个人纪录片强烈的作者性。在任何时候，生活都比艺术更重要，尊重、坦诚和信任是拍摄纪录片的通行证。为了作品完整而推动剧情发展或是偷拍的做法，均不是我的选项。还有一种剧情纪录片，在混淆纪录与剧情边界的同时，也带来创作上的自由和舒展，这种杂交优势，为纪录片的发展注入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纪录片所独有的记录属性和剧情片更加无拘无束的想象空间。注重剧情的纪录片其核心依然是记录，只不过具备了一些剧情片因素，使可看性更强。带有记录特性的剧情片，或者叫纪录剧情片，只是把记录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运用到创作中，而更注重影像自身的艺术表达。随着影像的发展，这样简单的界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多种取向的交叉缠绕，会带来更多晦暗不明的混沌地带。或者就叫做影像或电影，而不去管什么剧情和记录的区别。我时刻期待着影像的更加多元和开放。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依然会固守记录的边界，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并使记录下来的影像拥有生命的体温。

## 风格

造型古朴的汉代陶俑，大巧若拙的简牍文字以及浑然一体的霍去病墓前石雕等，其形态均有着大方的造型和介于方圆之间的饱满张力，这种雄浑朴拙与混沌不雕的品格，乃中国艺术传统的精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希望能在影像中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注意细节刻画但不伤及整体混沌粗犷的影像或与之接近。当下的个人纪录片，多数看起来比较土，制作上也不大精致，带着鲁莽的山野气息和厚重的生活质感，不管不顾地在坚硬的大地上发芽生长，并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里没有优雅、轻浮、从容的余地，也没有无病呻吟和装腔作势。作者的介入是迫切的，带着不可抑制的生命冲动和挣扎呐喊。其所呈现的草根样貌，与资金充裕的团队制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专业团队在产业链中打造出技巧高超的华丽影像时，个人纪录片更像是西北乡下一个淳朴的老农，面朝黄土，背靠青天，在简陋的环境和劳作中，建立起自己的影像天地。个人、低技、粗糙、丑陋、窘迫、直接、杂生、业余等等可以是它的相关词语，而土地最终决定着影像的风格与面貌。在这样一个地球村时代，距离和时间都已经不是问题。一个人能够接受的作品，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认识相关，也看能否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与其相遇。我20来岁时无法欣赏徐渭的书法，觉得不好看，习书多年以后，才终于体会到其粗拙洒脱中的深意。开始喜欢气势磅礴的音乐，尚无法进入室内乐的境界，直到很久以后才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心醉神迷。与心仪的作品相遇是一件幸福的事，但也存在着恰当地时间和契机。某些作品一出现就会赢得满堂的喝彩，而有些则需要黑暗和漠视中度过相当的年月，或许就在这默默等待中消失了也未可知。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只是历史长河的流沙中留下的幸存者，更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作品早已淹没和消失。

## 关于镜头语言的几则断想

1、圆融无碍的镜头语言是技巧更是一种境界，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和朴素，任何刻意的修辞，只是一种打着艺术旗号的装逼。

2、好莱坞式的漂亮画面，因其矫情和虚假令我感到厌倦。真实永远是直接和质朴的，只要影像中蕴含着生命的激情，哪怕是黑暗，也决然是美丽的。

3、重要的是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一段生命是真实的。它可以越过生活的表象，抵达生命的彼岸。

4、镜头是记录者的眼睛，对一个现实空间凝视的时间，决定了一个镜头可能的长度。为了艺术的标新立异而刻意超出视觉常规的长镜头，即没有道理，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

5、镜头的陌生感，是指通过拍摄者的独到观察，对人们早已熟视无睹的现象、场景和事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给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它是拍摄者个人眼光和声音的体现。

## 纪录片《三里洞》的细节

影片的架构是主干，丰富的细节是枝叶。通过细节的呈现，可以将逼仄的空间延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并给予观者真切地感受。

细节1：复调。葛登发那一段最后，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困境，葛登发和妻子刘梅娣以及儿子葛龙之间的对话，像音乐上的复调。在老房子将要拆迁引发的话题中，你一句，我一句，相互交叉缠绕，始终无解。这是生活本身的复调，用不着刻意去寻找，记录下来即可。

细节2：暗示。姚洪昌家墙上的玩具风筝小蜜蜂渐渐地隐没在黑色的“十字架”（窗框）中心，画面外我和姚洪昌之子谈到一个童年的小伙伴，中学毕业后招到矿上，没多久就在井下事故中去世了。对话的时候，自然联想起我们的童年，就像那只代表着纯真童年的蜜蜂玩具，被画面中十字形状的窗框特写所吞噬一样，过去的我们也已经被时间抹去。那个蜜蜂风筝和窗框本身是中性的，只是室内空间的一部分。但通过带有情感的镜头凝视，使两个画面的溶接，有了一种不祥的暗示。



108 (1-6)

细节 3: 反衬。讲完自己的经历, 刘梅娣说“我现在想想真想哭”。一面说着她已转身进入屋内, 我们没有看到她此时的表情。镜头推上去, 门上一个小娃娃挂件来回转动着, 默默地注视着镜头。



109 (1-4)

细节 4: 并置。矿工们青年时代的照片和现在苍老的容颜形成的对照, 展现了被时间齿轮碾过的生命痕迹。



110 (1-2)

细节 5: 象征。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会想一些很宏大和细微的问题, 从宇宙的演变到昆虫的生命。当我对着一只蚂蚁近距离持久地注视之后, 抬起头看到整座城市时, 会感受到个体生命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巨大空间和时代命运时的极度微弱, 这只蚂蚁是我的父辈, 也是我们自己。



111 (1-4)

细节 6: 联想。拍空镜画面时，从北公房破旧的矿工住宅内传出一个孩子清脆的英语朗读声和三里洞矿部暗夜里断断续续的二胡练习声，同样令我感动。从老矿工的口述中，我感受到面对命运无常的坦然。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失去希望和信心的坚韧，也依然在传递。而童仇讲到文革时，隐约从远处传来的部队操练声，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和情境中显现出时代的悖谬。

细节 7: 对比。画面是禁止明火的标志，声音是老矿工讲井下已经失火了，领导还叫矿工下井挖煤。在侥幸心理和利益大于一切的主导思想下，煤矿的安全规章已形同虚设。



112 (1-2)

细节 8: 反讽。墙上的标语写着“高高兴兴入井，安安全全下班”，画外音讲述的是井下出事故又死了一个矿工。



113

细节 9: 隐喻。讲到三里洞煤矿已经破产的时候, 画面上一盆脏水朝三里洞煤矿的大门口泼了出去, 大门上方歪斜的矿名也喻示着煤矿的衰败。



114 (1-3)

细节 10: 对位。刘梅娣讲干了一辈子, 什么也没有得到时, 画面上出现了矿工家属区墙壁上涂写的成语“南辕北辙”。说到老矿工都没钱买房时, 墙壁上的涂鸦写着“没钱买房”。



115 (1-4)

细节 11: 呼应。葛登发讲“立了三等功, 现在连窝都没有了”的时候, 画面从家属区向上摇, 定格在什么也没有的天空。



116 (1-4)

细节 12: 荒诞。一边是宣传标语“撤离危险地带, 人人平平安安”, 一边是老工人在讲房子要是拆掉了, 无处可去也买不起房的窘境。



117 (1-4)

细节 13：希望。刘梅娣讲到将招工指标让给别人时说：“咱也不能看着人家过不去。”画面是破旧的住宅楼窗台上放着一盆花。



118 (1-2)

细节 14：反讽。陆荣初说自己一个女儿也在三里洞煤矿买断了工龄时，画面上三里洞煤矿的宣传横幅上写着“走出困境”。



119、

细节 15：拟景。童伙讲到抓人的时候，插入的是一个矿区孩子打架的画面。



120 (1-2)

## 影像：宏观历史和个体记忆

数千年来，始终是少数人垄断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而芸芸众生的声音完全缺失。从文字、照片到影像，记录载体已变得更加直观、具体和鲜活。而互联网的日趋成熟，也使微博之类的自媒体平台，从参与人数、交互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活方式的改变、视频制作技术的便捷，使得影像记录如生活必需品一样随处可见。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用手机或电脑通过文字、图片与影像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个人纪录片像野草一样从四面八方的大地上迅猛地生长出来。不需要庞大团队和资金支持，一个人、一台家用摄像机和电脑，就可以完成一部纪录片的全部制作，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彻底颠覆了影像工业的制作模式。当下的便利条件使纪录片拍摄，摆脱了正式与拘谨，得以在常态的生活空间中自如展开。由于拍摄者身份的多样性和所处地域的普遍性，其注视的目光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所拍摄的内容也几乎没有隔阂。不需要授权签约，作者的在场和深入以及与被摄者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默契。个人的平视眼光和近距离观察，不仅去除了专业团队与被拍摄者之间常有的距离感和冷漠，也使记录下来的影像拥有了温度。这是第一次由众多来自不同阶层和年龄的个人，用低



廉的设备，自觉进行的民间影像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和现实密切相关的记录影像，必将显现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由普通人来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是个人影像时代的一个特点，也使民众有机会成为影像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垄断话语和民间记录，始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悖谬。宏大叙事的框架，只有融入大量生活细节，才能使陈述更为有力。而把众多个人记忆的石块汇聚在一起，最终会成为用影像建构历史的金字塔下坚实的基础。



121、《三里洞》剧照



122、《三里洞》剧照

## 第五部分 三里洞矿工口述实录

**时间：**

2005 年春

**地点：**

陕西省铜川市

**讲述者：**

顾龙祥

沈龙根

王正祥

姚洪昌

葛登发

张百生

陆荣初

周寿根

王俊彦

罗世俊

倪进祥

丁福珍

江兴怀

王福坤

缪德新

成妙祥

童 仇

高章顺

陈义祥

张电飞

叶永康

毛老福

朱阿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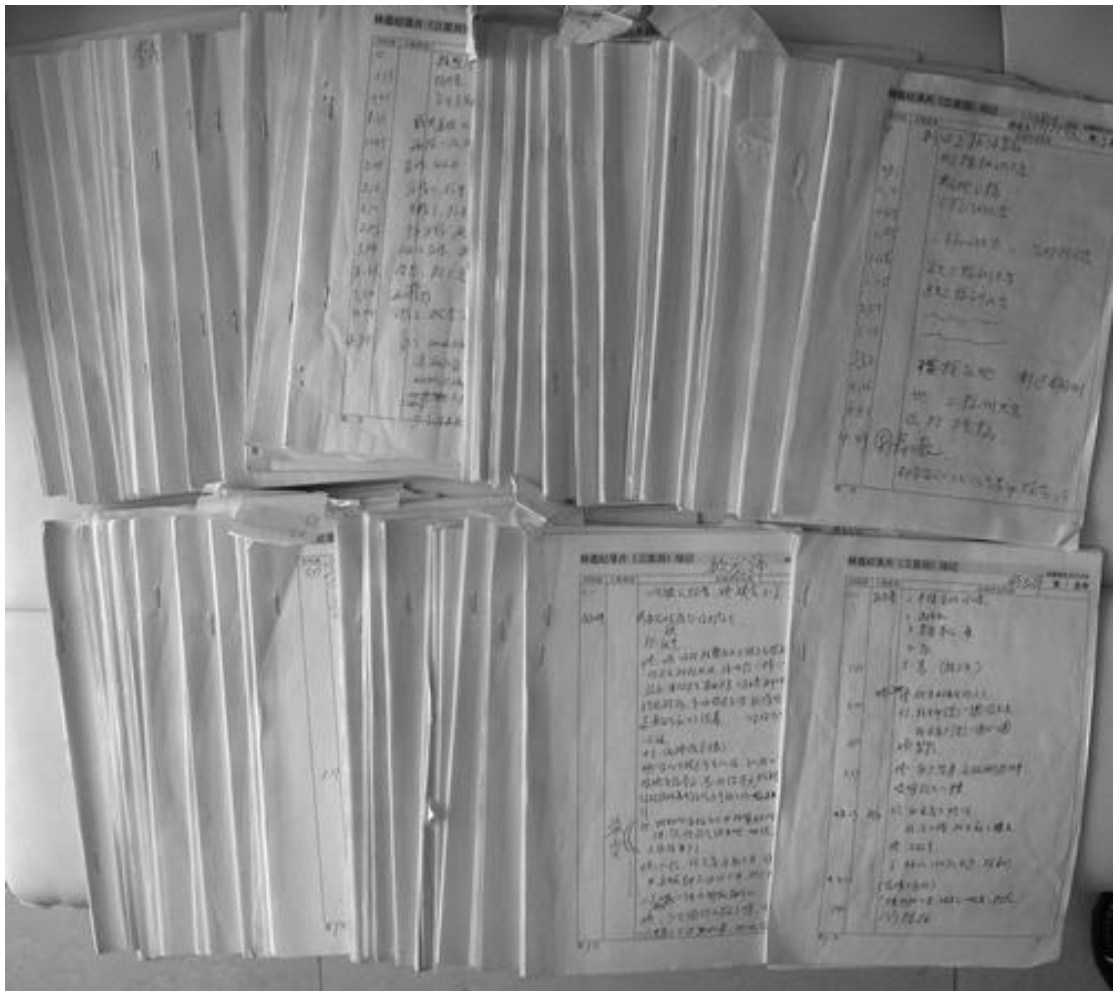
陈长寿

陆根福妻

裘水标



123、三里洞矿工口述记录稿



124、三里洞矿工口述记录稿

林鑫纪录片《三里洞》场记

顾龙祥

拍摄格式 DVCAM  
第 5 盒带

时间段	人物景别	访谈对话内容
0.		顾龙祥
1.23		<p>有的好家伙比事多，有的好家伙比事少还依。有时候好家伙人摸都摸不过去。那样子还比狗好一些。回由猫上这猫的地方，刚不去之接事猫的时候，头也顶就拖帽上顶起，拖住下依一臭，屁股顶在梁上，它啥都不能干，不是屁股顶梁上就头，那个下面确实依。有事多事少，依么像与狗一样往里钻。回刚事的时候事了个师傅也个支冒工，那么么一个家伙拿拿拿以后，那时说理他也听不听去。跟我在他前而在我后面，嘴通一字伙顶在头上，嘴通一字伙顶在头上，把帽子一弄顶下来了，一弄顶下来了，它个话也不管它。有时候训骂子而又接事猫，猫好猫的时候那管道依么有的比这个依，有的好家伙的这个无不多有的好家伙比这个还依人，真像狗一样爬过去，爬过去以后，那后物像狗一爬，这一些人爬爬过去，有的地方依么真跟狗爬一样，有时候看看好家伙哎，师傅嘴一字伙伙，我说我往里拱过去，我往里拱过去。</p>
2.38		

第 1 页

125、三里洞矿工口述顾龙祥部分记录稿

纪录片《三里洞》一共拍摄了71盘素材带，采访老矿工及相关者20余人，由于影片容量所限，最终选用了13个人物约2万字口述，是一个高度浓缩的影像记录。从2005年拍摄至今，七年过去了，其中的一些老矿工已先后离世，现从素材中整理出近20万字的口述实录，是一个比影片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文本，真实地反映了矿工的生活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

## 顾龙祥

顾龙祥，1936年生，上海浦东人，林鑫的姨夫，1955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退休前一直是绞车司机。

何菊珍，顾龙祥妻。

小兰，顾龙祥的二女儿。

林鑫，本名朱林鑫，三里洞矿工朱永生的长子，纪录片《三里洞》作者。  
邻居，媒婆。



126、顾龙祥和妻子何菊珍当年的结婚照



127、顾龙祥和妻子何菊珍 2005年于铜川家中

## 顾龙祥

**林鑫（以下简称林）：**像我父亲那代人慢慢地都不在了，活着的已越来越少。我作为矿工的儿子，想把你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和生活经历，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对我们是个珍贵的纪念。要不等到人一个个都没有了，全部去世了。我们后代想了解你们这代人，去问谁也问不出来了，是不是？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当时从上海来这里是怎么回事，把你自己的经历讲一下？

**顾龙祥（以下简称顾）：**来的时候是55年，参加工作是51年。这个事情你叫我想一想……49年解放以后，我在上海浦东，解放战争把房子都烧了，没办法维持生活。我12岁就参加工作了。那时跟我哥哥一起到杭州，隔了一年，就回来参加了上海房地产公司，52年元月份转正。隔了一两年，进了上海市建筑公司，盖房子。55年的时候，上海建筑单位不搞建设了，有些工作就停下来了，停下来的人也多，没地方工作。那时这里的人到上海的公司招人，建筑公司360个人报名参加。那时是为三里洞矿培训的，来的时候说铜川三里洞煤矿是西北第一流煤矿，是较好的，都是当什么……当小干部、领导，就这样子。那出来时文化程度必须是三年以上，都是有点文化的。我是55年12月份，20几号，哎哟，可能，11月还是12月份，时间长了，11月份，到这里来，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我们一块来的人有360个人。原来建筑单位有瓦工、木工、还有杂工，三个工种都合一，来了都是支援大西北建设。一个是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另一方面是疏散上海人员，所以说支援到这里来。当时分配在采煤区，到采煤区就是个支锚工，顶那个铁柱子、木柱子。当支锚工一弄，身体受不了，后来开始开绞车。当时维持绞车在一矿，三里洞矿还没有维持绞车这种机器。啥意思，维持绞车就是把掌子面木头拉出来叫它冒顶，这样比较安全。当时这个机器不适合掌子面用，后来就调剂到三矿，当时条件比较差一些，分配我开运输绞车，后来就是干支锚工。当时在三矿开绞车的话，那是最大的一个绞车，在井下开的，大概开了一年多。我52年在上海当瓦工的时候，50多块钱一个月，三级工。到这里来做煤矿工，开始拿18块一个月。采煤的、掌子面的拿井下一级工，也就是拿30多元一个月。

57年后，三里洞矿移交生产，把这些培训的人都抽回来。干啥还是干啥，开绞车还是开绞车，干支锚工还是干支锚工，采煤还是采煤，掘进还是掘进。我从57年三里洞矿移交生产，一直开绞车，原来在井下工作，到文化大革命66年，从井下调到井上开副绞。那时我在上面，看下井的煤矿工人，全是黑脸，光看见牙白白的，都看不出来。下去时认识，上来就不认识了，认不出人了。那时通风也差一些，到后来就好了。在副井开了一段时间，到主井。主井是专门提煤的，副井是专门上下人。到主井开了一段时间，又到副井上干。这两台是上面最大的绞车。到92年退休，这是一段工作历史。

不过在工作时间，也碰到了，也看到了。就是讲咱们一块来的，叫戚国其，55年从上海一起来的，那是矿上发生事故死的第一个人，他是第一个。为啥，那时主绞绳子一断，机斗下去了。那戚国其是在主井底下开水泵的，他开着没啥事，到安全洞休息，安全洞在旁边。机斗下去的时候，冒失了，也许是开绞车的思想不集中开过了。上下提煤的机斗是自动的。上来的时候失误了，一失误把绳子拉断了，机斗哗一下下去了。下去了以后，有一股风将他从安全洞里掀出来，当时机斗就把他压死了。那是矿上第一个发生事故死亡的人。那时咱矿上对这个人还比较重视，开追悼会弄啥子，把他家里接出来，有工作没工作。开追悼会的时候，他家里还在上海，把他家里人接出来，开追悼会。那时候矿上司机都参加了追悼会。这是矿上第一次发生事故。时间长了，发生事故多了，那矿上就那么回事了，不重视了。重视也重视，比第一个稍微差一点。咱矿上一起来的，一起开追悼会的，砸死的，这一个我记得（后事处理的）最好。为了支援大西北，支援煤矿，在井下开水泵，发生事故把命送了。其他方面像掌子面发生事故呀，掘进上发生事故呀，运输上发生事故呀，多了，这种事情多了。我在井上开绞车，井下发生事故，经常到井口去看，到井口看看是谁，砸死的人咋项，还有没有命。有的人有口气了，马上送到卫生所，帮他急救，有些人不行了，没气了，放到那井下回风巷。等人上下完了以后，几个人把他弄上来放在太平间。太平间在井的后面山上。那个太平房也是新造的，矿上推算超过十来个人了，就建造了这个太平房。为啥建了这个太平房，原来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放那个土窑洞里面。时间一长，老鼠呀、虫呀，咬那死人。有的把耳朵都咬下来了，把脚趾头啃了。后来看看不对，矿上就另外盖了太平房。那太平房高级，底下一圈用洋灰圈起来，老鼠进不去，吃东西都进不去，上面也比较高。下面发生啥事死亡了，都放在那太平房里。有时候底下发生事，当时人就不行了，直接就拉进去。十里铺矿医院也有太平房，直接放太平房里。解决就解决，实在不解决就放在十里铺太平房，以后慢慢解决。其他事情记不清了，时间长了。反正矿上的事，基本上一个月要发生一个事故，发生事故也不一定死，也不一定不死。反正是严重的死的多数，一般性的小的嘛，都是碰手呀碰脚呀，出事砸一家伙，这都属于一般性的。有的好家伙溜子上发生事故，溜子不是来回开嘛，人有时候想走近路，从溜子上跨过去，跨不好就叫溜子压住了。手断了、脚断了，多得很。你看现在十里铺矿医院，断脚断手的多得很呢，具体就是这些事。

**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听说过断绳这回事。除了问你们这些老人，问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听说出事后好多人都跑回去了？

**顾：**当时你回去，建筑公司还收，还要。

**何菊珍（以下简称何）：**那你咋不跑回去？

**顾：**那出来了呢，年轻人好多都跑回去了。

**何：**你爸和你姨夫俩都是老实人。

**顾：**那时，这件事发生以后，有些人就跑回去了。跑回家以后，上海市那个建筑公司还收。还有一些调动工作了，原来是建筑单位的，铜川市建筑公司也有，基建公司也有。一方面建设，一方面调到其他矿的也有。还有一个沈龙根，黑脸。

**何：**那个在3单元，他是下井挖煤，脸上炸的全是黑的。

**林：**因为老人我不认识，所以我先找我姨夫，找了姨夫，这些老人就一个一个容易找到



了。

顾：倪进祥一个，沈龙根一个，那边那个叫啥？

何：陆根福。

顾：不是陆根福，他娃在那个电厂的。

何：噢，王正祥。王正祥、陆根福都是一起来的，陆根福已经没有了，死了，今年死的吧。

林：现在剩的人不太多了。

何：没有多少了。

顾：老倪和王正祥他两个没啥事骗闲传，他们说还有谁，还有谁，还有个奚海金，住在我们上面。他也是和我们一起来的。这一块活动的还比较多。

我在井下时也出了一次事故，出了啥事故？那时休息不好，上夜班，绞车咕噜噜、咕噜噜转呢，脑袋瓜子不知想什么。眼睛看着睁的大大的，实际思想不知想啥，想想就忘了，扑通一家伙拉过头了。我在井下知道了，一下把棚梁拉断了好几个，降了一级工。那家伙就是人为的，你看着好家伙眼睛大大的，你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想啥，还不知道弄啥，等到你知道了，事故已发生了。你想想在上面开主副井，都在保卫科备过案。像那个戚国其死了，那也是开绞车事故。你注意力集中，不要胡思乱想，也许不会出那么大的事故，也不会把绳子拉断掉下去把人都砸死了。有些重大事故是人为的，有些不是人为的，有些是机械事故。你休息要好，操作方面要集中精力。一个耳朵、一个眼睛、还有嘴，还有手。手是操作的，你耳朵是听的，眼睛你要看的，这三个东西要配合到一块。你三个东西两个配合不到一块，那就要出事故。下去的人，上罐的人，下去的人规定一罐是 12 个人，有时候人多，你也挤、我也挤，有 20 多人。那 20 多人再装 20 多人，一上一下是 50 多个人。那 50 个人的生命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说不好听的话都靠你开绞车。你赖好不注意的话，嗵，一家伙去球了。上面不知道啥矿上，下去有四五个人，四个嘛五个人，下去时候，人也麻痹了，碰罐了，呜呜下去了。等到他知道了，马上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罐笼嗵一下下去了。嗵，一家伙下去以后，咋，有的人那个腿骨从肚子里出来。腿，那个腿的骨头，从肚子里面出来了。有的直接把腿碰断了，下去那多快。你看像咱那个井里边提水，绳子断了，水桶扑通一下下去了，不是砸扁就是砸烂了。那个罐笼下去有多厉害，那下去多厉害。听人家说，四五个人，两个或是三个报销了，当时就报销了。还有一个还是两个也是重伤，下去就没有命了。咱这矿上那个井筒，上下人那个井筒 170，从上面到下面 170 米。主绞是 200，深度要 200 米，副绞上下人 170。这还不算高，有的地方还高。有次到鸭口矿参加检修，那鸭口矿往下 300 多米，将近 400 米。那要掉下去比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还大。开绞车也危险，严重点讲，说不好听，那命都在你掌握着呢。你一个不注意的话，啪，都报销完了。所以开绞车的，不管是上夜班也好，上白班也好，一个是要回家休息好，还有是操作的时候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不要想啥，你想想，想到后来，思想一抛锚就完了。就是比较危险，讲不好听你开绞车也是开的提心吊胆的，你下去上来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些人下去上来咋样，掌子面，主副井，上来嗵一家伙不是完了。过去为啥一个月一开支，半个月就没钱了，因为这钱在半个月都花完、吃完、用完，用完了大家安心工作了。这煤矿工人下去不知上来上不来了，就考虑这个事。发了工资就吃、花，花完了再下去挣，死了去球，就这种思想。像你爸他当瓦斯检查员，瓦斯检查员也是个提心吊胆的事。哪个地方没有去，他第一个要去检查瓦斯，去测量。刚才不是说了上面死了 100 多个人，那也是瓦斯爆炸。

刚下去支援采煤的时候，走路都不能走。不是屁股顶梁上了就是头，那个下面确实低。差不多低的像只狗一样往里钻。刚来的时候，来了个师傅，也是个支锚工，那么长一个斧头拿着，那时说话他也听不懂。走，跟我走。他前面走，我后面扑通一家伙顶在头上了，扑通一家伙顶在头上了。把帽子一弄顶下来了，一弄顶下来了，走个路也不会走。有时候到掌子

面支援采煤，撬煤的时候，那巷道低的，人真像狗一样爬过去的。爬过去以后，稍微高一点，高一点人能站起来，有的地方低的真跟狗爬一样。师傅说了，你不过来也不中呀，只能拱呀。一拱还有个矿灯，矿灯挤不过去，一动挤住了。那确实是你不想下井采煤撬煤哩，走的路低的地方拱都拱不过去。有些老工人不慌，个子低的瘦瘦的习惯了，那低的地方出溜一下过去了，出溜一下过去了，我就是过不去。不是屁股顶住就是头发顶住，就是过不去，爬都爬不过去。那师傅说，赶紧快点快点。不用说爬过去干活了，钻个窟窿一身汗，根本干不成。跑到那边气呼呼，坐了一会好好休息吧，给我拖个木头，都是1米长的，也有1.5米的。有的地方一个人都过不去，拖一根木头就更钻不过去了。钻不过去，给我一根绳，把那根绳头系在木头上，一头系在腰里面。屁股撅过来像狗一样爬过去。时间长了，有些最低的地方咕嘟挤过去了，咕嘟就过去了。为啥支锚工他拿个绳子束在腰上，那个真是地方低的人过不去的。一头系在那木头上，一头系在腰上，吃着劲爬过去。木头系在你身上，慢慢地慢慢地这样，这是比较困难的。还有那个采煤，刚去的时候不习惯，空气也受不了。那个煤肺，就是工作面吃的那个灰尘。特别是溜子尾，那个灰尘可大，溜子尾那边是进风的，这边是出风的。这一溜子空气，从溜子头到溜子尾都出去了，最后溜子尾的地方空气最不好。有些人脸、眼睛基本上还能看出来，有些在溜子尾撬煤的人，只看见一副牙，白的，里头都是黑的，看不出来。说明空气不好，时间长了，还不都得煤肺。下面干活确实辛苦，那真的我给你说，我下去干活像小老鼠一样，跑起来快，耳朵也听，眼也看。你看有时候掌子面弄煤，煤撬着，眼睛还给其他人看着。看着什么，看着上面冒顶不冒顶。如果冒下来，赶紧跑呀，压下来那不压成肉酱呀。你一看不对劲赶紧就跑，那时候不管好跑不好跑，反正躲出去算。有些躲在煤道那个地方，比较好一点，那是躲不出去。有时大冒顶了，整个100多米掌子面，呼通一家伙整个下来了，那下来危险。原来在西山上的那个大冒顶，整个掌子面轰一下下来了。下来以后，可能也是殇了几个人。那还比较好一些，还搭了木头，这样子一个一个，木头搭了上面。顶上如果冒顶，就冒在木头上。有些人跑出去了，在木头周围蹲着，后来人家抢救了。没走到木头那儿的，压死的就压死了，受伤的受伤，有的围在木头周围算捡了条命。出来的时候，第一个脸黑的认不出来，第二个几天没吃饭，弄出来以后，如果活着有气也不像个人，好几天没吃饭。那时候不是有矿灯，有的灭了，有的矿灯还照着。那照着的地方肯定有人，挖那地方。这里有的人不行了，有的人还活着。矿上大冒顶那确实是……好家伙，有的把人吓得不能动弹。煤矿工就是苦，有一次我支援采煤在掌子面撬煤，正在撬煤，我听到掌子面上面刷刷正往下掉东西下来，上面有啥东西呀，那师傅过来一看说：“赶紧走赶紧走，马上就要冒顶。”支援采煤也没啥经验，他说赶紧赶紧，那会儿铁锨也不要了，赶紧就跑，跑得快还好，跑得慢不是把命送了，就是把手或者脚压掉了。我经常说，煤矿工人和打仗的人差不多。前线打仗的人，弄不好一下子就把命要了。这好家伙，打仗是在上面哩，都能看见。井下窟窿一下掉下来压你头上，压在脑袋瓜子上，当时就报销了。压在脚上、压在腰上，那最多给你弄个重伤或者轻伤。煤矿工人确实是不容易，就刚才我给你说的那个沈龙根，那确实是个亲身体验，就是掌子面高的掌子面低的他都去过，他是班长。他也是干了一辈子煤矿工人，采煤的，他也是采煤的，沈龙根，那个花脸。那好家伙，他直接在采煤的，轻伤重伤，他炮前咋嘣的，他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他给你说的话头头道道。我给你说的是开绞车，从井下一直说到井上，反正就是这事。所以说，干工作呀，一个要休息好，一个思想不能跑毛，不要想其它的事情。八个小时里边，安安全全上班，弄下去弄上来就是这事情。绞车上的事，要不出事故，要出的都是大事故。都是跟人打交道的，那一出事故都是大事故。不是掌子面上，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或则轻伤或者重伤。咱好家伙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四五十个人喽。当时说这四五十个人都在你手里捏住呢，一个不注意这四五十个人就报销了。

另外还有啥事，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已经上来了，在副绞哩。那不是分两派，一个是在十里铺，一个是在这里。咱不想参加武斗，矿上生产着呢。那时候上班确实是危险，还打枪

呢，现在说走路走不好，咚一声，打在脑袋上，死都不知道咋死的。那时三班倒，有时夜班，有时下午班，下午班上完以后，有的人不敢回来，就睡在那个机房里。那时候夜班还是夜班，光是白班分两班，上下午班的人下班了赶快回来。那时候一会儿扑通一枪，扑通一枪，害怕人着哩。有时候两派，你找我麻烦，我找你麻烦，走路也没法走。咱矿上到一矿下面巷道都通着哩，一矿到桃园矿也通着哩，桃园矿到王家河矿下面也通着哩。那时候矿务局为了哪个矿发生啥事人弄不出来，通过下面，你跑到我矿上，我跑到你矿上，通着哩。平时都封死的，真发生什么事的话，那洞就打开了。打开你可以到我矿上，我可以到你矿上。那时文化大革命也危险得很，可能是金龙嘛还是谁，在山上参加武斗，差一点被打死。参加武斗的在五一路和七一路隔开那地方，这面是212，那面是219的，隔开一条马路，两面都有阵势的。你在这面山头上，他在那面山头上。219是在大同桥对面，212是在七里铺靠那边的一个山头。好家伙，拉的炮，小钢炮，给那个一矿井老矿、山上面、老矿务局，都炸了几个窟窿。那家伙还是朝鲜战场退伍回来的，炸了不是炸了，死了就死了。那时你爸参加没参加武斗，记不起来了。我那时候还上班着呢，谁打谁也记不起来了。反正是攻过一关，拿石头砸过来，人死了谁不知道。你记不记葛登发那时候在那面。煤矿上就那回事了，有些时间长了记不起来了。6个月后，我在下面也不干了，都在上面。好家伙，有时候下面发生事故了，跑到那个井口去看看，听声音经常去看看。反正煤矿工人确实是辛苦，你下去以后，脸上黑的像包公一样，只看见牙齿。下面发生事故轻的还问题不大，重的你从脸上也看不出是谁了，就这样。

二米宽、高，那属于掘进，也就是煤巷，人能过去。有的运输巷道，你前面采了煤以后，后面就冒下来，这个地方慢慢就冒实了。你像那个地方，194下面大冒顶，100多米整个下来，把上面都惊动了，上面裂了缝，时间长了要下沉。过去采过煤的地方，冒过顶的地方不叫住人，防止下沉裂缝。因为掌子面有高有低，有的地方低像桌子那么高，有的地方高一点，最高一米高一点，一米以上的很少很少，咱三里洞矿的煤层平均一米。掘进和工作面是分开的，掘进专门掘进，工作面是采煤，把煤拉出来就完了。掘进上不管是石头是煤，见啥打啥。采煤得煤肺，掘进上得岩肺，这里有区别。这两个都对肺不好，有的时间长了，肺都成硬的了，像一块石头一样。这些人说不好的话，时间不会长的。如果得了这个病，你吃的好一点，你多活几年。如果你生活又苦一点，再吃不好，就要不了多久就完了。不管是煤肺也好岩肺也好，呼吸，呵，呵，呼不出来，时间长肺成硬的了，没有活动余地了。刚才我给你说的那沈龙根他是煤肺，他一到冬天透气都困难，有时透不出来。一到冬天这些煤肺的人，一般他不会出来，都在屋里，他不出来。外面冷，本身他呼吸就困难，出来受冷以后呼吸更困难了。还不要讲感冒，一感冒就更那个了。你吃的好一点，活动得多一点，能吐出来一部分。岩肺吐不出来，直接裹在肺上成了硬的。这两种病，相比而言的话，岩肺比煤肺要厉害一些，因为他吐不出来，煤肺的话他能带出来一些。

**林：**那你当时从上海来这儿，你自己是啥想法，是自愿报名来的？

**顾：**自愿报名。

**林：**那你为啥选择来这儿？

**顾：**那时候，上海建筑单位不建设了，不盖房子了。上海市就讲，把这些人分散出去，当时兰州去了一个公司，淮南也去了一部分煤矿工人，咱这里也来了360人。西安可能也去了一部分人。当时在上海，建筑上把这些人支援到外面去了，主要是支援外地建设。所以就匆匆忙忙地报名了。这里派人到上海去招人，招了以后，他们都领到这里来。我那时候想，哎，要跑的话，跑的远一点。就跑来了300多人。同样是建设，同样是为了国家。

**林：**你们一起来的现在还有多少人？

**顾：**现在没有多少了，老倪算了一算最多二三十人，不会超过50人。有的都回家了，有的都不在了，可能不超过50个人。刚才给你说的那个沈龙根，脸是青色的，放炮给炮崩的。他是放炮员，后来把脸崩了。他是出现哑炮了，他一拧没有拧响，没拧响他当是瞎炮了，

他又去补个炮，又去打眼补个炮。他咕噜咕噜往里钻，正好钻在里面没响的那个炮里面，一钻，那个炮响了，一钻响把他崩的一脸黑。在医院里住了多少时间。他还是职业病，咳、咳，气上不来。他年纪跟我一般大。

我是 92 年退休，我家里你也知道，我家里经济条件还比较差一些。小女儿经常看病，十五六年了，经常到阎良，阎良不是有个神经医院，住了几次医院。在王家河神经医院也住了一段，到私人那里也看。反正犯呀看呀，犯呀看呀，一看花好多钱。退休以后，我到鸭口那里开绞车。为啥？都是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没办法。你看我现在一天挣 10 块钱，一月挣 300 块钱，目的也是为了补贴一些生活，比较充足一些。过去，好家伙，你这个月拿了钱以后，用了 20 天就完了。给小家伙看看病，有时候她一住医院，一个月工资最多用半个月。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呀，那都是去干些其它活补贴补贴。原来我退休的时候拿不到 500 块钱，慢慢地现在能拿 700 块钱。这 500 块钱光老两口生活还可以维持过去，小家伙一有病那就少了。

我每年到年底都有补助，有时 30 来块钱，有时 50 来块钱。不管各行业吧，补助一点能好一点。最困难就是小家伙的病，把人没办法。家里原来在十里铺桃园煤矿小卖部，后来小卖部那个地方拆了，给她补贴了一些钱，一拆就啥也没有了。所以说为啥 70 来岁了，早就该享福了，不管是夜班也好、白班也好给人家看门，干一点比不干好一些。

小红原来在三建司，没交养老统筹把他开除了。哪里有活了到哪里去干干，没活了到其他地方去干干。干了拿到钱还差不多，前年干点活钱到现在还没拿到。他到 194 队指挥部去帮忙去了。反正就糊里糊涂，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就那么回事。比如存点钱买些啥东西喽，那根本没项。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就那么回事了。现在 700 来块钱说起来不少，现在物价都高了。原来我来的时候，面粉是 7 块钱一袋，那大公鸡四五斤的公鸡 7 毛钱一个。现在面粉将近 50 了。我上班以后都是我家里买的，反正都贵。

国家的形势是好了，待业的人太多了，一批一批的学生都没有工作。上班的人下岗的下岗，待业的待业，没钱的没钱。这些人要吃呀，没办法啃老家伙几个退休钱。哈……没办法。总的来说生活是好转了，可是物价上去了。原来我来的时候大肉才七八毛一斤，现在七八块了，翻了十翻，那工资数都没有翻。我是 92 年退休的，94 年工资翻番还未跟上。总的来说，国家的形势是好的，关键是物价上得太快了，工资没有物价上的快。你说起来，哎，给你们退休增加工资了，物价一上去等于没增加。没上班的人太多了，要吃饭，你说像我小娃，一个吃饭，一个还要看病，低保还吃不上。来这里工作一直到现在退休，不管是老毛时代也好，反正领导是好的。可是领导有些是好的，可下面管不了，下面违反领导，物价就上去了。你看看现在领导，现在领导想办法自己先捞一点，管你现在吃也好，不吃也好。

老大现在 400 多退休工资，老大的女婿省运司开汽车。过去一段差不多，也买了一间房子，买了房子钱一下弄完了。最近没活干，省运司好多汽车，出租的出租了、卖掉的卖掉了。我女婿那汽车时间长了，也不开了，有时在家里歇着。他的汽车是报废的汽车，人家不允许他开。当替班司机，人家有事请假了，叫他去开开。你开有工资，你不开啥也没有。省运司现在也是穷光蛋，原来差不多，现在不行了，现在是没人管了。他现在买了房子以后，我大娃一月 400 多块钱，基本能维持生活。老二在 194 队烧锅炉，冬天烧锅炉，现在停止了，停了以后到外面找些零活。反正几个闺女，你想要一点那是没项，只能她自己维持生活。老三在铝厂工作，她也没房子。闺女上学了，原来在铝厂里面学校，以后上初中了，里面没学校了，跑到一中，也没地方睡，在老大那边睡。反正基本上她们几个人能维持生活，基本上凑凑合合能过去。开学了小家伙一报名都几千几千，这是没说的。老大也没工作也没啥，老二老三娃上学，她妈都没工作，有工作也都下马了。没工作在家里给娃做饭，一直自己做饭，能维持自己生活。你想要她钱没项，她没多余的钱。因为钱少，他一个人挣钱，还养活老人，还养活娃，小家伙都上学。过去我那时都是靠政府，子女免费上学，上学不要钱，交点书费

就行了。现在一上学报名几百几千，来劲不来劲。

**林：**你现在除了在这儿上班看楼平常还干什么？

**顾：**工作就是 12 个小时。一天 24 个小时，已经 12 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了。回去再吃吃饭，能干再干点家务，不能干了，休息休息，玩玩。一共只有十来个小时，这里一过马路就到了。有的路远，在十里铺草公房那个地方，红旗桥过去有个草公房，纸袋厂这边。一来一回最起码要 1 个半小时。12 个小时，一来一回 14 个小时再吃吃饭，再弄弄就没时间了。反正你干了这个活，回去想干其他没项，时间有限。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地方，这比较近，远了还回来跑。这里也快了，也要不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地方干完了，要准备到十里铺红旗桥那边。那红旗街远了，一来一回 1 个多小时。我自己说，反正也快 70 岁人了，也跑不动了，我想不干了，现在精力不行了。过去跑起来快得很，现在跑起路来，多跑一点路脚底酸，精力退了，不中了。反正该享受享受，沈龙根退休到现在一直没干过。再说人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一些，不管家里也好，几个娃也好，没病。凭这点钱开了，吃完花完算了，我还有要看病的，你不看还不中，你看着弄不好还要住医院。

## 朱永生

**林：**讲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吧？

**顾：**你父亲是 55 年和我一块来的。来的时候都分开，你干啥，他干啥，当时就分配瓦斯检查员。听人家说也发生过一次事故，我也记不起来了。在医院待了好长时间，后来叫他当了通风区办事员。当时他在工作时间也是三班倒，瓦斯检查员都是三班倒，也艰苦。刚才给你说了，在井下当瓦斯检查员的人，每个地方他瓦斯检查员先去。为啥？他需要测量瓦斯，这个地方有瓦斯没瓦斯，检查以后，他要给区长汇报。这个地方有瓦斯不能开采，或者赶瓦斯，把毒气赶出去。他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路也跑的不少，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那时候一个班没几个瓦检员，东面一个，西面一个。掌子面多，采煤的地方也多，放炮以前，掌子面要测量一下，有瓦斯没瓦斯。如果里面有瓦斯不能放炮，要引起瓦斯爆炸。如果瓦斯没有多大，进行放炮。放炮以后，他还要去检查其他情况，看看有没有瓦斯出来。有的地方你放炮以后，煤放下来了，瓦斯周围的煤是空的，有小鸡眼。煤一放下来，瓦斯就从小鸡眼里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按规定不能采煤。所以讲，放炮以前要检查一下，放炮以后还要检查一下，有了瓦斯就不能采煤了，也不能放炮。一个瓦斯检查员要管几个掌子面，比如东部、西部。东部掌子面一个瓦斯检查员，西部也是一个瓦斯检查员，两边两个。不管哪儿要放炮，放炮以前瓦斯检查员要检查，放炮以后也得检查。如果检查出来没有毛病，采煤工、攉煤工就攉煤，对瓦斯检查员就没啥意见。没啥事就休息一会，不过休息的时间也不会长，他一个瓦斯检查员要管几个掌子面呢。到了一个掌子面以后，你啥时候放炮，你啥时候挖，都要给瓦斯检查员说。我这里十点钟放炮，你九点三十分要进去。一检查没有问题就放炮，放炮的时候先检查，至多半个小时，放炮以后还得再检查，检查以后里面没有那个问题了，这一段时间可以休息。休息一会儿，时间不会太长，又跑到其他地方了，跑到其他地方还是放炮，还要检查。东部、西部各一个人，他一个人要管好几个掌子面了，也是一个职务。总的来说他也不出力，他不出力他检查，他要工作，害怕出其它问题。

瓦斯爆炸你也知道，有的是局部爆炸，有的好家伙是全部爆炸。你局部爆炸，一个掌子面、一个掘进队是吧，就是说一二十个人。如果全部爆炸的话，那整个的矿就……那好家伙死了好多人，还有轻伤的好多人。当瓦斯检查员。他没有参加重体力的工作，路比谁走的都多，因为他跑好几个掌子面呢。到后来他发生了那个……脚那个了，啥时住院我也不知道。出来以后，他说你挑担住院了，我说住院弄啥，他给我说压住了。怎么回事，我说要紧不要

紧。他说不要紧，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我也不知道，人家给我说。当时具体情况因为我在机电上，他是通风区，在两个单位工作。他是搞瓦斯的，我是搞机械开绞车的，也不在一块。你说像采煤的掘进的，你在井下我在上面的不太了解，真是重大的事故，也许知道，也许不打听。你爸脚压坏了，我都不知道。听人家说工作咋回事，已经出了院了。咳，两个单位就是，我在机电上，他在通风区，各干一行。具体情况，几个原来认识的，还不知道住哪个地方。通风区原来有几个垒工箱木板的木工，这几个和你爸经常在一起，不知现在人还在不在了，也说不来了。

**林：**我爸当时是怎么来的情况你知道不？

**顾：**那不知道，因为在上海建筑单位里面我是第四公司，你爸是几公司？反正有一个是第二公司的，一个三公司。原来在上海不太熟悉，也许在一公司。一个公司有好几个工地，也不太认识。到这里来我那时单身，陈造根是一起来的，我经常到陈造根家里去。还有张金龙呀，你爸呀，你妈。张金龙、兆英就是在陈造根家里，他两个认识的，后来两个结合起来，过去也不认识。过去和陈造根也不认识，到这里以后，和陈造根是一个车间。我是机电车间，陈造根也在机电车间，管水泵的，他是水泵组长。戚国其那时候死他知道，不管谁开水泵弄啥，都是他管的。现在你问我，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有些还糊里糊涂。不是一个组，不一起工作，我是开绞车的，他是开水泵的。原来好家伙，在厂里有的钳工，有的电工，不是一个组，不是一个系统，不太接触。也许认识的工作不在一块，有些情况不太……原来金龙不知道是干啥的，也是开绞车，不知干啥的，开水泵？

**林：**电工。

**顾：**电工，可能是采煤区电工，采煤电工和机电上又不太……那时候和金龙认识，就是金龙经常到北关陈造根家里去玩，我也经常到陈造根那里去玩，次数多了后来都认识了。原来都不认识，原来你爸也不太认识，认识以后，我家里是你妈介绍的，介绍来的时候，不知啥时候到铜川的，也记不起来。

## 对话 1

**顾：**原来火车站下面都是草房房，里面卖票说书都是在里面草房房里面。

**何：**你爸刚来时，鸡蛋一块钱买一二十个。

**顾：**一个大公鸡不到一块钱，七八毛钱。

**何：**上海人一来鸡毛满天飞，他们这里人不吃鸡、不吃鱼。此地人说南方人一来呀鸡毛满天飞。他们说三矿几毛钱买个大公鸡，鸡蛋一块钱买一二十个，我来没有享受过。

**顾：**那时苹果、花红了，你有力气你到山上吃好了，没人管，你吃，你不能拿麻袋装，随便吃，不要钱。

**小兰（以下简称兰）：**以前思想好，你把东西搁在路边没人拿。

**顾：**过去三里洞南站那个地方，专门去买那个洋柿子，西红柿，人家管都不管，你能吃只管抓，最多能装两个，你还能吃几个。

**兰：**随便吃不让你拿。

**顾：**你听说过没有，就上个月，一个女的，在过年的时候，钱没用完，专门把钱存银行去，可是跑到银行以后，下来了她不存了。

**何：**上山后，后面一个男人拿一个石头把她一闷打昏了，把她钱抢跑了。到派出所报告，人也认不住。就在买菜那巷巷里，上山那巷子。

**顾：**她家在半山上。

**何：**我知她在半山上，从巷巷里走，把她闷倒。

兰：大白天？

何：就是白天。

兰：过去晚上害怕，现在白天也……

何：大白天也给抢光了。

兰：多少钱？

何：600块钱。

兰：还有高兰英的妈刚开了资，到那儿，耳朵上耳环也给抢了，开了那低保的钱也没有了，给他妈说了，满市场去找人，那能找着？找着也不承认。

何：你能认谁，你当时不拦着，现在……

顾：抢了。两个小伙子看她妈从银行把低保钱拿回来了，他爸不是在铁路边住着嘛，就铁路边，架着他老婆说你把钱拿出来，老婆说我没有钱呀。我看你从银行出来了。老婆说我把钱给你。你把耳环也给我。老婆不是戴着那耳环。老婆说我就这一个耳环。你给不给。你不给吧打一顿你也得给。你打我一顿我受不了，我赶紧把耳环给人家。给了以后那两个男人就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老婆还不疯了，低保叫人抢了，耳环也叫人给抢了。她能认识那俩人嘛，她从市场找嘛，找有两个礼拜吧，没有找着那人。就是嘛，要么急的疯的，兰英把她妈接过来，害怕她妈神经了，为了那一点钱想不开嘛。天天从那市场走，连饭都不吃。

何：就为那低保。

兰：噢，气的，这一下子，低保开了300多，耳环700嘛800，还是好耳环，她闺女给她买的。她妈说我以后再不戴耳环了，谁给耳环也不要了，害怕了，招贼呢。现在社会就是没办法。你没考上初中，人家不让你上了，你说咋弄，在家歇着，在家没钱，他不抢？他不偷？不像以前，一毕业让你下乡去，最起码出来给你招个工，好赖给你一碗饭吃。要说现在不是小孩坏了，社会逼的小孩坏了。

顾：我和你爸最深的那一次就是喝酒的那一天，我上下午班。

何：他喝醉了，把墙上的纸哗啦啦、哗啦啦全部都撕了。

顾：回来后弄个炉门弄好后，你妈还在家里。你爸跟我喝酒，我是晚上十一点下班，到林鑫家基本上十二点，最后喝的喝到天明了。

何：我妹子睡觉了？

顾：没有。那房子也小，这里基本上也隔开了，反正你想睡你睡，你不想睡你不睡。一个小灶间他奶奶住。我跟你爸两个人那时还买了鸡，煮了个鸡，刚煮好的鸡，扒了点吃不够，再扒了点也吃了。

兰：鸡也没有了。

顾：那次两个人喝了一斤多酒，喝的差不多天明了。那次喝酒时间最长，好家伙。

兰：烟戒了酒戒不了，爸，你酒能戒不能？

顾：少喝点。

兰：酒是戒不了了，老了也戒不了啦。

顾：喝了一次。有一次在矿上的时候，我上早班……

何：苦就苦了娃娃。

顾：上早班刚下班了，到大世界（食堂）里面去转一圈，我一看你爸喝的二迷迷，我说你咋在这里。唉，吃吧。弄了点牛肉，已经是食道癌，肯定是食道癌。弄了点牛肉，弄了点啤酒，他一个人吃，一个人喝。我说你光吃这，那个牛肉是热性，酒也热性哦。唉，吃吧，慢慢吃，反正是说不好听的话，也快了。查出来了，查出来了他知道。

何：那俺妹子已死了？

顾：死了。出院以后又开始上班了，是不是，又开始上班了。上班这段时间，又化验出食道癌。所以那一次我看见以后，到后来再没看见过。后来到医院是野根陪他去的。

何：野根还没退休？野根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你姑父的弟弟呀。

林：在上海川沙。

何：你姑父去世他去了没有？

林：去了。

何：唉，我的天呀，你当时去了没有，去了你咋不吭气，吭气我也去去。

林：你那么大年龄了。

何：最起码见见面吧，还有她姑姑神经上也不咋样，唉。兆英，林鑫他姑妈也可怜，跟荣明生活？

林：不是，荣明在西安干活，跟小弟。

何：有毛病那个。

林：不是，最小的那个。

何：都成家了吗？

林：成家了。

顾：看了没有？

兰：这病能看好？

顾：有些病也能看好，你不管看好要经常看，刚开始。

何：你看玲玲看好没有？

顾：玲玲几次反复了，几次住院。你姑也是。哎呀，实际上不管谁的家，不管困难也好，吃差一点，你没啥病就好。经济比较困难，再有病把这个家基本上就全部进去了，只能维持生活。兆英思想通了吗？

何：兆英自己也有病，跟吉洪章老婆吵架，吵坏了，她那么坏，欺负兆英。他现在也没项了，跟他儿子，他大儿子精得很，大儿子媳妇聪明得很，妈你跟我过，把她钱哄完了，也对她不好了。

顾：男的叫吉洪章。还是信耶稣好。

何：你也赶快。

顾：我给你说嘛，我表扬一下嘛。

何：说实话，我叫你姨夫信耶稣，人家老顽固不去，顽固得很。

顾：那也不能信两个神呀。

兰：信共产党，信。

何：我信耶稣光明正大，也不是偷的。不叫吭气，那个谁也是共产党员，人家也信耶稣，她男人说我是党员，你不要吭气。

兰：只能信一个信仰，不能信两个信仰？你信共产党不是还是一个信仰吗？还是违背主。

何：人家愿意那有啥。

顾：参加了党以后，反过来你信基督教，那肯定不美气。

何：咋不美？

兰：人家信仰只能信一个信仰，不能两个信仰。

何：我给你爸说，咱信，死了以后咱一起上天。感谢主，要不你在地上我在天上，看到你受苦更难受，是不是？我为你妈也祷告，你妈给我托梦。妹妹呀，上帝救她上天堂去，上乐园去，不要在地狱里受苦，可怜得很。谁一死我都给他祷告，到乐园去，到乐园享福，灵魂得救了。你外婆，就养我那外婆，每到清明托梦，手伸出来给我要钱呀，我说咋办呀。我说给上帝说说，你祷告叫你妈的灵魂到乐园去，你妈吧多可怜，你信耶稣吧，你救救她救她到乐园去，她可怜。哎，祷告祷告，没有了，她再也不来托梦了。

顾：那是思想作用。

何：啥思想作用。



兰：一种精神寄托嘛，就是思想。

何：你像我那年难受，到上海检查去。我说你给我说清哦，我是不是胃癌，要是胃癌你提前给我说，我现在能吃叫我吃点。哈……我不能吃饭嘛，吃点堵住，吃点堵住，一定得的胃癌。我手术台上下来疼的要死。你查出啥不要瞒我，我要是胃癌叫我吃点，吃点死了也高兴，我也镇定了。等一下张英一问他，俺娘娘咋项，得的啥病？哎，你知大夫咋说，凭你娘娘这种性格不会得癌症的，这么开朗的人，会得癌症？我就爱说，憋不住。

兰：你记不记在市医院，俺爸把你叫过去给你查鼻炎哩，说是鼻癌嘛，给俺爸和我说了嘛。俺俩进去，他说你鼻癌，他说你回家对你妈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

何：我也不管它，我说好病不背人，背人不好病，我肯定是胃癌。我心里想，我去你的，上帝你叫我死，我就死，死了少受点痛苦，行了。他们还吓得不敢给我说，实际上我早晚要死，早死晚不死，只要不叫我受痛苦就行了。

顾：你知道啥嘛？

何：我咋不知道，跑到陆军医院，下着雨给我到陆军医院一检查，检查好了。你是她谁？我是他儿子，那是俺妈哩。你来来来，叫你妈一边站着去。我说你不要背人，大夫呀，你千万不要背人，要是癌症你干脆给我说完，说出来。我该吃吃，人早晚要死的，你叫我吃了死，我还不冤枉了。咳，想开了，没事没事，我给你儿子说两句话。我说你拿钱就说嘛，叫我走开，叫我儿子来。你们说你们说，反正是癌症了，管你咋说了。心里想反正癌症了，随便咋说，我现在没觉着痛苦，干脆回家睡觉。我没有钱，我给你爸说，把东西一卖，卖了我一吃，唉……我心里这样想，管你屁事，我一点也不害怕，癌症、癌症，人早晚要死的害怕啥？你们那个一九四队，李双你知道不？我以前在小卖部，他老头在矿医院检查，他得了肝癌。她到我那里哭着，妹子呀，咋办呀，俺老头不行了，他来你可不要对他说哦。我说你老头我半认识不认识，我给他啥哩。他在矿医院检查，确定他是个肝癌呀，还有三个月呀，你说咋办？她说。我说不管他，你也不管他，叫他吃。这老头子也怪，对大夫说，你说啥，你不说清不行。大夫说我给你说出来，你回家好好吃去，你还有三个月活头，活下去算你命大，活不下去三个月。你非让我说，我不说还不行，你看你自己吧。老头回来，那天在市场上看见老两口拉着，好好的。矿医院烂屁大夫胡说，所以也不害怕。球，早晚要死，癌就癌吧。早晚要死，你给我弄点吃的，老头说。他说的怪好，心里难受死了哦。你看着姊妹呀，他说的可好可好，心里难受呀。第二次到医院里，叫他吃，我给他好的，他倒不好好吃。哈……我只管叫他吃，吃吃啥去。等了不到半年吧，她到我小卖部去了。老头在不在？好了，一检查啥癌都没有。你咋好的？问那老头。我管屁呢，人早晚要死的，我回家有点钱，我全部吃完了，哈……我说老伴你叫我吃吧，我也吃不了几年了。叫我多吃一点，你还多拿一个月工资。人家回家好了嘛。和玲玲看病那天，在红旗街买肉还看见那老两口，身体还健壮得很，你咋说。

兰：医生也有误诊，说不定还转好了。

何：香香他妈说肺癌，上手术台，香香他妈说我死也死在家，死在这里怪害怕，也签了字，要开刀了，她唾起来了，反正几年来，该死也死了，你给我背回去，不能走路。现在好了，跑来跑去。

## 对话 2

何：看见你姨，想起你妈是不是？

林：就是。

何：唉，你妈整天在我脑子里装着哩。过去那段历史，像电影一样，一个镜头，一个镜

头，

翻过去，翻过来。你姨那时也得了神经官能症，老回想过去呀，就像照相，翻来翻去就是这些画面，你妈可怜，没有享一天福。你们几个娃还争气的很，比我几个娃还有本事。你姨夫没本事，我也没本事，我娃都没有好工作。你妈给你弄个银行还是好工作，不到银行你也不行。

林：我那时候要报名下井，我爸那时不让我报名下井，说你还是待业吧。他说，我干了一辈子，不让你再干了。

何：你兄弟小红要想下井，说啥不让他下井，要饭都不让你下井，矿上太可怜。

兰：矿上前一阵子又砸死两个人。

何：三里洞矿又出事了呀，又砸死了两个。报废了不让他们采，他们偷采，又砸死两个。害怕不害怕，还不让知道。

兰：知道不是算那个啥了。

何：你看你姨傻不傻，老了呀，我说话都不着道了。

林：你说话还可以。

何：可以呀，唉，不行。光你小妹那一场病把我弄的好可怜，15年呀，林鑫，从18岁到今年34岁。

兰：人家要是看上了，给她找个家，她有个家都不着急了，没家她也急。

何：她也想成个家，你说不说（她有病）行不行？隐瞒人家将来发病，你瞒我，我不要你。你说了人家谁敢要，一个大难事呀，要不早都有工作了，娃都这么大了。没办法，这场病也是好强，和我年轻一样，也是好强，性格刚强些。

顾：上海来一批有个戚国其，那人死了也可惜。

何：死了都可惜。

顾：那个好家伙，他是在井下开水泵的。

何：冒顶。

顾：不是冒顶，是机斗下去了，把他人好家伙……

何：石头把他挤出来。

顾：不是挤出来。机斗钢丝绳断了，机斗下去了，下去以后有股风，一股风好家伙把他撵出来，他是在安全洞里边休息着哩。

兰：啥叫安全洞？

何：他是开水泵的。他在安全洞里休息哩，出来一股风，像风一样把他逼出去，一下子啪出去到死，硬给他砸死了，砸的第一个上海人。

顾：第一个上海人。

何：那一批来了300多人，他第一个死。噢，他姑父也没有了，噢，咋听的我心里难受，荣明他爸你知道吧，知道？

兰：我不知道，他是俺姨夫他哥吗？

何：他妹夫嘛，就是林鑫他姐夫。

兰：就是以前在二门诊部那儿住的。

何：唉，啥弄的呀？那你姑姑可怜了，那国家给他弄点啥？

林：那能弄啥？

何：你姑姑生活费多少？

林：好像没有吧。

何：啊。

林：有也不会多，他家问题还比较大。

兰：他也是从三里洞过去的。

林：是的，后来到那边铜矿。他们家姊妹四个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大学生，自己都不能自理。

何：他也是精神上？

林：对，恋爱嘛什么的，精神上受刺激了，抑郁症，接近精神分裂，前一阵子还住了医院。

何：有工作吗？

林：有工作，400块钱够啥呀。前一阵子荣明找医院报了一部分医药费。

何：噢，那你姑姑才可怜了。

林：你想明娥是家里的顶梁柱，荣明老在外面，是建筑工人。本来是林黛玉一样的性格，后来和孙二娘一样特别的能干，然后我刚给你说的她的儿子也去世了，得癌症，尤文斯瘤，我到西安去看了。

何：娃多大？

林：14岁。明娥说，人家都说好人有好报，我这么好，怎么没好报。

何：越好人，越磨难多。

兰：难，好像一个接一个难。

林：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办法。我去的时候，她笑着给我说话，说着说着，她哇的一声哭了，我根本没办法劝她，你说一个母亲即将失掉儿子，你能说什么安慰的话。

何：那肯定不能说。

林：回来这么长时间，我连电话都不敢打，没办法说……后来我妹来，说（那个孩子）12月就去世了。

何：他家的难咋也那么大了，我说我们几家咋回事。你看看，你家，你妈和你爸没有了，最大的难。下来又他家，又我家。下来又弄小妹这个病，一家有这么个病人，呀，林鑫呀，你不知道啥味道。我光给你小妹身上花了五万多块钱了，你说靠你姨夫一个人工资，你说这五万多块钱不容易呀。哎呀，把我弄得筋疲力尽，钱都用完就不说了，只要你姨夫身体好，是不是？这个思想上不行，把我也弄得要神经病，我本身那年也害了一场病。我小时候可怜，50天你外婆把我送给这个姓何的，我姓何，人家养大我，不能没良心，姓还是姓何，你外婆家不是姓吴嘛。结果到何家当童养媳，长到十五岁了，养大我的母亲……

【敲门声】

何：是不是你姨来了。坐，坐。

邻居（以下简称邻）：我是吃过饭的，他都去了，他没有说啥，就是说看咱这个娃有啥意见。

何：玲玲不知道，人家看上了再让她知道，农村就农村吧。

邻：（那男娃）个子可高，条件可好了。三口人，一个儿子，两个姑娘。两个姑娘出门了，就在这对面山上。一个大姑娘是税务局的，二姑娘在上海嘛北京。人家说看咱有啥意见，他们都看了，娃还在出摊子，做二十多年生意，拉架子车卖水果，个子都这么高。

顾：我看见认识。

何：不认识，你没见过你咋认识？

邻：没见过你咋认识，长的不错，就看玲玲咋样。

何：我今天晚上给她说说，给你个电话让他们两个见个面，咋弄哩。

兰：让她请上一天假，这老板可憎的很，我昨天请两小时的假都不叫我走。

邻：叫他们出去买东西互相了解了解，现在咱感觉他们，这个娃你看只大一岁，玲玲都33了呀。

何：虚岁34了，他虚岁35。

邻：一个是71年的，一个是72年的，一个属猪的，一个属狗的。

何：唉，叫你麻烦了。

兰：人家要是看上你了，咋样都好说，人家要是看不上……

何：就是她这个病。

邻：现在还吃药不？

兰：现在吃，就是一天一粒。

邻：就是害怕将来有个娃娃了，不敢吃呀。

兰：一结婚想开了，就不用吃药了。

邻：农村呀，人家那个院大的呀。

何：老婆没说啥？

邻：没有，人家高兴的呀。

兰：看着也是个实诚人。

邻：可实诚，可实诚。有时候可愁，有时候老两口整天愁，愁啥哩，他家门窗，铝合金门窗一合，可大家里不敢离人，还没有院墙。他们一结婚了，把院墙一弄，想在这儿干在这儿干，不想在这儿干就买个门面房。

何：我也不指望他们给我点，只要他们两个过得好，我们老两口有这点退休工资也可以，她有心就买点来。

兰：他姐和他妹子都找的城里的，咱就是这，只要他俩能过到一块好好的。

何：上俩月我给她看门去，玲玲，妈给你弄个农村的吧，你不是爱种地吗？我才不去呢，我不会种地，刚过去还罢了，时间长了，还看不起我呢。

邻：现在这一点地都不够他老公公种，他儿子今年都不干了，就那一点点地。

兰：就去外面卖水果。

邻：这是过了年才回来，原来一直在这边。现在普遍都没有工作，你不是说的。

何：俺两个外甥，一个在上海复旦当老师哩，娃可怜没妈没爸，其他啥都好。

邻：娃都有出息。那家老汉才 60，还能干哩，老婆才 50 多岁。她说啥都不干，就看个门，院墙弄好，门一锁。唉。

何：不敢让她知道，万一看不上呢，对她打击一下。今天晚上我回来给她说。你说呢，噢，这意思不敢叫她知道，今天晚上回来我给她说说。

邻：你回来慢慢给她开导开导，现在玲玲不知道，我把那个男娃引来把玲玲先看了看，他妈和那个男娃没意见，咱再给玲玲说，就怕是给玲玲一说。

何：男娃没说啥。

邻：他说没事，都是一样，他也都 30 多岁了嘛。

何：他没啥病？

邻：他没病，小小的做生意都 20 多年了。他爸那个人不当家，老实，一家人都可老实。老实脾气可犟，脾气跟牛一样。我看你老汉活道，老汉也是一个人一个脾气，他是河南豫北人。

何：那你俩也是老乡。

邻：我俩不是老乡。玲玲说话能听懂不能？

何：能听懂。女大不能留嘛，成冤家了。但愿俩人能成吧，那能咋说，我现在只能靠耶稣。俺玲玲都说的是河南话，因为都在这里长大，所以都说河南话。这儿河南人多，小河南嘛。我三个女婿整天在外面夸，俺老岳母好。我从来不要他们钱财，他们给我我都不不要。噢，要那个钱干啥。我说俺老汉也上班，我说不上，只要他身体好，啥都解决了。俺大女婿结婚时可怜，他爸妈都不管，还是我掏了钱。要不我大女婿对我好哩，俺三个女婿都对我可以。

邻：这个娃也聪明，还懂礼貌。

何：俺玲玲也懂礼貌。

何：你姨夫 18 岁的相片看见没有，他来铜川 18 岁。

林：噢。

邻：你就在底下看那厂子是吧？

顾：在这儿。

何：对过，就对过这新楼。

邻：一个月给多少钱？

何：一天 10 元，一个月 300 块钱，完了，（工程）快完了。

邻：你现在矿上能开 700 多？

顾：700 多一点。

邻：你们矿上工资不高，外面铁路上现在涨到 900 多。我老头也是退休太早了，才开 900 多。

何：那不错了，我们才 700 多。他那个腿提不起来，哒、哒。

顾：一天跑多少路呢。刚才叫我哩，我跑了一圈，我在楼上。

何：你跑楼上干啥？

顾：看一看嘛。

邻：我每天从那儿过，看见他在那儿烤火，看门，不认识。

何：这一说都认识了。

## 何菊珍

何：哎哟，你有啥办法，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小妹嘛。小妹要是有个家了，阿姨给你说，人家给说个农民，现在两个人还没有见面，我还没敢给她说。今天到时候我要去一下，让他先看，他看上小妹了，我再给小妹说，万一小妹要看上人家了，人家不愿意，那不要操气了。这事难弄的很呀。林鑫呀，农民行不行？城市没人要她，知道这个病不敢要，是不是？农民还不知道咋项呢，今天人家说呢，我到 11 点过去看一看，我说你先让人家见。哦，人家见了以后，说这个女娃可以，那么我给小妹再商量，看她同意不同意，农民行不行。她如果不同意呢，那只好算了。那你姨咋办，今年 34 岁了呀，小妹为这个烂怂病，看呀看呀，看过来，看过去，气得没办法。我那天跑到民政局，他说你都推给国家，我说我要推给国家早就……今年都 16 年了，到现在我说娃还……原想，我说看好给她找个对象，有个家我也不管了，对不对？做老人也心慌，到现在她也没有好，你说我该不该给她弄个低保。我不要我的生活低保，只要她一个生活低保就行了，你能养活她，国家赖好给她点生活费行不行。没有办法，他给我登记，登记了后交给办事处。我交给他材料已经两个多月了，问问他，说还没有下来呢，还没下来呢，他就推。林鑫，你说去给谁说这种话。人家金项链带着，汽车开着，人家还照样吃上低保，啥个理，没理，这国家现在没理。你还想真实记录煤矿工人，不要拍了，没用林鑫，现在谁管你哩，谁有钱谁管，你相信不相信？要不你小妹说，妈，我咋办？我以后咋办哩？你要老了，你老了以后我怎么办，她发愁，她咋不愁，发愁得很。

林：你和我姨夫那时候是咋认识的？

何：那还是你奶奶给我介绍的，你奶奶给我介绍来了。你妈先来，说姐姐你来吧，这里好，刚好有个工作。我那时候在农村比较可怜，你外婆把我送给那一家，妈也没有了，爸也没有了，我可怜没办法，回到你外婆家。你外婆说，给人家了，你到人家家里去算了。我没办法，你妈出来了，我说，你给我说说吧。你妈给你爸说，你爸又去给朋友说，你奶奶又中间给我当红娘，是这样出来的。你不知道你姨这段历史，不说都不知道。你姨受的罪比你妈苦的八倍、八倍。你看，你外婆生下我 50 天，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知道不知道？

你姨干了一辈子临时工，力也没有少出，啥也没有捞上。你看看，那天跑到劳动局去，你烧香没找好庙门，没钱，你咋说的，跑到劳动局人家都这样说。唉，我反过来一想，林鑫，你姨也想通了。又能怎样，你说要钱多了，又能怎么样。家有两万石，一日也不过三餐，你就是金银堆成山，也把我看一眼吧。能看几眼，你说。这样一想，信耶稣信的通通的，你相信不相信。林鑫，你姨夫也这样，快 70 岁的人了，我还能弄啥，只要儿女能过好就行了。现在就你一个兄弟可怜，也没有正式工。你看看，三建司要交养老统筹，他没有钱交。要不是你小妹这场病，我把钱给他。都叫你小妹一个人看病看完，你看看，你有啥法。现在你小妹身体好了，公家医药费不掏钱了。三年不掏钱，三年以后还得自己掏钱。我但愿三年快好，唉，难呀，你说这种病能看好不？林鑫，有人说一结婚，思想好了，病就好了。说不来。没办法，没办法，就苦了你小妹一个人。要不你看你姨也塞皮的很，塞皮的很，那没有，你有啥法，不省钱还不行了。我这多少年来，我跟你讲，我就为了我上海这个姐。她也是到人家当童养媳，结婚 4 年，离婚了。养大我这家，就把她当闺女看待。嫁到上海，她就好了。多少年来，说不好听话，衣服连的确良线都买不起呀，她给我从信里面寄回来。你说你姨苦到啥时候。和你妈一样，也是好强，再穷不敢说。有没有？有，有，从来不说没有，说没有怕人家看不起咱。你看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你要说穷，没人看起呀。林鑫，唉，天呀，俺这辈子跟你妈，没过上好日子。你妈是可怜的得了场病，其实你妈要不盖那房子，你妈不会死，又累可能再生气，是吧，这一下把你妈身体弄垮了。那人是好强，为那烂屁房子，你妈盖房子那时，我正害病厉害呢，害神经病，上海去看。你说看不好吧，你姨咋看好了，你看你姨现在有病没有，有神经病没有。人家都说我神经病，三里洞矿有名的，顾龙祥老婆是神经病。我在哪里看好的知道不，我在太仓造船厂，一个杨大夫，人家 20 多年的老军医。玲玲这回想找，找不到这个人了，要不找他看看。人家打针从太阳穴打进去，见过没有？人家就这样打。一扎就眼泪不断，伊伊伊，这样。扎好以后，脑子像一盘凉水，清爽清爽，人家就像给你把脑子洗洗一样，那么舒服。你现在哪有这样的大夫，没有嘛。现在大夫心也黑了，能看好也不给你看好。林鑫，你说是不是？玲玲的病，明明能看好，他让你死不死、活不活，总要找他吧，他就这样弄。要不说人都坏了，现在人都坏良心了。林鑫，你们也不要算，听到没有，该吃的吃，身体好就是本钱，懂不懂。你们还年轻呀，你阿姨年轻的时候算呀算，一毛钱都舍不得拿出去买的吃，到最后弄个胃病，一下子不能吃饭。当时想不开呀，当时只管吃，弄个好身体多好。你妈走到现在，我就做了一回梦，再也没有梦。你爸都没有托过我一回梦，你做过梦没有？做梦你爸没有？做梦他咋样，好不好？

天也空，地也空，养儿养女都是空，到头来还是无影无踪。灰一烧，还有啥？你说，是不是这道理，说到这里，不是都想通了。信耶稣就是这点好，林鑫呀，林鑫呀，你阿姨就这点，上帝救我了。不是上帝，阿姨早都和你妈一样跑掉了，早都跑掉了。你妈去世有 20 年了吧，有没有？哪一年？我把你妈哪一年都忘了。

**林：**86 年。

**何：**86 年，整整 20 年了。你光说的，你妈才 40 多岁。那是我的妹妹，也不知道在一起说说知己话，光是忙呀忙呀，她忙她的，我忙我的。光为一屋子娃，忙的呀，还上班，还干屁临时工。前面挣了，后面我生病了，光还债还不完，那几年，不知咋弄的，哎呀！

你应该拍点真实的，老一代咋样经历咋样苦，咋样过来了。我记得哪一年我过年，我害病，我两娃娃也害病。我过年就 17 块钱，17 块钱过一个年。林鑫，钱是钱，再值钱也不行。一袋面 8 块多，你要买，给娃娃买买衣服，买啥，什么都要买起来。可怜，我给你姨夫说，俺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时候咋说，弟弟妹妹都小了，一个一个都挨住，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那里。我记得哪一年，胃病那年，吃高粱面，屙不出来。我看他们小，舍不得叫他们吃，吃出病咋弄。你姨夫上班，人家下井，不能给他吃粗粮吧。70%粗粮，只有 30%好粮呀。吃好粮就你姨夫先吃点，娃娃吃点。上班吃点，中间不上班还不叫他们吃好粮，

就这 100 斤只有 30 斤好粮，你说那几年苦不苦。那是六几年，就是六二年吧，我记得有你这个妹妹的时候，你姨夫为我饿出胃病。我不是有小孩子吃奶了，我吃不好，我一顿吃了五个馍。那不是在家属食堂吃饭嘛，一共 24 斤粮。今天叫我吃饱吧，老吃不饱，一下吃五个馍都吃不饱，你说那年苦成啥。第二天不吃，谁知到第二天饿的更厉害。那是 60 年那时候，呀，那饿的肚子好像通海了，咋样吃吃不饱。主要是油，一个人能吃半两油。你看看，你爸爸上班，一两油。要不说现在好，现在好，要不说现在年轻人都忘本了。你看垃圾桶里的馍，一个个，我看着心痛哟，我那时候饿得包谷面馍都找不着。白面扔垃圾桶里扔的一包包，你说现在人咋想，你说忘本不忘本。尤其是下一代人，凡凡苦知道吗，你们应该给他讲讲哩。尤其是我那外孙，我苦死了，我妈不爱我，人家吃的好的很，我就没吃上好的，他老埋怨，你看谁……

你不要说，我刚到铜川来，你妈在火车站接我。你妈先来嘛，在火车站接我的时候，我只认你妈，谁也不认识。你爸光看我，我说这个人咋怪怪的。你爸我也没见过，我一个妹夫，那一个是你妹夫，我都不认识，分不出来，傻不傻，你姨傻不傻。去弄菜了，你爸去了，哎，龙祥，不要去了。这才知道这是你爸，你看我傻不傻。到食堂去买馍，糜子面，一层黑一层白，我给你爸说，这个好吃呀，这黑的豆沙。你姨夫说啥不给我买，说，你不吃，你一吃，你要回老家去了，吃那人一层层糜子面，农民会蒸，你不会蒸，还苦不唧唧。

俺小兰像个假小子，爱跑，一跑脚趾头露在外面，还只管跑，跑了半天，没跑出啥名堂来。我要支持她，也能跑个运动员吧。没有支持她，家里条件达不到要求。那时脑子也单纯，脑子也笨。我还没你妈聪明，你妈上初中，你姨才上了半年学呀，你说有文化没有，那时可伶的很呢。

**兰：**你那时看病，看俺姨来了，你看俺一个个脚趾头露着，你给俺一个拿了一双鞋。

**何：**我回老家看病，我一看半个月嘛，我就得了个神经病，回老家看病去了，也没看好。检查还查不出来，上海整个医院都检查完呀，一直是那个病。唉，那时可伶。我记得那文化大革命，打的、吓的回家。你姨夫参加那个 66 兵团，66 兵团干将。你爸也没有钱，我那时只有 40 块钱，你说和你爸两个回去够不够，干脆叫你姨夫回去了。你爸在这儿差一点呀，你爸在前面跑，后面那个人死了呀，把那个血全部溅到你爸身上呀。你妈吓的，说姐呀，我再也不叫永生出去了。东躲西躲，唉，你爸又回来了，躲在哪里，房子上搭个棚，躲在棚棚上面，热的呀。这个来叫，那个来叫。那时耐娟她爸最可憎，一会就来叫你爸，你不去不行，你不去是啥个派，要批斗你，叫走资派。我叫也叫不来，你非要去，写个毛，写错了，打 X，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戴个高帽子。那时真是文化大革命，大乱了，害怕人。文化大革命你们才多大，64 年四清，是 66 年。我就生你兄弟那年，67 年，这个学校，弄个平房，机关枪排着。你姨夫叫几声炮吓得呀，正好文化大革命，太害怕了。67 年 69 年那几年，正是武斗来劲的很，一个人被戳了 43 刀呀，昏了三天，你说命长不长。身上戳了 43 刀，身上还有好地方没有。唉，就是汽车拉着，人家广播说着，噢，这个人是英雄，咋样咋样。啥烂屁英雄，贫下中农打贫下中农，都是好人打好人。

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一楞呀，记住没有。你奶奶死，你跑到我家里来给我跪着，你记着没有，噢，记不住了。我问你咋了么？奶奶没有了。你妈还在老家，你妈那时与你爸两人吵架，你爸那人又倔，把你妈气得要离婚。我也老批评你妈，我说你不能啊，看在娃娃面上不能啊，妹妹呀，你不能这样做，听姐的话。你妈那时把我恨死了，阿姐，人家都劝我离婚，你还要我好。我说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还小不知道，你娃娃可伶。你说你找不找，娃跟着你可以，跟着你爸呢，你爸再找一个，你不是才……你说是不是。你外婆呢是个老糊涂，回来离婚，要这样男人干啥，趁早离婚，还给你妈打防疫针。后来你奶奶死了，你妈回来了，后来好了。好了以后有了弘鑫，这样子好了。唉，就是这样子闹呀。还有个谁，也是上海人，叫王桂芳，换老婆你听说过吧。那你妈是本分人，玩玩说说话怕啥嘛，都是老乡嘛。

你爸可不愿意，跟那个男的就学坏了，非学坏不行。你爸那个人心好，就是犟脾气，和你姨夫一样，倔起来，十头牛拉不过来。反正你妈也没有少挨打，犟的呀，你妈哭着跑到我这里，你爸我还不该喋喋他，我还比他小。你爸比我大，还是我妹夫，你说咋弄。不说了，你把你自己管好，少管俺的事。你爸也是个麻糜子货，我说你打俺妹子就不行，我就不愿意你。经常打俺妹子，俺妹子咋了嘛，俺妹子做啥丢人事了？你凭啥打她。俺姐妹再咋样，那是俺妹妹么，你要我咋说。你爸倔的呀，倔的要命。那会儿为你妈结扎，我不同意你妈结扎，女同志一结扎，对你妈身体不好呀。你有本事，你咋不去结扎，你凭啥叫俺妹妹结扎，我就那样给他吵开呀，给他没有商量通，叫你妈不吭气。那几年也是没有少吵架，那几年你爸恨死我了。因我爱说，我好说呀，你妈又不爱吭气，一弄不对，跑到我家里哭哭。姐姐呀，你到我家去呀，我光上你家吃饭，你从来不上我家。我说妹妹，我不能和你比呀，我家没有老人在跟前，你有老人在跟前，我不能到你家吃饭去。姐和你说话高兴，我不是吃你顿饭，说你妹子好，不吃就说你妹子不好，你只管吃，我有你只管吃。俺姐妹俩可好了，都怪你外婆了，一句话把我们俩说僵了。我也有病了，一下说的俺两个吵开了，那年我已经得病了。你说不清吧，觉得比谁都清楚；说清吧，觉得比谁都糊涂。自己说话有时候就掉道了。现在自己回想，也能回想起来。有的地方我想不起来，我病犯了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我一个人跑到山上，不吭气。我前面跑，这两个娃娃后面追，就没有叫你妈知道。前面跑，她后面撵，那些娃娃们，妈呀妈呀。你去屁吧，哭去吧，我只管走。你说我那时病成啥了。到了上海，到你姨夫家里，他妈对我好。那老婆还可以，我弄啥都任着我。到外婆家那大夫也好，给我开那个药也对症，你外婆照顾的也可以。你不知道为那一场病，我眼泪不知多少，几次都想跳河去。在小兰她奶奶家，看人家睡觉，我就自己跑起来，跑起来就死了好，死了好，活着有啥意思。现在信耶稣呢，那时就像魔鬼捉住我呀，那一场病害的不知自己咋了。现在好了，自己还能想起来，你说这病怪不怪。你说玲玲也能想起来，谁对我好了，谁对我不好了。那时真可怜，那时我还比你妈多一个娃，姊妹五个，俺可怜的很。病好了不是到小卖铺去干干，那时你妈不是也有病嘛。她说阿姐呀，我得了胃病。我说有病你好好看看去吧。林娟领你妈到矿医院去检查，也没检查出啥名堂。你说那时知道不知道？那时可能已经知道了，你妹子领你妈到矿医院检查了。我那时在小卖铺上班，问她啥病，她说胃病，不能吃饭。我说你好好检查去，到最后我不是不知道。唉，想想也是，想想窝囊。林鑫，俺姐妹俩跑这里跑错了，事实跑错了。林鑫，你妈不来，我也不会来。总想你妈说，姐呀，你来吧，咱姐妹两个做个伴。谁知道这里这么苦。那时好粮也没有，整天吃粗粮，你妈也像我一样，你有啥法。说不好听，你妈要不到铜川来，也不会死，相信不相信，得不了这个病，最起码老家的空气好，这地方好可怜。

你外公买的一条鱼被猫叼走了，把我骂了一顿。你这个小娘差得远，就是穷命，你这穷鬼，穷的连条鱼都吃不起。我买了鱼却叫猫叼走。你看你外公冤枉不冤枉我，那鱼是你买回来的，你也没给我打招呼。你买回来说，菊珍，那儿买回条鱼，你看好，他不说呀。他巴拉巴拉骂我，你说我难受不难受。我都不是要吃呀，那时在上海，啥我都不能吃。你不知你外婆说的话呀，我受不了吵一架我走了。林鑫，我把眼泪哭干了，我看病呀，她一天给我一碗稀饭，其他两顿给我红苕。虽说老家困难我也知道，我当时也没有说啥。回来我对你姨夫说，我哪怕借了钱，给我妈寄点钱去。你懂吗，我那几年实在是伤心呀，我那几年实在是记恨你外婆呀。你从小没把我养大，我长大了，我总是你闺女吧，一样看待吧。林鑫，长大她还不一样看待呀。你不知道，你妈出来给你妈陪马桶呀什么。我自己买的马桶，买了木盆，叫你外公漆漆，你外公还给我要漆钱呀。你说林鑫呀，你说我咋不伤心，我想起那伤心呀。要不这几年信耶稣才好了，我才不知道对你外婆恨了。我觉得她也难，也知道。以前不是呀，以前我把你外婆恨……你外婆来的这里，给我拿了一盒糕点，我不要你拿，她也是好心拿下，她好心拿的啥，林鑫你知道，里面霉菌长得这么高呀，这是你给外孙吃的东西呀，你没有不



拿，我不争，我知道你没有，你这是弄啥，对你闺女连外人都不如，你说是不是，林鑫。哎，你不知你外婆对我偏向偏向的，那几年我实在是好生气、好生气。本身工作上也生点气，想起你外婆……在我回家看病的时候，老想老想。你不知你外婆对我，我看病去，你小姨睡床上，我有病叫我睡（阁楼）地板上，外婆有阁楼你看见吧。叫我睡地板上我不说，那天冷的呀不行。我说妈呀，你给我拿条网套，拿条网套就行，拿条网套垫垫，冷得不行。冬天嘛，她拿了条网套还半新半旧，我也不计较，只要是网套就行。你外婆咋说，要俺的网套，俺的网套给你用就可惜了、糟蹋了。你听见了吗，林鑫，我有些话不应该给你们小辈说，噢，我想想生气呀。林鑫，你不知道，你外婆偏向偏向到哪里，你说，对不对，哎呀你不知道我好伤心呀。我总想着妈你因为困难，可能把我送人家，我不恨你。现在我长大给我一样就行，你说是不是，我不求你要给我多少，对不对，你只要对我一样看待，对不对，那都是你的闺女嘛。她可偏偏给我两样看待，你不知道，气死我了。她拿出一块布，我说妈你有布没有，那年我领的小红、小妹回家看病去了。我说妈，我还要看病哩，没有钱，你有粗布给我点粗布，给你小外孙女做个罩衣，她冻得要死。拿出块粗布，我给小外孙做条裤子，剩下角角做个罩衫。唉，你外婆和你小姨两个就这样看我呀，你不知道，噢，林鑫呀，我现在都穷成这样。要不从那次离开她门，我再没有到你外婆家去过。你知道你姨这个人好强，要不小妹这场病我想不通，我好强，咋命不强，女子咋弄成这。是不是，林鑫，人家不知道，是我这人坏到哪里去。其实你妈好人，你妈那个人好人，我不怨你妈，我就怨你外婆。你外婆就对我偏见的太很。我生下来50天（就把我送人了），那年，我才十八岁，实岁才十七岁。我说妈我回来我不想去了，你看那家妈也没有爸也没有了，养大我家的儿子老打我老欺负我，嫂子也欺负我。你外婆咋说，给人家的人，你死了是人家的鬼，就不收留我。你说林鑫，我要不是你妈给我救出来，我在老家也死了，也活不了，你相信不相信，气都气死了。回到你外婆家，你外婆不接受我。那会儿我会干活，农村活啥都会，插秧啥我啥都会。我说妈我不吃你的，叫我住住你的房子行不行，我啥都会干，她都不收留我，你说你外婆那颗心成啥样子。哎呀，你外婆气的我，平常我啥都不计较，那年我看病，不管咋样我领着你外孙都来了，对不对，也不叫你给我多少钱，叫你对我同样看待就行了，她都偏见的不好。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你外婆不是来了，拿一盒点心还长霉。你姨夫这个人好，菊珍啊，你不要争，啥也不要争，你就看着你也生过娃了，你就看你怀一个娃十来个月可怜吧，噢，你妈也是可怜的，你不要想你妈不好的事，想你妈好的地方，你要对你妈好好的。哎，你外婆来我对她真好呀，花生一布袋一买，那时我在小卖部上班，她要吃啥我去弄。临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你说林鑫，你生气不生气。林鑫，我就争你外婆那一点，我再咋样对你不好，吃不好，我生活就这条件。看你来了，公鸡便宜，5元就一个大公鸡，我借了钱叫你外婆尽量吃好，人家走了……我还跟你姨夫俩商量，我弄啥都跟你姨夫商量，我一个人做主不了，我挣的钱你都给你妈去，不能这样做呀。我跟你姨父商量俺妈走了，不管咋样，一张车票你给我买着哦，你那怕没有钱给借钱来，也要给俺妈买个车票，是不是，老人多少年来一回。你姨夫还好，行行行。我钱啥都弄好了，准备好了，你外婆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说林鑫，你说你姨啥味道。你不知道，你妈当时还不了解我咋回事，还说姐你咋回事，你老是计较老妈。那肯定，你在跟前长大，妈对你好。对我不好，我肯定心里也不平衡吧，是不是林鑫。你比方你妈养你们，对他好不对你好，你心里咋想是不是，我不是要你东西，只要你给我一句温暖的话也行。我和你妈有点矛盾，其实也没啥矛盾，有点小矛盾，就是为工作争了两句。唉，我给我妈说，妈你来了，你给俺妹子说说，我对俺妹子没啥意见，你跟俺妹子劝劝哦。俺妹子可能心里不好受，我给她说吧我的脾气赖，说不好害怕姊妹俩吵。你看你外婆咋说，你知道不知道。哎，姊妹们嘛，只有共日头，没有共灶头，好了可以来来往往，不好可以不来往。你说这那是老人劝的话，你说对不对，林鑫。哎呀，我从那天林鑫呀我凉透了，要不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几年来，我心里凉透凉透。要不是耶稣，我把世界看的透透的透透的，你说连你自己亲

妈都对你这样说，你在这世上有啥活头，是不是林鑫。哎呀，你姨是好强，你妈也知道。她说姐呀，你再没有钱也是有钱的，等我给你借钱，你再没有也是有的。其实你妈那人也是好人，她说姐呀，你太好强了，姐呀，请你想开点吧，你不要这样好强，好不好。今天有了今天过，明天了，明天再说，她也劝我。哎，后来你外婆一来，不知道在你妈面前说了啥话，给我前面没这个话。从那次你外婆一走，你妈给我不多说话了，我也不多说话了，我也和她疏远了，就这样俺姊妹俩就分裂了。你开始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为俺姊妹俩我不想跟小辈说。尽管说出来没意思，其实你妈真正和我一点也没有隔阂，就是你外婆来那一段弄得隔阂，你说咋不生气。我还怪你妈，我说妈走了，你也不给我打个招呼。你妈咋说，给你省一点还不好。噢，我说妹子，这是省的呀，你咋也不讲道理了。把我气得，我那时有气死病，你不知道，一回到家，躺到床上啥也不知道，一下气死过去。我那妹子咋给我这样说，可能脑袋已经不舒服了，我自己现在回想，可能已经病得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那已经看了病回来，还没有好一两天，那已经看了病了。你外婆最后一次来，我已经看了病回来了，就是那不行。我的病从那一年，有玲玲那年，大姐结婚那年，脑子清醒。开始我还不清醒，脑子糊里糊涂，老把你姨夫恨死了呀，把你姨夫恨的。就是那个贺俊芝，在银行叫贺俊芝缺了我一下以后，从那以后我觉得世上没一个好人，再没有一个好人。恨死，世上任何人不说话。你看我现在好了，还爱说说话。病一害以后，一句话都没有。你说说你外婆骂我我不说，好坏不说就憋在肚子里面。气的自己哭哭，跑到外面去哭哭。（那次回太仓，）临走把你外婆的衣服拿到河里洗洗。你外婆骂我，临走连饭都不给我做一顿，到最后走还不给我做饭。开始你外婆下地，我给她做做饭，领着小红、小妹。你妹子回去还在老家哩，你不知道她对你妹子好透好透，对我两个娃呀另眼看待。你说林鑫，自己穷呀，当我妈对我另眼看待，自己心里啥味道。林鑫，你说是不是这道理，是不是你姨不讲道理呀。你不知从那回离开你外婆家我就没去过。就那年97年回家，我也没有到你外婆家去。要不我信耶稣，我说上帝我错了，你叫我妈多活几年，叫我有机会去看一看，叫我赎罪去吧。自己也知道错了，不能跟老人争，可是那时不由人，不由人，不由人，想想难受的要命，一想起你外婆对我的那些，你不知道我心里啥味道。我说你没来时，俺姐妹俩好好的，我妹子也来，我也去。你一来，你不但没弄好，把俺姐妹俩隔阂了。好了可以来来往往，不好可以不来往。你说你老人咋这样说话哩，对不对。我跟你妈还不能说，给你妈一说，看你妈对你外婆挺好的。我说那几年，林鑫，你不知道，眼泪都哭干了，你知不知道。给你妈还说不成，一个是养大的，比如说没有养大我，我肯定对你妈不好。我说她对我不好，隔阂了吧。我说你再没有文化，劝闺女咋这样劝。我闺女姊妹们有时也吵架，我不能这样劝吧，对不对。再不好是你姐哩，你姐小时候也可怜，我没有把她养大，你对我妹妹应该这样说。（对我说）你妹妹小，离开我这么远，你应该照顾她点，这才是老人说的话。你都不这样说，你倒过来说。

现在你外婆身体好不好，你知道不知道？好着哩，噢，行行，感谢主，让她多活几年。我现在想过来了，让她多活几年，等小妹好了，有个家了，我还要回家去看看她了，表表我心愿。我也有想法知道不，过去也是你姨一种愚昧的想法，一信耶稣脑袋全部清楚了。那不信耶稣，脑子迷迷糊糊光知道恨那恨。不能恨，恨人杀人罪呀，是天大的罪，不能恨人呀。唉，没办法、没办法。最后一次，你外婆来那最后一次，她临走都不给我打招呼。不管咋样，我对你再不咋样，你应该打个招呼。你到我家里，我给你吃的不好了，怠慢你了，你也可以。我洗脸水端到你跟前，洗脚水端到你跟前。上班忙了，你姨夫给她端过去，你还要咋。妈你住嘛，她不住。她觉得有不一样，她住了有十来天，上我家，说啥也不肯住。我说咋了，我没有给你吃饱，还咋回事，没给你吃好，咋回事嘛。你闺女就这个条件嘛，我心想我尽了力了，你还要咋么，唉，临走吭都不吭气。我就说咋了么，我回老家，你对我这股劲，我也没有记你仇，你来我该招待你还招待你，该咋样还咋样，你走连吭都不吭气。从那以后，我97年回家，我就没去。我村上有一个娘家在你外婆家那儿，说我生气了，你咋不去了。我

不去，我不想去。为啥，我没时间，跟不上。我咋能说，我妈对我不好，说出来人家笑话我，是不是。像你妈咋样咋样，我说我妈好着哩，顾不上，下回回来再回去，我只能这样说，咋说。哎呀，你不知我难透难透，你不知我那几年，你那几个妹子小，整天害病。小红出麻疹出的呀，小萍那年也出麻疹。抱到你家，你爸你妈一裹，看着小萍。我回来小萍好好的，给我看的好的啥一样。我姐妹俩好好的，你当老人咋给我姐妹俩弄成这了嘛，你妈心里也不舒服。你给我这样，给你妈前面咋说哩，你不把俺俩调和好，又把俺俩拉远隔开了。你说这个老人咋当的，有时想想也生气。反过来一想，信耶稣，妈也没有文化，可能说话不注意呵。现在知道原谅她了。你看，你看你阿姨昏不昏，你阿姨糊涂的很。这几年我自己为你小妹这场病，我也是……我作孽了，对我妈不好了，都犯罪了。感谢神吧，我错在哪里呀，要不我把这个情况，给姊妹们说说。你不犯罪，上帝要熬炼你了，熬炼你给你一身金子啊。感谢主，就是刚才那个姨说，上帝熬炼你，上帝要爱你。你不要看这点患难，患难过去就享福了。人家都这样，劝信耶稣就这点好，互相之间可以相爱，可以劝劝哦。你要是和一般人不能说，说出来人家笑话你，你说是不是？你说俺妈不好，你好连你自己妈都对你不亲，肯定不是东西是吧，是不是？外人不能说。俺妈还在，俺妈快一百岁了，安排好了咱啥时候回家去看看，看看老母亲去，把小兰把两个闺女带回去看看。

### 【何菊珍唱的圣歌】

一

主的眼里没有难题，  
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只要你顺服和相信，  
祂必为你成就美意。  
有时候乌云暂时遮蔽，  
主你的慈爱却不远离，  
祂与你同行保护到底，  
使雨过天晴喜乐满溢。

二

我跪在十字架下求，  
止不住的泪水流，  
亲爱的救主，你来搭救我啊，  
让我投进你的怀抱中。

主，你拉住我的手，  
拉住我的软弱的手，  
灵程路上大步向前进啊，  
让我永永远远不回头。

主，你早日接我走，  
早日接我住进天堂楼，  
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啊，  
叫我永永远远享福到永久。



## 沈龙根

沈龙根，1937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放炮员，已退休。



128、沈龙根艰难地上楼梯



129、沈龙根和老伴

## 攥完煤再上罐，攥不完煤你就别想上来

【在顾龙祥看楼的工地门房】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们当时怎么从上海来的？

**沈龙根（以下简称沈）：**这里去上海建筑公司招工，招到这里来的嘛。他说是支援大西北，来了下井采煤嘛。结果是一个个报名，合格不合格啦，不合格还不叫去。他妈的那个时候，什么合格不合格，只要报了名，都合格是吧。来了就是这回事，没啥。当时叫咱到这里来，到建筑公司一集合，说走了就走。可能是12月到这里来，55年12月份到这里来。57年7月1日移交生产。来了以后在井下，下井，煤矿工人下井采煤嘛。一说到这里来下煤窑，一下去人，那么深的地方，下去一看都害怕，到采煤掌子面最害怕了。大巷里你看着像回事，到采煤上你去看看，不害怕？叫我也害怕。害怕，害怕啥害怕，害怕你也要干，不干不行嘛。我一直在采区，哪里都没去过，一直在采煤上。下井以后苦是肯定的，又脏又苦，再就是时间长，干工作时间长。说是8个小时，有时12个小时13个小时，干到天明了。就是分给你采煤上（的活），你给他干完。攥完煤再上罐，攥不完煤你就别想上来，就是这意思。

**林：**身边有因为事故不在的人吗？

**沈：**我身边没有。刚开始很少，就是头一个，戚国其那个，戚国其也是我们老乡，他是浦东人。当时一块来，人认识，干活不在一块。他是通风区的，我是采区的，根本不在一块。拉过小车，在三矿拉过，在这里一开始也拉过。巷道低你还要爬，还要拉，对不对。采煤上一块干活的有周永福、张野根、张友根。张野根是张金龙的弟弟嘛，这是我一直一块干的。有七个采区，三班倒。每个采区都有人，掘进人少，采煤人多，光一个班三四十个人。你采煤上发生事故了，最多就是叫几个人把人弄出去，打个电话，救下来。最苦就是干了一辈子弄了个脸黑。

**林：**发生这个事故是哪一年？

**沈：**73年。当时我用电钻打眼，装火药。装好以后，连着电呢，炮线往外一拉，你要进去连炮，两个连在一起。结果我进去连炮，正连着炮呢，人家在后面给我把电送上，他给你通上电了，这井下火药雷管就响了，崩过来了。不是自己弄的，是人家给我弄的。

**林：**井下冒顶是咋回事？

**沈：**冒顶，一放炮柱子倒了，一般都冒顶。柱子倒了，冒顶多一些。平常你采一块，把柱子打上，出一块煤，把柱子打上。你要方便就方便，弄不好，那就是大冒顶。冒顶压死人好几个。

**林：**掌子面低得很？

**沈：**差不多有这么高，你攥煤还要趴下攥。你不管干啥都要爬，你不爬，你不爬你不干，可低。采煤上出事故，派人处理，弄几个人往外抬，派几个人处理去，打电话救护车来，就是这回事嘛。采煤二区一次砸死三个。哪个采区都有，不能说没有，没办法。冒顶是经常遇到，不是说哪一次，冒顶是经常遇到的。采煤上经常冒顶多的是，不管哪个采煤区都有冒顶。你柱子打不好也要冒顶，放顶也是冒顶，你放的好差不多，放不好一家伙埋死在里边，埋到里边去。井下说死个人不在乎，就是说井下。

**林：**每天上班换衣服习惯吗？

**沈：**换衣服也不习惯，你说天气冷，天天穿衣服、换衣服，冻得够呛。你说井下干活出了汗了，衣服都湿了，明天上班你还要穿，还要穿上。不穿？煤矿工人说起来没法说，说不了。

**林：**那你们在井下怎么吃饭？

沈：一开始就是自己在家里拿点馍，拿手绢包的、塑料纸包的都有。后来食堂里专门有人送馍了，一人两个馍。

林：你后来是采区班长，你管多少人？

沈：30 多人，有时 40 多人。

林：井下安全挺操心吧？

沈：那咋不操心，不操心能行？掌子面都要来回跑，从机头跑到机尾，一个个都要看，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不安全要打柱子。哪个地方不看？老待在一个地方不行。

林：你在上海建筑公司做什么工作？

沈：干杂工，建筑上干杂工嘛。

林：你是上海人？

沈：上海市郊区，我是浦东的。刚来的时候不习惯。你说不吃馍，馍吃不了。上海来的，光想吃大米饭，大米。你吃不惯咋办，人家给你做？不可能嘛。你吃不惯也要吃，不管好赖都要吃，不吃你就饿着。那个时候来了，工资也少，才来的时候一个月就四五十块钱。在毛主席领导下，五六十块钱还要养活五六口人哩，你现在几百块钱还养不活。

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沈：60 年的时候，咱们也不好好上班。人家都不上班，我也不上班，我害怕嘛。60 年我吃不饱。你不上班，人家扣你粮。60 年的时候根本没吃的。

林：听我爸说过粮不够吃，他们去买私粮，跑了几天。

沈：买私粮要跑远了，跑的近买不着了。买私粮，近的地方根本没有。都要跑到宜君呀，北关山上。我没有去买过，我家里生活我不管，做好我吃，我啥都不管。你说洗衣服也不会洗衣服，做饭还可以吧，你说油没有了我做不了。一炒菜，油呛得受不了，上不来气。职业病，煤矿上职业病。

林：煤肺？

沈：噢。

林：你是煤肺几期？

沈：它现在算 1 期。本本上写的是 8 期，8 期是 1 期。

林：煤肺对你现在生活有啥影响？

沈：冬天比较厉害一点，像最近暖和了，那出来不要紧，比较好一点。一到冬天，我睡三个月，光睡床上三个月不起来。就是不起来三个月。冬天一个不能受凉，一个不能吹着，吹着要咳嗽。

林：职业病是怎么得的？

沈：一放炮，炮烟大嘛，还要进去连炮吧。主要是钻炮眼得职业病，不钻炮眼得职业病，不可能的事。反正采煤就是这回事，其他都没有啥，有些事时间长了咱也忘了，光来这 50 年了。

林：你还有年轻时的照片吗？

沈：年轻时我都不爱照相。为啥？脸黑了还要照相？人家需要相片了我照像，不需要我不照相。我向来都不爱照相，现在脸难看。

【沈龙根不断地咳嗽】

林：你经常咳嗽？

沈：噢，我现在吃药，不吃药更咳嗽。买药吃点，矿上不给药。本本上有钱，有钱他妈的不给你。我自己买药吃，一瓶就是 16 块。

林：一瓶能吃多少时间？

沈：吃 20 多天。

林：矿上也不给报？

沈：你到外面买的人家不给报。

林：那你到矿上诊所开呀。

沈：开？那一般好药他不给你。你到矿上开，一般的好药他不给你，我也不知道给他孙子出后门了。

林：你老伴是当时一块来的？

沈：老伴也是上海人，我们先来，她后来。六个娃，闺女都出门了，儿子摆摆小摊，卖卖调料。生活基本上还可以。咱也不问他要钱，他也不给我钱，就这回事。嗨，就是没给我钱。

林：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退休工资？

沈：拿 700 多一点。

林：老两口生活够用吧？

沈：唉，还有个孙子，三个人，还有个孙子，小孙子上初中了。

林：小孙子跟着你们？养孙子钱也是你们掏？

沈：嗯。

林：老伴身体还好？

沈：老伴身体比我还不好，比我还差。她主要是腰弯。那是老早烧煤泥了，和煤饼挖点土。就是给家里挑两担土和煤泥。人家那上边正好在打土坯。她已经担了好几担了，我说这一担不担了，不要担了。她说再担一担，再担一担。我说不担了球事都没有，这个腰。她说再担一担，就是最后一担，最后一担把她埋住了。

林：如果不来这里是否更好些？

沈：不来，在上海肯定比这里好吧，是不是。

林：也没想过回去？

沈：不想，一来就没想回去，咱的思想上来了，回去干啥嘛，就是给你说的，一直没回家。

林：一直没回去过？

沈：没有，我没回去。家里也没有人了。

林：你有孩子下井吗？

沈：没有。就接我班的那个（女儿）在选煤楼，接班在运输区选煤楼上捡矸，把石矸捡出来。其他的没干啥，都在家。

【顾龙祥陪沈龙根过马路回家，上楼梯】

顾：慢点走。

沈：我还歇歇，上四楼要歇个几趟。

顾：手扶着栏杆，

沈：手扶栏杆也不行。

一个腰弯弯的，一个呼噜呼噜气喘不上

【进入沈龙根家中】

林：阿姨您好！

沈：这是朱永生的儿子。

沈妻：是朱永生的儿子呀。



沈：一说都知道。

林：阿姨，你对我爸熟悉吧？

沈妻：你爸可孝顺你奶奶，他还有个妹妹，现在那里？

林：我姑现在陕南。

沈妻：到海南去了？

林：陕南。在汉中勉县。我姑父已经得癌症去世了。我专门去看过一次。

沈妻：她几个孩子？

林：四个。

林：阿姨，你那个时候咋想跟着叔叔跑这儿来了？

沈妻：他18岁就来了，来的时候还是小孩。他到这里支援大西北嘛，那时候结了婚，就来了。还有你爸，当时在一矿井。我是昆山的，你妈是太仓。河那边是太仓，河这边是昆山。

林：叔叔每天下井，你操心不操心？

沈妻：咋不操心，可操心。12点就要上班走了，有时学习9点就要走了，经常落点，有时12点，有时1点。有时不回来我们去问，跑到区里去问，问他们上来没有。有的说上来了，井下落点了。

林：叔叔下井，你带几个娃挺不容易的。

沈妻：娃都大了，都走了。剩老两口在一块，现在没啥人管了。房子一塌糊涂也没人管了。一个腰弯弯的，一个呼噜呼噜气喘不上。现在还好。他一冬天睡三个月，一直不起床的。现在算起来了，天气暖和了，药没有断过，一直吃药。就是老了，气喘不上来，不能跑远路，一跑远路气上不来，你看他楼梯上来要歇几歇。煤矿工人就是可怜呀，那时早上吃了下去，中午也没饭吃，也没啥到下午上来。到下午常是5点，最早4点半。天天要洗澡的，不洗澡认也认不出来。人家说像要饭的，面孔满是黑的，眼睛是白的，牙齿是白的。面孔上都是黑的。人家有的说这些人像要饭的，上海来有的不知道，真像要饭的。

林：阿姨，你刚来时生活习惯吗？

沈妻：不习惯，现在都不习惯。要吃大米，面粉都吃不惯。

沈：她不爱吃面粉，她爱吃大米。

沈妻：上海来的时候像逃荒，我在浦东也困难，出来啥也没有。到三矿也没有公共汽车，都是走到三矿，翻几座山，走到三矿。像现在有公共汽车。看他下井可害怕，我也下过井，做夜班。九点钟下井，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上来，再洗洗澡，到家十点。也没有吃的，水也喝着。人家担水下去，喝不上水的。我开溜子，井下开溜子，拉煤的，装在溜子上开回去。井下支援高产，干了三个多月。

林：那时经常支援高产？

沈：对，不管哪个单位都要支援高产。

沈妻：一点点爬的，都爬进去，爬进去人还要侧转。采煤，那么长的铁柱子拖着，拖一段，爬一段。拖一段，爬一段，爬进去。哎呀，第一回下井，罐笼像顶轿子那样，人都待在里面。然后门一关，钢丝绳吊下去。吊下去时都要待在里面一点，不要待在外边，头不要伸出去看。平时不习惯，猛一下去，头一晕一晕的，头要晕的。头上没有一只灯，就是黑天了，看不着了。

沈：在井下白天黑天根本不知道。

沈妻：开溜子的手里一只灯，一关和黑天一样。看见一只火，知道人来了，没走到你跟前，看也看不见。黑天嘛，看不出啥，全靠头上一只灯能看见人。发生死亡事故了，头砸破了，手砸住了，我没有去看过，吓得不敢去看。

林：我父亲那时脚也压住过，那是半夜，工友们来叫，夜里三点多。

沈妻：矿车挤住了。

林：我妈一直想回南方去，得癌症以后，我把她送到南方，在南方去世的。接着我爸也去世了，后来把我爸骨灰盒拿回去了，和我妈的骨灰合在一起在太仓南郊埋着。

沈妻：你还有个妹妹在这里？

林：小妹，在矿上选煤楼，后来买断了。你家也有个女儿在选煤楼？

沈妻：也买断了，矿上下马了嘛，三里洞下马了。

沈：退休以后，比以前稍微强一点，主要是有个小孙子，光我们老俩口是差不多。就是小孙子上学厉害，一天零花钱厉害，就这个小孙子。

沈妻：600多块钱，光报名800块钱，还要买书呀，买别样，买这样呀，1000块钱。他开600多块钱呀，还要吃药，我还要看看病，我头痛不能走路，光两个人生活稍微好一些。

林：子女都常来看你们？

沈：看是来看，子女来看。

沈妻：看是时常来看看，转一圈就走了。

林：阿姨想过回南方看看吗？

沈妻：南方不能去了，去了路费贵，身体也不好，走路也不方便。

林：叔叔一直没回去过，你回去过吗？

沈妻：都没回去过。回不去了，我们是在蓬朗镇住的，昆山蓬朗镇。

林：从五十年代来到这，再没离开过？

沈妻：没有，没有。

林：周围其他地方去过没有？

沈妻：哪里都没有去过，一直在铜川呆着。六个孩子，现在养大了，一个都不管了。

## 王正祥

王正祥，1933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放炮员，1984年退休，2005年完成本采访不久后去世。

林秋娣，王正祥妻。



130、王正祥和妻子林秋娣 2005年在家中



131、王正祥和妻子林秋娣 2005年在家中

## 你不报名就不行

**林秋娣（以下简称秋）：**春平他爸和你爸一样的，支援大西北嘛。上海那时候不行嘛。那年支援大西北，俺俩才结婚，第二年就来了。我们是54年结的婚，55年他们就来了。

**林鑫（以下简称林）：**当时你们是怎样报名的？

**王正祥（以下简称王）：**你不报名也不行，在那个年代呀，不是现在，你说现在谁来。

**秋：**他在上海新建的建筑公司没有活干，整天就坐在那儿学习，把你学的思想开通了，叫你支援大西北，直接就是这样叫你来了。

**王：**唉，我们这些来的，都是欺骗来的。

**秋：**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援大西北，他那时说得可好，说的是调到西北来当国家干部哩。他没有说下煤窑嘛，要是下煤窑谁来？

**林：**是自愿报名的吗？

**王：**你不报名就不行，有人报了名不来了，整天把你弄办公室给你做思想工作，哎呀，给你们说，说不通。

**秋：**那时没活干，整天吃了饭就办学习班，就开导你，叫你建设大西北。就主动叫你思想想通，叫你自己来的嘛。你不来也不行嘛，不来一个月就那么一点钱，养家糊口又糊不住，对不对，那是没办法。到大西北来闯一闯，年轻嘛，哎，哪个地方黄土不埋人，在上海能咋样，在上海有本事有钱，没本事还是一个样。

**林：**三里洞当时建矿时有多少人？

**王：**那个时候呀人不多，投入生产时只有八九百人，一千人都不到。以后慢慢多了。那时投入生产，两个采区，四个工作面，不到500人，400多人。还有掘进队，辅助部门。那个时候死人少，58、59、60年，这三年死人最多，受伤的人也多。

**林：**那是咋回事？

**王：**大跃进嘛。

**秋：**只管出煤，不管安全。

**林：**你来这儿干什么工作？

**王：**采煤，我是采煤。来了他分配干啥就干啥，来的时候培训采煤，到三里洞还是采煤，到退休了还是采煤。哈哈……

**秋：**人家一来就是辅助单位，他一来就跟着师傅学放炮。一直就是放炮员，可怜的很。那个衣服呀，新工作衣呀，街上买的那个劳动布多厚，我给他补上，补在膝盖上，一天就磨烂了。来回放炮，爬过来爬过去。别说一礼拜补一回，等于三天两天要补工作衣。他们放炮工最可怜了，其他还可以，放炮员最危险的地方，人家不进去他要进去，放炮哩嘛。那年大冒顶，他和葛登发，脚都扎烂了往外跑，他们这一代人确实可怜的很。

## 大冒顶

**王：**大冒顶，主体压力来了嘛。成妙祥你知道不知道，住在小河沟那地方，他兄弟就跟着我。哎……压力来了，我说快跑，他跑跑往后一伸，我一脚把他踢个翻，我从他身边爬过去啦。他看见我前头跑了，他也跟着我跑。好家伙那个情况冒顶给勒住了一样。唉，那一次危险的很。唉，那次大冒顶时候，在七号楼住六楼，那个王川江被埋在里边，两天两夜。哈哈……没有受伤，眼睛睁不开，他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哈哈……

**秋：**把他扒出来以后，想着都不能话了，两天两晚上。

王：头一个扒出来把他撑死了，他说肚子饥的很，一吃，弄个救护车送到大门口，死了。再弄出来不给他吃了，弄出来时就给他打针弄到医院去，住了一个礼拜出来了。

秋：你伯伯在井下受过几回伤，头一回是砸住腰了，在医院住了好些天。头回砸住腰，大概是到三里洞了，59年是吧？

王：58年。

林：大冒顶死了多少人？

王：那回还没有死人，都扒出来了。我们那一班还没有死过人，受伤的有。

秋：记得那时上四班倒。你伯伯上的是啥班呀，到第二天天明还没回来呢，把人等的急死了。半夜面条擀好，本身12点要上班呀，干到天明还没回来的呀。那时是四班倒，三班工人都在井下，家属在家真把人急死了。咋还不回来，咋还不下班回来，那真是油锅上煎的。那时春平他们还小嘛，他一晚上没回来，我整整一晚上没睡觉，不知道咋回事嘛。该下班了，咋还不回来，等到天明也没回来，跑到矿上找去。家家弄这个事，跑到矿上去找人。特别是井下采煤工，辅助单位还好些，反正我跟着你伯伯这一辈子是操心操死了，你说下班不回来，真是两眼望穿，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到退休，赶紧退。俺退休都没人顶替嘛，没顶替上，你伯伯年龄不够，算了。

## 对煤矿上我就是不感冒

王：我们那时候，国家把我们坑死了。下了29年窑，（子女）顶替都没顶替上，我们现在是有苦说不出。下了一辈子窑，不过自己身体还是不错。从煤矿工人看起来就是要吃，不吃不行。我们的生活你们也知道，反正有钱就吃。你爸工资低，我下井几十年拿七级工。唉，这个是命扒出来的。下井的人，穿得布衫，身上就没有干的。一下井，下班了，一到大巷整个把你冻得没办法。唉，渴起来就喝水管子里水。过去的时候，“四清”工作队来了以后，才有送水的，以前没有送水的。水管子的水，井下的水，尿也有，啥也有，那个时候人啊，放在这个时候说啥都不喝。那个时候人呀，他渴了没办法才喝了，不渴的人你叫他和说啥他也不喝。抱住那个水管子，你不知道一喝一个饱，你不喝不行，干的你真是没办法。唉，所以我说，确实，不管是儿子也好，女子也好，没有下井的。我是个煤窑工，对煤矿上我就是不感冒，人家钱挣得再多，我不稀罕。那个真正是命扑出来的。你像现在陈家山这个事故，你们也知道。哈哈……唉！

秋：井下受伤、死的也不少。戚国其是第一个。57年三里洞矿移交生产，一下砸死到井底下了，那年轻得很，20多岁。下来就是于月堂、明大坤。

王：我们班很少发生事故，发生也是轻伤，这是免不了的。有一个孙宜人，最能呼啦，实际那块石头不大，就这么大，跟那个刀一样，齐得很，把那个裤子拉烂了。唉，这个地方，我特别记得，他一弄，结果筋断了，接的狗筋，给他接住了。这个连骨头都没有伤，筋受伤了。我们一班这个事故最大了，其他就没有啥大事故。

煤矿工人可怜的很着哩，你出力了，还要看领导脸色。我那时候，不但不听他的，不看他的脸色，他还要看我的脸色。为啥，我炮放的好，晓得吧。唉，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嘴不会说，光会掏力，能吃苦。唉！最苦在三矿最苦了，煤层只有60厘米高，人屁股坐在地板上，头还要这样子，还有水。那确实苦得很。不过人家顶板好，五六米打一个柱子，人家顶板好。我放炮，在三矿就放的好。一般出不出事故，主要在放炮。放炮柱子打倒了，就容易出事故。我们那时候，不但柱子打不倒，那时还有炸药雷管奖，一个月还弄个几十块钱了。我们班那时候，老是炸药雷管用的少，煤出的多，有炸药雷管奖。

## 光我用的炸药，可能要拉个几车皮了

林：你们刚开始下井害怕吗？

王：害怕嘛，咋不害怕？那时才来，走在老巷道里，七八米远打一根柱子，七八米远打一根柱子。自己脑子里想，在这里砸死了谁也不知道。哈哈……

我最后一次腰受伤，在更衣室里弄了半年。他把我工级抹掉了，他看我不找他了，他又叫我下井。一块来的林冲其，他要我溜他，我就不溜你。我下井就下井，弄通风区，弄二线。不过通风区说起来是个二线，比采区掏的力还大。唉，后来说，我还要到采区去。他说，你在二线蛮好的嘛。我说我不干，我到采区去，后来又回到采区，去弄了五年。过去井下的巷道，只有这么高的巷道，如果扛个 135 斤的铁柱子直跑，70 年、71 年跑了，到 83 年，扛倒扛起来了，腿子抬不起来了。我说算了算了，不干了，我 84 年退休了。

林：你后来回到采区还是放炮？

王：噢，还是放炮。后来又维护，在这个机尾回收。光我用的炸药，可能要拉个几车皮了，哈哈……

秋：那箱子那么高，一天一箱子，背着。

王：大面积爆破，两箱子也用得完。大面积爆破用得更多，井下大巷有火药库，到火药库去领取。

秋：领出来自己要背到掌子面去，一天放多少炮，要多少炸药、雷管都得自己准备好。

林：你放炮出现过失误没有？

王：瞎炮很少，一般都好着。有的瞎炮是自己造成的，把雷管摔得很了，或是拽出来了。我们放一千个有一个瞎炮的，我的瞎炮也少，不能说没有。有时因为雷管质量的关系，有一年瞎炮就是多。是三年自然灾害，质量的关系。

秋：他们在井下不是一炮炮放，而是连着放，连炮。连炮，所以来回爬，来回爬，光在地下爬了。放一炮，连一炮。好放炮员，这是井下有名的好放炮员，人个子不大，爬得快，窜得快。为啥要快呢，放完以后，撬煤工要把煤拉出来呀。你放的晚了就不行了，到点了，那工人就对他意见大了。放炮员早早把那煤放下来，工人好干活，还要有技术把煤打到溜子的两边，打的远了打飞了，打的近了撬不到溜子跟前，这还真是有技术哩，我也是听他们一伙子来家串门子说，哎呀，这老王放炮放的好，这撬煤工对他没意见。

## 我给他一个人一个耳光子

林：下到井底离工作面多远？

王：最少要走十几里路。到二水平近了，但坡度是这样子。你人从上头下去了，一到底下腿都打颤了，不会走。你从底下爬上来呢，一身水。唉，路离井口近得很，坡度 600 米长，一华里多路了。唉，煤矿工人想起来不能干，说啥都不能干。

秋：那时不知道，知道了，在上海说啥都不来，拾破烂都不来。

王：唉，74 年的时候，我说春平、春龙，你们长大了干啥，他们说下煤窑。我问为啥要下煤窑，他说下煤窑拿钱多。我是七级工嘛，拿钱多。我给他一个人一个耳光子，我说讨饭都不叫你下煤窑。哈哈……75 年焦坪发生事故，死了 101 个人。我说你们下不下煤窑？不下了，不下了。我说咋又不下了。（拉棺材的）车子跑了一天了。唉……

## 来的没有几个人了

秋：正儿八经井下采煤工，来的没有几个人了，是不是。光我知道有葛登发，明大坤。

王：葛登发你去过没有？

林：还没有。

王：葛登发两个耳朵听不见。

秋：他能说。

王：唉。看起来蛮胖的，不精神，两个耳朵助听器戴上也听不见。年轻时好一点，能听见，现在一点听不见。

秋：本来耳朵也背，放炮放的。说话声音大，像吵架一样。

王：二层窑洞现在有个张林根，别的没有了。底下邱长宇死了，还有一个丁福珍。

秋：丁福珍能说。

王：丁福珍你认识吧，他和外孙在家，他老婆打麻将。倪进祥拍了吗？

林：下周拍。

王：他没下几天井，他在三矿真正下了几天。到这里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下了有个四年吧，他已经是干部了。倪进祥他嘴能说的，他下井攥煤攥了半年多，懂得多，嘴能说。

秋：理论嘛，人家干部。

王：人家就是满足一点。你爸那时也跟我一样，有啥说啥。说瞎话就能当官，不说瞎话不能当官。

林：你干那么长时间，有没有半中间想回去的想法？

王：有，咋没有。唉呀，我是城市的，在农村我早就跑掉了。在上海没有户口粮都吃不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粮就不行。

秋：二层窑洞那个姓唐的，就回老家了。

王：62年。

秋：他是泰州人，那么多人就他一个人回去了。回去能咋，最后不是又来了一次。就那俩钱，房子也没有，啥也没有。待了两三年，钱也用完了。他又来铜川一次，还想下井，矿上不要他。那年人家走了，他也给我商量，说我们回去吧。我说回去咋弄，又没有房子，又没有地，往那里去呢。

王：上海我姐夫一听我要回去，赶快叫她来了，把工作都停了。唉，现在她后悔了。不来的话，现在最起码也拿八九百块钱吧。我说不后悔了，后悔啥，我说在上海，不一定啥样子。

秋：我最后悔，上海户口跑到这里来，工作也没有。人家都退休了，咱啥都没有，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临时工，现在啥都没有。去年他们干临时工的都去找了，不行，都没有转。年龄大的不让干了，有的年轻人转大集体了，弄得俺啥都没有。后悔，后悔啥，就那么回事，不是一个，那么些人。原来来时都是一个个年轻人，原来上面一排房子，南方人有六七户。两口子两口子不在的多，张许金两口子，也是他们一起来的。现在姚惠民家，也没有了，比你妈那时晚一点。

王：他还是开绞车的，真正掌子面没有经过。唉……

秋：我也下过井，那时下井老工人引到老巷道里，窟窿这么大，我钻不过去，侧着身子都钻不过去，只能爬过去。真是，下井工人太可怜了呀，人家说狗洞都比它大。你伯伯身体好，他下井回来没有受过罪。原来带杂粮吃，他没有吃过杂粮，俺和娃们吃包谷面，就是没有亏了他的嘴。白面呀，馍呀。那时候你说有啥，要啥也没啥，买个鸡蛋，买个肉呀，都是计划。有很多人下几十年井，像葛登发职业病都没弄上。你伯都是退休了职业病才批下来。下那些年井，能没有职业病？我们家大的小的，不管哪一个都听他的，不敢叫他生气。他赖

好有点气，上不来气，马上坐到那儿都要憋死了。你看他现在坐这儿好好的，不敢见一点气。

王：我们年轻时吃点苦，现在老了享福了。他们呢不管咋样，多少还给我，我说我不要。我大闺女说，他塞给你就拿住，好好，我拿住。哈哈……

林：你几个子女现在干啥工作？

王：红梅、红爱两个退休了，春平在一中，春龙在供电局十年不上班了。他请的假，在外头弄。

秋：小花在北关做生意卖个鞋弄个啥的，小玲在工艺美术部胡混吧，反正个人都成家了，都能过去，过得好吧，就这回事。孙子也不好好学。

王：（春平）礼拜六、礼拜天，天天给人家补课。

秋：挣钱嘛。

王：矿务局老师工资低，才一千多块钱。市一中比他们（工作）晚的，两千多啦。特别是煤矿工人，老的拿点钱，养三代人的多得很。我们的生活不但不养活他们，他们还给我，都是儿子用钱的时候多。家里有啥事情了，春龙用钱。这电话用了一二十年，（当时安装要）2500多元哩。我说要电话干啥，他说不要你交电话费，我交。我说那你就安。我又不做生意，不干啥。他们家里都有电话，还有手机。他说有电话，你不要跑了，直接给我一打就行了。现在我没事，也不给他们打，他有时打电话问问也就行了。

秋：煤矿工人有的现在还住在那烂房子里，我们这个楼已经20多年了呀。我85年搬的，85年秋天，马上20年。现在分给你一个楼也买不起，就那几个退休金，像葛登发住那上面，还是老样子。

林：听说马上要拆掉了，那是报废房子。

秋：也要搬。

王：他不管你买得起买不起，现在社会确实……吃不饱饭的多着呢，你家你爸工级低，4级工，养几个人实在不容易。

林：在矿上干一辈子后悔不？

王：后悔有啥办法，现在咋不后悔。你叫我们回去到上海，你说拿这两个钱，人家说你哭穷。

秋：人家当你是乞丐，我们两个人不抵人家一个人，人家就是不相信。为啥，过去一人抵人家三四个人，现在拿这么点钱，人家就是不相信。知道的不说了，不知道的，他说你哭穷。他说我们不向你借。我说不是借不借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不说在上海了，陕西省矿区讲起来，铜川矿区最低。人家小矿务局工资都调改了，就是铜川矿务局工资没有动。后悔有啥办法，早都后悔了。不来这我们在上海，咋了都是正式工，老上海了。从小都在上海长大的，他在上海，我还去的晚。不能说，他们很多都是上海人，浦东人。

王：三楼也在我这底下，陆根福，是常熟人。去年五月份死了，比我小三岁。

秋：好好的，一下就死了，脑溢血。

王：弄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两千多块钱。

秋：那也是一起来的，俺这个楼上楼下。他不是采煤工，他是机电上的。

王：他没有采过煤。

秋：矿上还有个陆荣初，他们一块来的，后来当上矿长。还有罗世俊，矿上还有好几个。

王：就是陆荣初、罗世俊。就陈家山矿没有，其他矿都有。三里洞也没有瓦斯爆炸过，也没有失过火。史家河还失过火了，那一年还烧死过几十个人，大学生还有几个烧死了。

林：300多人现在剩有多少人？

王：现在剩有30来人。有的分到中机厂了，那个你都不认识。

秋：还有回老家了。

王：光退休回家死了不少了。



秋：还有调回老家煤矿了，吕帮新调回老家了。

王：吕帮新死了，张永福死了，董之良退休也死了，唉。

### 一直到现在，我记着你妈这句话

秋：那年从上海来嘛，我去送他们，都是年轻人，这地方戴个黄袖标，一共三百多人。上车哩，都是小伙子，一个比一个壮实。现在一看，都是老头、老太婆啦。一个叫陈造根，一个叫戚东宝，两家换老婆了，把上海人脸丢尽了。（后来）陈造根也不够意思，陈龙根家的瘸子腿老三闺女，跟他跑了，跑到沈阳去了。真是丢人。

王：陈造根比我大两岁。

林：最近回南方去过吗？

秋：他身体好能跑。我的心脏不好，不敢跑。十年了，我没敢回去过。

王：她病多。我98年到03年回去过三次。明年我还想回去，我也不和他们吭气。一个是他们不放心，另一个是这个弄钱那个弄钱。我一个人有钱就跑，没钱就算了。我谁都不给他们说。

秋：这一句话我给你说，那年盖房，你妈这么苦。到西沟买菠菜，你妈那一句话，嫂嫂呀，你回家去，这菠菜漏了吃，可好吃呀。一直到现在，我记着你妈这句话。现在这菠菜，一块钱几斤，有多好吃？一句话，一吃上菠菜，我就回想到这句话。你妈也可怜的很，上班了，下班回来，洗呀涮呀，上有老下有小嘛。

王：也没啥说的，反正也把苦吃了。

秋：比你爸你妈，俺俩就是享福了。你爸你妈是一天福都没有享。你家盖那个房呀，把你妈累的，真是累的。

王：你爸不在了，你爸和我一样大，虚岁73了，周岁72。沈龙根、顾龙祥都小，69了。他们小。

秋：去年，也是他们的一个战友，回老家了。海门人，叫叶佩昌。又专门跑过来看看，姓叶，叫叶佩昌，他们是一起来的，那个年龄大。

王：你爸也是个老实人，第一个没有体力，他在上海建筑公司是看大门的，我们在上海建筑公司是木工。他到这里来是瓦斯检查员，反正你父母工资也低，节省的很，艰苦的很，你爸你妈苦生活。

秋：你爸在井下也挺负责的，做瓦斯检查员。

王：像你家那种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你看你们吃的饭，面条光放点盐，连酱油都不放，你说我一口都咽不下去。

秋：在上面住，生活最好就是葛登发家，我们两家都是七级工，七级大工嘛。人家整天说，这两家有钱，七级大工，那时东西便宜。你爸工资低一点，再有你奶奶，确实负担也有点重。

王：在那个年代，你吃啥，你家有个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你工级再低，确实没办法。你爸、你妈确实把罪受够了。该享福了，人不在了。像我们比起你爸你妈，不是说太好，上天堂了。

秋：当初你爸那时候应该跟你姑两个结合的，你知道不？最后，你姑和你姑父相爱了。相爱以后，你姑是你妈的同学，从老家把你妈介绍来了给你爸。那个时候你奶奶不愿意，就是叫你姑和你爸结合。为这个事，你奶奶亲自给我说的，这个你奶奶亲自给我说的，想着自己养大的，好相处。

王：不是。你姑、你爸都不是你奶奶生的，都是要人家的，所以想凑合在一起的。后来

你姑不愿意，不管咋样，姊妹也一二十年了。

**秋：**你姑和你姑父相爱了，你姑那个人也不错，我也不能让你失望，结果给你爸介绍了一个，你妈从老家来了。你妈来的时候，身体不好，你妈一向身体不好。实际你妈那个人，是矿上的正式工，你妈有文化嘛，考试考取了，在机电科变压器房嘛。后来体力不够，孕妇嘛，瞌睡，叫人家开除了，这就是命，要真正干下去……（后来）在食堂里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回来是家里给你们做饭，还要给你爸做饭，还要洗衣裳，身体又不好，根本吃不消。

**王：**你爸是瓦斯检查员，三班倒。最后七八年，不当瓦斯检查员，当办事员。你爸的骨灰弄回去了？

**林：**因为我妈一心想回到南方，检查出癌症后，我们就送她回去了，在南方去世。我爸去世以后，叫我弟弟把骨灰带回去了，他们两个人葬在一起。

**王：**对着哩，对着哩。

**林：**他们从南方来，一心想回去，辛辛苦苦在南方盖的房子，也没有住一天。

**王：**你说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想回去，回去不了。我们的儿女都在这里，你假如有个啥事了，电话一打都回来了。你要回去了，路这么远，对不对。我有个叔叔叫我回去，我说我老了，我不回去。我身体好了，回来玩玩，我身体不好了就算了。咋不想回去，回去以后，你假如有个三长两短了，几千里路，说起来交通便利，车挤得很，对不对，票也难买，现在的人，谁想弄个坐票，都想弄个卧铺。唉，现在上海市郊区和嘉定基本上连起来了，这几年太仓、嘉定……我看太仓早晚还是分到上海去。

**秋：**糊里糊涂几十年了。

**王：**马上 50 年了。

**秋：**现在都可以，上面四个都可以，下面两个没有正式工了，小玲是大集体，不挣钱。我现在就是这，你个人顾着个人就行了，我们就这么大的本事，来铜川啥都没有，就混了六个娃，混大了，总算把经念完了。

## 姚洪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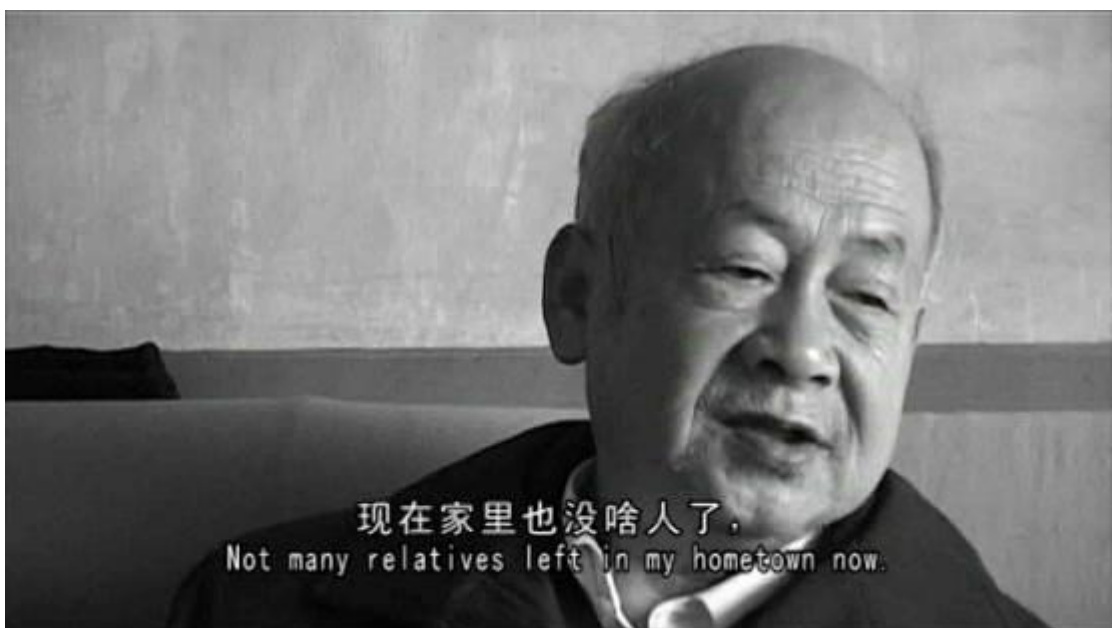
姚洪昌，1934年生，三里洞煤矿绞车司机，已退休。

姚风平，小名叫小风，姚洪昌的儿子。

姚风平妻。



132、姚洪昌在家中 2005年



## 要走了，就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

**姚洪昌（以下简称姚）：**以前在农村里边，家庭条件不允许，后来就失学了。主要是我母亲有病，身体又不行。以后就开始种地。我那个时候初中文化，过去妇女不识字的人多得很，51年那时学习文化，晚上给她们教学，教她们学习文化，到了晚上自己还要学习。在我印象里，华东建筑公司的建筑工人，有去北京、河南的。那时苏联帮助建长春、洛阳拖拉机厂。那都有华东支援去的人，我受他们影响，跟我师傅学了一年，可我没有接触建筑。为啥，我师傅在上海营造厂，我是帮助老板给各个地方送料，送了有一年，一直到老板垮台。那个时候是三反五反，工会已经建立了。我师傅进了华东，他没有带我，华东那时不收学徒。所以我就给工会帮忙，那时我还不是工会会员，帮忙那段，他们给我介绍加入工会。正式参加建筑工程局。

那个时候是自愿报名来的。在上海，从建筑行业来说不是太兴旺。像我们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主要是（面向）西北地区，支援全国各地的建设。现在来讲，就是支援大西北。咱这儿也算西北地区。支援的煤矿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淮南，200多人。一个是铜川矿务局，一共是317人，分三个分队。是5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的。铜川矿务局刚成立，我们来主要是为三里洞煤矿准备的人员。当时来了以后，就在咱这个地方。史家河和李家塔矿都是为三里洞培训的，说是培训一年。三里洞是57年7月1日移交生产，在移交生产之前你都得到三里洞矿。我来的时候是分配学电工，后来学电工人员有了，不需要了，就培训绞车。主要是立井绞车，就是地面的主要绞车，上下人员。我是56年8月提前就到三里洞矿了，那时在建井阶段，还没有正式投产。到了以后就开始学习（开绞车），在史家河已经会开，主要是为了熟悉情况。后来采煤区、掘进队的陆续到矿上。7月1日开始生产，我们上海来的这批人，绝大多数已经到三里洞矿上了。后来，人就开始慢慢分散开了，像支架厂有一部分。上海人都是搞建筑的嘛，所以红旗工程队成立时，去了一部分。三矿也有一部分。后来像王石凹，东坡呀，鸭口呀，这都有人。

我当时在上海建筑工程局第四公司，在我思想里我是搞建筑的。对建筑，我在当时年轻人里面也是好学的一个人，学技术也都是兢兢业业。记得我54年在上海建筑工程局，是所谓年轻人里的一个技术标兵。在当时情况下，支援大西北动员，自己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在年轻人里边来说。反过来说，也是年轻，自己思想比较单纯。支援西北建设那会儿，我跟着他们一块报名。那时报名的年轻人多得很了。第一批去兰州建筑公司，但兰州据说要求条件比较高。建筑单位从技术角度要求四级工，我当时是三级工，所以就没有去。后来一个是铜川，一个是淮南，这两个地方。我报名来这儿的时候，一个中队，三个分队，我是第三分队。同时我是五年的团支部书记。当时考虑咱来了以后，应该说在年轻人里面，不说太突出吧，起码不能太落后。所以说317个人来了以后，一看西北地区这个情况，回去的人多得很。当时回去的人，绝大部分都回到上海市第四建筑工程局了。但是超过一年后回去，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不收了，不管你了，就没有职业了。在我思想里，咱绝对不能走，要走了，就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起码来说，这个不光荣。在咱们，像你爸呀都在一起说这个事情，所以说再苦也得坚持下来，绝大多数就是这么个情况坚持下来的。

当时是按照三里洞矿，西北的第一座现代化矿井培训的人员，有电工，有采煤、掘进的，有开绞车的。井上开绞车，井下开绞车的。就是各个工种都配备有人。我是配备主井绞车上。开始配备电工，后来电工较多，我们三个人，我，周小侠，王福良，学开绞车，他们没有带家，王福良现在去世了。培训不到一年，大概八九个月，到56年8月份。以后一直在地面开绞车，开到88年。搞四大机械维修到92年，后来三里洞基建上没有人，抽我搞建筑，三

四年以后就内退了。我没有调过地方。像你姑父张金龙就调到沟门矿，那时文化大革命军队支左，最后到陕南。你姨夫顾龙祥，他是在井下开绞车，后来调到三里洞矿副井开绞车。王正祥那个时候来了以后，一直在井下采煤，直到退休。你爸朱永生嘛，他是通风区，属于辅助单位，你爸一直到老都是在通风区，始终没有调过。现在还有林冲其，过去在采煤厂的，一个眼睛叫煤崩了，他还在。还有一个周寿根，他原来也是采煤上的，后来到三里洞劳资科当了一段科长，现在也退休了。来的时候，最小的17岁，我们属于中间的。像陈斌林、陆荣初呀，这都是比较小的。17岁的只有5个人，再往上就是20来岁，我来时22岁。当时在上海成家的有几个，最大可能32、33岁。像江兴怀，那年龄比较大，三十多岁。再一个就是陆荣初，他两个当过官，两个都当过副矿长。其他的……现在都记不清了。这么时间长了，55年到现在，五十年来剩下的人确实不多了，没几个人了。有些自己的孩子已经在矿上退休了。

### 三里洞属于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

三里洞属于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在当时没有比三里洞先进的。后来就有苏联帮中国建设的王石凹矿。三里洞也是苏联专家帮着一起建的。当时来说，西北还没有这么现代化的矿井。三里洞矿当年年产60万吨，最高产量72万吨，那是极少数，其它都是50万吨。到九几年慢下来，现在属于矿产单位，破产了。地下也没有啥煤了，下马了。现在的采煤量大得很了，像王石凹设计是120。现在新投入的150万吨，这指的立井。

57年7月1日，三里洞矿移交生产的时候，当时三里洞矿主井还有蒸汽绞车，就是蒸汽机的绞车。当时两个老人，一个叫郝庆余，一个叫李永庆，这两个人都是史家河矿开蒸汽机的。开始是开火车。后来从一矿调到三里洞来，时间不长就把那个蒸汽绞车淘汰了。后改为电绞车，用罐笼提升了。那时，一矿那个井筒安全设备差远了。它光是蒸汽绞车上下，管道还是铁钢管道。要是钢丝绳断了，底下没有保险卡。三里洞属于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上下人的副井绞车，它是木管道。如果钢丝绳断了，马上就卡住了。从罐笼提升的话，如果钢丝绳断了，自动地就卡住管道了。从绞车的安全设施来说，要比蒸汽安全设施好得多。有紧急情况自动保护。电流过大，自动保护过电流节电器，自动保护。安全设备上来说，现代化的矿井比较先进。主井和副井差不多，主井后来就改成自动，不要人操作。副井那时都是人操作，搞了有一年多，后来实现了自动化。井下的煤从溜子上提出来装到矿车里，再从矿车里拉出来，拉到主井底。主井底用翻罐笼翻到煤仓里，又装到机斗里，机斗提升到上面。井的深度217米。提上来以后，就翻到选煤楼那个煤仓里面，再用皮带引出来，开始选煤，人工捡石矸，把石矸和煤分开。块煤是块煤，面煤是面煤。这完了以后就装到打煤厂，打煤厂就装火车往出运。

从咱矿上说，一个现代化矿井，康拜因、溜子这些东西都有的。拉小车，我还没有见过。我来支援西北建设，都是现代化的矿井。更困难的条件也没见过，也没经历过。光听人说，听人家谈。矿上还有好些人在旧社会（就挖煤）。过去听说他们短的十来天，多的半个月才上来一次呀。吃到地下，困了在地下睡觉，送下来你就吃一点。煤矿工人为啥叫煤黑子，那就是本身黑。在以后就好了，井下采煤，本身就黑的，起码上来以后有澡堂能洗澡，有班中餐，上班期间给你把馍送下去。中间十来个小时肚子饿，起码加一顿饭，比过去好一些。说起来（工作）八个小时，实际上都在十个小时的样子，八个小时的很少。在辅助部门还可能，在采煤、掘进上很少。煤矿工人真是没人干。说得不好听，你说我思想比较好哩，有没有浮动，思想也有浮动。说老实话，我的亲戚，我在上海学瓦工的师傅，他们都一再动员我。你不要去，咱们又不是没有吃，你也不害怕没有工作干。咱考虑，人嘛，都是要往前走的。

## 他为支援大西北献身了

三里洞矿从绞车上来说，最大的一次事故就是断绳事故，这是移交生产以后第一个大事故。当时绳子乱了，上面选煤楼上一个煤仓，煤仓煤倒满以后，这个机斗就下不去了，石头就卡到那个煤上了，一下不去，可是司机都是新手刚学的，姓雷嘛，雷云科。他是开车的。他好家伙还继续开，开开开，把那个滚筒上的绳子……机斗卡在那了，绳子还在那送着呢。绳子送送送，送得多了以后，滚筒上的绳子就乱套了。所以正在整理滚筒上的绳子的时间，选煤楼它那个机器一开动，把那煤仓的煤就运出去了，慢慢慢慢煤仓的煤就运出去了，一运出去，机斗里石头就没有力量，一下子下去。石头冒了一团火，绳子就在机斗跟前冒了一团火，当时我在现场，我在机房。只看见他妈的，绳子拧的一团火，机斗掉下去了。把底下的装备，底下也有煤仓，把煤仓整个砸了。煤仓底下还有一个水泵房，就是我们一块来的戚国其嘛，他在开水泵。机斗下去，一家伙把他砸到底下。这是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第一个牺牲的就是戚国其。唉呀，那个事故对我们上海来的这些人震动不小，确实震动不小。戚国其他那个老婆来了，后来把骨灰订了个木盒，直接就寄回家去了。

其他事情不是太多，地面上要比井下好得多。井下那个事故就比较多些。三里洞矿移交生产。采煤也行、掘进也好，最多的时候一年里边，每个月都要牺牲一个。那个时候生产也比较忙些，记不清了。最大的一次事故，是77年。那是冬天，暖气锅炉房六吨锅炉出毛病，往井筒里送的暖气供不上。暖气供不上以后，它那井筒上结的那个冰凌，靠在井筒上。那一溜子冰柱，从上到下整个都结着冰呢。采取啥办法呢，采取小学的办法，冬天冷嘛，化不了。采取打冰的办法，人工打冰。站到罐笼上边，罐笼里边也没有人，底下也不生产了。专门把墙上的冰凌刷下去。一直打到底下还有四到五档，这个钢梁到那个钢梁，大概还有个五六档的样子，快到底了。这个时候，上头暖气锅炉出问题了，暖气不能送了嘛。打冰的人，在井筒里也受不了。所以车间主任赶紧叫上来了。一上来以后，赶紧抢修6吨锅炉，抢修到锅炉好，又往暖气里送气。可是打冰当时没有进行。一直到早上八点多，那时候，我记得8点就正儿八经上来人，就是要换班了，井下三班嘛。换班正上下人的时候，底下没有打冰的那一层，掉下去了。因为开始没有送暖气，还靠着墙贴着的，一送暖气以后，墙上那个冰凌，跟井筒边脱离了，一家伙就下去了。那个冰呀，好家伙，好几吨呀，一家伙下去把罐笼盖都砸塌了，底下的钢梁都砸弯了，工字钢多大呀。当时就牺牲了一个姓王的，这是副井筒冰掉下去，砸住罐笼，盖砸坏以后，罐笼里边的人砸死了。这是副井发生的事故。最后那次处理事故严的很，我也参加了，咱车间主任曹青山，受了个处分。我当时就提出，我认为是设计有问题。井筒你增加了一个井口，就应该增加设备，采取积极的办法，取暖设备要跟上。取暖还是那个设备，那根本跟不上。副井筒是186米，下去没有几米就慢慢地开始结冰了，越到地下冰凌越大，你一个人，抱都抱不住呀，你说那害怕人不害怕人。在我记忆里这个事故对我影响还是比较深的。那害怕人，确实是。

陶明祥，也是我们上海一块来的。他是井下开水泵的，当时他们三个人，在井下那个巷道。巷道淹了以后，那个巷道不是水平巷，它是那个弯的巷道，就像外文U字的巷道，中间有一段低下去的，两边平的。水下来以后，把U字形的地方淹住了。淹住了以后，矿上采取了一个办法，排水，就是把这个巷道里的水赶紧拿水泵往外抽。当时没有考虑到，活头这边不要紧，死头那边不透空气，那个巷道掌子面里没有空气了。因为U形的嘛，把巷道整个都淹了嘛。淹了以后，就要把巷道里水往外排，没有考虑到你在往外透气的时候，里头那个瓦斯要出来，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光顾着排水，排了……把水排下去快透的时间，引出那个瓦斯出来把人薰倒了，把他们三个人都薰倒了，最后三个人都牺牲在地下。这个采

取的措施不利，三个人一次就牺牲了，瓦斯闷倒了。其中一个陶明祥，是我们一块来的。他牺牲以后，他老婆还有儿子来了。来了以后，他属于机电上的人，也是和我们一块来的。上我家来谈了谈，那时他儿子比较小。隔了大概有一两年，他儿子够年龄后接了班，分在机电锅炉房，烧锅炉。以后他二儿子也来了，也在机电科搞锅炉工。后来他们兄弟两个都回家了，调回去了。他爸的骨灰没有像戚国其那样弄回去。最后为这个事情，叫我可生气。我跟他儿子说，你爸为煤矿事业，为了你们，支援西北。你来煤矿几年，清明你们都不烧纸呀，都不上你爸的坟上看看。我当时对他可严厉。最后他说，他爸的坟地找不见了。咋找不见了，矸子山，井下拉上来的石矸，给它倒倒倒。最后把他父亲埋在那个地方都埋完了。我说你都干啥哩，你知道矸子山不是一天就把他埋完嘛，你为啥不把你父亲的骨头移个地方。为啥我生气呢，陶明祥呢本身也是弟兄一个，最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你不在矿上，咱就不说，没人管。你们一个接班了，一个后来也参加工作了，矿上照顾你们。你弟兄两个来矿上，为啥不把你父亲的骨头挪个地方，最后石矸一倒埋到底下。我说你为啥不早给我说，你要给我说，我起码给你出出主意，有啥情况的话，就我力所能及，我还可以帮忙。弟兄两个叫我说了一顿走了。对我来说，确实也生气。他牺牲以后，矿上埋的时候有棺材，车间也去人了，前面也封闭了。多少年了，石矸一天要出多少，最后倒倒倒一直倒到底下，倒到底下，就把他那坟埋住了。从矿上来说，几十年了也没人管，也没人看，一直到埋完，晚了。为啥我发现以后，我很生气。就是咱作为同辈人，一块来的，感到很伤心。他为支援大西北献身了，最后死的时候，他妈的叫石矸给埋住了。你们小辈来说，能花几个钱嘛，给他挪个地方，所以感到伤心。当时气的很，所以给他说话也比较重。那小家伙，现在也没有给我来过信。

## 我现在也不想回去，哪的黄土不埋人

**林鑫（以下简称林）：**您最近回过上海吗？

**姚：**有六七年了，我父母在的时候，还回去看。岳父岳母在的时候，还回去看看。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有病那段我回家伺候了几个月。他们去世以后，现在回去就是兄弟姊妹之间。你说自己年龄大吧，也不是太大，你说不大吧，确实也不小。生活上也感到困难，现在也不想走了，回去住个十天、八天还可以，住的时间长了谁来伺候你，所以现在也不想回。他们叫我，你回来吧，以后机会就不多了。我现在确实不想回。最近一段我弟弟给我来信，老家的地方也拆迁了，都盖成居民小区了。可是南方来说条件要好一些，房子的造价要高得多，但是拆迁的赔偿要比咱这要高得多。人家一个人给你 35 个平方，老房给你折价赔偿，要按照他们那地方价格就是 12.5 万。一个人 35 平方，两个人 70 个平方，三个人 105 平方，现在差不多都是三口人的多。盖完之后，就把这房子给你了，装修人家不管。现在房价，我妹妹来说，她娃买房，价高得厉害。5000 块钱一个平方，最贵要上万了呀，一个平方要上万了。我的妈呀，我在煤矿上，我能买得起这个房子？说不好听，我现在也不想回去，哪的黄土不埋人，你想回去也就是没那个门了，等于脱根了。说老实话，那时说安心煤矿生产一辈子，那一辈就在铜川了。

过去那个时候想不想？我也想回去的。那时还有老房子，现在老房子也拆掉了，人家把老房子也给你赔了，他们说咋不回去。我说我这几个退休工资，在铜川还能生活，还能过得去，你要说在南方，拿这两个钱去生活，没门。你就不能比，确确实实不能比。我过去想回去，能回去不，退休工人能回去。那就是你老两口能回去，小的不满 16 岁可以回去。超过 16 岁对不起，你户口进不去，户口进不去也不管用，去弄啥。自己的娃在这地方，人家还操心着你，是来看你，还是看娃了，两头着急不行，算了。现在家里也没啥人了，老人呢都过世了。父亲母亲，岳父岳母都过世了。你赶紧回来转转，以后回来机会就少得很了。我

现在都没有机会了，可能过了年以后，我弟弟可能要来一次。就是这个月过了以后，黄金周他可能来看看我，我也满足了，就那回事。

**林：**阿姨是哪年不在的？

**姚：**94年。她主要是高血压，突然之间。她那个人心眼太好了，光顾着别人。吃也好，干啥都好，她就是光顾别人，不顾她自己。你干活，想把啥都给你准备好。吃东西先考虑别人，吃剩下来了她吃。你比如说买个鱼买个肉，拿筷子叨一点，你们吃完了，你们不吃了她吃。你们要吃在一块吃，她舍不得吃。好的东西舍不得吃，就是那么个人。辛辛苦苦一辈子苦了自己。确实话，干活干到头里，吃到后面，直到去世，那真是该她享福的时候了，她早早就走了。孩子也都大了，经济条件也好了，她就走了。回忆起来，苦就是苦着她的。

**儿媳：**那边不管咋说都比这儿强，咱铜川这城市有点偏远落后，到这儿了，儿子呀都走不了，子子孙孙一直就在这儿。将来孩子有出息了，跑到外面更好，没出息了，就这样。

**姚：**不容易呀，现在老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老家那边时间长了，亲戚也不来往，亲情也没有了。要是不来这，兄弟姊妹几个，我不比他们差，肯定的，我也不是傻瓜。我妈老是说你要不去的话，你不比他们差。现在回头来说，我那个时候思想确实很单纯呀，过去那个时候，年轻，思想很好。

**儿媳：**现在后悔不？

**姚：**后悔咋样，后悔也来不及了，有啥后悔的。比我苦的人还多了，人不能不知足，要知足。一天不管，多活几年。不知足有啥好处，你想高的地方，你想攀了，你攀不到，比咱高的多得很。你能想到，你能做到做不到？我想通着哩。

**儿媳：**不想通也没办法，现在老了想回去也……

**姚：**想回去，就旅游嘛，转转。

**儿媳：**子女都在这，想回去也不现实。

**姚：**过去还有点小根据地，现在小根据地也没有了。

**林：**和其他人比较你已经是比较幸运的了，没啥负担，小风他们比较孝顺。

**姚：**就是，你爸你妈要是活到现在多好。你们条件好了，可是他们不在了。

**林：**我妈去世46岁，我今年都45了，比我大一岁。

**姚：**为啥说辛辛苦苦一辈子，该她享福的时候，一天福也没享，你有啥办法。我老是说，我家里就是那情况，辛辛苦苦一辈子，想别人一辈子，想自己想得少。

**林：**我对阿姨印象深得很，因为小时候给我做过饭呀。

**姚：**她那时交际也比较广，搞计划生育。她老说我，你光认识我，你再认识谁。你雅芳姨，她是家属区负责人。因为她搞计划生育，谁家啥情况，都是比较熟悉。

**儿媳：**俺爸不爱结交人。

**姚：**最艰难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时间。那时莉萍小的很着哩，要是没有大娃不是太艰难。所以说，如果有三四个娃，有那十四五岁，十六七岁，最厉害的就是十七八岁，吃得特别多，就很难。我就记着，我那个大的弟弟在西安，他考到西安冶金学院。在西安上学的时候，他给我爸妈写信回去，他吃不饱。整天就是没啥吃，拿水充饥。后来给我来信，那时又没有电话，通信时他给我一说。看样子吃不饱可怜，我和你姨两个，给他拿了面粉、苞谷面。那时有点面粉和苞谷面确实是不错。到西安去时拿这些东西，我还埋怨他。父母在家能吃饱？你30斤定量，父母也是这定量，农民比你低。你一说吃不饱，父母的心那能平静地下来。他们给你寄粮票，那是他们嘴里扣下。他们不吃叫你吃饱，害怕你饿住。我把弟弟埋怨一顿，你有啥事不给我说，我给你想办法嘛。我是开绞车的，一个月42斤粮，发菜票也好，发生菜也好，起码我们自己还是能过得去的。我家里那时在菜粮组，就是干临时工，管发生菜等。她自己也有定量。当时在吃来说，慌不慌，谁都慌。那一年我们几个去阎良，我，张许金，还有谁，三个人一下去，就是买萝卜去了。萝卜买回来，米里面放点菜能多吃点，你光吃萝



卜也不行。下去买萝卜，谁知道卖鸡的农民，拿出来要多少钱，要十块。那时十块八块，从钱来说要顶用的，最后买了个鸡回来，买了点萝卜缨子。生活上最困难是这一段时间，确实话。

## 一提起朱永生，那是个老实人

**林：**讲一些我爸的情况吧？

**姚：**你爸朱永生，过去在上海的时候，不知他是几公司的，不太接触。后来从上海来了以后，我知道他是干木工的，后来到通风区了。我在机电上，从业务上不太接触。我知道他是一块来的。你爸带家比较早，因为你奶后来了，你妈来了以后，你姨也来了。后来我成家以后，我们成了邻居。你爸在我思想里是忠诚老实的一个人，干活确实踏踏实实的，说是说，干是干。他对咱煤矿事业确实是忠心耿耿。在通风区里也都知道他是很踏实的人。所以在咱一块来的人里边，你爸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一提起朱永生，那是个老实人，都知道。现在为止，你们小一辈不太知道，像我们老的一辈人，在老年活动室，那经常也要编这些往事。说到谁谁谁，都知道。在咱上面，过去那个张许金，也是我们一块来的。过去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带了家以后，才成了邻居。你妈和我家里，那说话弄啥，都能谈到一块。为啥，你妈性格和我家里一样的，有啥话，互相之间都能说到一块，相互之间信任，跟别人不能说的，跟我家里说。你爸来了以后，回去的次数不多。那个时候，凭他在井下工作，要养活你们姊妹四个，不容易，确确实实不容易。而且上面还有个奶奶，后来老在了这个地方。你妈来的时候，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都是在家。那个时候在劳动服务公司干干临时工，那为啥要干呢，家庭生活压力搁在那儿，不干？谁都想往人前走，不想叫人家看着。我们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勤俭的家庭，你们家和我们家很相似。朱岳如也是和你爸一块来的，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退休以后他回去了。他儿子在这里，现在也回去了。朱岳如跟你爸正儿八经在一起多少年，一直到他退休。再下来正儿八经跟你爸在通风区的还没有。

**林：**我爸是瓦斯检查员。

**姚：**瓦斯检查员，确实是瓦斯检查员。

## 你找着活就干，找不着活就……

**林：**你子女现在的情况咋样？

**姚：**老大丽萍嘛，丽萍跟你同学吧。老大现在 194 队（学校）教学哩。她在兄妹三个中还算比较好一些。小风现在算失业了，他是在黄堡陶瓷厂，现在下马了。他早早就下岗，下岗拿了三年。三年以后，就转到那里，170 元拿了 2 年，现在时间一到，属于失业了。厂里也不管了，自谋职业。小蓉呢，她是那染织厂，原来属于下岗，现在下岗工资也停了。你说失业吧，她还没有到失业情况，说要破产，现在还没有。自谋职业，你找着活就干，找不着活就……

**林：**记得小风还弄过车？

**姚：**车处理了。

**林：**那现在干啥？

**姚风平（以下简称风）：**给人家开车。

**林：**你那时想过到矿上下井吗？

**风：**我从来没想过下井，我总认为，下井不是我的理想。看着那煤矿工人，下井确实辛

苦。小时候也经常去玩嘛，一看见煤矿工人上来了，往那儿一蹲，就抽香烟干啥，蹲到那儿。

**林：**我那时给我爸说家里比较困难，我高中毕业了，家里姊妹几个，我报名下井，我爸不让我下。我都干了一辈子，你在家待业吧，不让你下井。说啥不让我下井。我想，就我一个，只要为了姊妹们好，给家里挣点钱。老大呀，老在家待业也不是事。其实从心里来说，也不想下井，弟弟妹妹都小，就我爸一个人上班，家里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对我爸说，算了，我内招到矿上下井吧。我爸说不行。后来就离开煤矿了。

**儿媳：**他父母也是不让他下井，也是一个儿子比较心疼。他自己也不愿意下。

**风：**我本身就不愿意下，看着那工作，好像不适应。感觉下去以后，不知啥心理。我一直认为不能下井，危险性也高。那时条件也不太好，井底下年年出事故，真的挺害怕，心里总是有那种担心。

**林：**你同学那件事你该知道吧？

**风：**小思，噢。后来那一年，他好像在史家河，还不是这个矿上的。咋说，是因为啥，小车还是输送带弄死了。当时想想也是一个同学，一个生命下到井底下以后，出了事故以后人都没了。小思他家也是姊妹四个。

**林：**嗯。

**风：**前一阵在矿上还看到他姐，她姐是供电局的。

**林：**是供电局家属。小思的情况我有些知道。我后来听说是，下到井底下以后，钢丝绳断了，打过来当时就成植物人了，也抢救了，没有抢救过来。我们是从小在一起玩大的伙伴。

**风：**他跟你家是近邻。

**林：**隔壁，都在一块玩的。

**林：**谈谈你对矿上的印象？

**风：**实际上我对矿上没有太大印象。有时候去我父亲工作的绞车房，待待看看，感觉挺新鲜的。操作这个机器，把那拽上来感觉挺有意义的。有时候到井筒的时候，看着脏兮兮的，大热天都穿着棉袄上来。一上来井罐，就蹲在那儿抽烟。那时很小，就觉着他们一上来啥都不干，先蹲在那儿抽一会。有时排着队下井，那条件太恶劣。可能现在条件能好一点。我去矿上也很少，就是去洗个澡。不像现在哪儿都有澡堂子，过去的时候，洗澡就跑到矿上，去的也不太多。我那时候到矿上转的圈圈比较少，不太去三里洞矿。

**林：**你如何看我们的父辈？

**风：**我觉得说大一点，就是支援大西北。也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出来奔波，你说咱西北地区，实在是太落后。我前几年一直在上海干，你看人家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经济收入跟咱们实在没法比，一个家庭几个人收入，还抵不住人家一人收入。这儿条件也太落后了，他们要不来这儿的话，条件确实要比这儿好得多。

**林：**刚才我和你妻子在聊，我们铜川是移民城市，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本地人很少。

**风：**她家是河北人，他爸爸是从河北来的。

**儿媳：**我们家那时条件确实不好。我们姊妹五个，我妈经常讲过去整天饿着，吃不上。一个月挣40来块钱，养活一家人。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非常能吃，回来弄点面条。从小父母上班，中午不在家，都是姐姐做饭，站在板凳上，擀面条呀，干啥呀都做，后来下乡。大一点后，我两个哥哥管着我还有我妹子。父母中午不回来。在家里也是整天吃不饱，一说中午吃苞谷面漏鱼，我就不吃。俺妈说不吃饿死，我说饿死也不吃。那时候上学要一毛钱就感觉稀罕得很，一毛钱买可多好吃的。我那时小，我哥姐那时候受苦。我是69年出生，家里条件就好多了。我妈经常讲，过去吃糠咽菜，整天给人家拉架子车，干临时工。一个月挣几十块钱，家里有多困难多困难，到现在还讲。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弄这不吃那不吃。放过去啥都没有吃去吧，有一个馒头有一个苹果稀罕的。现在的娃，条件这么好，这不行那不行，

不能比，简直就不能比。现在的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条件越好他还是不好好学习。他还跟同学比，好了还要更好，这样比。他不是想着过去的父母受多少苦，体会不到，确实体会不到。你现在不好好学习，有啥出路，根本就没啥出路。现在高科技发达的跟啥一样，电脑的，这你不学习没知识能干啥，啥也干不成。过去父母受苦确实受不少，一天到晚，我妈那时给人拉架子车拉煤，那时经常有病，确实受苦不少。家里姊妹越多越苦。我们那公房，有一家九个、十个（孩子），真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那条件就是，馍筐挂在上面，要不锁在箱子里面。不够吃，整天饿着，肚子半饥饿状态。不可能天天让吃饱，那粮食就不够吃，吃个大白馍，稀罕的跟啥一样。穿衣服都是拾的，上面的穿了底下的再穿，除非短的不行了不穿了。老一辈确实受苦不少，儿女体会到，孝顺老人一点，有的儿女体会不到，受苦受得少。

**姚：**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光荣证那还在呢，最后也把它扔了，也烧了，支援大西北建设发的。老照片都没有保存，那时也没有那么多，留念什么。公司那时开大会发了光荣证，有啥用处，扔了。

## 葛登发

葛登发，1931年生，三里洞煤矿采煤区放炮员、1965年任区长，已退休。

刘梅娣，葛登发妻子。

葛龙，葛登发儿子。

邻居，女，三里洞煤矿医务室职工。

谢新红，葛登发的女婿，林鑫的同学，其父谢继贤也是当年从上海支援来的。



134、葛登发陷入了沉默



135、葛登发和妻子刘梅娣 2005年于铜川

## 因为自己是个党员，应该吃苦在前

【在五一路北公房葛登发家门前】

林鑫（以下简称林）：您还认识我吗？

葛登发（以下简称葛）：这不是老朱家的孩子嘛。

林：您今年多大了？

葛：现在 70 多岁，75 岁了，岁数不小了。

林：你耳朵咋听不见了？

邻居（以下简称邻）：问你耳朵咋听不见了？

【葛登发佩戴上助听器】

葛：这个带上去也不行，带上去声音乱一点，声音稍微乱一点。能听见，听不清，放声一点也不行。

【重新戴助听器】

邻：他家的翻译官也不知去哪了，美娣阿姨在的话……

葛：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林：在银行。

葛：在上海？

林：不，在这里的银行。

葛：你现在身体美的很，你父亲身体没有你身体好，个子差不多高，就是身体不行。来的时候身体不行，饭量小的很，吃饭都是小碗。

林：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葛：我来的时候呀，谈起来是咱响应党的号召，实际上我们来的时候真糟糕。因为在华东建筑工业部嘛，在第三工业部。来的时候说支援大西北，他也没有说是矿上的。没有说就检查身体，一检查身体好了，到这里来，就没法了，走也走不了。上海户口也报不上，上海疏散人口报不进，就这样回来了。当时来的时候，你爸和我苦啊，没办法想。主要是没本事呀，有本事到兰州活动活动，回去了，俺不行。六零年加入组织，完蛋了，啥也不能动，动也不能动。你现在身体好，你现在快 40 岁了吧？

林：45。

葛：45。你想想，我都 75 岁了。

林：所以我就想把你们那一代人拍下来，作为一段历史。

葛：你外婆你见过，是不是，现在光一个妹妹在这里。

林：嗯。

葛：在三里洞采煤嘛，你爸是瓦斯检查员，因为身体实在不行，就叫他干轻工作，当瓦斯检查员。当瓦斯检查员责任心强，他责任心强。我是在采煤上，在采煤打眼放炮，后来当个排长，65 年当区长。后来人也慢慢疏散了，自己也年龄到家了，退休了，就是这样。主要是当个区长，自己干干弄弄，岁数到了我就不干了。不干了退休，就待在家里，就这样活动活动，没事就坐在门口看看门。耳朵听不见嘛，不敢跑远，跑远也没法。只好待在家里看看门，他们出门的时候，跑跑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

那时候，在井下啥都干，打眼放炮，回收，叫回柱子，在井下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抢救人，广播一叫，赶快到矿上。啥时间叫，啥时间到，就是这样子。矿上发生事故，我扒人扒七八回，都是我自己去。矿上一通知，广播一叫就去了。白天叫，白天去，晚上叫，晚上去。为啥，因为自己是个党员，应该吃苦在前。目的就是这样子，自己下去弄一弄。后来组织上对咱照顾也是很不错的，原来薛庭炎是个矿长，粮食紧张，对我照顾得很好。越是照顾得好，

自己的话，思想没有包袱了，干劲也大了。自己各方面都很好。待在这里的话，想待在这里，娃也都大了，都待在一起。

原来在井下的话，在三矿。我和你父亲两个人在三矿，下来一直到这地方来。自己基本上还可以。但是受伤了两回，受伤两回脚上打的石膏。结果自己把石膏去掉，我自己下去。大夫讲你不敢取。我说不要紧，我年纪轻，骨头长起来快得很，自己把石膏取下来。不到一个月我又下去了。那时自己年纪轻，脾气也暴躁的很，说下井马上就去，就是这样。反正矿领导还是对咱不错。

我这耳朵，主要是在井下放炮的时候，震动性大。你自己是个排长，又要管生产，完不成任务领导上不愿意。放个炮打个眼弄弄，时间长了自己也懂一点，满不在乎，自己把耳朵弄坏了。放炮，本来放炮45米，我拉个30米。蹦，放开了。到70岁耳朵还好。结果年纪一大不行了，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以前耳朵还可以。在井下，三里洞移交生产，主井钢丝绳断，把戚国其砸死，我在井下泡16个小时，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把他弄出来。弄出来以后，领导叫我赶快回去休息，给我弄瓶酒，叫我慢慢喝。因为凉气太大了嘛，叫我慢慢恢复恢复。我说那行，叫我休息两天。结果第二天我又下井。因为啥，我还有一班人了嘛，自己管生产，是个生产组长，还有一班人属于自己管，事情都是自己弄。像我这一根骨头跳出来了，我不吃工伤，我下我的井。能干就干，不能干指挥着，招呼着。招呼同志们安全，我一天工伤没有吃，自己下去了。

在井下各方面，只要自己懂，都下手干。因为啥，人家当排长脱产，我不脱产。不领着他们干，任务完不成，领导也要批评。你领着他们干，你也干，带动他们干。自己的话，那时我生产最有名的，你今天出100车皮，我非压倒你不可，思想上就是这样子。人的思想极左的很，各方面都是这样弄。领导上对咱也关心，的确对咱关心。不谈当时招来的时候没有谈清楚，当时招来说清楚好了，当时招来没谈清楚，你既然来了，咋弄，只好干。

下面的情况，一般东西大巷，原来我们是在2510，三个10，258。那都是工作面的号码，都干过。反正在井下，一般地谈起来，打个眼，放个炮。在掘进上也干了好几年，在家里住，跑到五里铺，来回跑来跑去。有时特殊情况，事故不安全的话，有领导叫咱，咱去。领导不叫咱，咱不好去。因为啥，你本身有工作，你不能夺人家饭碗。要是领导叫你，你就去了。领导上不叫，你干你的，没有啥那个。要是领导上一叫，我赶紧要走。因为啥，咱服从组织分配嘛。其实在下面，东西大巷，一年跑到头。吃了饭，休息休息，睡觉。咱又不看电视，以前也没有电视，到点就走了，总比人家提前。8点钟学习，10点钟换衣裳下井，都是这样。8点钟去了，领着同志们学习，学习到9点50，换衣裳下井，都是这样，经常这样。不像上面，一动啥情况，啥情况。井下是老一套，打个眼，放个炮，背多少药，今天炸药用了多少，给领导一汇报。就是艰难的很，井下没啥那个。

实际上班的时间长了，基本上也可以，我们来的时候，娶个媳妇啥都没有，就一床被子。现在，三个男娃，两个女娃，我还有孙子。三个儿子，两个闺女，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现在我思想满意得很，就待在这算了。现在一个月拿700多块钱，生活各方面安排得都还可以，我又不打麻将，也不赌博。抽根烟，其他的烟，太浪费了。各方面，人家不如咱的人多得很，比咱条件差的多得很。我们的条件还是可以，一月700多块钱的话，还是可以。咱自己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仔细一想，确实不容易，真不容易。着急也不行，现在岁数大了，耳朵也听不见，只好慢慢地过算了……现在自己招呼着门口，人家不在家招呼着，其余没有啥了。

## 那个时候在铜川市是有名的

**林：**我记得小时候，你一个人敲一面大鼓。

**葛：**那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219和212观点不同，那个时候，我当赤卫队队长啦。观点不同，游行，那个游行现在说起来细的很，要面子。你今天出来2000人，我明天要出来2500，游行到体育场。买大鼓，还是我去买的。买回来敲坏了，蒙起来，还是我蒙的。买个大鼓，100个锣，100个铜鼓，都是我去买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在体育场，反正敲大鼓，那个时候在铜川市是有名的，谁都知道。现在的话老了，不干了。自己岁数也到家了，不想那事。那个打鼓，天再冷，一条汗衫穿在身上，一条裤子，出汗哩。不要轮换，出汗，一个这么大的鼓锤子拿到手，到下午三点，一游行，回来了。回来一休息，两个胳膊酸的够呛。开个大会弄个啥，一叫马上就去。为啥，自己的话，你不带群众，叫群众带你也不像话。那我自己各方面都要弄一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当了6个月的矿长，管生产。史家河发生事故，电机车把人压了。结果咋办，叫我和矿上领导。开出来？我想谁也不准开。因为你把人压了，从人身上过去不像话。他说你咋办？我说你拿吊链，用绞车吊起来。你用绞车吊起来，把人扒出来你再开。我说你电机车不吊，你人不要动。结果拿吊链，把电机车吊起来，我下手把肠子拿出来，放到他肚子里。噢，那段时间，当了6个月矿长。我在三里洞，还管着史家河。结果，一有啥事情都叫我，管生产，开个会呀弄个啥，都自己参加、布置。又不好好在家，整天在矿上。以矿为家嘛，一天到晚在矿上，没有事在家冷清的很。一到矿上，值个班，弄个事情。现在不行了。以前，值班24个小时，家里的啥事也不管。领导讲了，自己好好弄。张继昌、梁国兴他们都喜欢我，因为啥，你能干。干活麻利，说话也老实，没有文化，都是实事求是的，有啥说啥。矿上都是这样的，他关心人，就有信心，才能够过来。他要不关心，你那能够完成任务嘛，不可能的。他要关心你照顾你，你要把生产带好。那个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人家不生产，我们照常生产。因为啥，我不能出多出少，对不。生产停下来不行嘛，都是这样子。自己脑子没有其他的想法，都是以矿为家。反正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吃苦，受罪的很。人家东找西找，没法了，我往矿上跑。我往哪儿一蹲，遇到要紧的事情，我下井。因为啥，本身胆小，没有经验，不像人家有文化。那时人说不好听的话，态度不好的人多，他说打你就打你，捅你就捅你，你说你咋办。你朝井下一蹲，他不敢下井。所以自己在井下待得时间长一点。在家里没啥事的话，赶快到矿上去，一到矿上保险。那时间，一会儿212，219，又是这个兵团，那个兵团，把你弄去哄得造反，实际自己懂不懂，自己不懂。那不能乱参加，你乱参加挨打，何必呢。我也不乱参加，我以矿为家，谁也干涉不了。各方面领导对咱实心，想把生产抓好就行了。我在井下没有睡过觉，所以我身体好。有些人井下活不忙，打个瞌睡呀，弄个啥。井下凉气大得很，一方面凉气大，空气也不好。再一方面，你千万要注意身体，人没有身体就不行。

文化大革命中，在市一中我保的是冯印彰、郭长年，冯还是武装部长，我保的是他。结果他一平反，政委。我心里也高兴。保到黑帮头上就麻烦了。所以自己心里头也高兴。时间长也记不住。自己一心一意为了生产，没有为其他事动脑子想办法。咋样，把煤出来是英雄。你说的再好，煤出不来也不行，你进了计划一半，出了一半就扣你。

## 光扒人我扒了有十几个了

**【这时刘梅娣和儿子、女婿等回来了】**

**刘梅娣（以下简称刘）：**你说说井下那些事。到李家塔以后又调到三里洞矿，就是下井。下井的时候，矿上就是这情况，他那时都是在采煤上的，一直是采煤，干到退休，采煤也很苦了。

**葛：**井下干了十几个工作面，反正是以矿为家。组织上分配一点，广播一叫，睡觉的话



马上家里就叫我，广播响了，叫我赶快到矿上去，我就赶快到矿上去。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再一方面，出了冒顶，扒人，光扒人我扒了有十几个了。在井下发生事故扒人，自己朝外背，背出来。背死人不容易，抓住手背在身上，两腿爬出来，这样。井下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们要休息好，给我家里说叫她叫。一说广播响了，马上起来，把衣裳一穿，有些情况她知道。

发生事故大冒顶，你睡觉了，你又不知道广播响。她知道广播响，她叫我。一方面事情弄起来，时间长一点，我们说起来是艰难一点，实事求是的。唉，就是这样。扒人扒多少，1，2，3，4，5，6……扒十几个人。自己心想算了，自己也没有脑子，也没有文化。

**林：**您想回上海吗？

**葛：**想回去，我这孩子没办法，我主要考虑孩子。比方说，你回家度晚年了，这里几个孩子心里还是不放心。要是不考虑孩子的话，说不好听，有啥意思嘛，都是考虑娃在一起。

**刘：**干了一辈子，这房子要拆，干了一辈子连个窝都没有，不应该这样子。他说矿工干了一辈子，像人家凤凰台报道的，矿工还真不如一条狗。一个人老了，再穷应该有个窝。国家将来把房子一扒，连个窝也没有。干了一辈子就这点钱，你说能买起房子不能，一个月六七百块钱工资，都不吃？都没有办法说。像这些事，国家（应该）考虑这些老工人的，给你干了一辈子的矿工，在井下整整干了一辈子。一次脚上砸了，五个脚指头都断了，人家说他把石膏一取又下井去了。一心一意为矿上干一辈子，这个房子你不应该。应该给老工人适当安排一下，他不应该这样做，国家这样做不对，真的不对。你说这些老头、老婆往哪儿去，你说嘛。人家又不是当官的有钱，又不做生意，就这些工资。矿破产了，这些子女，待业青年多，下岗工人多，失业人员多。像这些问题，市上应该考虑到，不应该一刀切，叫人家统统搬走，他这样做不对。矿上哪次高产，都是他任务完成得好好的，他那一班完成任务最高了。整整干了一辈子。你叔要不是为这个矿上，从上海那么远的路跑这儿干啥，跟你爸他们都来。上海那么好的地方不待，支援大西北来，那就不应该这样子，都是那样说的。一心一意为矿上，弄啥东西都是。广播里一叫，葛登发，葛登发，井下大冒顶了赶快去。哪一次，只要矿上冒顶，你叔都去，哪一次都是那样子。那次陕西报上都登了他，56年嘛，陕西报就登着。真的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林：**我记得那时候，我爸没下班，我妈都不放心睡觉，赖好有个啥，慌得都赶快去问。

**刘：**救护车一叫，那害怕的不行。提心吊胆一辈子，直到退休。的的确确，这些老工人都把力出了，的的确确在三里洞矿是出了那么大的力了。

**林：**阿姨，你也支援过高产？

**刘：**俺也支援过高产。包饺子，洗衣服，支援高产。大巷里推车，家属都去。你问问家属干过临时工的，哪一个没去。家属往井口送水，支援高产，哪一次都是一二十个。只要在家属服务队干过的都下过井，支援高产都下井，都下井去。

**邻：**说是支援高产哩，把孩子们都扔到屋里就去了。我都是在矿上睡了，孩子们都没管过，都是支援高产。俺们家属也出了相当大的力，说家属也是矿上的一部分，那样说的。修马路一直修到铝厂那里，都是家属拉的石渣。学生家属齐动员，家属工人都出力不少，把力也出了。

**刘：**有次冒顶，广播响了，他下去救出来一个，死了一个。我现在思想也有点不太那个了。老实说，家属干了一辈子，服务队干了一辈子，（现在）连个（退休）工资都没有。那时干的时候都说是集体工，现在不承认俺是集体工，一分钱都没有。我跑了一辈子，一分钱都没有。我说，我最可怜，最苦恼。现在找谁谁都不帮这个忙，这个事都不说。整整干了一辈子，下井挖车底、撬煤，给职工拆洗被子，啥都是家属。开荒种地，大年初一还打个红旗上山种地，就没有休息过。老了老了，要不是你叔那两个工资吃啥哩，连个钱都没有。这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有的人一天都没干过还有钱的，干的人反而还没有钱，现在没法说。不像六十年代那时候，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关心。现在不行，根本不行。谁关心你呢，

你过去干了活该。就是你干，找也不行，找了多少次都不行，整干了一辈子。

像过去，工资还那个一点。那时娃们还小，日子欢欢乐乐过去了，现在老了苦恼，苦恼得很。你总不能给孩子们要钱吧。自己干了一辈子，双手创造出来这些家产，服务公司那些家产，都是家属们创造出来，可得不到，落了一场空。这苦得很，越想越苦恼，越想越苦恼，越想越想不通。像你叔干了一辈子，还没弄上职业病。人家没下井，还弄上职业病。你没法说，现在的世道也没法说。就是干了一辈子，整干了一辈子现在还给人家干着哩，在社区给人家帮着哩。现在还是跑。我想跑跑吧，不是爱钱吧，跑跑吧，锻炼身体吧，只要身体好好的都行。他要受一辈子的苦，干井下了一辈子。俺俩个都是这回事，当时五个孩子小，干吧，干吧，干到现在，还是落了一场空，没有生活来源。五个孩子。

**林：**想过回去吗？

**刘：**想回去没有办法，他不回去。想回去，后来他不回去，他不想回去。矿上，那时他耳朵有点那个，大夫不叫他下井。人家说他愿意下井，下一辈子的井，不在地面干，给区长我不干，愿当工人，我当工人，一线撬煤。三里洞矿最有名的就是他，底下大冒顶都是叫他。广播喇叭，葛登发，葛登发，大冒顶了快来。得到了啥？得到了啥？没得到啥嘛。

## 以矿为家，最后没有家了

**刘：**干了一辈子连套楼房都买不起。房子都没有了，现在最痛苦的就是这套房子。要是一拆，啥都没有了。你看矿工干了一辈子，人家再穷有个窝，连窝都没有了，现在要撵你走。都没有钱，三里洞破产单位嘛，你知道的，谁有钱？都没有钱，买不起。人家都说我住多少平方，你给我多少平方，哪怕你给我在别处盖一个平房也行。大家都没有要求高，没有钱，盖个平房最起码经济上能受了嘛。我住多少平米，你给我多少平米，我只要搁个铺能做饭就行了，都是这样说。你看底下老工人都是这样说的。我一下去，人家说，美娣你咋弄哩，干一辈子连个窝都没有了，都是这样说。也不是一家两家，三里洞矿老工人都是这样说，都问哩。因咱管这公房哩，要不给我说，我也可以代表咱这公房老工人意见，最起码给个窝，不能说撵走。矿务局说这个地卖给人家市上了，原来这些老工人给你出了多大的力呀。年轻轻的，一直贡献到老退休，是不是。你最起码，不要说楼房，起码给人弄个平房，差不多的房子，安置这些老工人。你不能说，那时候煤矿工人，重工业。现在再不提煤矿工人重工业了吧，现在再不说了。矿上你破产了，就这个房子，老了最起码有个窝，像这样。人家也不是经济方面叫帮助，老了有个窝就行了，也不要求高。现在说这个房子，三里洞都要扒了，扒了住哪儿去嘛。南公房现在都开始弄哩，老工人都不签字，没地方去嘛。你不给人家盖好房子住哪地方去，你说，干到现在苦恼哩。过去说了，以矿为家，为矿上出煤，多出煤，多贡献。现在没有地方苦恼哩，没有地方去哩，都是这样想。咱这底下老工人，一下去人家都问哩。

**葛：**苦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连地方也没有，也没办法。咱不要多大，两个人能住进去就行了。咱不要……现在看领导，1000多户哩，1200多户哩，看他咋解决。你说临时这样住下去也可以，咱也活不了几年，说不好听的话，安度晚年就算了。

**刘：**他70多了，74了。

**葛：**叫咱买房子起啥作用，根本就不起作用。你说买房哩还没有钱，就这点工资，自己生活还差不多，难度也大得很，看领导上咋解决。

**林：**他们说什么时候拆？

**刘：**他们底下说，这几个月，四月，南公房去年到今年已经开始了。

**葛：**这也要扒，统统要扒，都要拆。

**葛龙（以下简称龙）：**拆了种树绿化，现在工人……他补偿肯定补偿，一个房子能补多少嘛。

**刘：**那天那个新闻记者来说，补偿两万，一户补偿两万块钱。他说五千块钱搬家费，从最远处先弄。靠着山的那几家说，哪有两万，一共给五千块钱，还不给你手里。他问，不是给两万块钱吗，两万块钱加上五千块钱搬家费吗？他说，没有，没有。哪国家给的呀。

**龙：**如果是两万五的话，家里再凑一点，买个二手房还可以。

**刘：**关键是他不给你。

**龙：**像咱们父辈，他们都是煤矿的开拓者，他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呀，人呀。慢慢人现在已没了，应该多拍拍他们住的环境。今年七十多了，住的啥，要拍就应该去拍他们，多了解了解，通过媒体怎样把这些老同志先解决解决。现在是……唉，真正是让人想不通。现在就是住一天说一天了，这房子，也没法收拾。前年把这房子收拾起来，漏的不行了，花了七八千块钱。这不又要拆了，你能咋，也没办法。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家不给你补偿，父母还要住呀，在外面赁房也得住呀。那咋弄，国家他还……国家政策好，到底下就不行了，不执行政策。说不定最后结局是和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再逃回去。是呀，来的时候背个包来，回去背个包回去，可没地方住了。啥都没了，老人都没了，年轻人起来都不认了，两头落不着。人家说竹篮打水一场空呀，啥也没有了，这一辈子。

**刘：**在矿上几十年，就落得这个下场。都愁，不是说一家愁，老工人都愁，都愁。

**龙：**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矿上，得到回报就是这，流落街头。

**刘：**政府应该考虑老工人这些事，考虑老工人住的地方，先考虑。干了一辈子了，没有个窝说不过去。你给煤矿贡献一辈子，出多大的力，你现在连个地方都没有，没地方住就撵，撵你不走都不行。现在都没办法说，国家正儿八经拨的款，人家谁搬家，你就给人拨到人家私人手里。给人五千块钱，五千块钱顶个屁用，我说搬家费都不够。最起码要适当地给老工人安排好哩。你不说子女们，这些老工人，干了一辈子，最起码住的这方面要安排好的，是不是。不能说，你走吧，我这个地方卖给人家市上了，你矿务局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本身不对。原来这是三里洞的地盘，你现在卖给人家了，准备撵他到哪儿去，总不能去流落街头吧，是不是。人太多，又不是十户八户，赁房子，一千多间房到哪儿去赁。你那楼房买不起，工人开几百块钱，生活那么高。老工人解决不了，要起来闹事哩。这不是一户两户，这一千多户哩，谁都挡不住。说上访就上访去了，真要乱哩，不信弄弄试试，这月弄弄试试，要不闹怪了。国家要考虑这些事，这是最大的问题。他最起码知道，这些老工人过去出那么大的力，给煤矿上贡献了一辈子，把这些老工人安排好，子女不说吧，最起码把这些老人安排好，是不是？

**林：**你俩口咋来这儿的？

**刘：**俺两口都是上海建筑公司调来的。我是 56 年来的，他是 55 年来的，还在李家塔，57 年才调到三里洞矿。移交生产没几天，底下开绞车的戚国其，罐笼掉下去死了嘛。那也是南方人，就是你家住他房子那一家。戚国其一开始移交生产就牺牲了，他是第一个。57 年。都是 20 来岁，55 年（从上海）建筑公司调来的。他说这个地方有多好多好，他也来了，骗来的，55 年来的。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去上学，骗来的，骗到这来的，去李家塔。

**葛：**一来就走不了啦。

**刘：**有的上海人是逃回去了。他跟你爸他们是没逃，都是在这里以矿为家，到哪儿都工作。三里洞矿是 60 万吨。死的也不少，南方人死的也不少。那时候采煤是 60 万吨，最后拼命完成任务。

**龙：**俺爸那时候腿砸住了，砸住没有几天就……

**刘：**一条腿，一只脚，五个脚趾都砸断了，砸断了以后，说不行，自己把石膏拆掉，又下井去了，拼命干。他也好几次工伤了，都是把石膏一取就下井。那时候年轻，有点二。他

那一班完成任务最好，布置多少完成多少，都不欠。

**龙：**这要一说扒这边，这么多老工人都不愿意，给你房你住不起，没有这个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刘：**那时候以矿为家，一心为国家建设，这时候老了，没地方去了。

**龙：**那时一心为国家，现在一心为家，家现在不知在哪里。

**刘：**老了没有家啦。

**葛：**主井大修是几几年，七几年大修。在井筒里一天干两个班，一天干两个班，弄一个月。主井大修干了一个月，冒险立了个三等功嘛，给了个奖状。

**刘：**立了三等功，其他啥都没有。

**葛：**反正矿上的事，就是这样。冒险的事都是叫咱干，危险的活都是叫俺，有啥事情，广播一叫，就到了。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说不好听的话，弄到最后还没地方住，这是个大问题。我现在下了决心，真正没有地方住，我把行李往矿务局一搬，不管你啥房子，我弄一间住住就行了。这我没办法，对不对？我就靠我这两个工资生活，我又不拿人家，我又不偷人家，把生活维持住就行了。又不要好的地方，我条件不高，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安居晚年就可以。

**林：**矿上没有说安置，要你自己去找房子，给点钱就不管了？

**刘：**钱还不给，还不给你。

**葛：**下井下这么长时间了，快那个的人，老了还没地方住。真笑话，唉！要是不扒、不弄、不撵咱，就凑凑合合。

**刘：**住几年就算了。

**葛：**还能住几年？住不了几年。

**刘：**你想下一辈子的井，七十多了嘛。

**葛：**自己条件也不高嘛，我也不要楼房，这样，那样，只要我两个人能安置下去就行了。

**龙：**安置不下去……

**刘：**他到矿务局去。

**龙：**看矿务局局长家谁家有饭，做好就吃，只有这样。

**刘：**我都没有办法，为这事。

**葛：**市上还照顾咱，（免费）搭个（公交）车呀，活动活动。煤矿上啥都没有，你现在叫咱苦，苦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个地方安置就行了。

**龙：**像他们要求都不高，只要有住就行了。

**葛：**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被子能放下，能睡下就可以了。唉！

**林：**听着叫人很辛酸，觉得……

**龙：**咱自己也是，做儿女的都是这，放谁身上都是一样的。他就是当领导的，他妈的，听到这话，他也理解，他的父母要是没有地方住呀，你想想这个道理。唉，咋说呢，像我爸我妈这么大年龄了，也确实够那个。老了老了，总不能再到外面去赁房子住。他们的要求真不高，有一个能容身的地方就行。这儿你今天拍，说句不好听的话，到明年这地方就没了。再过上三年五年，像我爸这么大年龄的，还能有几个，再过几年就没了。

**葛：**那个时间靠组织的，现在组织不管把咱撂摊子了。我啥都靠组织上解决，看组织上咋处理。

**龙：**不过话又说回来，好一点，咋好，子女多，子女有吃的总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像咱们一家一个（孩子），将来就享受不了这个了。从我来说，我的父母，他们过得太辛苦。所以说，我在外面打工，每次回来，看到我爸，我心里面很难受。七十多岁了，我妈这么大年龄了，一天在社区跑过来跑过去。我就讲像我妈这吧，咋说，真的属于无私奉献。矿上是矿上奉献，家属区是家属区奉献，派出所是派出所奉献，奉献了一辈子，自己啥也没得到，什

么也没得到，真的苦。

刘：哎呀，真苦，我现在想想都想哭，干了一辈子。

葛：住这个小房子，给领导上看看，也不要怎么着，叫咱们走，搬到什么地方？

龙：就这么大房子，他自己觉得很满足。真的，因为他自己首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看看电视呀，坐着、躺着呀，自己觉得很温馨，自己觉得很舒服。有可能几个月以后，连这么大的窝也没有了。

刘：这儿住的房子是矿上给的房子，矿上一破产了，这也没人管了。这个房子说不叫住，就不叫住了。这些老工人都七十多了，有的八十了，往哪儿去住嘛。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房子问题。吃吧，好赖都行，吃点青菜，可行。这房子你说咋办嘛？目前就是这个问题最最苦恼。老工人都说，咋弄哩？咋办嘛？都说。

龙：别的不说，住上楼房的有几个是年龄大的，都是年轻人、当官的、什么的，像他们这年龄大的，有几个住上楼房的，还不是都在这儿耗着哩。

刘：像这些平房住住还是可以的，像楼房，这些老弱病残能上去？上不去。像那五楼、四楼上不去。

龙：现在不是上去上不去，上去上不去你都没有，你还不要说上去了。

刘：老工人要求都不高，你盖个简易房子给俺住住也行。这行嘛，要求不高嘛。国家要给矿工适当地考虑这些问题，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不行了。你说这老的八十多了，八十了，都没法说。目前这个公房，都是这个问题，唉……

葛：俺这人啥都靠组织，商量解决。

刘：靠么，靠到萝卜地里。

葛：以矿为家，最后没有家了。

龙：她跑了一辈子。对，她现在是矿工家属，又没工资又没什么的。一天还忙忙和和的，跑东家串西家，大小事都来寻她。今天这儿检查，明天那儿计划生育了，所以这也是跑一辈子。

刘：算跑了一辈子。

龙：也是奉献了一辈子。东家吵架她得去，西家吵架她得去。

刘：现在还是这样，他这儿来的，社区来的，电信局的，又是这个找人，那个找人哩。

龙：只要找不着人，就来找她。

刘：干了一辈子，现在连窝都没有了。政府应当适当地给老工人安排安排，要求都不高。唉！

葛：现在我们来的人也没有几个了。55年12月份到这儿来的人不多了，没几个人。

邻：煤矿工人是够可怜了，下到井底下你看看。今天下去，还不知道一会儿能出来不能。

龙：她是咱矿上医务室的。

邻：俺原来也是经常支援高产，一个月18块钱，也是连着天天下。

刘：煤矿工人真可怜。

邻：那掌子面低的跟桌子那么高。

刘：爬的。有的低一点，趴在地上爬，都是爬了。我那时候，爬进去开水泵，都爬进去，这么高一点，光进去一个人，爬。

邻：敢来个高产，不管你是家属，家属受伤好多哩。

刘：像吴大龙，小红都是。

邻：还有个叫郭啥兰，那个都死了。砸住骨盆，砸住那腿，最后矿上给她按工伤一月40块钱呀。

刘：那个谁的家属肠子都坏了，后来给她转正了。死了好几个，没法。煤矿工人真可怜，不来的话……

葛：一辈子还是靠组织。

龙：就像现在到矿上看看，肯定没干劲，现在哪个工人有干劲。现在年轻人滑的给啥一样，能偷懒都偷懒。那时候，就实打实干。

刘：三月份矿上死了两个人，井下事故。一个人赔几万，王石凹的，还有一个陕北的。

邻：都是咱矿上的？

刘：噢。矿上死了两个，三月二十几号。矿工真可怜，马路上救护车一叫，井下又出事了。一下班松一口气，一上班还要焦心。

葛：其实我们来的人不多了，没有几个了，没有几个了。

刘：就是，这是现实问题。从一开始支援大西北，到退休歇在家里。一直到现在歇到家里，现在房子快没地方住了，一直到这时候，没有地方住了。一直到这时候就算结束了。

葛：没有几个了。

刘：没办法，急死你。

邻：房子给他们说也不顶用。

刘：说说也可以，就是这个事嘛，要有结局嘛，最后没有房子住了，最后流落街头。

龙：俺哥拍的是纪录片，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到咱们老了以后看，作用可能越来越大，对不对。人家房子是一套一套，咱这房子是一间一间。几十年了，青春都奉献给这儿了。二十多岁来，到现在七十多岁了。

邻：从南方来到北方。

刘：支援大西北嘛。

邻：你爸也是三里洞矿的？

林：嗯，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

刘：小杨主任说，你们这里苦的很，你们这里穷的很呀，都失业了下岗了，多得很。这儿都是吃低保的，都是贫苦的很。你看一盒都卖不出去。

邻：卖菜都不搞价钱。人家都早上买新鲜的菜，咱都是下午去拾便宜的。

刘：不一样吧，矿区就是不一样。不到这个地方，就不知道这个地方贫苦的很。一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这个地方真贫苦的很。咱这地方，下岗的待业的多，失业人员多，退休老工人多，贫困的很。不是咱这里说，真正贫穷，真买不起那房子。买起房子的，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给他们讲老工人没地方住，他们还不信。真的，真正的。咱北公房有 300 多低保户了，但是经济条件有点好的也有，那是人家走后门弄的，也不是咱们弄的，那是极少数的。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

葛：由西沟那边数过来有 1200 多户。

刘：目前最苦恼就是这个房子，电视都已经演了这个房子的搬迁问题了，今年不弄，明年也得弄。

龙：像咱们南北公房这些人，到大城市后连个捡破烂的都不如。真的。在这还觉得能够维持下去。到大一点的城市就不行了，连个捡破烂的都不如。在这还觉得能消费得起，到那个地方根本消费不起。叫我爸我妈回上海，他能住起房子，他交不起那些费用。一月五六百开销，你就不吃了？没办法。

葛：反正思想上靠组织的，啥事都靠领导，有些领导正式对话还可以。有些来，都是走马观花，不顶事。

龙：唉，一辈子。

葛：你领导上不给咱解决，叫咱往那里走，实际咱这个条件好讲，好赖都行，不要求高，能安度晚年就行了。

龙：像咱们想的，压根就没想着继承你的啥遗产，是不是。只要老人安安稳稳就行了。

葛：现在就这样子过吧，你也无法，再年轻一二十年，劳动劳动还可以，现在不能劳动，

啥也弄不成。叫买房子到哪儿买去，就是靠这工资生活，你还想买房子，办不到的，没有来处了，现在没有来处了。

**刘：**要知道下井都不来。

**葛：**慢慢锻炼锻炼，活一天算一天。

**龙：**在上海待遇比这儿高很多，哪一个老工人下来都一千多块钱，就是退了休，还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子，唉，不能提，想回去是有心而力不足，回去以后咋生活。

**葛：**现在就这回事嘛，那你说你咋办，唉！各方面都要那个一下。

**龙：**现在工人越来越少了。

**林：**我爸去世了，欠矿上 500 块钱。我说，我爸二十岁来矿上，干到最后死掉了，还上着班。最后还欠你们 500 元，这合理吗？欠你 500 元，你们想法去申请补助。我们又不不要钱。还来给我要钱。滑稽，从年轻时我爸给你们干，一直干到死，还欠矿上 500 元钱。

**龙：**现在的情况给俺哥说说，俺们五个情况。

**葛：**叫你妈说，我脑子记不住。

**刘：**先说老大，下乡，又弄到食品厂后，倒闭了，已经等于下岗了。老二就是勤劳，也没有工作，女子。老三是宝宝，宝宝是接你叔的班，矿上退休了，提前退休了。老四葛龙，他是待业青年，也没有工作，现在给人家私人开个车，拉个东西，也不行。老三也不行，给人家打工嘛，打打工。现在又没办法讲。矿上是没有一个，退休以后，矿上就一个老三闺女宝宝，她提前退休了。剩下的都是待业，干临时工了。自己管自己吧，这些儿女挺孝顺的，挺好。如果在上海也不会这样，上海八大城市嘛，咱铜川就不行。

**龙：**如果我父母在上海的话，我们会更好，而且生活得更好。正因为他们来这边，我们跟他们在这边，生活方面一般，就那样，能过去吧。

## 娃埋怨，你也只能听听

**刘：**目前就是房子问题，俺们在这有四间房子，四户人都在这儿住。一搬迁，我们都要在外面租房住，是最头疼的大问题。又不是一家，互相支援一下，都在这里住了，谁支援谁了，也没法了。儿女们的工作没好好安置，这是最大的遗憾，一辈子就这个遗憾，就直接带到坟墓里去了，真遗憾。你叔那时不管，光下井，光管生产，啥都不管，家务事根本不管。你说我吧，跑东跑西，也不行。市上来个指标，先给人家困难户。一辈子给人家奉献，自己没得到一点。现在就是孩子埋怨也不行，好，你是共产党员嘛。

**龙：**你看我妈，没知识还是共产党员，有了指标都让给人家了。要不我们姊妹五个，没有一个沾我爸我妈的光。说不好听，给别人干一天有一天吃的，真正干不动了，啥都没了。

**刘：**照理在居委会干那么长时间，我孩子都可以安置。我这人就是，人们有困难，都是伤亡家属，有的他爸劳改了，你帮不帮他，帮帮他吧，指标都给他了，俺都不要了算了。干了一辈子，这是最大的遗憾，给孩子们没安置好。那时候指标有的，市上下指标，一个公房给你几个指标，你自己分配。那人家有的都困难的很，你不帮他？咱不能眼看人家过不去。我呢，你叔还上着班，能过去。可没想到走到这一步，这不是一辈子的遗憾？我自己有时候也后悔，后悔也没法，也过去了。有时候葛龙和老二都埋怨，妈，你思想好嘛，指标都给人家。娃埋怨，你也只能听听。都是，也确实实都是这样，都是为别人着想，没有为自己着想一点，没有为家庭着想一点。支援高产，他姐姐给他做饭吃。我有时 20 天回来一次，支援高产哩。这天这个石渣场去吧，明天红矸山去吧，后天大修队去吧，都去的，你要安排给人家。所以，矿上那些领导干部呀，工人也好，都认识，都知道，整天打交道。这几个子女，老大下乡了，除了一个，其他都没安置好，这不是一辈子遗憾？不要后悔，后悔也不行，再

捞不回来了。人家说，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庙，没法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年轻，就是拿我的良心来说，我做的这些事要对起共产党，要对起毛主席。因为只有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因为要报答，就为这个事，我从来都没有私心。你办了办，你不办算，不是这桩事情，你非给我办。我从来给领导啥私心没有。谁来办啥事，我秉公办事。

## 你爸一辈子，苦一辈子

【葛登发对林鑫说】

葛：你父亲在这里也可以，他原来身体不太好，在通风区当瓦斯检查员，后来当了一段办事员，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一年不如一年，趴下来。我们不是一个单位，接头少得很，要么上下班。他人可好，群众威信也高。他不管啥事，基本上做事稳的很，各方面稳得很。因为他人老实，人喜欢。有些啥事情，该自己弄，人家帮忙弄。他也勤快，刻忠字，他自己弄个纪念章，为人民服务。他弄个刀子，什么刀子，他弄个钢锯条，用砂轮一打，窄窄的，就刮玻璃上的水银，人可细心。他一方面自己艰苦的很，可艰苦，不像咱们。不铺张浪费，可艰苦。老人也在跟前，一家人家，他工资也不高，艰苦朴素，你爸可艰苦。像穿衣裳呀，艰苦的很。你父亲在上海的时候，还可以，当纠察。在华东第三工业部当纠察。我们来是一起来的，一个火车上的。他的生活在上海也是这样，在上海我们在一个单位，现在讲究什么，叫打工。在上海的话，叫杂工，他们是纠察，我们当杂工。1.54元一天，你父亲拿1.38元一天。因为啥，杂工工资比门房高，要买三斤大肉，现在一个杂工也得15块钱。

你爸说老实话，你爸一辈子，苦一辈子，一直苦到临死，没有享过福。因为啥呢？没有退休，去世了，苦一辈子。他各方面条件朴素的很，他威信也高。有时我在上海的话，天冷了，到门房去，有炉子嘛，编编，喝喝水玩玩。我们思想，他那时在浦东住，朝阳新村，我们在那里干活，每个礼拜回家一趟。到晚上没有事了，回家玩玩、说说、编编，就这样。基本上太老实，苦了一辈子。实际他人的话，在矿上也没有好好享受，就当了一个阶段办事员，当办事员的阶段，身体越来越垮，越来越不行。其实矿上对他还是很照顾，瓦斯检查员，一天跑呀弄，一天要跑三趟。身体不行了，你不要跑了，在上面当个办事员，开个条子，到月底开资了，给人家开开资，就是这样。后来在财务上，原来在单位开，单位办事员，一个月开个三天两天，有时候忙的话，他给人家送，大体情况就是这样。人在矿上没有好好享福，这是肯定的，没有退休，去世了。他住这一排房子，没有跟人家吵过架。他年轻的时候上下班，兢兢业业，没有一个人说朱永生坏。

## 咱那时离开煤矿也是没办法

【拍摄葛登发时和三里洞第二代矿工、葛登发女婿、也是我多年未见的同学谢新红相遇，有了以下一段访谈。】

林：你是怎么到矿上工作的？

谢：这个事情，从学校毕业出来，咱也没有下乡，一直在社会上待业到84年。父亲退休以后，才在矿上顶替下了井。下了十几年井，一直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矿上破产失业了，我们发了两年失业金就完了，现在连养老金都得自己交。那时就想着父亲一退休，咱在矿上，事情还能够延续下去。最后矿上一破产，延续不下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唉，我在矿上也沒干多少年，在井下干了不到两年就上来了，我那时在掘进队。



我父亲也是 55 年上海来的，我爸和你爸都是通风区的嘛。我爸有个手艺，他是木工，好一点。也经常下井支援高产，到采区去工作。我觉得他们一辈子，也不容易。我父亲现在回老家了，他把我小弟弟户口转回家，能给我小弟弟找个工。也是为了子女们的一切，又回到乡下去了，等于是返乡。子女们多嘛，咱们这都是一家四五个哩，都是为了子女们，又回去了。他在农村还比较好一些，他们这一辈子也把力掏了。

**林：**谈一下你对煤矿的印象吧？

**谢：**你要叫我说对煤矿的印象，是不太好，不愿意下井。我参加工作第一天，就把我吓得两天没有上班，把我吓坏了。咱没有见过那场合，是师傅带我们到小巷里去。呀，看着真害怕，就是这么小洞子，井下冷，穿的棉袄。好家伙，没有走两步，身上冒着汗，简直没法说。我是亲自体验过，井下爬着干。我们是搞掘进，掘进主要是打洞子。那有时顶梁一群，要从底下弓着走，你不敢撞着，一撞着，扑通一下下来，就要冒顶哩。头一次下井，心想我咋能干到这个份上，咱觉得煤矿工人确实辛苦的很，特苦。咱们三里洞矿老工人都知道，工作面都在铝厂沟还往里的山里，下去要走五六十分钟，才能走到工作面。我对矿上的印象，不是多好，最后是逼迫没办法了。咱那时 78 年（高中）毕业，我一下子待业到 84 年呀，六七年一直找不到工作，没办法。因为我是家里男的老大，我爸退休我就顶替了。不管好坏，那时煤矿基本上还是个铁饭碗，也算是国家大型企业，可以了。谁知道干了十几年就落个这，咱那时离开煤矿也是没办法，继续留在矿上也没啥意思。不管咋说，在社会上还能做点贡献。咱就自己学个手艺，在外面给人跑车，还能糊住家口，顾住吃吧。多也多不了啥，也就是顾住温饱问题。像咱买房子，根本买不起。我（从井下）上来到房产科，刚好分了一套小房子，在青年路，一直到现在。我们家南公房的房子也扒了，赔了 5000 块钱就没了。我是 60 年出生的，在那儿住了 35 年。过去咱总觉得煤矿那么大的企业，五六千职工呀，说倒闭就倒闭了。现在你看到井下设备呀东西，觉得可惜的很。往底下运了多少东西呀，大巷里双轨电车来回跑着。你说倒闭，那是矿上破，不是盈利单位。一年允许亏损多少，只要你不超亏就行了，就是这样一个单位。过去确实话没有效益，现在人家都讲效益，不挣钱出啥煤。那时是国家给扶持的，是计划经济。现在却要效益，要有这个盈利方式，没有盈利方式不行。老一辈人来铜川以后，确实话，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在煤炭上，到最后就落下这么一个归宿。负担太重，子女们多，都安排不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这地方属于滑坡地段，铜川市马上就要安排拆迁。这拆迁可以，这老工人也不说要多好的房子，他只要能住就行了。现在补偿的，根本买不起房子。一套楼房，下来都是七八万，六七万。哪有那些钱，积蓄也积不来那么多，这都是一个问题。那时咱在煤矿，说实话，都不愿意叫子女下井，走到没办法的时候，不下也得下，没办法。我们那是最后一批顶替，是全民职工。85 年以后就开始实行合同制工人，俺们是最后一批顶替的全民职工。

**林：**你下井两年中，遇到过危险吗？

**谢：**呀，在矿上遇到过一次危险的事情，冒顶了，那一次真是把我吓坏了。我们在井下干活，有一个工人不小心，用井下溜子皮往外带煤渣。他不注意把一个钎子杆撞在溜子皮上，溜子皮把几架棚全都推倒了。因为井下的大巷道，全是拿棚子支着，一个个往过走的。他当时推倒了两架棚，上面哗啦啦下来，当时一下子冒下来一大堆呀，高的很，看着不着。我们在里面正干着活，我一听外面风筒布哗一下挤住了，我们班长说，赶快撤。就那一次，把我吓坏了呀，我们刚撤出来五分钟，那上面窟窿把巷子全堵死了。光下来那一堆东西，处理了四天，四个班才把它处理通呀，那一场事故吓坏了。后面说，这狗日的害怕人的，看着像防空洞一样，一架一架过去的。好家伙，有些那么粗的木头，那钢梁都压弯了，压力来了以后就这么大。害怕的很，冒顶就这样冒的。就这样慢慢地支上去顶住，一点点打成尖尖的往上补。刚好在我的工作面上，就这个事情，回来挺害怕的。今天这个事情，真是不敢想。

**林：**像咱们这一级的同学，在煤矿下井的多不多？

**谢：**也有，不过现在在市面上的矿上没有了，都破产了。桃园矿没有了，三里洞矿没有了，史家河矿没有了，要有都是在下石阶、陈家山那边。

## 张百生

张百生，1933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采煤区工人，已退休。



136、张百生在讲述中



137、张百生家的室内景

## 我是农村人，我不怕吃苦

**张百生（以下简称张）：**当时说起来也是铜川矿务局吧，到上海去把我们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建筑公司来的这些人，在上海都是学徒工，工级比较小的，来的都是这号人。来的时候，可能是上海建筑公司联系好了。那个时候年纪轻，啥也不想，到外面跑，苦呀不苦没这种想法，一说都自愿报名来了。那个人叫啥，想不起来了，他身体检查不上，不叫他来了。他自己跑去检查身体，查查可以了，他来了，就这样来了。来了以后是学徒，我也弄不懂，那时来的时候，给你130个工资分，反正是来的时候工资没有在上海高，可能少一点，不够的话，给你130个工资分，那个时候这样计算。

来了以后不适应，也苦了。我来的时候，在三矿培训一段时间。不习惯的趁早跑回上海去了，那个时候还不叫随随便便走了。像我这个人没有说跑掉不跑掉这事，没有那种想法。时间长了，慢慢习惯了。在上海，两顿饭一顿粥呀，到此地来净是吃面。那时单位里，一个礼拜吃趟米呀，两个礼拜吃趟米呀，吃面粉多，吃馍。人家平时不吃米的，照顾我们南方人，也经常做点米饭给咱吃吃。慢慢慢慢习惯了，吃啥都习惯了。

才开始学徒跟着师傅，干了一段时间，把我们这些培训的学徒组织起来，好像没有师傅了，弄到采煤区。那些班长、区长、本单位老工人，做得也差不多。我们是给三里洞培训的，55年培训，到57年7月1日，三里洞正式投产了。不到57年7月1日就从培训的地方都到三里洞来了。来了以后，当时还要学习几天。三里洞刚成立采区，有好多工种，有打眼、放炮、支架。才开始干采煤工，一天到晚光装煤，差不多了，组织上叫干支架工，差不多了，组织上说你放炮吧，放炮放了好几年。才开始来，我是农村人，我不怕吃苦，培训时石头砸到我脚指头，把指甲砸黑了，鞋穿得疼，我把鞋前面弄掉了，没有脚砸破了怎样怎样，我还是坚持下井。从那个时候来，我培训4个月，正式评级数，一评二评。评时问我，问我要几级，我说人家老师傅几十年才七级工，我说给我五级工差不多，一弄评出来呀给我六级工。那时好像四级工、五级工较多，葛登发可能也是六级，多数在三矿评了。现在想想也是高兴。那个时候，煤矿上有煤贴，六块钱煤贴。

来的时候，组织一起来，我是单身一个人。培训一段时间，一块的杜玉文回老家，回了没多久时间，领了我家里和几个妇女出来了。我慢慢习惯了，她不习惯。她来了以后又回去了，来了以后又回去了，回去了两三趟。像她说，一个人带几个小孩，在上海不行，又来了，来了一直到现在。

凭良心说，其他工作我也没干过，煤矿上工作就是辛苦一点。刚才说了，太阳也见不着了，上早班八点钟上班，六点钟就到单位了。生活也和现在不一样，过去起来做饭，也不是现在电气化，炉子点了，风扇一开一会儿旺了。清早起来做饭要半天，晚上炉子压住了，一下子旺不起来，拿扇子给它一扇一扇，旺起来得半天弄。从做饭到吃饭也要一个小时，弄得不好一个小时饭还煮不熟。

早上八点钟上班，四点钟下班，到屋里也六、七点钟。为啥这么晚呢，一般来讲，这个井一下去，到干活的地方，路上走呀还得要一个小时，这样一弄，（下午班）四点钟下去，到干活地方五点钟了。等于说上班、下班还有接班。四点钟下班的五点钟才能交班，走到上罐的地方就要六点钟，洗洗澡呀到屋里七点钟。现在躺那儿看看电视，过去电视也没有。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睡觉。刚才说，现在条件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要看看电视。

三里洞有的地方煤层一人多高，有的跟这板凳那么高。那煤层高的高、低的低，不一样。低的要来回爬的呀，过不去，工作是那种条件。有一回，采区发生一个事故。啥样的事故呢，这个工作面50米长，采煤把这块煤采掉，这面采空，把柱子顶起来。这面采空的地方大了，这面顶就放倒。有的工作面有五六十米长，发生事故的时候，整个掌子面上面的石头都塌下

来。下面顶的木头，咯咯巴巴要断的时候，响到一定程度一家伙下来了。下来以后，有的人跑掉了，有的脑子里迟钝一点被埋到里边。比如说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垛。一个人开溜子，一个采煤。开溜子的给他旁边搭了个木垛，木垛好像是这样一根根木头，这样这样搭起来，有多高搭多高。你压力再大，你塌不到底。一个家伙没有跑出来，我们是两点班去接班，底下的人是早班，就这种情况。领导说把这个人扒出来，扒了几天，把这个人扒出来还没有啥，没伤着啥。像我们过去，一个月要牺牲一个还多，经常发生的。过去发生事故家属来，给你子女招工，在煤矿上找个活干干，给你点基本生活费。现在养到十八岁，自己干。

## 又塌下来把我埋在里头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在井下遇到过危险吗？

**张：**随便讲讲，噢，讲的不太那个也不要紧。有一回危险发生了，那个人放炮，炮一放这么多煤填实了，煤一放掉上面是空的，我赶紧拿木头给它支一点，看着不行拿木头去顶。顶的时候，木头顶上的石头掉下来，可能有桌子这么大，把我就埋到底下了。埋到底下，埋到底下就埋到底下，我当时就不清楚。旁边还有攉煤的人或者找班长怎么样怎么样，班长叫高永利把我救出来，问我要不要紧。没有啥，在上面歇了一会，没有啥。不管怎么样砸了一下，这里疼那里痒了，我说没啥，又开始干活，该下班时下班了。说这哩，我都受过几次伤了。那一次受伤是搞支锚工，放顶了，就这意思，放顶。那个木头敲过来敲过去都动了，一般人敲过去就算了，我这个人实心人，敲过来敲过去，光这根木头敲了好长时间，结果敲下来一块石头，把我这个脚砸坏了。把我拉上来洗了个澡，拉到十里铺矿医院。脚砸的骨折了，那就在地面上休息，休息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了，领导上派我做啥做啥。我这个人字也不识的，本来是井下工，在地面上做了一段时间。在井下七级工，上来给你三级工。采区好像谁愿意去，下井给你多少，所以又下井了。谁知第二次下井，下下又出事了。那时我放炮哩，炮放完就要上罐了，井下那个溜子上都是煤。又看见那么大一块石头，想把这块石头搬掉，在搬的时候，又一块石头掉下来，把这个小拇指头砸掉了，当时好像没砸掉，把小拇指砸成这样。砸成这样以后，大夫说你这个指头要去掉。去掉以后又去地面上，干干干干，那一次干的年数多了。在井下多少钞票，在井上还是多少钞票，工资没动。等了一段时间，好像是一块来的，姓江，长江的江，江兴怀，他过去是区长。他找我，你干不成下去指导指导，说得好得很。我说你叫我指导指导弄个啥，又下去，一干干到可能是78年或79年。那时放炮了，他叫我指挥指挥，我也不指挥了，下去就放炮。那天出了个事情，那时放炮哩，炮一响，再放另外一个炮，给它线接住又放，放了以后，又塌下来把我埋在里头，埋在底下。这个石头掉下来人都听见了，又把我弄出来。弄出来以后，那次比较严重，又拉到十里铺。那时大小便有七八天都不行，盆骨砸坏了。这一弄，又休息了几个月，慢慢恢复了，差不多正常。开时觉得瘫痪了不行了，这最后一趟。受伤以后，在上面干点轻活，我死也不下了，在地面上干干算了。又弄到矿上食堂里。生活困难呀。退休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两天感冒了，一般说起来，思想上也蛮愉快的。

**林：**想回上海吗？

**张：**回上海去吧，现在等于说家都在这里，没有想过。有六七年了，我回去过一次，说起来上海要比这里美的多了。你现在拿这一点钱到上海去，没有这里耐用。这里买点菜五块钱，到上海去不行，是吧。

**林：**你几个子女？

**张：**四个。过去都有工作，现在都没有工作了，他们现在自己在寻饭吃。老大娃住在南公房不远，那个地方现在拆迁了。矿上破产了，在西安什么地方看大门。老二呢，现在可能

也在西安，在西安基建公司盖房子，七弄八弄，现在西安那个地方卖饭，在西安体育学院那边，在西安乘 608 路公交车终点站，在那个地方。老三那孩子，在外地煤矿上，好像还是私人煤矿。老四娃，想不起来，咋说呢。

**林：**你退休能拿多少钱？

**张：**700 多，工资不高。煤价涨了，煤价涨了，全国各地煤矿事故也多。不知事情多了，还是消息灵通了，过去不听见这里瓦斯爆炸了，那里瓦斯爆炸了。去年，特别是陈家山以后，经常有这种事情。

**林：**你鉴定职业病了吗？

**张：**片子拍了，矿上单位一合计，谁谁谁，老板不点头弄不成。

**林：**葛登发也没弄上。

**张：**有人没几天就弄上了，咋说么，搞关系了。职业病，说起来相信科学哩，说起来难说。像我这隔壁，下井没几天，在劳资上干的，他也是职业病。唉，一块采煤的，我这脑子不行了，那边有个王正祥，有个毛阿龙。陈义祥脑子里东西多。

**林：**你是那一年出生？

**张：**1933 年。

## 陆荣初

陆荣初，1931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的三里洞煤矿，曾担任区长、书记、副矿长，1991年退休。



139-1、陆荣初在讲述中



139-2、陆荣初和妻子、儿子合影 2005年于家中

## 我在这 300 多人里面还是比较行的

**陆荣初（以下简称陆）：**我是 52 年到上海的，干瓦工，临时工，给人家打灶，修修补补。在 52 年，刚刚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咱就去登记了报名。我是瓦工，登记以后开始学习，忆苦思甜。到了 53 年元月份，开始正式干，干了几个工地，像朝阳新村呀，橡胶厂呀，钢铁厂呀。干了九个月以后，人招的多了，经常没有活干。西北的煤矿到上海去招人，凡是在四级以下的报名，五级工来得很少。三级工，还有油漆工，二级工。我记得当时是 317 个。

当时从上海来的时候，55 年 12 月 18 日，到这里 12 月 21 日，整整三天三夜。因为那时（火车）速度较慢，各小站都停。来到这里 21 日下午，敲锣打鼓欢迎上海建筑工人。开始从上海来都不习惯，吃的住的都看不惯，来了好多人都不安心。因为长期在上海住的那些人，思想不行。我们原来是苏北的，我们那里也艰苦一些。走了不少了，来了就开始走，走一个，走一个，走了不少。有些是走了以后，又后悔了。走了以后，没有地方批准，不给你户口，就是没办法。有些到全国各地，到陕南都有的。后来我们在这里安心了，两个地方培训。55 年来的嘛，56 年元月份开始，一个在三矿李家塔，一个在一矿。我们在一矿，成立了一个培训区。三矿也成立了一个培训区。要培训我们这些人当班长了，一投产要的人多着哩，都是技术工种。放炮员，区队长，班组长，技工，培训这些。一开始在史家河就是培训班长。

等到 57 年 7 月 1 日，（三里洞煤矿）正式投产。投产开始，像我们这号人就是培训的班长，那就自己住在区队了。当时一区，二区还是后来的。后来在三里洞矿上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采煤队，都是由我们这些人里面的尖子，分到各区队里面去。班长、组长、放炮员、电工。这个矿上原来在投产之前，矿长、技工、区队长是在东北阜新培训。我们这在史家河、李家塔培训，在区队里干。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大跃进，57 年 58 年，工作是比较艰苦。搞四班交叉，四班作业，那就是六个小时。我们在六个小时工作里面，比如我们上下午四点的，要给夜班，甚至早班见了面的。我们一区制度比较严，书记办法也绝。这班和那一班交叉出煤。我我班人和你那班人要在交班中间交 50 吨煤，不算时间。啥时出够 50 吨煤你就走，出不够 50 吨煤继续干。条件复杂得很，甚至一个班过去了，早班又来了，这班还没出够 50 吨煤哩。这一长呢，休息的时间很短。我们那时当班长时都不回去，在隔壁有个小窑洞，勉强能睡几个小时就起来了。到啥程度，窑洞潮湿，里面臭虫像黄豆那么大。把被子一揭，到处都爬的臭虫，我们都不在乎，能睡着，因为乏的利害。当初，我个人班长，培训时组长、班长。到这来，中心班长、副区长、区长，我个人经历。到 60 年，当采煤四区书记一年多。王石凹投产，区长带一班人到王石凹去。我又回来当主管区长，后来又变成书记。一区。文化大革命中还当区长。到了 71 年，革委会常委、负责人。后来又变成生产组，后来又恢复到矿，革委会副主任、副组长，当矿长这个阶段 20 年，从 71 年到 91 年退休，20 年矿长。生活矿长，后勤矿长都干过。后来这个劳动服务公司经理，91 年也干过，91 年退休，这段历史。

至于说我，在这 300 多人里面来说，还是比较行的。有三个，两个是三里洞矿副矿长，一个是焦坪矿副矿长，管生产的。我们矿是两个副矿长，一个管采煤，一个管掘进，其中有我一个。在 317 人里面，我们三人到副矿长。

原来有一个红旗工程队，给职工盖房子的，有些人就留在那儿了。因为上海来的，从 300 多人抽了几十个人盖房子，也是骨干，各矿都有。有开绞车的，当区长、书记的、劳资科长的。三里洞还有将近 20 个人，其他各矿情况不太知道。



## 从那时要命了，要命了

我个人的事，我光说几次受伤的事，那差点要命的事，这几件事给你说说。在史家河培训的时候开始跟师傅学习。56年那时候，开始学习放炮，背火药箱，就是三四十斤，跑很远的路，背火药箱进工作面。师傅叫背就背了去。有一次，在井下受伤了，脚受了伤，脚肿得穿42号大胶靴还要上班，不敢提工伤。为啥不敢提工伤呢？每个区都有奖金的，你一报工伤，整个全班奖金全都完了。所以不敢报，坚持上班，不上班咋办，这是一回。第二回我记得是学习，一般攉煤有啥学，要学也要到艰苦的地方学学。学习处理冒顶，在井下顶板不好，要塌方、冒顶，看人家咋处理。一不小心，一块矸下来砸住了，拉了好远，好在没有受大的伤，继续再干，也不敢吭气。在史家河那边就这两次。在三里洞要说个人受伤的情况，有几次差一点把命要了。有一次，工作面顶板有直接顶，有老顶。直接顶下来了，老顶要跟着下来。老顶还没下来，你当区长呢，怎么出煤，出不成煤了，下去观察情况去了。刚刚走过去，老顶一下子都下来了，扑到里面就得几天扒，差一点。还有一次哩，麻花钎子顶住运输机刮板，从我这身上，穿着厚棉袄，把钎子都顶弯了，骨头还未顶断，要是顶断了，内脏都通了，棉袄厚。还有一回，放炮了，我从放炮员跟前走过去了，他认为走得很远哩，后边没有放警戒，刚刚走到放炮的炮跟前，那有炮要弄响了，那就没命了。我想弄点炮线，唉，炮响了。那要说事故，我们见得多了，史家河那边一放炮，把□□都挂到顶梁去了，差一点。还有一次在下边倒车的煤仓里面被砸晕了。还有一次，就是你爸在那通风区，通风区区长和我们一块在下面检查工作。煤仓堵住了，必须得处理。下面满是水，煤仓里也是水。这事咋处理，通风区区长拿办法。矿长检查工作哩，那你必须处理了，不然出不了煤嘛。我说得放炮崩，煤仓里边装上火药，崩塌了把水放出来。炮一响，煤仓里水都下来，巷道也淹了。把通风区长也推得好远，把我也推到一边去了。区长受了伤送医院了，还得安慰区长家属，还得看望通风区区长，区长在医院住了半年。从那时要命了，要命了，看着得多了。到我退休为止，在井下死了140个，还不算重伤、职业病死的，光井下活活死的140个。煤矿上的安全就是这样，他有不安全的因素。还有我们一块来的，叫任福兴，在五区，与机电师也没关系，放煤以后是煤仓堵住了。咋办，崩，一崩，哗一塌，把他埋进去了。扒了好几个小时把他扒出来，扒出来完了。他闺女后来招工顶替了，还在铜川。这些人死里逃生，多次工伤，你害怕，别人咋办，别人咋出煤呀。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们这一批井下出事故的多吗？

**陆：**第一个叫戚国其，浦东人，高桥的。戚国其在井下开水泵哩，主井下有个人大水厂，不开水泵水就淹了，必须排水。主井钢丝绳断了，大机斗一下拍到里面，拍到水厂里面。把机斗提上去，光打捞他，打捞了几天。第一个事故，叫戚国其，浦东人，高桥的。死了几天以后，他媳妇来了，带了一个女娃，一两岁，又怀了一个娃。前几年，非要把戚国其尸体弄回去不可，他儿子已经结婚了。家庭生活，光拿抚恤金能拿几个钱，两个娃，不够生活。这老太婆就一直在浦东，蹬了自行车在上海卖菜，种菜。这是她自己来把情况说了，一提媳妇来，儿子不孝顺。哭的，听听心里很难受。在肚子他爸就死了，一直把他养到结婚，娶媳妇了，不孝。还有好多，比如任福兴，埋在河东，尸体都弄回去了，尸骨弄回去了。

**林：**阿姨是当时来的？

**陆：**我是55年来的，她是57年来的。那时候人啊，我们家也贫困，都靠我养活他们。来的时候有两个娃。儿子、女子，一个是52年生的，一个是54年生的。来时57年，来了以后，就住在北公房老上面。她们农村来的，也没出过门。买的风箱，弄的煤，上面也没水。下了班以后，还得上去给他们担水做饭，搬了好几个地方呢。开始在山上面，后来搬到山下面，又搬到河东。文化大革命中间，连个灶火棚都没有，没有东西弄。搞武斗去了，几乎等

于半停产了。漆水河里摸砖头，盖灶火棚。大儿子结婚了，要一间房子都要不到，那时当矿长了，当负责人了。为啥，因为人家困难的多得很呢，那山上的窑洞一搬走，人家马上就住进去了。生活困难没办法，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为什么，当时只知道要煤。人家国务院、煤炭部的号召，先生产，后生活，先顾生产。干打垒，弄个烂棚棚把人安排着，先生产。煤相当紧张，没有煤，电发不成，钢铁搞不成，光要煤。这些职工生活，起码56斤粮能保证，油能保证。市上单位保证不了，45块钱。煤矿工人都在七八十块钱。像我们光是120块钱，拿了20年。学校出来的技术员，中专的45块钱工资。我们一个技术员，陕南的，聪明，45块钱，矿务局一审查，四级工也拉了，相当难的。我那个亲家是老干部，工资是70块钱，我拿120元。现在反过来了，人家拿1500，我才拿700块钱。煤矿工人工资来说，比哪个单位都低，人也多，不好办。过去这个煤呀，卖不掉，嫌煤矿的煤石头多，没人要，推销不掉。先拿着钱，不付钱，那时煤不是那么好销。电厂打电话来了，先看看你的矿多大，煤矿矿多少，拒付，不给你付钱。现在矿大矿小他都要，现在是卖方市场，想卖给谁卖给谁。那时是买方市场，想买谁的买谁的。

现在特殊待遇，每年到春节，上面领导看上这些人了，慰问百十块钱、一二百块钱东西。其他整个矿工30块钱，各个单位不一样。在南方，我那女婿也算是退休，端午节、春节、八月十五都有东西，东西还不少。看人家现在单位的待遇，我连我孙子都不如。孙子上班时间长了，还给弄点东西，前一阵，还弄了一袋面，比咱工资还高。现在谁管你这事。

## 粮食根本不够吃

**陆荣初妻（以下简称陆妻）：**我刚来的时候，我大儿子还在无锡。来了就住矿务局山上的土窑洞，害怕得很。没见过这东西，也不会烧这个煤。看人家做的馍香的，我孩子说，妈妈，他们做的馍，你不会蒸点馍给我们吃吃。我有个老乡也在矿上，和我们一块来的，他给我背一袋面。我也拌面给我孩子蒸点馍吃吃，不晓得咋蒸，就拿碱放到面里。就像苞谷面一样，蒸出来黄呀。回来也不叫工人吃，也不叫工人看见，包在布袋里。也不叫小孩吃，就我一个人吃。结果没法吃，吃了有病，到医院里门诊部，住了一个礼拜出来以后，医生开证明，买20斤大米。回来咋吃，熬稀饭吃，有点大米还可以，不然我就回家，不在这里了。没有大米，回家了有两个小孩子，背五六十斤米。来的时候呀，房子像鸡窝一样的，矮的很。一想这个地方没有好的房子，都是窑洞呀，害怕得很。他回来，我给他做饭，开门。他不回来，我不敢开。对面窑洞里有个神经病，哎呀，一直夜里喊叫，我害怕，要回去，害怕人。所以，又给人说说搬下来，搬到西沟窑洞里。结果下大雨，漏的呀，漏的不行。又搬，搬了好多地方。又搬到老矿务局上边锅炉房，这边有个房子，搬到里边，1958年搬的。不多久，又叫搬家，又搬到河东，搬到漆水桥那个地方，又搬到那儿去。叫吃食堂饭，也是上海人，可怜得很，可怜得很。发烧在医院里住院，烧的呀，急的。大家有几个小孩子，吃饭没得吃，粮食根本不够吃。待几天，向人借，到下个月又不够吃。

**陆：**寅吃卯粮，首先借，借了以后，一买粮一还，又没有了，没有再借。

**陆妻：**就背着俺那个老三，背到富平，买红薯叶子，萝卜缨子呀。还有好人说，冷死了，把娃放炕上，弄点苞谷榛，把孩子喂喂。我不知咋感谢人家呀，老是不忘人家。这个地方面粉多，我是爱吃米，我是从小就爱吃米。

**陆：**我也不是上海人，我是苏北人。在上海呆了几年，在建筑公司干了三年吧。

**陆妻：**现在孩子大了，一共六个，三个男的，三个女的。我苦也吃够了。年轻时娃娃要上学，我干个临时工，早上还要给他们把中午的饭弄好，弄好以后才能上班去。走路就像跑步一样快，快点跑，一迟到都不敢去了。我们有限制，几点到工地，我就不敢去。已经到厂

子跟前了，不敢进去，就回家了。回家几个孩子上学回来，要做成饭给他们吃，孩子也可怜，整天吃苞谷面糊，苞谷馍，苞谷糊糊。现在小孩子真享受，我们的小孩子真是苦了，唉，到铜川来。

**陆：**现在俺老大、老二都在铝厂。他们都比我们强，工资也比我们强，老大拿一千。我们两人在家。

**陆妻：**生活还是不够花，这样要钱，那样要钱。

## 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

**林：**谈一下三里洞矿的整体情况吧？

**陆：**三里洞矿，原来这个矿是年产 60 万吨，能产 60 年。后来为什么没采够 60 年，成本。原来矿上缴的利润，那是很少很少。57 年投产，到 59 年达到设计能力，到 61 年最困难的时候，最高达到 70 万吨。后来就慢慢慢慢很少达到 60 万吨，年年亏损。后来日子混不下去了，煤又卖不掉，光是欠人家钱。又是停电，又是停水了。电厂你不交钱，你欠人家电费，水厂欠人家水钱，一弄就给你停电，一弄就给你停水。停电很少，因为国家保证，井下 24 小时必须有风，没风井下人就生存不成。一弄就停水，所以就更谈不上福利设施了。都是盖的临时棚棚，简易的，能生存下去。哪一任矿长都是那样，都没办法。哪个矿长来，都得赔钱。那时国家计划，你今年亏 500 万，对不对，500 万不够，总会超过他的计划。就是批准你计划，能在计划以内的都很少，不要谈福利设施了，就是这个情况。军代表在这里也是完不成任务，矿上换一任矿长还是不行。地理的条件复杂得很，煤层比较薄。井下的煤不是和收麦子一样，它山窝里，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像神木那地方，你采不完的煤，那煤层高的很。这煤层复杂得很，后来弄不成了，干脆整个停了算拉倒。几个人承包了，把煤柱子……大巷旁有 20 米煤柱，没有 20 米煤柱，大巷保不住。停产了，他把煤柱收拾收拾还能挣些钱。这一阵死了几个人。最近国务院出台了 20 万，死一个 20 万，你死吧，挨不起了。这又快弄不成了，前一段死了两个。这紧小心慢小心，没有发生大的事故。最多是冒顶死了 5 个，没有发生瓦斯爆炸、火灾。还没有出现过大的事故，零敲碎打。

60 年、61 年的时候，绝的很。一月一个，一月一个，只要这个月没有死，到下个个月俩，一年就十二三。一年死十几个，一年死十几个，事故多得很。过去还有指标，煤炭部给你下指标，你矿死几个，不超过这个数就是安全矿。超过这个数，奖金了啥的都取消了。过去那里谈的上盖楼哩，盖屁哩。简易房子，能住下就不错了。盖楼都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了。像陈家山那地方，人家是电影院、食堂、百货公司，啥都弄好投产。后来煤炭部也知道这事情，光叫人挖煤，生活艰难不顶用嘛。后来市上来咱这儿办一个商店，矿上弄不行。计划经济，你这个月要 5 条烟，给你 5 条烟。要多少油，给你多少油。不做计划调屁，啥都没有。冬天有时没菜，派采购员出去买点白萝卜、洋芋，保证过冬。没吃的，连菜都吃不上。过年给你发个菜票，等餐，弄个荷包蛋，弄点点肉，给矿工家属发个票，吃顿饭，都要批了，这矿够困难的。盖房子把家属组织起来，由两个技工带着一些家属，技工砌外墙，家属砌里墙。你看看都是弄些家属，哪有钱包给人家盖房子，不提福利设施，光提生产。

**陆荣初儿子（以下简称陆子）：**俱乐部都到八十年代了。

**陆：**有一次，吃顿饭、喝喜酒都提心吊胆，饭还没吃完哩，一块大冰把罐笼盖子砸掉了，死了 5 个吧。

**陆子：**76 年 77 年了，罐笼掉冰把罐笼砸坏了。

**陆：**本来有暖气，井筒不结冰。暖气不送了，进风，进的凉风嘛，井壁周围都结冰。暖气跟不上就不行了，一冻开不得了。冻了打冰，年年打冰。打冰，把井筒冰打了，罐笼才

能上来下去。那一回打冰，把罐笼盖子砸了。年年光靠工人生产不够，家属娃都下过井，都下井挖煤去呀。老婆娃一起上，遇到高产。

**陆妻：**老大都去的，都下去过。

**陆：**老婆娃娃一起上，给家属支部要套家伙，下井挖煤去。

**陆子：**74、75年……

**陆：**家属下去，安全没注意好，造成残废的也有。现在在史家河哩，终身残废嘛。

**陆妻：**到礼拜天，挣6毛钱入坑费，都争着要下。今天、明天谁下井，上几点几点。我要下、我要下，都一个一个报名。有的上下午班，有的上早班，不叫上夜班。

**陆：**我的大娃（上山下乡），分到这个队吃不饱，分到那个队吃不饱。干脆回（老）家去吧，回家吃饱了又孤单，又弄到这儿来。到这来工作又安排不了。又弄到生产队，在生产队挂个名，给他托人下井，6毛钱一天。上了半年班，自己养活自己，不然生活顾不住。一天6毛钱，别人还下不成，矿长的面子。

**陆妻：**头一次下井去，新工人。唉呀，你害怕不害怕。我们不害怕。不害怕，一块石头掉下来，砸到脚，这几个人都害怕了。别跑别跑，有人带班，别跑别跑，看着柱子，始终别离开柱子。我们是三个槽子，一个人撬煤。一个槽子二米五，每个人都三个槽子。谁要把这煤撬完，你就上罐，有任务的。有几个地方只有桌子这样高，都是这么长。

**陆：**全国都是，老婆娃娃一起上。到山东参观去也是。七八百（毫米）高的煤，坐到地上，躺到下面，山东淄博煤矿。

**陆妻：**我们是那一年过春节，多高呀，多长呀。

**陆：**我们那时在矿上，没有一次在家过春节，还都下井去。

**陆子：**革命化的春节。

**陆：**谁给你放假。后来有双工资了，单工资都不给你，月工资下井照常，哪有你工资嘛。一个月120块钱，下井，不下还不行。不下没人给你钱。文化大革命有一段，都不提钱了。这革命，那革命。这津贴、那津贴都取消了，放炮员津贴也取消了。不写申请，不写申请做工作，写申请取消了，不要钱。思想不通，不通也没办法。

**陆妻：**还有好多没说，都是危险的。早上上早班，在井下连上三个班。饥不饥？早班、下午班、夜班。到第二天早上，实在瞌睡得不行了，要命啊，脚踏车也不是新的，旧的，再加上昏头昏脑地，矿务局上坡的时候都没有劲。他上坡，旁边有个拉大米的下坡，倒下来以后压住肋子，住院几个月。这里看，那里看。都没得吃，馍也没有。人家矿务局照顾他30斤粮票，他都买成饭票。干啥，都装在口袋里。这个说陆矿长，我没有粮了，我家庭没有粮食没有馍。给，给你一张饭票，到食堂里去打了吃，弄三个蒸馍。我咋知道呢？是他住院，是工人在说，我挣的钱是养活老婆的呀，哎呀，你心好呀，这又来了。哎呀，没有粮，那时吃私粮呀，到富平买苞谷，粮根本不够吃，还有小孩子。哎呀，30斤粮票，统统都发给工人了。人家去医院看他，他才说的，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家几个小孩子吃啥，都是吃个菜呀，这东西没有啥好吃的。他在矿上就这样子，谁不能上班呀，谁家里没粮吃，他赶紧拿个饭票给你一张。你再到食堂里去买三个馍，工人都说出来了。

**林：**他回来也不给你说？

**陆妻：**没有，始终都不说。

**陆：**在60年，年年招工招好，工作衣一领，上两个班，连工作衣都拐跑了。区队里到火车站去截人，等着。有些人不在铜川站上车，跑到宜古村去，跑过两个站再上火车。招人，来的人也多，去的人也多。工作衣不穿了还能卖，还能换点粮。60、61年在区队当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很不好弄。还放着政治指导员，书记下面配三个政治指导员专门做这个工作，干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七级工，八级工，抵不住老汉一担葱。老汉卖葱的，比你七八级工还挣得多。才来的时候，吃的不能全发给你，全发给你你跑了。一次发三天，三天领来，

一天把三天粮吃光了。那时也饥得慌，56斤粮也不少，一天吃三天粮。吃了以后那两天咋办，不上班了，睡觉，睡两天再起来，再领再吃，典型事情。还有些跑回去了，生活好一些，又要来哩，又要跑回来干哩，那你前面工龄没有了，现在是新工人。在我手里有好多这样的，我叫你不要走不要走，你要走，到底比农村干着强。又来了，又来按新工人对待。

## 不容易，这个家是愚公移山

**林：**那时也没有给你分房子？

**陆妻：**第一栋标兵楼都有，他都让给人家了。我给你说，他啥东西都给人家。75年房子盖好，这个要房子哩，那个要房子哩，还有那三代人没有房子，困难户。

**陆子：**后来当矿长工资低的啥一样，工资都让给人家。

**陆妻：**他工资都让给人家了。

**陆子：**袁崇钱当矿长35块工资。我爸七级工，他工资低，让他们，工资也让给他们。

**陆妻：**陆矿长，紧人家紧人家，我不要。矿长家属要带头，干啥都要带头，不能落后一点。矿上招待所缺少一个人，有的说我给你说话，你上招待所去。不给他商量也可以，一商量不行。不行，别人要骂、要打哩。

**陆：**我们家四五个孩子上学，她不能去。她去了影响家里吃饭哩，影响我的工作，别去了。

**陆妻：**人家现在矿上都几套房子。

**陆：**我们这地方是军代表在的时候，73年时买的地方。人家开始来了也子女多，矿上给的料，你自己找地方盖房子去吧。红矸山找了一片，那都是烂房子，牛毛毡凑合着。韩城投产，他到韩城去了。他原来在调度室里，桑树坪缺少一个调度主任，把他调走了。原说好了，卖给你800块钱。出差回来了，人家870元卖给别人，别人又转卖。那时800多块钱不好弄，一个月才100多块钱。人家说房子刷好了，又转让，人家也担不起，也拿不出800多块钱。我借了五家，最多的借了300，最少的借了50，才凑够800块钱，买了这块地方。（当时）没这么大，有这一半大，都是红矸。大娃在铝厂里，用的民工弄防空洞哩。下了班以后，饭管好，装石矸。到十来点钟，再管人家一顿饭，叫人家回去，明天还要上班。到第二天再来，再给人家把饭管好，人家给你义务干。你给单位要公房，有这么大房子能住下就行了，分的房子别人住去吧，来不及了。

**陆妻：**这个地方是愚公移山呀。先开始大的小的，光垃圾篮买得好。抬啊，担啊，倒矿车上，倒山上去。

**陆：**矿车闲着时，给他把烟酒准备好，给他拉去。像愚公移山一样的，一个个干得没劲了，我老大在铝厂，管民工的，弄几个民工帮着干嘛。

**陆妻：**没有劲了，真没有劲了。人家弄架子车，翘板搭好了，架铁皮，直接倒矿车里去，装十几个矿车，一二十个矿车。

**陆：**求人家井口运矸的，稍微有些空闲时间，赶紧推几个车，挂上给你拉上去。不容易。

**陆妻：**不容易，这个家是愚公移山。

**陆：**现在单元楼退休工人也住不起，一个单元楼下来七八万块钱。

**陆妻：**红矸都堆到这里，先开始盖这两间，后来又挖挖，又盖一间。挖点进一点，挖点进一点。这房子凑合，能隔一间就隔一间，叫愚公移山样的。

**陆子：**不是一次盖成的，分好几次，财力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再挖。

**陆：**像她们这些服务公司，都是吃大苦耐大劳的人。年轻人都转成大集体了。超过50岁，拿100块钱就免了，一笔清。后来找找，找到现在，也没找上。排队到矿务局找，没有

用。不是光三里洞，吃大苦耐大劳，最后不了了之。年轻人刚干几天，年轻人刚干几天赶上大集体，在现在一个月三四百块钱生活费，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林：**你子女现在的情况？

**陆：**我们煤矿上都没人，弟兄两个转到铝厂去了。闺女在总机上的，也退休了。一个女子卖工龄了。过去卖工龄也走后门了，卖了一万多块钱，干了十几年工龄不要了。当时银行的利息，5年利润是4%，100块钱一年能拿四块钱。算下来又不开资，又没啥干，在家歇着，干脆卖了算了。弄了一万块钱，存到银行里也能开几个钱，4%嘛。等后来掉屁了，一步步下降，一步步下降，最后到1.8几利息，去年升到2.5，1.98。唉！

**陆子：**煤矿工人感觉着辛苦。

**林：**你那时想过到矿上下井没有？

**陆子：**80年刚毕业时想下井，后来还招不上。当时招工要的人比较少，要干工的人比较多，还弄不上。招碳素厂了，没想到和铝厂合成一家了，又成铝厂工人了。

**林：**南方话会说不会？

**陆子：**南方话能听懂，说不了。

**林：**你怎样看待父辈的一生？

**陆子：**这不好界定。只能说是一种历史产物了，不好决定。当时想想中国，也是搞政治吧，要求那样弄的。政治挂帅，当时服从国家召唤嘛，特殊历史时段，你没办法选择。我听我爸那一批人说，当时介绍说西北地方好得很哩。原来也说三里洞煤矿，是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当时来讲也是比较先进的，抽上海的技术工人过来了。来到这是什么环境，也就是什么环境了，你个人没有能力改变。现在想想那一代人为了生存，上海不比这容易生存吗，当时就是服从国家召唤嘛。

**林：**你刚才说上报纸是怎么回事？

**陆子：**就是带领全家下井嘛。支援高产。我上学老师问我，在一小的时候，郭全兴问我几回，说报上登你全家下井了，你下没有？我没下。

**林：**没想过回去？

**陆：**回去看看，看看人家生活，条件不一样。我们江苏省地比较紧张，你走就算完了，满共几分地，江苏省几分地都光了，变化也大。陕西省你要出去了，家里照样给你分地，照样有宅基地。

## 周寿根

周寿根，1935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曾任电工、机电师、动力科长、劳资科长等，已退休。



140、周寿根在讲述中



141、周寿根在讲述中

## 支援大西北，无上光荣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是如何来铜川的？

**周寿根（以下简称周）：**上海支援大西北，报了三个地方。徐州、铜川、新疆。就是那些年轻人，像二锤子一样，结果报个新疆。到铜川一看，他发现你上海人有那个干劲，他就把他们全部留在了铜川。新疆再要也不给。你说那家伙混蛋不混蛋，实际上真要到新疆去还好了。

因为在上海时都是私人营造厂，尽是上海建筑工人。上海建筑工程局四个公司，来的人里面，一、二、三、四公司都有。当时上海私人建设工程局建设的时候，要发展大上海。53年可以，54年也可以，到55年就不行了，不景气了。意思是上海要压缩人员。上海当时大概600多万人，结果中央意思要把上海压缩到400万，就是控制在400万人。当时建筑行业也不太好了，可能就是资金紧张嘛。再一个压缩人员，支援大西北。动员的时候，说上海是全国工业发展的基地，要支援外地。压缩人员就是要支援东北、西南呀。在上海那时学习没工资。本来是36块钱，有的56块，最高工资60来块钱。像我们一二十岁、十七八岁的36块钱。再一学习就是50%，只有十几块钱。结果好像是铜川到上海去招工了，先到上海市劳动局。劳动局说，建筑公司有一批年轻人，都是私人厂来的，要干劲有干劲，要啥有啥。结果铜川矿务局领队的人去一看，确实可以。劳动局说的地点就是徐州、铜川、新疆。结果年轻人一看，是新疆。那时候信仰毛泽东，是相当信仰的呀。周总理那意思就是，支援大西北，无上光荣。再就是年轻人走出去闯一闯，闯闯世面。要报名全都报在新疆，一共要了318个人。报名的大概有上千人。40岁以上人家还不要，只要25岁，有些人二十六七岁了。有一个苏州人，结果一看没有他，哭得呀，哭得伤心得很。实际上他学的是气象，后来再三的请求，结果把他要来了，来了后一看这个情况，不适应，后来就回去了。

这里的人去动员的时候说，铜川可以，你们是建筑工人上脚手架，现在是煤矿工人，叫你们上技工学校。说白了，还是叫他骗来的。上技工学校，上三年出来都是技术工人。那个时候年轻，技工学校，相当不错。55年有的技术工种，电工呀，那时还没有。电工、钳工、测量工，技工学校上了三年以后出来都是干部。结果报了名来了，从上海走了三天三夜，那个时候交通相当不便利的呀。在上海市送我们的是上海建筑工会的主席，上海市十辆大轿车，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从上海上车到铜川转了三次车，到南京下车一回，到徐州下车一回，到徐州下了以后，到西安，再到铜川。在西安还不敢停，害怕我们跑了。夜里住在山东旅馆，早上5点多就撵起来到铜川。白占玉，后来是宋炳祥，一看这情况相当不好。看着是一人一碗红烧肉和一碗黄芽菜，凉调的。那时是冬天嘛，12月18日，冷得很。一看是凉调的吃不成，一扣，把米饭吃了，那红烧肉都是肥的。

当时那个情况，一到铜川，也没上技校，就是到后来学习了大概一个礼拜，就叫下井。在史家河矿培训，给三里洞培训的。哎呀，反正早上下去，领了矿灯跟着师傅，跟师傅一块上去。食堂里吃米饭了，去排队买米饭。老工人倒也可以，你们要吃米饭，你们去吧，提前上来。上来以后，也年轻，也怂管，拿个洗脸盆到食堂里，一个人买上十来碗。一碗大概是二两吧，二两一碗。那个碗这么大，每个人都买上十碗，往脸盆里一倒，就往床底下一放。在上面再盖个脸盆，两个脸盆。把饭吃完了，还不知啥时候才卖米饭呢。哎呀，可怜得没办法说。刚到铜川的时候，比上海支援其他地方的情况要稍微强一点。一个交通也便利一点，也不在那个死山沟。说是铜川到西安一站路，有一趟火车。到后来改成两趟，到西安相当便利了。不像有些地方，死山沟沟里要乘车，要乘汽车要乘火车。都感觉环境还可以。虽然感觉铜川不怎么样，从心理上来说，离上海比较而言便利一点。结果后来一听叫下井挖煤，哎呀，炸了，都不干。整天在铁道边上看人家杀牛、杀羊。那时分的是史家河矿培训区，李家



塔矿培训区。后来，我们去李家塔矿转了以后，说我们是串联，想跑回去。实际上我们是看看他们的情况咋样，到那里去一看还不如铜川，因为离李家塔还有几十里路哩。我们顺着山沟里面走过去，回来就顺着山沟里面回来。总的来说，就是三里洞 57 年移交生产的时候，史家河矿培训区，全部到三里洞。那个李家塔的培训区也到三里洞。

## 凡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提前完成没问题

后来我的情况，也不叫领导操心。凡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都提前完成没问题。到三里洞移交生产，我是电工嘛，干干，当了机电师。从 57 年开始，到 69 年就提了，到动力科当副科长。那个时候压力大得很呀，光井下高低压电缆就是几十公里。井下变电所是 25 个，机电设备三千多台，高低压电缆 40 多公里。管辖的范围是东部风井，西部风井。西部风井在小河沟，东部风井在雷家沟铝厂里。说不好听的话，煤矿上只要肯干，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烂脏电工，能够当动力科长，我自己想来想去，我都想不通。另外一个，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初中才上了三个月，要当动力科科长，那不是闹着玩的。动力科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大专院校毕业的，可能有哈工大、中国矿院的，有重庆煤矿专科学校的，有山东矿院的，还有煤技校，西安矿院的。你说叫我当科长，我说我不干。结果老科长调走的时候，党委决定，叫他干吧，那人能行。虽然文化程度有点低，但实干精神强，他保证能把那些人弄到一块。那确实感到压力大得很。再想想，咱有些地方不懂呀，依靠谁呀，依靠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实际上，在当动力科长时，人数最多 60 多人，连工人带干部，确实还是可以的。不管咋说，咱吃苦在前，搞设计呀咱确实不行，实干咱可以，要拿理论上的东西拿出来，还确实达不到。确实话，工程技术人员对咱也可以，咱对他也可以，总的自己感到高兴。在 69 到 86 年当动力科长时，机电上没有发生任何大的事故。主井断绳呀什么的，根本都没有。东西峰，四大机械，基本上保证了安全运行。电打死人呀根本没有，自己感到庆幸的就是这一点。

86 年叫我到劳资科当科长，呀，快 50 岁的人了，还到劳资科当科长。人过三十都不学艺，你叫我到劳资再去学起来，都快死个屁了。矿长说你去吧，那是经过矿党委决定的。推荐来推荐去，想来想去，还是你比较耿直，搞劳资绝对可以的。到劳资上就是给大家办事，咱工人出身，只要你不要太过火了，要站在大家的利益上，不要认为你是个干部你是个科长。我说这没问题，你领导上知道，你看我当动力科长，人家和副科长弄不到一块，在我动力科从来没有。我到劳资上去，我不想去，我也没有这个特长。搞机电还可以，搞人事管理，特别是国家的政策，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政策。我说到那里，光是国家政策，干到我退休也学不完。再三地研究了一年，叫我顶了一年，我都不去。到最后矿长亲自给我说你去吧，到那里压压阵，具体的活叫下面给你干。哎呀，那活是真不好搞，但是我摸摸良心，我当劳资科长的时候，扣卡压根本都没这事。总的来说，群众的反映，特别是徐渭南，是上海财经学院毕业，那是副科长，他说我来劳资科当科长以后，群众对劳资科反映还是比较好的。你一来劳资科以后，劳资科年年是先进科室，以前没有那个事。你一来，季度是先进，年度是先进，年年都是先进，你咋弄的。我说咋弄，该给群众说话就说，领导有领导的意图，咱当科长的你不给工人说话，谁给工人说话，他去找谁呀。劳动纪律上也要求，连续旷工超过 15 天的，累计旷工超过 1 个月的，开除处理。一到月底，单位把名单报上来，一看都是这回事，哎，都要开除，都要处理。矿上礼拜六有个支部书记例会，好像完不成任务了，职工出勤率低，职工不上班旷工。我说我都想不通，职工子弟都在采掘一线，今天开会的都是科长，支部书记，矿领导。你的儿子在采掘一线的有几个，我数来数去，大概就有二三个，多少人呀，只有两三个娃在第一线。我说，职工子女没有办法只能在采煤，出勤不太正常不是异常的情况，也属于正常的范围。工人也是个人，干部还是个人。特别是咱中干，吹出去带头带头，

你带啥。你的娃咋不叫他挖煤去，就是职工子弟在井下挖的煤。我说连续旷工 15 天，累计旷工 1 个月你就把他除名了，摸摸良心于心何忍。假如是你的娃，你报不报名单将儿子开除。弄不好，你还来说情呢，说个情吧，不要开除吧。工人就一弄开除，你这支部书记思想政治工作咋做的，人家为啥要旷工，心情不舒畅。你工作方式有缺陷，他就不给你上班，是不是。另一个你劳动报酬分配不合理，他才不给你上班。他也没法说，找谁说去呀。我说报上来我都不看，真要开除了跑到他家做做工作，我们有专门管劳动纪律的人，跑到家里正儿八经说服教育以后，真不上班。只要他家长，他自己签上字，再上会，再除名。群众对我们做法还是比较满意。所以说，我到劳资科有些成绩，年年评的是先进科室。干，干，干，94 年我不干了。挂了两年我主动不干了，不能再干，得罪人。

我在劳资科的时候，机电上我一般都不让动。我原来想成立一个机电安装公司，职工队伍在全矿务局是有名气的。你看，整个铜川矿务局井筒的大小，铜川矿务局原来从来没干过这个工作的。结果，78 年副井要大修，里面整个东西要换完。哎呀，那家伙轰动了整个矿务局，整个煤炭厅都知道三里洞干得相当不错，井筒里边的东西全部卸完拆完，然后安装起来。我们报的是两个月，省上批的是 45 天。实际上我们 25 天就完成了，质量呀啥，完全符合国家规定。副井筒大修，25 天我都没回过家，工作衣穿了 25 天，也没有脱光睡一晚上。工作衣穿在身上，不管是下雨啥呀，跑到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睡不着嘛。那个茶叶水泡得浓的很，25 天喝了两瓶茶叶，确实凭茶叶支撑着。有些矿务局工作组的人说，周科长你去睡一会吧。我说对对对，现在回去把茶叶水一喝，迷上一会，穿工作衣又去了，25 天工作衣都没脱过。

后来王石凹井筒大修，也是矿务局自己干的。叫三里洞支援他们，结果还完成得相当不错，干得相当有名气的。从那以后，铜川矿务局的井筒大修，不出铜川矿务局的，就是安排自己干。我到劳资上去了以后，三里洞产量也不太景气。给矿领导说，组织个机电安装队，不说到广州呀，就在陕西省成立个机电安装公司，绝对没问题。现在，三里洞矿机电上的职工在西安新区的，什么开发区，都是咱三里洞机电职工，都是领头的，干得相当卖力。在三里洞干 100%，到其它地方拿出三分之一的力，就感到你这个人相当实称，相当能干。因为煤矿上要求是相当严的。机电设备，防爆设备，他的平面有 0.1 到 0.3 就不能用了，失爆了，不能用了，一有火花，从里面喷出来就引起瓦斯爆炸。现在井下有人吸烟哩，以前谁敢，不想活了。谁吸烟要抓了，报到公安局抓起来。现在谁管谁了，我今天干 8 个小时，上去完成任务就完了。所以这里爆炸那里爆炸。像陈家山瓦斯爆炸，明明着火了，你还叫工人下井挖煤去。那家伙，你不是寻着找祸了，只知道拿奖金，拿平民老百姓的命开玩笑。

就像你爸以前当瓦检员，一个班检查，要跑几十里路哩，八个小时。哪有空打个瞌睡，根本就没有的，就是不停的跑。看到不放炮了，赶紧拿个瓦斯鉴定器，测测瓦斯看有多少，如果说一超过，停下，不能放炮了。你说它咋能发生事故呢，它就发生不了。你爸他当瓦斯检查员都是跟着哩，放炮的时候都检查哩。跑的路，真的一天要跑几十里，那记录详细的很。瓦斯检查，上来给瓦斯调度汇报，哪个地方多少，都记着时间。现在瓦斯检查员也有，他想跑跑跑，不想跑就不跑。现在，谁管谁呢。

## 我好像在七一路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回来一样

我这一辈子，工作是全凭自己干出来的，全凭领导的支持，大家的支持。我感到心满意足了。小学毕业，初中三个月，还当个科长，大学生都没当科长。就是脾气暴，毛张飞，工作没问题。三里洞移交生产以后，我在采煤区当电工，要学电工，检修工。刮板运输机、启动机呀，开箱以后都是新的，也没有师傅，都是自己啃的，按说明书记录下来，到井下实践，

去看看哪个线路有问题。采区一共是 13 台刮板运输机，7 台水泵。全区职工大概是 180 多人吧。那时我当机电师了，说是机电师，下去和工人一样的。设备比较多，不是这台设备有问题，就是那台设备有问题。那设备都是仿苏德的康拜因。那个时候，13 台运输机，7 台水泵，水箱很大。天天下去，工作衣都是湿的，像跳到水里。有一次水泵把水排完后，把水泵往进移的时候，可能没有停电。我拿钳子掐线的时候，一掐叫电打住了。电打了以后，反正完了，如果不被人家发现，非打死在井下不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动力科长，给我做人工呼吸。醒来时，我说你们弄啥。还弄啥呢，你忘形得意，你都死了，现在才把你救过来的。他说你感觉咋样。我说我好像在七一路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回来一样。他说你还看电影，你都没气了，做了半个小时人工呼吸，才把你救过来。算了，你歇上半个月再上班。我后来第二天就上班了，那个地方相当惊险，我（差点）死了几回了。有一回还是那个工作面，叫拉东西，顶到肚子上，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刚快到肚子上停了，刮板运输机自动停了，我从刮板运输机上翻下来，这第二次。第三次是这手指头，也是在井下检修完了以后，那也是电工，五级工，我也是五级工。检修完了设备，安到那上面。他的那个设备安上去不转圈。其他都完了，就他那个刮板机转不了圈。结果着急了还要打开看，结果是轴承安反了他转不动。卡住了以后，弄好拆下来又装上。试验的时候，接那个传动链，把我的手指给弄掉了。我一看断了，给我安上。安上我一看，断了。我把手指头往空里一扔，我也不要了。手捏住，上来到矿医院职防所。结果人家说你不要看，叫我们给你动手术。我说看着不要紧。那个大夫拿镊子夹住，拿剪子一绞，血管毗一下，毗了大夫一脸。这时我才感到疼。歇了一个礼拜，也没有吃工伤。到现在就是断了一个手指，其他也没啥。

**林：**戚国其的事你清楚吗？

**周：**那不太清楚，反正那经过是知道的。他是党员，戚国其，我们来的时候他就是党员。分的时候，有分采区有分机电的。我们本来就在采区培训，名字就叫培训区。他们是学机电的。你像戚国其那个事情，他从上海来的时候是个党员，分配的时候，他们好像跟姚洪昌一样开绞车的。戚国其就是开水泵，小水泵。大概就是有七千瓦那个水泵吧，管子是二寸管子。他一到井底以后，还得往下 30 米，就是主井提煤的机斗。本来是在洞室里边的，主井底是直的，它有个拐弯洞室，那个地方有台水泵，交班的地方有水，接班的不太愿意，他说干脆再去排一下，排完了以后好交嘛，排干了以后好交班。刚在下去的时候，机斗钢丝绳断了，下去砸到这个地方，砸到中间，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了。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好象那个大罗马表还在走着，那是第一个，开水泵的。一个是他，一个是陶明祥。陶明祥是在采区风巷里排水。排水，水位高不通风了，瓦斯聚集了。他跑进去的时候没有风，没有风以后，井下你越跑，就闻到那个苹果味，他也感觉不来瓦斯，没有仪器。好像凭人的感觉，他闻到那个苹果味了，越来越想往里走，一家伙闷死在里边。上海来的，光开水泵的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吕庆远，那是开溜子，冒顶砸死的。那家伙说起来，就是开运输机的时候，班中餐，到了吃饭的时候，那家伙还小心的很，周围都是柱子顶着哩，他就在那个中间坐着吃馍。正吃着，那上面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他头上，当场就砸死了。于月堂，放炮员，一放炮以后烟大的很，他在刮板运输机上跨过去的时候，一块煤压过来以后，挤在他睾丸上，当场就死了，没送到医院就死了。他可怜得很哩，那于月堂娃还小着哩。我说陆矿长，支援高产把老婆孩子都弄到井下采煤去了，万一有啥事情，谁管你吧。假如把你家里把你娃娃撞一下碰一下，残废了谁管呢？还顾上这哩，谁让我当矿长呢。没办法，真太实在了。

总的到铜川来 318 个人，除了回去的，最后都差不多离开采掘一线了。干时间长了都调到辅助单位去了，有行政科的，有机电上的，基本上都离开采掘一线了。那出力出的呀，不能说。井下一上来的时候，脸又黑身上又黑，一到更衣室换衣服，那衣服拧下来的时候都能流水，实际上是汗，出的汗。哎呀，咱上海这批人在这儿把力出榨了。到后来，都离开采掘

一线，调到辅助单位了。东坡、鸭口、王石凹、徐家沟都有。到现在为止 50 年了，正儿八经 50 年了。现在剩下的可能年龄最大的就是江兴怀，下来就是陆矿长。江兴怀后来当了工会主席，他不干了就是徐殿明干，基本就这情况。

## 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林：**你是江苏人？

**周：**宜兴，也是在江苏，现无锡管着。宜兴现在发展相当快。

**林：**你总共几个子女？

**周：**三个，老人在矿务局通信上。老二是延大毕业的，毕业后在虎头山教学。他自己弄到城关派出所，后来到公安局，也不行，是肝癌，不在了。老二媳妇在铁路上买断。老大媳妇，在这个学校，后来不行也不干了。老大的女子都 18 岁了，上高二。老二的孩子跟他妈了。就剩下老三，32 岁，参军回来西安矿院又上了三年，现在矿上破产了，弄到下石阶公安科，混吧。去年年底才说，10 月 1 号给他（把婚事）一办算了，完成任务。管屁他，顾不了这些。我看你爸你妈最好，把你们都培养成人，真是不简单。

**林：**把我们培养出来，他们俩都不在了。你孙女我上回来见了，长这么高。

**周：**现在还在楼上睡着哩，那也是辛苦着哩，天天学习到晚上 12 点。我老大从电线杆子上掉下来以后，吃着工伤，现在西安打工哩。管屁他。一个人的家庭，说不好听的话，前半辈子好过，到后半辈子真……唉！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林：**你还在无锡待了一段？

**周：**待了三年。我回家三年，在无锡我也干着，在我外甥女婿那儿的电信局，看门房、送个报纸，一个月给 460 块钱。你看人家那地方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的，刚好赶上澳门回归的时候。上班的人，一人 5 千、6 千。干临时工的，还给了 150 块钱，叫我看门房还给我 150 块钱，经济实力相当雄厚。

**林：**你后来咋又回来了？

**周：**不行，生活水平不行。我回去拿了三万，就这我回去呆了三年，月月还给我寄，还跟不上。我家里弟兄姊妹八个呀，不是这家有事，就是那家有事。在咱这儿你送个人情，送上个一百二百还可以，在老家不行呀，一送都是上千。说不好听，就咱这点收入，不吃不喝也不行呀，消费太大。我外甥女婿说，你原来当过科长，叫你看个门房，送个报纸你干不干，局长都是年轻人。我说干，咋不干。我坐到门房又不费力，送个报纸，人家进来我登记一下，就完了。四五十块钱奖金，将近 500 元一个月了。我孙子也在那里，我领着在无锡待了三年。结果老二媳妇去一看，弄得美得很嘛，写的字也漂亮，一年级。她说爸，说实话，我要看着阳阳在这里不行，我马上把他领走。我看他在这里可美，你弄的也干净，那就在这上学吧。一学期就得一千，一年就得二千。我说算了回来吧，光这点退工资，在铜川你不管咋说够吃，要在南方不行。像南方这儿退休都是一千六七，我们村上原来都是一千六七。我那时才拿六七百块钱，涨了两回才涨到八百块钱。他说你煤矿工资高嘛。我说挖煤的高，地面上不如南方，井下工资高一些，地面上不高。他说都说你们煤矿上高。煤矿上危险高，煤矿上工资根本不高。回，回铜川，比不成，咱苦就苦在铜川算了。

现在最担心的，说不好听话，谁给煤矿工人着想呀。就包括铜川市那些市领导，他都不想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可怜得很着哩。可怜到什么程度，你看现在退工资五六百块钱。说不好听的话，不是光养老两口呀。还有儿子哩，还有媳妇，还有孙子哩，都在煤矿里面。煤矿职工既要管自己，还要管儿子，还要管孙子。为什么呢，煤矿工人可怜，他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他的娃基本上都是靠煤的。就拿三里洞来说，那娃娃基本上都是接班的娃娃，

煤矿接班的。破产了以后，有的人买断了，有的还不到退休年龄的，就是 205。205 元还要供娃娃上学，你说当父母亲的看着孙子、孙女上学，儿子就这 200 来块钱。说不好听，媳妇有工作没工作还模棱两可。煤矿的子弟，正儿八经找个媳妇有工作的不多，所以现在老两口，既管孙子，又管儿子、媳妇，还要管自己，就这五六百块钱。说不好听，我这 890 块钱，还是高的。一般来说，都是 600 来块，700 来块钱，他要养家糊口。现在整天说这边拆迁，那边拆迁。他哪里去拿钱买房子呀。他条件也不高，六七十岁的，我现在也不要你钱，你给我安置个地方，住下就完了。我也不说单元楼什么，我只要能住下人就可以了。要叫我去买房子，拿啥去买，我偷吧偷不来，抢吧抢不来，银行存款我又没有。现在年龄大的煤矿工人呀，特别伤脑筋。一出去，就像 60 年吃饭一样，咋弄哩，要拆迁哩，要搬迁咋办哩？就这整天就把他愁的。还不要说奔小康，咋奔小康。再想想，像铜川市，你就不想想发展工业，发展行业，你整天弄那个面子上的活干啥，给谁看？可是，老百姓可怜巴巴的，就是吃点干馍吃点咸菜。就是胡锦涛提出来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你们到底咋为民，咋立党为公。那些老同志六十多岁、七十岁的，一提到拆迁，真的愁得夜里都睡不着觉，你看那愁得很着哩。说不好听，亲戚朋友有钱的想去借，人家不一定借给你。他也考虑你拿啥还嘛，咋还嘛。再一个你去贷款去，还要抵押，你拿啥抵押，拿人去抵押？所以说，你要到南方就不一样，南方要拆迁，他们也同样的，农村 500 平方，人家都是装修好的，平方有规定。

### 还有上技工学校学三年，那都是骗人的

我是 35 年 2 月生，初中只上了三个月，到上海学徒的时候 15 岁，到这里刚好 20 岁。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家里穷，家里要不穷，能够上到初中毕业，我们一块的基本上能够。哈尔滨航空技工学校，北京航空技工学校，还有江西航空技工学校，就是我这一届只要初中毕业，都招到航空技工学校去了。像我们村上在一个小学上的，基本都在江西、北京、哈尔滨。我是到上海学徒，没办法。要说工资，我那天算了一下账，56 年我们就是五级工 78.85 元，63 年是 89.28 元。现在退休了，到现在为止，是 890 元钱。那天我算算帐，基本上跟 63 年 89.28 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我家里 300 块，我 800 块，说起来 1200 块钱，我在这里凑凑合合还能过去，回到老家去，1000 多块钱半个月就花完了，都不行。退休的正儿八经在上海的医药费，看了以后拿到矿上报，报了以后剩下的，拿到上海照样给你报销。咱这儿谁管谁呀，咱这就没人管。人家是民政部门，一万块钱，矿上报销剩下八千，人家就给报了。你说老百姓心情咋样。

318 只有七八十个人了，中机厂可能还有几个，以前是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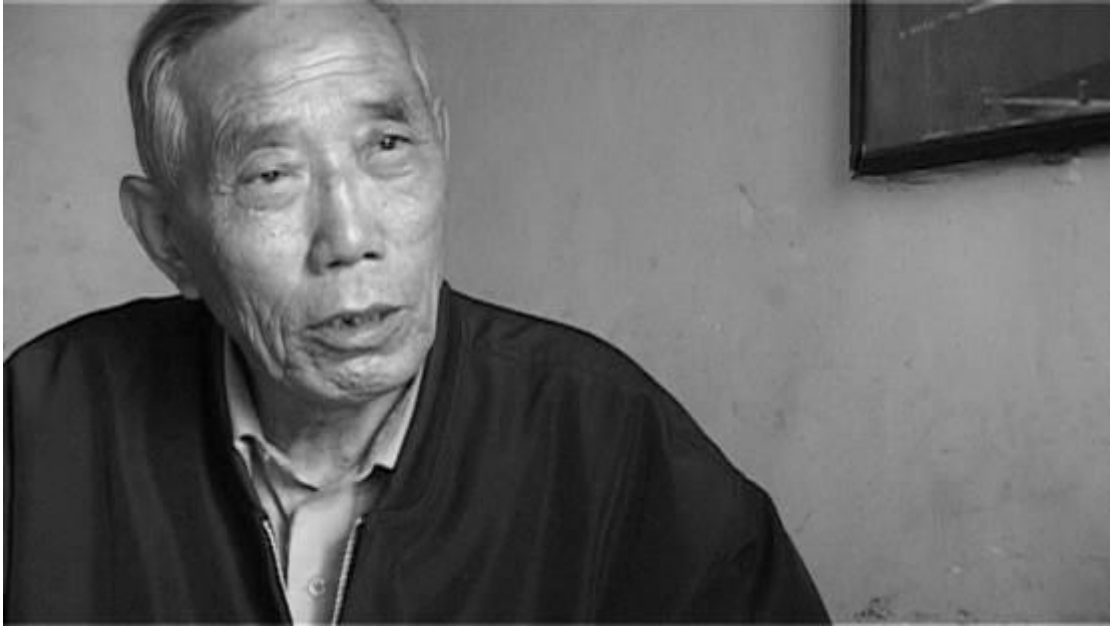
你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忠厚实在、为人和气的人。那个人不多嘴的。一直是当瓦斯检查员，到后来时间长了，确实也跑不动了，才弄到区里当个办事员吧，那从来不多事的。在咱这一代人没办法说，都是那么回事，实实在在的。在形象上忠厚老实，自己的事情都不考虑。才开始我们都是采区的，经常跑几个工作面，三、四个工作面。距离就是东部跑东部，西部跑西部，一个班就是四个瓦斯检查员。东部一个管采区，西部一个管采区；东部一个管掘进，西部一个管掘进。就是 4 个人。假如有三个工作面，他三个工作面都得跑到。他不是跑一次，最起码跑三次。那三次相隔的距离呀，要跑几十里地。说不好，下班回来，粮食紧张的很，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有时为了小孩都可以吃饱，粮食紧张的时候，相当艰苦。总的来说，没有吃好，也没有穿好。憨厚，都是为了娃娃。一说一笑，你妈的印象，我现在还能想起来，胖胖的、圆圆的四方脸，和周围邻居关系相当好。总之你父母亲都不错的，在我们印象中是相当诚实的，不多事。那就不容易，不容易。我 55 年来时 20 岁。58 年以后一定级，慢慢带家来。你爸四级工，采掘一线是六级工，电工呀五级工。像你爸，瓦斯检查员，

辅助单位的辅助工，四级工。60 来块。我是 75 钱元 3 角。

文化大革命我回去了三次，都是保守派。管屁他呢。在上海不来多好。有些人说，谁叫你们上海到这里来的。妈的，那时年轻，谁知道咋回事。都想见识新疆是咋回事。铜川，实际上报名报的是新疆还不是铜川。结果到铜川一看，夜里都想跑回去。领我们来的，陈宝山，教导处有个陈志军，原来矿务局三个人去的。来了以后，我们就找这三个，弄得他们都不敢见。矿务局就在这儿，都不敢见我们上海来的。把我们骗来的，什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还有上技工学校学三年，那都是骗人的。骗也没用，现在都来了。

## 王俊彦

王俊彦，1927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曾担任采煤区和通风区区长，1980年退休。



142、王俊彦在讲述中

## 我那时是通风区区长

王俊彦（以下简称王）：户口本上给我弄错了，弄成25年，我实际是27年出生，今年79岁。我是50年到上海，跟你爸爸一样当建筑工人，在那个地方干了有五年，铜川矿务局去招工，把咱们招到矿务局。我们是12月19日来的，22号到的。以后在矿务局办学习班，你父亲就分到史家河，我就分配到李家塔，现在是三矿。培训大概一年多一点时间，到57年6月，我们来到三里洞矿，7月1日投入生产。我在采区大体上干到65年，采区比较艰苦一点，送煤巷，采掘工作面，工作比较艰苦。65年以后，就把我调到通风区，那时我在采区当区长。那时你爸就在通风区，你爸可能就没到过采煤区，一直在辅助单位。我调到通风区还是通风区区长，以后，我一直在通风区待了十二年，这是大概的过程。你知道三里洞矿东西大巷有十多里，就巷道维修，东西大巷的维修。通风区嘛，就是矿底下的通风。你父亲那时就搞瓦斯测验、巷道维修、通风设施，做些矿上通风设施的辅助工作，这一段时间也长。那时我在通风区呀，发生一次事故，是人家改那个巷道设备。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陆矿长、陆荣初，他和我一起去的，给采区做准备，掘进队送那巷道。风井装了一风井石矸，里头是水，要把这个水和石矸都放掉，给人家做准备工作。那一次事故最吓人，因为要到这个风井上边去，那时陆荣初已是生产科科长，我那时是通风区区长。叫工人上去，工人都都不肯上去，危险，确实危险。陆荣初要上，我说你不上，我上去，我就上去了。我上到山顶口上，那个都是石灰岩，我就跨在石灰岩边上。上去目的是干啥，是把那个反锁里头的石矸呀、反顶口机子弄开，把石矸放下，放下了，连水带煤放下了以后，我给人家做准备工作。我上去非要把机头柱子打掉，我当时靠了两根柱子，因为柱子当时靠不下，弄钉子钉住哩，你把那钉子拔掉，把那柱子靠了。刚靠了两根柱子，只听上面呼……下来了，下来我就朝巷道旁边躲，躲也不行，因为风井那个石矸整个都涌下来了，它没从机头里面走，就在井筒里面轰下来，一轰下来，把人推到巷道里来，那巷道有两米多高，石矸下来把我一下都埋住了。自己心里有数，不是说吓得神志不清了，还没到那么严重。自己知道埋下去了，自己拼命扒着石头朝上爬，我爬出来了。陆荣初他没到上头去嘛，在巷道里连煤带人一下把他推了有三四米，有躲避洞，把他推到躲避洞里，也把他埋住了，连煤带水把他按在那地方，不是多严重。我那是整个一大堆煤把我压住了，他那个是煤下来后把他涌到里面埋住了。所以那一次出了事故，人受伤不太严重，性质非常吓人，住了几天医院，后来就回来，就在那一段时间。我有职业病，到72年人家就把我从井下调到地面上来，到四中里头给人家有一年多时间当工宣队队长，以后又是一年多时间，他又叫我回矿上搞那个土建。现在矿上大礼堂，还有那个单身大楼，后边的家属楼，都是我弄的。因为我是上海建筑公司来的，他那时非叫我去搞那个土建，一直搞到80年退休。这就是在矿上工作的一段历史。实际上我在矿上也不能说没出力，在57年到矿上以后，到65年这段时间，一直是在采煤区掌子面，那段时间工作也苦，煤尘也大。65年元月份以后调到通风区，也有煤尘，比采区要好得多，在通风区待了12年，在地面上待了四年，我80年就退休了。

## 湿衣服一天能穿八九个小时

那时候在上海，我们都是搞土建盖房子的，盖房子的时候，我这个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们都是农村人到上海的，那就是对出点力，不奸不猾。在搞土建时，给人家搞一个厂房，一共干一个月时间，现在叫打工，那时叫临时工，给人家干小工。一开始去干，我们就没干过那活，现在我们抬筐是用扁担抬的，在上海用竹子，毛竹，有那么粗，筐是大箩筐，抬石子、



抬沙子，就干那个活。每天到开工那个地方去等，早上四点就爬起来，一跑跑了二十天时间。那天等时间长了，坐汽车。上海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都有，以后那一天八点多快九点，人家说中心公园还要七八个人，我们就到中心公园给人家搞水产宫、海龟池，在那儿干一二年，就一直干再没停过。为啥来到此地？干临时工，说不好听话，有就干，没有就歇。正好那年55年11月份左右，把我停下来，弄到上海市政府学习，招工就在那个地方。不过这有个过程，南处工程一个领导送我上火车时给我说，老王呀，你不应该去，你不应该去，应该留下，你现在报了名，留下也不行。那个人对我印象深一点，因为那时我在建筑公司出席过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彭汉平是副市长，后来是反革命最终平反。就那些领导出席了先进工作者会议时他也参加，他认识我。到老市政府学习以后，铜川矿务局去招工，这一段时间报了名来了，大致是那过程。煤矿上工人比较苦呀，名义上是三班制，实际上不是三班制，早上8点钟上班，家属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做饭，5点钟上班工人就要吃饭，吃饭吃十几分钟，吃过饭以后就要走，那时谁买得吃，6点钟你就要准时到区队，班前学习要学一个半小时，那半个小时做准备工作。所以不说干活了，这两个小时就占上了。另外就是到井下，说起来是4点下班，辅助单位提早一点，采煤掘进就不行，甚至你5点都下不了班，每个人下去溜子弄顺了，没有车皮了，正要出煤到点了，那怎么办，只有落点多干一会，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在一般工人落一个来小时，他上来一洗澡回去了。特别是组长、班长不行，为什么不行，他洗完澡以后，还要到调度室给人家汇报，汇报这个出多少煤，没有啥事故。所以说名义上是8小时，你上早班啥时下班，起码要到下午8点，9点才能到家，不要说吃饭了。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钟。所以这一段时间，干活时间不多，主要是其他时间，给煤矿工人弄的太辛苦。你要说苦确实苦，为什么煤矿工人又是关节炎呀，煤矸肺呀，这你没有注意，你父亲也不注意，为什么，他不到那地方去，他不是真正生产单位。没到干活时间，衣服都湿透了，上头那个顶板滴水，你就是穿那个工作衣，你在下面干多长时间，湿衣服就穿多长时间，湿衣服一天能穿八九个小时，穿上来。湿衣服第二天下井咋办，有的到烘干室烘一烘，没有烘干室的时候下去还得穿那个湿衣服，湿的穿在身上很难受。要是干的穿在身上，脏也好、灰也好，它都是干的。有的一开始还没有工作就把那湿衣服穿在身上了，一直要穿八九个小时，好受不好受，这煤矿工人也可怜，这是我亲身感受。有些人没下去过，他也体会不到这一点，你找老工人他就体会到这一点，情况就是那个情况，现在说也没有用了。确实话，还没干活衣服都湿透了，到最后，大铁锹在水里捞煤，水都到这地方，到最后确实没办法才停下来，水要到这么深。所以说，哎呀，看起来铜川当地人在旧社会就没人下井，下井都是外地山东、河南呀，到此地逃荒的下煤窑，本地人没人下煤窑。解放后条件改善了，在当地招些工人。为什么他一开始到我们上海去招工人，那时矿上就没有多少本地人，都是外地人。我们来几批人，上海来一批人，西安厂来一批人，七几年陕南招些人，以前陕西地区本身就没有多少人，都是外地人。我们在上海来318人，跑了36个，不适应嘛，不适应走了，有一部分分配中机厂，有一部分分配到红旗工程队。凡是留在矿上的，说句不客气的话，都是踏踏实实的。凡是捣一点，有一点技术的，人家都不在这矿上干。像我们这些没有手艺的，你不干咋办？上海人讲脑子灵光的就干些技巧的活，脑子笨一点的，你就出力罢。威国其罐笼下去把他砸死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光知道罐笼掉下去把他砸死了，那时投产时间不长，扒的时候我也去了，在罐笼底下，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啥文化，不出力咋办，我给你说，简单一点说，凡是采煤、掘进出身的，当队长也好，当区长也好，当书记也好，你没有文化都是靠干出来的，你不干上不来。采煤、掘进文化水平都不高，像我这个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煤矿上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在科室里边，不会朝你采区分，采区大学生上学就是学采矿的，不然不会到煤矿来。

我现在是跟着我女儿。我还有个孩子出事故死了，留下一个孩子，她给我做做饭。我四个孩子，三个男娃一个女娃，三个男娃遭车祸死了一个，现在还有两个，大的孩子都结婚了。

## 放一炮，瓦斯检查员要进去检查一次

在通风区我到西北干校学习，通风就是搞一些辅助工程，是为生产服务的，搞瓦斯检查，风力大呀小呀要你调控，送风，井下各个巷道、各个采区、各个工作面，副井下去多少风，你要分配。风大了也不好，风大了工作面煤尘刮得不行，人不好受。风小了人感觉热呼吸受不了。可能你父亲一开始是测风的，搞风力调整，因为你父亲身体不好，后来，搞瓦斯鉴定器。朱岳如是海门人，也不在了。朱岳如当班长，后来邱水标……还有一个。

陈家山瓦斯爆炸嘛，那个玩意真是无味，你看不见摸不着，你弄不好就容易瓦斯爆炸。在三里洞没发生瓦斯（爆炸）。有的瓦斯检查员他不想跑路，他扒煤车挤到那墙上，把他挤死了，通风区出过这事故。通风区主要是为采区、掘进服务的，你搞不好就要死人，搞好就没啥事情。三里洞通风上没大事故。检查员一班要有六七个人，整个合起来有 20 个人。我是 75 年走的，以后检查员就多了。那时一个工作面一个检查员，焦坪煤矿瓦斯爆炸以后，对那个瓦斯检查员加强了一些，焦坪煤矿瓦斯爆炸时我正在通风区，派好几个去处理事故，这事你说重要也不重要，你说不重要也是个不可缺少的部门。

**林鑫（以下简称林）：**焦坪煤矿瓦斯咋回事，死了多少人？

**王：**那回死了 101 个，也是瓦斯浓度高，头一班检查员走了，第二班瓦斯检查员没有很好交接班，据人家说是这样的，瓦斯检查员不在，他们放炮引起的。所以井下采煤工作面，瓦斯浓度高，放一炮，瓦斯检查员就要跟进去，检查一次，浓度高的就不能采。所以说，这个工作说重要吧不太重要，说不重要还避不过他，特别瓦斯浓度高的，放一次炮要进去一次，放一次炮要进去一次，就是这样。陈家山这一次还不是，瓦斯浓度高，里面还着火，陈家山的煤本身油质大，本身着火，上面叫他处理了再生产，矿上为了赶任务，不停，一个劲儿生产，结果就造成这个事故，矿上职工死了一百五六十人，实际上不止，实际上还有民工，还有些打工的民工，一次性给多少钱处理掉。

一个通风不好，一个火。工作面出了火，瓦斯浓度高，就会引起瓦斯爆炸。为什么放一炮，瓦斯检查员要进去检查一次，就是这。放炮以后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会产生那些有害气体，特别是放炮的时候，这个瓦斯检查员工作责任心是否尽到，他劳动强度不高就这一点点长，小仪器。

一般也不爆炸，如果没有火，不会爆炸。如果这下边用电器机械的时候，现在溜子呀，灯呀，又是打了煤桩用那个电缆，不产生火花爆炸不了。要在井下掌子面你迎那个灯头一望，都是那黑星星，黑星星就是风刮的煤尘。为什么人得煤肺病，人呼吸进去了，到肺上了。瓦斯爆炸会引起煤尘爆炸，连环爆炸，煤尘爆炸最厉害。

## 究竟还有多少人不太清楚

身体还可以，一般没有其他病，就是个职业病，其他气管炎呀，肺气肿呀，心脏病呀，高血压呀这些毛病都没有。我有个孩子，在铜川市人民医院，他每年都要叫我过去检查一次身体状况。我从 80 年退休到现在 20 多年了，没有大的毛病，有时冬天有个感冒呀，小毛病也是有的，一冬也就是一次，打打针，吃吃药，就好了。好多人没有咱那么大岁数咳嗽的不行，路走不成，就这样子，过一天说一天吧。你父亲（要还在）也 70 多了，你父亲比我小一点。咱们来铜川差不多有 50 年了。

**林：**整 50 年，55 年到 05 年，支援大西北整 50 年，今年拍这个有纪念意义。上一回陆

荣初说，50年上海人搞一个纪念，他先挑头搞这个事情。

王：可以可以，究竟还有多少人不太清楚。红旗工程队、中机厂、桃园矿、金华山、徐家沟、鸭口，有好多人在东区，三里洞有好多老人回去了，还有些老了，人不是那么多了，那就要花一些时间把这些人找到。远一点东区人比较多一些，金华山、徐家沟、鸭口，金华山有个跟你一家子也姓朱，在金华山选运科干，来的时候才17岁，朱才宝来的时候也小，17岁、18岁好几个人。我们来的岁数最大的有个叫朱岳如，还有个叫史啥，这个人老早不在了，有个叫王阿根，下来就是江兴怀、夏俞斗，有个王福坤你认识吗？像陆荣初、周寿根，有的不到20岁，有的十八九，有一二十个岁数较大的。还有个叫童什么的，他年龄比较大，起码80多吧，那个人叫童什么，旧社会上海是黑道上的人，黑势力，那个人英语也好，口才也好，文化程度特别是英语一口流利，那个人姓童，不知道叫童啥，记不起来了。他那个档案都不在我们矿务局，都在铜川市公安局里，文化大革命把他也弄回去，没死，现在死没死说不清，嘴巴子也行，童啥，这些人都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要搞这事，挑头的人呀，一定要群众威望高一些的。我去找，不管咋说陆荣初在咱三里洞，不是说他矿长怎么样，关键他的为人。在我们矿上，他的群众关系，群众威望比较好一些，对人比较好一些，平易近人，由他来负责挑头。江兴怀也是跟我们一起来的，今年83了吧，他原来也是咱矿上副矿长，不过他那人不如陆荣初，中层里边就是我和周寿根两个人，其余的没有多少人，陆根福死了，陆根福你认识不认识？

林：听说过名字。

王：原来有个李金寿，也是中层干部，这个人群众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已经回上海去了。要挑头的话，三里洞矿的人找找还可以，徐家沟、鸭口，丁协星，过去叫丁协星现在叫毕文涛，这个人在东区，他不管事，在东区比较和气一些，叫他在东区负责，金华山就是周涛一个人，王石凹我不记得了，桃园矿可能有两三个，有个姓孙的，有个姓李，中机厂有好几个人，中机厂原来有个办公室主任，现在恐怕也退休了，这个人姓啥。我跟你讲，我们在上海来了318个人，只有7个党员，有个王宏……啥，还有中机厂一个，还有朱岳如，还有一个，我们都是上海来的七个党员。陆都是到三里洞矿以后发展的。

来搞这玩意，要资金呀，不是30、20就行了，起码一个人要百十块，你既然搞就要有点活动吧，是不是？你搞活动有点纪念嘛就要百儿八十。陆荣初和我谈过一次，你也感兴趣，我也感兴趣，那么我也找找陆荣初，我再联系一下江兴怀，再联系一下，再跟周寿根说说，再跟丁协兴打电话联系一下，他在东区。像中机厂、桃园矿的人，人在不在不太清楚，有那么两个人在，具体不太清楚，因为时间长了，不见面，就有些就有些记不清了。

## 我临走他还在通风区

陆荣初老婆说，去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陆荣初不在家我也不认识。就是说去你们两个人，我问她姓啥，她说不知道，他说顾龙祥是他姨夫。噢，我能知道是谁，有可能他姓朱，你回去问问，她说我没问，我说他爸我知道，时间长了，光知道他爸想不起来名字，就在南关那个市场走到那一头，忽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以后我就在那等，等这个方百珍，我说他爸姓朱，叫朱永生，我说你回去问问是不是他。因我知道顾龙祥老婆和朱永生的老婆是姐妹。如你不信，你回去问问陆荣初。她说明天要到我这里来，我说好吧。时间长了，就是你爸的名字我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起码也有十分八分钟我才想起来，经常见面的人还容易想起来，经常见面打交道的或者有点印象的，那你一说就知道。（院子里还有一个一块从上海来的），他是6号楼，我是3号楼，我们一起来的，现在他叫啥姓啥不知道，因为你不跟他打交道，你别看住在这里，不和他打交道就是这样。一个他那个人本身也没有啥交际关系，再加上那

个人窝窝囊囊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来往。七八年前我到他家去过一次，我陪丁协兴到他家去过一趟，其余就没有打过交道，就是这样。一般跟人家没啥交往，一时也想不起来。

**林：**你们当时是12月来的，你们要聚会的话也定在那个时候，那不是有个纪念日。

**王：**有是有啊，来的日期还记着呢，12月19日来的，那么到这是20至23号，22号。那时来冷是冷一些，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铜川矿务局到上海去招的第一批工人，我们来到这地方对我们来讲多方面优待一点，比如说取暖呀、饭菜呀，我们南方人吃大米比较多一点，吃白面比较少一点，现在说优惠一点。取暖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煤炉子，在那年代煤也不贵也不缺，一个人给你发几块钱取暖费，那个煤呀尽你烧，一直烧到天气暖和了，就是这样的。

**林：**另外我想问一下，我前面拍好几个人也都一直在问。因为我父亲去世了，我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情况，陆荣初伯伯就说你和我爸在一个区队，要问我爸的情况王伯伯最了解的。想请你给我介绍一些我父亲在矿上的情况。

**王：**裘水标跟你父亲比我时间长。

**林：**他不在这儿。

**王：**在这个地方。

**林：**裘水标我认识。

**王：**那就行了嘛，我给你说住在什么地方，上去选煤楼有个选煤厂，到那个地方，他就住在后面的山坡跟前，你到那儿一问就知道了，裘水标你知道是南方人嘛，是浙江人。再一个岳邦峰、席天成这两个人和你父亲（在一起）时间也长。

**林：**也是南方来的？

**王：**不是。岳邦峰、席天成这两个人都是河南人。裘水标和你父亲时间最长。

**林：**裘水标来的晚。

**王：**他来的晚一些，不过也不算老晚，你找着他，他对你父亲情况最了解的。

**林：**噢，我回头专门去找他。你现在把你了解的情况讲一讲，你们毕竟在一起待了十来年。

**王：**我刚刚给你说了，他原先是在下边搞测风的，后来身体不太好以后，因为我们单位有一二十台仪器，他搞这一行时间比较长嘛，一个是你爸，再一个是朱岳如，他们两个人机器用的时间长。他能把它拆卸、能修理，就是这样的。以后就把他调地面上修修仪器，再一个就是搞办事员工作、报报表呀、做工资单呀，到开工资的时候开工资呀，一方面是修理仪器，一方面就搞搞办事员工作，就是这样。我临走他还在通风区。75年我就到现在的四中，过去的中小学，在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就到了修建队，矿上的土建队。我在的时候他就一直搞这个工作，如遇到测风的时候谁去晚了没人或者遇着啥难事情了，下去处理处理，或者给人家替个班，大体上就是这个情况。最好你就找裘水标，我是65年到通风区的，65年以前他们就在一块。

**林：**我爸最早好像是裘水标的师傅。

**王：**裘水标、你爸还有朱岳如，朱岳如时间好像最长的，培训班是在史家河培训的，他们原来就是搞这个的。我是在三矿培训，培训以后到采煤区又待了几年。57年投产，59年我当副区长，到65年调到通风区当区长。我在采区就是副区长，实际上我在采区当工人挖煤就是三年时间。

**林：**在上海不认识？

**王：**朱岳如在上海和我在一块的，你爸在上海我不认识。朱岳如、刘云龙还有桃园矿姓沈的，原来在上海都认识。

**她说你想找共产党的组织干啥**

**胡菊芳（林鑫妻子）：**你在上海就是党员？

**王：**闺女，你不知道伯伯犯过错误呀，我是淮海战役参加共产党，那时候 48 年吧，以后回到老家。在农村民工担架队当民兵队长的时候，参加淮海战役嘛。那时年轻，一二十岁毛头小伙。我有同学姓侯，离我们那里有二里来路，都是一个县的，他是县长。那时四几年呀，正是共产党、国民党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没有的吃，吃救济，发啥？发那个豆饼子，就是黄豆油压过那个饼饼，发给老百姓吃。发到他那地方，他把它贪污了，没分给下边的老百姓，后来这个事情暴露了。好像给我们这些人说了，说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去告他的，以后他报复我们。我们那时年轻身强力壮的，谁要弄这个事情呀，大家当农村干部也不拿钱，啥也不拿，到处跑腿不说，还要那个。就拔腿跑了，跑到上海干工，这么一走，党员关系就丢掉了，因为你偷着走的嘛。丢了以后到上海就找这个……50 年 51 年，那时候好家伙，在上海根本找不到共产党人的，一直到 52 年打老虎工作队到单位去，我找他谈，这附近的共产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光摇头都不知道。我说你能问问不能呀，他说问问倒可以，但是不知道。他说你找它干啥？我说我找它……那也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敢说，那时候还有打黑枪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我们那时候说不好听的话，烂脏工人，也没啥那个的，他也不会杀我们。不过你就不知道，那些工人四面八方来的，你知道是谁呀，你也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工作组这个人问了以后，他说不知道。后来连着民主改革工作组又到建筑单位去搞了，因为那些工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不知道啥人对啥人。那个人的关系比较复杂了，一天到晚见面好得很，又是办事员又是啥，白天说的好好的，晚上叫人逮走了。逮走一公布，原来是国民党的啥啥啥，你就不知道。所以你也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工作组又去，我又问他那个领导头头，你知道上海工程局党的组织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它干啥？我想找他们问个事情，他说我给你查查。后来来了一个女的，好像姓刘，她就跑来找我，她说你叫王俊彦，我说就是，她说你想找共产党的组织干啥，我说我在家是共产党员，到上海来找工作把党的组织（关系）丢在家里了，现在我能找到你们，找到党的组织，就把关系转到这地方来。她说我回去给你联系联系，她一联系，第二次又跑来找我，她就叫我登记、填报，你是哪里人。那时候她回去给我们老家发函，发函以后我们老家也给她回复，说时间太长了不能恢复，说要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再发展他。所以那个女的又来找我，她说你可以再写申请，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的组织部又来找我谈话，我就重新写申请，又重新发展，以前那一段时间就丢掉了，同时到 50 年一年时间就丢掉了。

**林：**49 年以前算离休老干部。

**王：**那个我问了，因为在 48 年淮海战役你回去以后，就在家种地嘛，你到 50 年这段时间不是连着的，要是连接着承认，不连接着不承认。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地方去了几十个人，就是民工，发展党员我们一个村也就是我一个人。那时候可不容易呀，我们那个担架队里头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共产党员是地下组织，党支部没有公开嘛，到 54 年以后基层党支部才公开，53 年以前没有公开。

今天早晨就有个人，说你和我差不多大吧，我说你多大，他说我 70 了，我说那我比你大得多呢。他说你有多大，我看你就和我差不多大。我说我 79 了，哈……

**林：**状态好，记忆力还这么好，耳朵也不背。我采访葛登发他耳朵全听不见了，他说话可以，但你和他说话他听不见，带助听器也听不见。陆荣初伯伯也带助听器，不过他耳朵还可以，葛登发耳朵你说啥他也听不见，你大声喊叫很大声音他才听得见，戴助听器也不行，他说放炮崩的，后来年龄大了就不行了，耳朵整个听不见了，啥都听不见了。

**王：**我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 罗世俊

罗世俊，1929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已退休。



143、罗世俊和妻子在一起



144、罗世俊在街头寻找有病的妻子

## 感觉支援大西北光荣的很

**林鑫（以下简称林）：**把你从上海来这儿的情况给我讲讲？

**罗世俊（以下简称罗）：**从上海报名自愿来的，支援大西北嘛，那时候，人的觉悟高。矿务局到上海去，赶紧报名支援大西北，人觉悟高嘛，感觉光荣得很。重工业嘛，咱上海那时重工业还没有，只有轻工业，感觉支援大西北光荣的很。来到这个地方嘛，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这儿没有楼上，我们平地的。我们有电灯电话，说得挺好，就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你们一年不下井，地面上学习一年。结果来到这个地方，学了十五天就分配下井，到李家塔矿上下井。

我来到这个地方，分到采煤上培训过一年，在李家塔矿上就算毕业了，你单独操作了。但是煤矿上苦得很，像你年轻不知道，苦的要命。我是 55 年来的，56 年差一点把我命要了，冒顶砸着我了，砸着我，差一点过去了，受伤了。五里铺二门诊部知道吧，二门诊部大医院，像矿务局职工医院一样。那时候住院，还没有病房。老矿务局在五里铺，我找上海带我来的那个人，人事科那个人。他说，你住在老火车站旅社里，他报销，住这儿看病。最后看病看好，眼现在还不行。当时砸得我眼白都没了，都是血，遮住了。慢慢住院住院好些了，我说再不干了，再不能干这煤矿，差点把命都要了。上海来的很多人都跑回家了，咱这人也老实，也算是个老实人，就这样干了。矿上这工种随便捡，工作随便干。要啥工种，给我锚工，给我支锚工。支锚工懂不懂？专门扛木头在巷道架棚的。我跟着师傅，夹着木料，这地方都磨成茧子。三里洞开采了，7 月 1 日开采，把我调到三里洞。还继续在采煤上，采煤工作比较苦，确实苦。现在叫年轻人干那活去受不了，现在比较轻了，真受不了那活，重得很。干那么重的活，我七个小孩，人口又多，生活又过不了。那时拿 60 块钱，七八口人，就这样弄。一直干采煤，又是干掘进，掘进工，没有干过轻工作，一直干。就煤矿来说一般身体都受不了，我有病了，又把我调到通风区和王俊彦在一起，调通风区干了二三年，最后身体不行，又调到地面，干一干。干煤矿来说，干到现在又有啥？那时人思想好，不像现在人的思想。像你爸思想都好得很，感到光荣嘛。我们在上海看见老年人、抱孩子的，马上起来让座，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像我在煤矿干到现在，我的思想好不好呢？年年有奖状，季季有奖状，都是奖状，都是标兵啊。这呀，那呀，到现在有啥用呢？活倒是为国家贡献不小，没啥用，真一点用没有。像陆荣初他们吧，人家干干还有点用，像我干有啥用。实际上要不来这地方，要在上海就好了。

## 能扒出来就扒，扒不出来就算了

我原来是正式干部，后来又取消了。再后来在掘进上以工代干，以工代干知道吗？管理工作。在掘进上，又掘进又锚钉，大巷多高，繁重的很。一般要有技术，没技术不行。你看掘进以后，要锚钉大巷，危险得很。打锚钉懂不懂，锚钉打进去以后，再用钢筋水泥打到里面，把顶拉住，整个控制住它，不要往下冒，就这情况。掘进队来说，苦不苦，咱做管理工作责任心大，歪一点都不行，对吧，那责任心大得很。掘进和采煤，采煤要苦一些，掘进也苦，不是不苦，也苦的很。从做巷道来说，合乎矿上要求，够标准，全国都到我们队上参观，看我们做得好不好。梁都是一致，腿都是一致，就是这样情况。没有干过轻工作，就这样的活。到矿上经过来说是这，采煤，采过煤以后是掘进，掘进以后又搞通风，通风当过班长，管密闭，通风哪里该密闭就密闭，该打开就打开，要风量畅通，不要瓦斯聚集。

在井下你看，不是砸头就是砸脚，井下工作苦的很。说实话，确实苦。经过大冒顶多次，多次冒顶，人是往外跑，一动就被溜子压住了。溜子你懂不懂，你没下过井，一动人就被机

器压住了，压住以后就扒，能扒出来就扒，扒不出来就算了。扒出来以后，连着再送洞，再铺溜子，再采煤。井下的工作复杂的很，不平凡，地质条件变化大，有时碰到压梁碰到低谷，有的煤层高，有的煤层低，工作时艰巨困难的要命。煤矿你是没下过，像你爸的话就体会到，为啥你爸知道，你爸当瓦斯检查员哪儿都去过。掘进呀，采煤呀，通风呀，运输哪里都到，大巷小巷都到。井下的工作艰巨、不平凡又复杂，真复杂的要命。你掌握不住它，变化大，工作面有时出水，有啥办法。确实话干这采煤呀，费多大脑筋，简单也不简单。这个过来了，干一辈子了，不干不干，二十多岁过来了，干一辈子。你说这情况，上煤矿的三班倒，尤其是夜班，这人呀受不了。瞌睡，井下为啥瞌睡，井下没有空气，一弄就叫你瞌睡，叫你瞌睡。怪得很，在采煤上，有人站着站着就扯呼噜，乏的。井下吧，东西不坏，机器不坏，开着干着，还可以。东西一坏一停，就瞌睡的不得了，受不了。一睡觉一醒，人就感到不舒服，难受的要命，在井下，睡觉真不舒服。空气闷，空气不好，越往井下，空气越热，里面热的很。一进去热的很，就乏的很，要瞌睡。凉一点不要紧，你下去巷道里，一热，人就不一样了，就想瞌睡，就想睡觉。要是你爸给你介绍就很详细了，凉的地方他去，热的地方他也去，他比我知道的多。我没文化，从小受罪，没上过学。他不在了，在就好了。你不说我都忘了，你一说我想起来了，朱永生和我关系好的很了。你看我这脑子，忘就忘了，确实不错，我在通风区，你爸也在通风区，在一块。他当瓦斯检查员，我当班长的时候，在一块。

**林：**戚国其的事记得吗？

**罗：**戚国其是三里洞第一个牺牲，任福兴知道不知道，任福兴牺牲了，戚国其牺牲了，你看戚国其头一个，任福兴第二个，牺牲了。任福兴跟你爸都一块来的，你小你不知道。戚国其头一个，主井往上调煤知道吧，绳断了嘛不知道咋回事，把他压倒里面，压住肩膀子把他压到水里面。

## 我哭着说火车票没有了

**【罗世俊妻子过来和罗世俊说话】**

**罗：**你讲啥我听不见，你吃鸡蛋你吃去吧。

**【罗妻走开了】**

**罗：**她有病，脑子也不管用。你要说辛苦也辛苦，你像我这都死了出来的人，55年来，56年就差点把我砸死了。在上海身体好好的，在上海退休比这儿也多一点。太辛苦了，那时思想好，要是这会儿就没人来了，在上海好多哩，吃得也好。

**林：**你那时从上海来是你自己要来的？

**罗：**自愿嘛，光荣嘛，年轻人嘛，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嘛。像你这一代社会教育就不一样了，这社会谁教育了，都想钱了，对不对呀。那时候不想钱，干这光荣，光荣的很。

**林：**后来也没想到过回去？

**罗：**考虑了，有好多跑回去了，后来在火车站堵住了。火车站是草棚棚，到川口都没人，农民住在山上，都是空地。

来到这个地方，我六个孩子，六个孩子上学没花过钱，那时候都是公家招呼嘛。大孩子在矿上的，老二孩子下乡，知道不知道，那时知青下乡。招到东坡矿，干啥干不了，矿上把他开除了，第二个除名了。第三个闺女也是下乡学生，招到商业局，商业上的。老四千个临时工，没有工作干个临时工。老五闺女招到矿上，现在退休了。还有个老六，也没啥工作，在社会上流浪哩，在延安和他人一起开个食堂，在那儿弄这个。六个孩子三个有工作，三个没工作，这情况，一直混到现在。

**【这时罗世俊忽然起身去另一个房间看看老伴】**



罗：看看我家里在不在，她脑子不够用。

她走了。我家里脑子不够用，跑了。他妈的狗日的说走就走了。真走了，真走了，脑子不够用，跑得不回来了。

【罗世俊赶紧披上外套，出门寻找】

罗：看见那谁没有，跑哪去了，我找她去了。

看见她往那边跑没有？

跑哪去了，我找她去。

【罗世俊在马路边的油条摊前发现了妻子】

罗：在这里吃饭。

【罗世俊等老伴吃完饭，扶她回家。上楼梯，进门坐下，罗世俊继续讲述】

罗：俺老伴是吧，在上海结的婚，54年结的婚是吧？

罗世俊妻（以下简称罗妻）：53年。

罗：53年结的婚，在上海生了一个娃，到这儿来了。我老伴，一说就哭了。干临时工时，下井呀，推大车，井下推大车。来到这里，她跟着我也吃苦了。上海人嘛，她受苦，她也没有话说。但是你看现在又有病了，有了病脑子不够用。有时就跑了，跑了我找不到。跑耀县，耀县派出所打电话来了，才找到她。最后跑跑到上海，跑了几天，上海打电话到上海了。夜里两点钟到上海，人家给她送到南浦大桥，中午12点才到家，你说多长时间。夜里两点到上海，中午12点没摸到家，人家送到弄口她摸不到家，就这样情况。她有病了，我离不开，白天晚上都要照顾她，离不开。她走路又不行，脑子也不够用，在门口都认不到家，看见吃油条地方，噢，这快到家了。确实现在，年龄大了，我也苦的要命，一天到晚的休息不好，服伺她老服伺她，你说咋弄。人嘛，一辈子对不对，老伴一辈子，你不服伺谁服伺。你指望儿女，服伺不了这样周到。不像我整天看着她，就这样情况，她走到哪儿，我撵到哪儿。

罗妻：他在三层楼住。

林：她说我在三层楼住，她知道？

罗：她知道，咋不知道，都知道。你妈她都认识，熟的很哩。年龄大想不起来，熟的很，她们经常在一块，我们住底下，你们住上头嘛。他住上面，住我们上面知不知道。

林：你们原来住下面一层窑洞，在丁福珍那边住着？

罗妻：对。

罗：等于咱们是邻居一样，我们在底下窑洞，你爸在上面住的。上下班都在门口走嘛。确实话，她有病了，老了，我也没有休息时间。我一个人一辈子，晚年也过不好，休息不好，你不服伺咋办。人啊，到老了就应该服伺，互相照顾了，你不照顾咋办哩。走路也走不成，走时栽倒，有次腰骨折了，才好，睡了三个月呀。一摔摔倒了，骨折住院，住了三次院，三次。弄点钱都看病看掉了，才好。住了三个月医院呀，看病看的穷的，你看我家，就这样子。住了三次院，花了多少钱，医药费贵的很，你也知道。不敢生病，生病生不起，家里穷得要命。现在你看才出院，第一次矿务局医院。第二次，北关医院。第三次市医院。住了三次医院。你看病重成这样，昨天她妹子来电话，叫她到上海去，到上海去不能走路，她妹家在上海，打电话来了叫她去，她说我不能走路，咋去嘛，这情况。这人很可怜的，可怜的很，这情况就这样。一天到晚服伺她，叫我没办法，不自由。

林：住院医疗费矿上报不报？

罗：不报，她是家属嘛，不报。直接掏，都是自己掏，吃药都是自己掏。唉，人怕生病。你看住院，头一天到市医院，一天390元，几百块钱一天。你看我的工资那么少，几百块钱一天，最少都150多，200，300，两天的话，一月工资都完了。住两天院，我一月工资两天都不到，都完了。发烧，本来家里这么穷，住了三次院。现在吃药，还要花钱，药费也贵的

很。

像我中午也不烧饭，在我闺女那儿吃饭哩，一天都不做饭，一个月一次，她完了她，她完了她，轮着吃。

**林：**你一个人可以回到上海去？

**罗妻：**嗯。来到火车站车票被骗走了，我哭着说火车票没有了。列车员说，不上去，车开了。我等在检票员这儿，检票员好，给我说，你进去吧，我上去了。

## 倪进祥

倪进祥，1955 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已退休。



145、倪进祥在讲述中

## 白白地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啥

**倪进祥（以下简称倪）：**这个朝阳新村南二路，去年我回家，还到那地方旧地重游，到那儿看看，现在都变样了，我们盖的那房子老样子还在。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个电话，说上海这个地区，不宜于建设，要支援大西北，精神就是这个精神，详细的情况都说不清了。像现在讲一讲，现在可以说，带着那种欺骗性。为啥说有欺骗性，说铜川和上海是一个样，高楼大厦、柏油马路，还有什么苏联顿巴斯矿工，这些事情。没用，你拍了没用。咱打个比方说，或者是铜川市记着，陕西省记者拍拍讲一讲，也就是说电视上给你放上一放，现在对这东西都不感兴趣。昨天夜里犯病了，今天精神方面有点不太正常，给你说这些话。

就是12月18号来到铜川，看到情况是很不像个样子，就在大礼堂里面吃了一顿饭，休息休息，到李家塔，一部分分到史家河。7月1日以后，都陆续调到三里洞。反正总的这个概念，说我们建筑工人对重工业煤矿工人不太了解，就是稀里糊涂，连头带尾，将近50年。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比如说，十天半月吧，三个中队有百十个人都跑回家了，当时跑回家好像有依靠的还是可以，回家没有依靠的都凑凑合合，没有那个啥。只有这个地方，过去说生根在这个地方，你到上海没有依靠，没有出路，上海不要你了你找谁去。这个讨论以后，就把人做了第二次分配，有开绞车的，有到机电上的，有到通风区，有第一线的，人很少，最后也有几十人在第一线。有调到供应处的，就是这么多情况。58、59年以后，留在铜川三里洞的，基本上60-70%工作也变了，地位也变了，有的提到当区长、班长、行政干部这些，哎呀，就是这些。我是以后在58年提干，先后也在第一线待过，后勤也待过，在机关也待过，反正在铜川要说起来，按我说起来确实也是……白白地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啥。

当时那七个人我还能记住一个吧，人都不在了，有个姓葛的，那记不起来，动员，开始动员报名，对着哩，自愿来也是一回事，上海都不能搞建设了，用不了这些人，要支援大西北，前提就是这一个。我们也不能说自愿来，但是话说回来，你不自愿来，也不会跑到大西北来，对不对。他通过组织把你调过来，调过来也要服从分配。不像现在打工，你要到山西，你要到什么广州、海南就想去哪去哪儿。那时候有组织有安排，统一支援大西北，几个中队集中起来，你看咋理解，如果不支援来不可能。集体把你支援大西北，那时支援的方向，第一步是河南郑州，第二步是西安，第三步是兰州，我们属于这个支援西安这个方向。我有心脏病，我有病，现在就是不想用脑子，在这里说话，情况就是这吧，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找着陆荣初、周寿根这些，基本上完满了，我相信他们比我说的更细。

给你说我昨天晚上犯病，今天精神有点不行，如果按正常，我没有这个病的情况，你叫我给你写本小说，前前后后也能写出来，现在给你说，就像我给你说的，说了东忘了西，说了西忘了东，就是上边接不上下，都不是……所以说，你要拍这个东西，我这个人……

**林鑫（以下简称林）：**不要紧，我作为资料留下来。

**倪：**我理解你的心情。

**林：**如果我父亲要不是你们这一代人，我绝不会费那么大劲去找着拍这些人，有感情在里头的，再者，我本身不是做纪录片工作的，我从内心觉得应该去做这件事，别人可能没有兴趣关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随便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随便聊，聊到哪算哪。你们经过了，觉得没啥意思就过去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认识你们这代人，认识整个五十年代这一代人，对更年轻的人来说，它就是有意义的。

**倪：**就这吧，小朱，我跟你说，精力不行，确实是……

**林：**我能感觉到，确实是很抱歉。

**倪：**我吃过饭要休息一会，我这个说话能力也不行，现在说话也不行。如果聊天呀，还能慢慢地说，还能说两句，如果要是激动一点的时候，在家里人家都不叫我参与这些事，因

为啥，脑神经都不行了，就是说不到一块。现在是在家吃饭，转转玩玩，什么事情都不管，老俩口就是在这里。孩子们都有他们的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己管自己。要想在脑子里装点啥东西要想说一说翻一翻，没有这个……现在有时想了也想，也感到有点那个啥，说起来就是……要说年龄也不大，七十多岁，现在老……

李家塔和那些井口，你要拍些电视、电影吧，你都可以拍，现在没有这个精力了，也给你说不好。其中还有这么个镜头，矿民警队过去在上面站岗，不叫你卷铺盖跑回家了，这些事情。因此说，你要说找了我说这个事，从这两个矿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在深山老林里头，李家塔离咱铜川最起码有 40 多里，40 多华里。史家河在市区又不一样。又没火车，又没公共汽车，全凭两条腿从李家塔跑到这儿。我们几个人后来在一起，我、顾龙祥、陈连昌、沈春龙还有朱文耀，当时我们都走，除了沈春龙是海门人，上海长江口的对岸是海门，剩下的南汇的、川沙的，就这两个人，我们五个人在一块比较好，我年纪比他们大，都称我老大老大。从上面下来要打个早，起个早呀，早起跑下来看一看，铜川我们来的时候，最好的（建筑是）服务大楼，57 年以后延安饭店，现在是王益区政府，盖了几栋楼还像样一些。马路也是 57 年以后才修的，没修以前，天晴是污染大的很，下着雪是满脚黑泥，脚脖子都盖住，到了 57、58 年，路慢慢……

来了以后，没有啥东西，都是这里盖个小房，那里挖个窑洞，不像个城市。那时候市政府在北关嘛，五天一会，在同官县，现在的东街往里走，就是县政府机关。57 年往后陆续慢慢往南移了。过去李家塔当矿长的也没小车，捷克嘛匈牙利买了个摩托不会开，叫会开得送，送到矿务局开会，开完会再送上去。58 年以后，慢慢有公共车，就这吧，断断续续，给你介绍这么些情况，没有意思。

**林：**我很感激。

**倪：**现在我给你说要是身体好的话，能说得清楚吧，前前后后还可以能……你有能力写报道，我自己写一本小说，也能写出名堂来，现在说不成写不成，脑子是……只能想着一点说一点。

现在你要想找找十里铺，有些人死了死了，有病有病，去也……有些还不胜我了，我还能说两句，有些人去了以后……江兴怀还可以说，江兴怀说话你听着有些吃力，他苏北口音重，王福坤不知道还在不在，哎呀，王福坤很难说在不在，以前还经常见面。杨五峰现在也瘫了，北区里还有周广森，不知道在不在，也多年不见了，徐家沟有个徐七楼还在，也是苏北人，还有个叫什么……范一勤回家了。

**林：**我昨天见了王俊彦伯伯说他和陆荣初伯伯他们准备把来铜川这批人搞在一块聚一聚。

**倪：**我也说这个事，咱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想说和你们年轻人聚会形式，就是 55 年来的这一批人里，最后一想也是，能跑能说的没几个人，都是病的病，瘫的瘫，没有用。说起来就是陆荣初、周寿根、林冲其、王俊彦，还有包钟祥，那人也是……放不出的屁，没有多少人了。

**林：**包钟祥也是和你们一块来开的，在芳草堤住着的

**倪：**跟王俊彦一起。想不起来，就这样了。

**林：**你抱病和我谈这么多，我非常感激

**倪：**确实很对不起，你不管和我儿子同学也好，我儿子回来也好，领着人和我不多说话，说不成。今天已经慢慢地给你想着说着，还能说两句，真正有些啥事了，他们说我不参与这些事，刚开场我给你说，咱这个人基本上是报废了，等着上火葬场了，没有意思，唉呀……

**林：**年轻时的照片还有吗？

**倪：**唉，照片现在也不好找了，看顾龙祥还有没有，我以前好像……现在不知塞哪了，不好找，照片不知塞在哪了。过去有，搬了多少回家了，找不着不好找，近十年还有照片。

要在 2002 年前，不得这个病，脑子思维还有点那个啥，说起来咱们这些人能到这程度，儿子女儿们对咱们够孝顺也都不错，都在家里边，房子里设备买这买那，都可以了，也就是说咱现在也满足了，不想不想……这了那了，好了就这结束吧。

**林：**行。你的几个子女都在哪儿工作？

**倪：**老大是桥山矿泉水，原来在政府机关，也不想干，自己在那儿干。你说你同学倪建荣是在警校。两个闺女都退休了，女婿在三建司经理也退休了，小女在郊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四个，两个男娃两个女娃，就这。

**林：**好，谢谢！

## 丁福珍

丁福珍，1955 年从上海来的三里洞煤矿，1984 年退休。



146、丁福珍家门前的过道



147、丁福珍在讲述中

## 四个人一天要装 24 吨煤

**丁福珍（以下简称丁）：**我们当时在第三建筑公司，然后归上海市建筑公司。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铜川矿务局介绍进来，来了 300 多人，跑回去也不少。到这里下煤矿你有啥办法，只好干了。弄到三矿，一天到晚，唉，苦得很，我们来时苦得很。你爸还好一点，为啥好一点，瓦斯检查员还好一点。我们就是拉小车呀，调到三里洞还是拉小车，一直拉到 59 年。到大跃进的时候，那才苦呢，24 小时都不能上来。现在老了又干不动，弄成职业病，还把职业病的福利去了，矿务局真没办法说它。你比如过去，咱老了死了，家属拿 287，现在死了只拿 130 元，福利不加还减。你像工令津贴也不给，工资套改的时间也没给套改，因为我们 84 年都退了，身体不好都退了，一直到现在打官司告状，工令津贴也不给。现在矿务局一弄给市上比呢，我们出啥力，他们出啥力，结果挣得还比我们多。国家提倡给我们涨工资增加养老金哩，他们涨 60 多，我们才涨 55。这还是 53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唉呀，现在我们都不能回想这事，回想这个事情真伤脑筋。你涨工资，应当分开增加养老金，我们那时出啥力，一下井浑身都是水。现在你市上谁出汗，市上现在上班站柜台能除汗？能和煤矿工人对比。我们长了几回工资，国家照顾我们，人家涨 50，我们涨 100，要不是这样工资才低呢。

目前来说，你像有病也没人管，（医疗费）一年就 200 多块钱，两瓶吊针一挂就完了。有些事情的确对煤矿工人太不合理了，医疗改革也好，都和市企业一样，市企业根本都没那些病，我们煤矿工人一到这儿，都是干一辈子，弄得一身病。天不下雨我们都知道天又要阴了，又要下雨了，浑身都疼，气上不来了。你市上有这种情况没有？没有。我们的确是把力出尽了，出尽也没办法，也不能给谁说去，现在领导上也不关心，我也想不起来了，脑子也糊涂了。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那时是怎么从上海来的？

**丁：**哎呀，你再不要说了吧。一开始在南京招工，招到江西上饶，53 年调到上海，调到河东第三土木工程处，又分了一个上海建筑公司。实际上那时我不应当来，我原来是团支部书记，到市政府学习 6 个月。支援大西北，咱响应党的号召，人家来到这里嫌苦走了，我也没走，我和你爸都没办法走，回去也是没有办法。人家在上海有办法的都回去了，那时我也一天到晚要求到地面来。还不差，一开始在三里洞弄三班大组长，管三班。身体垮了，我到临潼疗养了三四回。那张继忠，他是掘进队队长，我是水力采煤的大组长，任务只要交给我，我们都完成。弄到身体垮了，慢慢地就到辅助部门。实际上矿上对我也不错，身体一跨，就把我弄到运输区，把把井口呀，又把我弄到通风区维修，维修以后身体不行，就做炮捻呀，一直到退休。三里洞还是对我不错的，也只能那样，没有文化嘛，有文化早上去了。那时候马海珍是咱党委书记，马海珍、张继昌呀，都在这里，每天汇报时任务完不成。那马海珍把水给你倒上，那张继昌也是党委书记，那客气的很呀，哪像现在领导。就是陈大垠来说，也没有说出我不干，都是出死力干活的。现在有那老同志都知道，就是说话上，有一起说一起。你干部也好，工人也好，你不对就说哩，吃亏就吃到这上头。哎呀，暂时说到这，也忘了，有些事情也说不到项上。主要是脑子现在不够用，脑子现在糊涂的很。那天西安来检查，说我两个眼睛都是白内障，我现在只有一个眼（可以看见）。

**林：**刚来时你在那个区？

**丁：**从上海来在掘进队干了三年多，在掘进队把力出尽了。来的时候在东西大巷，就是东部和西部，送总风巷，又调到中间巷，送好就是拉小车，风巷送工作面都是拉小车，那坡度大得很。四个人一天要装 24 吨煤，还有拉车的，还有这么高的坡度。那时年轻有劲，拉一个小车不够后面还两小车，拉四小车一车煤，四小车就是一吨煤呀。只要车一掉道，四轱辘一掉道，这一个人一背，把这两个轱辘一支，再背那两个轱辘，板子一支，铁道一平，钎



子一撬就上道了。现在，嗨，你十个人也弄不上去。我们那时两个人都可以把车子抬起来，还四个轱辘掉了。一个人背，一个人拿板皮在下垫，那时有劲，现在不知道咋弄的，劲大的。那坡度，就这样的坡度，一次拉两个筐，拉两筐一吨煤，一个煤就是一顿呀，矿车还装好。24个煤，四个人，进4米道，装24个煤，还推到车上，还装起来。你现在能拿，妈的屁多少人也出不了24吨煤，拉小车。主要在掘进队把身体搞垮了，看着不行了到临潼疗养去了。头一次去疗养，就是把手砸坏了，还带着工伤去。待了两个月，回来几天还是弄不成。区长叫啥，我都忘了，李国旗，还有陈啥，我想不起来了。他说老丁你走吧，还去疗养去，到了临潼疗养院，马海珍已是八个疗养院的总书记呀，人家害怕临潼不收我，才出院你又来了。单位写了一封信，到了那个地方，迁到黄河疗养院，转过去。我到临潼疗养了五回，五回或是六回，一回都是去两年，健康回来，回来干了两年，身体又垮了。在掘进队时年轻还没人照顾，后来调到采区人家照顾我，照顾可不是叫你干轻活，还是重活呀。身体垮了你疗养去，疗养回来，你还继续上第一线。后来真是身体不行了，领导给调到运输区。人家调辅助部门把工资去了，我第一次调到运输区时，他不动我工资，这个原因连我也不太清楚，一直到退休都是六级工，一直到现在。退休以后涨了一次，七级工。人家退休是55-80%，我是100%退的，就700多一点。不过给国家也把力出了，其他我也说不了啥。

### 就我这一下，把二十多个人命救了

丁：井下工作也就是危险得很，我在三矿培训的时候，我的师傅叫张树楨，人家就给我说，大型的冒顶，15分钟要给信号哩，15分钟上头掉渣呀，一个劲地在响，那你就赶快走，撤离工作面。我经过好几次这大型的冒顶，到通风区采小块煤，我说不行了，卢家洪说为啥不行，不能撤。我说你是区长，我是个烂脏工人，我说你不撤不行，非撤不行，我现在不听你的。把人都喊叫出来了，卢家洪和我吵，我说你不要和我吵，马上就来了，能带的东西赶快带，不能带的东西就丢。没有二十分钟，轰一家伙，从机头冒到机尾，光剩下个溜子头了。咱是没有人，像那一次报到上面，起码是国家劳动模范，他不报，因为把人得罪了，你知道吧。那一下20多个人呀，就我这一下，把20多个人命救了。丢下东西刚跑到溜子头，卢家洪说你上去我处理你。处理我，我还要处理你呢，两个就在那儿顶起来。其实卢家洪也没有坏心，他人还是不错的。噢，人不听他的，他不让出。人家一听危险，有人喊叫，井下工人只要有人喊叫危险……到最后他也害怕，柱子看着一掰两节，东西是一点都没拿出来。还有一回，我已经到18分（队）了，唉呀，我看着害怕，木头呀，我看着噼噼啪啪，我说你不要呵煞，命早都叫住了，一阵子落下去后，我把一个人拉出来。顺着木头进去，其他人不敢进去，我进去把他抓出来，抓出来以后，我就吓瘫了。嗯，那个叫啥名字，我都忘了。我在通风区，要是卢家洪那里有啥问题就叫我去，哪里危险就叫我去。实际上后来改成18分队，井下情况分队嘛，哪里危险就叫我去，我有这条经验嘛。我在三矿，我的师傅在老采区呀，就是旧社会采过的。我一直都跟着师傅，他有啥情况，都替我守卫。到啥程度，这个天板非下来不行，你不管到哪里，今后调到哪个矿，有这种情况，大型冒顶，提前20分钟，15分钟，就给你信号。小的冒顶，它也有信号，不是没有，它先掉渣，掉的轻，大的冒顶，咯叭咯叭弄的，一开始半边压，半边压，慢慢地就出来了。我那个师傅叫张树楨，对我可好了。调到三里洞，咱就是没有文化，提不了干，就是那么回事，其他也没啥。

林：你讲的那个拉小车是怎么回事？

丁：拉小车，我给你说，低下有四个轱辘，上放小筐，八个一车，大筐就是四个一车，你挂一个绳子，就顺地爬着拉，把它倒在矿车里。拉小车就是人拉的，后头一根绳子背着，这样子拉着向前爬。讲个不好听的话，两条腿两只手都在地上爬，后头背个小车。拉拉我后

面再挂一个，一趟拉两个车子，倒一个矿车里。不管是煤巷也好，岩石巷也好，我进去以后，一接了班，拔出矛头就打眼，先掏槽，掏完槽以后我领2.4米的钎子，就要进2米4道呀，是吧，我今天下来几个人，就计划打多深的眼，要进多少道，一点都不能少。首先打眼，小车一拉出去，后来炮一连。人家打倒棚子，我还打不倒棚子。这一弄煤拉完了，眼子也打成了，药也放好了，再斜着一边打两个眼，最后两个双板要打四个眼，一下子翻着压过来，2米4的眼，一点都不能少。我还有经验，人家装炮的时候，填两锹土就行了，我不行，我起码要填700（毫米）深的土，土一深炮朝前攻，药量朝前攻，它不朝后退。大巷有时掏两次槽，我计划要多少道，非要打够哪些不行，实际上是两次掏槽一次放炮，先打几炮把槽掏出来，一般人都是一打炮泥装的少，它朝后带，顶出来了，知道吧，我非要装可多可多。我也不是先进人物，凡是哪一次，评奖都有我的，我家里（奖状）贴满满的就是出不了矿，不管是在采煤区也好，通风区也好，掘进队也好。在水力采煤区，我也凶着哩，隔二天，那锣鼓就打来了，喜报就送来了。话也说回来了，没人提拔你真是不解决问题，光是你干得好，给你一办，替你一弄，没有替你朝上弄。因为我爱得罪那些干部，哪里不对我就会说他，提他意见，就是这样子。我原先在掘进队，我的脾气不好，那里不对我就要说，你要我背地里汇报人，不。你不对，我当面就说，批评你一顿，就是这。你上去，张三李四王麻子，还客气的很，我就这优点，见干部也说，把干部也得罪了，工人也没落好，就这一回事。有些记不住，脑子也糊涂了。

## 有汇报说着火了，着火也不要紧，一样出煤

**林：**最早发生的威国其那件事你知道吗？

**丁：**知道，那是矿上刚移交生产，经验也不太足，他在底下清理煤仓，可能是头伸出去呢还是咋回事，刚好提不动，猛一松，钢绳断了把他砸死了，头一个事故就是这样。唉，头一个事故死的惨的很呀，真是惨的很。他老婆回上海了，他老婆还有一个娃没满月的。我到现在都懊悔，为啥，人家都不叫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到我家来，我年轻我也不懂这些事情。这是威国其老婆，现在回家回到上海去了，不知道干啥，咱也不知道。

我和你爸两个最好了，你爸去世的时候我真难受死了，哎呀，现在我也脑子记不清，有些事情我也说不了。

**林：**我报名下井，我爸不让我下。

**丁：**你爸给我说的嘛，能给他弄个临时工干干，也不让他下井，我也不叫他下井。我和你爸两个一没事就在一起编闲传，经常领我到你家，经常去，唉，实在……那时不管咋说，出力也好，不生那个气，干部工人统统都是那些钱，现在呢，妈的，很贪污呢。谁贪污也不知道，你也拿不出他的证据，你说不贪污，这楼房，装修一回，又装修一回，买楼房一买几套，那不是贪污的钱，凭上班挣工资，能拿多少钱，挣不来那些钱。现在人，他妈的，严密的很。

**林：**我爸那时一直是瓦斯检查员。

**丁：**瓦斯检查员，后来改成测风员，就是这个工作面有多少人送多少风，规定是一个人要4立方风力，没有这4立方风，咱矿上一般都达不到，一般都是3方多，问题在这里。朱岳如他是班长，我调到通风区是木工组，就是打密闭的。听从指挥，他们说哪里打密闭，那我们就去，工作面送不上风，那要找我们木工组，哪里放风，哪里没弄好。

你说陈家山那瓦斯矿，我们就在那儿说哩，俺一说就知道，你别看我没去。这个瓦斯大的矿，这些事情都是因领导，为啥，你正常通风，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再一个，你已经着火，你还出煤呢，你瓦斯严重，底下再着火，引起瓦斯爆炸。陈家山这个矿可惜呀，可能

到现在还没有出煤呢，真可惜呀。你要是按国家条例来说，根本出不了这种事故，他们来说瓦斯爆炸，唉，肯定现在是光生产不顾工人……有些事情，都是胡来的，没办法。再一个领导处理得不恰当，你像上一回瓦斯爆炸，明知道因瓦斯爆炸处理了，还能到省上当大官去了。上回他出事不要紧，只要完成任务，管他黑猫白猫，捕住老鼠都是猫。对不对，出事，这里处理了，调到其他地方，还升大的，他是这种思想。你看这回出这么大事，说不定处理了三个人，到其它地方又干上了。我那天看那个凤凰台，人家说的都是对的，把工人都不当人。干一辈子老了，一点福利都没有，说得可清楚了，就是这个情况，人家一点都没替你夸张。有啥福利呀，妈的屁，套改不给，工令津贴不给，国家该给的不给，谁打官司告状了，蹦得凶了把你抓上，还有啥，就是这个情况，没人管。你像现在，有个病呀有个啥子，巴不得你死快一点，死了就少开支嘛，问题就在这里，他明着也不敢说，暗里就这样。一说起来，你们工人闹事，这怨工人吗？根本就不怨工人。你该给工人就给工人，不该给工人就不给工人，是吧。还说我们矿务局穷，你们可以缓一缓，等我们有钱了再给你们，工人也能理解，是不是。他不说这，现在矿务局煤卖的……陈家山出事故了，陈家山不出事故，钱可多哩。他也没有说，那些老工人没有套改，那时矿务局穷，现在好过了，该给他们。

有些事情，人现在胡弄哩，现在对陈家山事故来说，我到现在心里都不服，妈的，国家给你设备这么好，你们把人死了一百多个……现在领导把人不当人，我还是这句话，陈家山超级瓦斯矿井，肯定有警报器，那警报器达到程度它都叫唤哩，是吧，你把警报器弄哪去了。直接是管理不严，你不下去查查看，天天下去看看，在井下发现超级瓦斯矿井出火了，你还叫生产，明显对人安全不那个。不过我也没去过陈家山，噢，根据人家说，这个事故都是领导的责任，不但矿上领导，矿务局领导，连省领导都有责任。叫我来说，你不经常管教处理还行哪，更不行，一家伙死了160多，真是。第一回死了40多呀，唉，处理的人，都上升了，都升了，还跑到省里当官去了，当时是在铜川市当官，还跑到省上当官去了。

这底下有个姚洪昌，你去了没有？

**林：**去了。你中间有没有想不干了，回南方去？

**丁：**没有，我一直都没有。因为南方没有靠嘛，不想回去，全家都没有了，都在西北，都是这样。你看我二哥在咸阳，现在死了，我大哥在兰州。我们原来都在一个公司，一个地点。我三哥是干了三个月就回去了，我们都没回去，过去我弟兄四个都在一个公司。现在兰州一个，咸阳一个，上海一个，这儿一个，就是这样，都分开了。那时候一心一意，就是把国家搞好，就是这种思想，没有说想往回跑，我们过去家太穷了，一直是跟共产党走，就是这情况，吃苦……

**林：**你子女的情况？

**丁：**一个在咸阳做生意，一个在矿上做生意，开小食堂。老大原来在桃园矿工作，身体不好，一弄，旷工处理开除了，现在没有办法也是做个小生意，开个小食堂，一天卖100多块钱。

**林：**他们经常回来看你老两口？

**丁：**那经常看，孩子都回来。你母亲后来死在南方了？

**林：**南方来的人都想回到南方去，在南方还叫我外公给盖了房子，一想已经没有机会了，送回去吧，死到南方心里也安宁了。送回上海，找大夫也没办法，后来就死在南方。我妈一月份去世，回来两三个月，我爸就有病，又到西安住院，那时候，我搞的呀，又熬到11月我爸又去世。不到十个月，我爸我妈都去世了，也是癌症。我那时才20多岁，20年了嘛。

**丁：**你姑还不是你亲姑，知道不知道？

**林：**我知道。他们俩都是要来的，我爸和我姑都是我这里的奶奶要来的。

**丁：**就是这也没人管了，现在才没人管了，唉……，现在连工令津贴也不给，你说说看，照理来说，现在工令津贴可以说过去，应当给人家是吧，出了劳力都是这些人嘛，你不给人

家。为啥工人一弄就骂矿务局干部，死掉以后，啥都不给。你像套改，平均出来 200 多元一个人，想想现在多少人，一共才几万块，不给就算了，还把人都抓。史家河一个矿长提出来，算了，现在矿务局穷，缓一缓，以后有钱了再给，弄这，好，一缓缓的不给了。霍世昌当局长的时候，还是沈浩，后来是安继栓，现在沈浩走了，来了个安继栓。沈浩是陈家山发生事故了，瓦斯爆炸死了几十个人，处理了。唉，处理没两个月，弄到西安去了，像霍世昌弄到西安去了，这回还是牵连霍世昌，为啥牵连霍世昌。说煤炭企业，你完成任务，我再给你拨 200 万，超额完成任务多少。底下矿长一听说弄 200 万，不要命了，警报器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就出煤。有汇报说着火了，着火也不要紧，一样出煤。为了一个拿 50 万块钱，一个局长拿 50 万，一个矿长拿 40，只要完成任务就行。结果还没有处理，谁不知道嘛，处理了三个人嘛。陈家山到现在还没出煤哩，我听说还没出煤哩。

**林：**人下不去。

**丁：**现在还下不去，说现在通风都通了嘛。我听说，咋说，退休工人有经验的，也可以去，领导新工人。再一个，就是到外面找一些工人，专职的，这也没人去，人招不来，现在工人招不来。

## 江兴怀

江兴怀，1923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曾任三里洞煤矿副矿长、工会主席，1983年退休。



148、江兴怀在讲述中

## 你不建设咋办，还得当亡国奴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们当时是怎么来的？

**江兴怀（以下简称江）：**我们是 55 年 12 月 18 号由上海到西北来的，一辆火车就是 340 人，那时周寿根最小，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他们都不安心干。也不怪他们不安心到铜川来，连一条马路都没有，连一间楼房都没有。路上七里铺还有个大山坡，小毛驴上山坡拉架子车，小毛驴拉着，后面有人推，没人推坡还上不来。那时到西北来也是没有大米吃，国家对我们南方人照顾还拨一些大米，在那时间大部分思想上也不安心，煤炭很重要，国家说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没有煤，飞机大炮都造不成，我们就要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就教育我们这些人，不管咋着安心干，所以就安心干，采煤掌子面干。那时间我们才到这干，可危险了，也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铁柱子，都是木柱子，所以，干干经常……拿三里洞来讲，一个月要死一个人，12 个月，有一个月不死人下个月都要补上。所以，有些年轻人在这儿不安心，我们感觉到为着国家建设，你要都像这样子怕死都不吃苦，我们还当亡国奴。拿我们这辈人，日本人在我们国家欺负中国人，随便拿洋灰刀就砍我们。我们这些人能建设到现在，你不建设咋办，还得当亡国奴，不当亡国奴，一定要干，哪怕今天干明天就死了，也得干，为着祖国的建设，为着工业的粮食，非常光荣的。那个史省长，陕西省长到这儿来，都亲自接见我，认为说南方人能吃这苦是不简单的。到这儿来连个房子都没有，我们到史家河培训呢，就是住在那个小草棚棚里，哪能安心，连水管都没有，打水哩，就这样坚持下来，一直到 57 年三里洞投产了，我们调到三里洞，就这样安心干。三里洞第一个工作面大部分是上海人，叫 211，所以就这样干，我觉得光荣的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替国家出那么大力就是非常光荣。以后孩子在这地方也上了学了，一上学，我那孩子又从西安矿院毕业，所以像这样就好了，逐步就改善了，我就简短地说这一点吧，不要说太多了。

## 在煤矿上能干到最后，而且还活着，那是不简单

**林：**讲讲你在矿上的经历吧？

**江：**开始在煤矿上干，这些工作很艰苦，有些低的地方还要趴着爬，一般的（高度）在 1.2 米，我们人都 1 米七八，1 米 2 就直不起头来，在里边趴着爬，就像这样爬，已经爬了十几年了，所以，到我退休时，工龄都 20 几年，我 83 年退休的。所以像这样，我就感觉到在煤矿上能干到最后，而且还活着，那是不简单。那时间煤呀，才卖 17 块钱一吨，弄弄还给人家赔光，现在煤翻身了，现在煤 200 多块钱，煤价提高了，我们生活也提高了。那时间我们来只有 32 块钱，以后到三里洞干干就是 6 级工，85 块钱，一直干到退休，我们都涨到 131 块钱，现在虽然说工资比不上年轻人高，我们现在工资已经 700 多块钱，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在三里洞开始当工人，干个年把多就当班长，就带了七八十人。又干了三四年，又当区长，又干了十来年采煤区区长，一个区就是 300 多人。感觉那时从旧社会来的人，大部分都不识字，所以给工人报个工，我们感觉到有困难。区长干了，以后又提拔到矿上当矿长，矿长不识几个字，原来在上海学过几个识字法，你这个很困难了，一个县团级单位，你不识几个字，经常到外面开会，这是很困难，我不接受，组织上陈大垠说，我们贫下中农不干叫谁干，叫地富反坏右来干，压制我们，不能干你也得干，你不能干好，你能干个啥嘛，你能挖出来煤就行了嘛，非要说那么漂亮的话干啥嘛，所以像这样又干有七八年矿长。以后我就向矿上说我都五十六七岁了，我该休息退休了。那时间东北来的高局长说，你退啥休，你再

享受两年嘛，干生产比较苦一点，你再干几年工会主席，管宣传的，有时外地来看看工伤、病号呀，组织上来看非常要紧的，所以，在工会又干了二三年，一直干到时间才退休，83年60岁，我今年83岁了。所以，像这样领导上提拔非常重视，我这人有困难，不识几个字，领导上硬把我朝上推呀，我那时要有文化我都上去了，就这样子不错了，一个大老粗，提拔到一个矿长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说，这样就好了，就这。

**林：**你在井下工作，遇到过危险吗？

**江：**这很难讲，就这些。所以上海来这批人呀，我们算不错的，我孩子原来上西安矿院毕业出来，在科技处搞科技，又搞微型电机、自动推车，就这样的。再一个我孙子又到部队汽车连当兵，国家看能用上，又当汽车连连长了，现在媳妇也娶了，也有孩子了，今年也30岁了。一个小孙子，现在耀县新区搞电器维护，所以，下一代生活还是不错的。不管咋说，我那儿子矿院毕业，大专文化程度，也是不错的，就这。

## 王福坤

王福坤，1927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1980年退休。



149、和老伴坐在一起的王福坤在讲述中



## 说到西北也挺好的，也有太阳

**林鑫（以下简称林）：**把你们当时怎样来的，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讲给我们晚辈听一听，平常儿女们也不一定愿意听你们讲这些事，现在人不听这些事了。

**王福坤（以下简称王）：**谁也不讲，我们已经……讲啥嘛，都完了。

**王福坤妻（以下简称王妻）：**你爸在哪里，在三里洞还是一矿井？

**王：**在三里洞，朱永生是老实人，你爸是老实人，太仓的，你老家是太仓的，江苏太仓。

**林：**我爸妈都是太仓人。

**王妻：**你姊妹几个？

**林：**四个。

**王妻：**你是老大？

**林：**嗯。

**王：**南公房有葛登发。

**林：**我都拍了，葛登发、姚洪昌我都拍了。葛登发的耳朵听不见了，他能说。戴着助听器都不行，我得大声喊叫，刘梅娣阿姨在旁边替我翻译，勉强能听懂我的话。

**王妻：**他老婆身体还好吧？

**林：**很好。

**王：**陈龙根……

**林：**陈龙根不在了。

**王妻：**陈龙根早都死了。

**王：**北公房那个窑洞他在这边，我们在那边。

**林：**听你谈谈当时是怎么来的，全当给你侄子讲一讲你们当年的经历，就这么简单。

**王：**当时人家这里去了三个人，矿务局原来是老矿务局嘛，去了三个人，根据上边的指示支援大西北，大西北嘛固然穷了一点，我们那时年轻也不知道煤矿咋回事了，那个时候旧社会和新社会不一样，新社会开会呀，这个……

**王妻：**他来时才 24 岁呀。

**王：**现在上电视呀，过去什么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就是开会呀，说到西北也挺好的，也有太阳，那是笑话嘛。我们也不懂，年轻时不懂，那时幼稚，对吧。因为我们这批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文化的，旧社会也穷，谁上得起学，上不起学，穷得很。就这情况，支援报名吧，报了名光荣嘛。那时讲思想、讲政治，不是现在，现在讲钱了。你这个思想好不好对不对，报名人家不批准还哭呢，批准的敲锣打鼓戴上红花，咱们来时包了三节车厢坐满，对不对，三节车厢不少人哩。

**王妻：**300 多人。

**王：**不是，我们可能 500 多人，到这里，跑回去不少，一节车厢 100 多人哩嘛，也就是三四百人，400 人左右。但是下了车，有人跑了，下车以后就有人跑了。后来矿务局一考虑这些人不行，跑完了咋办哩，就通知车站，通知各个运输地方，是南方人，没有证明不叫买票，所以人就跑不了了，这就跑不了，你这些人就没办法了。那时交通没这么方便，来的时候是五一车站那个小棚棚，没有车站，对吧，就是一个棚棚。来的时候相当艰苦，我们南方人……

**王妻：**土坯墙，夏季雨把土坯一下塌，人塌死不少。

**王：**南方人，你想吃大米，到这里没有大米。当时讲，食堂里大米卖给我们，不卖给他们吃，一说话就听懂了，我们一说话他就知道，这是上海人，这样情况。我们来的时候相当……

**王妻：**面都不是好面粉，都是发芽的面呀，一下雨麦子捂到那儿都发芽了嘛，长芽这么

长，咱吃不了，蒸馍也不会蒸，擀面不会擀。结果南方人照顾买大米到粮站去，面不要都可以，你们现在晚辈都享福了。

王：你们现在都享福了。你说哪有马路呀，都是土路，一下雨，一鞋下去就这样子，五里铺一下开到七里铺没有人，以前七里铺草公房嘛，也没有戏院、电影院。

在上海都是建筑公司的，四公司、二公司是两个单位，建筑公司整个是一个局嘛。第一公司、第二公司抽了一部分人就是这样子，最准确是多少人呢？王福良也死了，王福良是带队的，他知道是多少人，他清楚，他死了，王福良你不知道吧，有人说了没有？

王妻：王福良死了，他老婆在五里铺住。

王：现在还有谁呀，现在还有童侑知道。

王妻：你知道童侑在哪里，童侑在大厦后面山上。

王：80多了。

林：现在我一个个打听，别人给我说上一个我再去找。

王妻：童侑的闺女就在我们骨科医院里，在挂号那地方。

林：我今天就是着重拍伯伯和阿姨，拍完了我再一个个去找。

王：到这里领导也是很照顾的，有大米先仅南方人吃嘛，对不对？不习惯生活，不习惯菜，都是生菜。像你爸他们来，我们都不吃生菜，我们南方人都不吃生菜，吃炒熟的菜。他说生菜最好了，招待你。到这来培训一年，咱们来的时候，不知道都到井下了，工作生活辛苦对不对，因为你上海人到这里。当时来的时候，老实人呀一般都没走，调皮捣蛋的都跑了，张金龙没跑。

王妻：我以前在北公房下面党委院里住，以后搬到火车站对面那个公房。

王：那是南公房。

王妻：服务大楼后面。

林：现在要拆掉了。

王妻：那都是土坯，年数不少了，58年、59年。

## 死了的死了，退休的退休，回老家的回老家

王：你咋想起来弄这个事？

林：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小，我父母在的时候也没有问过他们，那时不管的，不操这个心。

王：不是不操那个心，在那个时候也正常，小嘛，年轻，到现在四十多岁，基本上成熟了。

林：现在我父亲都死了二十多年了，我问谁去。想记录下来，趁你们这些人在，记下来，这也是一段历史，你们也是一批人呀，整个一代人，矿工的缩影，记下来。

王妻：徐家沟还有两个人，见面都不认识。

林：不认识呀，一个个问，认识了这么多伯伯叔叔们，才知道了你们这一代人，叔叔阿姨都对我好得很，老同事的儿子嘛。王伯伯是哪一年的？

王：27年，我今年78了。三里洞原来算国家机械化矿井，这矿井是重点矿井，我们这批人来了就是为三里洞培训的，就在其他矿培训。57年7月1日，三里洞投产，我们这批人整个都回到三里洞，都分开了，有采煤的，有掘进的，有通风的，当时三里洞矿井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属于现代化矿井，所以我们这批人整个都到三里洞了。我当时是在一采区，是和陆荣初一个采区，陆荣初、江兴怀。刚去就那几个采区嘛，后来扩大了。掘进队呀都分开了，掘进队也有，采煤上也有。当时情况三里洞还是可以的，对吧。现在还算三里洞人最多，虽然调开了，三里洞是最多的。当时三里洞是死了的死了，退休的退休，回老家的回老家。

**王妻：**那缪德新和你一起来的。

**王：**他离市区比较近，离街道也比较近。现在是铜川市，原来是铜川县，对吧，这些地方都是刚刚发达起来的。原来这个矿务局对门就是一个卖水煎包的，没有啥小房，这几年发展起来就是这情况，看起来像个样，像个铜川市，原来不像嘛。国家有标准，达到什么程度才变城市，一个人口占多少，人口也少。这马路是 57 年 58 年修的，原来是土路，整个土路。现在看起来不是铜川，全国都发展了，交通又方便。以前就是落后嘛，就是落后，对不？现在你到上海去都不认识了，不要说你们，像我都不认识，50 年了嘛。

**王妻：**你老家都有谁。

**林：**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王：**在上海吗？

**林：**上海一个，太仓一个。

**王：**太仓离上海一点路嘛，路又不远，这可以了。

**林：**我姊妹四个，两个在南方，两个在北方，我小妹妹接班了，在三里洞矿干了十几年买断了，矿上给了一万块钱。

**王：**不是退休？

**林：**买断了，她年龄小嘛，30 多岁，给了一万多元，十几年工龄。

**王妻：**听说买断工龄也可以上班。

**林：**你要有本事，可以联系别的单位，你到哪儿找单位呀，现在都不容易呀。可以到王石凹矿上，她不想去。

**王妻：**那咋办，现在回家了？

**林：**在家待着嘛。

**王：**你现在招也是个临时工，打工的嘛，现在这个社会体制已经变了嘛，一般都是私人的，就是到国营企业一般都还是聘用制，临时工。帮老板干了打工的嘛，这样的情况嘛，整个变化了。所以，这个社会慢慢都变化了嘛，现在这个情况。作为我们来讲，以前确实吃苦了，那时下煤窑可不是现在，过去下煤窑说是八小时呀，都是十几个小时，没有十几个小时上不来。完不成任务还不行，四班交叉作业，你这班下去了，你这班没有完成，他帮着干，你完成你走，可紧张，那时可紧张。现在病的快死了。现在下煤窑一般工资也高，原来工资也低，原来工资最高就是七级工嘛，就算高工资七级工，江兴怀退休了也就七八百块钱，就这样。你到南方就不能比了，光工资，我们上海最低的工资一千多，一般都是两三千、三四千这样情况。相反的比较，这个地方生活水平比较低一点，从市上这样情况，对吧，三里洞还是这情况。他说计划是（开采）60 年，40 多年完了，呵呵，就这情况，没有煤了，还不就……我们这批人就这样了，在这里落户了，成家了，就这样情况。

**王妻：**回不去了，娃都在这里。你这个弟弟、妹妹到上海有两个，我们全家都在这里，对吧，最远的就在西安，大部分都在铜川，就这情况。就这样，一辈子就完了，还能混几年，就啥也不知道了，对不对？人都是这样情况，就这糊里糊涂一辈子过去了。你这个还有心情，整个还把这个……父亲死的早，整个情况你也不了解，咋来的咋干的。他也这里生的。

**王：**他这里生，小嘛。

**林：**我没有在矿上下过井。我那时给我爸说家里比较困难，我高中毕业了，家里姊妹几个，我说我报名下井吧。

**王妻：**你下乡没有？

**林：**我七八级，刚下乡那阵，说老大可以免下，留下了，我想报名下井，我爸不让我下。我干了一辈子，你在家待业吧。不让我下井，说啥不让我下井。为了姊妹们好，给家里挣点钱，老大呀，老在家待业也不是个事。其实从心里面说也不想下井。弟弟妹妹都小，就我爸一个人上班，家里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对我爸说，算了，我内招到矿上下井吧。我爸

说不行。当年大学没考上，下井我爸不让下，80年我就考到银行，离开煤矿了。

**林：**这是您儿子？

**王妻：**女婿。

**王福坤女婿：**刚回来拍噢。

**王妻：**他爸和你爸以前一起来的。

**王：**他爸死得早，他爸和我们一起来的，都是上海过来的，他爸死了20多年了，他现在是找我们这些老家伙回忆经历，咋样来的，他不知道，他爸没给他讲过。

**王妻：**45岁，他和我老四一样大。

**林：**现在还活着还都健在，再过几年就不行了，看着这个不在了那个不在了，慢慢就没人了。像我们这一代人就不了解这一段东西了。趁他们在，希望把他们当年的经历讲给我们听，我们作为晚辈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除了我们作为矿工的儿子我有兴趣做这件事，别人没兴趣做这件事，别人不关心这事。所以，我们试图将这段历史用影像记录下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我有时想，别人都围着市场转，围着领导转，我试图把这做下来，所以王伯伯你尽量详细地将您来到铜川三里洞以后的经历讲给我听，你只讲你个人的，他们是讲他们个人的，每个都不一样。你给我讲你个人的经历，讲给我听就行了。

**王：**咳，经历就是下煤窑的嘛，对不对？

**林：**你遇到过冒顶这些危险吗？

**王：**那有。

## 井下这玩意，一不小心，就要发生事故

**林：**就你个人的经历怎样脱险再提一下采煤的情况，因为我没下过，就完全不知道，讲给我听。

**王：**当时这样情况，一到三里洞，我啥都干过，放炮员也干过，打眼放炮，支锚工也干过，就是支柱嘛。到58年我就当班长，带一班人下井，这样情况。就是在井下危险性比较大，有些情况是人为的。比方讲，支柱支起来，有些支锚工也有不負責任的，打在虚煤上呀，没有打到底，它松动，顶板一压，它下沉了，这样情况，就是讲容易出事故。这话咱也经过这些事情，对不对？冒顶这个东西害怕人的，井下这个工作，顶板来压的时候，它没有时间的，他说来压就来压了，顶上这么厚的地层，一压的话，责任，特别是班长责任大得很，你发现啥情况把人都要撤出。所以，这情况你脑子不灵活的话就不行，要发生大事故，班长就不好当，你要负责任产量还要负责安全，出了事故，你班长都有责任。那时在我班里死了三个人，就是一块石头下来，死了三个人。两个撬煤工，往溜子上撬煤，一个是支柱工，这个东西就是我下去之后，当时情况是，晚上的班，他主要是……所以，井下这玩意，一不小心，就要发生事故，脑子要灵活，牙还要紧，腿还要快，手脚都要快，所以井下工作相当艰苦的。下井的时候都要带俩馍嘛，中午要吃饭，咸蛋你自己带，你带去吃饭。有些人一般还不带，因为他不习惯，底下灰尘比较大嘛，煤尘大得很，这种情况相当艰苦。所以，一般来说，完不成任务，首先班长最辛苦，工人走了，班长走不了，班长交接班，哪地方合格哪地方不合格，哪个地方不安全，你们处理，都是事，对吧。你上来以后完不成任务，区长说起来要扣分，我们批评批评，到调度室不盖章你工报不了嘛，调度室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你完不成任务嘛，怎么完不成啥事啥事？多得很，等那儿。（早上）八点钟的班，应该（下午）四点钟下班了，实际上我（晚上）八点还没有到家呢。十二个小时都到不了家，所以，辛苦的很，当班长比工人辛苦，这样情况。像我这个经历就是原来当区长，当副区长，那时陆荣初当正区长。那时人可以，那时人提拔不是现在提拔，提拔你就是得一个时间，对不对？看你胜任

这个工作了，就任命你了，不是现在，那时考验了，对不对？现在是一弄一报就行了，那时不行，那时要考验一段时间，对吧。最后我就有病了，得了风湿关节炎，以后把我调到地面，调到选运区，又干了一年多，当中心班长，管三个班。不行啊，好了好了又叫我回采区去，还要回一采区，哈……我说我干不了，不行了，我说大学生干，弄不了，不行还要干，你先干了再说。干了以后，徐家沟投产了，把我们一个区，6采区，把我调到6采区当班长，整个支援到徐家沟，我还到徐家沟待了几年，到徐家沟以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66年了，徐家沟66年投产，投产以后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们不去武斗，有人参加武斗了嘛，我们就是还坚持生产，生产也是边干边不干的，工人也没心情嘛，上头武斗他有啥心情干呢，所以混了几年。到67、68年，我这个病又犯了，最后我就鉴定，就调到地面去了，不下井了。调到地面看看风井，风井看几年，后来又支左解放军，后来到陕南铜矿，他叫我去。阳平关过去燕子砭，去了以后，领导一看工资太高，咱七级工，工资高，不行，人家接受不了，又回到矿务局。矿务局又办了个铁厂，最后到铁厂去，在铁厂干干，矿石是从河南焦作弄来的，没有就地取材弄矿石，到外地弄矿石，那都是我去弄的。到焦作弄了以后这个成本太高了，好矿石他不给你，含铁量70%以上的他们自己用了，50%的给你，40%的给你，所以这个成本太高，铁厂又不行，铁厂和供应处就合并。把这批人弄到供应处当采购，七几年物资相当紧张，到处跑采购，结果到北京住了三年，当采购嘛，常驻北京住了三年。我们这个采购不是光住北京，常驻是北京，华北地区有事你都要去，太原、包头，哪里有事你都要跑，石家庄呀，唐山呀、天津……这边属于北京这个点。最后唐山地震，回来以后又把我调到上海住三年，还是采购，采购紧固件、螺丝、螺帽，就是井下用的、溜子上用的螺帽、螺丝，三年以后回来还是搞采购，在材料科。原来班长是干部在册，为啥，后来粮食紧张的时候，班长这干部就30斤粮，不行呀，班长工人在册56斤粮，咱都是一样的。毛主席那时的官不好当，哈……当那官干啥，这样的情况，就这样一生。我80年就退休了，因为我是职业病，下煤窑下了十几年了嘛。80年我才50多岁就退休了，一生就是这样情况。我这跑地方比较多，当采购跑了有十年了。

子女基本上都招工了，老大在鸭口下井了，老二也在下井，因为我在徐家沟嘛，老三是招工了，后来都调上来了。老大在西安航天公司，航天公司到这里招了一批人，把他弄到西安去了，他现在退休了，50多了。老二也退休了，老三在三里洞退养，他不够年龄，今年六月份才够年龄正式退休。退养就是205嘛，到六月份正式退休。老四嘛，他是下乡的，88年招工招出来在红旗工程处，现在下岗，他和你一样大，45岁。老五是人家铁路上招工招走了，5个儿子。大闺女接我的班了，小闺女是大集体，供应处的。子女就这样情况，就是一个老大去了西安，其他通通都在铜川。

**林：**你把下一代安排的还可以。

**王：**噢，基本上可以。哈……哎呀，现在是糊里糊涂了，咱还能混几年嘛，大部分都不见了，对不对，就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要找人，你要找童伢，他还知道一部分。童伢的话，你到我们的骨科医院问小童，他们就知道了。他闺女在骨科医院里，咱们这工程处，你找到她，就找到童伢了。他现在住了个公房，在哪里呀，在虎头山那里，小河沟那里，具体我没去过，我见过他。

我说你可以呀，你这个当晚辈的还能有这个信心。

## 繆德新

繆德新，1936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1958年到桃园煤矿，1984年退休。



150、繆德新在讲述中

## 说是支援大西北建设，那是骗来的

**缪德新（以下简称缪）：**说是支援大西北建设，那是骗来的。我52年参加工作，我们上海建筑公司这批人也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个房地产公房修建公司，就是上海的老房子修建，后来，我们属于上海建筑公司了，我们是53年并过去的。55年的时候，铜川矿务局来了人，原来是要到兰州矿务局的，不知咋回事到这儿来。我们来的时候，对西北这地方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什么煤矿呀、下井呀，一点都不懂，在上海就根本没见过。那时年轻才20岁，我今年70，到铜川来整整50年。那时年轻，一开大会做个动员报告，把这西北情况谈谈，说煤矿建设需要人。那个时候主要讲的是西北地区工资也高，生活水平也可以，再说你们过去，那边有房子。想带家属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房子，有住的地方。其实那时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那个时候一动员，这是属于自愿吧，想来的自己报名，不想来也可以。结果，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一块说，上海这个地方工资低的很，那个时候才40几块钱，那个时候40几块钱很值钱了，那个时候钱管用。他说西北地区工资高，一月开100多，这个那个。几个年轻人一商量，去不去，你说去，他说去，三说两说来，自己报了名，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等到啥手续办完了，回家迁户口了，父母才知道。像我这个情况，父亲说你这个时候才来说，要早一点说我不叫你去，他来过这个地方，知道西北这个地方生活也不是老好，我们来不习惯。没办法了把户口一迁，直接到这儿了。刚到矿务局，在五里铺老火车站，矿务局在老矿务局。矿务局领导来接我们，看起来还挺隆重的，接到矿务局礼堂，大米饭红烧肉，上海人爱吃米饭嘛。可到第二天就不行了，米饭吃不上，吃馍了。哎呀，把我们吃的肚子难受得很，慢慢时间长就习惯了。最后的话，就是在一矿培训，三矿也培训了一批，都是给三里洞。三里洞煤矿56年移交生产，把我们这批培训人员整个都拨到三里洞去了，有的是生产第一线的，有的是第二线的，有的是运输区的，有的下井挖煤了，有的搞掘进的，有的开绞车的，有的当电工的，啥都有，情况嘛，就是这样。到58年的时候，桃园矿移交生产缺人手，当时我们培训6个人，给三里洞留了2个、桃园矿2个、王石凹分了2个。我分到桃园矿，在地面干到64年，生活也不行，人口也多了，慢慢地就参加生产第一线了，第一线工资高一些，地面工资比较低。到83年，我又到陈家山矿，那时身体也不行，有病了。到84年，那时我才48岁，不到50岁，我的职业病批下来了，我一看身体也不行，干脆退休算了，在陈家山退了休，一直到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作为我们来说，确实话，这一生呀，把力出了，也辛苦，对国家也没有什么贡献，碌碌无为吧，看我条件住的还是烂房、平房，对不对？对矿上贡献也不小，也没落个啥，有啥意思，我这是白白地过了这一生，也没啥收获，情况就是这样情况。反正像我们这批人来的话，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武斗的时候，还死了不少人，剩下的也不是很多，现在也就是几十个人吧。刚来的时候，好多人生活不习惯，吃面吃不习惯，都跑回去了，跑回去有三分之一。像我们这些人那时太老实，实际要跑回去也跑回去了，三年嘛，在上海呆三年，三年以后户口给你解决了。咱这人太老实了，也没有跑回去，跑回去沾光了。跑回去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牺牲了一部分，现在老了，老死了一部分，剩下是寥寥无几了，在这里小河沟还有几个一块来的，一个叫叶永康，他是红旗工程队的，现在早都退了在家，一个是成妙祥，供应处就是王福坤吧，其他没有啥。南山有一个也死了，三里洞人多一点，现在时间长了，也不来往，名字好像也想不起来了。三里洞那南公房。

**林鑫（以下简称林）：**南公房没有，我一个人没有找到，周寿根给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谁，有人不在了，有人回老家走了，没有一个人了。

**缪：**有的可能是回家了，北公房有……

**林：**北公房多，北公房拍了五六个人。

**缪：**其他地方，有的都不在了。

**林：**五十年过去了，不容易呀，你们这一代人来的时候都二十来岁，现在拍的时候都已白发苍苍，你把在矿上的经历给我讲一下吧。

**缪：**开始来的时候是在一矿培训哩，现在每个矿都有。在一矿就是无极绳嘛，煤从井下提上来，用无极绳提上钩，一直拉，五一路火车站有个煤台，就是把这个矿车一直从矿上拉到五一路那个煤台，我在那个地方就是给他翻煤哩，有一个罐笼，把矿车往罐笼里一推，把电门一开，罐笼一翻煤就倒下去了，倒下去以后，空车就出去，重车就进来，搞这个工作。后来三里洞移交了，我在三里洞井下也是搞这个工作，后来58年桃园矿移交生产了，也需要翻车嘛，就把我们那个叫王啥，他后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回家了。现在上海浦东开发了，原来浦东是郊区嘛，我的户口是市区。那时有一次机会，就是户口在郊区的不想在这儿干可以回去，结果我走不了，人家机会好，人家走了。后来到64年时，家里人口比较多一点，4个娃，两男两女，在地面上说老实话，工资也不高。所以自己要求到井下，井下虽然苦一点，收入要高一点，在桃园矿掘进二队干了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文化大革命休息了三年到四年，那个时候整个矿上都瘫痪了，文革开始时，点个名呀，人到一到现场，最后人去也不去。在68年以后，工作恢复正常了，一直干到83年，84年退休。退休以后啥也没干，一直在家，身体也不是老好。不过说起来，我这个寿命还是长的，好多人都死了，我不管咋说还活着哩，就是那回事，其他也没有啥意思。

## 掘进是为采煤开路的

**林：**你状态还好，我拍采煤的、开绞车的多，掘进上少，您刚好是在掘进待的时间长，你把掘进方面的工作经历给我讲的细一点。

**缪：**矿上一个掘进队，一个是采煤区，掘进是为采煤开路的。采煤的时候，他必须有那个，地面上叫皮带运输机，井下叫溜子，铁槽子，地面上是皮带的，井下是铁槽子，铁槽子转把煤运出来。我们掘进队是跟这个采煤区打基础，给他送这个工作面。你比方说，这么大一块煤吧，我们掘进队从这个地方给他送进去，送一条路就是送一个巷道，送到以后，给他分开。把巷道弄好以后，他们采煤区才可以进去，铺开槽子，溜子可以铺开。然后，打眼放炮，把煤崩下来往里面装。井下那个斜井，煤翻到斜井里面了，斜井下面还有一个巷道，上面是个巷道，下面是个巷道，走矿车的，煤倒到矿井里边，下面有矿车接住，接满以后，拉一溜子，运输区有电车，电车直接把煤就拉走了。电车把煤拉出来，把空车给他送进去。我们的任务是只能给他送巷道，送好这个地方，他们才能进去，我们不送他们进不去嘛。所以，我们做的活，不管是遇见石头，一半石头一半煤，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地方打通。我们任务主要是打眼放炮，把这崩下来的煤呀、石头运出去，给采煤区做好准备，掘进任务就是这样子。先掘进后采煤，没有掘进他就采不成煤，主要任务就是这。我那时候干的主要就是打眼放炮，一般掘进队是三班嘛，三八二十四个小时，三班倒。一个班有三个组，一个组送一个巷道，三个组送三个巷道。比如，我们二队是为二区干，三队是为三区干，一队是给一区干，就是各有各的任务。煤矿上其他也没有啥，就是掘进干掘进的，运输干运输的。我在井下掘进上也负过伤，不是太严重，有一次，放炮太近，一般距离近的话，放炮的话转个弯，你要是直放那不行，必须要超过50米以外，井下都有规定的，距离近了，崩到人咋办。主要是年轻，为了赶任务，近一点，近一点，慌的，放吧，放吧，一放，崩了一块石头，大概这么大，危险得很，要崩到胸脯上那就麻烦了，崩到胳膊上赶紧到矿医院，把石头取出来，受了点伤，其他也没有啥。我那老大娃也在矿上，桃园矿下马了，他也下岗了。他现在还在那私人矿上，他是瓦斯检查员，专门检查瓦斯。井下因为瓦斯量大小都是用仪器来测的，超过一定的浓度的话，就不能干。陈家山矿不是因为那引起瓦斯爆炸吗？那玩意厉害得很，他



干的就是检查瓦斯的。我那个老二是宝鸡公安局的，他原来是当兵，从部队复员到宝鸡。几个女子在市上，不管咋说孩子们都有工作，不用我操心，我们老两口就是那一个月几百块钱，够吃够花了，哈，就是那个情况。现在也没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想法，过一天说一天吧。你说原来想回老家吧，其实我老家还有个妹妹，再没有人了。我母亲去世的早，在我9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父亲后来又娶了一个生下我妹妹。再说，他妈的，咱回去有啥意思，啥意思也没，就挣那几个钱，回到上海去叫人家看笑话，人家把你当要饭看，对不对？上海那个地方高工资高消费，所以说还不如算了，就在铜川吧，将来死在铜川，埋在铜川吧，就是那回事情了，有啥意思。不管咋说吧，想当年说起来怪好听的，支援大西北建设，算是把这个责任尽了，再没啥想头了，现在咋，现在有谁管，根本就没有人管咱，情况就是这。你看看我这个家里，这个条件不行，差得远。主要那个时候人口太多，六个娃，三男三女，就指望我一个人把他们养活大，确实话也不容易，不管咋说，把他们都养活大了，工作的工作，成家的成家，行了。不管咋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这回事，该干的任务，我也干了，该完成的我也完成了，哈哈，好了，就这样。

## 成妙祥

成妙祥，1934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已退休。



151、成妙祥在讲述中

## 我们那时候思想也动摇

成妙祥儿子：你和我家荣妹是同学吧？

林鑫（以下简称林）：噢，你是成荣妹的哥。上中学时成荣妹和我是同桌，她现在哪儿？

成妙祥（以下简称成）：在长安大学。

林：噢，后来是哪一年在街上碰见过一次，后来再没有见过，我们俩光坐同桌都好几年。

成：她有时回来仓促的很，问过你，我说见过，在银行，不知在银行嘛在保险公司，我说，反正就在育才小区那个地方。

林：像你们这一代人，我小的时候，听我爸他们整天聊天，人名字都知道。好多人，包括王俊彦，搞不懂他名字的发音，以为是叫黄金叶，怎么这个人的名字和香烟牌子一样，叫黄金叶。

成：王俊彦后来在五里铺。

林：在供电局后面住。

成：他是苏北人。

林：他也是一起来的。

成：一起来对着哩。

林：高章顺是否和你们一块来的？

成：一块来的，他在那个三里洞桥头，现在那房子扒了。

林：扒了，我现在找不到了。上个礼拜见丁福珍，他说你找不着找我，我把你领到他那里。

成：还有个叫毛阿龙，还有个叫沈龙根。

林：沈龙根我找到了，毛阿龙他现在在北关租的房子，新房子还未装修，还未搬过来，来回跑着呢，我说回头到北关找他去。你怎么从上海来到这儿，整个经历，一直到现在，给我讲一下。

成：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来的，我是52年参加工作，53、54在上海搞建筑，搞得很好、很凶的，54年以后到55年初，就是说蒋介石往大陆轰炸，就是往上海轰炸，上海就开始考虑建筑，那时不知开开几大会议哩，考虑到在哪里建设，就给我们学习，好像到内地建设，沿海地区好像不太安全。工长就给我们说，建设到处跑，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大力支援，就这样。刚好那时候建设任务也少了，因为我们都是国营建筑公司嘛，建设的少了，少了就整天学习，拿个60%，那时几十元一个月，拿60%，刚够吃饭开销。刚好去了两批人，一批是铜川去的，招我们到这里来建设西北。另一批呢，到淮南去，考虑到那时淮南比这儿还苦，这里西北铜川还比那边强一点。

1955年12月18日嘛几号，我记不清了，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在井下，地面上很少，都在井下。井下就是一个师傅带一个人、带两个人的，主要照顾我们安全。开始不习惯，下去4个小时就上来了，后来慢慢8个小时，跟着师傅。到半年以后，成立个培训区队，我们一直在采煤上培训，差不多几个工作好的，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担任领导。他们派有老工人，就说担任区长、班长，就这样开始干了。55年底来的，56年在一矿，57年三里洞投产就开始有独立生产的能力了，三里洞成立两个采煤区，一个是康拜因采煤区，一个是□□采煤区，就这样，一直在三里洞干了十年。后来矿务局进一步发展，我们的300多个人逐步调散了，开头最先调的就是王石凹，后来是徐家沟、鸭口、东坡，再进一步陈家山，慢慢地各个矿都有。

当时我来的时候有好多思想动摇的，也跑回去不少。因为煤矿工人太艰苦，费劳力太大，钟点还多，一般来说都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吃不了那苦，有些都跑回去了。再一个加上

井下的工作相当危险，我们那时候思想也动摇。因为家庭条件不一样，上海那时工作也不好找，来的时候把我们户口（都迁来了），那时户口粮食关系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就扎根在这里，咬住牙关就一直搞。我还调了好几个矿，从三里洞调到鸭口矿，我也担任过区队领导，人家给我分配了房子，那个地方不行，因为往铜川来一次都不方便，交通很不方便，所以说，房子都批好，一直都不往上搬。后来又想办法调到桃园矿，一直干下去。干、干、干，后来年龄大了，下不了井，又到地面上。咱的文化也比较浅，刚好还用上了，在食堂里当了几年管理员，后来一直干到五十多岁，职业病下来了，允许退休了，后来才退休了。

## 害怕也不行，干这一行没办法

**林：**你在上海自己是怎样考虑要来的？

**成：**那时考虑，去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南方人多少比北方人有文化，意思说你们去培训一年，都是领导干部、骨干。我们来的时候，也工资很小，只有37块5呀，来的时候，当时上海刚好停止建设了，等于现在待业，待到那里和下岗一样，光给点生活费嘛。后来一考虑说年轻，两个哥哥都不允许我来，你来了就扎根到那儿了，回来可是不容易了。我当时也考虑了，到哪里都是为了工作，大的方向来说，是响应号召，为祖国建设，从内心来说，也是谋生活嘛。来到这里，一下去就是采煤，打眼放炮，就是最苦的一个工作，不像姚洪昌他们开绞车的、机电工、机电师傅啦、开压风机啦，他们文化比我们高一点，我们那时候小学都没毕业。

**林：**你把那几年采煤的经历比较详细的给我讲一下。

**成：**采煤那经过，没什么讲的，一下去就是打眼放炮，那时也不会。教我的师傅是徐州沛县那地方人，老乡很好，照顾我们非常好，就跟着他学。他说你既然要扎根在这里干，你就要好好地学，打眼的角度、放炮的方向、炸药量大小要好好掌握好，哎，我也有耐心跟他学。我们55年来，56年工资就改革，头一次改革国家就定下了打眼放炮工达到啥标准拿几级工，那时候我单独工作，打眼放炮工就直接是6级至7级，我就评个6级，人家老工人都不服呀，老工人说这来了不到一年就拿6级工。就说你眼打的好、炮放的好，主要把煤放下来其他东西不损坏，不打倒。底下也有设备嘛，你稍微药大点就把整个都炸翻了，药装的少就打不下来嘛，所以说，这样来衡量。那时候来的6级工评的也不多。陆荣初啦，江兴怀啦。

58年大跃进，那时相当艰苦，那时已经7级工，家属都来了，所以安心立业，就扎根在这儿，一直干下去。在三里洞一直干到区长的位置，后来调鸭口。那时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工作没有这么紧张了，再一个担任区队领导了，也没有这么出力，后来在鸭口干了7年，以后都不想到郊区去，又调回来调到桃园，还是采煤，一直采煤。后来腰部受伤了，调食堂给人家记记账，当个管理，一直干到退休。

**林：**受伤是怎么回事？

**成：**正在干工作时，上面掉下一块石头，砸住腰部，腰部当时还好，有的人砸在腰上，街上坐三轮车的，多得很，就这么一段历史，就这么到现在。

**成妙祥妻（以下简称成妻）：**你过来了。

**成：**他拍我们上海来的老乡，支援大西北的历史。

**成妻：**你爸你妈都没有了，你妈和我可好。

**林：**你在采区遇到过冒顶吗？

**成：**有，多得很。

**成妻：**他的鼻子也砸烂了。

**成：**腰受过伤，鼻子受过伤，遇见过危险情况多得很。有一次在井下工作，因为里面空

气太少，我们一放炮，不是说一次放完，起先放几次可以，到最后一炮，实在里边的空气呼吸不了了，一进去，赶紧别好炮出来人都昏倒了，那时还当个放炮员嘛。哎，班长一看，人都昏倒了，赶紧把人抬到外头空气好的地方，慢慢才能苏醒过来。再一个，大压力冒顶相当严重，一样看住都要下来，在一矿最严重的一次，班长的经验高，看大冒顶来压了，班长一喊，赶紧全部往外出，我们所有的工人刚出到外面，巷口里边一阵风下来，再转过去看，里面整个全部压严了，那次最好，一个人都没有伤。在三里洞，有一次，两头关住，两头冒顶，三里洞北公房拐弯过去不是 XXX 都死了嘛。那一次大压力来，关里面好几个人，后来经过几个小时才把人一个个抢救出来，那次还好，还没有压住几个，光关到里头出不来。有一次眼看一个楼这么高，一会这么高，一会这么高，一会这么高了，赶快弄个柱子顶住，手扶住就顶住了，都这么严重了，心里就是害怕，害怕也不行，干这一行没办法，也亲历了好多事故。有一次，我上早上八点班，说好了那时我们家里要买粮哩，那时买粮跑到河滨路粮站买，我叫她先去买，你等着我下午四点下班，骑车子回来给你推回来，谁知道等到我八点还未回来。

**成妻：**把我吓死。

**成：**井下出事故了，你走不了呀，回来还要开收工会，要讨论咋样发生的。后来等等我不回来，救护车老在大街上呜呜叫，呜呜叫。她那时在服务大楼，一直跑到电厂才碰到我，她说你到这时候，你说好早早回来买粮哩，你到现在还没回来，啊，那时确实害怕。

**林：**最早有个威国其事故……

**成：**那是头一个死亡。

**成妻：**他头一个死的，他最可怜。

**成：**他在主井底下开那个翻罐那个煤嘛弄啥，我记着是这个意思，底下啥东西不知道，他人刚下去，弯一下头，吊煤的扑通下来了，把他一下压扁了。他头一个，也是上海人，威国其头一个，三里洞开采没几个月，他头一个死了。

**成妻：**死了可多，可多上海人底下死了。

**成：**压伤的，坐三轮车的也有，不少哩，具体记不清了。

**成妻：**死了可不少，于月堂、王全鹏呀，都是压死的，就在我们一排房住的。

**林：**你们最难过的是哪些年头？

**成妻：**60年吃不饱，一群孩子吃呀吃不饱，弄点粮都给孩子吃，自己大人都不敢吃，买点萝卜叶子，买点萝卜都一块钱买二斤，苦死了。我那一年跑回老家了，回老家老家也可怜，老家比这儿稍许强一点，哎，苦的事不能提，那时你妈在街上看见我说苦的死呀，苦的死呀，你姑现在哪儿？

**成：**在陕南呢。

**林：**我姑在陕南。

**成：**他姑父没有了，他刚才说张金龙。

**林：**你子女现在的情况？

**成：**我四个孩子，三个男娃，一个女娃成荣妹，是你同学。大的比较艰苦一点，他因为原来找对象没有找好，是我的错，现在南方工作。成荣妹我那女子是老二，她是西北大学毕业，现在长安大学任教，副教授。还有个孩子在铜川南站，铁路工人，儿媳也是铁路工人，生活过得也可以。一个小的杭州商学院大专毕业，分到这儿搞食品卫生，到这里没有发展前途，后来就停职自己找工作，他现在联通公司，他跟我那女婿学那一套通讯工作，后来又培训了一下，现在联通公司是营业部经理，生活还可以。四个娃，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去，不是很富裕吧，一般情况，不是很艰难的。

**林：**你后来没有考虑回南方去呀？

**成：**考虑想回去，现在回不去了，回去你拿这几个退休工资，到家生活不够，南方开销

大嘛。

**成妻：**我一回都没回去，东干临时工，西干临时工屁都没拿上，就光吃他一个人的工资，荣妹你熟悉吧，她现在弄的不错，闺女弄的不错，闺女给我贴一点，我的衣裳都是她给我买的，女婿也能干。

**成：**所以你想回去，我们回去一说，六七百块钱退休工资，在这里来说可以了，老两口一般性凑合下还可以，到南方一听，老两口在那儿咋生活下去的，人家都是几千几千的。

**成妻：**人家工资大。

**成：**有的上班的人都是上万的。

**成妻：**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死到这儿了，老家有点破房子，人家都建成楼啦，还是过去的老房子，谁要哩，回去房子还得修修。再一个咱七十多岁人了，几十年不在老家，没有和你亲近的人了。老的都死了，小的也不认识你，回去有啥用，孩子都在这儿。

你爸先老你妈先老？在街上买菜（遇见），老乡亲得很，好得很，真是可怜人。他妈说话可和气，没有高声音的。原来你们家住的下边还有个叫张林根你可能认识。

我们优秀的家属都不叫下井，对男的不好的，体验体验男的生活，叫下井。东干西干连个劳保都没弄上，干干也没转正，在矿上千个理发，干个十几年也没有给我转正，咱也没后门也没啥，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拿上。

**成：**（荣妹的孩子），叫他上了高一、高二，高三就到英国去上，就在英国剑桥那个大学，他在那里学学学不进去，后来一考虑学不进去，叫他回来，回来又留了一级，本该今年要高考哩，现在又回来上个高二，花了几万块钱，到英国去上，一年三十万，两年都毕业了，我那个女婿想给他弄弄，他不好好学，考不上还不要，把荣妹气的啥样，男娃整天打篮球，打的好。

**成妻：**我也不想待在这鬼地方，说要拆了，几十年待在这地方，一年一年拖着，死都死在这地方，哈哈。

**成：**那年来的时候照的，都不像样了。

## 童侑

童侑，1922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后调到金华山煤矿，1979年退休。



152、童侑在讲述中



153、童侑在讲述中

## 我底板这么丑

**童侬：**我们那时呀，是在上海建筑二公司华东地区建筑工程局。1955年，组织上号召我们支援大西北，我们就转业了。原来是建筑工人嘛，转业到大西北，那里是重工业，转业过来，上海工会（的关系）也带过来，这是一个待遇。

**林鑫：**多人给我说，当时这一批来了318个人，也有人说340多人。

**童侬：**318人，没错。为啥说318，我那时是纠察。318个人，一共8个纠察。那时318个人里面，86个团员，2个党员，纠察我轮不到。我达不到目标，可是我争取。我想一切办法争取这纠察。但不能（说）给我吧，给我吧。现在说走后门，找关系了。那时还没有这关系，我表现。我们从上海来的318个人，10个人一个小组。编好小组、小组长，一个工会组长，一个先进组长。那当然有我，这个我底子放在那儿，小组里面可以讨论。这次到西北去谁有困难，谁没有棉衣棉裤？因为12月18日嘛。谁没有棉衣棉裤，被子达不到要求，都有规定的。棉袄15元、棉裤7元，一条被子25元。如果还有背的债，根据实际情况，单位给你处理。可是我来的时候，就带一条被子，箱子也没有。箱子7元，没有箱子，给你买箱子，给你7元，小组可以定下来。小组上报就可以，国家有一笔钱专门照顾。可是我没有箱子，我只有一条被子。我的上衣棉袄有的，一般人不要穿这些棉袄，我穿，但是借的。我想啥办法呢，我有一双靴子。我那双靴子，你那里放放，我还有条衬裤，老李你那里放放。那么他们知道童侬没有箱子，说这些东西乱放哩。他们有的提意见了，童侬这买箱子呀。所以小组里面同我谈话了，我不同意。我说不，我说这钱给比较困难的人去，比我困难的人还有。也有人说你最困难了。我始终没要，始终不要了。大队指导员说，这人，先进的很。所以就把纠察（袖章）给我手里，纠察是这样得到的。纠察得到以后呀，我还表现哩。那时上海到这里车子要三天，有些人到火车站外面去逛逛转转。三个车厢，8个纠察管着。可是有时纠察只有3个，其他都出去逛了，只剩3个，其他5个人出去逛了。那么你走吧，你走吧，火车站一进站都能看到我。那时我们有带队的，说童侬能行，无形中带队也落到我的头上。童侬你好了没有，去5个人带队。第二个我写东西比较漂亮，直接说我是大学生。因为我懂外语，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不是带队的，我也不是党员，我也不是大学生。对于下井挖煤，我没啥贡献，我根本不干重活。我在井下根本不是拼命挖煤，干这干那，不是这么回事。我这生命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底板这么丑，刚解放时单独斗特务人员，我这个区里第九个报名。我交代出来的问题，比领导掌握的还多。那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就使我政治上没有受到多少压力。问题是我很严重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没有啥。

## 一块手表

我55年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大学生。实际上我不是大学生，我小学三年级。为啥说我大学生呢，那时我是做西药买卖的，经常同外国人打交道，包括地下党也同我来来去去。第二个，他为啥说我大学生呢，因为我们55年来的时候，矿务局开欢迎会，领导讲话，群众讲话。那时我们上海话和西北地区不一样，他们听不懂。所以我发言以前，我有一篇发言稿，交给委员会党委书记。我一面讲话，他们一面看我的发言稿，就有水平。不但能听清话，发言稿里，事情都是具体的，很有道理。第三个，我在一矿井培训时，西北的劳动模范是我们班长，叫陈启星。周总理送给他手表。为啥，因为西北地区第一批劳动模范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他时送他英纳格手表。这手表在矿上丢了，那这个问题严重了。那时史家河矿上通知保卫科长，一个月内要破案，破不了案你别来见我。这话也可能有点不民主，那是1956年上半年，这话也有点压力。他成立一个破案小组，14个人中有我。群众认为童侬能行，能



说能干，而且是大学生。以这样的名义叫我参加小组。这案子到 23 天没头绪。可是 14 个人除我，13 人都是党员。结果他们党小组开会，会后找我。已经 23 天了，你知不知，你发表你的意见，这是党组织问你。当天晚上 9 点钟，我就把手表送到培训区。当天晚上党小组开会，征求我有啥意见，有啥要求没有。我说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件事情，咋处理要通过我们小组，这言外之意就是这件事咋处理要通过我，我不是这么说啦。如果这事作处理，要通过我们小组。那保卫科长说，我们组织担保。这件事情破案了，《陕西工人报》新闻记者来了，我恕不奉告。他们专门写一个大字报表扬我，我不要。建议给我涨工资一级。

这表谁偷的，这人现在还在。这个人就是 55 年和我们一起来的，他叫陈家兴。但是我跟他保密。因为领导上给他处分，通过我们破案小组，我有不同意见。这人始终没有受到处分。陈家兴，他恨我，我给他破这案。但是他也感谢我，是他从 56 年开始，组织上没有给他处分，而且对外也不公开。那我咋破案呢，这些事情我咋知道哩？我家里那时已经到铜川来了，陈家兴他把老婆也接的来。他老婆来和我家里见面了。陈家兴这只表，他给他老婆戴着。她戴了这表，我老婆见了。她说陈家兴老婆戴只好表，英纳格还是进口的。那时进口表比较珍贵。我说叫我看。我家里叫她，这表叫我看一看，我破案就是这样破案。所以说我赶紧到陈家去。我对他说，我给你负责任，你家里这只表交给我，一切责任我负。所以晚上 8 点 30 分，陈家兴他老婆拿了这表交给我。我叫我老婆看着她把表拿来，破案这样破的。这也没受处分，也没给他公开，一直到现在。这表是谁的表，陈启星的表，周总理送的。

结果，史家河矿上给我长一级工资，就这事。后来我到三里洞矿，史家河培训后到三里洞矿上，陆荣初等都到三里洞矿。那边三里洞矿长、总工程师王文彦，在调度会上讲过一句话，井下问题和童仇联系。可是我是工人。我是家里的大儿子，我来井下。所以矿务局里面认为我是大学生，就是这样说的，因陈启星表丢了，我把它破案了。

## 对对对对对

我有个特殊情况，因为我成份不好。我父亲是反动地主，而且是流氓出身。反动地主家庭，流氓出身。我同日本鬼子打过交道，主要做生意，也有人说我是反动汉奸；可是我同英国人打过交道，做西药生意，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里面有交好军官，那么是国民党的残种余孽。帝国主义走狗，日本鬼子汉奸，流氓出身，反动地主成份。解放以后，因为刚解放时（参加）学习班了，我也经过好长时间，主要是学习。我在煤矿上工作时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是我管的事情我要管，是表现，要突出表现。不是你管的事情你管了，才是突出表现。第二个，我想各种办法来避免对我控制。同我一起工作的采运区区长、书记都住在我们这里。我在井下工作是这样子，你叫我童仇，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工作特点。叫我，我就对对对对对。可是这些领导说对啥？你不是叫我嘛，叫我肯定有事情，没有事情不会叫我，对吧。你有事情叫我，我先同意你，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叫我天上抓月亮去，或取太阳去，不可能吧。肯定我能办的事情你叫我办，我就说对对对对对。他说你这人真是没办法。只要井下谁找我，我都说对对对对对。我思想上有一个特殊东西，我已经估计你叫我干啥，我已经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这工资从一级工能长到六级技工，79 年时已经涨到六级工了，就是这样。

那时我在井下时，国家有规定的。大月不能超过 31，小月不能超过 30 个班。这有两个规定。一个是劳动纪律规定，一天挣一个班嘛。可是我一个月挣 34 个班，35 个班。这有机关，咋会有机关在里面？我下班洗好澡以后，我一定要到办公区走。为啥到办公区走？就是听听井下工作面还有啥问题没有。只要有异常，我就又下去了。因为我是机电工人，只要说井下溜子开动不了，或者啥电机上有问题，那我就下去了。下去我一处理，一个班。所以我

一个月能干 35 个班。我电钳工呀，可是井下开矿车的经常掉道，我能装修好。所以我在井下活是不重，我脑袋瓜子比较复杂。所以那时三里洞矿长王文彦说，井下有啥事，问童佻就知道。我为啥？有两个原因。一个，因为我成份不好，出身不好，不要从这方面整我；第二，我工作以外，多知道一点事情对我有好处。所以有时顶替道工、组长。因为我提一个意见，给我报一个工，这经常情况。那么现在说起来，是投机取巧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去金华山矿上。三室一居，住四间房子，科级待遇。可我是工人。在史家河矿，因为破了陈启星手表以后，党支部马上叫我上课入党，结果一看我这底牌不行。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行。在三里洞拿着三年干部工资，可是我不是干部。这里面有问题。因为拿了干部工资，上班下班，下井上井，不需限制。所以我出力不多。可是我这个活动能力可以。所以那时总工程师党正立、矿长王文彦，对我有种看法。只要能提工资……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贫下中农为主。因为这客观环境，我的工资涨到 6 级工。那时我在井下，是工作面的电钳工。可是我做其他事情，比工作面的电钳工还多。比如巷道溜子倒车，那不是电钳工事情。一切都是我去帮忙，推大车。并不是 8 小时都去推大车了，我好表现了，这是我工作态度，也可以说钻了空子，涨到工资。实际上我也尽力表现。我 83 岁了，我现在身体健康，和我那时工作态度有一定关系。所以我现在这么大年龄了，不以为我年龄大了，我没事。

## 给我安的罪名是畏罪自杀

我是 52 年参加建筑公司的。52 年以前是做生意的，做西药生意。文化大革命整我，因为做西药生意与地下党有接触。那时地下党不公开的，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党，但和我关系挺好。上海一解放，这地下党（到了）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我对这地下党有意见。我说你为党工作，那时为啥不向我公开一下，我也可以参加你的工作了。结果，这个人上海市人民代表，调到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讲过一句话。江青，我情况不了解，蓝萍我了解的。蓝萍是上海市电影明星。结果江青听到这句话，就把它逮起来了。不知怎么了解了一下，说我认识他。那时我在金华山矿上，矿上军宣组找我。他说你可以立功了。咋？他说三个条件。一个条件，你现在是工人可以提干；一个你不是党员可以入党；再可以给你加工资。我问啥意思，这啥意思？他说你只要提供某某人，他叫陈明山，把陈明山思想写点，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可以提供意见。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到中央去了，跟我有啥关系呀。他说这样子，莫须有，你随便说嘛。那么当然我也不能说了。那时对我要求挺高，任意把我关了十三天，我憋得没办法了。那金华山不是有公房嘛，金华山给我待遇也挺高，现在是三室一厅了，那时是四间房间。三室，一个主房间。我被拘起来了。我爱人、孩子住在公房里面。他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家属，没有条件住公房。把我老婆、孩子也赶出来了。造反司令就住了我房子。我想不通。即使我有罪呀，我老婆、孩子也没有罪。那么我上吊了。那时军管，解放军把我救过来了。给我安的罪名是畏罪自杀，送到公安局去了，我被关了两年。畏罪自杀，就有病了。啥病？神经功能障碍，经常糊里糊涂，经常大小便随便解。结果关了两年，关两年弄不清楚。畏罪自杀？为啥畏罪自杀，憋了没办法畏罪自杀。监狱待了两年，错了，咋错了，没有逮捕，所以是临时拘留，拘留了两年。公安局没办法了，写介绍信，当时碰到很多拒绝。因为没有根据，公安局就同市上，同金华山矿联系，回矿养病。有罪？没有罪。他是拘留嘛，回矿养病，结果我回矿上去了。在矿上，神经功能衰弱这个病呢还治着。他介绍信上说回矿养病，实际上是保外就医，就这样进病房的。金华山他们内部已经沟通了，一个月给我 100 元钱，是生活费。既不是工资，也不算津贴，就是照顾你，给你 100 元一个月。可是我到处看病，神经功能衰弱，保外就医了，通过各种渠道。70 年把我弄出去，到 79 年。金华山矿上可能和矿务局各组织联系了，说你有啥要求没有。他们

给我暗示，你这样子，你先办退休手续。办好退休手续以后，你孩子可以顶替。结果就办了退休手续。办了退休手续后，我孩子顶替。在供应区，仓库保管员。那这工作挺不错呀，意思就这样子结束了。80年我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结束了。

## 上访

可是到99年，这桩事结束不了。回矿养病呀，也算放你也不算放你。回矿养病就是保外就医，保外就医不能退休。因为保外就医不能退休，结果从80年文件下来以后，我又开始上访了。我提出我的意见来，保外就医期间，我这个人属于谁的？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单位的，所以单位没有理由叫我退休。跑了5年呀，我和矿上谈判了5年，谈判好了。按工伤退休。这不合理，是不是不合理呀。结果给我工伤待遇。原来退休76元钱一个月，工伤待遇96块钱一个月，百分百领钱。结果，矿上给我工伤退休。可是，我不应该工伤退休。我因为文革期间把我打得没办法上吊。上吊了以后，神经功能障碍。通过残联，残联接待我。说你不属于工伤，是迫害致残。他通过铜川市残疾人联合会，就是这个人迫害致残，应该以公残待遇。所以他给我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残三级残疾人证，落实政策。这我有残疾证，可是矿上不承认。他说残联不能作为政策依据，说残联给我发残疾证不起作用。金华山矿有文件，专门发了个文件，就是不作为政策依据。可是，我心情太平。我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结果在金华山矿上，有一次我神经功能障碍症严重了。矿务局中心医院就说我这个人不好去。因为神经功能衰弱，在矿务局医院没啥办法。第二是我不经上级，经常看病去了，官司也比较复杂。矿务局中心医院把我转到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功能衰弱，我这个眼睛瞎掉了，同仁医院进行抢救。矿务局长叫艾知善，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同金华山矿上联系，谈童仇这人不好处理，解决不了，给他转到北京同仁医院去看病。矿务局领导也过问，局长通知矿务局信访处打电话给我。局长说给金华山矿党委联系好了，你直接到金华山矿办理手续去。我就直接到金华山办手续。金华山谁管呢，社保科。因为有好多手续，中心医院看病开个单子、介绍信。金华山矿社保科科长说，我是社保科长，我不是大夫呀，这给我看干啥。结果有人陪我去哩。他说矿务局局长叫他来的，你和党委可以联系嘛。社保科长说，咋样，他说江泽民叫你来找我也不行。这句话荒谬。我一听解决不了，我神经功能障碍症又挂上号了，就倒下去，这里面破了，流了血。结果他害怕，咋办？有人给我叫辆车送到西安。因我有残疾证，省残联说我们这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到疾病监视室。100元1小时。省残联送来的，医院当然重视。省残联觉得费用太大了，和矿务局联系，开一张转院单，转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同仁医院，都有手续。二个月零二十天，控制住回来了。回来金华山，矿上专门发一个文件，虽然这看病有中心医院转院单，有手续。但是没有经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批准，故不能报销。一共4000元，专门发一个文件。有东西，我都在。我想不通。到现在，我北京看病，我经常看病没有钱，矿上不能报销。医院你出院总要交钱，进去可以不交，出院总要交钱。把工资卡，养老金有工资卡，交给铜川医院。这就复杂了。矿务局局长专门带了8个人到我家来了，李子科专门到我家里了解我这个情况。

我73年井下发生事故，这些单子我都有，矿务局局长给我的信我也有。当然了，80年公安局、中国残联给我的信我都有。我第一次发到工资的单子我都有。我向矿务局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条意见，金华山矿上给我发过93号文件要给我解释；第二我公残工伤，中国残联证我也有，可是矿上不给我报销一切费用，我可以理解，心里能平衡。但是对我无中生有，强加于我的这些，我不能接受；第三个我这么残，中国残联按照803文件进行鉴定，而且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残疾人员证，矿上不承认这些事情，我可以理解。我们企业单位根据劳动法鉴定的工伤待遇，已经执行了，但是不全面。我还是提出意见，我现在向矿务局长提

出三点意见。我来铜川 50 年了，这 50 年里我的历史遭遇，当然这十八年里我比较特殊一些，一般说通过 803 文件，一般人就结束了。可是我还要争取，虽然我已经 83 岁，我还是要继续争取。矿务局长到我这儿来，矿务局长李子科是管后勤的，我给了他 79 封信。那天到我家，头一句话就是，你 79 封信我全部读了。我 79 封信都有留底，都有具体内容。那我说行了，我就不要再讲话了。我给你 79 封信，你已经收到了。那我说我的要求和意见都在里边，组织上该（咋办就咋办）。你现在有多少贷款拿出借据来，行政上不能解决，工会给你解决；第二、你现在有多少单子，只要是你名字，合乎条件的全部给你报销；第三、金华山矿矿长关照社保科，童仇如果贷款看病去办手续，5000 元以下不要找我。童光要借款 5000 元以下，不要找我。可是我不是看病要借钱，不是报销问题，有困难我自己克服嘛。但是，我还要正义，我还讲党的政策。这个残联证有的是，铜川数字也不少，应该有区别对待。我是上吊，被逼的没办法了。残联也有东西，迫害致残。残联也认为我是迫害致残。你不能说一般的致残，比如小儿麻痹，摔倒了或被汽车碰倒了，这情况又不一样，我是迫害致残。可是矿上说不能作为政策依据，那我这个残联证我去还给中央。中国残联说到啥时候都起作用，一句话都解决了。到北京去了民政部招待所，拿残联介绍信，一天交 4 元钱，2 块 5 饭钱。有钱交 6 块 5 住宿，如没钱只要残联签个字，那就不要交钱。民政部招待所，那不是说高级宾馆，但里面生活条件挺舒服，24 小时有热水。

因为这些特殊情况，矿务局李子科带了 8 个人来。他来的话肯定要开会，这 8 个人都是需要跟他来的，不是张三李四王麻子都行对不对？来时他开会，一定要到童仇那里去，我们达到啥目的，达到啥要求。那他肯定这么说了，不是随随便便带着 8 个人到我家里，带了 18 斤水果。回去以后他们又要开会，肯定要开会。结果他们中有一人把我档案弄错了。他把历史档案都看过了，他说童仇那么大年龄了，他的脑袋瓜子思维呀比较特殊一点。他们两小时啥问题都没解决。他是现场办公嘛，要我提出意见来呢，应该解释解释。我啥意见都没有。我说你们今天来的人，都是执行政策的人。那么我有啥事情，你们肯定是了解了，才到我这里来的。那么你们看着办，应该咋解决，应该咋解释。不需要我讲话，甚至你们了解情况比我知道得多，所以我不需要去讲话。结果我得到一个马路消息，他们回去研究说，童仇高人呀。旧社会你可能听说过上海还有青帮、红帮，杜月笙、蒋啸林、黄金荣。他说解放以前童仇是杜月笙的高级助手，是青红帮的高级助手。错了，狗屁，这档案错了。那时杜月笙、蒋啸林、黄金荣他们青红帮头头都六十多岁，我不到二十岁，你给他当孙子也不行。蒋介石还是第二辈，那我第三辈挂不上号。他说我是蒋啸林的高级助手，这是胡说。可是矿务局现在已经有这印象，童仇是青红帮头头里边的骨干，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有这印象，对于我没有坏处。因为旧社会青红帮是专门帮民除害的。国民党说的不算，我说了算。国民党说把他提起来，枪毙了。青红帮说不行，把他放了。那青红帮就是这态度。共产党就希望有这样机构，把他社会搞得一塌糊涂，对吧。对共产党，他们知道我和青红帮有关系，对我没有利，因为路线不一样。矿务局现在已经找到这些，说我是杜月笙的亲密战友，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们有这样印象也好，因为办法多得很，你们带了 8 个人，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我意思是这，你不能以解释的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应该以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你们现在是以解释来解决问题，那不行。但是我没有这么说。你们都是掌握政策、执行政策的，那我需要的讲话，你们都比我更理解。那么也不需要解释了，最后没办法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大革命我如果不上吊自杀，也不可能把我交到公安局去。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被公安局关了两年呀，没有开过一次庭。因为它没有东西问我。关了两年谁来问我呢，金华山来问了我三次。金华山头一次办公室主任，第二次保卫科长，第三次他们请了一个人。这个人有相当本事，王家河保卫科长，叫李小杰。这人破案能行，金华山矿请这个李小杰来审问我。问我三小时，那相当厉害。他代表公安局来问，这是啥地方，你知道我是谁，压力相当大。他从 8 点半问我到 11 点半呀，可是我对这个人开始我不相信，后来我感觉到是公

安局来的，结果到 11 点半，我发现，他一起来的看一看表，他给旁边人说我们吃饭咋办。他就讲这句话，我听见了，我说，这事这样结束。他说你啥意思。我说你口口声声是铜川市公安局，你不是公安局来的，我说到此结束。他灰溜溜跑了，第四、五次没人来了，关了两年，结果回矿养病。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叫我回去算了。可是矿务局不同意，金华山不同意，回来咋办呀。回矿养病。可是我一方面回矿养病，我不是养病，我告状。80 年这东西、这文件你看了，68 到 69 年这一段是错的，必须纠正。这是上级机关讲话，不是铜川市公安局讲话。公安部讲话，公安部问省公安厅要材料，公安厅不能直接到铜川市公安局要材料。省公安厅了解了，公安部说了，已经到我们公安部了，你们公安局审不了。结果省公安厅两级机关到铜川市公安局，那时王小光是局长。

实际上公安局关两年回矿养病，金华山矿给我待遇也可以。77 块 6 角 3 分，再下下井、填填单，就 96 块钱了。可金华山一月给我 100，照顾已经可以了，对不对，但是我不满足。我拿 100 块钱，我不是去看病了。一告状，别人同情我，坐飞机去，几次我都坐飞机。有轮船坐轮船，有火车坐火车。可是靠 100 块钱那不行，于是我想各种办法。现在中国残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不希罕，残联发证不稀罕。可是我这个证不一样。为啥，情况不一样呢。我有铜工 35 号文件，属于迫害致残。而且残联也给我写东西。迫害致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金华山矿上接到我这东西，说不能作为政策依据。话对吧，对，不能说不对。因为残联证多得很，都依照残联证办事还行呀。可我是特殊情况。金华山矿上又错了。残联看到金华山矿这文件，他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证书不能作为政策依据，那金华山矿上超出范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证书不作为政策依据，那你啥作为政策依据啊。不过我这样给你说，都是我的丑话了。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行的通。

### 一件怪事情

在三里洞矿的时候，我大部分（工作）都在井下。61 年调到金华山矿，68 年文化大革命就把我弄起来了。一直到现在。那么我原来金华山有房子，造反司令给弄走了。所以住在这地方，这是报废房子，不要钱。现在矿务局也对我挺重视，矿务局长带了 8 个人到我家里来，他们说扶贫慰问。可是我没有要求。最近矿上对我有件事情，也是怪事情。去年 1 月 14 号有人通知我说，快过年了，你情况特殊，矿上给你定了 100 块钱补助。我属于离退科，听到给我补助，我到上面去领了。结果离退科科长说，非但没有这回事，而且听都没有听说过。结果我去找捎话这人。我说我上来花了 10 元车费，我想领这 100 块钱。我科长说，非但没有这回事，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倔得很，他说童叟，我可以用头来担保，没这件事，我不会同你说这话。我用我自己的头向你担保，但是看你，能不能争到这 100 元钱。对，我有信心。我花了 160 块钱。4 月 12 日这个离退科科长 100 元交给我闺女。我闺女说要不要签字。不要签，我们都认识的。100 块钱给我了，这是一件怪事情。离退科科长给我说过两次话。一句话是非但没有这件事情，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第二句话，谁说有这 100 块钱你找谁去，这是第二次离退科科长给我说话。第三次离退科科长给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我错了。我碰到的都是这些事情。100 块钱已经给我闺女了，4 月 12 日给的。我还是记着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没听说过，根本没这回事；第二句话谁说你找谁，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已经把三句话又记录了，要求矿务局领导解释一下。我今年已经 83 岁了，有好多人给我说，童叟你今年这么大了。我现在 778.10 元退休工资，他说你们已经够生活了。我年龄虽然老了，但是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方针政策还没有忘，我心里是清楚的。也有人对我说，这 100 块钱给了你，也就算了，应该这样子。对我，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结束。正义，为正义啊。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对解放以后的东西我都有。因为我对共产政策，没有解放时都已经了解。共产党是重证据，你没证据不能行。就像金华山 100 元钱一样，100 块钱不到我手里，我就没有话说。我说有，你说没有，啥证据。可是你 100 元交到我手里面，就是事实讲话。

## 这是报废房子

我 55 年在史家河培训时，不是专门为井下培训。今天叫你开会，明天叫你。后来到三里洞，拿干部工资，不是在井下天天报名，天天上班，天天出力，不是这么回事。那童仇咋下井了，童仇回家了。我拿了三年。我 68 年已经 6 级工，啥工，电钳工。实际上我这电钳工呀，三级工条件都不够，为啥给我弄到 6 级工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这。79 年退休。像我这样子的人呀，达不到这要求，工资待遇达不到这要求。我现在心情挺舒畅，也挺愉快。我现在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工作还挺理想。这两个原因，一个环境因素，一个个人努力。我儿子现在矿务局供电所，一个闺女在供应处，还有个小闺女在骨科医院。以我主观出发，像我这样子的人，医务需要有人啦。不是说一天到晚给我看病，必要时给我晚年生活以安慰。我家庭生活就这样。我爱人 75 岁，精神挺可以。那天李子科来了，他说你住这房子，没有住房？但是我没有同他说，隔壁一间 400 块一年，我租下来了。隔壁有一间，有两间生活还可以。不要钱，这房子都不要钱，这是报废房子。隔壁房子我一年给他 400 块钱。

你从这个相片里可以看见，我是 54 年同她结婚的。我先后有 2 个老婆，同她结婚以前我孩子六岁多了，可是我同她结婚以前一切结束了。54 年同她结婚的，结婚以前，也不顾汉奸帝国主义走狗，同蒋啸林、杜月笙一起。不可能没有结婚啊，不可能没孩子。我现在结婚这个，养三个孩子，一个在供电局，一个在供应处，一个在骨科医院。但是我现在，我挺满足。为啥，这三个孩子都有房子，都两室一厅。一个孙女上大学了，一个外孙在技校，小闺女的孩子上初中了。我现在心情挺舒畅。虽然有这样波折，这样子遭遇，可是我心情，倒楣的？没这回事。你看我家里面心情也挺舒畅。

我最满意的是我家属状况。第一、我爱人身体好，这是一个顶主要原因，爱人身体好，我思想没有负担；第二、我孩子现在都有房子，而且都是二室一厅；第三、我现在 777.10 元，我和我爱人两人，不能说很富庶小康，但生活已经够用了。矿上经常照顾我，我对矿务局局长说，局长到我家，亲人感人心。实际上铜川矿务局三万多工人，比我条件差的人不在少数，可是矿务局局长专门带了 8 个人到我家来，的确是亲人感人心。我现在找矿务局，找矿上，你们这文件收回去，你收回去。为啥要收回去，你也没看看这东西。

你还有啥，关于你这个纪录尚有啥需要，文件上的东西我有，如果需要你可以提出意见来，我可以很坦然地，实事求是的，向你反映一下。

## 高章顺

高章顺：1936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1986年退休。

高金康：高章顺长子，三里洞矿工，后买断工龄，林鑫的同学。



154、高章顺在找老照片



155、高章顺在讲述中

## 在铜川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

**高章顺（以下简称高）：**咱们原来在上海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市工程局。上海那时工作也少了，后来开始学习，回去等工。学习期间工资拿 75%，每天早上学习，点个名，到月底给你开资。那时我哥上兰州去了，我跟他一起去，咱们是木工嘛。上兰州那里去的人太多了，本来明天要走了，今天他说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开会。后来就说人才太多了，没有地方做。他说四级工以上去，四级工以下不叫去。三级工就不叫去了，没有上兰州。我哥去了，后来把我丢下了。丢下以后，铜川矿务局到上海来招人，支援大西北嘛。当时来的时候哄的，铜川多好多好，你们是干部，怎么回事，你们不愿干，给你们户口，吹得乌烟瘴气。他们说煤矿工人好得很，上来给你洗澡，又是太阳灯，又是这个那个，矿工帽子怎么样，实际就是他们骗来的。

那时一看煤矿黑嘛，戴了个矿灯，不习惯，空气也不好。低的地方这么低，人爬过去，身上这矿灯还得取下来，人才能钻过去。有的工作面低，一爬就是几十米。那条腿跪着，爬着真像个狗一样，那煤矿工人确实苦呀。像这个拉小车，弄个筐筐这么长，能装一百多斤。底下弄个木架子，弄四个这么大的轱辘，这边两个，那边两个。弄根绳身后一绑，这样拉。上坡才难，地下爬着拉着绳子，地下爬着拉小车，才苦哩。咱们这个地方煤矿工人确实苦呀。

来到这里以后，有的都跑回去了。有人打电话到西安，煤管局的人到西安火车站截。咱们上海人背着包袱、背着被子回去了，你跑到西安，人家给你抓回来。结果有的还是偷偷地跑了，跑走了十几个。走了以后他不给你户口。后来走了一年以后，才来转户口。矿务局不叫你走，那时候就这样子。实际上煤矿工人是比较苦的，后来没有办法，有的人就回去了，有的坚持坚持就算了。到铜川来时是 55 年，12 月 21 日到铜川。来了以后，在史家河煤矿开始培训，到 57 年 5 月份，回三里洞矿。三里洞矿 57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产。

咱们在井下啥都干呀，在井下打眼、放炮、装药、爆破，那时啥都干，需要啥工作都干了。比如说煤采完了，就开始回收一根根木头，还要节约，木头把上面劈一点，还要把木头回收下来，以后还可以用。有些危险的地方，如果是斜冒着，4 米至 5 米支一根，中间就开上几斧，压力一来，木头就下来，叽叽声响，上面石头就要掉下来，都快跑。顶板顶住石头上不来，一排排采过这么长，整个压力来的时候，整个切下来，溜子等全部都冒在里面，那危险大得很。所以你回收也要回好。咱们年轻时确实把力出尽了。

井下工作时，经常有大冒顶啊，很多的事情，危险大得很。有一次，大冒顶了，那个老师，他要干活去。我说等一会，他没进去。结果大冒顶了，冒下来，我说差一点。还有一回，整个工作面压力来了，还有徐区长，徐殿明嘛。他管生产，搭木垛，一根一根搭完以后，我说徐区长快走，不走不行了。徐区长刚跟在我后边走出工作面，整个工作面切下来。大冒顶次数多了，经历的次数不少哩。有的工作面采的时间长了，顶还没有冒，到冒的时候，你要注意。真冒的时候，都给压在里面，溜子啥的整个压在煤里，危险性大得很，经常发生。经验丰富一点，脑子灵一点，该打个柱子，就打个柱子。不行的话该跑要跑，不跑你就要命了。有人慢一些，发生事故多一点。精干点，比较好一点。我下井 17 年，工伤也没有吃过，能保持完整还不错。有的往往就把命要了，咱们那矿上一年死 24 个，一月一个。一回冒顶下来，压死三个。有时两个都压到底下，死人也不少，煤矿工人就是太危险。一方面空气不好，工作面打眼放炮，这个煤尘呛的不得了，炮烟又苦，难闻的很，煤烟大。一般掘进的煤尘才大呢，弄个风机来回开着，这个确实对人危害性大，一般容易得职业病。我职业病也 30 多年了，71 年得上职业病，现在也 34 年了。咱煤矿工人也确实把力出了，就这样了。得了职业病以后，调到地面上来了，在行政科管单身房产，（做）管理工作，73 年到 86 年，又干了 13 年。



**林鑫（以下简称林）：**得了职业病是什么状况？

**高：**职业病一般情况是气短。好比井下吸这个煤尘多了，这个煤吸到肺里面，把肺的通道堵死了，气短。有时不太通气了，容易堵塞，呼吸困难。变天了，就感觉闷得很。天气好的话，好一些。咱一期职业病，还比较轻一些。三期职业病是路都走不动，上楼梯都上不去。吸吸哈哈，呼吸特别困难，肺里煤尘吸的太多了，确实呼吸困难。咱矿上职业病死了多少，一般的不行都死了，上不来气。现在还有矿上住院的职业病，呼吸这样，呵，呵。咱这职业病还比较轻。我下井戴两个口罩，还是放炮多，里边弄个干口罩戴好，外边弄个湿口罩，喷上水，上面再戴一层。一般脏东西，有水了外面都吸住了，要好一些。那时身体也保护的好，一个礼拜六个口罩，天天换一个。今天旧了明天弄点水戴在外面，新的戴在里面，一个礼拜洗一次。把自己的身体保住要好一些。不戴口罩，职业病还要严重。辅助单位还好一些，在大巷里工作，运输弄啥。像你爸在通风区，比较好一些。一般在第一线厉害，差不多能干个七八年，死得不少。职业病一般是到冬天比较厉害，天气像现在要好一些。光咱矿上职业病死了多少，多得很。一个老乡，三级职业病，说不行就不行了，人就是这样。还有上边那个姓边的，你爸认识。他死了，把亲戚弄来了，在煤矿上得了职业病，可能年头里也死了，他住院八年。

我们这个班，比如 15 个人，没有发生过重伤，腿压断了，人压死了。在井下工作，第一个要人眼力好，一个手快，腿快。一看情况不行了，赶快掏个坑打个柱子。人在井下，工作要勤快，不会吃亏。就害怕屁股大的人，懒的人，光想坐一会，最容易出事故。我当班长时我这样说，新工人刚来，不知道，你老工人勤快一点，打个柱子就行，你要不打柱子，万一顶掉下来压住，压的轻了工伤，压得重了，就压死了。井下煤矿工人害怕一个，懒，能勤快点的人不会吃亏。一方面你坐的地方，你注意安全。煤这么高，时间长了煤偏帮，照样把人砸死。你要小心，一方面坐着，一方面看看顶板，有裂缝没有，有柱子没有。要小心呢，你不小心不行。咱们那个时候，一方面不怕苦，一方面勤快一些。

你说井下，一天风风雨雨，干几十年，一落点，你知道是多少时间。一般说，8 点上班，7 点钟到矿上，7 点 30 分下井，到下午 7 点，一天 12 个小时在干。下去穿着湿衣服下去，特别是冬天呀，还没有暖气，湿衣服穿着，那时没有办法。那不是弄个毛巾，干毛巾贴在肩上，湿衣服往上穿，哎呀，咱们那时候确实是受苦受够了。

在铜川风风雨雨干了几十年，干到退休。像咱们过去，打眼放炮，回收啥都干。到 62 年，我眼睛有病了，在医院里住了有几个月。后来鉴定，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能干重活，就叫我到地面上。在地面上不行嘛，家里父母、岳父岳母都有病，还有四个孩子，生活上太艰难。后来我要求下井，井下干辅助单位，工资少扣点。原来是六级工，后来降半级工，五级半。干了一年以后，给我恢复了六级工，一直干到 73 年。73 年以后，拍了（片子）有职业病，调到地面上来，在单身房产科，做管理工作，管理单身宿舍。干到 86 年 12 月 1 日，就退休了，有职业病是提前退。退休以后年龄也大了，也不干了。我基本上还是可以，吃饭各方面都可以，下午跑跑，回去没有事，打打牌转转。吃吃喝喝玩玩，就是这回事。咱们来到这里 50 多年，大致这个情况。

## 破产以后，年轻人 45 岁以下的卖工龄

**林：**你退休以后回过南方吗？

**高：**我回去了几次，回去看看，回去一两个月转转。我侄子都在上海浦东，我姐姐他们的条件都好得很。儿子、媳妇都是高工资，他们条件确实好得很。像我大侄女，她实际已经退休了，单位还聘用她，她儿子在中国进出口公司，一年下来十几万。媳妇在浦东高桥。她

女儿原在浦东法院当法官，都有钱得很。咱们可怜的买套房子，几万块钱都够呛。

**林：**谈一下你子女的情况吧？

**高：**子女就是这样，我大儿子买断工龄了，干干临时工，有了就干干，没有了就在家歇歇。我的大女婿也买断工龄了，反正就是这回事。我小闺女也卖工龄了，没有啥。我小儿子没啥工作干，去打工了，在浦东。现在都是困难，就是这情况。现在煤矿采煤时间长了，好多地方还不能采，像铝厂下面的煤不允许采。就是说，煤不多了，基本采完了，矿上就破产了。破产以后，年轻人45岁以下的卖工龄，一方面你其他地方干了，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干去。其他单位下井弄啥，娃也不想去。没有办法情况下，只能卖工龄。卖工龄交统筹一开始一千三四，现在一千七多。一年下来，这点钱的确不够交统筹的。卖个一两万块钱，你看一年要交多少。还要平时生活了，有了临时工干干，没有了还要吃老本，这是一个情况。像我女婿这都卖工龄了，现在干干临时工，有了干干，没有了就停停。铜川地区没有开发，也没啥工厂，确实干临时工也困难。一般干临时工就是个三四百块钱，就是这个条件。铜川确实没有办法说，其他地方条件高一些。咱这儿就是低工资，低工资工作还难找。小姑娘也一样，给人家当保姆，一个月给280元。在食堂里去干干，一天14个小时，早上6点15分走，到晚上8、9点钟回来，一个月给240块钱，确实工资太低。现在卖工龄没有办法，就是这情况。工资低，人也吃力，钱也挣不下，确实困难。

**高金康：**像以前，咱父辈从上海到陕西来，搞煤炭事业，这个家也拴到这儿了。家长也没有路子，咱还是在煤矿这个圈子里转。像外头招工，咱也想去招个市上单位，到一个厂里。以前也不想下井，父辈们经历的太多了。知道有职业病，有工伤残疾，也知道煤矿比较危险。出于家里也无奈吧，咱以前考学也没考上，机会也错过了。我父亲再想了想，算了，你到矿上下井吧，以后有机会了，调到地面上。你不是爱画画嘛，搞个美术宣传一类也可以。反正就是报个名，下井就下井。当时我还不太情愿，确实话还有点。像赵建忠都到纺织厂去了，都不愿意在矿上下井。我爸给我说了说，把我的思想工作做通以后，下就下吧，反正就是那回事，人嘛都要生活嘛，光在这儿等着也不行，就报名下井了。我是80年4月份到矿上，参加培训下井，当时是在掘进三队。干了一段，因为是高中生能写写画画，给我选了个团支部书记，开个会呀办个黑板报，写写东西，写写报道呀什么的。在掘进三队下了三年井吧，就调到洗煤厂去了，一年以后又调到工会，一直干到93年。当时三里洞矿也不行了，工资也低。俺单位谁要愿意可以下岗，因为下岗一个月还有点钱，到外头再去挣一点。当时就想，那时浦东开发嘛，到上海去闯一下，跑一跑，看一看，就去了。当时就想去搞广告公司，搞广告。但我表姐他们全都是搞工程的，工程部。搞广告这方面外面没有关系，拉不来业务，也很难做。当时我去也比较简单，都是外面铁皮广告，用油画颜料，画一些楼群、家呀。当时去了工程公司，活没接上，我就在广告公司干了有一年时间。下来以后就到工程部去了。工程部就是给人管安全，培训以后当安全员。就是工人进去以后，我要把注意事项通通说一遍。下一步让他们签安全合同，保障每个职工生产安全方面，叫他签过字，就是我们培训过了，下一步给他们办暂住证什么的。反正一直是这样干，中间也有段时间没工程，有段休息时间。以前比较少，休息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就有活了。但是从去年开始，活越来越少。现在上海这个建设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工程量少了，建筑单位多。就是和尚多饭少了。现在就是请客送礼，把标中了，凭关系。处于这阶段。我在去年只干了四个月回来，今年到现在那边还没消息，在目前比较艰难一点。

## 陈义祥

陈义祥，1928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电工、机电师；1959年调到王石凹煤矿，1961年担任机电区长；后来在铜川矿务局生产处工作，1986年退休。



156、陈义祥在家中



157、陈义祥在讲述中

## 唯一的将来，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

**陈义祥（以下简称陈）：**像我们这一茬子，吃苦全部赶上了，工资赶不上。当时你爸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我说很清晰，随后我也去买。要票哩，（售货员）看我哩。我正好出差到广州去了，14寸彩电不叫带，只能带黑白电视机。你妈那时在银行做饭，弄了一个票。

**林鑫（以下简称林）：**那个时候电视机不好买，要票。

**陈：**电视机、缝纫机都要票，不像现在你只要有钱。现在你弟弟成家以后有娃吗？

**林：**现在还没有。你是什么情况下来的铜川？

**陈：**我的情况是这样，我一开始在昆山学徒哩，为啥和你爸这么亲近呢？你爸是太仓人。就是我在昆山，他在太仓。那时到上海以后吧，借着亲戚关系。49年解放，我是50年到上海去的。到上海是搞工会，因为我在昆山那时候就是搞工会工作。开始在资本家糖果店、食品店工作。那时候生意清淡，叫回去了。老板说到生意好时，给你写信再来。后来我参加工会了，向工会主席请个假。他说你不回去了，你到工会来吧。就是这样情况。老板娘也不叫我回去，她说我们吃啥，你吃啥，你也不去工会了。这样我说搁一下，我先去一趟上海，玩玩。到上海去一看，上海那个地方，比昆山大的多。年轻时到上海感到兴奋，到外滩转一转，到人民路那里去逛一下。老上海小，人民公园、城隍庙，那一点点，看一下。小时候听人讲故事，真正上海地方是在城隍庙。后来都是外国人占领中国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小河边都把它填了，上海扩大了，我一看就是这样情况。

在上海没有事，我就跑到上海总工会去，我拿了会员证，刚开始会员证是相当吃香的。进工会给他拿会员证一看，找到门房。门房问我，是哪儿来？我说是昆山来的。有啥事？我说有些情况给你说不明，我说我在昆山搞工会工作，在那里有点紧张。他说咋回事？我说我在工会搞工作，他们那里有个委员，被绑在电线杆上，拿毛巾一塞，把他塞死了。我说知道了，老有尾巴跟着我，我想离开昆山。他说这样情况到三楼去，啥事情给他说。那时上海刚解放乱的很，工会会员证是统一的，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我说有些困难，想联系一下，我想离开昆山。他说你坐吧，你有证明没有？没有开介绍信，光拿会员证。他说那不行，他说开个介绍信，我说那行吧。这样情况，我就没回家，搭火车到昆山，一个多小时。到工会主席家，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好办事。他说那吃饭吧，钢精锅端出来叫吃饭。我说不吃饭，你给我开个证明比吃饭还重要。他说你那么心急。我说给哥哥没打招呼，我问了一下就来了。那行。到办公室给我盖了章子，写了东西。写完了又到上海去了，又到我哥哥那里。他说你到现在才回来。我说我又回到昆山了，他说吃饭没有，我说我吃了，在外头吃了。他说去干啥嘛。我说我去开了个证明。就这样，昆山给我开了个证明。给我介绍到河南路电业工会，四平路，国权路。到那个地方，那地方上万人排队在那儿等着，排了四行队，吃救济粮的，窗口满满的人。他说你后边转过去到办公室。我拿着介绍信，找工会负责人。他说你找唐主席。他把介绍信一看，说好吧，你下个礼拜来吧。我在四平路同济大学那边，直接在上海等着。

大概有几个月，工会组织派人找来，他们说你再不来把他都饿死了。不知道嘛。赶快回去端个钢精锅吃饭哩，我说不吃了。他说走吧，你赶快到站里去，把情况给唐主席说一下。我说直接去吧，他回家了，我就过去了。到那以后，他写了个条子，他说你那么困难，你早点咋不来呢。我说等你们通知哩，等不上。我在上海管四个井，一个井5毛钱，四个井2块钱，那种生活。上海真紧张，一条被子卖给人家2块钱，一双皮鞋新的，2块钱，有些人还比我们困难。一到工会，他们说你来吧。到国权路三角地那地方，那里是救助站，接待一些失业人。我去了，去了以后待了几天，也是搞调查工作的，吃救济粮。去了以后给了我

90斤粮吧，大概要了80斤粮。这40斤可以吃，那40斤换点钱买点菜嘛，生活紧张。我说谢谢。你啥也没有，就这在站里工会干了一段时间，吃救济粮。后来一个通知（招人），都是临时工，我不想去，搞工会工作有利条件嘛。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说要干就干长工嘛。都是一个礼拜，这纱厂，那纱厂，这工厂，那工厂。实际是试验工，一去都好了。不到一年，快年底了，那个唐主席说，哎，小陈，有个好工作你去不去，可是不挣钱呀。我说是啥。他说是三民粮政干部学院，就是搞专科。养些鸟、小动物呀，到那儿去。去就去，我年轻着呢，才20多一点，去了。去了两三个月，三个人，一个人一把椅子。三个月以后，总理电报来了，他说，你们才小学毕业，跟不上国家的发展，现在招高中毕业的人。把我们介绍到华东军区委员会，拉到淮海路宋庆龄住的地方，修了半年地下道。

半年以后，礼拜天出去玩，把会员证丢了，二次重新参加工会，这样一来，把工龄弄没有了。所以现在登记是50年参加工作，实际我44年都工作了，16岁在昆山学徒。修了半年以后，就到了淮海路，直接拉到华东军分区委员会。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南区，到那儿工作去。搞电业工作嘛，体力不行，结果当纠察，到吃饭时拿个铃铃一摇。干了几年以后，感觉也没啥意思。我说年轻人没有技术不找点出路不行，我就给指导员说。他说走吧，你先去打篮球，报到去。打了几天，第五天早上起来，拿洗脸盆洗脸，他们几个在篮球场，没接好，结果把脚扭伤了，又回到建筑工地去。我气的。腿坏了不要紧，歇两天就好了，叫中医大夫扎扎针看。待了两三个月，干脆你不去了吧，他说你到中苏友好大学去报到，弄啥，他说，你原来搞工会，你还搞工会，又上学去了。还有个是在王石凹，叫啥我都忘了，可能那人都不在了。学习搞工会工作，学习回来后，在工地上整天开会，摆单布、搬桌子、拿喇叭、电壶，就弄这。年轻人干这没意思，总想学点技术，结果到工地上转转圈，看到上海自来水工作，搞安装搞水管。我说你们属于那个单位，上海市水电公司的。我没想起来问问他们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我和指导员商量。他对我特别好，他是崇明人，他说我给你问问。最后吃了饭，刚放下碗，他已经给我问了，他说水电公司不是我们单位的，我们是为这个工作。他说你学技术，瓦工、木工你都可以干，我说干不动，太累了。他说这样吧，我给你联系，到机器供应站，周围用的机器，吊车这些，我说行。一直到南京路，几号又忘了，当场考试，他把我名字也没有写清。那时知道三统，政治任务三统，噢，最后想起来了，就是各国总统。写好以后，没有填名字就把卷子交了。那时我们工地总共4个人，三个人都录取了，没有把我录取，又把我气的一天饭都不想吃。指导员又找我，说你当工作组吧，我的文化程度（低），早起、晚上，上民校，参加工作组。正好那时搞四清，就是清理社会上那渣子，有危险，这了那了，搞那些工作。他说你是工作组的人，你还当你那纠察去。那是在淮海路干那个工作，干了没多久把我调了。这一说，两年多了，到上粮工地，建好后，上海人的存粮都在那儿，一圆圈挖了，轮船能进去。挖了两个月，把我们又调回学习大队，朝阳新村那地方。

那调过去是假，把上海人疏散是真的。到那地方以后，就把18至25岁的都登记。没几天，外地要人，我们自己自愿参加的话，报名。三个地方要人，山东、沈阳、铜川要人。山东要500来人，沈阳要100多人，造机床的，我们这300多人，铜川要300多人。在西安，人家说西安就是唐僧取经，到西京。我们年轻人，没有经验，要跑跑远一点，不行了，哪怕再回来。最后一弄摸着情况，我们那318个人，是给南京培训的合同，到铜川来学采矿技术的，是这样情况。我们报名来以后，给家里人也未商量，自己做主。那时年轻没社会经验，所以几个人一说，你去不去，你去我也去，去就去吧，报名，先报了名。大概学习了半个月吧，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我们在上海那时有火车，到南京是转车摆渡了，那时还没有桥。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摆渡。一摆过头一船，他说你们要吃饭，你们自己下车吃饭，有些人吃，有些人不吃。第二趟摆过来以后，再挂上，到西安。到西安了晚上也看不见，不像现在灯光闪闪的亮，那时也看不清楚。转车到铜川，到铜川以后12点多吧。我们当时还转车，弄个被子在那儿打扑克，正打着扑克，敲腰鼓的欢迎队到了，就回到老矿务局，说到了。

就这个地方，哎呀，我们的心里唾一下，呀，这个地方这个样子，也没人，不像现在马路上有人，也没人。我说这不是农村嘛，看人也不见。实际上人都在窑洞里住着，我和你爸那时逛，都看不到里面。他说这里面都是埋人的窑洞，好像南方挂那个竹帘子。哎，有人出来，不是的。逛得一直逛到桃园矿，咱这后面虎头山。

最后分工，意思是政治面貌、年龄、文化程度这三种结合的，登记几个人。登记后，干什么呢，放炮员，学习大概有三个月，没下井以前就下井，到史家河参观。一参观以后，一看下头，好些人思想通不过。当时参观还没有说啥，大家参观上来了，你脸黑的，他脸黑的，你看你脸，你看你脸，笑的，接着吃饭。第二天又去了，分工，说同志们，将来你们都是我们一矿的主人，把你们招到这儿来，唯一的将来，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就是说开路先锋一样。我们现在正在煤矿搞发展，正在扩建，将来都是机械化，都是搞机械化。你们上海人要文化有文化，暂时你们辛苦一点。文化程度差一点，身体好一点的人，给你们发个搭肩、担架、钩，拉小车，发那玩意。这一发不要紧，第二天一下跑了十八个，背着被子到西安。教育处知道以后，开了车就撵到西安。有些还未上车进站时，只要说上海的问一下，你在哪工作，上海，上海哪工作，只要说上海到铜川的，这些人留下，一下把十八个人又弄汽车拉回来了。拉回来干了一个月，第二次他们商量好，把被子行李先寄出去。他几个口袋买的馍，在茶炉上烤烤，清晨不到天亮，烤了馍以后他们就走了，几个人商量好在咸阳上车。你跑上海，那时吃粮都是定量的，回家以后，国家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工作，人家蹬三轮中午回来吃饭，他利用这一二个小时，上街卖棒冰，擦皮鞋等。到亲戚家人家都是定量，你吃不行。弄不成了，有些人又回来了几个。三年以后，才解决了户口。他们回去以后，把他们介绍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去了。

## 一打听知道我了

我呢，到这里以后，脑子里还存着想学点技术工作。一开始叫我学打眼放炮了，下去以后放了，炮响了。我们三个人，彭兆林、周云华、我，我们三个一个班一个，彭兆林接我的班，我接周云华的班，干了几个月放炮。后来矿上有消息，机电上要人，他问你啥文化程度，我说高小文化程度。他说这样，有个表你们填一下，表一填，他说你到机电车间去报到。他说你放炮放了几个月，我说放了两个月。他说你先给师傅说一下，就说这里需要人。三个，有我有谭奇、有郭德奇，三个去报到。那个科长东北人，他说你们上海阿拉，他说这是你组长——现在也退休了——刘振兴，副组长姓曹的，小曹，你去给他干活。那时不公开，只干活。结果干了半个月，他说你们上海阿拉给我们干活，你们不穿胶靴、不拿工具，怎么干活。我们不知道，说给刘组长说了，刘组长说不知道。科长东北人说，给你们没发衣服领鞋。我们说不知道。噢，你们不知道，曹伯祥你给他们三个领东西，需要开啥你开啥。领了胶靴、领了工具。结果，三个人当电工了，背了工具很高兴回去了。这一领不要紧，把我们上海人操气了。一开始教育局说要15个人到技校去，这现在悄悄地只有三个人领工具。他说这我们不清楚，你到矿上再问，矿上说是临时帮忙的，要几个人干活的。他们领了工资。领了工资帮忙干的。咱们来的，像童仇资格比较老。他说你们说下吧，他们三个同志，有的干这，有的干那，是临时嘛。四个月以后情况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试验试验，那也是劳动分工。

四个月一干，后来又重新分配。开绞车人最多，绞车工，充电房充电工，抽风机的，有钳工、铆焊工，有钎子工，都分了。我们三个是给电工帮忙的，还继续跟着电工干。那时史家河正在扩建，我们整天是抬电线杆、拉电话线，我们也不怕累。问问打听打听，他说你不要问，先干着，干的好了可能把你们留下。那时正式分工作，开蒸汽车，开大绞车，开小绞车，开抽风机充电房哩，大部分都是机电上的。可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说文化程度，确

实是不适应，像华庚、童伙那一些。童伙在工会上，王叶涛他们都是分到开绞车，王富良这两个是带队的，王富良是开主绞车的。我去问，说我们现在算啥嘛，他说你们在哪里嘛，我说你还不知道，你们中队长你们不知道。唉，他说我也不清楚，我给你问问。我说行。他问了以后，说科长说了，你们跟着电工干活嘛，干四个月考试，就是这事。算正式工不算正式工，他说你们都不算矿上工人，将来都属于三里洞新矿的培训工人——实际是给南京培训的——矿上不负你们那责任，只负责你们各个工种参加培训。这样稀里糊涂就干，四个月考试，一考，我们三个人，年龄最大的是谭奇，95，我考85，郭德奇80分。郭德奇就是……东坡矿那边有个林皋，林皋那边有个水库。他到林皋去赶会回来，他们几个买鸡蛋买鸡，南方人爱吃鸡嘛。他们还有两个北方人，天热洗澡，喊救命哩。他又跑下去，一跳下去，栽下去再没上来，抽筋了，凉水一激抽筋了，死了。外出死亡，不属于矿上，结果不处理那事情。谭奇是癌症死了，在中机厂。我们三个后来在史家河培训，培训后所有采煤工都调三里洞去了，把我们一个烧电焊的，有四个钳工，都留在史家河。他们都走了，我们留在那儿。结果谭奇在玻璃板那儿又发现一个调令，有我们三个人，也是调三里洞去的，矿上不想给，把三个人留下了，还有几个钳工，还有几个电焊工。谭奇年龄大会捣鬼，充电的章子和机电科的章子一样大，都是三角形的，他偷出来以后，把充电房那个章子一盖，同意回三里洞。谭奇把字一写，可能叫郭德奇写的。结果我们第二天跑了，因为睡在老矿务局石头窑洞里，那个窑洞二层楼，就是你住的那个下头，就到三里洞。一到三里洞，分到机电科，在机电上就是从三里洞矿到老矿务局拉电话线，在那里就是天天安电话线，上杆子。干了一段，我们上海来的一些人，对我们不服气，整天咬蛋。结果给组长一说，把我们三个都要调到一采区去，结果我们不同意。调令开来，我们不想去采区。返回来说，正学技术的时候，在史家河时我们考试，全矿大概有60多个电工，考二级工都没考及格，因为他们都是苦家庭出身，没有文化。我们开始和电工一起干活了，我们三个人就到五一路百货公司买那书，有的工具需要买的，我们自己买。宿舍门口载个电线杆子，一天都是爬电线杆子。拿着马蹄表，专门学那技术，考虑将来考试。最后不考那玩意，应会20条，应知20条，就考那东西。考考也有好处，我们提前看书呀，走在路上看看电线杆子怎么样，施工设计和书本相结合，结果我们是三级工，还不敢公布，公布是二级工。我找人事科，他们说安抚人家老职工，人家干了几年了，就是二级工，现在不敢公布，公布了思想上通不过。到三里洞要调动时再更正，我们三人说，你嘴说了不算，没有凭据，写个东西给我们。当时人事科长，现在工程处。当时严和子说盖章子，他说不要盖章子，我的笔体在这里，盖章子反而不好。最后整三个月以后，给我们更正，我们开三级工资。他们老工人开二级工资心里不服，最后找到人事科，为啥这样弄。他说你们考试没有？考了，你们考几级工？低下头不吭气了。考了三级工就是三级工嘛，为啥？考试就是标准嘛。也没有吭声。老工人心里不高兴，干活你们三级工干，我们二级工不干。实际他们公开不会说，心里发不出来。

在这干了以后，调三里洞。三里洞上海人专门成立了个一区，从三矿、一矿两个矿回来的上海人放在一起。原来在史家河成立个培训区，一个工作面采煤。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人的培训区比老工人干的还漂亮，采煤工作面搭那个柱子，横竖行行，那都标准的很。那时大工资的，上海来的瓦匠、木匠、小木匠特别多。二级工的木匠，他有基础，自己做那个木尺，可以伸缩。木尺一量一看，打柱子，打的齐，打的还快。采煤工作的浮煤扫的干净，叫老工人到上海培训的工作面去参观。我为啥到三里洞要到一区去，因为我在史家河已经是挂上名的了，自己爱这个工作，从小在上海就想达到这个目的。那12月天气冷得很，挖了电线杆挖坑，赤了脚拿着挖。叫我师傅看见心疼不行，你把脚弄坏咋弄。不要紧。在史家河就当先进工作者，开大会接奖。到三里洞以后，说把老乡弄过来，结果硬要把我要去。大概要去了，我没有报到，旷了40天工。我不想去，这个机电科也不愿意叫我走。一个姓常，常科长，一个姓赵，赵科长，他说你到我这儿来，他打了个电话。时间长了，风头过去了，

我去上班去了。一去正好人事科冯科长在，啊龟孙上海阿拉，找了多天找不到你，你赶快去嘛，找你找不到。我说还没过那风，这么长时间没上班，也没扣工资。他说扣啥工资，你去你去，没办法又去了。这一去到一采区报到，那区长一见我也说。姓丁，丁福军，我说丁区长，你非要我不行，其他电工来不也一样嘛。他说啥，你们都是老乡，都关心的，说话好懂，来吧，你来吧。我去了以后，正好要成立一个三区，安工作面。几个单位抽电工，又把我抽去。我说刚到一区咋又把我抽去。他说帮忙安工作面的，你是电工嘛。我去了以后帮助安装，安装完以后，这个机械一人开一台。我说这个人脑瓜子想不到这问题，我想1344可以串联，连着启动嘛，可以安指示灯，我动这个脑子，可以把线路给它改了。所以十台机械连起来后，外边给它弄个木板，弄个灯泡，弄点红漆一漆，编上号。1号、2号、3号、4号，先开1号，安完以后，那个三采区区长，东北人，这人现在不在了，他知道后，问这是机电科谁安的，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的。东北人高京九，他说哪个电工干的，他说听说是那个上海人，姓啥不知道。他打听那个人，一打听知道我了，叫陈义祥。知道我以后，给矿上劳资科打招呼，安装完以后，把陈义祥留在三区。可是丁区长也不愿意，也要。他说三个电工换你一个，这可以吧。三区电工是选煤楼调下去的，高京九是选煤楼的科长，结果他到三区当区长，带了八个电工过去，结果给他换，把我留下来。从一采区借了三个，回两个可以，把上海人电工留下。他也不要意思，区长和区长之间，结果把我留在三采区干。在一采区干了一个多月。周寿根你去过没有，他在一区，我在三区，后来两个人都提了当机电师了。大概干到59年，在三区、一区，整个关注，大旗子挂在门口，放高产。连续三年，周寿根也没夺走。我俩关系也挺好。

后来是王石凹中苏友好矿投产，需要各个老矿支援，把我调王石凹去了。59年到王石凹，一采区也调了我们好些人，叶佩昌、夏俞斗呀，都是我们上海人到那里，陈述书、陈清都是我们三里洞矿去的。在那地方一直干了有两年多，又提为机电区长。后来干干，又到安装队当主管。干到77年，矿务局成立了机械化指挥部，本来也巧，王石凹停产修井筒，我也停下来，不搞其他工作，搞支部工作。我到王家河上党校去了，在王石凹干的时候，把我抽了。光搞机电不行，把我抽到西北五省煤校。煤校上了一年半，毕业后，又到王石凹矿。煤校是全面的，搞采矿呀，搞机电、搞设计这些，在煤校干了几年，那时着重政治，回去以后，又搞了几年，干到77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王家河上党校时，矿务局知道了，党局长给王石凹矿联系，把我调到矿务局搞机械化。矿上说在党校，矿务局劳资处老海，人事科的，到党校去找我。正好是礼拜天不在，到矿上找见我。学校王书记给我打招呼，现在矿务局需要你，另行工作安排，回去到矿务局。办公室有这个事，拿了个调令，他说到矿务局报到，领新工具，你再不需要上党校，你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回来。在矿务局报到以后，就干下去。我们自己知道，中机厂搞综采柱子、机械这些东西要拿到北京测试一下。结果第二天我就押了车到北京去，40多天，搞压力破坏试验，回来以后就搞机械化。大概搞了有两年多吧，又到动力处。动力处干了时间不长，又到生产上，一直干到86年。这是我个人的情况，退休后矿务局在15号楼三层给我分了一套房子。

## 矿区确实辛苦，说不辛苦是假的

我们来时的一些情况，我们318个人，有4个中队长，到三矿去了两个，两个中队长忘了，因为不太接触。一矿是王叶涛和王富良是中队长，这个我记住。来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来了以后，矿上很艰苦。到这个地方，下去有个小澡堂，里边是窑洞，换作衣，里边有个包裹单一包，往那儿一放，专门有个老工人看住窑洞，澡堂也小，矿井条件也差。所以说生活条件就是下井一个人拿两个馍，我们来的人还比较卫生一些，缝一个口袋包着，毛巾围



着，还戴口罩，一开始是这个情况。后来正常工作了，口罩也不戴了，毛巾也不围了，馒头在炉子上烤一烤，在井下不容易沾灰，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矿区确实辛苦，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是安全，并不是太可怕。苦到什么程度呢，冬天，以前也没有洗衣机，衣服轻易不拿回来洗。出出汗，衣服里面都是湿的，到冬天冰凉，呲呲牙咬住，呵呵，换点衣服下井。井下也不是那么……有些地方，灯安的很好，到后来灯泡就不着了，灯烧了也轻易不更换，不及时。头上都带着矿灯，背个矿灯，还背个安全器，也挺重。井下干活，实际那时干活说是八小时，实际有12个小时工作。为啥呢，提前一个半小时学习，那就要提前两个小时起床。早上随便吃一点，拿个干馍到矿上，点名学习。那是毛老头子领导时，天天学政治，一个半小时。开始学政治，接下来布置任务。每天任务，安排人次，一律不能变的。下边的情况，下边交班的情况，要给上边汇报。每一班要跟个副区长，还有班长、组长。井下情况，采煤那都是分岔的，井下一开始采煤，全是用木头把煤刮出来。采煤，名义上是2米高，实际采不到，采到1米7、8，有的还有0.8煤头。我们来的人有50%没有文化，因为都是采煤工、掘进工，有文化的大部分是开机械绞车呀、充电工呀、抽风机呀，电工呀，钳工呀，电焊这些都在机电上，因为没有文化程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事实。我学习电知识的时候也是困难，那时才高小文化程度，也是早上晚上两头上学。井下工作发了作衣，大部分是劳动布的，上面是破棉袄。一开始棉袄还比较好的，还是囫圇的，穿下去也干干净净。到后来也养成煤矿工人那一套，也是老一套。后头背着矿灯有硫酸，把后头半截子基本上烧掉了，整个后头一块烧掉了。看着是个棉袄，老远看是要饭的，到近一看是掏炭的，才知道是个煤矿工。两头不见太阳，早上五点钟，不像现在有公共汽车，上下班都是跑的。穿着靴子咕咚咕咚回来，那靴子一天干了活，潮湿，自己放在煤炉上烤一晚上，干干的。

你爸那时采煤的工作基本上没怎么干，当瓦斯检查员。我在史家河当电工，他当瓦斯检查员，所以我在变电所，他掌子面一转，到我变电所，我们两个谝闲传。他任务完成了，到我那里，所以我们两个是关系比较长。在井下空气再好，总之没有地面空气好，井下的空气看不见，你到工作面看不见。一开始都戴口罩，后来都养成了不戴口罩的风俗习惯。顶不上，一戴口罩出汗，闷得很，干不成，最后也取了。所以我们上海人，采煤的工种有50%，大部分是职业病，我也是职业病，到冬天出不来气。现在我们好些都去世了，那是出不来气，晚上睡觉就是要趴着睡，躺着睡就闷气，害怕一下子出不来气就日他了。所以井下条件再好，就安全来说，一般死人不少。在井下塌死，真正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部分是不听安全规程，有些是扒矿车，扒绞车，有些是不按作业规程进行。应该先打立柱，再放顶，有些不打立柱就放顶，冒顶塌死了。井下煤层塌死人很少很少的，只要按作业规程进行，确实很少很少。

井下工作面采煤方式，实际采煤方式，不是叫前进，那是后退式采煤方式。三班交叉作业，为什么名字叫三班交叉，就是有8点、4点、有12点，三班24个小时，再交叉半小时。经过工作面，班长和班长互相检查，看了以后交班。井下采煤也是分段的，分段就是分岔，一个岔三个人。打柱子工、打眼工、撬煤工，三个人一个组，分岔井下。大部分工作面一般来说，都是70-80米，100来米，超过100米长的少数，最长不能超过140米。短的地方一般有40米长，最短40米，最长140米。正规循环采煤就是三班交叉，两采一冲。为什么叫两采一冲呢，就是采煤进度是1米，往往达不到1米，0.8，采了八车以后把机械推过去，叫运煤机，把运煤机推过去以后，挨着煤墙，这里面打上柱子，保护一层，保护采空区，采空区再打上密柱。什么叫密柱，就是柱子一根挨一根，一根挨一根。采了两个岔以后呢，就是两班采煤，一班整修。为什么呢，采空太大了，容易造成危险冒顶。为什么采取两采一冲，就是两班采完后，第三班下去放顶。挨着煤墙有个运输机，运输机过来，站人的位置有40里米，全部打上密柱。打上密柱，放0.5出口，一个工作面大部分80米，5米一个出口。放顶的人，两头进行放顶，从机头和机尾。放顶时间还要留一个信号柱子，用斧头把那个柱子嚓嚓砍个两下，砍伤有刀印，来压的话，这个柱子先听见压力响，这就叫信号柱。这就像

海洋灯塔一样的，给你信号。手里拿个大锤，先打掉上面那个楔子，楔子打掉以后，木头可以回收，木料能回收 60%，二次还能用。不能用的当犊马，砍断以后，劈两半，顶顶。以前出的煤，是用木料换来的，和现在不同。现在是钢铁工作面，不要木头，全部是钢铁，叫综合采煤。

我们来的时候，机械化变了多少次数，可以算出来。一开始用 11 型，为啥叫 11 型，就是电机马力 11 千瓦。到后来换了 22 型，电机 22，功率改了以后，运输量增大了。22 以后，又换了 30 型，30 千瓦电机，改变了，运输量提高了。后来又换了 44 型，双电机。以前的采煤机为什么慢呢，那时人的脑子还没有现在这样，机械化逐步提高，人的劳动力也逐步降低。原先挖煤，工作面是低洼型，情况不一样。运输机铺的高，人攥煤要往上攥，现在 0.8，运输机上下槽子合在一起了。像以前的槽子高，20 型槽子可以做冬天烤火的炉子。现在的机械化工作面采完都不用更换，原来采不了几天，运输机铁板 2 毫米，现在 12 毫米厚，增加了 10 毫米，差距大，耐磨。以前槽子不耐磨，现在钢板里面有钼，又耐磨又光滑。原先人工打眼放炮，一开始用黑炸药。我们来的时候，打眼叫三化眼，离顶板 0.8 打一个眼，探顶炮。中间再打一个，斜打，这一放叫掏槽炮，把煤掏出来。先放底炮，后放压顶炮，这是采煤这样做。后来又变为 80 型，80 又变为 160，运输力也慢。原先我们人工采煤，现在全部机械化。什么叫机械化呢，原来顿巴斯煤矿矿井式的采煤方法，就是圆圈割一个洞，中间有个出水杠，人工打个窟窿，把机械推进去，才开始叫康拜因。再往后来，这个机械在运输机上骑着，用钢丝绳牵。自动钻眼机的话，钻起来钢丝绳往上拉的，是这样采煤。现在又不一样了，螺旋形采煤机综合机组，就是螺旋滚筒，1.8 米直径，可以采两米高，一次成型。一开的话，吭吭吭，把煤自动装在运输机里。一开以后，一直打到头，没有立柱什么的，但上面全部是用钢板。一个有 7 根，一个机腿整个连身柱子，连底板钢板、前面钢板算下来有六七根，两个就要 14 根，工作面全部铺成钢板系统，保证死不了人。

本身来说，看煤后面东西全部看不到，后头自动放顶。你煤往前采着，后面自动往下放，所以现在这采煤效益高投资少。同样出一顿煤，原先出一顿煤投资 200 块钱，现在出一顿煤投资 100 块钱，挣 200 块，翻番。现在消耗量不一样，效率也高。原先一个矿 7000 人，像王石凹矿一天出 2 万吨煤、1 万吨煤都难。现在一台机器年产量可出到 80 万，两台可以出到 200 万，产量也高也安全。所以这个生活是发展的，也不一样，原来大老粗也可以采煤，现在不行，现在大学生。为啥，用电器遥控形式来控制。工作面的采煤人员，原来有 7000 人，现在用 180 人。全矿两个机组，两个采煤工作面，只要 180 人，全部机械化。现在生产就是这，开巷道，开掘进，人不多，现代化还干净。所以现在陈家山这一次，他那煤层里呀，本身有瓦斯，那就叫瓦斯矿井。采煤一代代发展下来，到现在机械化发展这么高，煤矿工所以少。在 77 年、78 年间，我们全矿务局有 6 万职工，12 个矿，现在基本上还有 10 个矿罢，现在 2 万职工。实际非工人生产还没有，那都是搞房子、搞建筑、搞副业那些人下去了。现在人不多，但是产量还保持着 2 万吨。原先一个矿区至少有 4 个工作面采煤，光是王石凹就 7 个，现在改为 2 个，去掉 5 个，但是产量还比以前高。原先 120 万吨矿井，军代表在时，真不容易，干了三年，最后到第三年才达到 120 万吨。军代表说，掉四两，补半斤。为什么这么说呢，全矿总动员，拼命干，摘掉亏损帽。掉了四两肉，要给你补上半斤。那句话确实是好，可是也能做到。结果到年底完成 120 万，每个人拿着碗，到食堂里端半斤方块肉回家，这个可好。

就说采矿，煤矿工人说，不苦？光学习到收工，每天要洗澡，你一天不洗不行呀，身上有脏。一上来有些人洗澡累了，有的人带点馍吃了。有的人早起吃一顿，就不吃饭了，干完十来个小时活，洗了澡回家，才能吃饭。为吃一顿饭确实辛苦。井下通风又没有地面好，到老了，得下职业病。毛泽东时代，确实关心，现在你职业病，一开始组织上说，还有营养品啦，现在，一概而论啥都没有了，都给你弄完了。但是真正有病，看看职业病在医院，确实

辛苦，出不来气。原先的口号是什么呢，小车不倒只管推，活着干，死了算，为了我们国家后代人得到享受，不受人家外国人欺压。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改天换地这思想。像我们这一茬人，是比较辛苦的。毛泽东时代，那时粮食还紧张，那吃杂粮，不像现在细粮都吃不完。科学发达了，以前提的口号，人民只有人民，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是光荣的。现在对工人确实是不怎么提了，像我们来的318人，现在有个五六十人就不错了，有些人回家了，大部分死了。三里洞发生工伤死亡事故头一个，就是我们上海人戚国其，开水泵的。于月堂，正儿八经在工作面打眼，电缆刮板挂上了，把他拉倒，运输机拉着走，把裤子扯烂了，把蛋皮拉破了，流血过多死了。那时三里洞建设57年投产，59年他就死了。所以我们来的，牺牲的，开水泵的、打眼放炮的，还有几个是把脸崩坏的。放炮员在井下也牺牲不少，不过在工作面牺牲的不过14—15个人，其他开水泵瓦斯闷死的呀，这样死了。后来大部分为啥提前死了，都是职业病死了。

所以到铜川四五十年，对我来说煤矿干了30多年，下井下了29年，从打眼放炮、从铁锹撬煤，一个人撬5米长，800（毫米）宽，高度为2米，这是一个人要撬这么多煤。分配给你5米，5米的煤全部要撬完，这不能少。一撬完出满身的汗，所以作衣都是湿的，冰凉。我们上海来的人，一看都像少爷，干活确实是精干，能吃苦，确实能吃苦。和北方人比起来，他们也知道能干。在史家河成立了上海工作面，老工人都在参观，这都是知道的，在咱矿务局确实出了汗马功劳。把我们这些人全部分散以后，工作比较认真，好些当班长，稍微有些文化的可以说基本当上班长，当工人很少。我们来的矿长级别的有四个，连中机厂一个有五个。有个老工人叫杨啥，原来在三里洞，后来到中机厂车间当主任，他是个木工。这几年人老了，神经不太清楚。上次照相，他脑子不清楚，在那照相他都哭了。杨武峰，我说你哭啥，他意思说照相害怕，我还要领工资。意思我寿命不行了，快死了，不行了。到现在还没有死，还活着，在中机厂家属院住。杨武峰也算是矿级领导，他是主任，中机厂的，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当办公室主任，他那文化程度也可以。大部分来了以后，家属也来了，也参加矿上打杂吧，干干。但是我们来的还基本上保持了工人的本色，没有变捣蛋的，做坏事的，没有。有两个上海来的历史不清，后来回上海去了，由单位组织上把他弄回去了。一个是中机厂的，一个是三里洞的。现在分的各个矿都有，焦坪矿、三矿留了几个，退休的都回去了。基本上咱们这一代退休，有些子女干了都退休了。咱们那些人，旧社会本身他就吃苦，所以养成那种习惯。到这儿来能接受煤矿这个工作，那也是争先恐后拼命地干。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建设，二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生活下去，子女嘛要求得生活。实际上你爸那时候他也画些画，他画的也可以的，他给我画了张画。咱都是单身，在一矿后头那个房子住着，画了一个马，贴在床上。咱们有些人回去了，有些人子女在这儿回不去了，一生就是放弃了南方。

我今年回去一个半月才回来，看看家里情况，我们这些人根本比不上，没法说。到亲戚家都不敢去，因为吃不消，我看就这回事吧。有些问题想不起来，我们来的时候也给矿务局找了一些事情，为啥，我们年轻到这里来，前前后后想打篮球、足球呀，结果在单身宿舍把玻璃都踢坏了。弄的领导上思想也是……体育场就是我们修的。叶佩昌你知道，沈宏三，好些名字记不起，因为我不爱踢足球，我爱打篮球、打乒乓球。咱们那朱宝生，还有那小朱打乒乓球，在体育馆调过去打，他兄弟在上海跑采购。要说煤矿工不苦，两头不见太阳。粮食控制紧张的时候，带点苞谷馍，给梁上一挂，干，干到半中间没有水，有的还是我们自己带的水。在井下干了29年，现在回忆回忆不是容易的，那天天如此。后来当了区长值班，那都不能回来，在调度室隔壁房子睡，有啥问题随时随地都要下井处理。有时开会弄啥，瞌睡的，三里洞完不成生产任务，矿长王文宇批评，我都想抽他的桌子，瞌睡的呀。为啥？三班交叉，有时弄那个四班交叉，区队办公室人都不断，这班人没有走，那班人都来了。还要给那布置任务，还要讲那学习文件，还要给人家辅导，还要讲技术课，真辛苦。回忆回忆，以前八级工资制，现在是无级了，咱们现在……

## 我们一代人基本上也完了

唉，从上海到这里 50 多年来，咱们一些人确实是把全身的精力，都贡献给煤矿了。子孙后代有些人，还确实在继承着，有些人接他父亲班，还继续干这个工作。不过现在煤矿比以前好干的多，机械化程度高。现在我们回去，家乡人基本上都不认识，我们一代人基本上也完了。有些跑来，这个跑来叫爷爷，那个跑来叫爷爷，光是回去两天吧，把 1000 块钱（没了）。叫一声爷爷，100 块钱，少了还拿不出去，因为南方的水平。所以到家里亲戚那儿都不想去，去不成。咱们一个月才拿多少一点工资嘛。现在我们来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平。600 多，700 块，700 块，600 多，都是这样的水平。好几个现在都死了，都是出不来气。江东林、张阿发，去年死了吧。陆根夫也是去年死了，陆根夫是得的癌症，不在了。他也下井，他是采六区的，后来当机电师了。反正是井下干的，多多少少都是煤肺，有的是动动脑筋他知道，有的不动脑子。张百生，在周寿根那边住着，西沟口，放了一辈子炮，还没有弄上职业病，那人也老实。王正祥放了一辈子炮，现在他的娃在电厂，我说你还可以，电厂工资高，对你还支援支援，身体还保护的不错。沈龙根黑脸，炮打伤的，他对我不太认识。

我是搞机电的，一开始在三里洞矿地面上，电工是到处跑，搞这电工各个办公室都转、看。但是，煤矿工这样的情况，回忆回忆以前的人，还是比较老实实在。再一个毛泽东时代，因为刚解放，像毛泽东那样关心人民呀，人民也关心党的事业，他也会忠心耿耿。毛泽东处处提到人民的事情，人民干活他也提到，不容易。说解放得到自由，在毛泽东时代，从来不埋怨不喊苦的，再苦再累心甘情愿。像我们那一代人，正好是他那种社会造成，条件也不可能达到。从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后来是蒋介石，蒋介石为少数人。像我们这些从建筑单位来的人，确实都是苦家庭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真正都是干的出力活。你到西北来，从年轻时思想来看，有两种情况。一个属于好奇，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求保自己生活。你在上海那时候也是困难期间，刚解放时间不长，只有 32 个工资分，一个工资分才两毛多钱，那干一个月才 32 个工资分。想想，不过那时物价东西便宜，你买这个烧饼才 2 分钱，买油条 1 分钱。看戏弄啥，上海大世界一开始一毛，后来涨到两毛。两毛钱，早起 11 点进去，到晚上 11 点出来，玩 12 个小时。所以说，一切都不一样。我们到这里来培训，一年半的话，上海开支，这里还不开。因为暗地里定的合同，给我们是暗地里，我们不知道。是给南京培训，最后我们在这里干得好，矿务局硬卡下来不给了。曹百合拿着一份合同，我说你咋拿着合同，他说到办公室碰上了，拿了一份，给南京培训。所以一年半是上海开支。

我们来了以后，下井有好多问题，不习惯，看着那么艰苦，都不想干了。最后党中央……那时有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是党中央青年团总负责人，带着两部电影片子，在老矿务局给咱开了会，放了放电影，看《智取华山》。那个白局长，外号叫白球生，他是参加这华山作战的。后来上海专门来了辆公共车，三四十个人，也来慰问我们，到铜川矿务局来慰问了一下。为啥，思想落后一点的人回去是少数，那时是少数，多数 90% 的人还是在这里坚持下来。一来慰问以后，确实干的漂亮，结果到一矿开了开会吧，上海人一个工作面叫上海人新工作面，我记得有条有理，那时田海生在外面巷道里专门是倒车、接煤的，把煤装好了倒出去，把空车倒进来，他干了一生也就是干那玩意。我们来时就是打眼放炮，送巷道掘进，包风钻。我一开始啥都干过，维护大巷道，就是巷道里砌墙放料石。反正我来了以后，矿务局 12 个矿井，我全部都下过，都看到工作的情况。最不好走的工作面是王家河，0.8 米煤头，不到 1 米高，一进工作面就是爬。它那工作面还有五六十米长，60 米长全是爬的，四脚挨地爬着走，在那蹲过点。露天矿是焦坪矿，也蹲过点。12 个矿生活情况我们都了解些的，哪个矿、哪个矿我们坐在一起都评，各矿都有特点。从本人来说，学着他们的特点，回来自己做菜自

己改善生活，也自己学了本事，自己学到东西对自己是点享受嘛。

我们的有些老同志，我认识的比较多。在地面弄啥，知道我这个人，我们来的大部分知道我这个人，不一定认识我。我们在上海几个都认识，和夏俞斗在上海都在一块的，还有这里的肖谷贵也死了，去年上半年就死了。现在陆荣初身体还凑合，反正瘦瘦的。年底在他那儿喝点酒吃饭，和叶佩昌，还有小丁，就是你（家）底下住那个丁福珍，苏北人。一块去了，准备跑王正祥那儿喝酒去了。我说……结果是娟娟，叶佩昌他女子请客了。歇了两天，田海生女子瑾瑾，和你那一块住着的，她在育才马路上面那一套房子。陆荣初说，把我们几个人都找在一起，留念照个像。我说，很难找到一起。我说有些年纪大的想法不一样了，联系了几个问了。他说，唉，无所谓，没意思。我到周寿根那儿几个人说，周寿根还可以。给张百生一说，没意思。他，有几个人对周寿根有意见，因为没有弄上职业病。他说我们南方人都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都是包公式的人物，当官的，不讲交情。我说你自己去找。他说我自己有责任对着哩，不积极。我说那你不能怪周寿根，周寿根后来当劳资科长，我说那你不能怪他。周寿根那地方住了有三个人嘛，林冲其，现在服务大楼住的，我记不起名字，在小楼上住的，小楼上第四家吧，姓史，百货公司后头嘛，咱们五里铺百货公司后面一个小楼嘛，姓史嘛。

**林：**那个不在了，他女子接走不知去哪了。

**陈：**又来了，回去了几年，去年我在他家坐，我和叶佩昌一块去。塌陷下来，把腰塌坏了，一直瘫痪在床上，最后回到浦东以后死了。还有个开水泵的，说起来那都知道，姓徐，闷死在风门里头，那一回死了两个嘛三个。王阿根他们是烧锅炉的，陆德元和张金龙都调到陕南，最后又到文化宫，调回上海。

**林：**张金龙也不在了，也去世了。

**陈：**张金龙？

**林：**也得癌症去世。

**陈：**那你姑姑呢？给你爸那时思想工作做不通。本来你姑姑那时是应该和你爸两个人结婚。为啥？因为都是你奶奶领回来的，你可能不清楚，我知道。我去做思想工作。他下井下的晚，为啥，他搞瓦斯检查员，前线人下完以后，他最后下去。下去三个工作面一跑，那就没事了。没事就到我那儿，出去坐那儿，边上有电话，班长有啥事，出去看一下。后来传说同意了，那时铜川跳舞了，我和你爸两个最要好，去玩去。玩时间长了，晚上他们自己也在那儿玩，在陈造根家，拿洗脸盆敲着。玩时间长了以后，你姑和张金龙两个跳的热乎了，思想也沟通了，想法也不一样了，最后你姑夫也给你爸说了情况。好是好，就是一点不好，这是我妹妹，但是人家不知道我们家庭实底，我们俩结婚不好。你姑说，那不行我找张金龙。结果你爸说你们愿意行嘛。所以你妈是老乡介绍来的，你妈来了姐妹两个，（你姨夫是）开绞车那个顾龙祥，顾龙祥我们两个疲沓惯了，好像不骂不说话。为啥，我们实际上在一块玩和其他人不一样。不要看上海人，这个上海人，他不像人家陕北、河南地区人，没有那个团结。上海人大部分各顾各，不多啰嗦，不在一块玩。我们过年过节来来往往，可能就是你爸和我俩，其他过年过节不来往。

## 这煤考古下来以后，是森林变成的，

**林：**我爸当时怎么从上海来的情况你知道吧？

**陈：**你爸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那时在学习班，才20多岁。年轻学习时只管学习念报纸看新闻，这一吃了晚饭就跑了。你爸在上海学习大队当纠察，也是当纠察。和我一样也是体力活不行，当纠察。因为我们身体都不怎么样，干体力活不行。但是他怎样去建筑公司，

我们两个在一块从来也没有谈过那个事情。你爸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不多瓜葛。我小时候爱打乒乓球，他们也是纠察到里边转转，他工作还特别负责任。他说我们晚上看电影，晚了比较熟悉，就这样过程。你爸是太仓人，我说你怎么到上海哩，那一段历史不太清楚。说是说了，我也忘了，记不起来了。再一个，到矿区以后，就不提那个事情。我一个，还有下边开抽风机的叶永康，你爸，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玩，就是到文化宫跳舞呀，到194跳舞呀，我们三个男的，和女的不跳，看电影弄啥，都是些别的事情。你爸不是喜欢喝点酒，我也喝酒，但是我们俩喝酒不多。那时我当机械师，完成任务发酒。今天你完成了，当时见效，敲锣打鼓西凤酒，给你送到办公室，给你吃的。我们两个也关系密一点，你爸多不喝，反正六两酒，平时一个人在家，玻璃杯就那一杯，喝一点酒。上哪里爬山，到哪里逛，弄一块玩。他有点不一样，有些上海人我们看不惯，不正规。你像童侑那时候，人家说上海小阿飞那种风味，你说流氓不流氓，地痞不地痞，反正他有那个性格，给咱们玩不成。我们是正儿八经的，不敢胡来的。给你说，他们在马路上，又是打口哨，又是说笑话，我们还看不惯。反正那时候是，从你住那对面史家河的山上，桃园山上一直转到新马路的山下回去，那时有劲。再说呢，刚开始也不正规工作，吃了饭没啥事。记得我们买鸡，五块钱买三只鸡。没锅，哈……两个洗脸盆一扣，三块砖一支。打扑克，那时候买花生、买五香牛肉，都在二楼下头住着。一个窑洞住六个人，反正玩了六七天，不lets了。一开始给我们做思想工作，那次参观以后，跑了80个人，那不基本上跑完了。又把人弄回来，做思想工作，要求打篮球。194队那儿有个图书馆，修了个球场，打篮球、踢足球。在史家河单身宿舍，把玻璃都踢烂了，结果老工人都反映，矿上做工作。

我们来时，团支部书记陈炳林，最后说是他带头闹事的，把他开除。结果陈炳林的妈，好家伙，在中央当保姆，可不是一般人。结果上北京一说，好家伙，国务院周总理都知道那件事了。我们上海到大西北支援的，结果一告，告赢了，开除了又把他弄回来，弄回到供应科。那时还没有供应处，就在五里铺陈长寿住那个地方，当装卸工。嘶啦啦，嘶啦啦，拉较链。哪个矿区要设备，要东西，拉较链。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你们这地方不行。那个小伙陈炳林和陈长寿两个文化程度是可以的，刻个寿字都能记下来，他和陈长寿两个能力强的很。史家河书记谈话，谈了以后，最后在供应科干了不行，矿上说不成，给上海公司联系，上海公司来信叫他去兰州，到兰州后，还是当团支部书记，这样子过去了。

我们那些人一来，当时不习惯。就是吃馒头，吃了以后，十个人至少六个人嘴上起火泡，不对劲，好长时间不习惯。还闹了一次笑话，大概来了有九天，记得头一天说是上海人爱吃大米，给我们蒸了大米，吃了一下红烧肉是和豆腐煮的，味道还可以。我们吃了一个，买一个端到宿舍，晚上买酒呀，有几个猜拳，买点花生，打扑克玩。第九天又是卖米饭，有些人脑袋一转，把洗脸盆擦洗干净，拿洗脸盆买米饭去了。买了十碗倒在一起，他看他拿洗脸盆，他也回去拿去了，一下去了十几个，都拿了洗脸盆。这个炊事员操蛋说，你们都拿洗脸盆，你们明天不吃了。我们爱吃大米饭，你们做的少得很，这么长时间，你们才第二次做大米饭，害怕吃不上。有人开玩笑说，你们不是来西北搞建设，你们是来抢米饭吃哩。还有个排的挺操气的，不吃，把米饭一扣，扣在桌子上，回去了。第二天就到教育处闹事，把教育处长的牌子砸了。你们把我们哄来的，欺骗来的。啊，门口有条大河，河里有水，生活水平和上海差不多，有大米，第九天才吃到第二回大米。这一闹，教育处那儿有个女的，人事科长他老婆，东北人，结果以后没事来做思想工作，来我们宿舍，走访走访，来谈谈心。这地方大米确实少，确实有这情况，请你们原谅谅解，做了两三天思想工作。我们一些人吃馍不习惯，买了馍茶炉上铁棍一烤烤起来，烤了香嘛。

主要是不上班整天闲着，下午叫去开会，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矿区情况。矿区整个矿井过程形状介绍，把图纸摆出来，井下什么样子。你说井下的煤咱们咋知道，我们铜川的煤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铜川这地方是黑腰带，采上百儿八十年是挖不完的。我们这地方的煤一直

到青海那个地方整个是煤层，煤到底是啥东西我们是讨论过，那时学习这煤就是木材变成的，但是 100%任何人不敢说这话，绝对不敢说 100%，可以说 60-70%，哪有这么多木材呢？他说亿万年前，地球上没人，结果把我们拉到焦坪去参观，说焦坪那地方是个海洋，说 50000 年前是个大海洋。后来经过地壳变化，就叫地震形式，就把海洋撵去，撵到东海，这地方成了山区。所以那时候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挨的挤实，结果地壳一变给它翻下去，海洋翻下去。可是水流动不是像你这样说说随便冲散，水有水的规律，水有水道。它转的时候，河水不是直的那样走，河有弯曲的。但是水有冲击波，有的水打转转，这一转把木材又冲在一起了，这一转在一起，上头的土把它给埋下去了。当时转的时候成竖形立体，但是土一压，把它分开压平。老师讲的美的。所以说，这煤考古下来以后，是森林变成的，因为以前的森林特别特别多。煤还有年龄，有的煤年龄小，有的煤年龄大，埋的深度还不一样，埋的深度还有老一点，嫩一点。所以煤还有很多种，烟煤、无烟煤、炼焦煤，有的煤特别硬和石头一样，有的煤特别软像豆腐一样，你手一摸它就酥，硬的像大榔头敲敲不烂。有几个地方你可以看，下石阶煤是软的，焦坪煤是松的，榆林的煤你怎样敲怎样打都是小方块，它肉眼看不见，你拿放大镜最小的煤放出来还是方的。所以，煤的形状……

我这个人喜欢听那技术课，觉得津津有味。煤是怎样形成的，像井下怎样投产的，要经过精心设计。首先把这一片地方要打钻井，钻井打下来以后，采了那个煤样，哪边煤高，哪边煤低。在我们三里洞、史家河、桃园和包括王家河这一块地方，一直到东坡这一块地方，煤的形成形式是低洼形的。整个平平的，1000 米到 2000 米是不可能的。在什么地方可以，就是金华山到王石凹那地方一块煤，煤层比较平，从地面看上头是比较平行的。你到三里洞看整个煤头像一个山一样的，苞谷形的，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下头煤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有些采着采着没煤了，落差断了，一个煤在这儿，一个煤放上头了，这就叫什么呢，水的冲击波，一冲就过去了。井下情况也是这样的情况，要成立个煤矿，首先是打钻井，钻井打下来以后，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只是参考资料，70%的参考资料，有的还达不到。比如说金华山、王家河 40%都达不到。

金华山钻井正好钻到煤层薄的地方，煤的边界线，钻那地方 0.8，结果开开以后不是那样，最高煤头七米，平均煤头在五米，煤质相当好，这煤质可以炼焦煤钢材，煤相当不错。一看 0.8 米，以后看来没有希望，最后打了一个井筒，结果采煤以后不相符。金华山工人大部分都来了，开矿以后，老是完不成任务。工作组去也好，局领导去也好，给工人开会讨论也好，怎么说呢，一传话，金华山独眼龙，一根绳要想完成任务不可能。上下人一个井筒，还要下料，还要提煤，还要上下人，还要搞其他辅助事情，都要从这个井筒里下去。运煤一根绳，一直拉到金华山，拉到红土镇，多少距离呢，要四里半地，那是 4500 米，正常使用无极绳也不是直线，也有高低落差，用那个轮子压住无极绳，运煤卡子通过马眼轮子，啪嗒过去了。但是不一定啥时候啪嗒这个马眼轮子出了马眼轮，嘭，跑到上头去了，那就出事故。运煤道上呢，也是会出现翻车，一翻车，那不是一会两会儿人能处理完的，有时甚至一天出不了煤，所以，完成任务也不行。但是工人也说了，我们要完成任务也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们要下去计划，今天布置的任务多少，一天 300 吨，一个班 150 吨。为啥？三班都是两班采煤，一班整修，一个班是 150 吨。我们下去两个小时，一开始做准备工作，第三个小时正儿八经出煤。但是，出煤呢，你坑木问题还没完成，车皮还没有到位，我们在工作面冻的，风量还大，我们披着棉袄，还出不了煤。等有车皮出来了，其他采区把车皮抢走了，为了抢车皮打架，闹到调度室，领导解决问题。可是我们晚上不耽误看电影，上四点班晚上上来看电影。为啥，因为没车皮，穿着工作服上来看电影，电影看完了又下井挖煤，就是这样情况。可王家河呢，打钻眼一下打在厚煤层上，在三米以上，结果开了两个井筒，井还不深，七八十米，上头喊话下头能听见。在绞车房安了个井筒管子通下去以后，在绞车房可以和下头对话。王家河开了两个井筒，结果送巷道正儿八经按图纸进去，正规采煤。送了几千米下

去以后，没有找到三个五个煤头，最高是1米2，大部分是0.8，那等于王石凹的第四层煤。王石凹有四层煤，最低是0.8，最高是5米，平均在3米左右。那么采的话王石凹是采2米。所以这两个矿井就不同了，结果开了矿以后，所有的煤层都是在0.8米，出煤有些困难。像王家河最多时工人2400人，金华山最多时工人达到5000人，最后剩1000来人。他投资方法，计划按井下的储量计划的，最后是不行。

王石凹本来是中苏友好矿，是苏联投资的，苏联来建设的，中国后建。说了半天是中苏友好矿，中国和苏联闹了矛盾以后，苏联人撤走了，专家也撤走了，自己搞自己的，盖的房子都不一样。因为苏联人个子高所以办公室就高，宽大，大部分设备是苏联设备，苏联人个子高，所以啥电机，啥玩意都大、都重，都不一样。日本和德国电机个小，还有劲。为啥？这是我亲自在史家河安运输道，运回来以后，结果是苏联电机拉那个运煤道，拉出车皮一来一回60个，回来30，去30，一律是4个，一律长是4个。一吨矿车，一组是4个，开始拉不动、起不来，把绞车还是停了。到外头采购电机，还是采购回来日本的电机，马力相等，现在是80千瓦，差不多。结果小日本电机开了以后，汪汪叫，轻松得很，拉了无极绳转开了。这是我亲自安的绞车房，运煤道型号安好以后，就正常运转了。苏联电机还发烧，热的还拉不动，日本的设备，不一样。美国电机和咱中国不来往的，为什么呢，在资本主义国家他是60组风，咱们的电机是50组风，差10个，所以他那个铁路系统电机和中国不来往的，他那东西给咱用不成，我那东西给他也用不成。

金华山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完成任务，实在费劲。东坡矿、鸭口矿、史家河矿同样一个地方，它有一个边线冲突。你像说，徐家沟正好像海洋边上，水冲到那儿没劲了。井下情况正好也是那样子，金华山的煤特别好，再一个它地面表层也比较平，顶板形成也好，这个煤它一个40米工作面，采1米8，要求采2米。我到王石凹井下，一看都眼红，我说掌子面完成任务呀，其他掌子面都不要，叫我来采。他一个采掘工作面都拉不完，煤头这么漂亮，简直是漂亮的顶板。我一看，顶板和千层饼一样的，一层一层缓慢下沉，压力还不大，这太漂亮了。我说整个在煤肚子里吃煤，还没有石头，多好。他说你吹牛。我说不是吹牛，我说我在王石凹的土洋结合都有，自己康拜因改的滚筒采煤，现在综采是无锡造的机器，滚筒上下我都用着的两台。他说你是王石凹采五区。我说我是王石凹采五区的。他说光听说。我说我现在不在采五区了。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现在在矿务局生产处，干那玩意。我俩编了，一起说说，我说金华山煤确实漂亮，那时完成任务真不费多大劲。弄这一台机组，工人最多干两个小时就行了，那干一道就行了。你采两米高，直径采1米，但是炮一响以后，你卡出来煤很多。要多少呢，计算不一样。我说采一米就是一米半，采一吨就是一吨半，你140工作面，你算算只要两个小时都完成了。最后王石凹停产检修，修井面，把采五区弄到金华山去了，采二区弄到三矿去了。采五区是4个采区全部停了，我一个包了。为啥？采区你一天要供应车皮，但是完成不了任务。我们说话算话，那时矿长亲自抓车皮哩，书记坐调度室，人家轻松的很。6个小时本来是8点半下井，9点下井，本来是6点上罐，人家3点半就上罐了，生产任务完成了。不但完成，车皮供应不上，他超产完成。这是经过实际经验得出这个，45天看见的。所以王家河把铁路铺进去形成那样，王家河没有盈利，只有赔钱。因为啥，他两个井筒当大矿出煤，招工人，一开始到3600了。建井队打开以后一送巷道，他妈的送几千米巷道都是0.8煤头，找不到一块5米厚的煤头，就是井筒那一块煤厚，你看啥事情。

你像现在三里洞，他真的没煤采？向西部第二水平的煤，美得很着哩。现在人都是脑子里有问题，把工人都下岗了、开除了。这是什么作风，你现在回忆一下，现在还照样出着煤，这个现……有些理，咱们现在还是共产党领导，没按毛老头子那个。毛老头子有缺点，人都有缺点。但是毛老头子的优点和邓小平的优点结合起来就好了。现在嘴说是毛泽东思想就那几句话，向后都是那其他东西。但是毛主席的创举呢，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呢，毛主席对人民



的爱戴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提倡这些事情。处处考虑人民，人民就不会像这样都想发财，见了钱都走不动了，甚至都见了钱晚上睡觉都不安宁了。发愁，有钱也发愁，没钱也发愁，穷人和富人档次拉的特别大，不一样。就和井下采煤一样落差太大，一个在一档，一个在四档了，都不行。

现在像我们这些年龄的人为什么思想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亲身关怀你，所以这些人你就不能忘记。那么也就是古代人说话，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我们生活这个条件，邓小平也好，江泽民也好，我们这脑子里总觉得不能忘记毛泽东。对不对，毛泽东不管怎样，事实做到那儿，为了革命家里亲属死了五六个，他有什么好处，他没有为家庭搞富裕。这个个人崇拜不是他要搞，个人崇拜是下边人，他还反对嘛。文化大革命时他说有些人跳忠字舞，树毛主席像。毛主席说你们一天辛苦了，晚上睡个安宁觉，我一天辛苦了，晚上还要站在外头给你们放哨站岗啊。我站到马路上，黑天白天下雨淋雨把我淋的你们看不见，光想象为你们来着想，你们玻璃窗上到处贴着忠心，你们事实忠心不忠心。你们说毛主席说一句顶一万句，你们听不听，可能一句也不听，你们想怎么搞怎么搞。毛主席一直提防着国家的变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到上海视察，你林彪在家算啥。毛主席高血压发作了，他不生气嘛。党章上规定，他是副统帅，跑到上海市搞爆炸，想把我炸死。说一句顶一千句，顶一万句，实际一句不顶。所以说是像我们这些年代的人怀念毛泽东，不但毛泽东说着，还写在书上，文化程度高的和文化程度低的都能看懂。所以我们那时候，愿意吃苦和毛泽东分不开。毛泽东天天管教着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在井下不怕累，也不怕脏，也就是说死了都不喊冤枉。像现在不同嘛，现在口号提的太多，框框列的太多。他说有些人为什么不听呢，假货为什么多呢。你医院里整天在电视上宣传，宣传啥，医院的刀子是最快的，杀人不见血。要钱是最高的，那老百姓看不起呀。这一月工资跑到医院里，还未看到病，还未抓到药哩，就把一月工资没有了。这个检查那个检查，那个检查这个检查，检查了一圈以后，完了，一月工资没有了，药还没有抓到，病还没看成。那以前看病只要个医疗证，到那儿一看，开药，不管怎么样，他也是医生嘛，那他不是假的，随时给你治病。现在病还未治先把你钱弄走了，这个事实对比。人是最聪明的动物，所以人人说呢，人往上走。对着哩，为什么往上，农村往城市。现在城市失业了，下岗了，那么家庭在二层楼三层楼住着，楼上能种地，不能种地你叫下岗，干啥哩。给你生活费 205，生活费 205 现在为什么不给。自己找出路，国家都给你解决不了，国家给你找出路，对不对。你这成了反贴门神了嘛，对不对。你把门关着哩进不来，那儿找出路。那不是毛泽东这一代人，子孙后代是邓小平这一代人，坑毛泽东叫你子孙后代骂毛泽东。那吃老子的，他没工作下岗了，老子也舍不得叫他饿死嘛，不可能。这个做法确实是毒辣。

你现在对比，不是光煤矿上对比。我们从上海迁移到西北来，为什么，因为上海工业发展轻工业地区，上海可说是一个技术仓库，也可以说是一个技术宝库。技术宝库打开了，把所有的技术发到全国，整个种子发到全国，那发展不是快了嘛。并不是上海人聪明，因为上海人建设看的多，脑子就开阔的快。有些事，矿上工人都说你们上海人聪明，并不是上海人聪明，他看的东西多。上海也是个人嘛，我们西北也是个人，不是一样的人嘛。因为他们没看见，山里人没见过火车啥样子，他咋知道火车这么快会跑了，拉一车拉几千人哩，因为没看见。上海人看见东西多了，做法就是不一样。上海是轻工业地区，从南京到上海，你看什么发展的快，他互相可以联系。你可以做个螺丝，他可以做个螺丝帽，对不对？他可以制造个齿轮，你可以制造个支架，一装起来，一台机器。可是你西北做不到，不行。你新区开发，叫人家来，怎么来，你没有水，你旱鸭子弄不成，井里打水也供应不了多少，不可能的事。唉，今天就给你编到这里吧。

**【陈义祥找青年时期照片】**



158、陈义祥青年时代旧照

**陈：**就剩这一张了，在这里。

**林：**你子女都在哪儿工作？

**陈：**现在不工作了，都在铜川。一个招待所的，也退休了。一个工程处的，一个在文化宫旁边住着哩，一个是在矿务局家属院住着哩，一个在桃园矿住着哩。

**林：**你有个娃也在三里洞，后来破产买断了？

**陈：**和你弟弟弘鑫同学。

**林：**同学。

**陈：**他两个一样大，属马的。那时弘鑫每个礼拜到我那儿玩。你那时候不是在你那个对面小房子里画画哩。

## 张电飞

张电飞，1935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分到红旗工程处（支架厂），1993年退休。



159、张电飞在讲述中

## 每年药费一二百块钱，挂不了几次吊针都挂完了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当时从上海怎样来的？

**张电飞（以下简称张）：**在上海建筑工程局我们是二工区，一般都是年轻人，我那时在上海曹家渡那个地方。支援大西北，想不到到这里来，第一批是到山东的，一批到青海，一批到铜川来。那时候也说不来啥情况，总的一句话，好像光荣的很。到这里来，矿务局领导到上海去说的可好。

**张电飞妻（以下简称张妻）：**可能跑回去不少。

**张：**当时一下火车，就跑回去 30 多个人，在这里下了一年井，主要是培训工作，培训了整整一年。我们在三矿，一批在三里洞培训。我最小，只有二十岁，三里洞有个朱才宝也小，和我差不多年龄。到这里以后，矿务局系统成立个支架厂，到支架厂以后又成立个大修队，一直到现在，大修队、工程队，这个单位名称都改了几个了。从上海来的啥工种都有，木工、瓦工、杂工、架子工，整个一套人，有来粉刷的，懂这一行的，所以自己过来了。过来以后，反正一直干着瓦工活嘛，当了十来年区长，后来要转干，我说干脆不转，到六十岁退休政策也变了，不叫接班了，自己落的一身病，啥都没弄上，工资工资升不上。

**张妻：**到西北这里一点好处也没有，工资也没加上落一身病，现在谁也不爱管了，找哪个领导也不爱管了，一年四季药费都自己掏。两个儿女一个都没有工作，都是待业。人家说俺最亏了，来了大西北啥也没有，人家接个班，俺那闺女、小子都没接上。他落个一身病，现在谁也没人管了。为啥不回去，你现在回去户口有没有也可以，回去这点工资到上海去没办法花。你高消费到上海咋花，亲戚朋友也多，赖好一个亲戚朋友来，一个月工资就完了，咱说实话对吧。回家了三年，算了，老的送走了赶紧回来吧。在外地也没人来，亲戚朋友也远，也好一点。为啥有的说你咋不回去呀，没办法回去，回去几百块钱的工资你咋花嘛。总之，还是收入太少了，那人太老实，啥也没有混上。

**张：**退了休以后接上班也没有啥，说起来干了一辈子吧，原来当个区长，当个组长。当个区长退休的时候不能接班，一辈子也太亏了，啥都没有轮上。73 年动个阑尾炎手术，落个慢性支气管炎，每年药费一二百块钱，挂不了几次吊针都挂完了，家里也失业了。

**张妻：**62 年下放了，我也在家里干活，到 64 年有病。

**张：**我老家在上海南汇。她是 62 年下放了，后来给了些生活费，刚给的时候开了 20 块钱，反正上班的升一点，她也涨一点。现在拿到 360，总体两个人的工资拼起来也就七八百块钱，日子能过去。人家喝好点，咱吃赖一点，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病还可以，孩子没有接上班没有啥，吃咱两个人一点菜嘛，其他也没有啥说的。

**林：**那你子女是啥情况？

**张：**我就两个孩子，一个女子，一个儿子，自己没有生。就是原来老乡回去了，现在宝山，他子女多，给了我一个女子，后来人家又介绍了一个男娃，是这里本地的。都不是我自己的，都成家了，反正娃都是国家的，对不对？当父母亲的责任把他们养大，现在在市场里弄个一人摊位，卖点……反正吃的都是我管着的，自己日用的啥东西能够用，孩子买奶、衣服等都是他们自己的，都可以了。

**林：**你哪年退休？

**张：**我 93 年退休。

**林：**退休以后没有到南方待。

**张：**去也是临时的，临时看望父母亲。家里现在还有哥嫂、妹妹，去转一圈就回来了，也回不去了，心也定了。93 年老母亲病重以后，回去招呼，在那边整整待了三年。送走以后，孩子在那边找到工作了，孩子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到那边不习惯，所以又回来了，重

新回到这里。反正一辈子在铜川也苦惯了，其他也没有啥。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地方，你说回去，回不去，你想回家，现在车费啥东西都贵。在工程处还有几个，毛老福一个，还有叶永康、朱阿宝，就这几个人。杨文芳可能还在，郭国臣，最近去世了好几个。

## 叶永康

叶永康，1932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分到红旗工程处（支架厂）做瓦工，已退休。



160、叶永康在讲述中

## 我到支架厂干自己老本行

**林鑫（以下简称林）：**您当年是怎么来的？

**叶永康（以下简称叶）：**那都是一样的，矿务局是去了两个人嘛，支援大西北来的嘛，自己报名来的，上海市那时候没有强迫，上海市不强迫你来。你愿意来，不愿意来拉倒。一般有啥困难上海市也不管，合同就是一年培训时间，一年培训以前还属于上海市的，一年以后属于矿务局的，是这样情况，培训一样。

**林：**您来了以后在哪儿培训？

**叶：**在一矿，五里铺那边，以前叫史家河，现在叫一矿井。培训没有完，我不干了，我到支架厂干自己老本行，支架厂成立土建队，到现在工程处，一直干自己老本行。

**林：**你老本行是干什么？

**叶：**干瓦工。

**林：**您子女咋安排？

**叶：**都在这里。

**【林鑫转身问叶永康儿子】**

**林：**你在哪儿上班？

**叶永康儿子（以下简称叶）：**失业了。

**林：**现在做啥？

**叶子：**给别人打工。

**林：**你上海话能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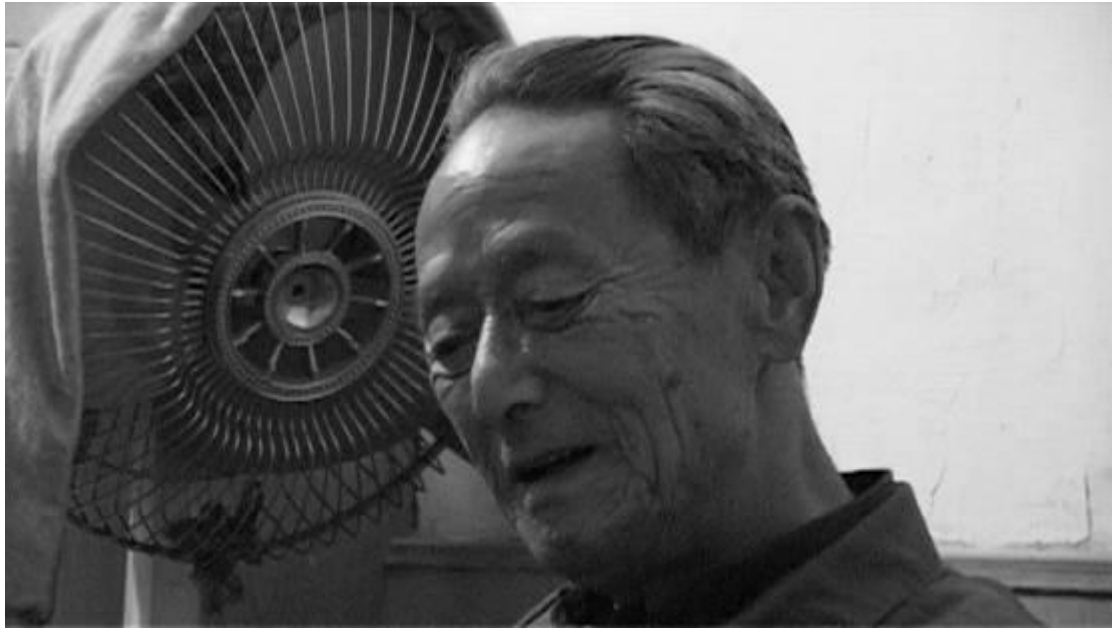
**叶子：**说不了。

**林：**也没到南方去过？

**叶子：**没有。

## 毛老福

毛老福，1955 年从上海来到铜川，分到红旗工程处（支架厂）做瓦工，已退休。



161、毛老福在讲述中



## 我调到红旗工程处当瓦工

**林鑫（以下简称林）：**你咋来西北的？

**毛老福（以下简称毛）：**从上海是动员来的嘛，矿务局两个人到上海来，他动员说怎么好，怎么好，就是这个情况，我是在上海市当瓦工的嘛，自己自愿支援大西北嘛，支援三里洞煤矿。在一矿培训将近一年，我调到红旗工程处当瓦工。到 58 年提拔为工长，我没文化，有文化我老早提拔起来了。83 年吧，9 月 1 日我就退休了。干一二年临时工就休息了，就这点历史，其他也没有啥。

**林：**后来又回到上海去没有？

**毛：**回去过一次，噢，我差不多二十来年没有回去，一个妹妹在上海厂里也退休了，家里没有人了。

**林：**现在你子女做什么工作？

**毛：**大儿子过去在三里洞，后来在铝厂，现在也退休了。老二在红旗工程处当木工，现在也退休了。老三在咸阳汽车公司。老四在西安，知识青年。老伴去世快三年了。

**林：**你在矿务局做什么？

**毛：**矿务局房产科行政处，房产科还管点房子，管点维修。

## 朱阿宝

朱阿宝，1932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铜川，分到红旗工程处（支架厂）做瓦工，已退休。



162、朱阿宝在家中

## 活一天算一天

**朱阿宝（以下简称朱）：**原来上海来的时候，这还记着，不管其他脑子不行。原来是形势关系，一方面国家政治要工业、要煤，从煤炭部建筑部要人，上海正是要减少人，中国那时候形势紧张得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特别是大城市，上海市是有备的，尽量减少建设，建设到内地去，你这个建筑工人有的多，所以，他往外调了，这样子咱们从上海，铜川到上海去，煤炭部建筑工程部两家说好，你要人你到上海去招，上海建筑工人真是人有的多，你不建设了，人有的多，意思是往外边，就这样子过来了的，那大体上这意思，就这样子。一共没有多长时间，两个月这么一说，咱那时年轻，三级到四级工的年轻人，自动报名，支援大西北。铜川矿务局去了三四个人，怎么样子宣传，等了一段时间，上海建筑工程局他要给你说，人到底要给你弄到哪里去，道理要给你讲清楚，这么样子的过程。我是那时年轻，在上海也不行，家里也穷的很，支援大西北出去了，就是这样子。叫下井，一般性先下井半年以后，叫转正期限，你初次没有转正期限。哎呀，来了生活方面也不习惯，不习惯，没办法，回去，回去人也不少，咱是老实，没有啥说，意思说回去，也不要带户口了。那时候卡的厉害的很，要想出铜川，川口这一条路那是没项，矿务局交警是矿上管的，把住了不叫出去，出去叫回来了，有的说回去要带户口，他户口不给你，有的回去等了半年以后到一年，上海户口都解决了……现在在铜川真没法说，说出来是……现在娃下岗了，现在你看吧，一个大的，住媳妇兄弟的房子，没有房子。我现在分这个房子，弟兄两个争着要，我说你们要我到外头去住，现在弄的没有办法，现在生活最终没有办法。说不好听的话，活一天算一天。在单位说起来这房子分给你的，娃没有享受权利，自己的孩子嘛，你说咋弄。这啥都……事情没法说，要不是邻居互相知道我了。现在你看看我说退休六七百块钱，那现在用一部分，自己身体不好看病。老伴去世八九年了，现在是娃下岗了，干临时工也有小娃。那边有个大娃上着班，工资也小得很，王家河干校那边，他干杂活。媳妇原来干干，也下岗了。你看我是，现在光是最后一个更困难，所以买粮弄啥给贴补，你说是光顾自己，不顾家行不行，我光说自己吃的好一点，看着娃吃不上，我心里能吃下吗？所以，反正糊里糊涂，一天天想是经常想，想是不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娃呢，不是他安慰你呢，说不好听也是不懂道理，一般性说，母亲去世了，父亲身体情况啦，各方面注意一点啦，啥啦，安慰安慰，说说心里话，这工作却不……有些事情想说说，有些事情邻居知道这样子，这生活一天天过着就对了，其他就再没法说，生活就弄的这么样。有的说是你以后，你也可以回上海，我说回上海顶啥用，那公家谁管你，公家或者管你，说不好听给你弄间房子也不好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说。六七百块钱，我假使孩子不花钱，顾自己看病还是可以。娃就是这样子，生活就没有办法，说不好听，人家一般是少说一点，一家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只能有一套房子就行了，说装修不装修还好，有一套房子对不。一个老大在北关，说那个老房子拆迁人家准备搬了，想要搬回来，去年那道墙堵住了，他来了，门也堵住。小儿子在那边，老大孩子在这边。我也考虑了，咱已经是七十多岁人了，身体也不好，还能活几天。就是真不行他来了，外头赁一间房子住一段时间，有些事情不好说。你外面想弄点煤棚弄点啥，你房子小嘛，冬天要烧点煤啥，小东西放在棚里面不影响的，公家还说不愿意。我也啥都考虑，我说你拖拉机也能过，不影响人家，你假设弄个煤棚，你光顾你自己不顾人家也不行，这栋楼不是你一家人家说了，那这个事情啥都考虑，公家也不愿意，这个事情就……老乡那里条件确实是好，你给他骗过了吗？

**林鑫（以下简称林）：**张……

**朱：**毛老福嘛。

**林：**毛老福我不太好意思多说，他气上不来，说不成话。

**朱：**年龄大，他现在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老大文化大革命时下乡了，后来回老家，他老家是无锡，离开无锡城里不远。他原来条件紧张的很，后来老大回来了，在三里洞下井。陆荣初你知道，原来在三里洞当过副矿长，他和毛老福关系不错。在三里洞矿干了几年，矿上也不行，调到北关屠宰场，大概待了几个月不行，后来到了铝厂。铝厂条件好，他退休了，工资拿一千多。老二孩子在前边住着哩，也退休了，媳妇也是南方人，三里洞矿的。后来老毛在矿务局行政处管工程，媳妇从三里洞调回来给老干部锅炉房当化验员，也退休了。还有个老三孩子在咸阳。现在说了条件好了更好，闺女考上大学了，现在西安。老毛他家里去世两年到三年了，他现在条件不错，但是年龄大，没有很好的照顾，要是很好的照顾要好一点。

**林：**他身体不太行，说话很吃力。

**朱：**就是呀。

**林：**张电飞家子女一个也没接上班。

**朱：**张电飞他原来是当区长。没有接上是他最后退的晚，最后就不叫接了，他两个娃都要的娃，你知道吧。

**林：**他讲了。

**朱：**闺女是姓王的王祖德（给的），他调回去了，是上海宝山县的，是老乡。他的老婆没有生娃，要个闺女，后来又要了个男娃。男娃也成家有了娃。张电飞现在条件还是可以，比咱强多了。叶永康现在条件也是紧张得很，他娃多，也紧张，没有我这样困难厉害，他比我好一点。他家里也去世了，他是五六个娃，也确实比咱条件好一点，也够紧张，这你咋说，没办法。我也有个亲兄弟在上海，比我小四岁，今年七十岁。我哥去世了。你现在找了多少人？

**林：**现在连 20 个都没有找够，开始主要是找三里洞的，后来找到十来个人，我知道的人都找完了。然后在桃园矿周围的找，现在总共加一起还不到 20 人。我原来知道三里洞、东坡、鸭口还是徐家沟咱南方人有一个区队去了，那边三个矿，金华山也有，反正不多。剩下的也不多了，一个矿也就是两三个人，也没几个人了，你想五十年过去了。

**朱：**我来时才 24 岁。

**林：**你哪一年出生？

**朱：**1932 年吧，今年虚岁 74 岁了，属猴的。

**林：**你最近没到上海去？

**朱：**六年前娃没结婚的时候去过。我想去没有钱，孩子说叫我去，老伴去世了，责任都在一个人身上，你做父亲不想办法咋办？买房子要钱，年轻人买房子、添家具、装修，我走了半个月，他经济方面看来也紧张，拿了一两千块钱，住了半个月我就回来了，我再待下去也没办法。亲生孩子，主动了拿一点，不主动也不行，也难得很。叔伯的稍微隔开一点，那更不好说，娃没结婚前拿了我大侄子 6000 元钱没给。我给我娃说，平时不写信，不通电话，过年时通个电话，没有钱你通个电话，或者写上几句话，或者花个十几块钱，对吧，你不要说个把小时，花几十块钱，不必要，你需要写封信，写封信。娃最近身体也不太好，我身体也是这样子。

**林：**你是在三矿培训，培训完一直在工程处一直干到现在，一直瓦工？

**朱：**噢，一直在工程处，从三矿下来，原来是支架厂，一直在这个单位，后来单位合并了，成立工程处，后来和陈家山建井队一合，一直在这个单位。一部分是到三里洞下井，老毛到三里洞下井，张电飞没有到三里洞去，他也在三矿，他是在采煤区，我在通风区，说起不在一个区队，都在三矿。一共一年多，后来三里洞要移交生产，矿务局要房子，集中要盖家属楼，后来说你们从上海来的有木工、有电工、有架子工，啥工种都有，你们愿意去，不下井在上面干，后来一直在上面。

**林：**你哪一年退休？

**朱：**我 84 年，那时我退休时工资只有 70 多块钱。

**林：**现在多少？

**朱：**现在 700 来块钱。你说个人生活看看病弄弄啥还可以，对不对？娃把你拖的压力大了，你不管是几个老乡，娃压力大，没有我这个压力大。

## 陈长寿

陈长寿，1921年生，1955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1986年退休。



163、陈长寿在讲述中

## 给我们放了电影《顿巴斯矿工》

**陈长寿(以下简称陈):**我们从上海来的时候,那是铜川矿务局到上海直接来招,我们是55年12月份调到这里,那来的时候矿务局说的好听,说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矿是西北第一座现代化矿井,后来我们300多人,85%以上都是井下采煤、掘进,百分之十几那就是地面工,有的不想下去,井下的工作比较艰苦一点。你像陆荣初、姜兴怀一般也下去,包括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下井,采煤、掘进是一线,工作就是艰苦。反正旧社会是对煤矿工人看不起,现在解放了,铜川地区大部分还是瞧不起,煤矿工人一上来不像人,脸说不好听给包公一样。那当然是工作上的关系,到井下都是煤尘,一出汗不黑也不行。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先在一矿井培训了一年,三里洞移交生产,我们大部分都到了三里洞,因为我们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给三里洞矿培训的,三里洞是个新矿,没开采。来的时候大家都心高的很,为啥心高的很,我们在上海没有来以前,矿务局去找我们这一批活动分子,给我们放了电影《顿巴斯矿工》,这叫谁看见谁高兴,穿的白衣服,戴的白帽子,跟原来的医生护士一样,干净的很。所以我们大家信心很高的,都愿意支援西北大建设来。后来伤亡的伤亡,回家的回家,到后来我们这一批年纪也比较都大了,有的都调换轻工作了。因为井下工作重,到40岁以上,根本都没有项,都调到上面来。井下的空气有限,再一个吃的饱一顿、饥一顿,如果上早班吃了饭去,再带一点到晚上才能回来,一般情况下胃病比较多。现在人都老了,也不行了。总地来说,为了国家建设,你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为着国家建设,原来我们在上海工作好好的,为啥要到西北来,因为上海的工人比较多,西北地区需要我们支援,我其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是大老粗出身,旧社会也没有好好上学,就这样吧。

## 对于我来说,100个人也挑不出俩

**林鑫(以下简称林):**在矿上您具体干什么?

**陈:**刚开始在矿上也是采煤,打眼放炮,主要工作是打眼放炮。

**林:**你在井下遇到过危险吗?

**陈:**有、有、有,过去旧社会说不好听的话,井下那是4块石头夹块肉,就是这句话。等于四面都是石头,你中间夹了块肉,就是那个人。对于我来说,100个人也挑不出俩,也没有受过重伤,也没有残废现象,也没有说毁你的面容,你看十几年间就这一点作纪念品。井下的工作那跟开汽车一样,胆子还要大,心还要细,你是莽莽撞撞,吃亏就多一点。当时也是打眼放炮,对身体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炮眼里边是炸药,毒气比较大,一放炮要先进去,放了炮,放炮员进去以后把四面一检查,没问题了,你可以吹集合哨,哨子一吹没事了,采煤工可以进来采。后来到62年,我那时胃病比较严重,什么也做不了,后来经过医院鉴定调到地面工作,调到供应处发劳保用品。干到69年说是三线建设,大煤矿组织几个小煤矿跑到焦坪。谁还在焦坪,想不起来,是苏北人,他可能现在还在焦坪。调到焦坪,焦坪运输不方便,采的煤运不出来,运费一加上肯定成本要高,结果关了。我调到矿务局机关运销公司搞营销,搞什么营销,就是矿务局出来的煤往外运,运出来,搞这工作。一直干到86年,我65了,不是60岁退休嘛,我娃小接不上班,65岁是最后一批接上班了,过程基本就是这样。

**林:**你几个子女现在情况?

**陈:**子女,我的小儿子接我的班,现在运输那地方。我的女子现在二号信箱工作,基本上生活还可以。

林：后来退休到上海去过没有？

陈：我 2000 年还去过一次，现在家里也没啥人。回上海去生活上不行，我们这里工资你看看是六七百、七八百块钱，对铜川地区来说是主流工资，一到上海去，500 元一月还能吃低保，那根本都不行，你能过那种生活去，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都住不了，赶紧回来，他生活水平高，工资比这儿高。

林：你在矿上真正干的时间不太长。

陈：十年，55 年到 66 年，像我这还是不错的，你看林冲其眼不行了，那个谁有的脸黑的。

林：脸黑的沈龙根。

陈：还有一个哩，好长时间没见了。

林：你说在矿务局也是你们一块来的叫啥名字？

陈：记不住了，原来是下井，炮崩的。

林：林冲其眼睛？

陈：也是跑崩的。林冲其原来也是放炮员，我们是同行。

林：周寿根说他五月份才回来，前一阵子回南方去了。

陈：最近好长时间没见了。这两年不行了，因为我得过糖尿病，最近也不行，年龄上去了，这病时间长了，对身体影响比较大。

【陈长寿妻在做饭】

林：阿姨，您哪一年过来的。

陈长寿妻（以下简称陈妻）：他是 55 年来的，我是 57 年来的，也来这么多年了，我来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今年都七十七岁了，年龄不小了。

林：您和陈伯伯都是上海人。

陈妻：嗯。

林：你们的子女还会说上海话嘛？

陈妻：不会，他们是这里生的，这里长的。

林：也没有回去？

陈妻：回去顶多一个月半个月就回来了，回去看看。



## 陆根福妻

陆根福，1955 年从上海来到三里洞煤矿，2004 年已去世。

陆根福妻，三里洞煤矿退休职工，基督徒。

陆平，陆根福儿子，林鑫的同学。



陆根福的妻子在讲述



陆根福遗像



陆根福妻子青年时代旧照



陆根福青年时代旧照

164 (1-4)

## 人死了，等于啥也没有了

**陆根福妻子（以下简称陆妻）：**我给你说，他（陆根福）是1955年来的，我58年和他上海认识，那时候我们交了一年多的朋友吧，怀孕以后我就到宁夏去了。我从宁夏又调到铜川是1960年12月以后吧。我和他结婚一个月我就调过去了，本来呢他说你不要去，就在这里，这里也能找到工作。可是我说不能这样子，我和你结婚就不要工作了？我说就这样，啥时候调过来我啥时候来。领导还很关心，60年12月我就调到三里洞煤矿，和他一个单位。原来他是下井的，在运输区，后来就调到井上，最后到了机电车间，我也在机电车间。他以后当了车间副主任，我是在车间里主扇房工作。反正我们俩基本上还可以，因为刚工作嘛，其他地方呢我们感觉也可以，领导上也可以，我们孩子慢慢地齐齐长大以后呢，上面都是男娃嘛，都下井。结果他们又不爱下，两个孩子，老大下井，老二下井，最后老三参军以后，下井了，他不想下，最后调到上面保卫科。老大、老二呢最终辞职了，孩子在外边干哩，就是自谋生路了。他就在机电上干，生活上基本也可以。家里这么多孩子，就是靠我们两个生活，把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一个个都成了家。现在哩，这一退休以后呢，我总感觉领导在关心上基本没有，哪有关心呀，根本不管你，谁管你哩，根本没有人管你。我们这么多孩子，现在不下井了，工作自己找生路，找生路自己混口饭吃，结了婚以后就这样凑合着过。可是领导上并没有关心我们，反正我们两个生活上也可以，我们两个退休以后也1000多块钱嘛，就是到现在为止，领导上关心并不多。为啥？我认为老汉死，领导上根本没有关心，根本没有人关心，现在真正没有人管，那死就死了嘛。像我们那个矿上，他看病了，并不是可紧急，他是脑溢血，咱也不知道嘛，只知道紧急送医院。本来是矿医院管哩，我不知道嘛，结果送到市医院，市医院两三个小时花了将近2000块，结果只报销了二三百块钱。这一辈子就这样在西北混过去了，我给你说，现在孩子们一律下岗了，煤矿都倒闭了，都没有工作，都在家里，现在孩子们都困难，都没钱。现在没了谁找谁呀，现在矿上就是不像话，你说人死了嘛，医疗费那个钱，他们到现在不给报销呀，该给你的钱没有给你呀，还有1000多块钱呀，我去报了多少次没有给呀。你说我们在西部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关心，谁关心呀，我们就是靠自己这样活着哩。三个孩子结婚了，还有一个孩子没有结婚。就是这，生活就是这，我对领导有意见为啥？这儿都是煤矿工人，现在人死了就没人关心。人死了医药费应该给我们，我说我现在经济困难，我说你给我，已经拖了一年多了，现在还没给。其他我也没说，我说领导在这方面应该关心对不对，到西北来了这么多人，不管此地人南方人，这方面应该关心。人死了，等于啥也没有了，谁来问你呀，没人问你，谁来问你给你说，我就是这一点，其他都没啥。孩子没有工作社会上多了，不是我一家对不对？可是男人死了以后他们这样不照顾，我总感觉是太不像话了。一方面他的抚恤金钱，推到现在还没有给，还早哩还早哩，家里困难谁来问呀，没有人来问呀，谁来照顾你？这几个孩子成家了没有工作呀，没工作你说有啥办法？其他我也没啥，反正我现在自己也有工作，对不对？退休工资也有，就是这一点，其他也没有啥说的。

**林鑫（以下简称林）：**来了这么多人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这里，到最后人都去世了，这事情。

**陆妻：**你看连个医药费都不给你，一年多了，我去问，他说咋了，人家还有好多年的人还没有给钱呢。你看，就1000多块钱到现在还没给，你看我（丈夫）人死了到现在一年多一点嘛，二月份死的。哎呀，我有工作也没求过矿上，像这种情况，你矿上应该……虽说你矿上倒闭，你矿上还有其他领导哩对不对？领导你应该来关心人嘛，来问问，没有人来问，就是这，那死了就白死对不对？现在死了真可怜，啥也没有，只拿了1500块钱的丧葬费，你看看药费还不给你，到现在我说家里困难需要钱，不给你，你有啥办法。孩子们一个个都是

下岗呀，买断的买断，下岗的下岗。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正式工作，都弄下岗了，你说我们到西北工作可怜不可怜？他们那批 55 年来的，我是 58 年调到这里来的，现在矿务局我也没有去过，把我们丢到这里没人管了，成没人管的人了你说。

**林：**你几个娃现在生活怎么样？

**陆妻：**几个娃去打工吧，煤矿也害怕。当时去打工，煤矿出事了，他给人家申报了，你一个小组出事，一个小组的人每个人出钱支付这个受伤的人，他等于干了工白干，看病要钱都是这伙人拿。出事了工人拿，最后不干回来了。反正我这个家在西部也真可怜，我们老家在常州哩呀，你老家在哪里？

**林：**太仓。

**陆妻：**太仓。太仓过去常州，苏州和无锡这两边，就是三角洲。你们还有工作，我们娃没找到工作都下井，你看，现在弄得一场空，啥啥没有。可怜的，你要饭有啥办法，国家政策是这样你有啥办法，你就这样过了嘛，你说咋办？惨得很跟你说，没一个正式工哩，现在都是外边打打工，自己混饭吃吧。反正我一个就是自己的工资，58 年工作到现在，现在涨了 50 才 600 多一点，以前才 500 多，没淘到钱。你爸说起也没福气，像你这俩孩子有出息，按道理该享福了，可你爸死了，你妈死了。俺这孩子不行，也没好的工作，在铜川这地方，铜川根本没有发展的，那是死胡同，真是死胡同，有啥发展的地方，没有发展的地方了。

**林：**陆伯伯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陆妻：**2004 年 2 月 18 号死的，现在死了一年多了。

**林：**职业病？

**陆妻：**他哪里是职业病？我给你说，中间还有一段哩，他脑子在井下受过伤，他是工伤，脑子开过刀以后呢，他也老实，头上开刀应该是几级工伤，也没有人去给他说，也没有去弄，把这个工伤事也给耽搁了，人死了更没门了。

**林：**他那井下受伤是咋回事？

**陆妻：**就是井下电钳工钻巷道，上边石头掉到头上不知道，到后来时间长了，就那几年发现头晕、恶心，一看东西是两个，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鸡是两个鸡，结果去查人家当是脑瘤。那时候矿上有人关系很好，就送到西安陆军医院去看，看的就说是上了手术台就下不了手术台，一上去就下不来了，那也得开刀呀。哎呀，真是感谢主哩，一造影他说不是瘤是血肿，结果马上就改变方法，按血肿处理，把那脑后开掉一块，把血抽出来，就这样好了这几年。那时候我们两个在矿上工作，没有给矿上要求过，啥也没有要求过。现在是脑溢血两个小时就死了，两个小时，早上六点多，我看不行了，咳、咳、咳，咳不出来，正忙活哩，他话不会说了，他睡在这儿把眼睛瞪上了，我马上把孩子叫过来送医院不行了，脑子那个血已经出了 80%，救不了，如果救出来还是个植物人，光会吃不会说话就是这样，后来我说也没有钱，就这样算了，快得很，真正几个小时。

## 跟着男人没有享过福

**林：**阿姨，你一直是矿上的正式工？

**陆妻：**我正式工。我是从宁夏调过来的，我好工作，调到这里呀……吃亏死了。我原先是宁夏吴中发电厂的，现在就是宁夏青龙峡水利发电厂。你看工作调坏了，在宁夏发电厂退休工资 1000 多哩，现在你看刚刚升到 600 多一点。煤矿工人工资低得很，在全国人家看不起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实际上是很辛苦的，一线下井的采煤工最辛苦了。为啥我了解，因为我下过井，支援高产，那煤矿真太苦了。为啥孩子们不愿意下，就这么小的巷道钻进去，钻进去，钻到里边，看看巷道开溜子皮，就是我开溜子采煤哩，跪在地下，那个煤锹上来，锹

到溜子皮上。井下工人真苦呀，比啥工作都苦，还危险，呀，太苦了。再一个煤矿工人这个福利也不好，领导关心上我看差的太远了。不过我们在井上感觉是幸福的了，你看下井多苦呀，下井工人一上来满脸都是黑，只有牙是白的，黑的呀，那井下工人真是太可怜了，哎呀，太可怜了。掘进、采煤最苦了，但是我们机电上的工人的确还是幸福的，就是井下配电室、压风机呀，开水泵的呀，这个地方的人还比较好，最苦就是井下采煤工人，我自己采过煤，亲身经历过井下的苦呀。你不知道到高的巷子上头下来一棍子用木头搭着，害怕呀，咯咯啾啾都响哩，无意中上面会掉下东西。尤其是井下工人，有时候你走的快，走的不快那真的压死了，这么大，嗝，掉下来，正好他走到这里，相差这么远就要命哩，好多老工人都有这种经历呀，你说井下工人可怜不可怜。在井下工作虽说是重工业，跟人家重工业比起来差太远了，太苦太苦了，工资也不老大。你们没下过井，不知道井下工人真苦呀，苦的很，井下工人真是苦。上面王正祥家你没去？

**林：**去了。

**陆妻：**他身体好，没得那个煤肺职业病呀，现在好好的。好多人你去看看，都是气上不来，气呼噜呼噜，走路嘴都是发紫。尤其是掘进可怜，那边那个王少南最后就是矸肺死了，可怜，井下可怜。国家领导要真正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太可怜了，他们用煤的不知道井下的苦呀。我们下边自动化水平不高，就是溜子，人工采的，康拜因恐怕没有几台，都是人工采的。就是自动的没有几台，还是人工采煤。你看人工采煤多苦呀，跪在地下，把那煤一锹一锹，锹到溜子皮上，你看苦不苦。呀，我说现在真是，我们国家工业上也不发达，不像外国，下井都是几个人能管理一个煤矿，就是自动化，中国不行，中国都是人工操作，多少人来工作，就是我们煤矿 5000 多人。我们过去支援高产，每个小组每个礼拜支援一次，就是几个月下一次，支援高产。其他地方我也去过，我也看过，可怜死了。真的，我们中国就是比较落后，都是人工采煤。

**【找照片】**

这是我姐，这是我妹，姐妹都在上海，我跑到可怜地方了。这是他全家像，这是他老家的，这是他朋友。40 多年了，我 18 岁离开上海的，你那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上海支援西北建设，我们支援报名先到宁夏。

**【陆根福妻子年轻时滑冰的照片】，**

**胡菊芳（林鑫的妻子）：**阿姨好看的很，阿姨年轻时漂亮死了，让人可羡慕。

**陆妻：**像不像电影明星？这是 59 年照的像，20 岁嘛，我 20 他 24，差 4 岁，那时彩色相片还羡慕啊。现在 66（岁），40 多年了，俺这一生是可怜的一生，跟着男人没有享过福。你们这一代有福，俺这一代苦死了。我得了两次癌症，十三、四年开了三次刀，第一次是胆结石，胆结石以后乳腺癌，乳腺癌开了子宫癌。上帝给我好身体，这是主救我，上帝不救我没有我这个人了。四个孙子，一个孙女，老大老二都是两个孩子。（陆平）下井在掘进三队，后来不干了，自动退出了，在外面做生意，现在铜川生意难做的很，你不会做，老是赔，把人赔害怕了。

## 打工嘛，跑到神木那边打工

**林：**你哪年到矿上的？

**陆平：**我 82 年矿上招工，在三里洞矿掘三队，一直干了有两年，不干了。

**林：**你也在井下干过，你现在如何看父辈？

**陆平：**他们反正是辛苦一生，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好。反正是从我记事开始，还有在井下干了那么多年，感觉到父辈们确实是付出了相当的辛苦，过去咱们家庭情况都是属于温饱问

题，父母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起早贪黑，为煤矿干了这一辈子。井下这工作，活吧反正是出力的，你让我现在有啥感觉我也说不出来。

**陆妻：**不过你们两个还好，他们姊妹几个都好，他弟弟在上海，这是凭自己，在复旦大学当老师。你妈真是没福气呀，哎呀，真没办法说。所以，此地人不愿意下井，再苦不下井，不像我们南方人下井。

**何菊珍：**记得兰兰找对象，一提煤矿工人，你姨夫说啥不同意，只要是煤矿工人再好都不要。

**陆妻：**生命没有保障，尤其是掘进、采煤的最可怜了。

**林：**你下井遇到冒顶危险没有？

**陆平：**遇到过，我为啥不干了，咱年级不是有个赖金刚他弟弟，被矿车把头挤住，挤死了，从这以后我就吓得不敢干了。

**林：**也是咱们一级同学？

**陆平：**赖金章在你们那儿住的，那年轻，也就是二十一二吧，一出事故我就不干了。

**林：**你现在主要做什么？

**陆平：**打工嘛，跑到神木那边打工。采区干了半年，才回来，井有 200 米深，顶板比咱这儿还好一点。

## 裘水标

裘水标，1960 年从浙江来到三里洞煤矿，曾是朱永生的徒弟，已退休。



165、裘水标在讲述中

### 他说你跟朱师傅学吧

**林鑫（以下简称林）：**裘叔，你就把那时你和我爸认识时的故事讲给我听吧。

**裘水标（以下简称裘）：**我可以讲的，你爸……我来的时候，我是 60 年来的，你爸是 55 年来的，支援大西北支援到这个地方来的。上海、浙江、南方都有，你爸调过来到通风区，就是当瓦斯检查员。我是到 60 年才过来，劳资科给我直接分配到通风区了，那时我还不认识朱师傅哩，过了几个月的光景，那时是谁当区长哩，那个叫……想是能想起来，现在还在哩。他当区长，他说你跟朱师傅学吧，他是你师傅你跟他学。我说行嘛。所以，我就跟朱师傅学开了，瓦检学过以后，朱师傅这个人那在工作当中踏踏实实，最是勤勤恳恳的。那人跑，一点都不偷懒，他也不休息，他也在转。总是叫我，你歇着叫我去。我说我还刚开始嘛，你跑到哪儿我也走到哪儿，所以我一直跟他。大概一年来光景，区长叫我顶班，他说你一年了，可以单独工作了，我说可以。我单独工作，这样我跟朱师傅两个人就分开了。朱师傅这个人呀，勤恳嘛，他可好，所以谁都拥护他，所以一再跟他学习，他带的徒弟也不少、确实不少，我来时是带了好多人嘛。以后区长叫我当测风员，单位是一个单位，但工种不一样。我是搞测风嘛，瓦检员已经出师了，自己能单独工作了，所以他说你搞测风吧，矿上一共只有两个测风员，全矿这么多单位，瓦检员多，瓦检员几十个哩，发展到三四十个检查员，他慢慢发展，慢慢扩大嘛。这个矿越来越大嘛，瓦检员也越来越多。所以，跟他干了以后我就当测风员，一直搞通风，每个工作面多少风量，需要多少人员，多少风量。那都是一个人

要多少风才能供应，你少了风量也不行，怕出事情嘛。没风事故，事故多的很，那瓦斯要爆炸。所以一直是搞那个通风。你知道那时我来向你要帐嘛，但是我在矿上一再打报告，给徐主席，工会主席，我说确实是小朱有些困难，弄不了，他说我给你慢慢研究研究。我想给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少拿一部分，大部分我都给你免了，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来要过嘛……来过一回，我再不来了嘛。我退休以后，这笔帐到时把它勾销就行了，在区里给他一垫，不垫出来不行，这笔钱你不垫有个位置在那里，那工会会员都有一笔钱嘛，把他退了，萝卜有个坑了嘛。所以通风区到最后我一退就把它勾销了，销了就没有这回事了。那岳邦峰是区长，我干工会主席干到退休为止嘛。情况经过，那你爸的事，勤勤恳恳一直工作细心的很，那个人细心得很，他自己身体弱，体力是很弱，你爸的体力不太好，真不太好。他都是跑巷道，巷道低嘛，他跑过去满身都是汗，天天是这样。他反正不偷懒，一直干，干到完成。假如投机取巧，这个工作面我知道了我不去了，把它盲目一写就完了，上来就好交差了嘛，交接班一交就好了。朱师傅这个人确实工作上面勤勤恳恳，一点都不偷懒。他跑工作面干活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哎呀，他满身都是汗。那我一直考虑，朱师傅身体弱，我说叫我给你去跑，你歇歇。他不行。所以我各方面、各个工作上对朱师傅（印象）最深的，他的工作真是勤恳不偷懒。工作上面嘛，天天如此。我们的工作直接看起来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啥。那有的还是假汇报，各方面都有，不跑工作面，上来一填一写算完了。

**林：**我听他们说瓦斯检查员每天在井下要跑好多里路。

**裘：**哎，掌子面多嘛，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分开的，那你还要检查其他巷道，其他没有人的巷道，那儿万一冒顶、风堵住了呢，风量就小了嘛，掌子面就要出事哩。那就要跑路远嘛。有采煤的掌子面，有掘进的掌子面，掌子头，掘进是一条巷道嘛，掌子头嘛，矿上有12个掘进头，7个采区，反正是这么多人，矿上过去是3000多个人。

## 噢，那是冒顶碰住了

**林：**我爸上回出事故那个事你还记得吗？

**裘：**你爸啥时候？

**林：**脚受伤的那次。

**裘：**噢，那是冒顶碰住了，我也有这个事嘛，你爸也是冒顶，你掌子面跑过去以后，顶板烂了嘛，不太好嘛。它有时不太好下来，下来了你要跑得快呀，手快、腿快、脚快，各方面都得要快，你才能跑掉，慢腾腾的，你根本跑不掉的，那这是实际情况。那冒下来以后，把他脚碰住了，他这事故就是冒顶片帮，就两个。咱检查就一个冒顶、一个片帮，你要过去他片下来一片、一大片，片不好把谁压住了，片好了你侥幸穿过去了。一弄就忘，记性很差。矿上就是天天上班、下班，吃完饭就走了，到晚上下班就回家了，天天如此，哪讲啥嘛，讲不成嘛。

**林：**像我爸爸辛辛苦苦一辈子，干到55岁到退休年龄了，得病去世了，从年轻时到矿上一直干，为矿上献身，干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还欠矿上几百块钱，苦了一辈子，是不是，煤矿工人挺恹恹的。

**裘水标妻（以下简称裘妻）：**想回南方，反正回家，我啥都不要了，反正回家哦，回老家去，他都不想回老家。

**林：**裘叔叔后来回南方去过没有？

**裘：**87年我父亲去世回去过，再没有回去过，因为那边生活水平太高，这边太……所以回不去，我不敢回嘛。

**裘妻：**我弟兄姐妹多。

**林：**你回去是长辈，结婚呀什么，送个份子四五百，一个月才挣七八百，两个人一送喝西北风，没办法吃饭，没办法待。

**裘：**没办法，我就是考虑这问题。

**裘妻：**俺们一共 600 块，你要一送，你一个月不要吃饭哦，不敢回家。

**裘：**不敢回。

**林：**你那时是咋来的？

**裘：**是我哥在这里，和你爸一批嘛，他给我介绍到这里的。

**裘妻：**60 年没有吃的，58 年大跃进你不知道。

**裘：**我总算到这里来了，他介绍我到这里来的。

**裘妻：**现在想回家也不容易嘛。

**裘：**不容易，不容易。





166、《三里洞》剧照

## 第六部分 噢，父亲

### 燃烧

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层中燃烧  
那时我太小这种深刻的绝望无法感受到  
只是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  
看着一辆辆汽车装着一排排棺木不知有多少  
同学们相互传递着瓦斯的爆炸  
有人说瓦斯过后的人体象烤熟的红苕  
我只在父亲的瓦斯鉴定器中  
窥见过七彩的颜色象彩虹在我的心头照耀  
母亲在晚上再也睡不好  
等着父亲等着父亲的归来平静的脸上隐藏着心焦  
凌晨三点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  
我和母亲走在死城的马路当中听得见山上的狼嚎  
父亲的腿上打着石膏  
苍白的脸上浮着微笑  
在那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坚毅里  
将心中美好的愿望一点一点全部蒸发了  
曾有过欢笑曾谱过曲稿  
这所有的一切在哪里不知道  
不幸的父亲总算没有死在坑道  
临走的那天紧紧抓住我手摇了摇  
没有希望没有微笑  
从此那黑色的矿井再也抹不掉  
昔日的小伙伴又走上父辈的路  
昨天 XXX 已在井下报销

2000年3月27日下午4.30分

### 噢，父亲

你头上戴着矿灯星星一样闪着  
在一队黑色的鬼影中叫着我的名字  
我胆怯地躲在更衣箱的旁边  
任黑色的胶靴象水流一样从眼前飘过

所有的鬼影只露出眼白和白色的牙  
所有的灯光在幽暗中交织出光线的网

你的慈祥消失在黑色的看不见的记忆里  
拉着我的手我便直觉地认为就是我的父亲

黑色的浮沫冲去身上黑色的煤灰  
污浊的脏水中露出一根根惨白的肉  
眼睛里依稀布满着血丝的眼睛  
粗狂的吼声里辉映着麻木的笑容

巨大的阳具一根根垂下  
所有的笑容只剩下一排又一排的白牙  
我赶紧扑扇着幻想的翅膀再  
    一次飞过泥泞  
穿过一个个木讷的身躯像  
    穿过一座密密的树林  
站在矿车的夹缝中透过选煤楼  
    黑色高耸的身影  
天轮旋转着  
我看见寥落的夜空里  
有一颗孤独的星

2000年2月27日晨

## 不能忘记的父亲

不能忘记的父亲终于度过了漫长的黑夜死在黎明  
岁月的齿轮早已将他全部的棱角打光磨平  
父亲扎给我的兔子灯我现在也扎给我的儿子  
只是那暗夜里讲述的珍珠塔玉蜻蜓成年后才知其名  
那深沉的男低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伏尔加河  
那纤夫痛苦哼唱的难道是我的父亲  
父亲手抄的课本成为我最初的启蒙  
父亲的严厉也给我的身上留下累累鞭痕  
我痛恨我的父亲冷漠的外表下一颗受伤的心  
只是随着年岁的渐长我第一次体验了父亲全部的沉重  
在暗夜里我的可怜的无助的父亲  
我的神明

2000年3月27日下午6点

## 沉默的风景

当黑色的煤层变成了红色的火焰  
一只灰雀在刹那间掠过寂静的蓝天  
人们终于拥有了象猪们狼们一样多的奶头  
五彩的头发在广场上海浪一样翻卷  
叉开的双腿不能掰的更开  
妓女成为最令人艳羡的职业  
一朵又一朵的白云现出女人体的形状  
一座又一座的高楼是一根根勃起的阳具冲天  
再也不需要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生灵在天地的夹缝中谱写出无尽爱的诗篇  
一棵梨树紧紧搭住一棵木棉  
一只小狼对一头老驴进行着鸡奸  
子夜的狂欢中传来哥里高里的圣咏  
迷失的灵魂就象送葬时漫天飘落的纸钱  
所有的鸟没有了翅膀穿着拖鞋  
所有的人没有了五官只露出光秃的脸  
所有的树干没有了枝叶却长满圆圆的果实  
所有的时间永远地凝结在今天下午的两点  
说什麼都已经太晚  
生命的进程不可逆转  
去人幻想出两栖三栖的人类沉迷于做爱的虚幻  
其实生命的故事早已消逝在昨天

2000年3月25日

## 在开往西线的列车上

窗外的树木一排排掠过  
玻璃上重叠着一张少女的脸  
那略带疲惫的面容微笑着  
辉映出青春全部的灿烂

爸爸妈妈年轻时支边  
将种子撒在遥远的北疆  
那剩下的全部岁月  
就是在梦里也呼唤着南迁

所有的积攒全部奉献给漫长的铁路线  
他们象候鸟一年一度地永远朝南  
岁月的风沙已磨尽了父母的岁月  
他们的一双儿女一南一北  
就象被三八线隔在大地的两边  
少女的心中抹不去南飞的宏愿  
哪怕那漫长的铁路线漫长无边

每当我坐上这趟开往西线的列车  
同样的故事总是一遍遍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的眼前浮现着少女那双忧郁的大眼  
她现在不知是仍在北疆还是已经南迁

2000年3月29日晨

## 我依恋着母亲

我依恋着母亲就象鸟儿的羽毛尚未丰满  
超不出三月的诊断犹如晴空的雷电  
我跨上自行车拚命往家赶  
眼泪河一样淌在马路上  
烈日行人朦胧一片看不见

系着母亲的心愿踏上列车直向南  
弱小的我撑不起一条远航的船  
所有的希望全部在焦急的期盼中一点点抖落  
我陪伴着母亲向她讲述着蓝蓝的天

母亲沉醉在遥不可知的记忆里  
说起外祖父小时候买给她的青梅多么甜  
我沿着河边跨过小桥将太仓城踏遍  
为寻找青梅从凌晨三点一直奔走到傍晚

母亲的微笑母亲的痛苦我早已不知道  
只是一分一秒地把这最后的时刻煎熬  
母亲去了母亲走了我没有一滴眼泪  
终于从哽咽的嗓子中发出一声悲惨的嚎叫

我是长子也许应该呈现我不再弱小  
我还要带着弟妹去把未来的岁月寻找  
平静的脸上早已不再有悲伤  
就好象我的心中早已将母亲遗忘

痛苦的种子在漫长的冬眠中一点点发芽  
我的母亲每天在梦中回到我的家  
母亲的指责我的虚弱都无法说清  
白天的我晚上的我是两个分离的魂

2000年3月29日午

## 梵高 黄色的梵高

金黄色的麦田上惊起一群乌鸦  
中弹的你鲜血流在地下两眼望着天涯  
刺目的阳光合上你疲惫的双眼  
阿尔的大地成为你最后永远的家

昏暗的汽灯映着吃土豆人们憔悴的脸  
在荷兰阴暗潮湿的屋檐下生命就象豆腐渣  
你躲在墙角不发出一点声响  
只是细细地将这一切描画

你想把神的旨意带到黑暗的矿井下  
太伟大的心灵神灵无法接受他  
向日葵呀鸢尾花  
在你的身后创下天价

阿尔的吊桥赶快放下  
咖啡厅的红色血一样可怕  
割下的耳朵洗干净  
你说要在星月夜中送给她

奥维尔的小教堂在紫色的空气中昏睡  
一把无根的向日葵在黄色的陶瓶中胡乱插  
黄色呀黄色太阳的颜色洒满你整个的卧室  
窗外的大地上继续生长着疯狂的鸢尾花

一张张扭曲的自画像遮不住一张张痛苦的脸  
放风的人们被四面的高墙挡住了视线  
一只蝴蝶按照你的意愿想越过高墙  
弱小的身躯却终于没能把自由兑现

太阳的烧灼将你送进了疯人院  
加歇医生的高超医术也无力回天  
从唐居伊老爹处赊回一管管颜料  
已注定你一生的在劫难逃

可怜的西恩情愿重新去街头卖笑  
也不愿跟着你活活地忍受煎熬  
你用全部的激情画出痛苦  
抱住一个风尘中的女子把全部的热血燃烧

得上了性病使你的生命更加富饶



所有的苦日子全是对未来无情的嘲笑  
为了那千秋万代的艺术哟  
我们不能让艺术家生前过好

黄色，是希望的煎熬  
黄色，是痛苦的吉兆

2000年3月30日

## 生命的结束是死亡的开始

生命的结束是死亡的开始  
无边的死亡却把有限的生命封存  
一个偶然的生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一颗消逝的流星刹那间无声地掠过天空  
考拉熊静静地看护着自己的婴儿  
精神病院的楼道内在夜半总传出一阵阵绝望的歌声  
山谷中的一片片灯火  
就象在黑色大锅内煮沸的一群星星  
一个个绝望中结束的生命  
等过了漫漫的冬夜等不到春天的黎明  
死 是一种幸运  
自杀 是一种将生命折断并迅速推向永恒的自觉  
一种主动  
应该对西尔维娅·普拉斯表示尊重  
她勇敢地用自己的双手掐断了自己的喉咙  
新的生命不断地产生  
多的超过满天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地震 是一种福音  
一瞬间便将数十万的生命浇铸成青铜  
毁灭 是一种期待  
没有灵魂没有诗歌  
没有罪恶没有自我

2000年3月30日午

## 黑色的记忆

有个问题在脑海中想了好多年  
为什么黑色的煤炭却能喷出红色的火焰  
几亿年前绿色的森林沉睡了  
沉睡前的森林里一定是鸟鸣雀欢  
我背靠着大地面向蓝天  
蓝天还是和几亿年前一样蓝  
面对着我凝视的双眼渴望的期盼  
他表示出一种博大高贵的漠然

森林早已死去了已经死去亿万年  
那绿色生命的化石  
演变成坚硬无比的尸体  
黑色的煤炭  
在千米下的地层中蔓延  
一口口矿井在巨大的尸体上钻探  
被炸碎的尸体  
一块块一车车源源不断地运上地面  
掺合着矿工的生命和血汗  
又被运往大地的  
东——  
南——  
西——  
北——  
形成一朵朵小小的火焰象一曲曲哀歌  
述说着消逝在记忆深处的沉冤

绿色的森林  
黑色的煤炭  
有着那么漫长的记忆和幽怨  
唯一能够做证的蓝天挺着冰冷的脸  
我俯身背朝蓝天  
拥抱着沉睡的大地  
终于在春梦中听到了  
几亿年前的雀鸣鸟欢

2000年3月30日下午4时

## 黑色的闪电

黑色的闪电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有点痉挛  
希望的岛屿发出春天的呼唤却是一条无法启动的航船  
心灵的港湾在黑色的浓雾中轮廓消失了茫茫一片  
记忆的深海中没有光线也涌不起一丝波澜  
欲望的火焰穿透了生命的极限  
死亡的礼赞只能用鲜活的生命进行铺垫  
希望,是闪电  
绝望,是沉船

2000年4月1日凌晨  
于醒来前的最后一个瞬间

# 狼

夜幕低垂  
西北山坡上一只狼的  
眼睛里映现出城市全部的灯火  
在疲惫的眼神中  
消尽了昔日的锐气并  
呆呆地凝视着  
像一尊雕塑已在漫长的风雨中变得残破  
狼的生命已经不多  
他独自离开他的族群  
经过漫长的跋涉  
在星光照耀着的  
夜晚不停地奔走在时间的  
追忆中  
恍惚的神情  
仔细地辨认方向  
父母早已死亡死在离开这里的时候  
但那种气味  
依然停留在当年的  
空气中  
狼循着这特有的气味  
来到祖辈生息的家园

地上的星星多得已使  
天上的星光暗淡  
他在遥远的记忆中  
拼命地搜寻  
脑海中闪现出  
一片浑浊的颜色  
思想已经短路  
只有这独有的气味  
弥漫着  
一只黑色的枪管在悄悄地向他靠近  
狼慢慢地闭上双眼  
没有痛苦

2000年4月2日下午

## 两朵并蒂的花

两个孪生的姐妹是两朵并蒂的花  
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微笑人人夸  
两人小小的辫子上都扎着白色的丝带  
两个可爱的孩子却只有孤单的妈  
羡慕着别人的父亲缠着母亲问  
我们的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妈妈没说话眼泪不住地流  
你的爸爸睡着了睡着了在井下  
两个孪生的姐妹是两朵并蒂的花

2000年4月5日夜

## 小妹

常想起小妹忍不住心中牵挂  
父母去世时我们已经长大  
那时你最小还在中学读书  
忍受的痛苦一定比我还大  
平静的脸上没露出悲伤  
默默地把全部的苦难吞下  
踏上选煤楼你走着父亲的路  
还没干几年就已把岗下  
有了孩子支撑起一个家  
在市场摆摊卖着围巾和鞋袜  
辛苦了几个月只挣下手中的货  
小妹病了我送去两盆盛开的花  
我们不是苦命的爹妈  
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好过长过他（她）  
忙着自己的生计日子过得飞快  
此时想起小妹已是深夜我眼中含着泪花

2000年4月6日零点10分

## 这里曾是我的家

这里曾是我的家

两排公房长长的一二层向东三层向西建在山脚下  
小伙伴长大房子不够住每一家门口都盖起二层的小楼像宝塔  
一个接一个的在过道排列着没有人感到惊讶  
小小的窗台上有着几棵干巴巴的大丽花

这里曾是我的家

夏夜里家家户户躺在门前的凉席上  
煽着扇子穿着裤衩大人们相互说话  
小孩子捉迷藏在满天的星光下  
黑暗中烟头的火光红红的像信号请绕开它

这里曾是我的家

睡梦里也想着担水排队在四层楼  
在中间水管在大院在河东的井边  
水桶多次掉在井中又捞出在那春秋在那炎夏  
总是缺水幻想着满天的大雨溅起一片片水花

这里曾是我的家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黑暗中知道水沟在哪  
父辈们很多已消失邻居们早已更换偶然  
路过难得见一张熟脸一群娃娃  
在狭窄的过道上奔跑着叫喊着把仗打

这里曾是我的家

一块块砖头一块块瓦二层的小楼经过了  
多年的风雨依然矗立着父母已去世弟妹已迁出  
孤零的房子中住着的人我也不认识只是在  
眼前还仿佛映现着全家在一起度过的苦乐年华

这里曾是我的家

说起它不管是甜蜜不管是忧伤当年的一切  
都已经改变我已经变老增添了白发  
匆匆地度过无数的岁月已经没有感觉在  
记忆的深处依然清晰的记着  
这里曾是我的家

2000年4月6日零点30分



## 大妹的婚期已经订下

大妹的婚期已经订下  
母亲的生命闪着最后的火花  
我心中巨大的恐惧无以复加  
这两个重大的日子千万不要在同时发生  
有啥办法  
有啥办法  
我绷紧的心弦上再也没有任何想法  
绝望中的我被痛苦冲昏了头脑心想  
让我问问妈妈  
一瞬间的惊醒我呆呆地站着发傻

2000年4月6日凌晨1点

## 烛 光

烛光在背后拉着长长的影子  
那里隐藏着内心全部的沉默  
孩子的脸被烛光映得红红的  
一股暖暖的空气寒冷已退到门外  
一本小人书摊开在烛光下  
没头没尾展现着一个纸上的世界  
双目紧紧地注视着书本  
空气中有一丝头发被烧焦的糊味

2000年4月6日晨

## 三个层次的星星

世界上有三个层次的星星

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空间占着长短不同的时段

第一层星星在天上在晴朗的夜晚布满天空向你不停地眨着眼

第二层星星在地上灯火闪现在每个城市和村庄每一个夜晚伴着你的无眠

第三层星星在千米深的地层下不分白天黑夜一盏盏小小的矿灯

闪耀在地球的心里你已看不见

2000年4月6日晨

## 第四维空间

两块镜子面对面  
映现出无数的镜子  
无数的镜子重叠出  
一个深不可测的视野

有谁胆敢在镜前起舞  
回应他的是千万只手臂  
千万只手臂的下面  
千万条腿奔跑着  
草原上无数的马蹄

无论你朝着哪一个方向  
总有你无数的眼睛  
默默地望着陌生的你  
无法回避

一刹那的跳跃  
一群鹤飞在幻想的夜空里  
像一条白色的闪电  
穿透无数层镜面

只要你不停止跳跃  
她便不停止飞翔  
无意中你越出镜子的视线  
群鹤便在一瞬间消失

两块镜子面对面  
便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2000年5月12日

## 第七部分 王小鲁对话林鑫

人物：王小鲁（电影评论家、策展人）

林鑫（纪录片作者）

时间：2009年7月

方式：E-mail

### 群像具有的力量

林鑫生于1960年，居住于陕西铜川。2005年到2007年间拍摄纪录片《三里洞》，之后完成了纪录片《同学》，两部片子都在一些电影放映活动上有获奖纪录。林鑫没有受过专业的电影教育，他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同时是一个画家，并出版过诗集。

《三里洞》和《同学》拍的是他身边的生活。前者拍摄的是自己的出身——关于父辈的故事。他的父亲等300余人在特殊时期从上海来到陕西铜川，是以“支援大西北”的名义。但来陕后却发现组织许诺的待遇都没有兑现。这里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是三里洞矿井下危险且没有自由的生活。多年后这些矿工退休，煤矿也已宣布破产，300余人只剩下数十人，患职业病的矿工们生活无着，连医疗保障都没有。有人说这是一部“充满了怨恨”的电影。《同学》则拍摄毕业于三里洞中学78级的同学们，如今他们已届中年，林鑫描绘了他们在今天的生活面貌。

两部片子的拍摄手法很相似。《三里洞》是14位矿工的口述史，加上导演的父亲，一共呈现了15位矿工的工作经验和人生故事，《同学》则描绘了23位同学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到，林鑫喜欢拍摄群像式纪录片。群像式纪录片不只是致力于描绘一个群体，还致力于描绘一个时代，力图获得更广阔的社会景象。单个平民的命运若没有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没有被剪辑到一个片子里作为一种互相的对照和应答，那么某个孤独的悲剧经常会仅仅被看作个人的不幸加以对待。若以单独的故事去做一个社会性的判断，也经常显得证据不足、论说不充分，这种群像式做法，就是力图为小我的悲剧找到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这种做法本身是具有政治性的。

《三里洞》和《同学》都呈现了某种一致的素质。这是一个中年导演的作品，情感深厚、笃定，工作方法略显笨拙。但当一个人如此坚定地以那种笨重的方法完成了一种深长的表达时，你会被它感动，从其中你也能获得一种厚实的美感。

《三里洞》的方法是口述加具有解释性功能的画面，口述包括对历史的追溯——矿井下让人恐怖的死人事件，包括对当下生活品质的倾诉——居住环境和没有得到善待的人生境

遇，也包括子女的去向——他们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对父母也往往不孝顺；那些画面则多是相关的矿区内富有质感和历史内涵的空镜头。由于没有对事件的跟踪，过去和当下的状况都只是使用了口述的方式，因此电影所展现出来的当下发生的时间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停顿的。加上使用了黑白画面，画面里是破败的居住环境，以及讲述者作为生命衰退期的老年人……片中由此呈现出一种死寂感，而这都恰如其分。但《三里洞》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对过去的价值的全盘否定。

《同学》的创作方法是对23位同学的一天进行分别跟踪拍摄——它们有的在开照相馆，有的沿街叫卖卫生纸，接下来就是他们坐下来谈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观——有的人说他为了生存身心俱疲，有的说他现在心灵极度空虚。同学们都已是中年人，但却不能将《同学》看作是关于中年危机的片子。“中年危机”这个词所界定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它无法揭示这个社会的特殊性。《同学》表达的不只是中年危机，更是社会危机，因为社会不能给予其成员一种价值实现的空间。

制作这个片子就像进行一项社会调查，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严谨，或者朴拙。每个故事都严格按照上述顺序进行拍摄，而剪辑也只是把这些人物按照某种逻辑罗列起来，在结构上显得缺乏经营。甚至还有更极端的做法：在描绘每个人物一天生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人物从上班到下班的每个动作都逐一进行描绘，上车——在车上——下车——等车——坐上一辆新车——在车上——下车——行走……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小心谨慎地使用纪实主义手法，好像在习作阶段的导演才会有这样的思维，但在这里它使人感受到作者对于现实的那种敬畏态度。一切都像社会调查的表格一样，规矩、整齐，每一项都被填写，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那里。

但以影像做的社会调查有着独特的生动性，它并不枯燥。影像展示的无言的居住空间、被拍摄者的脸色与衣着所折射的营养状况和精神气质（满足还是怨恨），每一格与每个镜头内部的细节，都是对于生活品质的描绘，都是社会的面相。

我与林鑫导演说到他在片中表现笨拙的地方。他说创作纪录片使他有所改变，“所有艺术上的考量在这里已变得多余和奢侈。我不得不去除我精心构想的镜头，并臣服于生活的逻辑。”我发现他还在其他很多地方多次谈到对“艺术”的排斥和对自己过往艺术生涯的否定。他的作品曾在美术馆做展览，我想那应该多是架上绘画吧？我不知道他以前的艺术作品的风格，但从他的讲述中，我想他应该是处于中国艺术创作局面的整体特征里面。过去的艺术创作具有纯审美化的气质，即使过去的前卫（观念）艺术，放弃了传统的美学概念，号称要影响社会人心，但因为他们只注重一种观念的经营，过于照顾某种理念的自洽，因而也具有有一种纯粹审美化或者理性主义的任性倾向。它们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过于玄虚，其效果难以获得验证。而纪录片的特点决定了他必然与社会和时代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这其中饱含着社会伦理的内容。

中年之后的林鑫找到了纪录片这种创作方法，顿觉今是而昨非，就如同大学里的艾晓明教授中年之后忽然发现纪录片是一种卓越的学术工具一样，这使她释放了更大的学术能量。纪录片在他们那里成为了一种最适合表达当代生命经验的东西。随着纪录片创作高峰的逐渐来临，也许有理由相信纪录片逐渐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文体或者说艺术手段。将来也许可以有这样的类比：唐代的人找到了诗，宋人找到了词，明清人们找到了小说，而今天的人则找到了纪录片。

数年前我曾与林鑫在南京做过一次访谈，但因为录音质量问题没有整理成篇。但林鑫绵密的句子、低沉的音调以及伤感的性格，给我印象深刻，使我把他与其他导演很快分别开来。此次对话是我在北京、山西两地与远在铜川的林鑫导演以 E-mail 的形式进行的问答。

## 社会的面相，崇高的纪实

**王小鲁：**我从《三里洞》中了解到你的身世，当年你父亲支援大西北来到三里洞当了煤矿工人，自然你也成为了一个陕西人。在观片过程中我考虑最多的，是这些受访者在讲述中对当年“支援大西北”这一行为所宣传的价值进行的否定。否定这些就是否定自己过去的工作和生命经验，令人痛心。在你的成长经历中，从你的父辈对你的描述里，对支援大西北的价值判断应该是一直变化着的，比如从认信到怀疑到彻底否定，你能否谈一下你对这一过程的印象？另外，在今天我们的位置看来，这一行为是否还存在某些正面的价值让今天的人分享？

**林鑫：**我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从小在矿山长大。当我拿着摄像机来到三里洞，通过一个个线索寻找着当年来自上海，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时，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对煤矿的生活十分了解。然而随着拍摄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深深地震撼和压抑，并常常不由自主地眼圈湿润。我所拍摄的这一切，已远远超出我自身的生命体验。使我知道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个体的生命，怎样在历史的车轮下被时间碾碎。当然，有着“崇高”的名义。或许从来也没有从认信到怀疑到彻底否定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作为解放初期处于半失业状态下的上海建筑工人，“支援大西北”这个契机，使这些大多怀着青春梦想的青年，在美丽的宣传和生存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踏上了西行的列车。1957年，三里洞煤矿投产不久发生的造成戚国其死亡的罐笼断绳事故，已经彻底粉碎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希望。我们不知道戚国其的面像，他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黑暗深处。但50年后，被拍摄者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及这个人名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他们生命中，受到的最初也是最重的一击，并留下深深的创痛。母亲多次向我讲过，因将我姑姑和奶奶一同接了来，所以我的父亲没有退路，不然他可能也跑掉了。活下去，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在那个时代，没有更多的可能。父亲从没有给我谈起过这个话题，一直到他死去。我只是通过对这些父辈们的拍摄，才逐渐理解了沉默的父亲以及他心中的无奈和悲凉。时间像一条缓缓的河流，平静地掠过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面对着这些从死亡线上挣扎着活下来已变的从容淡定的老人，使我们谈论的所谓价值变的虚妄。只是这些顽强坚韧的生命，带给我温暖和信心，也使我和他们不再相距遥远。记得在07年大理放映后的一天，在片场偶然与一个看过此片的女孩坐在一起，她告诉我，假如她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她是不是也会像这些老人一样无奈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说这话时，她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那一刻我心里感到触动和慰藉，这个八零后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体验进行着独立的思考。

**王小鲁：**我听得出来，你的回答很决绝，态度是分明的。我理解你对于那个女孩“独立思考”的赞赏，因为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经常纠缠着一些杂质，比如要考虑到某些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者被一些宏伟的全局性命题所裹挟，而个人在这里往往只有沦落成历史和全局的一枚棋子的份。个人的主体性从来被忽略，三里洞职工是在半强制和欺骗的动员下引导来的，这是悲剧的起源。不过，在你采访的这14位工人对历史的讲述中，也有一些人是略带温情的，在当时当地的某些时刻，他们似乎也的确被一种“精神”所召唤，比如一位老人

说，我不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逃兵，这是他在当年的认识。坚定的怀疑是今天才有的立场。比如有的老人在镜头前说，那些奖状和荣誉有什么用！令人感慨万端。我没有怀疑你的片子整体所透露的态度，我是在思考和辩证，因为我看到一些人质疑导演的倾向，比如有人说为什么那些记忆全是黑色的，难道没有一点彩色？你的父辈是因为作为上海人，才对这个煤矿的艰苦有着强烈的认识，而那些从农村被招工上来的人则对煤矿有着向往，因为这里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村，所以你们对上海的怀念似乎是对一种优越感的怀念；还有人说，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悲惨，并不只三里洞悲惨，如此质疑有很多。我的观点按下不表，我想听一听你对它们的回应。

**林鑫：**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已尽可能地在拍摄和制作中保持中立。但作为一个鲜活的人，我无法冰冷。我开始真的是想在黑白的片子中，加上一个湛蓝的天空的镜头，作为生命的呼吸和一个透气的孔，给幽暗的世界增加一抹亮色。对那些常年生活在地底下的人们，这一片纯净的蓝天是那样的必须。在形式上，大段地面上的黑白画面和一个天空的彩色镜头并置，会充满视觉张力和遐想余地。我一直这样想。然而随着制作的进程，我意识到，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现实的残酷，早已剥夺了任何可能的抒情。所有艺术上的考量在这里已变得多余和奢侈。我不得不去除我精心构想的镜头，并臣服于生活的逻辑。在这里，只有黑白是准确的。那是一种心理和直觉的真实，和客观外在的表象无关。然而在黑色的矿区夜色中，隐隐传来的磕磕绊绊的二胡练习声和在废墟似的一片残破民宅中微弱传出的朗读英语单词的清脆童声，是那些不屈生命的律动，并终将穿透瓦砾和黑暗。这是我在这部影片中看到的彩色，它很微弱，但构成了对卑微生命的强大支撑。并给予我和他们一样的力量和信心。这些细节都保留在片中，也许因为微弱而无法引人注目。我的父辈是从上海过来的，但大多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很多是来自周边的农民（包括来自江苏太仓的我的父亲），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在上海的建筑公司打工。即便本身是上海的职工，也因为职业和技术等级较低等原因，一样生活在上海的底层。所谓对上海的怀念乃是来自对家乡和归根的渴望，就像在我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将她送归故土，我父亲死后我弟将骨灰盒带回太仓安葬一样。所谓上海人的“优越感”，针对这样一群人来讲，恐怕只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在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中来到三里洞的不仅仅是上海人，也有东北和其他地方来的建设者。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我可以进入的点，并试图通过我的努力，记录下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群像。你在片中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欺骗也罢、死亡也罢，我们看不到愤怒。他们只是坦然地讲述着生命中曾经经历的一切，不时还面带一丝微笑。其实这就是生活，每个人都只能面对。所谓悲惨只是一种远距离观看的结果。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你就会感到这不是问题。

**王小鲁：**面对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在理解的过程中会调动不同的经验和知识储备，这个过程可能会造成误解，你刚才讲到那些上海人的所谓优越感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好多不是地道的上海人，因此那只是观众的想像，这就是交流的意义所在，它能迅速澄清误解。其实我的观点是，即使那些所谓的“优越感”存在，那些伤害也不能因此就不可以再被命名为伤害。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国家或者社会的缺乏恒心与恒德，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恒定的价值认同，过去以荣誉（主要是奖状）来满足你，督促你出让体能，而等体能耗尽，普遍有职业病的老矿工却失去医疗保障，房子也将被廉价拆迁，他们无处安身，这样的社会太不负责任了！它人为地切断历史，今天不对昨天负责，不把这些时间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对待，这造成普遍的怨恨。难怪今天的矿工那么强烈的否定过去的那些荣誉，将动员自己来铜川的话语称为欺骗。其实，最让我痛心的，是在过去的一些精神价值被判定为虚假之后，这些人坐在巨大的废墟里，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里，如何继续生活下去？而你拍摄的人又都是老弱病残，废墟有社会和政治的废墟，也有时光流逝造成的生命废墟，整个片



子因此显得相当阴暗，但它们真实存在着。你进入这个世界之前的准备是怎样的？什么样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使你能够进入？

**林鑫：**进入他们的世界，对我来说同样不是问题。毕竟我二十多岁以前，一直住在三里洞的矿工住宅区里。片中的好几位老矿工就是我家的邻居。他们看着我从小长大，我看着他们从年轻变老。也眼看着他们那代人中的一部分先后死去。我的父亲、我的姐夫、我的姨夫、我的岳父以及我大多数同学和朋友的父亲都是矿工。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长大后进入煤矿工作，我的妹妹接父亲的班被招工到三里洞矿的选煤楼。所以，这不仅是他们的世界，也同样是曾经生活的世界。尽管后来我离开了煤矿，但并不遥远，还一直生活在这座煤城，与三里洞依然有着联系。但那时我毕竟还太年轻，除了谋生之外，已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幻想中，离三里洞的现实越来越远，也根本无暇停下匆匆地脚步去注视周围人们的生活。同学们中学毕业二十年聚会时，我也仿佛觉得是上辈子的事情，不愿提起。只是到了四十岁，自以为在现实的生活中，棱角渐渐被磨平，不再有生命的激情时，突然一次不期而遇的心灵地震，掀开了被掩埋在潜意识深处的关于煤矿、父亲和童年的记忆。不分昼夜半个多月写下的170首诗歌，选出119首，出版了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不管我是否有意，那暗夜中洒下的无数泪水，预示着我必将再一次与煤矿、与父亲以及与他同代人联系在一起。作为晚辈，我应该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命肖像在彻底消失前用影像记录下来，成为一种纪念和见证。恐怕现在已很少有人愿意倾听他们述说那些陈年往事，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而此时的我，作为他们工友后代的身份在这里起到了和他们无障碍交流的决定性作用。我日渐成熟的生活经验和年龄，也给了我倾听、理解和记录的能力，并拉近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通过拍摄我更加深入地走进他们的生活，那段尘封的历史和生活现状得以在我的眼前呈现。在拍摄前我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身边生活着像童仇这样一位传奇式的矿工，显示了时代的错综复杂和诡异悖谬。寻找他最为费力，在到处打听没有结果即将放弃之时，意外地碰到了一个认识他并知道他住处的人，竟然是他过去的领导。拍葛登发对我触动很大，他是我家的邻居，在文革中几乎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穿着补满补丁的工作服，赤膊上阵插一面大鼓的英姿，给儿时的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当我现在见到他时几乎已经耳聋了，依然住在那即将被拆除的报废的老房子里一筹莫展。当年来自上海的318个年轻人，此时我能找到的已经不到20人。而在片中时常发出爽朗笑声的王正祥，也于去年离开了人世。

**王小鲁：**我对你提到的童仇的讲述印象深刻，他跟其他矿工不同，当别人在讲述艰苦的时候，他却在讲述自己如何屈尊融入那个集体，他父亲是反动地主，自己是“流氓”出身，他在讲述中所透露的情态及其中所展示的复杂人格，今天的年轻人都难以理解了。他其实连抱怨那个时代艰苦的资格都没有。还有那个王正祥，他在说话中不停的笑，予人深刻的印象，我很想知道他去世前后的情况。这些人死后受到什么待遇，家属是否获得救济？他们的房子目前是否得到了解决？每个冬天要在床上睡三个月的矽肺病老人怎样了？你拍摄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看待你的拍摄行为？你来倾听他们的倾诉，是否使他们获得安慰？你的拍摄过程中，他们是否曾期待你的拍摄能改变他们的现状？由于这些人的状况相对比较一致，居住也比较集中，很容易在社会层面发出一种呼吁的声音，你是否想过通过拍摄来帮他们对目前的状况略做某些改善？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林鑫：**其实当大多数20岁左右的青年还怀着憧憬和理想进入“支援大西北”建设行列的时候，此时已经36岁结过两次婚的童仇，作为其中颇有社会经验的年长者，可以说是为了规避风险，目的性非常强地加入了这“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队伍。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如此精于算计，却最终也没能逃过劫难，其人生的起落令人感叹。一个个体的生命面对这样一

个时代，只能像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地任人践踏。已 86 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的像一块顽石。诚如他所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你问我，我可以非常坦白地告诉你。至于看着我从小长大的王正祥，也是在我拍摄的矿工中，难得地认为自己晚年还过得不错的人。因为他的子女都离开了煤矿，子女留在矿上的则经济条件要差的很多。后来听其女儿讲，其实在我拍他的时候，就已经患上了癌症，只是没有及时发现而已。去世前一直住在长子的家中。后来没有更多的消息。至于死后的待遇和救济，我可以告诉你。我父亲从五十年代来到三里洞煤矿工作，一直到临近退休前去世。最终还欠了矿上 500 元。父亲去世很久以后，还派人来向我讨要。那些在影片中你看到的一片片残破的民居，大部分已经被拆掉了，一座座新楼也建了起来。葛登发住的老房子由于紧靠山坡，没有利用价值，暂时还留在那里。在拍《同学》时从一个在拆迁办打工的同学口中得知，周寿根坚持了很久，房子还是拆掉了，最终不知他搬到哪儿去了。我刚好拍下了同学走过那一片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堆瓦砾的镜头，后来用在《同学》中。患矽肺病的沈龙根没有再见到，也没有消息。我不忍再去打扰他们。凤凰卫视在做《黑色的父亲》那两期专题时，也选了他，被我去掉了。真的，我们帮不了他们什么。我无法再去面对那样的一双眼神，我也不想因为我的缘故给他们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不愉快，那样我会感到内疚的。最后那两期节目播出时，铜川地区突然无法看到凤凰卫视，打电话询问有线台，说上级临时让停掉了。我们能说什么？我的拍摄对他们来说，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他们也必将这样生活下去，直到死去。他们明白这一点，在拍摄时，他们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也基本完了，没有什么意思。

**王小鲁：**你讲述的苦难令人窒息，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很多人陷入类似的生存情境。这种密不透风的绝望，我称之为灭没感，在其中价值毁灭，个人失去依靠。前段时间赵亮的《上访》有类似的一幕，那个上访数十年的江苏妇女掌握的真相被所有人抹杀，包括国家级媒体，甚至包括她自己的女儿。这么多年支撑她上访这一行为的事实依据竟然忽然化为灰烬，于是她被四面墙封闭住了，这个时候她要活下去，必须为自己寻求一个精神出口，果不其然，电影后半部分我们发现她在临时居住的小屋里贴上了观音像。《三里洞》里的人们也面临类似的局面，你拍摄时挖掘的每个老人的问题都相对统一，都是对过去的回忆，然后让他们介绍家庭和子女的状况，外在社会不能善待他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力，这个时候家庭伦理也许能温暖人心，但很多老人的子女也不怎么孝顺，因为他们也处于贫困中。《三里洞》出现过一次顾龙详家属跪着唱圣歌的镜头，希望能早日“住进天堂楼”，结尾你在自己父母坟墓的镜头上也用了宗教歌曲，为什么这样安排？记得你说过你自己不信教，拍纪录片是你的宗教，我特别理解这样一句话。你觉得纪录片对你有怎样的改变？你在几个地方说你在 40 岁时忽然产生了写诗的激情，我很好奇那是出于什么样的特殊机缘，我猜你的纪录片创作会不会是那个激情的延续，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年的银行职员，能忽然拿起摄像机这种陌生的工具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这需要激情。

**林鑫：**纪录片的拍摄，很多时候你只能凭直觉被动地跟进并迅速作出反应。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顾龙祥是我姨夫，当时我正在拍摄他寻找青年时代在上海的老照片。耳边忽然飘过来一阵阵歌声，起初我以为是电视，突然感觉不对，赶紧调转摄像机，于是拍到了我姨在家中祷告的镜头。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信仰是最后的一道支撑。经历过无数的困苦艰难以及心理的无望之后，信仰之门为她打开。在那样一种窘迫的生存环境中，她怀着信心和盼望唱起了圣歌，“主，你拉住我的手，拉住我的软弱的手”。那苍凉的像生活一样时有磕绊的歌声，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最柔弱的部位，我把目光转向窗外，潸然泪下。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所听到的最为动人的歌声。不是来自于出色的嗓音和技巧，而是来自于一颗饱受苦难的灵魂。在三里洞煤矿拍摄的间隙，顺路去看望一下久未相见的小妹，进门看到她一面在网上听远在江苏太仓的大妹的女儿唱歌，一面用 QQ 接收照片。我凑上去一看，

那是在南方的弟妹几天前清明节给父母上坟时的照片。简直是天意，我当时就感到这些照片将是《三里洞》最合适的片尾，就用接收照片时一幅幅相继呈现的方式，只是大妹女儿的歌声，在片中用我姨所唱的圣歌代替。苦了一生的父母，最终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从2003年开始拍纪录片《陈炉》，那还是典型的艺术家心态，我力图将实验性、记录性、文献性结合在一起，画面也拍的精致唯美，尽量避免露出业余的痕迹。随着《三里洞》和《同学》的拍摄，已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几年来，我几乎是跌入我所拍摄的生活，感同身受地体验，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社会视野和认知能力。我懂得了自己的卑微。不再有勇气堂而皇之地谈论艺术了。纪录片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自己在希望中活下去的一种支撑。生存中的挣扎是每时每刻存在的，那些无望的岁月和痛苦总是有意无意地被自己选择性的遗忘，因为你要活下去。然而，只要你的心灵没有彻底死去，生命的激情终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喷发，太深的郁积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得以释放。尽管我以前从未写过诗歌，至今也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只是那些诗句像井喷一样涌出，我抄下来而已，几乎没有改动。真正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我的诗歌和片子都是这片给我留下诸多痛苦和无奈的城市给予我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偶然，都有着潜在的动因和必然。我拿起摄像机也是一样。

**王小鲁：**我相信拍纪录片的过程使你加强了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的交流，它改变了你以前的生存模式。你说面对三里洞和同学，不敢再奢谈艺术，我觉得这个片和《同学》都显得朴拙，没使用什么修辞，《三里洞》里有一首诗，结尾时有一个从近处蚂蚁的画面拉开落到三里洞全景的镜头，《同学》的结尾把所拍摄的人物行走的背影剪在一起，那算是明显的修辞手段，整体看你后来这两部片子非常白描，但情感沉重、持久，我能感觉到拍摄者心态的坚韧。拍摄即使对被拍者没有具体的物质帮助，但是拍摄本身是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灰暗的生活不再自生自灭，不再被社会彻底抛弃，而是被记住，成为社会记忆里的一个章节，重新与人类历史建立联系，进入一种哪怕是想像中的永恒。而当你拍摄了那么多的孤独之后，大家会获得一种同感，孤独因此被减轻。你的片子是否给你的被拍摄者看过？他们是否有所回应？另外咱们再讲一下关于《同学》拍摄前后的情况吧，它与《三里洞》有什么关系？

**林鑫：**《三里洞》拍完后，没有给被拍摄者看，也没有在当地放映和传播。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既然帮不上什么，就不愿再去添麻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凄风苦雨，就让他们静静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岁月吧。这个片子是他们留给我们这些晚辈的一份礼物。后来见到陆荣初，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把片子做完了。我说您知道了？他说有人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将报纸拿来给他看了，上面有他的照片。还有一次在街上见到葛登发的老伴，我说凤凰卫视播出的节目你们后来看到了吗？她说孩子们在网上看了，他们没看。《同学》完成后，请以前搞写作的那个同学看了，他对整部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对自己在片中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当时生意才刚起步，借了很多钱，心理压力特别大。两年过去，现在经济上好多了。他说你可以重拍嘛。我说那完全是两种状态，生活是无法复制的，《同学》中的人物排列顺序完全是拍摄的时间顺序，片中的他是那个特定时段的准确再现。没有给更多的同学看，也是由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没有权利去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片中的有些内容他们不希望周围其他同学知道。在拍摄前是打算完成后有适当的机会放给同学们看的，现在只有放弃了。《三里洞》关注的是我的父辈矿工的生活；《同学》则展现了我们同代人的经历，主要讲的是矿工第二代的故事。《三里洞》完成后，我便开始着手准备《同学》的拍摄。从1978年在三里洞煤矿中学毕业，到我开拍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期间和大多数同学没有来往。有时在路上遇见，也只是匆忙打个招呼，无暇多聊。确定了依然是群像的拍摄方式，只能从街面开始，他们最好找。所以前三个都是在街面上做生意的，但处境和心态各不相同。像滚雪球一样，从已拍的同学得到其他同学的联系电话，从中选出一个拍摄对象，然后再得到更多同学的联系方式。拍摄对象的选择，基本涵盖了不同的社

会层面。从2007年夏天到2008年初春，拍摄历经四个季节。在影片中主要是两条线，一条是随机跟拍每个同学的一天，作为其当下生存状态的切片。另外一条是每个同学三十年人生历程的回顾，是时间上纵向的延伸。这两条线相交，形成当下和历史的坐标。片中主要呈现了23个同学的生活，共有31个同学进入了影片画面。这部作品是试图通过拍摄我的同学们，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群像。

**王小鲁：**《同学》里有关于回忆的口述，也有展现当下发生的日常流程，而《三里洞》则基本上是回忆历史，对于现状也主要是口述，我们在这里获得的当下发生的信息主要是他今天的身体面貌和那个当下存在的居住空间，没有对事件的跟踪，可以说是比较静态的，这也造成一种死寂的感受。你刚才说了《同学》的编排顺序，《三里洞》人物顺序编排是否有你自己的逻辑？两部片子的结构都相对简单，都把人物进行了简单的排列，到《同学》的时候，你是否尝试着改变这种结构方法以更能体现一种思辩的能力？我发现你善于拍摄群像，而不是对某个个体的持久挖掘，所以《同学》里的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展示都比较短暂，但是社会面却广阔了许多，这样的构思是来源于你的视野倾向还是来自于对纪录片美学历史的认识？

**林鑫：**《三里洞》所反映的，基本上属于已经翻过的一页历史。其废墟似的现场和残存的人物，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遗迹。只有通过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用口述的形式来进行现场的还原和历史的重建。唯一的例外是拍罗世俊时，其病妻的突然消失，使口述在瞬间转换成跟拍。《三里洞》的人物顺序也基本是拍摄的顺序，只是拍摄当中自己跳出来的已故者戚国其，因为对他们的人生转折至关重要而置于篇首；我已去世的父亲朱永生也由于影片进展的必然性而放在片尾。两个逝者加上中间十三个幸存者，成为此片前后呼应的结构。生活本身所赋予人物之间的变化和起伏，像连绵的山丘，高低错落，用不着我来设计。《同学》也是一样，生活所具有的戏剧性张力，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只要你能俯下身去，生活必将会为你绽放。事后我仔细分析过《同学》的人物排列、相邻人物之间的对比以及性格命运的落差等都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其中，也有着自然的起伏和参差错落，杜绝了艺术的做作和匠气。在自然中，一片树叶的脉络和枝干穿插总是妙趣天成，学画时的反复描摹和设计，却往往弄巧成拙。相对于以事件为主体的交叉剪辑，我更注重人物本身的塑造和完整。而人物数量的叠加在展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也有效地回避了个案的偏激和不足。对于像《三里洞》、《同学》这样人物众多的群像式影片，我目前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总共四十多万字的口述素材，用到影片中只有三万字。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结构，便不得不作出割舍和放弃，因为一部影片容量是有限的，容不下无限的扩张。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也没有看过太多的纪录片。采用目前这样的一种构思，更多的是一种直觉把握而非刻意选择。

**王小鲁：**的确如此，你的结构方式给人一种无为的感受，也许这种方法对于你的素材是最合适的。《三里洞》的故事相对集中，这些人被一些共同的元素决定着命运方向，但到了《同学》，问题的焦点就散开来了，“毕业于三里洞中学78级”的身份已经不足以将这些人整合在一起，那个出身不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而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因此你的拍摄是对于大社会的散点式描绘，同学只是一个名义，你本质上是拍摄了一群中年人。不过中国的中年普通人的命运其实是有着国家历史的脉络可循的，他们处于国家体制改革的左右下，其命运常常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结果，这种控制与《三里洞》里的控制不同，三里洞的人是被国家强制性地集合在一个单位里，这个控制是有形的，《同学》中的人则是失去了国家单位，进入边界模糊的大社会去闯荡。社会往往被视为一个让人自由发展的领域，事实上资源分配的不公使你处于另外一种不自由的困境中，而这个时候，你的困境又失去了可以用来控诉的对象。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片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命运是悲观的，

有的因为经济困难，有的则因为心灵空虚，不悲观的人一般是官员和物质富裕的人，比如银行行长，还有一位大学副教授，但我觉得这些人的生活非常犬儒，活得无价值无意义，没有一个人身上体现一种健康的社会观念。比如那个副教授，被丈夫、房子和儿子的私人利益左右着，无暇在教学上进取，而她对此的自我评价却是“我觉得我活得比较潇洒”，她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她信周易，她为自己找的理由是：共产党员也不能没有信仰吧。这种形象是让我厌烦的。观看《同学》时感受到的悲观情绪是来自于你的取舍？还是来自于客观现实本身？或者来自于作为解读者的我的观念偏向？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林鑫：**其实，“毕业于三里洞矿中78级”的身份只是我能够有效进入的一个起点，也正是由于我这样一种有着同学的身份而又基本上游离于他们日常生活圈子之外的因素，才使我能够没有障碍地直接进入他们的世界，并使他们能够坦诚地面对我的镜头，讲出一些长久地掩埋在内心深处无法通过向周围人直接倾诉而得以释放的隐秘情感。也由此展现出这些在步入社会时起点几乎相同的一群人，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历经三十年的生存挣扎和被命运无情的摆布之后，在每个个体身上体现出来的巨大落差。片中人物的悲观，是来自于这些年近五十，对前途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的认命以及对当下生存现状的无奈和妥协。对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同龄人感同身受。你观看《同学》时感受到的悲观情绪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来自于现实本身的残酷和沉重。当然，面对同样的一种生活境况，每个不同的人也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得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作为旁观者的理解和片中人物自身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面对拍摄中的人物选择和剪辑中对素材的取舍，我应该说是非常地谨慎和郑重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录片的制作人，应该知道自身的卑微。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将自己凌驾于生活之上，打着所谓艺术的名义，武断地对生活进行扭曲和割裂，变相地将生活演变为陈述导演观点的道具。在实际拍摄中，我已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态度的中立，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人物的选择，而是以生活本身为依据，确定不同阶层和地域的人物采样比例。例如在78级的800多人中，大多数仍然生活在铜川，在外地工作的只占极少数，所以在选择拍摄的二十多个同学中，外地的只选了一人。其他的各个社会层面，也都通过我所选取的人物有所体现。面对拍摄到的众多素材，我在剪辑中也仅仅是做了一件工作，浓缩。将最基本的现场、观点和陈述浓缩到有限的时间长度中，以便更准确、忠实地呈现出这些生活在当下的鲜活人物。不带个人的褒贬和阐释。然而绝对的客观是无法做到的，摄像机是我的眼睛，其最终呈现的毕竟是我的视角，所以也必将深深地打上我的生命和情感的烙印，这也是我们最终能够被称为纪录片作者的原因之所在。

**王小鲁：**其实你的片子印证着我对于社会现实的判断，但当我们孤独一人的时候，则常常会自我怀疑，因为我们深受某些强制性舆论导向的影响。目前民间性纪录片保存了我们在今天的真实经验，观者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照射并获得比较的材料，使我们敢于忠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和判断，善莫大焉。其实在《同学》这个片子里，我发现你比较严格地使用着一种纪实手法，甚至因为严守某种东西而显得笨拙，但我从中感受到你对生活真实的敬畏。比如在拍摄同学一天的生活过程中，你会严格地把这个人物一天的主要动作都按先后顺序放进去，卖珍珠奶茶的董发义，在煤气站工作的刘川林，跑长途的杨德胜……都是这样处理的，比如刘川林，你从他吃早饭、下楼、上车到单位工作，甚至他到单位上班和下班分别要转两次车，都被你描绘得十分详尽，这可以被学者们当作探讨纪实主义的一个范例。我知道这种烦琐是和生活的烦琐相对应的，但这样做容量太大，所以《同学》的镜头都很短，剪切得太碎，很多时候观众来不及去感受，这个镜头就结束了一——当然，片子总会有一些从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我这样评价不知道是否妥当。最后，我想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拍摄使用了什么机器，经费怎么解决，你如何处理创作和工作的关系？我知道你下一部片子是《瓦斯》，还是关于煤矿的，如果有机会拍摄十部片子，你觉得你会对哪些领域感兴趣？

**林鑫：**对《同学》中的人物随机截取普通一天的详尽再现，是试图对当下个体生存状况忠实记录的努力。在煤气站工作的刘川林，其每天上班，要从市中心乘车到终点站，再转乘电动三轮车到郊外的一个村口，然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山上的工作地点。这段影像的罗列使观者对他生活中的无奈有了更为直接地感受。如果只用一个上班路上的镜头来交代，是无法准确地展现这种时间上的绵延和来回颠簸的真实状态的。对第一个人物刘全安，因为离工作地点不是很远，则用一个镜头带过。对长途大巴司机杨德胜一天生活的跟拍，则像公路片一样，主要的时间都在车上度过。从铜川到西安一天两个来回，早上六点半离家直到晚上月亮高挂时回来。我几乎一直是站在晃动的车内拍摄，到下午时举起摄像机已感到吃力。他们看我很累，说你跟上一个来回，拍一下就行了。我说每个时间段的光线是不一样的，我必须准确地捕捉到时间的流逝，并对这一天的生活进行完整的记录。《同学》的初剪版本完成后，全片长度近五个小时。然后精剪，最终将片长控制在三个半小时之内。其他段落去掉了许多。唯独这一段，再三删减，最终只去掉了十秒的内容。生活的节奏在片中有着同样的张力，我无法武断地强行剪切。对这部片子，我应该说已竭尽全力。影片的不足以及作者的局限，就像生活中存在的缺失一样，无须回避。拍摄这两部片子使用的索尼 PD-190 摄像机，是借单位的。非常感谢朋友的帮助，使这些影片的拍摄能够尽快成为可能。其他的经费由我个人投入，主要用于购买剪辑设备、数百盘录像带和支付英文字幕的翻译费用。我本人以及协助我工作并承担了文字整理录入的妻子和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的儿子，都是不用支付报酬的义工。工作和创作的关系从来就是两难的问题。它使你的思维不得不在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时空中来回切换，精神常常处在高度绷紧状态。所以我对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处境深有体会。如果说创作是我赖以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那么工作就是我能够活着的现实基础。我的影片及拍摄方式，是现实生存状况对我的诸多限制和我在生活中不断妥协在创作中不断寻求可能与突破相结合的产物。在银行这样的单位，你应该是知道的，每天按时上下班打卡和事务性工作占去了大块时间。只好将所有的空闲和休息时间用于创作。多年来，亲朋好友也很少有时间往来。这是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生存三部曲》已完成两部，最后一部将探讨记忆和遗忘。因着某种特殊的机缘已先行拍下了结尾并剪辑完毕。其余的部分还没有开拍。在工作之余耗费四年多时间和精力连着做完两部片子，身心已非常疲惫，所以稍事喘息。在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关于信仰的片子也在心中涌动已久，呼之欲出。这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我所拍摄的影片题材基本是不由自主地从胸中涌出，无法预料也无法割舍，只好凭直觉跟进。所以我无法回答“如果有机会拍摄十部片子，你觉得你会对哪些领域感兴趣？”这样一个问题。唯一能确定的是，只要我对生活一直拥有像现在一样的激情，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都无法阻止我对这片土地持久地注视。

## 附录

### 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煤城

#### 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在我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我们很难想象一座面积只有 3882 平方公里、仅辖三区一县的城市——铜川市，会成为一座“名城”。

铜川市最早以窑成名，先是有瓷窑，后来有了煤窑，水泥窑，两大产业并驾齐驱，曾经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与此同时，资源的大量开发，环境治理的极度滞后带来的环境问题，使得铜川市大气污染变得十分严重，终于在 1993 年，中央电视台以“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为题，报道了铜川市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这座城市以污染之重“闻名”于世<sup>4</sup>。

由西安驱车向北行驶 68 公里后，就进入了关中盆地和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铜川市境内，当下也仅有 80 多万常住人口的小城铜川<sup>5</sup>，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有人偶尔提起铜川，人们也经常茫然地问，铜川在什么地方，是市吗？

铜川市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一五”期间，奠定国家工业基础的 156 个重点项目中，就有 4 个项目安排在铜川市。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催生了这一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和繁荣。铜川市成为当时陕西的第二城市和闻名全国的西北煤城。铜川矿务局下属十几座大型国有煤矿，在山山岭岭蜿蜒；归属区县乃至乡镇的小煤矿，也是见缝插针，星罗棋布<sup>6</sup>。

在 1949 年后的 40 年中，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地，铜川的煤炭源源不断输送到各地，已经为国家建设奉献了 2 亿多吨煤炭<sup>7</sup>。历经数十年的持续开采后，铜川市跨入了国务院确定的 44 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行列<sup>8</sup>。2004 年 11 月 28 日，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造成 166 名矿工死亡，成为中国 44 年来最大的矿难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sup>9</sup>。纪录片《三里洞》反映的 1955 年从上海支援到三里洞煤矿的矿工故事，也发生在这座黄土高原上的煤城。

---

<sup>4</sup>引文见《中国环境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sup>5</sup>引自《铜川人口网》透过“六普”，正确分析铜川人口发展态势  
[http://jsj.tongchuan.gov.cn/structure/rksj/tc/content\\_50973\\_1.htm](http://jsj.tongchuan.gov.cn/structure/rksj/tc/content_50973_1.htm)

<sup>6</sup>引文见《中国环境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sup>7</sup>见《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233 页。

<sup>8</sup>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7651.htm>

<sup>9</sup>见《让 166 个灵魂安息：陈家山矿难两周年法院宣判》转自  
<http://news.163.com/06/1130/08/315N1GFJ000120GU.html>

## 地质时代和人文景观

早在6亿年前，铜川是华北古陆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在距今6-4.4亿年前的早生代寒武纪到奥陶纪，铜川成为茫茫大海。从4.4亿年前的奥陶纪末开始，加里东造山运动使铜川再度隆起成陆。铜川大地长期经受风化、剥蚀，直到中石炭纪，持续了1亿多年。从而，使铜川缺失志留系、泥盆系和下、中石炭统地层。2.8亿年前的上石炭时期，地壳很不稳定，震荡运动频繁。地壳下沉时，海水进侵，造成铜川海相地层；地壳上升时，发生海退，形成铜川陆相地层。当时，气候炎热潮湿，海退后的陆地变成茫茫林海；海侵时，森林迅速被泥沙覆盖。在漫长的地质时代里，被埋没的森林经过复杂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作用，转变成煤，而泥、砂则变成砂岩和泥岩。由于有节奏的地壳运动和反复沉积，铜川形成了5-9层煤，而每层煤都被砂泥岩分开，就这样，在铜川造成了海陆交替相夹煤层的上石炭统地层。这套地层被称为太原组。从早二叠世开始，海水完全退出，铜川最终隆起成陆。

……

晚更新世后期，我国出现了最后一次大冰期——大理冰期，气候十分干冷，强烈的西北风不断地吹送着蒙古高原一带的沙土，铜川被马兰黄土所覆盖。由于地壳升降的差异和后期侵蚀、剥蚀的作用，才形成了铜川今天具有黄土梁峁原冲沟及山川河流与各级阶地的独特的地貌景观<sup>10</sup>。

你现在从铜川往北到金锁关附近，依然可以看到过去地质变迁留下的痕迹，公路边一座山的整个岩层呈45度倾斜着，像是把整座山搬起后又斜插入地面。这里的山峰走势都是南北走向，而女回山却为东西方向，并在当地民间留下了孟姜女将山峰搬转阻挡秦兵的美丽传说。在铜川北部的砂石山中，可以看到很多经历千万年前地壳运动后由古老河床隆起产生的沉积岩，大面积的鹅卵石层和沙土一起凝固在山体中，那是沧海桑田的见证。

铜川过去叫同官，因与潼关同音易混，民国35年（1946）才更名为铜川。铜川市虽然是一座小城，但历史上也出过一些名人，像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书法家柳公权、北宋画家范宽等，都是彪炳史册的翘楚。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开创了疾病分类、症候记述、治疗方法和药剂处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被尊为药王。每年二月二庙会期间，满山翠柏的药王山，仍然是人头攒动，香火旺盛。相传能治病免灾的“摸摸爷”佛像，更是被簇拥的游人摸得油光锃亮。药王山不仅有佛像，还有道士，更留下了魏晋时期释道交融的《魏文朗佛道教造像碑》（424年）。沿山拾阶而上，就来到了北魏造像碑林，这里安宁静谧，游人稀少。尚处在楷书演变中的石刻文字不拘泥于界格，结体自然生动，朴拙大气。里面最为著名的《姚伯多兄弟造像记》，在碑廊的寂静中矗立着，夕阳的斜晖照在日渐风化的石面上，为其披上一层金色。作为楷书四大家之一的书法家柳公权，更是众所周知。他的碑帖《玄秘塔》和《神策军》，仍然是当代习书者的典范。北宋是中国山水画的全盛时期，你如果对比北派山水画家范宽的杰作《溪山行旅图》，就会发现其密如雨点锯齿般的岩石皱纹和铜川照金秀房沟一带雄浑毓秀的山脉如出一辙。

照金地形险要，不仅是当年红军在西北地区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也由于以南北方过渡地带的丹霞景观为依托，拥有众多白垩纪宜君砾岩和凤凰山砾岩构成的石质山峰，于2012年晋升为陕西省唯一的国家级丹霞地质公园<sup>11</sup>。园区内的大香山，在东晋时已开设寺院，迄今香火不断<sup>12</sup>。在铜川北部的峡谷绝壁中，不仅有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天然屏障金锁关，也有已经毁坏仅剩遗址的玉华宫。

<sup>10</sup>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3-54页。

<sup>11</sup>引自陕西旅游网：<http://www.sxtour.com/portal/lyzx/detail.jsp?contentId=5562>

<sup>12</sup>见《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页。



唐贞观二十一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扩建仁智宫，由初唐著名建筑大师阎立德设计营造，半年竣工，改名为玉华宫。二十二年（648）三月，太宗巡游玉华宫。永徽二年（651）八月，高宗李治将玉华宫改为玉华寺院。显庆四年（659）冬，玄奘法师来玉华寺肃成院译经。在此四年，译成了600卷《大般若经》，计20万颂。玄奘又命弟子录其一生所译经论，共74部、1335卷。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子夜，玄奘圆寂于玉华寺，享年65岁<sup>13</sup>。

驰名中外的耀州青瓷和古镇陈炉，也有过鼎盛时代，只是当年十里窑场和“炉山不夜”的辉煌场景均已成为过去。

## 渭北黑腰带上的明珠

铜川市区坐落在一条南北向的狭长谷地中，川道纵向十里，横向最窄处不足一里，周围都是高低不平的山梁洼地。漆水河由北向南流经整个市区，一到夏季发洪水，经常将地势较低的灰堆坡等大片房屋浸泡在泥水里，形成洪涝灾害。直到1970年代在漆水河沿岸修建了石块砌成的堤坝，洪灾才得以控制。铜川名义上是十里长街，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还没有城市的模样。市内只有一条泥结碎石马路，汽车过去后会扬起一大片尘土。从北往南，依次是城关、三里洞、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川口，仅从地名就可以分辨出大致方位。那时的漆水河还清澈见底，两岸光秃秃的山上几乎看不到树木，塬上的农民大都住在傍山倚崖挖掘的土窑洞里。除了城关老县城、五里铺和十里铺等地段相对热闹一点外，大部分地方都没有人居住，蒿草遍地。据老矿工讲，1955年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七里铺一带还经常有狼出没。1972年以后，在漆水河东岸人行便道的基础上修建了沥青路面的二马路，此后市区才有了两条平行的主干道。1980年以后城市发展了，一马路和二马路才逐步改成了水泥路面，但依然是一座没有十字路口的城市。

五六十年代的铜川市区没有多少建筑物，当时最高的三里洞煤矿选煤楼，天轮日夜不停地旋转着，站在几里以外都可以看到，这座1957年7月1日正式投产的年产60万吨煤矿是当时西北地区第一座机械化矿井<sup>14</sup>。五里铺北公房曾经是铜川矿务局所在地，成片的平房，依山而建的三层和四层联排楼房，以及周围半山腰的窑洞里，住着几百户三里洞煤矿的职工和家属。火车站斜对面的一栋四层楼叫服务大楼，是当时五里铺街道上唯一的大型公共建筑。集照相馆、理发馆、食堂、旅社等于一体，成为人们生活中摩登的象征和日常对话中的常用词汇。七里铺电影院建的较早，一直延续到电影行业的衰落，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和记忆，现在已经拆除了。十里铺的文化宫建成于1958年，曾一度烧毁重建，也基本上不再有演出，罗马科林斯柱式门廊下的前厅场地已经成了打台球和照相馆的营业场所。

铜川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最早多从山西迁入，民国31年（1942年）咸铜铁路修通后<sup>15</sup>，外籍人口流入渐多，尤其是河南人大批迁入，到煤矿做工。1949年以后，随着煤炭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1949年4月，铜川总人口仅有94998人，1957年增至172358人，1975年已经有297020人。1989年底，全市户口统计为75947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36738人，占总人口的44.33%。铜川人口自1953年到1989年总迁移量达939295人。从50年代开始，铜川的自流人口也一直呈增长趋势，1960年达最高点。据公安机关统计，到同年8月2日，共有无户口人员11648人，（新工人8630人，家属3018人）<sup>16</sup>。

<sup>13</sup>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6页。

<sup>14</sup>见《铜川矿务局志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1995年）632页

<sup>15</sup>见《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423页。

<sup>16</sup>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3、97页。

铜川的人员构成主要分为市区和矿区两大块，1990年底，铜川矿务局的职工总数6.4万多人，含家属在内的总人口达26万多，占当时铜川市城镇人口的大半<sup>17</sup>。

正是这些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的大量移民，成为铜川几十年来工矿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也将他们的子孙后代繁衍在这片土地上。在市区几乎很少能遇到地道的铜川本地人。不管是在铜川的街头路边，还是到各级单位，只要你随便和人聊起来，打听一下他的籍贯，基本上都是从外地来的。仅笔者接触所及，就有来自东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上海、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四川、陕北等十多个省市的移民。铜川河南人最多，有小河南之称，不管你来自哪儿，在矿区的通用语言基本是清一色河南话，矿工子弟也从小在河南话的语言环境中长大。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市区和矿区却像是两个独立的生态环境，矿区子弟也大多以能够进入市上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为荣。在市区大多数单位的人际交往中，则主要使用陕西话。到外地出差，又都会说普通话，不管是带着浓重秦腔的普通话、河南普通话还是上海“阿拉”的普通话。来自全国各地的铜川人除了自己原有的方言以外，基本上都会说河南话、陕西话和普通话，并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随时转换“频道”和交叉使用不同的方言。当地民间流传的此地猴、河南担、上海鸭子呱呱叫等顺口溜，也体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

铜川矿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全市煤田面积522平方公里，有“渭北黑腰带上的明珠”之称。铜川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始于唐而兴于宋，但生产规模很小，均为手工原始开采。1930年代才开始出现半机械化采煤。1949年以前的同官煤矿矿部就设在五里铺北公房的半山坡上。自1955年铜川矿务局成立之后，铜川的煤炭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随着三里洞立井（1957）、王家河立井（1958）、桃园平硐（1959）、王石凹立井（1961）、金华山立井（1963）、徐家沟立井（1966）、鸭口立井（1966）、东坡斜井（1970）、陈家山平硐（1979）、下石阶平硐（1980）等多个大型国有煤矿陆续建成投产，史家河立井（1956）、焦坪诸井（1970）、李家塔立、斜井（1954、1957）等老煤矿改扩建完成，煤炭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截止1989年，全市有两个设计能力百万吨以上，基本机械化的大型煤矿和288个中小型煤矿，煤炭产量980.86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1/3，在西北地区煤炭工业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sup>18</sup>。

除了煤炭以外，铜川还逐步兴建了铝厂、水泥厂、耐火材料厂等建材企业。“铜川市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不合理，污染治理投入不足，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水平差，不能达标排放，是市大气污染的症结所在。”2011年10月19日的《中国环境报》这样写道。

这座资源型城市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饱受污染之苦，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城市。一组当时的监测数据足以说明：1989年环境监测统计，铜川市工业污染源占66.66%，交通运输污染源占22.3%，生活污染源占11.1%。工业污染每年大气排放污染物16.7万吨，交通车辆每年向大气排放铅及氮氧化物1.3万吨，增加粉尘3000多吨。直到2002年前后，铜川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也不足200天，意味着铜川市的老百姓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sup>19</sup>。

在川口一带，天空整日飘着水泥粉尘和各种漂浮物，几家大型水泥厂窑炉矗立在铜川市入口处，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像一片片迷雾笼罩着这座城市。水泥厂附近的树上落满了厚厚的浮灰，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排灰色的现代雕塑。十里铺耐火材料厂的高大烟囱不时地冒出滚滚浓烟，穿着白衬衣在街上走一圈，身上便落满了烟囱飘出的黑灰点。昔日清澈见底的漆水河，也早已变成了一条被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的臭水沟。除了市区内的多个煤台和水泥厂，

<sup>17</sup>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1995年）1页

<sup>18</sup>见《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1995年）。153-157页。见《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217页。

<sup>19</sup>引自《中国环境报》2011年10月19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烟尘污染是造成铜川市大气环境质量低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被国家列为二氧化硫控制区。

而污染最主要的受害者，则是在铜川市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老百姓。他们用3句话来描述自己生活的苦不堪言：吃饭捂着碗，走路眯着眼，（露天）看电影打着伞。

1979年对71个单位5万余名30岁以上人群进行肺癌普查表明，市区为肺癌高发区。以至于在西安的各大医院，创造并流行起了一个新名词，叫“铜川肺”。何为“铜川肺”？据说，铜川人去西安各大医院拍片子，肺部的纹理普遍粗大，明显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人。大夫看片子，单从肺部的特征，就能断定坐在他面前的患者，是不是来自于铜川市<sup>20</sup>。

这还仅仅是地面上，几十年煤炭开采还夺去了许多井下矿工的生命。仅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的矿难就有：

1960年11月8日，李家塔煤矿运输平巷着火，32名矿工遇难；

1962年6月26日，史家河煤矿井下610大巷发生火灾，30名矿工遇难；

1975年5月11日零时，焦坪煤矿前卫斜井发生瓦斯爆炸，101名矿工遇难；

1986年3月14日上午11时，金锁乡背塔村第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1人遇难<sup>21</sup>；

2001年4月6日21时14分，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8人遇难<sup>22</sup>；

2004年11月28日7时10分，陈家山煤矿再次发生瓦斯爆炸，166名矿工遇难<sup>23</sup>。

绝大多数下井的矿工除了随时面临的生命危险之外，也无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煤肺、矽肺等煤矿职业病侵害。最后的结果就是肺部纤维化，人出不来气，呼吸衰竭，活活被憋死。铜川是一座以煤矿、建材为主的重工业城市，几十年里除了给国家做出贡献外，也将严重的空气污染留给了自己。

资源为铜川市这座城市带来了繁荣，但与之俱来的污染不断累积，也成了阻碍铜川市各项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为铜川市已经不适合人居的言论，许多精英人才前赴后继，纷纷逃离；许多从铜川市赴外地求学的游子，掐断了回乡的念头，从而让铜川市失却了“新鲜血液”的补给；不少业已存在的投资者撤离了铜川市，更有不少前来考察的投资者望而却步。他们不是担心这里的资源不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怕的是这里严重的污染给自己的生命造成威胁<sup>24</sup>。

1993年9月1日，铜川矿务局徐家沟煤矿、三里洞煤矿、金华山煤矿和焦坪煤矿红卫井口受到铁路运输和煤炭市场影响，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全局近2万人歇业<sup>25</sup>。

市上一批效益不好的企业也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中纷纷倒闭。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只好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很多专业人才也纷纷离开铜川，前往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城市寻求发展。从50年代的八方来支援到90年代的孔雀东南飞，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段历史的轮回。几十年重工业发展和一代人的付出，呈现的是一座以能源为主的资源性城市从兴起到逐步衰落的演变过程。

2000年9月1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正式批准三里洞煤矿作为全国第一批破产煤炭企业。2000年10月，该矿正式向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破产涉及的三里洞煤矿及所属李家塔煤矿、史家河煤矿、东方化工厂、轨枕厂共有职工6472人，通过退

<sup>20</sup>引自《中国环境报》2011年10月19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sup>21</sup>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49~260页。

<sup>22</sup>引自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GB/67613/67769/64589/68250/4611084.html>

<sup>23</sup>引自新浪网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04-12-03/21214426863s.shtml>

<sup>24</sup>引自《中国环境报》2011年10月19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sup>25</sup>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34页。

休、待退、发给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一次性安置、资产重组安置等途径，共安置 6140 多人<sup>26</sup>。

因煤建市，以煤兴城，除了煤矿就是水泥，这样单一的产业结构不仅存在市场风险，环境污染问题也自然首当其冲。由于资源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规律，资源型城市必然经历“建设—繁荣—衰退—转型—振兴或消亡”的过程”<sup>27</sup>。因此，铜川市开始艰难地转型，搬走煤台，迁建、关停污染严重的企业，对工业发展带来的污染进行整治。至 2008 年底，全市累计拆除了 24 家企业的 39 条落后水泥生产线，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420 万吨<sup>28</sup>。要使这个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生机，除了破解环境污染难题，做好优化产业结构外，还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铜川市中心的整体南移，规划区面积 45 平方公里的铜川新区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和陕西“一线两带”<sup>29</sup>建设的全面启动，为铜川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希望老百姓向往的健康有尊严的普通人生活，不再是一种奢侈和梦想。

2012 年 5 月 21 日，中国社科院编制的《2012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北京发布，铜川跻身全国两岸四地 294 个城市综合竞争力 10 年提升最快的城市之一，排名全国第七<sup>30</sup>。《铜川日报》写道：

为了破解污染难题，历届市委、市政府将环保列为最大的民生工程。经过治理，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我市空气环境质量二级以上优良天数已由 2003 年的 200 天提高到 2011 年的 328 天，连续八年年均增加 16 天，成为全国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中二级天数增幅最大的城市。昔日天灰地黑、到处乌烟瘴气，因污染而闻名全国的铜川，如今环境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处处天蓝水碧、山青地绿，就连过去污染最严重的新区玉皇阁水库，今日也成了对环境最挑剔的白天鹅的栖息地和省级湿地保护区<sup>31</sup>。

---

<sup>26</sup>转引自新华网《陕西首家破产国有煤矿拍卖成功》

[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

<sup>27</sup> 见百度百科名片：资源枯竭城市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7651.htm>

<sup>28</sup> 引自《中国环境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

<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sup>29</sup> “一线两带”就是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陕西段和宝潼高速公路为轴线，以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级关中天火产业带为依托，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形成的以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为特点的产业经济体系，涵盖整个关中地区。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五个地级市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54 个县（市、区）。引自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8736.htm>

<sup>30</sup> 《铜川日报》2012-5-25《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铜川排名全国第七》转引自

<http://x.0919123.com/NewsShow-1642.html>

<sup>31</sup> 《铜川日报》2012-5-25《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铜川排名全国第七》转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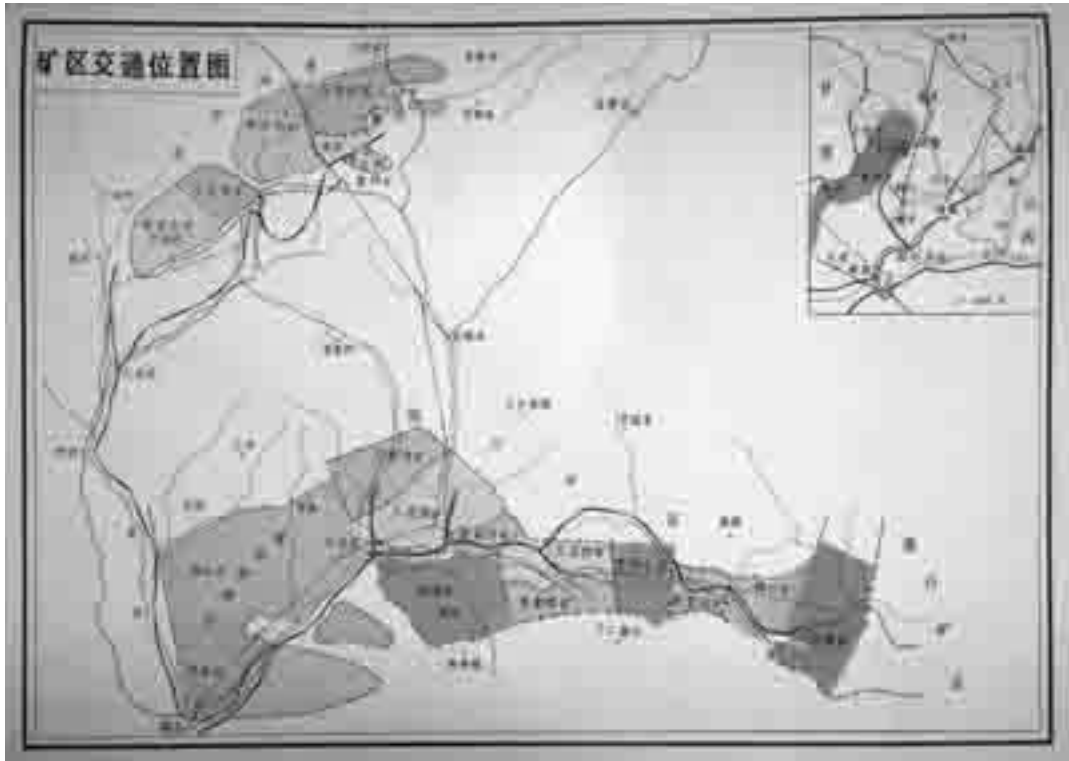
<http://x.0919123.com/NewsShow-1642.html>

## 铜川市行政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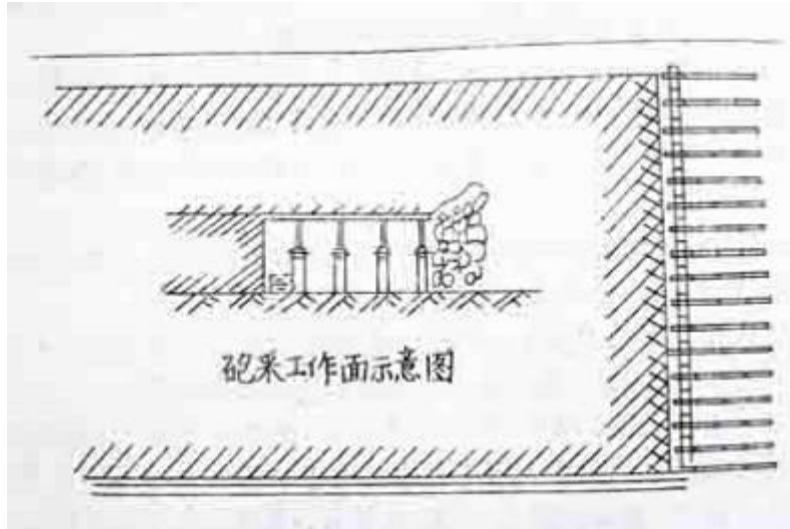
167、注：本地图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 铜川矿务局矿区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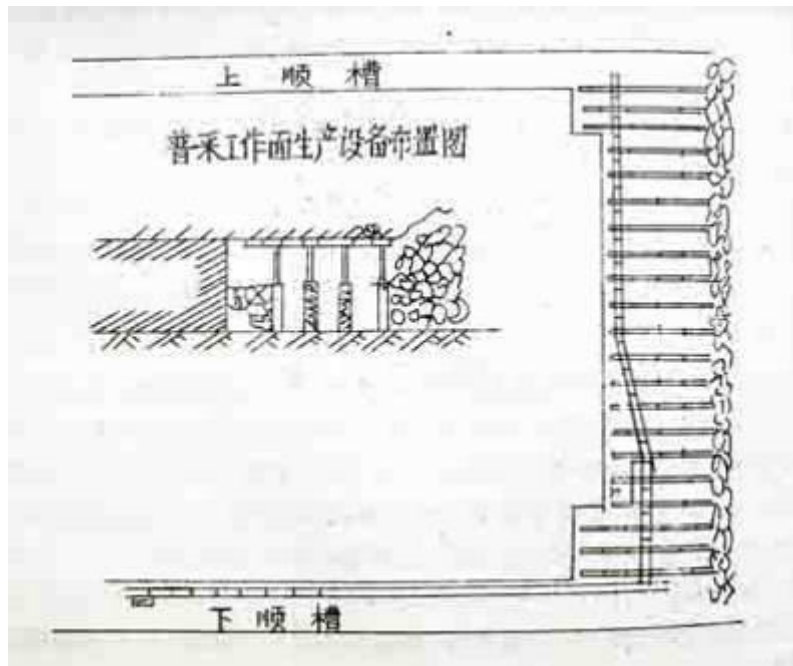


168、注：本表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

# 采煤工作面示意图



炮采工作面示意图



普通机械化采煤工作面示意图

169 (1-2) 注：本表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 196 页

###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一）

第三十四表 主要矿厂简介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

表 14-8

年份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原煤产量 (吨)	原煤全员工效 (吨/工)	掘进进尺 (米)	期末职工人数
1957	129.53	110321	0.492	2201	1602
1958	690.00	600100	0.897	20876	2440
1959	845.18	600497	0.895	23297	2637
1960	899.50	700845	0.965	26985	3383
1961	774.39	510028	0.716	22040	3212
1962	705.56	486339	0.681	17706	3526
1963	779.14	518694	0.630	14472	3515
1964	757.08	513047	0.671	16912	3380
1965	863.27	579938	0.805	18800	3531
1966	725.09	486399	0.731	16595	3472
1967	354.25	257163	0.307	6093	3472
1968	311.63	223107	0.222	6122	3896
1969	505.62	333840	0.496	11645	3489
1970	523.38	415078	0.552	16668	3116
1971	839.37	461747	0.648	15856	3011
1972	968.34	345524	0.753	12400	3728
1973	1060.90	807445	0.766	18193	3652
1974	1053.09	610158	0.752	17995	3896
1975	1121.09	610152	0.742	17403	3016
1976	940.43	518418	0.599	15261	1064
1977	1136.00	600460	0.660	12388	4240
1978	1094.90	610306	0.662	12013	4173
1979	1233.15	669910	0.739	30030	4279
1980	1302.25	622051	0.719	18489	4459
1981	1004.60	463589	0.556	17330	4502
1982	959.49	431063	0.517	17347	4882
1983	1231.60	545154	0.629	16339	4748
1984	1146.40	520439	0.622	15016	4535
1985	1366.66	560020	0.731	15404	4971
1986	1190.70	492866	0.546	13587	5065
1987	1114.63	495133	0.618	12160	4154
1988	746.33	402383	0.360	9113	4949
1989	638.95	356820	0.640	9589	4831
1990	1442.55	358858	0.605	10565	4877

170、注：本表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634 页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二）

三里洞煤矿							
三里洞煤矿历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表							
年份	吨煤成本 (元)	吨煤销售 (元)	吨煤销售 利润(元)	企业利润 (万元)	固定资产原 值(万元)	固定资产净 值(万元)	平均人均工资 (元)
1957		14.31	-2.83	-24.3	1213.8	1150.6	839
1958	11.48	16.42	3.30	172.5	1675.5	1566.5	858
1959	11.64			232.5	1826.3	1636.6	802
1960	10.94	16.66	4.48	325.2	1782.8	1534.4	751
1961	15.03	16.73	0.44	23.7	1816.0	1502.0	759
1962	17.51	16.71	-2.03	-98.4	1828.9	1464.7	768
1963	16.69	16.34	-1.58	-83.9	1871.4	1425.0	813
1964	16.20	17.20	0.16	8.4	1936.5	1407.6	811
1965	14.66				3120.0	194.0	885
1966	15.39				3044.3	1975.9	857
1967	27.79	16.06	-12.11	-449.7	3067.9	2001.3	771
1968	28.85	16.47	-15.31	-524.1	3093.2	2026.1	862.80
1969	24.06	15.98	-9.26	-501.0	3052.2	2091.2	847.44
1970	18.26	15.71	-3.68	-271.9	3130.0	2142.1	925
1971	16.30	16.01	-2.79	-239.5	3141.0	2216.7	1016
1972	14.66	16.91	0.86	39.8	2033.3	1613.5	913
1973	14.41	16.82	1.12	31.9	2125.8	1704.1	913
1974	14.69	16.90	0.89	25.3	2230.1	1811.4	897
1975	16.28	17.02	0.27	6.6	2288.9	1873.1	890
1976	17.93	16.99	-2.01	-138.0	2417.0	1999.5	837
1977	15.37	16.89	0.17	9.4	2555.7	3170.0	916
1978	16.46	16.33	-1.37	-37.8	2706.7	2322.7	949
1979	16.99	17.39	-0.95	-86.6	2917.3	2538.2	998
1980	18.45	17.67	-2.95	-121.6	2769.0	1627.7	1028
1981	22.57	17.08	-6.82	-466.0	3020.8	1773.2	1047
1982	26.10	17.74	-9.82	-509.4	3174.1	1827.2	1057
1983	22.30	17.83	-5.67	-398.9	3286.8	1855.1	1078
1984	22.85	18.60	-5.41	-379.6	3577.7	2097.3	1111
1985	25.28	20.99	-4.99	-555.1	4044.4	2482.4	1233
1986	32.65	17.77	-14.62	-830.1	4174.4	2561.0	1303.60
1987	32.82	18.73	-15.50	-1080.4	3590.7	2077.5	1303.88
1988	42.73	18.65	-23.42	-1211.0	3618.2	2149.2	1770.48
1989	56.03	19.16	-37.01	-1506.5	3503.7	2220.6	2399.52
1990	71.80	22.84	-49.30	-1686.0	3670.6	2374.1	2800.24

171、注：本表引自《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635 页

## 三里洞煤矿简介

三里洞煤矿位于铜川市城区北部漆水河畔的三里洞村。铜（川）——洞（三里洞）铁路支线通往矿区，西延公路由矿区西侧通过。

该矿井于1954年8月1日由西北煤矿管理局建井公司铜川工程处施工始建，1957年7月1日建成投产。矿井年设计能力60万吨，是西北地区第一座机械化矿井。

该矿有竖井一对，主井井口标高+862米，井深192米，井径4.5米；副井井口标高+862米，井深169.4米，井径4.5米。

该矿井投产至1990年，累计生产原煤1673.4万吨，平均年产原煤49.2万吨，年产达到设计能力的有9年。1960年最高年产量为70.1万吨。

该矿所产商品煤为贫瘦煤，动力用煤。该矿为低沼气矿井，瓦斯相对涌出量8.7立方米/吨日，煤尘爆炸指数19.9%。煤层无自燃。

管理机构：矿长、书记各一人，矿处级管理干部12人，实行矿长负责制。矿设职能科室22个，采煤区4个，辅助水平开拓区1个，掘进队7个，辅助生产单位10个。包括通风区、选运区、动力科等。

矿井投产时，有职工1602人，其中原煤生产人员1639人，工程技术人员108人，管理干部94人。1990年底，全矿有固定职工3563人，合同职工496人，协议职工818人。原煤生产人员2504人，占职工总数51.3%；管理人员193人，占4%；工程技术人员55人，占1.1%，其中高级工程师6人，工程师12人。该矿有职工家属2706户，11060人，全矿总人口15937人。

1993年9月1日，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等多家煤矿受到铁路运输和煤炭市场影响，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全局近2万人歇业。

2000年9月1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正式批准三里洞煤矿作为全国第一批破产煤炭企业。2000年10月，该矿正式向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破产涉及的三里洞煤矿及所属李家塔煤矿、史家河煤矿、东方化工厂、轨枕厂共有职工6472人，通过退休、待退、发给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一次性安置、资产重组安置等途径，共安置6140多人。

说明：

- 1、1990年以前内容主要引自《铜川矿务局志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1995年）。
- 2、1993年内容引自《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34页。
- 3、2000年内容引自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

## 铜川矿务局暨三里洞煤矿重大事件年表

- 1946年 陕西省政府将同官县改为铜川县。
- 1949年 人民政府没收了原有的同官煤矿，使之成为铜川第一家国营企业。其中铜川煤矿第三厂1944年建井，次年投产。1953年改名铜川煤矿第一矿井，1964年更名史家河煤矿。李家塔立井前身为私营同泰煤矿，1941年开井，1955年改名铜川矿务局第三煤矿，1964年改名为李家塔立井。
- 1951年 6月，铜川煤矿第三厂（史家河煤矿）开始在井下大巷铺设轻便轨道，试用安全矿灯，工人上下井及提煤均用罐笼。  
9月铜川煤矿开展民主改革运动。
- 1954年 西北煤矿管理局建井工程公司成立了铜川建井工程处，铜川三里洞煤矿8月1日破土动工。
- 1955年 11月，铜川矿务局成立，隶属西北煤炭工业管理局。12月，铜川矿务局从上海建筑公司为新建的三里洞煤矿招收了318名新工人，于12月18日从上海出发，21日到达铜川。分别安排到史家河煤矿和李家塔煤矿学习培训。
- 1957年 1月8日，公私合营焦坪煤矿井下发生火灾事故，14名矿工遇难。  
4月，铜川矿务局机修厂建成投产。  
7月1日三里洞煤矿建成投产，矿井设计年产为60万吨。  
7月7日发生罐笼断绳事故，将上海来的矿工威国其砸死在井底。  
12月，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动工兴建。
- 1958年 1月，铜川矿区工人文化宫建成。4月5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铜川县建制，成立铜川市，归省管辖。  
9月，铜川市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高潮，动员4万多名劳力，采矿炼铁，所炼的铁块基本属于废品。
- 1961年 11月，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建成投产。
- 1959年 铜川矿务局桃园煤矿建成投产。
- 1960年 1月19日，李家塔煤矿井下西巷277工作面积水突然涌出，14名矿工遇难。  
7月21日李家塔煤矿立井掘二队冒顶压死工人6名。  
9月24日，李家塔煤矿斜井采煤二区，冒顶压死工人5名。  
11月8日，李家塔煤矿东区上二127半煤岩中间运输平巷着火，32名矿工遇难。  
11月15日三里洞煤矿红旗采煤区冒顶压死工人3名。  
是年，全市精简职工3087人，压缩城市人口11693人，参加农业生产。
- 1961年 1月10日，桃园煤矿下二绞车道车场，瓦斯窒息矿工5人。  
9月21日，三里洞煤矿采煤二区，大冒顶，压死工人4名。  
市工人文化宫毁于火灾。  
9月1日，国务院决定：铜川市由省辖市改为县级市，恢复富平、耀县建置，均划归渭南专区管辖。
- 1962年 5月30日，三里洞煤矿机电区工人在风巷排水，瓦斯涌出窒息5人。  
6月26日，铜川矿务局第一矿井（史家河煤矿）井下610大巷发生火灾，30名矿工遇难，31人受伤。  
8月29日，桃园煤矿选运区，地面选煤楼捅煤工人坠入煤坑，窒息3人。

- 1963年 11月，铜川矿务局金华山煤矿建成投产，设计年生产能力30万吨。
- 1964年 6—7月，全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铜川市人口为236300人，耀县人口为156034人，宜君县人口为68286人。
- 1965年 6月1日，铜川矿务局改为渭北煤炭工业公司，管辖铜川、蒲城、韩城等统配煤矿，隶属煤炭工业部领导。  
王石凹煤矿因设计巷道层位不当，井筒施工质量差，巷道变形严重，难以正常生产，被迫停产翻修。
- 1966年 3月28日，年产45万吨的徐家沟煤矿建成投产。  
6月10日，桃园煤矿陈炉斜井，因绞车道跑车，压死工人3人。  
8月1日，铜川市改为省辖市。
- 1967年 2月2日，“造反派”组织“铜川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总会”（简称“铜总会”）冲进公安局，当场宣布“夺权公告”。使市公安局的工作限于瘫痪。  
3日，“铜川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简称“铜总司”）在市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到市委、市人委机关强行夺权，并成立了夺权指挥部。从此，市委、市人委机关全部限于瘫痪。  
8月19日，陕西省军区和8133部队，公开支持“铜总会”一派。压制“铜总司”一派。  
9月2日，“铜总会”与“铜总司”两派群众在铜川红卫公社前原村一带，动用枪支武斗，3人死亡。  
9月14日，“铜总会”与“铜总司”两派组织出动千人，在大同桥附近，用长矛、棍棒和自制的“装甲车”激烈武斗。  
10月14日，“铜总会”与“铜总司”两派数百人携枪支弹药在前原村一带进行武斗，打死25人，打伤60人。  
11月9日，为制止武斗，兰州空军工程兵某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驻铜8133部队联合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事管制。
- 1968年 8月—1969年底，全市66届、67届、68届高、初中毕业生4200人相继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万余名城镇居民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 1969年 7月28日—8月10日，漆水河连续泛滥，漆水桥下洪水深达5米。  
工农兵煤矿（焦坪煤矿）东北塔平硐移交生产。
- 1971年 11月25日，焦坪矿永红斜井采煤区，冒顶压死职工3人。
- 1972年 4月14日，鸭口矿采煤4区，冒顶压死4人。
- 1973年 6月26日，李家塔煤矿立井采煤二区，冒顶压死工人3名。
- 1975年 漆水河治理工程竣工。  
5月11日零时，焦坪煤矿前卫斜井101工作面9号硐室瓦斯爆炸，101名矿工遇难。
- 1976年 2月1日，王家河煤矿副井工人下班升井时，突遭冰块下落，罐笼盖被砸掉，4人坠入井底死亡。  
4月19日，桃园煤矿采煤六区，3人进入盲巷放工具窒息。  
8月15日，焦坪煤矿前卫斜井采煤一区，因溜子煤嘴掉落，压死工人3名。
- 1979年 6月11日，陈家山煤矿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150万吨。
- 1982年 3月2日，桃园煤矿南六采区6032工作面，冒顶压死工人4名。  
6月20日，三里洞煤矿采煤工作面冒顶，压死工人3人。
- 1983年 2月13日，徐家沟煤矿采四区3部运输机着火，24名矿工遇难。
- 1984年 2月26日凌晨3时40分，宜君南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9人遇难。

- 1986年 3月14日上午11时，郊区金锁乡背塔村第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1人死亡，1人重伤。  
5月17日，铜川矿务局金华山煤矿+680水平扩建过程，2301区段掘进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2人罹难，1人重伤，4人轻伤。  
8月3日焦坪南塔组办煤矿事故6人死亡，2人受伤。  
东坡煤矿改扩建工程投产，矿井综合生产能力由45万吨增至95万吨。
- 1989年 李家塔煤矿由于矿井濒临衰老，产量逐年递减，于元月1日报废。  
三里洞煤矿年产煤30万吨，远低于设计的60万吨。1957—1989年，三里洞煤矿累计生产原煤1634.3万吨，其原煤产量33年中，14年在50万吨以下。  
1989年底，三里洞煤矿有职工4831人，其中工人2643人，占54.7%。井下工人1843人，占职工总人数的38.1%。工程技术人员55人。  
12月底，铜川矿务局共有职工6.21万人，其中局机关编制462人。
- 1990年 7月，铜川市总人口782347人，其中市镇人口456987人(市人口414035人)。
- 1993年 9月1日，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徐家沟煤矿、金华山煤矿和焦坪煤矿红卫井口受到铁路运输和煤炭市场影响，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全局近2万人歇业。  
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以“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对铜川市大气严重污染进行了曝光。  
1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铜川市在下高塄设立新区。
- 2000年 2000年9月1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领导小组正式批准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作为全国第一批破产煤炭企业。
- 2001年 4月6日21时14分，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四石门皮带下山延伸段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8人死亡，16人受伤。
- 2004年 11月28日7时10分，铜川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66名矿工遇难。时任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赵铁锤说“11·28事故是我国自1960年11月28日平顶山龙山庙煤矿死亡187人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之后，44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最大的一起安全事故”。
- 2005年 7月19日14时20分，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五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死亡，3人受伤。
- 2011年 10月16日11时38分，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田玉煤矿发生井下瓦斯爆炸事故，11人遇难。

#### 说明：

- 1、本表主要参考资料为《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1，13~35，225~229，249~260页。
- 2、戚国其死亡日期见老高老高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416749405>
- 3、三里洞煤矿破产信息转引自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
- 4、2001年陈家山瓦斯爆炸信息引自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67613/67769/64589/68250/4611084.html>
- 5、2004年陈家山瓦斯爆炸信息引自新浪网新闻中心。  
<http://news.sina.com.cn/c/2004-12-03/21214426863s.shtml>

## 1955 年上海支援到铜川三里洞煤矿部分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出生年份	主要职务	状况	备注
1、	顾龙祥	1936	绞车司机		2005 年受访者
2、	沈龙根	1936	采煤工		2005 年受访者
3、	王正祥	1933	采煤工	2008 年去世	2005 年受访者
4、	姚洪昌	1933	绞车司机		2005 年受访者
5、	葛登发	1931	采煤工、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6、	张百生	1933	采煤工		2005 年受访者
7、	陆荣初		副矿长		2005 年受访者
8、	周寿根	1935	电工、劳资科长		2005 年受访者
9、	王俊彦	1927	通风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10、	罗世俊		采煤工		2005 年受访者
11、	倪进祥		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12、	丁福珍		采煤工	2010 年后因病去世	2005 年受访者
13、	江兴怀	1923	副矿长、工会主席		2005 年受访者
14、	王福坤	1927	采煤工、采购员		2005 年受访者
15、	缪德新	1935	掘进工		2005 年受访者
16、	成妙祥		采煤工、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17、	童 仇	1922	电工		2005 年受访者
18、	高章顺		采煤工、班长		2005 年受访者
19、	陈义祥		电工、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20、	张电飞	1936	瓦工、区长		2005 年受访者
21、	叶永康		瓦工		2005 年受访者
22、	毛老福		瓦工		2005 年受访者
23、	朱阿宝	1932	瓦工		2005 年受访者
24、	陈长寿	1921	采煤工、营销员		2005 年受访者
25、	戚国其		绞车司机	1957 年 7 月因煤矿事故去世	
26、	朱永生	1932	瓦斯检查员	1986 年因病去世	
27、	陆根福	1930	采煤、机电工	2004 年因病去世。	
28、	张金龙		电工	后调到陕南，2002 年因病去世。	
29、	王福良		中队长、绞车司机	已去世	
30、	王叶涛		中队长、绞车司机		
31、	周小侠				
32、	雷云科				
33、	陶明祥				
34、	张许金			已去世	
35、	朱岳如		班长	已去世	
36、	邱长宇				
37、	姚惠民			已去世	
38、	吕帮新			已去世	

39、张永福		已去世
40、董之良		已去世
41、陈造根		
42、于月堂		1959年因井下事故去世
43、明大坤		已去世
44、孙宜人		已去世
45、叶佩昌		已去世
46、周永福		
47、杜玉文		
48、毛阿龙		
49、任福兴		已去世
50、陈连昌		
51、沈春龙		
52、朱文耀		
53、谢继贤		
54、周广森		
55、徐七楼		
56、范一勤		
57、朱才宝		
58、王阿根	锅炉工	
59、李金寿		
60、丁协星（后改名叫毕文涛）		
61、周 涛		
62、刘云龙		
63、裘水澄		
64、王川江		
65、吕庆远		因井下事故已去世
66、武书华		
67、戚一鸣		
68、奚海金		
69、鲍忠祥		
70、陈龙根		已去世。
71、陈述书		59年调王石凹煤矿
72、陈 清		59年调王石凹煤矿
73、夏俞斗		59年调王石凹煤矿
74、谭 奇	电工、中机厂	已因病去世。
75、郭德奇	电工	50年代下水库救人溺亡
76、彭兆林	放炮员	
77、周云华	放炮员	
78、华 庚		
79、张林根		
80、林冲其		
81、杨武峰	中机厂	
82、沈宏三		

83、朱宝生	
84、曹百合	
85、田海生	
86、肖谷贵	2004 年去世。
87、江东林	
88、张阿发	
89、戚东宝	
90、陆德元	调到陕南
91、徐 XX	因煤矿事故去世
92、史 XX	已去世
93、陈炳林	后来调到兰州
94、陈家兴	
95、王全鹏	因煤矿事故去世
96、王少南	
97、郭国臣	
98、朱阿福	
99、杨文芳	
100、王祖德	后调回上海
101、阮德贤	
102、孙登方	
103、王宏 x	
104、江君才	
105、郁光荣	
106、丁叔兴（边文道）	
107、刘孝贤	
108、丁启平	
109、左学书	

说明：

- 1、据多位被采访的矿工讲述，1955 年 12 月 18 日从上海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的总人数为 318 人。当时的人员名单已佚，我先后采访了约 20 名老矿工及相关者，上表是根据他们的讲述整理出的部分人员名单，共 107 人。2014 年 3 月，从同一批上海来的矿工子弟处，又知道了他父亲丁启平和另一矿工左学书的名字。合计 109 人。
- 2、上表中“2005 年受访者”是指我在拍摄纪录片《三里洞》时采访过的老矿工。
- 3、部分人名无法确证文字的，只能根据当时采访视频的发音推断。
- 4、上面名单中知道状况的均已经注明，没有标明属于未知。



## 朱永生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年表

- 1931年 朱永生，学名朱兆其，出生在江苏太仓新丰的一个村子里，其父朱成良，母亲石小妹。朱永生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三岁时因家境贫寒，母亲将他送给了在太仓南郊镇开茶馆的朱福和、朱贵宝夫妇。朱贵宝后来还收养了一个女儿叫朱兆英。
- 1940年 吴玉英出生在江苏太仓南郊的一个村庄吴家弄堂。家里姊妹众多，她排行倒数第二。她的父亲叫吴银生，母亲叫周阿云。
- 1955年 12月18日至21日，朱永生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从上海建筑公司来到陕西铜川的三里洞煤矿。随后将其养母朱贵宝和妹妹朱兆英也从江苏太仓接到了铜川。后吴玉英也在同学朱兆英的介绍下，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嫁给了朱永生。吴玉英又介绍其从小就送了人的姐姐何菊珍来到了三里洞煤矿，嫁给了也是一起从上海来的绞车司机顾龙祥。朱兆英嫁给了电工张金龙。1960年以后，张金龙又介绍其弟张野根从上海浦东来到三里洞煤矿下井采煤。
- 1956年 朱永生、张金龙、顾龙祥在铜川的史家河煤矿参加培训。
- 1957年 朱永生在铜川三里洞煤矿通风区工作，担任瓦斯检查员。顾龙祥在绞车房当绞车司机，张金龙在井下做电工。
- 1960年 1月20日朱永生、吴玉英的长子朱林鑫出生。
- 1961年 朱永生的生父朱成良于8月12日去世，终年63岁。
- 1963年 朱永生、吴玉英的长女朱林娟出生。
- 1966年 朱永生、吴玉英的次子朱红鑫出生，后改名为朱弘鑫。
- 1968年 朱林鑫在铜川三里洞煤矿小学上学。
- 1969年 朱永生、吴玉英的次女朱红娟出生，后改名为朱弘娟。
- 1970年 朱永生的养母朱贵宝去世，终年73岁。
- 1974年 朱林鑫进入铜川三里洞煤矿中学读初中。
- 1976年 冬，朱林鑫姊妹四人回到江苏太仓读书，半年后返回铜川。
- 1978年 朱林鑫在铜川三里洞煤矿中学毕业，参加高考落榜。
- 1979年 朱林鑫在铜川三里洞煤矿砖瓦窑和书画社干临时工。  
吴玉英之父吴银生于7月26日去世。终年75岁。
- 1980年 6月，朱林鑫考入铜川市人民银行工作。
- 1982年 朱林娟考入铜川市人民银行郊区银行（后改为工商银行）。
- 1983年 8月，朱弘鑫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来一直读到博士，并留校任教。
- 1985年 8月，朱林鑫和胡菊芳私奔去无锡、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旅行结婚。  
11月，朱林娟调到太仓工商银行。
- 1986年 1月，吴玉英因病在太仓去世。  
1月，朱林娟和杨俊的婚礼在太仓举行，一年后女儿杨舒郁出生。  
2月26日朱永生的生母石小妹去世，享年86岁。  
11月，朱永生因病在铜川去世，终年55岁。  
将朱永生骨灰运回太仓与吴玉英合葬在吴家弄堂墓地。

- 朱弘娟接父亲班到三里洞煤矿选煤楼上班。
- 1987年 春节期间《林鑫书画展》在铜川图书馆举办。朱林鑫开始用笔名林鑫。  
6月，其子朱思凡出生。
- 1989年 6月，《林鑫现代艺术展》在陕西美术家画廊举办（陕西美术馆前身）。
- 1993年 8月，《林鑫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 2000年 三里洞煤矿破产，朱弘娟买断了工龄，失业。
- 2001年 12月，《21世纪优秀艺术家画集——林鑫》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 2002年 4月，林鑫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 2003年 林鑫开始拍摄纪录片《陈炉》。弟媳张莹帮助翻译英文字幕。
- 2005年 4月林鑫开始拍摄纪录片《三里洞》。
- 2006年 朱弘娟回到太仓打工。
- 2007年 8月林鑫开始拍摄纪录片《同学》。  
吴玉英之母周阿云于7月5日在江苏太仓去世，享年98岁。
- 2009年 林鑫在铜川陈家山煤矿拍摄纪录片《瓦斯》。
- 2010年 12月林鑫完成纪录片《瓦斯》后期剪辑，开始拍摄纪录片《传道人》。
- 2012年 5月朱林鑫（林鑫）提前退休。  
2-12月林鑫完成《当代纪录片文献：三里洞》一书初稿。
- 2013年 10月林鑫完成纪录片《传道人》后期剪辑。

# 纪录片《三里洞》拍摄制作和放映

## 一、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矿工之子拍摄的关于他父辈的纪录片。1955年,300多位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怀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希望和梦想,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50年后,当年的建设者大多不在了。在那片深埋着黑色煤炭的土地上,始终激荡的是矿工们的命运和呼吸。本片用15个片段,记录依然生活在当地的老矿工、已故者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以矿工的群像,见证了生命的坚韧和尊严。他们是:戚国其、顾龙祥、沈龙根、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张百生、陆荣初、周寿根、罗世俊、丁福珍、童仇、高章顺、陈义祥、朱永生。

## 二、 作者阐述

作为矿工的儿子,那深深地刻在心灵深处的煤矿,成为我永远也抹不掉的黑色记忆。1955年12月,父亲和他的300多位工友,从上海来到西北铜川的三里洞煤矿。在艰难的生存挣扎中,掩埋了他们的青春和梦想。2005年,我怀着对父亲的一份歉疚,寻找着那些活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肖像,并以此作为纪念。

## 三、 纪录片《三里洞》主要技术资料

- 1、片长:172分钟
- 2、彩色&黑白:黑白
- 3、影片画幅比:16:9
- 4、影片拍摄格式:DVCAM
- 5、影片画质:标清,720\*576
- 6、影片原始文件格式:AVI
- 7、影片语言:汉语
- 8、字幕语言:分为中英文字幕和英文字幕两种
- 9、影片完成时间:2006年12月
- 10、修订版完成时间:2007年6月(修订版仅替换了个别镜头画面,影片长度不变)
- 11、导演、摄影、剪辑:林鑫
- 12、影片资金来源:林鑫个人
- 13、英文字幕翻译:小刘等
- 14、英文字幕校对:范敏格、黄冬、朱弘鑫

## 四、 前后期设备

- 1、拍摄设备:索尼190P数码摄像机、索尼780三脚架
- 2、编辑设备:普通PC计算机
- 3、编辑软件:adobe premiere
- 4、拍摄介质:小型DV磁带

## 五、 拍摄制作

- 1、拍摄地点:陕西省铜川市
- 2、拍摄时间:2005年4月至6月,共拍摄71盘DV素材磁带

3、后期制作：2005年6月至2006年12月，整理录入口述文字近20万字。2007年6月进行了修订

## 六、 主要放映和获奖

2007年4月 云之南记录影像展  
2007年5月 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独立精神奖（最高奖）  
2007年10月 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年度十佳纪录片  
2008年10月 巴黎 SHADOWS 电影节  
2008年10月 第四届 REEL CHINA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

## 七、 主要收藏机构

- 1、 栗宪庭电影基金
- 2、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 林鑫纪录片作品

### 《陈炉》

拍摄时间：2003 年

拍摄地点：陕西铜川

DV/ 29 分钟/ 彩色



172、纪录片《陈炉》海报

#### 内容简介

画家林鑫在这部首次执导的实验性纪录片《陈炉》中，讲述了黄土高原腹地一个千年陶瓷古镇的故事。本片由一个 360 度的全景序幕和《自说》、《风骨》、《风情》三部分组成。《自

说》主要通过数十位陈炉男女老少的特写镜头和每人一句话，从不同角度呈现了陈炉人自己心中的陈炉；《风骨》用象征的手法、张力的画面，展示了手工拉坯、刻花等传统陶瓷工艺的魅力和产品制作流程；《风情》集中展示了古镇的民风、民居及名闻遐迩的独特风景——罐罐墙。全片以凝视的目光和诗性的语言，试图在影像中留下“炉山不夜”的风光不再、传统日渐式微的最后的陈炉。

#### **Abstract of the Newsreel *Chen Lu***

*Chen Lu*, the first experimental newsreel directed by the painter LIN Xin, tells a story of an old ceramic county with almost 1000 years of history on the hinterland of loess plateau. The newsreel is composed of a prelude with a 360-degree panorama and three other parts entitled *Soliloquies*, *Essence of Art* and *Civilian Landscape*. *Soliloquies* presen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 one sentence from each native, the Chen Lu in local people's own hearts by close-ups of tens of Chen Lu people consisted by men and women, young and old. Through the techniques of symbolizing and the scenes with tension, *Essence of Art* displays the attraction of traditional ceramic art, such as artificially making flans and cutting flower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procedures. The part of *Civilian Landscape* shows not only the folkway and civilian houses, but also the special and widely-known scenery – guanguanqiang, a wall built up with ceramic pots. With an intensive gaze and poetic wording, the newsreel attempts to impress the audience with the last view of Chen Lu – a county with a fading glory and dying traditions; a county that once made a boast of its ever-bright mountain.

#### **作者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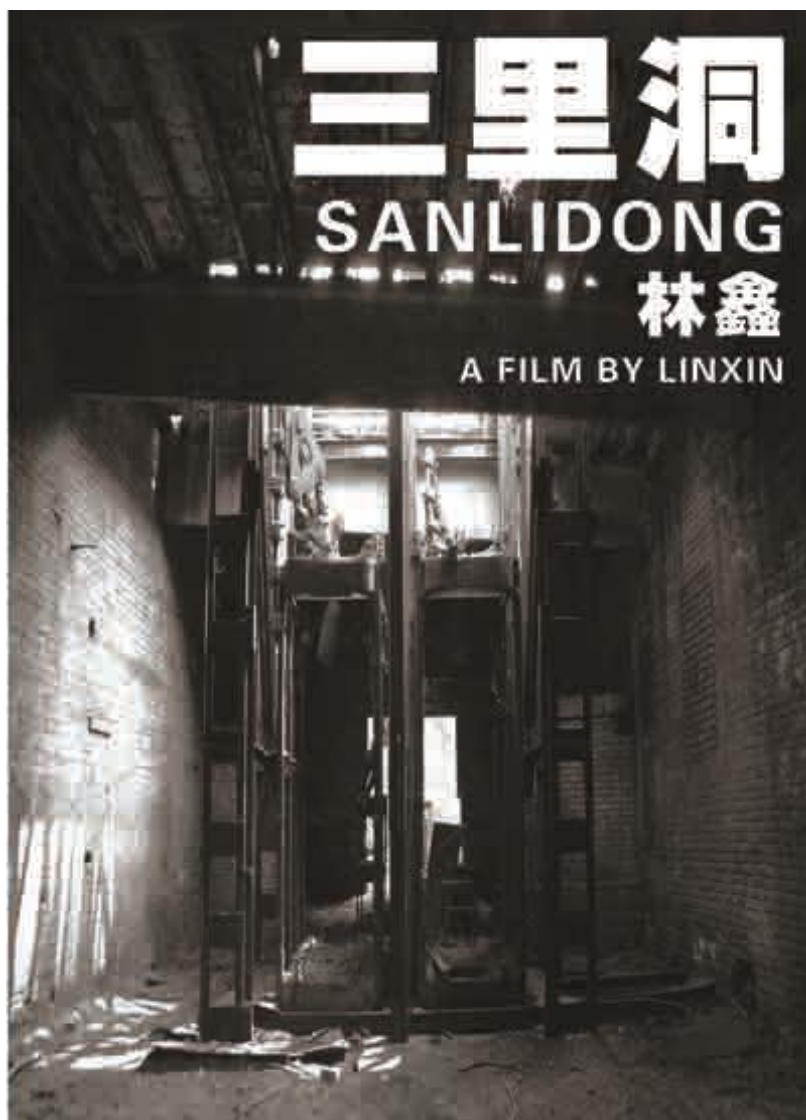
这是我的第一部影像作品，制作中几经坎坷，历时一年才完成。在本片中，我试图将实验、记录、文献等多种因素融为一体，使多向解读成为可能。并从拍摄的 100 多位陈炉人自述中选取 48 位来向世人展示陈炉人眼中的陈炉。

#### **Statement of the Author**

As this is my first video work, I spent one year on it with frustrations and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 tried to incorporate various factors of experiment, records and literature into one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audience to understand the work via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ty-eight out of 100 Chen Lu people were selected to illustrate, through their soliloquies, the Chen Lu in local people's eyes.

## 《三里洞》

拍摄时间：2005 年  
拍摄地点：陕西铜川  
DV/ 172 分钟/ 黑白



173、纪录片《三里洞》海报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矿工之子拍摄的关于他父辈的纪录片。

1955 年，300 多位来自上海的热血青年，怀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希望和梦想，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50 年后，当年的建设者大多不在了。在那片深埋着黑色煤炭的土地上，始终激荡的是矿工们的命运和呼吸。本片用 15 个片段，记录依然生活在当地的老矿工、已故者和那个即将消逝的时代。以矿工的群像，见证了生命的坚韧和尊严。

他们是：戚国其、顾龙祥、沈龙根、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张百生、陆荣初、周寿根、罗世俊、丁福珍、童佺、高章顺、陈义祥、朱永生。

###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San Li Dong*

This is a documentary film made by the son of a miner about his father's generation. In the year of 1955, more than 300 ardent youths from Shanghai City came to the Sanlidong Coal Mine with the hope of realizing their dream of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Northwest. 50 years on, few of them are still alive. The sound of breathing of the miners is omnipresent on that land of buried black coal. This film is divided into 15 sections, and records the lives of miners still living there, those who have already died, as well as an era that has almost ended. The images of the lives of these miners are testimony to their incredible tenacity and dignity.

The 15 miners are: Qi Guoqi (deceased), Gu Longxiang, Shen Longgen, Wang Zhengxiang, Yao Hongchang, Ge Dengfa, Zhang Baisheng, Lu Rongchu, Zhou Shougen, Luo Shijun, Ding Fuzhen, Tong Guang, Gao Zhangshun, Chen Yixiang, Zhu Yongsheng (deceased).

### 导演自述

作为矿工的儿子，那深深地刻在心灵深处的煤矿，成为我永远也抹不掉的黑色记忆。1955年12月，父亲和他的300多位工友，从上海来到西北铜川的三里洞煤矿。在艰难的生存挣扎中，掩埋了他们的青春和梦想。2005年，我怀着对父亲的一份歉疚，寻找着那些活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肖像，并以此作为纪念。

### **Description of the Film by the Director of *San Li Dong***

As the son of a miner, the coalmines that are deeply buried in my soul have become dark, black memories that can never be erased. In December 1955, my father, together with more than 300 other miners, came to work in the Sanlidong Coal Mine in Tongchuan in the Northwest; they spent their youth and dreams in a desperate struggle to survive. In the year of 2005, filled with remorse after my father's death, I tried my best to find the surviving miners still living at Sanlidong, and recorded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 can be remembe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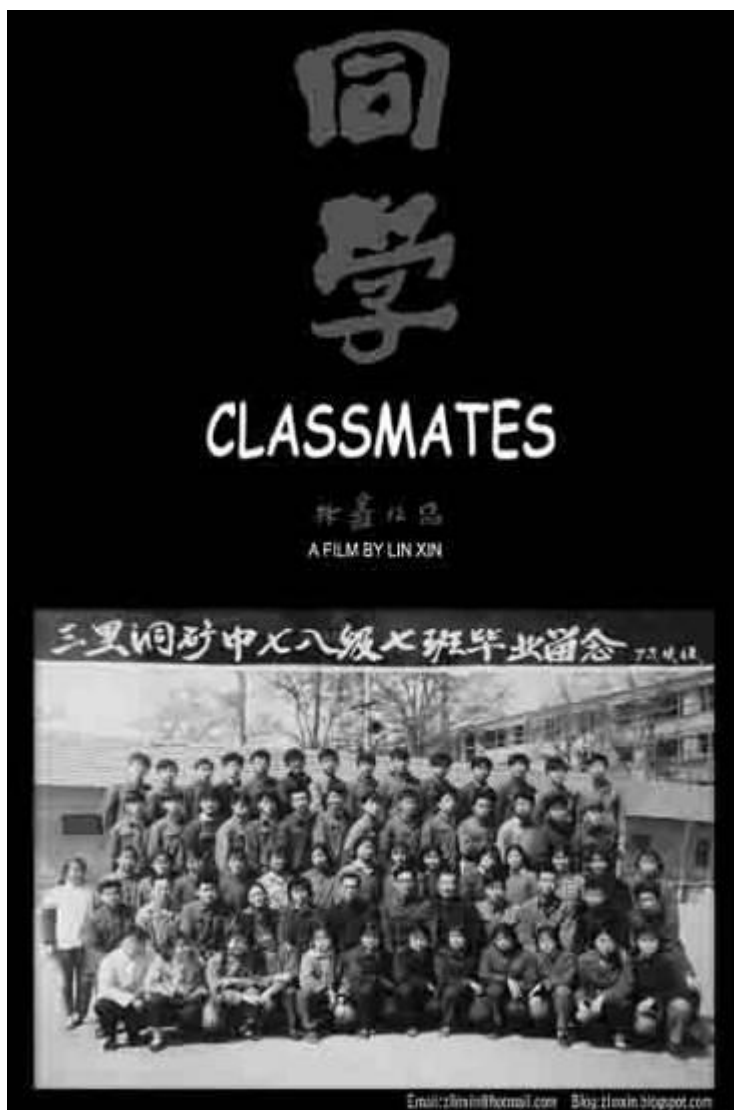


## 纪录片《同学》

拍摄时间：2007-2008 年

拍摄地点：陕西铜川

DV/203 分钟/ 彩色



174、纪录片《同学》海报

### 内容简介

二十多个同学的回顾，追溯了三十年的个人历史；一个个随机截取的普通日子，对应着自然和生命的四季。1978年，当这些大都是矿工后代的同学，从陕西铜川三里洞煤矿中学毕业时，他们即将展开的人生之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沉浮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有着太多的理想失落与妥协，也有着不屈不挠的挣扎和坚守。三十年后，林鑫再次走近当年的同学们，记录了他们当下各自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平淡中的安逸、喧嚣中的孤独、富足后的厌倦、贫困里的无奈，都一一绽放在这群鲜活的生命中，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城市大多数普通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辉映着这样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

### Summary of the documentary *Classmates*.

Twenty plus classmates look back into the past, tracing back through a 30 year history. One after

another adapts to the random events that come to shape their lives, to the four seasons of life and nature. These descendants of mine workers graduated in 1978 from Tongchuan Coal Mine Middle School in Sha'anxi. The years they were about experience coincided with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Floating in the changes of the new era, some experience compromises and the loss of ideals, whilst some keep struggling ahead with great determination. Thirty years later, Lin Xin encounters his old classmates, and records their individual lives and history; the ease of monotony, the loneliness of success, the weariness of a life of plentiful, the helplessness of poverty... all come forth in the lives of these group of people, becoming an epitome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small to middle-sized cities in this era,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ing on a generation that advances forward undefeated.

### **导演自述**

作为铜川三里洞煤矿中学高七八级的一员，一直挣扎在谋生与艺术创作冲突的双重疲惫中。大多数同学依然生活在这座城市，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时代的烙印凝成个体生命的轨迹，岁月的沧桑蒙在曾经青春的脸上，我再次和他们一一相遇。我的预期在拍摄中不断地被现实修正，生活带给我的震撼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接受命运的摆布，在这些偶然或必然相遇的同学的普通一天中，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状态，感知着生命的柔弱和坚韧。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无奈，都不断加深着我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的认知。

### **Director's Introduction**

As as a 1978 grade student at the Sanlitong Coal Mine Middle School of Tongchuan, I struggled between the twofold consuming conflict of making a living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Most of my old classmates still live in that same city, each living their spells of good and bad fortune and their different destinies. The imprints of the era congeal into individual trajectori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come to put a veil on their once young faces... I once again come to meet with each of them. My expectations are constantly rectified by reality during the filming, many things exceeding my imagination. I come to accept the manipulation of fate. Whether fortuitously or inevitably, I've come to meet them again and record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ir situations, perceiving through this the frailty and tenaciousness of life. Their happiness and sorrows, hopes and despair, all continually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life, as well as my knowledge of this generation.

## 《瓦斯》

拍摄时间：2009 年

拍摄地点：陕西铜川、西安

HD/136 分钟/ 彩色和黑白



175、纪录片《瓦斯》海报

### 内容简介

2001 年 4 月 6 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8 人遇难。2004 年 11 月 28 日，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66 人遇难。五年后，矿工之子林鑫拍摄了这部关于矿难的影片。本片通过矿工、遇难者家属等二十余人的口述和街头随机采访，从不同角度立体地呈现了矿工的真实生活和矿难背后残酷复杂的社会现实。这部影片是林鑫《生存三部曲》的完结篇。

### Summary of the documentary *Gas*

On the 6<sup>th</sup> April 2001, a methane explosion occurred at the Chenjiashan Mine near Tongchuan in Shaanxi Province, claiming the lives of 38 people. On the 28<sup>th</sup> November 2004, 166 people died in

another gas explosion at the Chenjiashan Mine. Five years on, Lin Xin, son of a miner himself, decided to make a film about these mine accidents. This film portrays the real lives of miners and the cruel and complex social reality behind these incidents, through oral testimonies and street interviews with over twenty miners and family members of miners killed in mining accidents. This film is the last in Lin Xin's "Survival Trilogy".

### **导演自述**

当我拿起摄影机进入陈家山煤矿时，作为中国 44 年来最大的矿难，陈家山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五年，然而恐惧和不安依然笼罩着矿区。因为还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很多在职的矿工拒绝了采访。而最终面对镜头的人们，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的矿区生活和矿工生存的艰辛和无奈。

### **Director's Introduction**

When I picked up my camera and entered the Chenjiashan Mine five years after China's largest gas explosion in the last forty-four years, fear and anxiety still hung heavily in the air. Many working miners refused to be interviewed because they live in the area. Those who finally agreed to be filmed give an account of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mining area and the frustrations and hardship of those working in the mines.

## 《传道人》

拍摄时间：2010-2013 年

拍摄地点：陕西铜川

HD/162 分钟/ 彩色



176、纪录片《传道人》海报

### 内容简介:

#### Summary:

这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纪录片，讲述了陕西省铜川市十多位基督徒的故事。影片通过老中青四代传道人的生活 and 信仰之路，反映了五十年来社会变革对当地教会的深远影响。无论是个人在侍奉道路上遇到的拦阻、软弱和成长，还是教会内部的纷争，均成为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中，关于传道人群体以及教会历史和信仰现状的忠实、中立的写照。

This is a documentary about faith, narrating the stories of a dozen or so Christians in the city of Tongchuan, in Shaanxi Province. Through the lives and beliefs of four generations of preachers, the film reflects o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50 years of social change on the local church.

Whether recounting personal setbacks encountered on the serving path or people's weaknesses, growth, or disputes within the church community, the film becomes a neutral and faithful portrayal of a group of preach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community and of the status-quo of belief in this faithless era.

**导演阐释:**

**Director's commentary:**

完成了生存三部曲之后，开始拍基督教。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原先对信仰的纯粹想象完全被颠覆。或许只有上帝是全备的，人都有缺憾和软弱，传道人一样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生存压力。因此，也使得纪录下来的传道人群像更为真实和鲜活，离我们并不遥远。

After completing the "Survival Trilogy", I started to shoot material on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my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deepened through the filming, the original and clear-cut image I had about faith became completely overturned. Perhaps it is only God who is fully equipped and all people hav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and so the preachers, in the same way, have to face a complex social reality and the pressures to survive. Consequently, the characters of the group come through as more real and dynamic, and not so far-flung from us.

## 后记

这是由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一部影像和口述文献，包括了老一代矿工前辈的一生经历和一个矿工之子长达十年跨度的拍摄、整理和写作。书中的文字是从个人视角出发的，无论是矿工口述、我的回忆以及对纪录片的观察和思考，均与所处的社会现实和各自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个人的眼光和镜头不是冰冷的，在持久地注视中，也必将带有自身的心跳和呼吸。绝对的客观中立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把这些不同个体的叙述汇集到一起，是试图保存一个群体、地域和时代的记忆。

从2005年春开始拍摄纪录片《三里洞》，到完成本书的梳理和写作，已经过去了十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谋生和继续拍摄新的纪录片，记录下来的口述文字资料，也一直没有时间整理。2011年12月，《中国纪录影像文库》主编郭净老师建议我写作本书。但真正动笔是从2012年2月开始的，我当时因腰椎间盘突出，在家休息，躺在床上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本书“第五部分：三里洞矿工口述实录”的整理。2012年5月我提前退休后，开始其他章节的写作，于2012年12月完成本书初稿，2013年3月完成第二稿，2014年4月定稿。

我的纪录片拍摄和写作，是用自己的心灵和被拍摄者对话，没有这些老矿工对我所做工作的认同、理解、信任和支持，就没有纪录片《三里洞》和这部书稿。我也一直认为，对父辈生活的忠实纪录和准确还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本书出版的终审阶段，出版社要求提供被采访者的双重书面授权，这是我以前没有考虑到的，况且已经过去了十年，不少被采访者已去世，很多人搬迁了，不大好找。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湘女士给我发来信息：

昨天和郭老师汇报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只有让您辛苦一下，但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值得去做。在纪录片界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没有涉及公开出版，甚至没有涉及在影院放映，所以一直没有解决。这次就借您这本书的出版，开创一个规则。我们拍纪录片的初衷原本就是在关注一个人群，理应尊重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这次的授权书不仅是为了这本书的顺利出版。

郭净老师和陈湘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诸多辛苦，我也在十年后再一次走进三里洞。

从铜川新区到老区，虽然只有40里，坐公交车却要一个多小时。我和妻子菊芳到了老区，首先来到五里铺北公房，那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这里变化很大，过去的矿工住宅区都拆掉了，靠着山坡，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在马路边那些打扑克的老矿工人群中，我们发现了姚洪昌的身影。他显老了很多，却依然精神矍铄，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平时一个人住，刚好他的小女儿来看望他，顺便签了第一份授权书。姚洪昌告诉我，葛登发、周寿根、张百生都还健在，已经搬到了拆迁后新盖的安居楼中。见到了这几位老矿工和他们的子女，令人欣慰。葛登发身体还好，耳朵更加听不见了。他老伴刘梅娣依然在忙着家属区的事情，桌子上摆着那些还没有得到安置的人员名单。丁福珍已经去世了，其妻也搬走了，地址不详。从北公房出来，直接到河东我的姨夫顾龙祥家，他腿脚不便已经不能下楼，只能在室内走动。我姨夫菊珍身体还好，老两口依然在为小女儿操心。另一个单元住的沈龙根去世了，他的老伴已经不能下床，每天女儿过来给她送饭。见到我她哭着告诉我，老伴不在了。回到姨夫家见到了陆根福的妻子，老太太满头白发，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精神却依然很好。和她约好第二天上午10点和她的儿子见面，我和妻子便在夜色中赶回铜川新区。

第二天一早，正准备乘车，接到了张百生儿子的电话，告诉我他父亲的身份证已经拿来

了。从张百生家出来，和陆根福的儿子见面后，我们又找到了高章顺的儿女，高章顺已经去世，他儿子是我的同学，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打工，才回来不久。我们来到三里洞矿的标兵楼找罗世俊，罗世俊的老伴已经去世了，他一个人住。老人声音洪亮，只是耳朵听不见。我只好把要说的话用笔写在纸上告诉他。打通了他儿子的电话，约了下午3点见面。罗世俊告诉我陆荣初已经去世，其老伴住的地方他记不得名字，但他知道在北关什么地方，执意领我们去找。陆荣初的老伴比以前瘦了很多，说起陆荣初去世了，不住地流泪。见到了陆荣初的儿子，和其父长得很像。从陆荣初家出来，打车将罗世俊送回家。我们在三里洞桥头的一个家属区找到了丁福珍的老伴和儿子，也意外地知道了我父亲的徒弟裘水标也住在同一个小区。下午3点准时在三里洞选煤楼附近见到了罗世俊的儿子，他也在矿上干了几十年，已经退休了。

从三里洞回到五一路火车站附近，几经周折，找到了陈长寿家，陈长寿已经去世，他的老伴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十年前见到她的时候印象是胖胖的，现在显得清瘦。不一会他的儿子回来了，要给母亲做饭。河东住的王正祥也已经去世了，忘了是谁告诉我，他的老伴平时在红旗街百货大厦前摆摊卖鞋垫。我和妻子打车过去，在马路边的台阶上，见到了王正祥的老伴林秋娣，老人现在住儿子家，一个人没事在街上卖卖鞋垫只是消遣。找到了她在中学教书的儿子，他爽快地说，不用说了，我给你签字。这些老矿工及其家属和子女的信任令我和妻子深受感动。

第三天一大早，坐车到老区川口下车，费了一点周折找到了王福坤家，王福坤和老伴都身体很好，80多岁的老太太，思维敏捷健谈，讲起自己60岁还到香港去打工的经历，令人感慨。她带着我们找到了90多岁依然健在的江兴怀，以及童仇的老伴和女儿，童仇五年前已经去世。蓝公房住的缪德新也去世了，他的老伴住在即将拆迁的房子里，我们去时她的女儿将她接走了，后来也找到了她们。中午，我们爬上虎头山大坡，找到了陈义祥原来住的地方，说他在矿务局家属院住，我们又到矿务局家属院找，没在，打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是电话坏了。邻居说上午还看见他。我们一直等，到下午4点左右，仍不见陈义祥回来。一个邻居说他的小女儿在文化宫附近住，我们就去找，只知道他女婿姓张，开车的，居然也找到了，但不在家。他外孙女给了陈义祥小女儿的电话，终于联系上，原来陈义祥被接到了他的大女儿家。傍晚终于见到了陈义祥，87岁的老人非常兴奋，躺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往事，记忆力依然很好。

第四天，主要在狭长的小河沟川道，叶永康和朱阿宝还健在，毛老福、张云飞已经去世，也先后找到了他们的子女。回到新区，见到了王俊彦的儿子，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另外，还有两个老矿工的口述，尽管我做了努力，仍未得到其子女的书面授权。我虽然为无法把他们的经历收入书中感到遗憾，但尊重其子女的决定和选择。

2005年拍摄《三里洞》的时候，主要采访的是老矿工，这次则更多地接触到他们的子女。

如果没有诸多前辈及亲友的信任、支持和帮助，就不可能有这部书的存在和出版，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接受采访的父辈矿工及其家属和子女。

感谢在本书写作中始终给我鼓励和指导的郭净老师。

感谢为本书撰写序言的电影评论家王小鲁先生。

感谢《中国纪录影像文库》丛书主编何明先生和副主编陈学礼先生。

感谢民族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陈湘女士。

感谢金波、钟瑾、詹娴、贾笃拴、朱奇、朱世清、李武运等师友。

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全力以赴地支持、帮助和理解，并使我得以继续前行。



林鑫  
2015年9月16日于铜川新区

## 参考文献

### 著作

《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铜川矿务局志 1955-1990》（铜川矿务局志编撰委员会，1995年）

### 网络文章

新华网：《陕西首家破产国有煤矿拍卖成功》

[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http://news.xinhuanet.com/chanjing/2001-09/27/content_43458.htm)

老高老高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416749405>

《中国环境报》2011年10月19日《铜川走出由黑变绿的发展之路》。转自《铜川都市快报》<http://www.ej125.com/portal.php?mod=view&aid=274>

《铜川人口网》透过“六普”，正确分析铜川人口发展态势

[http://jsj.tongchuan.gov.cn/structure/rksj/tc/content\\_50973\\_1.htm](http://jsj.tongchuan.gov.cn/structure/rksj/tc/content_50973_1.htm)

百度百科：资源枯竭城市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7651.htm>

新华网：《让166个灵魂安息：陈家山矿难两周年法院宣判》转自网易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06/1130/08/315N1GFJ000120GU.html>

陕西旅游网：铜川市照金丹霞地质公园晋升为国家级地质公园

<http://www.sxtour.com/portal/lyzx/detail.jsp?contentId=5562>

人民网：《2001年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4.6”瓦斯爆炸事故》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67613/67769/64589/68250/4611084.html>

新华网：《陕西矿难是44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最大的安全事故》。转自新浪网新闻中心

<http://news.sina.com.cn/c/2004-12-03/21214426863s.shtml>

【全书完】

# Contemporary Documentary Literature: *Sanlidong*

(*Sanlidong*: Image history of miners from Shanghai to  
support the border areas)

By  
LIN Xin

## Introduction

With a short history of only twenty years or more, Chinese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expressive depth, have preserved unusually abundant and perceptive memories of this rapidly changing era. Besides, they have been sharp questioners of society and art, which is shocking as well as thought-provoking.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auteurs' bravery aggressiveness and their quickly accumulated works,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has been greatly lagging behind. The phenomenon can be witnessed from that most of the relevant explorations are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movie reviews with few fieldwork, which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truth that documentaries should be rooted in real life. The lack of first-hand information will not only jeop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mage recordings, but also engender absence of strong theoretical backing to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which will find difficulties in seeing their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and will be declining under both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pressure.

*Sanlidong* may become a turning point. The auteur LIN Xin is a frontline soldier with self-reflective wisdom and courage. Day by day, he and his wife honored their commitment by completing image data filing and compilation of over three hundred thousand words. *Sanlido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based on fieldwork in addition to *Bumming in Beijing* by WU Wenguang previously. The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Sanlidong* and the E-zine *Film Auteur* has enlightened us that:

Auteurs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are seeking combination of texts and images instead of images alone. Only with the mastery of multiple languages can documentaries possibly grow and thrive into accretionary and vigorous culture, not just a wrathful but faint cry.

In 1955, over 300 ardent young people from Shanghai went to Sanlidong Coal Mine in Tongchuan with hopes and dreams to support the Great Northwest construction. 50 years later, most of the builders passed away. On the land where coal buried, the sound of the miners' fate and breath keeps omnipresent. As the son of a miner, in 2005, the auteur went deep into the mine

district to find those survived miners still living in Sanlidong where he completed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This book is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s well as an in-depth text. The miners' oral records, sorting out from a mass of images and video clips, are true reflections of the miners' life and the disappearing era. The author's reminiscences of Sanlidong and thoughts on shooting can serve as another perspective. The book also contains texts about the shooting process, scripts corresponding to pictures, chronologies, stills, dialogues, poems, paintings, and maps, etc.

All the pictures in this book are taken, drew or provided by the auteur, except for those specially indicated.

By Dr. GUO Jing  
Chief editor of Image Recordings Library of China  
Researcher at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Contents**

**Preface: the narrations of local people and the light of documentaries**

**Chapter I : my memory of Sanlidong**

**Chapter II : looking for the miners about to fade in the dust of time**

**Chapter III: scripts of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Chapter IV: 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Chapter V : oral records of the miners in Sanlidong**

**Chapter VI: oh, my father**

**Chapter VII: a dialogue between WANG Xiaolu and LIN Xin**

**Appendix**

**Epilogue**

**References**

## Contents

### **Preface: the narrations of local people and the light of documentaries**

#### **Chapter I : my memory of Sanlidong**

Hometown,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North public housing  
Going to school  
Taicang (Part One)  
Film  
Yegen  
Sanlidong Coal Mine High School  
Memento  
Taicang (Part Two)  
My mentor: CHEN Jiayong  
Unemployed  
Bros  
The elopement  
Grief over the deceased  
The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Garcinia  
The poetry anthology  
Brothers  
My cousin's bitterness  
The growing of Sifan  
CHEN Lu  
The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Sanlidong, Sanlidong  
Life is moving on, and the shooting is moving on  
I am from Tongchuan

#### **Chapter II : looking for the miners about to fade in the dust of time**

Before shooting  
Shooting diary on the first day  
I can never look directly into his eyes again  
Uncontrollable hearty laughter  
The old photos are not saved  
The influential man: GE Dengfa  
He is not that talkative  
Deputy mine manager: LU Rongchu  
The obscured memories  
In *Grass Dam* Community  
The helpless nostalgia  
He said haltingly

Those were pains he would not like to mention  
In Shilipu  
Looking for TONG Guang  
A lucky man  
CHEN Yixiang  
The construction division  
109 names  
Memories pulled back from the dark  
My father: ZHU Yongsheng  
Traces of the coal mine

**Chapter III: scripts of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QI Guoqi  
GU Longxiang  
SHEN Longgen  
WANG Zhengxiang  
YAO Hongchang  
GE Dengfa  
ZHANG Baisheng  
LU Rongchu  
ZHOU Shougen  
LUO Shijun  
DING Fuzhen  
TONG Guang  
GAO Zhangshun  
CHEN Yixiang  
ZHU Yongsheng

**Chapter IV: 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My principles of shooting  
Surrender to the logic of life  
Angles  
Colored VS black and white  
Trilogy of life  
Group portrait  
Two parts: scenery shot and recounting orally  
The structure  
Poem: my presence  
Time  
Space  
The appearance and the truth  
Rough and exquisite  
The voice  
Editing  
The version

Restrictions and responses  
Amateur  
Intuition  
Culturally colonial mentality and confidence  
The border  
The style  
A few thoughts on the language of lens  
Details in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Images: macro-history and individual memories

### **Chapter V: oral records of the miners in Sanlidong**

GU Longxiang

GU Longxiang  
ZHU Yongsheng  
Dialogue 1  
Dialogue 2  
HE Juzhen

SHEN Longgen

You cannot go in the tank until you finish shoveling coal  
With waist bent, being puffing hard

WANG Zhengxiang

You have to come  
The great roof fall  
I'm not interested in coal mine  
The explosives I use may load several wagons  
I slapped them  
Only a few people alive  
I remember your mother's words till now

YAO Hongchang

If I left, I would be a deserter against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anlidong Mine was the first modern coal mine in northwest China  
He devoted himself in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Northwest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Shanghai. Anyway, people die everywhere  
ZHU Yongsheng is an honest man whenever be mentioned  
If you can find a job, you just do it; if you can't, .....

GE Dengfa

I should be the first to bear hardships, being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 was well-known in Tongchuan at that time  
I dug up a dozen of miners  
I think of the mine as my home, but finally I lose my home  
My kids complain, but what I can do is just listening  
Your father's life is full of hardships  
There was no other choice but leave the coal mine

ZHANG Baisheng

I am from rural areas; I am not afraid of hard work

I was buried again because of the fall  
 LU Rongchu  
 I did a good job among over 300 people  
 Since then, it was hard, really hard  
 There wasn't enough food  
 It is defined as a safe mine where number of deaths is within the criteria  
 It was never easy. The home is like a fool's errand

ZHOU Shougen  
 It is a great honour to support the Great Northwest construction  
 I can complete all the tasks in advance the leader assigned to me  
 It seems that I was just finished a movie in Qiyi Road Cinema  
 Anyway, there is a skeleton in every house.  
 I was deceived to study in technical school for three years

WANG Junyan  
 I was in charge of the ventilated area  
 I had to wear wet clothes for 8 to 9 hours a day  
 The gas inspector had to check when blasting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are still alive  
 He was still in the ventilated area when I left  
 She asked "for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LUO Shijun  
 I think it's honored to support the Great Northwest construction  
 I dug up those could be, but let them go if could not be  
 I cried and said there were no tickets.

NI Jinxiang  
 I lived in vain for so long with nothing left

DING Fuzhen  
 Four workers had to load 24 tons coal in one day  
 I saved over 20 people just for this action  
 Although it is reported that it's on fire, we had to produce coal as usual

JIANG Xinghuai  
 If you don't work, you will be conquered people  
 It is not easy to work till retirement and survive in a coal mine

WANG Fukun  
 The northwest China is not bad; at least there is sunshine  
 Some died; some retired; and some went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As for working in the coal mine, being a little bit careless will lead to an accident

MIAO Dexin  
 We were told to support the Great Northwest construction,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lie  
 Tunneling was to blaze the trail for coal mining

CHENG Miaoxiang  
 Our minds were faltering at that time  
 Since fears were of no use, we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do so

TONG Guang



My Inglorious past

A watch

Yes, yes, yes

I was trumped up a charge of committing suicide to escape punishment

The petition

A strange thing

This was a scrap house

GAO Zhangshun

I've been working in Tongchuan for several decades, through ups and downs

After the bankruptcy, those young people under 45 offered to sell out seniority

CHEN Yixiang

It's the only future. All of you are important to the country

He knows me when asked

It's really hard in the mine district. It is not true just to say the work is easy

Our generation is doomed

The coal is transformed from forest according to archeological evidence

ZHANG Tianfei

There is just one or two hundred yuan for medication every year, only enough for a few transfusions

YE Yongkong

I went back to my line of work in the timbering factory

MAO Laofu

I was transferred to be a bricklayer in Red Flag Construction Division

ZHU Abao

Just live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CHEN Changshou

We were showed the film *Donbas Miners*

For me, it was hard to pick two out of 100.

LU Fugen's wife

Nothing left when a man is dead

I have never lived in ease and comfort with my husband

Work in Shenmu to earn a living

QIU Shuibiao

He said that you apprentice to the master worker Mr.Zhu

Oh, that's stuck in the roof fall

## **Chapter VI: oh, my father**

Burning

Oh, my father

My unforgettable father

The silent view

On the train to the west

I am attached to my mother

Van Gogh; Van Gogh in yellow

The end of life is the beginning of death

The black memory  
The black lightning  
The wolf  
Two flowers growing from the same base  
The younger of my sisters  
This was my home  
The wedding day of the elder of my sisters was settled  
The candlelight  
Stars of three levels  
Space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 **Chapter VII: a dialogue between WANG Xiaolu and LIN Xin**

The power of group portrait  
A physiognomy of the society is a sublime documentary

### **Appendix**

A coal city on the Loess Plateau  
Administrative Map of Tongchuan City  
Location map of mines by Tongchuan Bureau of mines  
Schematic coalface  
Tabl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anlidong Coal Mine over the past years (1)  
Tabl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anlidong Coal Mine over the past years (2)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Sanlidong Coal Mine  
Chronology of major events in Sanlidong and Tongchuan Bureau of mines  
The name list of some of the miners from shanghai working in Sanlidong Coal Mine in 1955  
Chronology of ZHU Yongsheng's family and major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production and exhibition of the documentary *Sanlidong*  
Documentaries directed by LIN Xin

### **Epilogue**

### **References**